

大明亡国史

崇祯皇帝传

苗棣 著

才自精明志自高，生于末世运偏消。

而不动声色励精图治的年轻君主

是如何起早贪黑辛辛苦苦走上破家亡国的不归之路的。

辽宁人民出版社

VISIT...

LANZAROTE
Caliente.com



大明亡国史
崇祯皇帝传

苗棣 著

才自精明志自高，生于末世运偏消。
他不迷声色、勤勉图治的年轻君主
是如何起早贪黑辛辛苦苦走上破家亡国的不归之路的。

辽宁人民出版社

目录

封面

关于“回顾丛书”

再版前言

首版前言

卷壹 平步青云上九重

一 深宫少年

二 信王殿下

三 初登大位

四 拨乱反正

卷贰 守业艰难百事多

一 会推风波

二 己巳之警

三 西北烽烟

四 朝中朋党

卷叁 励精图治总无期

一 刚明求治

二 下诏罪己

三 君臣之间

四 战和两难

卷肆 烽火惊传事日非

一 三十而立

二 枢辅督师

三 江南復社

四 松山败绩
卷伍 生于末世运偏消
一 绝处图强
二 土崩瓦解
三 煤山惨雾
四 遗胤余波
崇祯帝大事年表
主要参考书目



大明亡国史

崇祯皇帝传

苗棣 著

才自精明志自高，生于末世运偏消。
他不迷声色、励精图治的年轻君主
是如何起早贪黑辛辛苦苦走上破家亡国的不归之路的？

辽宁人民出版社

关于“回顾丛书”

约半年前，艾明秋女士来电，要我“再做点贡献”。小艾是辽宁人民出版社文史编辑室主任，也是我的第一本书《大汉开国谋士群》的责任编辑，我们的合作非常愉快，进而“成为生活中的益友”（张立宪语）。

对小艾的要求，我一向近乎有求必应。听她谈过初步设想后，觉得挺有意思，可以操作。随后，辽宁人民出版社副总编辑张洪兄来电，进一步讨论、商定了相关细则。这便是“回顾丛书”的由来。

“回顾丛书”拟每年出一辑，每辑6册左右。以经过时间和市场淘洗的旧书再版为主，新作为辅；以专着为主，文集为辅；以史为主，政治经济军事社会思想文学为辅。入选的各类书籍，都是我所感兴趣的，有料，有趣，有种。回顾的目的，当然是为了更好地前瞻、前行。

太白诗：却顾所来径，苍苍横翠微。2008年初夏，收到首册样书时，欧洲盃激战方酣。去年秋天再版，新书出炉时，我正沿着318国道驱车前往珠峰大本营。此情此景，宛如昨日。我想，再过五年、十年，回过头来看这套“回顾丛书”，又会是什么心境呢？

是为序。

樑由之

2013年6月6日，夏历癸巳蛇年芒种后一日，于深圳天海楼。

再版前言

1992年到1994年，我为《吉林日报》的副刊写过十几篇文章，基本上是与文史有关的杂文，用的笔名“老陶”。其中有一篇原来题为《皇太×》，发表时被改为《君主继承人的两难境地》，议论在专制皇权制度中继承的艰险，引起了吉林文史出版社一位前辈的注意。这位老先生来京找我洽谈，定下来为其写一本专门讲中国歷史上君主继承惨案的通俗读物，我定的书名叫《血腥的继承》。为了这本书，我又找到人民大学的同窗好友徐怀宝，商量构架，分头执笔。书稿先写了几万字，连同框架目录送给出版社先看，回覆说似乎还不够通俗。我们也愿意再适应，但后来就没了音讯。这是1993年的事情。

也许是这次种下的种子，到了1994年春天，吉林文史的另一位编辑王桂兰女士又同我联繫，说是准备出一套明朝皇帝的传记，问我有没有兴趣。我在前几年刚刚完成了一部关于魏忠贤专权的歷史着作，正好在这一年由社会科学出版社出版，题为《魏忠贤专权研究》，对明末的歷史还在兴头上。但天启一朝的事已经嚼过一遍，无意重温；而崇祯的事蹟则在那部魏忠贤专权中刚刚起了个头，很想继续探究，于是答应写一部崇祯传。按照出版社的思路，既要严格忠于史实，又要生动可读，对于较难解读的古文，引用时要适度翻译。

明末的现存史料极其丰富，一部皇帝的传记又会几乎涉及到整个帝国内外政治、经济、社会、军事、文化的方方面面，因此浏览各种典籍，建立对崇祯帝个人和他的帝国的整体印象，很费了一番精力。直到这年9月，学校开学了，才算进入正式写作的阶段。

当时我在北京广播学院担任着广播电视文学系的副主任，教的课是“电视文化学”，好在并不算繁忙，每週总有三四天时间可以全心全意地写作。妻子那时在美国参加一个奖学金项目，家里只有我一人，写作的时候，基本上是每天起床后打开286电脑，一面翻书核实材料，一面用WPS软件录入书写，写得畅快时常常是到晚上九十点钟才停下来做饭吃饭。歷史其实一点也不枯燥，那里面多少人物的运途起落、悲欢离合，真比一部大戏更精彩。

直到年底，写完那句“苍茫大地，真是干净”，才算长舒一口气，也从此告别了我非常喜欢的史学领域。

吉林文史的《崇祯帝》是其《明帝列传》系列中的一部，1996年1月出版，第一次印了1万册。十多年后，2007年，中国社会出版社又想起要出一套明朝皇帝的传记，但不是重起炉灶组织编写，而是用已经有了版权自由的旧稿统一编辑，拙作得以再版。这一系列名为《正说明朝十二帝》，我的那部题为《崇祯皇帝大传》，2008年1月出版。中国社会这一系列装帧印刷较为讲究，还在文中插入了许多歷史图片，但由于文字总量有要求，我自己删除了原稿中大约十分之一的内容，原书的前言也没有录入，有些遗憾。

这次再版，则是由樑由之先生推荐联络，辽宁人民出版社的非系列单行本，也是几乎没有做任何改动的原稿本。樑先生和我以前并没有见过面，但在网上神交已久。他对我这部崇祯传一直抬爱有加，为了让这本完成于近20年前的旧着能有更多的读者，颇费功夫。在这里我只能表达深深的谢意，同时也要感谢负责本书组织编辑工作的艾明秋女士。

希望这部新版的旧着，能为读者带来穿越歷史、直面古人的快意。

苗棣

2013年秋

首版前言

在我们的歷史上，有过许多次盛衰兴亡，于是也有了许多开国立业的君主和丧乱亡国的君主。有趣的是，开国之君的伟大大体上都是一个模式，而亡国之君的遭际却往往极具特色，各有各的不同。在形形色色的亡国之君中，明末的崇祯帝显然是最有特色，也最引人注目的一个。因为至少从表层现象来看，这个崇祯帝根本就不具备人们通常以为的一个亡国之君应该具备的那些特徵。

难怪明末的遗民们会为此发出许多感慨。

钱馨（音同“声”）在《甲申传信录》卷一中说：“上英谋天挺，承神庙、熹庙之后，励精图治，骎骎然有中兴之象。然疆场外警，中原内虚，加以饥馑荐至，盗寇横出，拮据天下，十有七年，神器遽移，遂死社稷。呜啖！英谋睿虑，曾不一施，其留恨又何极也！”他对于崇祯帝的死和明朝的亡国表现出极大的遗憾之情，而且显然认为，“英谋天挺”而又“励精图治”的崇祯帝对于明王朝的覆灭并不负有什么主要责任。

邹漪的《明季遗闻》序中则把崇祯皇帝与歷史上一些失德丧邦或是导致国家衰败的君主们做了比较，更觉得明朝亡在崇祯帝之手实在是很难理解的事情。这篇序中说：“先帝以圣明在御，旰食宵衣。比之太康之尸位，厉王之内嬖，哀、平之外戚，惠帝之昏弱，明皇之淫荡，道君之放逸，百无一似，谓宜治平立至。而逆寇犯阙，身殉社稷，言天言人，都不可信。”既然崇祯帝要比夏朝的太康，周朝的厉王，东汉的哀帝、平帝，西晋的惠帝，甚至风流倜傥的唐玄宗和宋徽宗都要强得多，完全没有他们身上的那些毛病，为什么亡国的灾难还要落在他的头上呢？

的确，不论是同歷朝歷代的君主们相比较还是同明朝的列祖列宗们相比较，崇祯帝都不能算是一个很差劲的皇帝。他好学勤政，严于律己，人也相当聪明干练，具有这样全面素质的帝王在中国数千年的歷史上实在是并不多见的。但他生不逢时，正好赶在一个最不利于实施统治的时代登上了君临天下的宝座。

在中国歷史的治乱循环中，一直有两大主题在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一个是多年相对安定的社会生活必然会造成人口的膨胀，而当人口总量超过当时的经济发展和社会结构所能承受的限度的时候，就必然会产生以人口危机为前导的巨大的经济危机和社会危机；危机的总爆发酿成灾难性的大乱，其结果是通过饥荒和战争等恶性手段大量消灭现存人口，首先解决了人口危机，而后在这个基础上重新筑造治世。另一个主题表现在文化方面，承平日久和悠久的歷史文化传统往往使得以中原统治阶级为承载主体的中原文化在多年治世之后表现出严重退化的迹象，于是政治腐败、道德沦丧、世风绮靡、武备孱弱；这种古代的“过度文明”症状同样会给整个社会造成巨大危机，而这种危机往往要通过一个或数个边疆地区的少数民族军事集团对中原的进犯和蹂躏才能得到解决——清新的“野蛮精神”给中原文明注入了新的活力，接踵而来的也许会是一个文治隆隆武功赫赫的盛世。

而在17世纪上半叶，也就是崇祯帝策御宇内的时候，中华帝国却正好处在一个最敏感的危急时刻。此时，明帝国的人口密度按当时情况已经达到超饱和的程度，而长年的干旱和平均气温下降造成的农业生产衰退更加重了人口危机的烈度，开始出现连年不断的全国性大饥馑。这是一种明王朝自身机制根本无法解决的灾难性危机，因而尽管崇祯帝和他的大臣们绞尽脑汁，却无论如何也缓解不了越来越严重的大饥荒，也无法扑灭由饥荒引发的农民大暴动。在崇祯帝17年的统治中，他一直对以李自

成和张献忠为代表的所谓“流贼”充满了刻毒的仇恨和绝望的恐惧，却很少清楚地意识到，在农民起义者背后决定着明王朝最后命运的正是谁也无法摆脱的飢饿之神。

同样在这个时候，明王朝的“过度文明”症状也已经发展到了无以復加的程度。在崇祯帝上臺之前帝国刚刚经歷了魏忠贤专权的灾难性事变，那段为时不长的“黑暗时期”其实恰恰反映出明帝国在整体上已经极度腐败。崇祯帝在剷除掉魏忠贤集团之后却不得不继承下那个集团给他留下的全部政治遗产，其中包括一整套僵化、繁琐、效率低下的政治结构，朝臣间激烈而又毫无原则的党争，制度化了的普遍贪污腐败，荒谬的军事体制和由它造成的武备的极其衰弱无能，国家各级财政的极度拮据……也包括明末士大夫只知一味高唱理学的道德至上高调（奇怪的是与此同时士大夫们，甚至许多大理学家们的道德水平相当低下），对于经邦治国却毫无能力可言。中原文明的败落给了边疆少数民族部落极好的机会，这个机会被满洲军事贵族抓住了，在一次次对明王朝这棵大树进行过无情砍斫之后，皇太极的继承人终于进入了北京，成为“天下”的统治者。

在崇祯帝上臺的时候，他的帝国即将灭亡的命运已经无可挽回，这也许是其悲剧的基本原因。对此，许多人就归结为“天命”或是“国运”，而崇祯帝本人则强调“朕非亡国之君，臣尽亡国之臣”。但他本人真的就没有一点责任吗？对于这一点，清代的歷史学家们已经在进行认真的讨论。胡智修在《居业堂集》卷二十中说是“烈皇所以被诬者四：曰自用，曰愎戾，曰吝，曰用宦官”。所谓的“诬”其实就是时人为崇祯帝总结的主要弱点。距离明亡时间较远因而也能持比较客观态度的全祖望更明确地指出：“庄烈自言：朕非亡国之君。夫其忧勤明察，固不可谓为亡国之君，然性愎自用，怙前直往，自亦不能辞于亡国之咎。大抵庄烈召祸，内则

退宦官而不终，外则吝于和议。……”（《鲒埼亭集》卷二十九）从政策的角度来讲，全氏认为崇祯帝主要有任用宦官和不能同清朝和谈两大失误，这方面值得进一步探讨；而在个性或者说政治作风方面，“性愎自用，怙前直往”和清初人们普遍评价的“自用”、“愎戾”则完全是一致的。

在深入接触文献材料之后，每个人都会对崇祯帝的自作聪明、自以为是、固执多疑和刻毒残酷留下深刻印象。但是，如果将崇祯帝的性格特点追溯到他的幼年时代，我们就会发现那些个性其实本来并不算怎么恶劣，在一般人身上顶多是无伤大雅的小毛病罢了。可怕的是，这些本来并不算十分恶劣的性格特徵，一旦同专制皇帝的绝对权威结合起来，却变成了一种令人震惊的破坏性力量。崇祯帝作为一个歷史上少有的积极有为的皇帝，又把他自己的人格力量发挥到了极致。从某种意义上说，正是崇祯帝的这种积极精神加速了明王朝的灭亡。有些古代学者已经隐隐约约地感觉到，如果在明末天子宝座上的是一个比较昏聩无能的皇帝，例如万历或是天启那样的皇帝，明朝的国祚也许还能再苟延一段时间。

因积极振作而误国而亡国，这本身就是个足以令人震惊的话题，顺着这个话题说下去难免就会牵扯到对于君主专制制度的批判。17世纪中国最伟大的思想家黄宗羲就是在含着血泪总结了亡国痛史之后，才写出那部着名的《明夷待访录》，在中国歷史上第一次对君主专制制度进行了理性的批判，勇敢地提出：“为天下之大害者，君而已矣。”因为“今也以君为主，天下为客，凡天下之无地而得安宁者，为君也”，故而“天下之人怨恶其君，视之如寇仇，名之为独夫。”（原君）

在《明夷待访录》中，黄宗羲一点没有提到崇祯帝和他的歷史教训，这或许是出于一种难以克服的遗民情结。但从其内容来看，却不难找到崇祯朝事的影子。黄宗羲在《置相》一章中提出用相权限制君权，提出人

臣要做君主的“师友”，要“为天下，非为君也；为万民，非为一姓也”。这就很容易使我们联想到崇祯朝五十宰相昏昏碌碌、奴颜婢膝的实况。而在《学校》一章中所言的“天子之所是未必是，天子之所非未必非”，和关于“天子亦遂不敢自为是非，而公其是非于学校”的大胆政治设想，显然也是深深有憾于崇祯时期天子刚愎自用，以致杀身亡国的惨痛记忆。

一个早在300多年前把绞索套在自己脖子上的专制帝王的故事，大概正是从以上的角度讲，对于我们的现代生活，还是不无借鑑意义的。

苗棣

1995年2月7日于美国斯坦福

卷壹 平步青云上九重

一 深宫少年

明万历三十八年十二月二十四日（1611年2月6日），京城里鞭炮声此起彼伏。这天是立春的日子，又接近岁末，人们刚刚在严寒中祭过能够上天言好事的灶神，正忙着准备过年。紫禁城里的嫔妃和宫女、太监们也都随着新年的临近而忙碌兴奋起来，蒸点心办年货，裁绸缎制新衣，贴春联剪窗花，宫里还要设鳌山，扎彩灯，备办烟火，真是热闹非常。就在这一片喜庆热闹当中，一个男孩在紫禁城东华门内的慈庆宫里呱呱坠地了。

男孩的父亲是慈庆宫这组庞大建筑的主人，当时的东宫太子朱常洛。朱氏家族统治明朝帝国已经200多年，到万历年间更换过13个皇帝，新诞生的婴儿是太祖朱元璋第十一世孙。在200多年间，太祖朱元璋家族的子孙十分兴旺发达，此时各枝各脉的男性皇族宗室已多达60万有余，但每一位宗室成员由于同代代相传的皇朝天子血缘关系远近不同，地位悬殊，有着天壤之别。远枝别脉的小宗子弟衣食都没有着落，有些人年过半百还娶不上妻室；而大宗的亲王、郡王们却拥有数万顷良田的资产，在王朝中有着至尊至贵的崇高地位。作为太子的朱常洛在整个宗族以及天下万姓之中又是地位仅次于当今天子的第二号人物，一旦万历帝去世，他就将继承皇位成为帝国最高的统治者。

但这位当今皇帝的法定继承人此时的心情却并不很愉快。因为尽管在生活上有洞房清冷、锦衣玉食，身边又是妻妾成群、僕婢盈堂，但他总是能够清楚地感觉到，自己的皇储地位并不稳当。他的父亲明神宗万历皇

帝朱翊钧明显地不喜欢这位长子，而且宫中朝中乃至京城的市井之间，近年来一直都在流传着一些听起来不像是全无根据的流言，大体上都是说皇帝和他宠爱的郑贵妃想要找机会废掉现任太子，改立郑贵妃亲生的皇三子福王朱常洵。有些流言甚至有鼻子有眼地勾勒出郑贵妃一党阴谋活动的各个环节，让太子宫中的上下人等听了难免有些不寒而慄的感觉。

虽说是处在有点朝不保夕的焦虑之中，但年还得过，而且得到一个儿子毕竟还是令人高兴的事情。太子这年已经29岁，（按本书中所提到的年龄，除特别指出者外，均系当时习惯使用的虚岁。）正妻太子妃郭氏没有生育过子女，另外几个侍妾却为他生了不少儿女。这最近一个出生的儿子排行第五，生母是在太子宫中地位相当低微的一个小妾刘氏。生母地位的微贱和在兄弟排行中的劣势似乎决定了这位新出生的小王子不会有什么了不起的远大前程。根据明代的宗室封爵成例，如果朱常洛最后终于坐上了皇帝的宝座，他的全体儿子除了由最年长的继承帝位之外，都要封为亲王，但也仅只是亲王而已，照例要远徙他乡，严禁干政。由于这样的原因，慈庆宫里趁着过年的机会，为这次弄璋之喜小小地庆祝了一下，但比起当年朱长洛的长子朱由校出生时张灯结綵的一番热闹相差得很远，紫禁城中其他宫廷院落里忙碌着的人们对于这件事也没有引起什么注意。

小王子正好在立春这一天出生，如果是在民间，或许会因此得到一个“春生”之类的乳名。但皇家体制森严，没有民间那些世俗的习气，在这个男孩出世后不久，宗人府就根据太祖皇帝钦定的子孙排行字序为他择定了一个郑重其事的嘉名，叫作朱由检。

在幼年，小王子朱由检一直生活在一种沉闷而又冷峻的气氛中。太子地位不稳定造成的人心惶惶使东宫中的姬妾、宫女和太监们宁可明哲保

身，尽量少出头少说话；前途的莫测又加剧了宫廷中本来就层出不穷的钩心斗角、相互仇视和中伤。这位小王子也算是命途多舛，他的生母刘氏并没有因为给太子生了儿子而母以子贵起来，反而在哺育儿子的期间遭到太子的冷落与厌恶。刘氏为此郁郁寡欢，竟然积郁成疾，在她的儿子才只虚岁5岁（实际只有3週岁）的时候，就抛下了亲生骨肉，死了，当时只有23岁。

小王子自有乳母餵养着，而且太子还指定了一位宠妾李选侍（康妃）作为这第五个儿子的直接监护人。但缺乏生母之爱还是给这小王子心灵上烙下了深深的印痕。十几岁上，他受封为信王，曾经留意向宫中的老太监打听："听说生母刘老孃娘葬在西山申懿王坟附近，你知道吗？"老太监说知道，他就拿出银两，祕密派人前去祭奠。后来登上帝位，他隆重地追封生母为孝纯皇太后。此后，又急切地想要找人画出生母的遗容——因为无论他对于亲生母亲怎样思恋怀念，却没有办法靠着幼时的记忆为自己提供一个具体的形象。后来仍然是由几位老太监在宫中选择了一个相貌较为相似的宫女做模特，再凭着回忆指点，总算绘出了一幅刘太后的遗像。他的外祖母刘老夫人那时候还健在，见到画像认为也还说得过去。崇祯帝对着遗像大哭了一场，才算了结了自幼留下的遗憾。

太子朱常洛总共有过7个儿子和10个女儿，分别出自他的一大批侍妾，但这十几个儿女中的大多数都在婴儿时期就夭折了——宫中虽然奢华富有，医疗卫生条件却并不比民间好多少，婴幼儿的死亡率极高，哪一位龙子龙孙或是金枝玉叶能够坚持到长大成人，全凭运气。在朱由检童年的生活中，可以算得上兄弟伙伴的只有大哥朱由校（后来的天启帝）、三哥朱由楫，以及后来封为乐安公主、遂平公主和宁德公主的三位小妹妹。但几个兄弟都被各自的生母或是养母把持着，作为日后兴旺发达的政治资本，每个人身边又都簇拥着一大群宫女太监，相互间基本上没有

什么交往，也没有机会像百姓家的小孩子那样集合在一起玩耍打闹。对于一个孩子来讲，没有童年的伙伴，本来就十分寂寞难耐的深宫生活更显得沉闷无聊。

在生母刘氏死后的第二年，也就是万历四十三年（1615），慈庆宫里却突然发生了一件引起极大轰动的事件，打破了深宫的沉寂。

那年五月初，宫里正在忙着准备过端午节的时候，一个手持枣木梃的中年男子不知怎么混进了东华门，突然窜到慈庆宫的门前。此时太子正好没有住在宫里，因而宫门的防卫不严，在慈庆宫守门的只有两个六七十岁的老太监。那汉子不顾门卫的阻拦，用木棍打伤了值班的两个老太监，径直闯进宫里，到了正殿前才被蜂拥而上的太监们制服。闯宫的汉子立即被押送到刑部进行审问，得知，此人名叫张差，35岁，是蓟州（今天津市蓟县）一个无家无业的游民，平日靠砍柴卖草为生，至于这次闯宫的目的和背景，他交代得语无伦次，前后龃龉。在歷史上，各朝各代这类莫名其妙的擅闯宫禁事件层出不穷，大体上以精神或是智力方面有缺陷的疯傻人员居多。初审的刑部司官们也就依照疯子闯宫的路子，在所录供词中强调主犯的“按其迹，若涉疯魔”，希望就此了结此案。但这一次的事件（后来被称作“梃击案”）因为涉及了太子地位不稳这个极其敏感的背景，立刻就引起了朝廷上下猜疑四起，终于纠集成了一个解不开的政治死结。

朱由检的祖父万历帝有8个儿子，但没有一个是正宫皇后所生，按照传统的宗法制继承原则，“有嫡立嫡，无嫡立长”，皇长子朱常洛才被立为太子，成为法定继承人。朱常洛的母亲本来是万历帝生母李太后宫中的一个宫女，生出这位皇长子完全是事出偶然，并非真的得到了皇帝的宠爱。万历帝喜欢的是郑贵妃，两个人情意绵绵，而且那爱情持久、执着，至死不渝。郑贵妃也为万历帝生过两个儿子，皇三子常洵和皇四子

常治（另有一个皇二子少年即夭折）。万历帝很想立郑贵妃所生的常洵为太子。这样，皇帝的意图就同传统的礼法发生了激烈的冲突。



万历皇帝

不论儒家的经典理论还是列祖列宗的实践，都明确规定了“无嫡立长”的继承原则。对于儒学的信徒和皇朝的忠臣来说，这一原则具有绝对真理的性质。但是皇帝竟然想违背这一原则，在朝臣看来，就是溺于私情，很不光彩，很不道德，而且对于政治局势有着极大的破坏性。为了伸张天理，也为政治的稳定，朝臣们同皇帝的荒谬意图进行了长期的斗争。因为事关太子的确定，而太子是嗣君，被认为是国家之根本，所以这场斗争被称作“国本之争”。这“国本之争”大约从万历十四年（1586）起直到万历四十八年（1620）光宗继位，前后断断续续地闹了30多年，给明代后期的政治生活带来了极深远的影响。

在“国本之争”中，坚决站在立长原则一边，同皇帝进行无情斗争的，是一群在朝廷中虽然地位不太高，但是势力浩大的自命为“正人”、“清流”的文官官僚。由于这个集团中的首脑人物顾宪成等人曾在家乡无锡的

东林书院中聚众讲学，当时又称他们为东林党人。

早在万历二十二年（1594），去职的吏部郎中顾宪成同他的好朋友高攀龙、钱一本等人就在无锡宋代的东林书院旧址聚众讲学，一时名声大噪。许多在野的士绅闻风向附，以至于书院的学舍常常拥挤不堪。东林书院名义上是探讨经义，讲求学问，真正关心的却是时事政治，在书院的楹联上也分明写着：

风声、雨声、读书声，声声入耳；

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

东林书院在学术上高谈性理，以维护和发扬光大程朱理学为己任，提倡“存天理，灭人慾”。他们认为，明代自中叶阳明学兴起，程朱理学就开始衰微，于是人心世道都变得越来越坏，因而需要在士大夫中大力倡导光復理学，恪守儒家正统道德，用天理来纠正人心的偏差。在政治思想方面，他们对于自张居正以来出现的内阁集权的倾向非常不满，以为内阁的“擅权”造成小人争权竞进，严重损害了士大夫阶层的整体利益，也给国家和天子的权益带来损失。有一次顾宪成去拜访内阁大学士王锡爵，王锡爵对他说，近来朝中有一件怪事，“内阁以为对的，外论必以为非；内阁以为不对的，外论必以为是。”顾宪成却回答说：“外间也有一件怪事，外论以为对的，内阁必以为非；外论以为不对的，内阁必以为是。”两个人相对一笑而罢，政治理念和政治利益上的对立却表露无遗。

东林书院的主持者和参与者以及在全国各地同他们志趣相投、声气相通的人，再加上他们在朝野上下的支持者和同情者，逐渐形成了一个宗派。大体而言，这个宗派中人多是些注重道德修养的正人君子，在政治生涯中一般却并不太得志。既然有了宗派，他们在有意无意间就会利用各种手段为自己的宗派争取利益，特别是政治权力，于是展开了一系列

的政治斗争。那些对东林宗派很不以为然的人就送给他们一个名目，叫作“东林党”。

“党”这个字在古代是有明显贬义的，是指朋党之党，结党营私之党。东林党人自己只称东林，从来不说自己是党。这个东林党也不同于现代政党，并没有一个真正的组织，成员也没有严格界限。只要是观念上同东林一致，在政治斗争中站在东林一边，或是同东林人士有些门生故旧、亲朋好友一类密切关系，都可能会被划入东林一党，许多人也就因此以东林党人自居。但东林党人中佔比例最大的还是号称文明繁华之区的江南一带的士绅，特别是苏州、淞江（大体相当于今上海市的范围）、常州三府的士绅，因此东林党人在政治方面的要求常常体现着江南士大夫的实际利益。这样一个松散的集团中包含了不少社会名流，也有些是达官贵人，社会影响和政治实力都在日益增强。

那些在观念上与利益上同东林党相冲突的人，反过来也被东林人士看成“奸佞”，叫作“邪党”，在不同的时期又有“齐党”、“楚党”、“浙党”等不同名目。为了各自的政治利益，东林党人与“邪党”之间在各种各样的问题上争斗不休，朝中的官僚也形成了相互对立的两大派别。两个政治派别的隔阂越来越深，到后来，所谓“正”、“邪”两派已经到了水火不相容的地步，不论大事小事，原则问题还是非原则问题，双方都要赌气相争，朝廷自然也就被闹得乌烟瘴气。到万历后期，朝中党争已经成为一个对国务活动破坏性极大的问题。

在“国本”之争这个所谓大是大非的问题上，坚持正统宗法原则的东林党人自然是坚定不移地拥护太子派，并且同万历帝进行了长期的顽强斗争。而那些所谓“邪党”中的一部分人，却或是希望讨好皇帝捞取政治资本，或是愿意以一种息事宁人的态度来求得君臣之间的和谐关系，往往采取抹稀泥的调和姿态。于是有关“国本”的各种问题都成了万历年间党

争的重要话题，东林党的态度执着而偏激，常常还会神经过敏，弄得万历帝本人也十分难堪。

万历帝的个性原本是很软弱的，在朝臣的激烈抗争下，他虽然一再拖延、搪塞，还是在万历二十九年（1601）册立了长子朱常洛为太子。但这个决定毕竟是在朝臣的逼迫下做出的，所以他始终心怀愤愤、意气难平。为此，他在自己统治的后20年里对朝臣采取了消极怠工的策略，基本上不理朝政，既不上朝接见大臣，也不批阅事关政务的各种本章。由于皇帝在当时的政治结构中处于核心地位，皇帝的怠工自然会给朝臣们的日常政务活动带来极大的不便。朝臣为此屡次抗议，皇帝却依然我行我素，君臣之间的对立由此也就愈演愈烈。

万历帝的反常举动还使得朝野上下产生了极大的猜疑。既然皇帝对于立太子的事情如此耿耿于怀，他就完全有可能在某一个时刻改变原来的决定，重新确立太子。由于有这样的猜疑，朝臣们特别是东林党人们对于各种风吹草动就表现出了近于病态的敏感。他们曾经为了太子的读书问题、福王朱常洵的之国问题、京城出现的祕密传单（所谓“妖书”）问题等等，掀起过巨大的政治波澜。这一次，竟然有人提着枣木棍子直接去威胁太子的安全了，当然更加引起了他们的警惕和忧虑。

大多数东林党人根本就不相信“梃击”事件仅仅是一个疯子的无聊之举。根据他们的逻辑，郑贵妃和她的家人以及党羽时刻都在觊觎着太子的位子，每天都在阴谋策划着危及太子的声誉和生命，而皇帝也在暗中默许甚至支持着这些阴谋。既然如此，那个张差能够大摇大摆地手持凶器混进宫中，而且不闯别处，偏偏要闯太子居住的慈庆宫，显然是有人指使有人接应的一次有预谋的行动。

东林中的骨干分子刑部提牢主事王之寀是专门负责管理刑部监狱事务

的，他利用职务之便，在刑部对张差进行初审后的第二天晚上在狱中再度进行私审。这次审讯的结果令人十分震惊，张差招供说：他是由同乡的马三舅和李外父介绍给一个不知名老公（宦官），由那个老公带到北京，住在一个不知名街道的大宅子里。另一个老公让他“先冲一遭，撞着一个打杀一个，”并给他一根枣木棍子，领他由后宰门（地安门）进入皇城，混到宫里，后来打人被捉云云。这一次的供词里说的仍然带着几分疯傻气，但不论如何，他的闯宫却是有人阴谋主使的！东林党人的猜疑得到了证实。

王之寀立即把审得的情况向皇帝作了书面汇报，同时请求万历帝亲自出面再审凶犯，或者至少是由全体大臣共同参加会审。其他人敦促皇帝立即降旨深究的奏章也随后接连不断地飞进宫里，有些东林党人已经在奏疏中使用“奸畹”（指郑贵妃的哥哥郑国泰）这样的词语，把矛头直接指向了郑贵妃。不论这件事同郑贵妃有关还是无关，反正火是烧到她身上了。万历帝也明白，其实连他自己也已经受到了极大的牵连。朝臣们为了他自己的儿子的利益同他斗争了几十年，现在出瞭如此重大的针对太子的阴谋，群臣和百姓要对他产生怀疑恐怕也是在所难免。为了应付这场危机，万历帝一开始使用了惯常的手法，对议论“梃击”事件的奏章一律留中不发，想用沉默来淡化此事。但如此关系重大的事件岂能轻易被淡化？在朝臣的强烈要求下，万历帝最后只得同意由刑部再对张差复审。

复审是在十天以后进行的，参加的人员大大多于第一次。这一次张差招供得极其痛快，原来的马三舅、李外父都有了实指，还招出那两个不知名的老公是庞保和刘成。这庞保和刘成据说正是郑贵妃宫中的执事太监！如果情况确实如此，这“梃击”事件可以断定是一起郑贵妃阴谋杀害太子的未遂事件。但事情却有许多可疑的地方。最大的疑点就是这样的

阴谋太不合逻辑，太不合情理。暗害元嗣这样的重大阴谋可以有许多种方法，歷史上有的是先例，但由一个半疯不傻又不会半点武功的人，单枪匹马地用一根棍子冲破重重警戒去打死太子（就算闯进慈庆宫，他肯定也分不清哪一个是太子），实在是想象力所难及的最愚蠢的办法。反过来看，如果张差的闯宫确有人指使，那指使者显然并不希望达到根本不可能达到的打死太子的目的，而只想获得某种轰动性效应。郑贵妃恰恰是最希望置太子于死地（按照东林党人的说法）和最不希望引起人们注意的，所以几乎可以肯定，指使者并非郑贵妃。何况，张差的供词本身也还是很可疑。有人说张差在复审招供完时曾经大嚷道：“昨日教我的话，今都说了。”如果是真的，那问题就更加复杂了。

鑑于有这样的疑点，万历帝如果振作起来深入调查，其结果不见得会不利于郑贵妃和他自己。但生性软弱无能的万历帝宁可把事情敷衍过去。到了月末，他带着太子和几个皇孙一起，先在慈宁宫向着不久前故去的母亲李太后的亡灵进行了一番祝告，然后又在那里接见了内阁大学士以下的文武诸臣，演出了一场父慈子孝的闹剧。小王子朱由检也头一次亲眼见到了天子召见朝臣的政务活动。

当时才只有4岁半的朱由检还没有宝座前的御案高，对所见所闻的一切也还无法完全理解，但召见时那种森严冷峻的气氛还是给他留下了深刻的印象。被召见的朝臣们绝大多数根本就从来没见过皇帝的面，这时被天子身上散发出来的那股强大威严所慑服，个个目光呆滞，脸色沉重。万历帝却是强压着内心的不满，做出一副和颜悦色的样子。朱由检见到，体态肥硕的祖父装模作样地拉着一脸病容的父亲，对跪在面前的群臣们诉说：“这个儿子极孝顺，朕也极怜爱。如果朕有别的什么意思，怎么还会立他为太子呢？朝臣们到底是什么意思，要用流言蜚语离间我们父子吗？”而后祖父又特地把他和两个哥哥叫到面前，让群臣们看看仔

细，并且说道：“我的几个孙子都长这么大了，还有什么可说的？”父亲也打起精神责备朝臣：“我们父子亲情何等深厚，而外臣却无缘无故议论纷纷。你们这些作臣子的目无君上，害得我也成了不孝之子。”

朝臣们在皇帝父子这一番表演面前不知应该作出什么样的反应，全都噤若寒蝉。突然，跪在后排的一个官员大声怪叫了一句什么，把朱由检吓了一跳，朝臣们和万历帝父子也都十分吃惊，气氛更加紧张起来。据一些在场的人后来回忆，那位名叫刘光復的御史当时说的是：“皇上，东宫（指太子）慈孝！”显然是想阿附讨好皇帝和太子。但这个马屁没有拍对时机，正处在极度紧张状态中的万历帝根本没有听清楚他说的是什么，只见他疾言厉色，以为又是当面揭露顶撞自己。经过了一段死一样的沉寂，万历帝才有了反应，咆哮起来，当场命侍奉在左右的护卫太监把刘光復揪出队列，用棍棒打了个半死，又让人拉出去，到刑部从重治罪。

不凑巧的是，刘光復恰好是被东林认作“邪党”，竭力主张把“梃击”事件大事化小的，万历帝的一番淫威完全没有发对地方。但这龙颜一怒还是收到了震慑效果，没有一个人再敢当面同皇帝分辩。加上事件的苦主太子本人也出面弥合，朝臣们很难再争执不休，这个始终没有弄清楚的“梃击案”只得煳里煳涂地了结了。张差被立即处斩，马三舅、李外父等人仅处以流刑，而被指为庞保和刘成的两个太监（其实叫郑进、刘登云）抵死不招，后来由司礼监刑毙。案子虽然结了，却为日后的政治斗争留下了粗重的伏笔。

朱由检生平第一次参加的政务活动在一片混乱嘈杂的撕打中宣告结束。这也是他所接受的第一堂政治教育课，面对着群臣的跪伏和震恐，他感觉到了祖父那身为天子的巨大权威，而这种君臣关系的基本模式也深深印在他幼小的心灵中。在后来崇祯帝本人的天子生涯中，他一向以刚毅果断，对臣子心狠手辣着称，根子大概就是从那时候扎下的。

“梃击”事件闹腾过一阵之后，宫中又恢復了表面的平静，慈庆宫里的日子又变得漫长乏味。但在这种没有亲情、缺少欢乐的生活中，小王子朱由检还是一天天长大了。

深宫寂寞，缺乏母爱，又不被周围的人们重视，造成了朱由检敏感而又内向的性格。在这方面他同长兄，后来的天启皇帝，形成鲜明的对比。天启帝是从小被骄纵坏了的那一类男孩子，好玩好动，外露轻狂而内心却极为虚弱，凡事缺乏主见。朱由检却是个看起来十分安静的孩子，喜欢读书，十来岁就爱静悄悄地坐着唸书写字。因为父亲和祖父之间有一种特别的别扭关系，慈庆宫中几位小王子的教育问题一直被拖延着没有正式提到议事日程上来。他们本该在一个由高级学者组成的教授班子的严格指导下接受最正规的儒家经典教育，而实际上却是从身边几个有文化的太监那里学会的识字读书。好在朱由检是一个爱学习的孩子，没有教师就自己用功。明朝宫廷中的书籍，基本上都是“五经四书”、“二十一史”一类正规经史，读起来相当艰涩，他遇到书里面有不认识的字或是不懂的典故，就查阅宫中常用的工具书，像《洪武正韵》、《海篇直音》、《韵小补》之类。这样的自学过程反倒养成了他凡事喜欢独立思考的习惯。

他喜欢读书，也一直把读书当成一件严肃有益的正经事。有一次宫里一个陪他一起读书的小太监在朗读经典的时候因为不好意思，声音忸怩微弱，他就严厉地斥责说：“读书是好事，倒害羞；如果是唱曲子反而不害羞了吗？”通过读书，他懂得了不少圣贤的道理，也瞭解了许多歷史知识。这方面的修养使得这个安静的孩子在性格上逐渐养成了刚强而且十分有主见的一面，这一点，后来崇祯时期的朝臣们是充分体会到了。

宫廷生活刻板得极有规律，每一天都像是另一天的精密复制品。天明即起，小王子要向父亲和养母等长辈请安；然后是白天，唸书，写字，偶

尔玩一玩打弹子或是掉城（类似跳格子）的游戏；天一黑，就该安寝了，睡在宽大的木床上，能够听到紫禁城里寻更守夜的宫女摇着串铃，丁令令，丁令令，由远至近，近了，又远了。伴着铃声的是那好似含着无限哀怨的报更声：“天下太平——天下太平——”。

天下却并不太平。明王朝经过了200多年的沧桑，到这个时候已经是精华已竭，沉疴难治，早已是一片千疮百孔的状态。朝廷里朋党交闹，国无宁日；皇帝实行无限期罢工，政务混乱。各部门的任职报告大都被皇帝扣压留中，于是出现了各衙门有职无官的奇特现象，南北两京的六部尚书和左右侍郎职位有多一半都空缺着，有的部门只好由司官来临时掌管印信，地方官员的情况也好不了多少。管理混乱松弛正好为贪官污吏们大开方便之门，这一时期贪污成风，贿赂公行，贪污和贿赂的大量钱财自然都是从平头百姓那里蒐括来的。

百姓们有被蒐括敲剥之苦，又要经受数不清的天灾人祸。在万历皇帝统治的最后一段时期，南北各地接连出现大灾荒，大灾荒引起大饥馑，有些地方甚至出现了宰杀活人卖肉的恐怖事件。在死亡的威胁下，民间开始有人揭竿而起，白莲教、无为教等祕密宗教团体组织过许多次暴动，规模都不大，却引起社会的极大恐慌。有些官僚认为，一场黄巾、赤眉式的大暴乱就近在眼前。

内地危机四伏，边疆地区更不平静。北方的蒙古族察哈尔等部接连不断地对大同、宣府（今河北宣化）、延绥（今陕西榆林）等边防军区进行骚扰，西南苗彝土司又多次造反独立。最为严重的是山海关外的辽东地区，那里建州（今辽宁新宾县附近）地方的一个叫作努尔哈赤的女真族酋长从万历十一年（1583）以13副遗甲起兵，队伍不断壮大，到万历四十四年（1616）竟然建立起一个朝气勃勃的大金汗国（史称后金）。从万历四十六年（1618）起，后金开始对明帝国进行军事征讨，先是佔领

了战略重镇抚顺，而后于第二年在萨尔浒（今抚顺市东）同明朝的10万大军进行了一场决战。决战以明军的惨败而告结束，10万大军被歼灭了一大半。两年以后，辽东的主要城市渖阳、辽阳相继失守。明朝的辽东地区大体上相当于现在的辽宁省，当时属于山东行省管辖，但设有一个省军区级的辽东都司，基本上是个独立的行政单位，在明代边防中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明军接连大败之后，原来的辽东都司辖区只剩下辽河以西的一个狭长地带，东北边防极其薄弱。而后金政权却在不断髮展壮大，已经不是一般的所谓边患，而是要直接威胁到明王朝的生存了。

天下祸乱纷纷，宫中也并不太平。郑贵妃和皇太子两个派系的权力之争影响深远，背景不同的宫眷、太监明枪暗箭，钩心斗角。这场隐蔽的斗争直到万历帝死去之后才平息下来，但接下去的却是一场更加剑拔弩张的恶斗，只是主角换上了新的面孔。

万历四十八年（1620），朱由检11岁，又亲身经歷了一连串的宫廷混乱。

那年的七月末，万历帝突然重病不起，很快就一命呜嗯。这样，太子朱常洛总算是战战兢兢地熬出了头，在八月初一日即位当了皇帝，就是明光宗泰昌皇帝。太子东宫里的上下人等终于一扫几十年来压在心头的阴云，欢腾雀跃起来。国丧期间，宫里宫外到处都在披麻戴孝，但慈庆宫里，肃穆的孝服丧仪还是掩饰不住一派欣欣然的愉悦气氛。这里的主人成了“唯闢作威，唯闢作福”的皇皇天子，这就意味着，宫中的全体人员，不论是姬妾子女还是宫女太监，都将随着天子一步登天，得到大大的提升。在外朝中，一直忠心耿耿维护太子利益的东林党人同样欢欣鼓舞，他们几十年的艰苦奋斗终于要得到报偿，他们一直期待的以天理道德重振朝纲的计划终于可以实施了。果然，在不到一个月的时间里，大批的东林党人被起用或是提升，在朝廷的一切要害部门，从内阁中枢、

部院寺司直到六科十三道，到处都塞满了东林同仁。



明光宗朱常洛

光宗是憋闷了几十年才出头做了天子的，一时心情畅快，不免酒色无度，难于自拔。谁知乐极生悲，皇帝才只当了十来天，就生起病来。最初他还勉强支撑着参加御门议事的办公会议，后来吃了内御药房给他开的泻药，当晚就腹泻不止，从此委顿不堪。到了八月末，他已经感到痊癒无望，在召见大臣时问起了自己的棺材和陵墓的准备情况。此前，有个鸿胪寺丞叫李可灼的自称有仙丹能为皇帝除病，光宗病笃乱投医，此时倒很想试一试，于是让李可灼先后进上了两颗红色的药丸。光宗于当晚服下一丸后感觉颇佳，第二天又服了一丸，待到半夜之后就“龙驭上宾”，驾崩了。那时正是九月初一日的凌晨，光宗的天子生涯刚好维持了整整一个月。

对一个十来岁的孩子来说，一月之间连遭祖父、父亲两次大丧，不论是心理上的压力还是仪礼方面的劳累，都过于沉重了。皇帝的丧礼是天下

最隆重的丧礼，有一整套哭临、祭奠的繁缛仪式。朱由检作为孝子贤孙，那些繁文缛礼照例都是要参加的，仅跪在灵前灵侧放声痛哭（以示对于死者的追思怀念）一项就不知要重复多少遍，哭得很累，也很苦。在这段日子里，他沉浸在那些痛苦的仪式中，大概没有注意到宫廷里、朝廷里又在发生着剧烈的事变。

国不可以一日无君，在光宗死后的第五天，他的长子朱由校就即位登上了皇帝的宝座，就是明熹宗天启皇帝。但这次即位却弄出了许多曲折。

刚刚君临天下的这位少年天子同他的五弟一样，也是从小就死去了生母，也是由光宗的李选侍监护着长大的。李选侍能把握住光宗的两个幼年丧母的儿子的监护权，说明她当初在太子宫中的得宠程度确实非同一般。由于太子妃郭氏死得早，光宗即位之后，并没有人能够自然而然地成为皇后，李选侍就把这国母之尊看成了自己的囊中之物。她因为得宠，晋升皇后并非没有可能性，光宗在生前也确实数次提出要封她为皇贵妃（在宫中地位仅次于皇后，由于没有皇后，皇贵妃自然要主掌宫壶）。但礼部认为，新天子刚刚登位，连两位太后和元妃的谥号还无暇议及，晋封皇贵妃的事也只宜缓办。谁知光宗只一个月就故去了，李选侍不但晋身皇后的梦想成了泡影，就连皇贵妃的名号也没有捞到，实在是又悲痛又懊恼，于是生出一些“妇人之见”，想用手中把持着的小皇帝来作为同朝臣们讨价还价的资本。

天启帝是一个幼稚晚熟，又从小被娇纵坏了的孩子，直到当上皇帝的那一年，他已经16岁，在许多方面却仍然像个十来岁的儿童，毫无主见和独立意识。小皇帝特别晚熟，这给了李选侍一个机会。她以为只要能继续监护着这位皇帝，就能从中得到好处。因此，在光宗驾崩的当日，群臣到宫中同遗体告别，她就把小皇帝藏起来不让群臣见面。后来朝臣同内臣联合起来，连吓带骗，总算把天启帝弄了出来，于是山呼万岁地朝

拜了一番，既而不由分说，把那吓呆了的孩子簇拥到慈庆宫，断绝了李选侍和小皇帝的联繫。

皇帝被劫持，李选侍乱了章法，只好赖在干清宫不走。这干清宫是皇帝的寝宫，按当时的说法，“惟天子御天得居之，惟皇后配天得共居之”，并非什么人都住得的。李选侍先前因服侍光宗而住进干清宫，现在光宗已死，实在没有再赖下去的理由。揆其心理，她不过是希望朝臣们能有所妥协，大小给她个封号，也不枉辛辛苦苦监护小皇帝几年。只是在朝中得势的东林党人却不好惹，他们毫不妥协，今日一本，明日一本，还几次到宫中吵嚷争执，痛斥李选侍。李选侍手中没有了皇帝，已自洩气，熬了几日，只得悲悲切切离开了干清宫，搬进临时闲着的哕鸾宫，连行李也顾不上收拾。这一番混乱后来就被称作“移宫”。

在“移宫”的那些日子里，一向宁静的深宫里接连出现了少有的喧闹，也惊动了宫中上下一切当事的和不当事的人们。一月之间已由皇孙升格为御弟的朱由检也难免要耳闻目睹其中的许多细节。光宗即位之后，他跟随着李选侍同父皇和长兄一道搬进紫禁城中路的干清宫，在九月初朝臣们进宫的那次“哭临”（遗体告别仪式）中，也就亲眼看见了东林干将们那副捋袖揎拳气势汹汹的样子，还见到已经成为皇帝的长兄像个傀儡一样听凭朝臣的摆佈，悽悽惶惶，不知所措，多少次流着鼻涕掩面而泣。

他自己的生活也因为这次“移宫”而受到了极大的影响。李选侍被迫搬出干清宫标志着她的彻底失势，皇帝从此独立，不再由她监护，对皇五弟朱由检的监护权在同时也被宫中掌握着实权的大太监、东林党人的好朋友王安给剥夺了。朱由检被从她手中夺走，转交给了光宗的另一个侍妾，也姓李。当年在太子宫中，地位最高的侍妾正是这两位李选侍，因为居住位置不同，宫里的人们分别把她们叫作“西李”和“东李”，在“移宫”中倒霉的是“西李”，后来被封为康妃，而这一次接手监护朱由检的则

是“东李”，后来封为庄妃。朱由检毕竟已经在西李选侍身边生活了好几年，感情还是很深的。他在后来回忆说：“当年皇考（光宗）因为朕和先帝（天启帝）都是幼年丧母，命李选侍抚养。她爱我们如同自己亲生，朕和先帝也像对待亲生母亲一样尊重她。”此时为了他根本弄不明白的原因，一下子就把养母从他身边生生拉开，这位小御弟不免又惊恐又难过，却又无可奈何。他只得跟着新任养母东李选侍又重新回到原先居住的慈庆宫，住进后院东侧的勖勤宫里。不久他又听宫女、太监们传说，西李选侍被逼得仓皇搬离干清宫时，有人乘乱闹抢财宝，干清宫里乱成一团，李选侍忧愤交加，已经上吊自杀，李选侍的亲生女儿，一直被他当作可爱的小妹妹的所谓皇八妹，也被惊吓得投了井。后来证明这些传说不尽属实，但当时宫中那种纷乱慌悚的气氛却从中可见一斑。

那时候，朱由检还弄不清宫中的那些非常事件同政治大局的关系，他只是感到，大臣们一旦闹起事来实在是可怕而难缠。这一段生活经歷也使他对于东林党人有了一种不容易改变的成见，觉得东林诸臣真是见识偏激而又肆无忌惮。在以后的日子里，尽管社会舆论普遍给予东林党人崇高的评价，成为皇帝的朱由检却持强烈的保留态度。

身为天子的天启帝在一群强悍的朝臣手中夺来抢去，除了哭天抹泪之外毫无办法，年幼而又没有一点权势的御弟朱由检自然更不能对宫中朝中的局势发展产生丝毫影响，只好听凭东林党人与他们在宫中的内应——大太监王安的安排。他跟着东李选侍老老实实地住进勖勤宫里，对外间的事情从不过问。而朝中的东林党人在“移宫”一役中得手之后，正在以汹涌澎湃之势迅速扩大战果。

还在“移宫”事件纷乱不休的时候，一些东林党人已经在追究光宗的死因了。在他们看来，光宗死得蹊跷。李可灼职非医官，随便为皇帝进药已属大不合规矩，何况服红丸在前，光宗崩逝在后，从时间顺序看，似乎

红丸就是光宗的死因。如果真是这样，红丸岂不就是毒药，李可灼进药岂不就是弑君？依照这个思路想下去，问题越来越严重。李可灼能入宫诊视进药，是首辅方从哲带入的（其实是光宗自己坚持，方从哲遵命而已）。而这个方从哲在当年的“梃击案”中就态度暧昧，据说同郑贵妃颇有勾连。再深一步想，光宗病体加重都是因为吃了内医官崔文升的泻药，而崔文升原先竟是郑贵妃的属下！显然，光宗之死，死于一连串的阴谋，阴谋的主使，宫中是万恶的郑贵妃，朝中是郑贵妃的同党首辅方从哲。这个关于光宗死因的争辩，被时人称作“红丸案”。



杨涟

其实，东林党人的推理有许多不合逻辑的地方。他们强调“连进红丸两丸，须臾帝崩”的时间顺序，却有意忽视光宗此前已经病入膏肓的事实。至于当事人同郑贵妃的种种牵连，更是出于主观的臆想。东林党人抓住这个问题不放，已经同当年争“国本”、争“梃击”有所不同，如果说当年的出发点主要还是为了维护太子的权力和安全，那么这一次却主要是为

了保住和发展自己的政治权力。纠缠“红丸案”对东林党人有两大好处：一是首辅方从哲和他的一群亲信牵扯在里面，可以藉机把他们排挤出政治舞臺，由东林取而代之；二是暗示郑贵妃是主使者，可以向人们强调数十年来的“国本之争”，突出东林党人的歷史功绩。

东林党人果然如愿以偿。方从哲顶不住朝中的人言藉藉，终于避嫌辞职；在“移宫”和“红丸”之争中显示出来的政治实力使得东林党人的威望如日中天，几位在“移宫”中表现特别突出的东林斗士，如给事中杨涟、御史左光斗等人，都迅速得到提升；他们还把已经沉寂了好几年的“梃击案”也再度提出来议论争执了一番，最终大获全胜。经过对“三案”（“梃击”、“红丸”和“移宫”的合称）的争议和其他一系列公开或隐蔽的政治活动，东林党人在朝廷中的势力空前膨胀起来。

但是，就在东林党人最志得意满的时候，他们也开始注意到，在宫廷深处正悄悄地发生着一些不那么令人高兴的变化。这种变化对于东林党人的命运，对于天启帝和御弟朱由检的人生命运所产生的深远影响，在最初是谁也没有料想到的。

二 信王殿下

紫禁城是一组巨大无比的建筑群，佔地1000多亩，大大小小的殿堂屋宇总共有9000多间，全部被封闭在一道3丈多高的坚固城垣里面。这组建筑对外是全封闭式的，在内部也被分割成几百个大小院落，相互隔离。慈庆宫是一个靠近东华门而又远离三大殿和皇帝后宫的孤零零的大院子，勖勤宫又是慈庆宫里一个相对独立的小院子。朱由检同他的新任监护人东李选侍住在这个被层层封闭起来的院落里，对于外面的消息十分闭塞，但他们还是从身边太监和宫女的口中听到了一些风声，隐约感觉到宫中的形势正在出现某种不祥的转变。

经过了“移宫”，本来就不成其为势力的李选侍的势力被彻底摧垮了，但身为外朝官员的东林党人却无法朝朝暮暮守在天子身边，时时刻刻把持着幼稚的小皇帝。这项工作他们只能通过在宫中的内线，大太监王安来完成。王安早在光宗幼年时期就是他的伴读太监，以后常年不离作为太子的朱常洛左右，是他的第一号亲信随从。这个王安性格严肃，不苟言笑；自幼在内书房读书，也有相当的文化水平。为了政治上的利益，他同东林党人一向交往密切，是太监中极少有的东林密友。光宗即位之后，他就自动地接管了宫中大权，只是还没来得及名正言顺地拿到宦官中第一把交椅司礼监掌印太监的头衔，但光宗的突然去世却使得宫廷的格局又产生了微妙的变化。



魏忠贤

王安是一个很严厉的人，就连光宗皇帝对他也有几分畏忌。还只是个孩子的天启帝对王安更是只有敬畏之心，却无亲爱之意，他本能地不愿意由一个总是让自己战战兢兢的人来充当宫廷里面的最高首领。按照一朝天子一朝臣的规律，老皇帝朱常洛的亲信在他登极一个月即告死亡之后，也就迅速地成为过时的明日黄花，又将被新天子自己的亲信取代，这个过程在天启帝继位后不到一年的时间里就完成了。

在宫里，天启帝最热爱最感到亲切的，是他的乳母客氏。明朝皇室子女照例从小都由奶妈哺乳，客氏就是在天启帝出生的万历三十三年（1605）被选入宫中的。她是京城一个姓侯的普通百姓的妻子，入宫的时候已经26岁，有记载说，她不识字，但是很精明，记忆力极强。因为缺乏生母的慈爱，天启帝自小就把对母亲的依恋全部寄託给了这位容貌端正、态度亲切的奶嬢，而且这种依恋之情直到他当上皇帝之后仍然有增无减。他不但封客氏为奉圣夫人，给客氏的兄弟、儿子全部加官晋爵，而且不顾朝臣的强烈反对，一直让乳母滞留在宫里，极尽孝敬之情，几乎是言听计从。

依照明朝宫廷里的传统，几乎每一个宫女都拥有一个相好的太监，宫中俗称叫作“菜户”。这些“菜户”虽然有致命的残疾，但到底曾经是男儿之身，在深宫这个缺少鬚眉男子的天地里就成了宫女们寄託感情的对象。他们还帮助相好的宫女料理各种外勤事务，而宫女们则为自己的“菜户”操持内务，其中感情深厚的真像世间的伉俪那样，缠缠绵绵，因此这种关系又被称作“对儿”。客氏在宫中待久了，自然也有了“菜户”，最初是皇长孙一房中主事的太监，叫作魏朝。但魏朝通常都很忙，难得照顾客氏，另有一个专门负责管理朱由校伙食的办膳宦官叫魏忠贤的却同客氏接触较多，照拂殷勤。时间长了，客氏同魏忠贤的感情反而更深。

“对儿”这种事毕竟不是真正的夫妻关系，魏朝和魏忠贤原本是好朋友，也没有为了客氏的事情争风吃醋，大家长期和平共处。但随着天启帝的继位，客氏跟着一步登天，哪一位是奉圣夫人的相好成了关系权力利益的生死大事，两个姓魏的朋友就不那么礼让为先了。两个人先是在暗中斗劲，后来终于发展成公开冲突。在泰昌元年（即万历四十八年，1620）冬天的一个晚上，两个从前的好友一起在干清宫的暖阁里喝酒，微醺之后就为了客氏的归属问题发生争执，而且越吵越凶，最后把连同皇帝在内的干清宫里上上下下全都惊动起来。天启帝瞭解了争吵原因之后，请出客氏问她：“客奶奶，你只说你真心要着谁替你管事，我替你断决。”客氏就毫不犹豫地选择了魏忠贤。从此奉圣夫人先后两位相好有了截然不同的命运。魏朝当场被王安打了一个耳光，被罢免了干清宫管事的显要职务，后来又被流放到凤阳去看守皇朝祖陵，最后被魏忠贤的爪牙勒死了；而魏忠贤则从此飞黄腾达，成为宫中最有权势的大太监。

魏忠贤是北直隶肃宁（今河北肃宁）人，家境贫苦，迫于债务的压力于万历十七年（1589）自行阉割入宫。当时他已经22岁，娶了妻子，还有一个女儿。这样的年龄入宫通常意味着绝没有发展前途，他没有文化，

不识字，又不可能再进内学堂从头学起，只好干些看门守夜之类的杂务，地位十分低下。他在宫中混了多年，一直没有起色，由于表面憨直老实，还得到了一个“傻子”的绰号。直到万历三十几年，他在魏朝的帮助下谋得了一个在皇长孙房中办膳的差事，才算大小有了一份执掌，进入了庞大太监群体的中间层。以后的十几年中他都在兢兢业业地管理着皇长孙一房中的伙食，在朝夕相处中不但同客氏，也同后来的天启帝建立了很不错的感情。这多年积累下来的感情资源待到天启帝登基之后就显现出了它的无穷价值。天启帝为了自己的亲切感，更为了让心爱的乳母风光体面，毫不迟疑地把魏忠贤飞快提拔起来。他先是出任了内廷24衙门之一的惜薪司掌印太监，而后又升任司礼监，成为歷史上为数不多的不识字的秉笔太监。这司礼监秉笔负责代皇帝批阅奏章，在明代权力极重，人称“内相”（宫内的宰相），其影响已经不止在宫廷内部，而是直接关涉到国家大政。

皇帝的个人感情对于宫中的人事变化终于起了决定性作用。就在天启元年（1621）夏季，王安突然被莫名其妙地革除了全部职衔，不久就被祕密杀害了。而魏忠贤则在不久后又兼任了总督东厂太监，主管组织严密的皇家特务机构——在庞大的宦官系统中，这是名列第二位的职务。但宫中的全体宫女、太监，乃至后妃全都很清楚，魏忠贤之所以没有充任宦官第一职务的司礼监掌印太监，实在是因为他一字不识，根本无法掌管那些繁复的文移庶务，若论在宫中的实权，他同他的相好客氏相结合，其实早已超过了歷代的司礼掌印太监。事实上，靠着魏忠贤的抬举才获得司礼监掌印太监职位的王体干从来都把魏忠贤当作主子一样，甘愿充当他的一条走狗。

人们对于宫中风向的这种变化反应不一。大多数的趋炎附势者都在想方设法地钻营巴结，拼命地讨好魏忠贤和客氏，想要在这突如其来的权力

再分配中得到一点好处。另一些人对客、魏的气焰熏天虽然心存不满，却也只好噤声屏息，不敢有丝毫冒犯。只有少数的嫔妃，因为年轻不识利害，很看不惯客、魏的专横跋扈，不免公然发作起来，这些人没过多久一律死于非命。有了这样严峻的教训，宫中更没有人再敢同客、魏抗衡。

住在勖勤宫里的御弟朱由检本来是远离宫廷权力斗争漩涡的，他的年龄也不足以对深宫里的风云变幻作出什么判断。但他还是感受到了一种被奴才欺辱的压抑。很多年来他都是同客氏和魏忠贤一起生活在慈庆宫里的，又同在养母西李选侍的管辖之下，本来是很熟识的。他怎么也想不明白，那个和蔼可亲的客奶奶和憨直勤谨的魏办膳为什么会一下子变得气焰熏天、不可一世，居然成为宫中的领袖。而且，他身边的亲随、杂役，都不得不对这一对男女俯首帖耳，甚至奴颜婢膝，就连他本人也不能不注意客、魏二人的脸色。尽管他还只是个十来岁的孩子，这种不愉快的感受还是颇为刻骨铭心的，所以到后来由他来处理这对男女的时候，他做得心狠手辣。但在当时，他只是感到了自己的无力和软弱。

天启二年（1622）九月，13岁的朱由检作为当今皇帝唯一的胞弟（他的那位三哥在8岁上也夭折了，另有两个弟弟全都殇于幼年），被册封为信亲王。亲王在明代的爵位系统中地位是最尊贵、最崇高的，而且以同当今皇帝的血缘远近而论，他在四五十个亲王当中又是支脉最近切的，这一次封王典礼本应该庄严隆重。但当时宫廷内外正在酝酿着一场权力大厮杀，没有人真正关心一个少年小王爷，典礼也就极其草率。由于年龄还小，这位信王殿下在受封后仍然住在紫禁城中的勖勤宫里，但已经是寄居的性质。依照规定，在成年之后他必须移居到远离京城的封地。没爹没孃又不受人重视的信王只能孤零零地蜗居在自己的勖勤宫里，唯一的亲人长兄天启皇帝自幼同他没有什么感情，即使在礼仪性的朝拜活

动中能见到一面，也只是机械地下跪磕头，从来没有什么话可说。皇帝对这个小弟弟不关心，其他人更很少过问他的生活和教育，更不会有人理睬他对于时局有什么看法。一天天成长起来的信王就以一个局外人的身份，眼睁睁地观望着朝中宫中的潮起潮落。

朝中的政局真是风高浪急。有着丰富政治经验的东林党人在王安被罢黜被杀害的事件中已经感觉到宫中的情况有些不妙，从天启元年（1621）冬季起，他们就对宫中的客氏和魏忠贤发起了一次又一次的弹劾高潮。他们反对客氏长期居住宫中，反对魏忠贤在宫中主掌大权，更反对皇帝不理朝政，把处理国务的权力甩手交给一个人格卑俗、品质恶劣的太监。但凭藉着皇帝的信任和依重，魏忠贤的势力却还是在稳步地膨胀。天启帝玩心极重，又特别醉心于木工的技艺，每天在宫里制造各种桌椅板凳和精妙的自动玩具，做好了又拆，拆完了再做，乐此不疲。而对于繁复乏味的政务，他是既弄不明白，又毫无兴趣。皇帝无心处理朝政，魏忠贤就甘愿代劳，在他的指挥下，几个亲信爪牙牢牢控制住了代替皇帝在一切公文奏章上用硃笔批示的大权。据说，遇到特别关键性的政务，魏忠贤总是故意等到皇帝做木工做得最全神贯注的时候才去汇报，天启帝无心顾及，总是说：“朕已经全知道了，你们好好干吧。”于是，朝廷用人行政一切大权，实际上都逐渐落入了魏忠贤和他的党羽手中。

天启四年（1624）夏秋之际，东林党人再也无法容忍朝政中这种上下颠倒、黑白混淆的状况继续下去了，以东林中的核心人物，在“移宫”事件里曾大出风头的左副都御史杨涟为首，对魏忠贤发起了一场总攻。杨涟在弹劾魏忠贤的奏本中列举了他的24条罪状，并且要求把他“绑缚到列祖列宗的神庙前面，召集在京的全体文臣武将，由司法机构逐条罪状严刑审讯，……判处死刑以消解神灵和臣民的公愤。”在杨涟之后，弹劾魏忠贤的奏疏沸沸扬扬，联名的、单署的竟有70余章。在各种劾疏上署名

的不仅有御史、给事中一类专司监察的言官，还包括大学士、尚书、侍郎等朝廷重臣以及地位较低的京堂、部属，连陪都南京的官员们也加入了攻击魏忠贤的行列。有些部门是首长带头集体署名，共同谴责魏忠贤的大逆不道。八月，国子监（即国立中央大学）以署祭酒（代理校长）、礼部右侍郎蔡毅中为首，包括监丞、博士、助教、学正、学录、典籍等教职人员联名上疏，对于魏忠贤作孽而由皇帝代为受过表示“合监师生无不扪心愁嘆不已”，请求皇帝“憬然悟，赫然怒，雷震之威，加以三尺”，对魏忠贤依法制裁。东林党人甚至几次打算在宫门外组织群臣进行静跪请愿活动，由于种种原因才没有实行。

但魏忠贤在宫中有他的女友客氏的有力支持，有天启帝的全面信任，并没有在东林党人的攻击中损失半根毫毛。待到东林的攻击高潮一过，他反而大肆反扑，利用皇帝的无上权力把一大批东林骨干力量罢官削籍（开除干籍），而且以皇帝的名义公然宣佈：东林党人多年以来“内外连结，啕吸应答，盘踞要地，把持通津，念在营私，是非颠倒，诛除众正，朋比为奸，欺朕幼冲，无所忌惮。”完全是一个结党营私、误国殃民的罪恶团伙。在这种形势下，朝官中一些在天启初年备受东林排挤的“邪党”分子和品质低劣的政治投机分子见到政治局面大变，也纷纷投入到魏忠贤的麾下，为他出谋划策，效力卖命，一些少廉无耻的政客甚至甘心充当魏忠贤的干儿义孙。这批人都迅速得到提升，成为朝中的主导力量。由于是甘心情愿地为太监阉奴做心腹爪牙，这批人在歷史上被称作“阉党”。

有了阉党的全面配合，魏忠贤的统治发展到了巅峰状态。天启五年（1625）以后的两年多时间里，明帝国进入了歷史上最黑暗的一个时期。阉党们一朝权在手，就对多年的夙敌东林党人大加迫害。他们把多年来东林党人引为自豪的“三案”之争重新搬出来进行讨论，并且得出结

论：东林党人争论“三案”是“捕风吠影，污蠛宫闱，致使天子圣德受损；以此无端风波，牵枝引蔓，驱除忠良之臣殆尽”。阉党还把有关“三案”的争论和这一结论编纂成一部具有标准意识形态性质的着作《三朝要典》，由天启帝亲自撰写序言（当然是阉党的词臣代笔），颁行天下，意思是要把东林党人永远钉在歷史的耻辱柱上。

阉党们还以黑名单的方式把所有被认为是东林分子的大小官员编制成册，送给宫中的魏忠贤，司礼监就按名册进行了一次大清查，把全部东林党人赶出了政治舞臺。对于那些反对魏忠贤统治最激烈的东林人士，他们不惜从肉体上消灭，先后制造了“六君子案”、“七君子案”等几十个着名的冤狱，以杨涟为代表的一大批东林党人被无端地判处死刑或是不加审判就被残酷地迫害致死。以魏忠贤为首的特务机构肆虐横行，在京城和各地建立起严密的监视网络，对一切稍稍表示出对魏忠贤统治不满的官员和民众施行无情的镇压。有人在自己家中同朋友喝酒，酒酣后对时政发了几句牢骚，东厂的密探突然破门而入，把不满的人抓起来凌迟处死，而另外几个一同喝酒的人因为害怕没敢随声附和，就得到宽恕。特务们还发明瞭剥皮、割舌头等种种酷刑，杀人如麻，造成了全国上下人人忧愤而不敢言的局面。

与此同时，阉党们又利用一切手段肆无忌惮地讴歌赞颂帝国实际的主宰者魏忠贤，把他比拟成夏禹、商汤那样的明君，比拟成周公、孔子那样的圣人。说他“以至诚忠心得到天子的信任，由于先知先觉而担负天下重託，声名充溢华夏和四夷，朝野上下都在欢腾称颂”，简直是骇人听闻。从天启六年（1626）起，全国各地又开始为魏忠贤建立庄严宏伟的纪念堂——生祠。到第二年魏忠贤的统治突然终止时，短短的一年多时间里建起和正在动工兴建的生祠多达90多座。生祠建立起之后，各地的大小官员就按时焚香祭献，叩首礼拜，有些人干脆对着魏忠贤的塑像大喲九

千岁爷爷甚至九千九百岁爷爷，以表示他离皇帝的万岁至尊地位只差着100岁的距离。

黑天昏地的政局造成的阴郁气氛对于生活在紫禁城角落里的年轻信王当然不会没有影响，在魏忠贤专权最猖獗的那段日子里，全体皇亲国戚们都产生了一种不祥之感。魏忠贤的所作所为太出格了，就连龙子龙孙和华胄贵戚们也感受到了他的统治给自己带来的威胁。早在天启五年（1625）二月，戚臣李承恩因为不满魏忠贤的专横跋扈而被东厂特务逮捕。李承恩是世宗宁安公主的嫡子，也就是嘉靖皇帝的亲外孙、万历帝的表弟，是皇家一个不算疏远的表亲，正好被魏忠贤选中作为泄愤立威的打击目标。东厂对他的控告主要是在家中擅用龙袍及龙纹漆盒瓷器。李承恩自己辩解，那些衣物都是母亲留下来的，在家中使用不能算僭越。但东厂特务机构却根本不理会这些，很快就定了案。法司根据东厂的成案，滥引了“盗乘舆服御物例”拟判斩刑，但同时也提出，因为李承恩毕竟是嘉靖帝的外孙，应该援“八议”之条予以减刑。“八议”是古代司法中对上层统治集团中的8种人犯罪予以减、免刑事处分的一种原则，根据明代法律，像李承恩这样的贵戚除了犯有“谋大逆”等不赦之罪外，一般是不应判处死刑的。但魏忠贤却否决了使用“八议”条款，坚持对其判处死刑。这当然是对皇族特权一种明目张胆的侵犯，如果在平常时期，皇亲国戚们肯定会对这类事情发表自己的看法，对犯事者进行救援，但在魏忠贤的高压政策下，人们却只好缄口不言，把愤懑都留在心中。

魏忠贤甚至把他的威风耍到了天启帝张皇后的头上。张皇后出身于平民之家，并不懂得什么政治，但她性格庄重严正，对魏忠贤和客氏在宫中的飞扬跋扈，侵犯她在宫中应有的权力，一向非常不满。据说一次天启帝到皇后宫中，见她正在读书，便问所读何书，回答是《赵高传》，天

启帝为之默然。赵高是歷史上最着名的弄权误国的宦官，张皇后作此回答，是一种很明显的暗示。魏忠贤和客氏对这位不驯服的皇后很不满意，决心彻底剷除。天启六年（1626）九、十月间，魏忠贤部署亲信，对张皇后的父亲张国纪接连发动勐攻，说他强佔民产，殴毙无辜，并且书写匿名文榜恶毒攻击当局时政。更为骇人听闻的是，阉党们还造谣说，张皇后根本就不是张国纪的亲生女儿，而是一个死囚的野种！幸亏一向缺乏主见的天启帝在夫妻情分上却不马虎，对于张国纪所受到的种种攻讦，他不准再深究议论，只是将张国纪革职，让他回老家反省，张皇后的地位仍然没有被动摇。

这次攻击张皇后的行动闹得满城风雨，年轻的信王也为此担惊受怕了好一阵子。因为在魏忠贤的党羽们对张国纪发动总攻的时候，有传闻说，魏忠贤要诬陷张国纪“阴谋杀害天启帝，拥立信王”。信王朱由检此时已经17岁，算是成年人了，他很清楚，尽管自己对这个所谓“传闻”一点也不瞭解，但如果魏忠贤的这个阴谋真正实行起来，等待着自己的很可能就是无法逃脱的大祸。可是面对着巨大的危险，他却既不能主动出击做一番拼搏，又不能设法逃离隐匿避祸。此时，他再次深深感到了自己的无力与无奈，虽说名义上贵为亲王，实际上只不过是政治棋盘上任人摆弄的一颗小棋子。

表面看来，魏忠贤对于皇帝唯一的兄弟还算尊重。魏忠贤喜欢花木，因而也喜欢用花木做礼物送人。他也不时地差人给信王送些花草瓜果之类的东西，做些表面上的应酬。但信王却不敢为了一点表面的礼貌就放下心来。他生性节俭，本来不大喜欢花花草草一类的东西，但每次魏忠贤派人送礼，还是要表示极喜欢、极感谢，要重重地酬劳来人一番。就是在自己的家里，他说话行动也不敢透露出半点对于魏忠贤的不满情绪。因为他知道，在自己的身边就有魏忠贤安插进来的亲信，无时无刻不在

对他进行着监视。这是一种深刻难捺的压抑感，无奈之余他只能更多地埋头读书，读得最多的是史书，每当读到东汉末年权阉当道、欺君误国的时候，忍不住就要勾起无限的悲愤和感慨。但在现实生活中，他唯一能做的，却只是推说有病，不再参加任何朝廷中的礼仪性活动，尽量不引起别人的注意。他只希望快一点成长，早日到自己的封地去，离开京师这个是非之地。

担惊受怕的日子过了一天又一天，不知不觉之中，小小的信亲王已经长成了一个很像样子的青年人了。像朱氏家族中的大多数成员一样，他的身材不算高大，但也许是母系的遗传基因在起主导作用，他不像祖父和父亲那样肥硕臃肿，而是清癯瘦削。常年生活在深宫的畸形环境里，养成了这个青年人双重的性格。一方面，长期作为吆奴喝婢的一宫之主和位尊爵重的亲王，使得他性情严急，有时甚至很苛刻，自以为是而很少能听得进去他人的意见；另一方面，从小的孤独寂寞和难于主宰自己命运的无奈处境又让他敏感、多疑，有点过分自尊，在内心深处却又十分软弱，在重大关头他往往拿不定主意，怨天尤人，怀疑自我，最后是毫无主见地把一切听凭命运的安排。但至少从表面看来，这位年轻的亲王还是沉稳持重，神态庄严的，给人一种过分早熟的感觉。

他还从祖父那里继承下来另一种品格，就是生性吝啬，从好的方面说也可以叫作俭省。自小用仿影的方式练字，如果纸张较大而模本较小，他就会先对齐一边的边角，写完后再把剩下的地方填满，免得浪费纸张。对于经济账目他也有一种特殊的敏感。以他的身份是不能随便出宫的，但为了节约起见他常派人到宫外去买些食品和用品（如果在宫中支取价格通常要高出几十倍甚至几百倍），而且要仔细地讯问价格情况。直到他做了多年皇帝以后，说起宫外鱼肉小吃的价钱来，他仍然记得一清二楚。对于一个皇室亲王来讲，这样精打细算也许是必要的，因为尽管国

库中每年要为他拨出大笔款项作为生活费用，但在宫中各级太监的层层贪污盘剥之下，所剩并不算很宽裕。

虽然在性情上不是没有可疵之处，但总起来讲，在为数众多的皇族子弟中信王朱由检还是一个难得的俊秀人才。他主要通过自学阅读了大量经史着作，学问方面已经不亚于一般士人。儒家的正统观念对他浸润极深，对于孔孟之道以及程朱理学，他都有一定的造诣，而且有些自己的见解。高级皇族是绝不会去参加科举考试的，因而本来用不着学着做那些章法森严缺乏生气的八股文（当时一般叫作“制艺”）。但时代风气所致，能不能写好八股文似乎是当时衡量一个人才学的唯一标准。大概是为了证明自己的才学不俗，朱由检在制艺方面也下过不小的功夫，所以他后来亲笔撰写的诏令、上谕也常常带有很浓重的八股气。但八股文讲究代圣贤立言，要起承转合，有强烈的说理性，又特别注意文字的铿锵韵律，经过这样的严格训练，他的文章一般说来还是朗朗可读的。相比之下，他对于诗律词章的功夫下得就不够，为了体现风雅，他也作过诗，但从现在能见到的几首“御诗”来看，水平实在是不怎么样。

宫廷生活有俗不可耐的一面，但也有当时只有极少数人才能享受到的艺术生活，朱由检受着这种艺术气氛的薰陶，也很有一些艺术感觉。他喜欢清雅，讨厌俗艳，在贵族子弟中也算难能。他的字写得不错，学的是唐太宗李世民，大体是魏晋比较古朴的风格。他也热爱音乐，喜欢古琴的高远、琵琶的哀婉，自己还能作曲。这样的学问和修养在朱家的龙子龙孙中的确是不可多得的。

可惜的是，他几乎命中註定了是天生我才必无用。因为明代制度是严禁宗室王公干政的，亲王一旦成年要迁移到自己遥远的封地去，叫作“之国”，从此就被禁锢在封地上，不得随意离开一步，也不许对朝廷和地方政务进行任何干涉。这些王爷们虽然位尊禄厚，实际上却如同一帮高级

囚徒，唯一的任务就是花天酒地，生儿育女，为已经庞大不堪的龙子龙孙队伍进一步扩充实力。由于之国意味着远离出生成长的故土和所有的亲朋故旧，而且通常是一去就不能復返，所以亲王们对于之国大都很不情愿，只要有办法，总是一拖再拖。只有信王，面对这混乱的朝局，是真心而急迫地想要尽快之国的，好远离京城这块是非之地，确保自己的平安。

然而事情总是不能遂人所愿，按道理他也算到了娶妻之国的年龄，但因为政务一团混乱，有关他的封地、王府的安排建造并没有预先筹划好，之国的事情也就无人提起。可是年龄不等人，到天启六年（1626）初，依照当时习惯的说法信王已经17岁了，即使是平民百姓家的子弟也该娶亲了，天启帝只好张罗着先给这个弟弟娶一房妻室。但皇宫大内之中除了皇帝和太子可以迎接自己的新娘进来之外，是不能容纳其他女眷的，于是只好为暂时无国可之的信王在宫外安排一处临时住宅，就是所谓的“信邸”。这个信邸是临时抢修出来的，再加上监工的太监剋扣工款中饱私囊，建造得很粗陋。但对于信王来说，只要远离皇宫一步，也就少了一分政治风险，所以他对搬家的事情仍然感到很是欣然。

信王妃是这年六月选定的。明朝制度，天子和诸王的后妃一律从清白平民家的女儿中选出，为的是防止世家大族通过与皇家的姻亲关系干政擅权。信王的王妃也是从平民家庭中选出来的，姓周，父亲叫周奎，祖籍苏州，是京城里的普通居民，家境相当清贫。选择王妃的事最初由外朝和内府中的有关衙门联合主持，照例定出候选者，再由太后最后确定。天启时宫中没有太后，掌管太后印信的是万历帝的一个妃子，昭妃刘氏，但宫中的一切有关事务都由张皇后定夺。为信王选妃的时候，张皇后觉得周家女子过于瘦弱，刘太妃在旁说：“现在虽然弱一点，将来一定能长得高大。”张皇后也就同意。

此后又有一系列的仪式典礼。第二个月闰月，负责天文历法和观察星象的钦天监为信王的婚礼各个进程择定了吉日。十一月，信王先从紫禁城搬进了属于自己的信王府。十二月初十日，首先举行了标志着长大成人的冠礼，这意味着他已经进入了独立的成年期。以后是纳采、安床等许许多多的麻烦事；周家则备办嫁妆，给新娘开脸，更是忙得四脚朝天。这样经过了一番大忙大乱之后，新娘子总算在天启七年（1627）二月初三这一天清晨被娶进了新建成不久的信王府。朱由检从此总算有了一个自己的家。

这位被选中的信王妃周氏生于万历三十九年（1611）三月，名义上比信王小一岁，实际上只小3个月。一对小夫妻年纪相仿，出身经歷却极为悬殊。周王妃是小家碧玉，受的是规范的淑女教育，但一时很难习惯帝王之家严格的礼数和奢华的气派。好在她对自己这位高贵的新郎相当满意，作为一个平民少女，一下子位晋王妃之尊已属极为不易，何况夫君又是一个品貌才学都十分优秀的青年。出嫁之后，周氏对丈夫的感情一直相当深厚，直到最后同日而死。而新婚的信王却从新娘身上感受到了一些民间的清新气息，好像一下子打破了多少年的郁闷。妻子又是他身边的第一个亲人，给了他爱，给了他热情，抚慰了他过于寂寞的心灵。所以他对这位妻子也始终热爱、尊重，这同明朝的绝大多数皇帝与结髮之妻极为冷漠的关系形成了很鲜明的对照。



明熹宗朱由校

当时普遍实行着一夫多妻制，贵族家庭更是如此。因此新婚的信王夫妇尽管相敬相爱、鱼水和谐，却还是在蜜月刚刚结束的时候就又为自己的家庭增加了新的人口。信王同时娶进府来的两位次妃一个是田氏，另一个是袁氏，都是年龄略小一点的少女。其中田氏从小生长在扬州，音乐、绘画、书法样样精熟，又体态清丽，风格秀雅，特别得到信王的喜爱。由原来形影相弔的一个人突然变作妻妾满堂，由死气沉沉的深宫一下进入欢乐热闹的信王府，朱由检第一次体验到人生的欢乐。有了一个

家，真好。唯有时局不容他乐观。此时他没有别的企盼，只希望早一点带上自己的妻妾，离开危机四伏的京城，赶快到封地去做一个与世无争的太平王爷，去享受平安富贵、花团锦簇的人生。他和他的家人们绝没有想到，用不了多少时间，他们这一家人又将重新搬回到紫禁城里，但那时候他们是以整个皇宫的主人的身份进驻的。

有记载说，当初崇祯帝还住在勖勤宫里时，一天睡午觉时做了一个梦，梦见两条乌龙缠绕在宫中的柱子上。其时正好风雨大作，崇祯帝被暴雨惊醒。雨停之后，人们发现院里的水井中有几条一尺多长的金色鲤鱼，鲜活跳跃，崇祯帝命人用水桶把鲤鱼汲上来，放到了西苑的太液池中。

这显然是一个由崇祯帝的贴身侍从们制造出来的神话，目的无非是要证明崇祯帝登基正位完全是天命所归，而非一时侥倖。因为乌龙、金鲤都是真龙天子的化象，而风雨大作则是潜龙出动的徵兆。按照这则神话的说法，崇祯帝早在身为信王住在勖勤宫里的时候，就已经命中註定要统御天下了。还有些神话把崇祯帝上膺天命的时间追溯到更早的时候。据说天启帝最初即位的时候，还不太明白事理的小御弟朱由检忽然好奇地问哥哥：“这个官儿我可做得否？”天启帝随口回答：“我做几年时，当与汝做。”许多人就把这些话当成了预示后来事态发展的谶语。

神话毕竟只是神话。其实当年身在勖勤宫里的少年信王常常忧虑的是如何保住身家性命，对于日后成为国家的主宰，那是连想也不敢想一下的。出居信邸之后的情况也差不多，他只盼着早日脱离政治中心的漩涡，而绝无其他的非分之念。按照当时的实际情况，信王能够继承帝位的可能性也确实是微乎其微。明代实行严格的父子相承的继承制度，除了初年成祖通过“靖难”用武力夺取了侄子的政权外，200多年来实际上只有嘉靖帝是以堂弟的身份正常继承皇位的，那是因为正德帝根本就没有生育能力，又死得过早，没来得及安排过继嗣子。信王作为天启帝唯

一的弟弟，在天启帝突然死亡而且没有亲生的或过继的儿子的情况下是可以继承皇位的。但是，嫔妃们实际上已经为天启帝生育过3男2女，只是都没有养大就夭折了，天启帝又正值盛年，才不过20岁出头，只要不出意外，再生养几个儿子应当是没有什么问题的，所以直到天启七年（1627）的夏季之前，从来没有人想到过会由信王来入承大统。

但情况却突然发生了变化。这年五月，天启帝开始腰疼、发烧，以后又遍身浮肿，从症状上看，可能是得了急性肾炎。当时的医疗条件对于这一类急症可以说是毫无办法，所以尽管太医们尽了最大努力，皇帝的病却越来越沉重，到七八月份，已经呈现出大限将至的迹象。专制君主的健康状况在当时属于核心政治机密，但信王邸中的太监们同宫中的太监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繫，消息还是很快传到了信王的耳朵里。审时度势，信王掂量得出这消息的分量，不由得又紧张又兴奋起来。

兴奋的是如果天子真的一旦发生不测，那么接替皇位的很可能就是自己。他自幼读过许多圣贤的典籍和歷史着述，自信极有治理国家的统治才能，对于当前的时政，他也多有自己的见解，一旦登上皇帝的宝座，他将大展鸿图，做出一番丰功伟业，为列祖列宗创下的基业再增添一份荣耀。但情况也许不会那么顺利。把持着朝政并在宫中盘根错节的魏忠贤和他的党羽们未必会轻易地交出权力，如果他们利用手中的权势施展什么阴谋，那么等待着信王朱由检的也许不是君临天下的尊荣，而是无可挽救的灭顶之灾。因此，他只能急切地派亲信人等密切地监视着宫中的每一点风吹草动，只能无可奈何地等待着命运的安排。

这时候，宫中已经乱成了一锅粥。最不希望天子很快就死去的正是魏忠贤和他的爪牙们。他们是靠着天启帝的信任与託付才专权主政、横行无忌的，一旦天启帝驾崩，继承人当是信王，在一位新皇帝的统治之下会出现什么样的政治局面，那是很难预测的，如果一定要预测，恐怕是凶

多吉少。所以魏忠贤和阉党的几个核心人物都在想尽办法来延续皇帝的生命。魏忠贤搬到靠近皇帝寝宫的懋勤殿居住，不住地探视观察皇帝的病情。他还在禳祝上下功夫，给御前的近侍太监全部发放金寿字大红贴裹（一种内官制服），想用一片金红的喜庆气氛驱除病魔，又不时地在宫中宣传："圣驾万安矣！"用的也是典型的巫师除病的手段。阉党大僚兵部尚书霍维华则寻找到一个偏方，据说叫作"仙方灵露"，其实不过是蒸馏的米汤，当然也治不了病。天启帝吃了近半个月，无效，才不再继续服用。其他人也在焦急，也在想办法，但一切办法都无补于皇帝日益衰竭的肾脏。看来大局已定，只能筹备后事了。

八月中旬，已经自知无望的天启帝开始操办自己的后事，首先是把乳母客氏的儿子侯国兴封为伯爵，然后着手确定继承人。他其实别无选择，根据皇位继承系列的排位只能是由御弟朱由检来出任下一位皇帝。天启帝把这个办法先对客氏和魏忠贤说了，虽非正式的政治遗嘱，却也为日后的继承问题定下了一个基调。魏忠贤和他的党羽们也曾祕密商议过其他一些继承的方案，想要让某妃子假称有孕，用一个婴儿冒充天启帝的儿子来继承皇位。但这样的事情是大逆不道，要天诛地灭的，魏忠贤的心腹爪牙们竟然没有一个人敢承担起来为他谋划操办。那些阉党们平日为非作歹、捣鬼有术，到了关键时刻却全都乱了阵脚，没了主张，一些头脑特别灵活的此时甚至在打主意找机会，想方设法地要摆脱与魏忠贤的联繫。

谋士爪牙全都无能为力，生性颟顸的魏忠贤更是不知所措，在天启帝最后的日子里，他只能终日悲痛哀嘆，至于未来会怎么样，他没有心思去想，也没有能力去安排。

正是魏忠贤和阉党们这种消极的自暴自弃给信王带来了好运气。八月二十二日，天启帝到了自己最后的日子，直到这时候才召见了唯一的弟弟

和合法继承人信王朱由检。他此时倒也还明白，拉着弟弟的手说："弟弟将来要做尧、舜那样的明君呀。"信王暗藏在心中的想法被长兄一语道破，不由得又恐惧起来，只得支吾着："陛下怎么能这样说……臣真是罪该万死。"天启帝已没有精神再多讲，只是託付将来一定要善待张皇后，最后又想起来，告诉信王魏忠贤堪委重任。

当天下午，这位煳里煳涂做了7年天子的天启帝终于一命归西，终年23岁。魏忠贤哭肿了眼睛，却不知应该做点什么，还是司礼监掌印太监王体干吩咐礼部的官员赶快准备丧礼。各部门立即行动起来，首先以张皇后懿旨的形式向全国发布皇帝的讣讯，同时公佈了大行皇帝的遗诏。这份由内阁代笔而作的遗诏中说了一大堆官样文章的空话，其实实质性的内容只有一句："皇五弟信王由检聪明夙着，仁孝性成，敬奉祖训兄终弟及之命，绍伦序即皇帝位。"继承问题的安排一旦宣佈，再要更改就十分困难了。据说在最后决定之前，魏忠贤又同他最倚重的亲信兵部尚书兼左都御史崔呈秀进行了一次祕密商议，因为拿不出什么好办法，只得按照正常的程序办理。

按照惯例，皇位的继承人是不应当立即进宫的，应该稍微缓一下，等着朝中的主要大臣们前来劝进，就是请求继承人为了天下苍生而承嗣大位。继承人还应该数次表示自己无才无德，难当此重任，几番推辞，来向天下万民表现伟大的谦虚。几劝几辞之后，再从容入宫。这当然都是一些虚套，却是礼仪和道德两方面都要求实行的。但也许是当时形势太乱，也许是未来的皇帝心情太急，那天晚上，当以英国公张惟贤和内阁大学士黄立极、施凤来为首的一班朝臣带着劝进的表笺来到信王府，做好了思想准备要打一场劝进持久战的时候，王府里的人却告诉他们，即将登基的新天子已经被魏忠贤派人接到宫里去了！

三 初登大位

明帝国实行极权的君主专制制度。在这种制度中，被称作天子的皇帝以“天”（中国传统宗教中的最高神）的代表的身份对帝国实行绝对统治，叫作“唯天子受命于天”。因而从理论上讲，皇帝集立法、行政、司法和军事大权于一身，几乎可以为所欲为地决定国家和全体臣民的命运，也可以任意地“敲剥天下之骨髓，离散天下之子女，以奉我一人之淫乐”。无边的权力构成了无边的诱惑，对于即将接手这巨大权力的嗣皇帝朱由检来说，尽管前途还很迷茫，只身入宫进到魏忠贤一党的包围圈里也有着极大的危险，但称孤道寡君临天下的前景已经足以让他欣喜若狂，顾不得那么许多了。

正是这种突如其来的狂喜和兴奋使得嗣皇帝有点丧失理智，所以他才相当冒失地接受了魏忠贤的邀请，只带着几个贴身随从就进了宫。妻子周王妃更担心的却是新婚丈夫的安危，在她看来，丈夫在这个危险的时刻入宫，不啻是独闯虎狼之穴。她不懂得朝中本有一套迎接新皇帝的规矩，只能千叮咛万嘱咐，要丈夫千万不要吃宫里的东西，不要喝宫里的水，还准备了一包糕饼干粮让他带上，然后才洒泪相别。

皇帝的寝宫干清宫暂时还被天启帝的死尸佔领着，还没有取得正式皇帝身份的朱由检这天夜里只好先住进了紫禁城东南一侧的文华殿。文华殿是一座四周相当空旷的院落，孤零零的更显得悽清寂寥。朱由检生怕变生不测，不敢睡下，只好枯坐在书案旁，伴着烛火熬过永夜。深秋天气，一阵阵肃杀之气不断传入深宫中的殿堂里，在暗夜中虽然不时有巡逻守夜的内官从殿门外匆匆而过，却没有人向这位未来的皇帝看一眼，对他说一句话，这情景使他更感到一种诡谲的恐怖。

大概是实在难以消受这可怕的寂静，他在半夜时候让人叫住了一个带剑巡夜的太监，把那柄剑要过来放在自己的几案上，算是为自己壮胆。见到自己的这个行动没有引起什么不良反应，他的胆子也真的又壮了一些，问身边的人：要用酒饭犒赏那些巡夜的，应该找哪个部门？随从对他说，应该找光禄寺。于是他以皇帝的名义发佈了自己的第一道圣旨，命令光禄寺给在大内里巡逻的人预备酒饭，以示慰劳。他发现，自己的圣旨还是相当灵验的，没过多久就有人准备好了酒食，并且向巡夜者们宣佈这是新皇帝的恩赐。立刻，受到恩赏的巡夜者们欢吆着万岁的谢恩声响彻了紫禁城。

这以后的下半夜，他的心里平静了许多。从那第一道圣旨的颁佈和执行的过程中，他第一次亲身体验到了身为皇帝的无上威严和无边权力。他也开始有了一点信心：靠着上天和祖宗的福佑，靠着天子的地位、手中的权力，他一定要清除朝中的奸党，重振朝纲。

战战兢兢地熬过了第一夜之后，天气晴和明朗，朱由检在心理上也逐渐进入君临天下的状态。内阁大学士等文武重臣在第二天到宫里补上了劝进的一课，已经定下心来的嗣皇帝接连推辞了3次，最后勉强接受。礼部立即为新皇帝拟定了四个年号，是“干圣”、“兴福”、“咸嘉”和“崇贞”，朱由检自称不敢当苍天之圣，也不敢以中兴自任，而“咸”字中又带着一个“戈”，主刀兵，不吉，因而圈定了最后一个，并且把“贞”字改为“祯”。这或许体现了他对未来的某种憧憬——他统治的年代将是一个吉祥如意、充满幸福的年代。

八月二十四日（1627年10月2日）清晨，为新天子举行了盛大的登基典礼。典礼是在紫禁城中心最宏伟庄严的建筑群体三大殿举行的。三殿在明代原来叫“奉天殿”、“华盖殿”、“谨身殿”，嘉靖中改为“皇极殿”、“中极殿”和“建极殿”，但在万历年间失火被彻底焚燬，常年废圮，泰昌帝和

天启帝的登基典礼都是在文华殿举行的。直到天启五年（1625），在魏忠贤的主持下，才又重新展开了再建三殿的工程，由于工程浩大，这项工作进行了两年多，到天启帝临死前，八月二十日才初步竣工，却正赶上为新皇帝的登基大典提供一个气派的场所。从某种意义上说，这新完工的三大殿也可以算是魏忠贤送给新皇帝的一份厚重的见面礼。

刚刚修復的宫殿金碧辉煌，高高坐落在三层汉白玉的丹墀上，显示着天朝君主的威风和气派。新皇帝戴上天子的冕旒，先在建极殿接受群臣的朝拜。但主持仪礼的鸿胪寺因为多年没有举行过三殿的正式典礼，调度失措，弄出了许多差子，皇帝已经在御座上就坐了，朝臣的队伍却还没有排列好，乱哄哄地挤作一团。新皇帝对这种混乱局面当然很不高兴，但在刚刚登上皇帝宝座的时候又不便于追究，只能带着一脸的严肃等着朝臣们调整阵容。漫长的典礼让皇帝和朝臣都非常疲惫，但无论如何，仪式总算进行完了，朱由检从此正式成为明帝国的第十六位皇帝。

这一天还向全国颁佈了新皇帝的即位诏书，颁诏的仪式同样隆重而富于戏剧性。用黄绫裱成卷轴的诏书由威风凛凛的仪仗队护送出宫，登上承天门（天安门）城楼，系在一只特制的金凤嘴上，再由城楼顺着一条绳索飞翔而下，这叫作金凤衔诏。跪迎在承天门外的百官万民见到一匹巨大的金色凤凰自天冉冉而下，立刻同声山嗯万岁，表现出无限的欢腾崇拜之情。诏书的复制品送到各省各地的时候，各处也都要摆设龙亭，组织拜接，仪式同样繁复热烈。所有这些戏剧性的仪式无非都是要在全体臣民中强化当今天子的权威形象，激发臣民们无限忠于无限崇拜君主的热情。

即位诏书的词句古奥聱牙：“我国家列圣，缵承休烈，化隆俗美，累洽重熙，远垂万祀……”大意是说，列祖列宗开创了伟大美好的帝国；先帝（天启）英明精勤，正在大展鸿图，却不幸辞世；我惭愧地被指定为继

承人，经群臣和百姓再三劝进，多次推辞不成，只得接受遗诏，祭告天地祖宗，于八月二十四日即皇帝位。诏书中还宣佈：大赦天下；改明年为崇祯元年。

在建极殿正式登基之后，新皇帝照例要搬进作为天子寝宫的干清宫，并且要在干清宫的正殿里接受内官的朝拜庆贺。以往在干清宫中举行的“庆贺山呼礼”，都是由魏忠贤居于首位，由于他在一年前已经被晋封为公爵，因而每次内朝都头戴公侯品级的簪缨，就是所谓“貂蝉冠”，在内官中显得分外招摇。但在这一次庆贺崇祯帝登基的大典中，魏忠贤却犹豫起来。他对于到底应该穿什么服饰参加典礼一时竟拿不定主意，反覆踌躇，最后还是穿上了高级太监的普通礼服，只戴四品补子。魏忠贤行为上的这种微妙的变化立刻引起了宫廷上下的注意，他的收敛和顾忌显然表明，他更希望能够得到新皇帝的理解和信任，希望以卑微臣服的姿态来保住已经在手中的权势和地位。

崇祯帝当然也注意到了魏忠贤的姿态，但他却不愿意让这个大太监继续在朝中作威作福。在天启时期，号称“九千岁”的魏忠贤实际上已经成为皇帝的政治代理人，从声誉名分到实际权力都远远超出了一个人臣所能具有的范围。但天启帝本来就厌恶政务，再加上感情的因素，把大权交给魏忠贤是他心甘情愿的。崇祯帝却在登基之初就对治理国家表现出极大的兴趣，他根本无法容忍任何人侵夺自己身为天子的神圣权力。何况，他对那个愚憨狂放的魏忠贤本来就没有好感，在勖勤宫和信邸担惊受怕的日子里又早就深深埋下了对魏忠贤和阉党的仇恨的种子。他现在面临的问题是，只能孤身一人同势力雄厚的魏忠贤集团周旋。这对一个还未满17週岁，又毫无政治经验的年轻人来说，的确是有些勉为其难了。



锦衣卫章图

在崇祯帝与魏忠贤集团的斗争中，魏忠贤集团的力量在于他们掌握着整个国家机器，内阁中枢、六部中央机关、东厂锦衣卫特务组织以及大部分地方政府，都被他们控制着。这部强大的国家机器所能发挥的威力是巨大无比的。崇祯帝能利用的武器则有两个：一是他的皇帝名分——这在明代是一宗了不起的法宝；二是广大民众以及官绅贵族的普遍不满情绪——民心在任何时代都有举足轻重的分量。从总体上比较，崇祯帝处于更有利的地位，但他所拥有的名分、民心两大武器都属力量含蓄的一类，面对魏忠贤集团的刚劲之势，必须用太极拳般的战术，充分调动内力，才能取胜。

刚刚登上政治舞台的崇祯帝对于怎样施展阴谋权术还一点都不懂，对于权势熏天的魏忠贤只能是小心翼翼地应付，等待着政局的自然变化。而魏忠贤则抱着能在新天子手下继续得宠的一丝幻想，尽量要得到崇祯帝的欢心。两个人都在小心试探，在整整两个月的时间里，大家似乎相安无事。

在最初的日子里，魏忠贤和他在宫中的爪牙们尽量簇拥在新天子身边，不离其左右，表面上是亲近关怀，其实也不乏监视和竭力施加影响的意

思。崇祯帝不敢小觑这个庞大的势力集团，也只得做出无可无不可的样子。但新皇帝内心中的倾向，还是有意无意地透露出来了。在登基后不久，崇祯帝似乎是无意间向魏忠贤和王体干问起了关于立枷的事。那立枷是一种特别残酷的刑具，重达100多斤，东厂和锦衣卫抓到的人犯被戴上这种木制重枷，用不了多久就会被活活压死。魏忠贤上臺以后，为了立威和迫害政治反对派，经常使用这种酷刑，因而这残酷的立枷也可以看作是魏忠贤残酷统治的一种象徵。崇祯帝忽然问起这个，魏忠贤等人就不能不立刻进行辩解。王体干说："对于那些大奸大恶，用平常之法治不住的人，才使用立枷。"崇祯帝并不正面表态，只是说："虽然是这样说，实在还是太惨了。"魏忠贤一时不知该怎样回答，只得带着众人叩头退下。

皇帝这样一番没来由的讯问，很让魏忠贤一伙摸不着头脑，不知那只是偶然表现的悲天悯人呢，还是隐含着某种暗示。九月初一日，魏忠贤向新皇帝提出了辞去东厂职务，回家养病的请求。这是宫中旧例，在一位新皇帝即位后，原来担任重要职务的大太监都应提出辞职。但魏忠贤的这个举动显然也是为了摸清崇祯帝对自己的态度的一种尝试，如果皇帝言辞热切地予以挽留，他大概可以暂时地放下心来；如果崇祯帝批准了辞呈，他也还有机会另做安排。但一时还拿不定主意的崇祯帝的反应却正好在两者之间，既没有同意让他就此回家休养，也没有按照先前的惯例那样大大地褒奖他一番，"温旨慰留"。这种不冷不热的态度使得魏忠贤仍然摸不着头脑，只好继续摸索着前进。

但在另一个问题上，崇祯帝的态度就鲜明多了。在拒绝了魏忠贤辞呈的同时，他客客气气地把客氏送出了宫。作为先帝的乳母，客氏在天启时留在宫内已经不合规矩，在新皇帝继位之后再赖在宫中当然就更没有道理。崇祯帝送客氏出宫的决定合情合理，客氏和魏忠贤尽管心中很不情

愿，却没有反对的余地。于是客氏把珍藏多年的天启帝幼年剃下的头髪、剪下的指甲在先帝灵柩前焚化了，作为最后的诀别，而后哭哭啼啼地离开了皇宫。魏忠贤在宫中最重要的内援从此不復存在。

宫内格局的变化还不仅仅是赶走了一个客氏。按照传统惯例，新天子上臺，御前任用的太监必定要实行一次大换班，崇祯帝进驻皇宫，自然也要从他的信王府带过一批亲随。新人进宫，旧人就得让位，魏忠贤在宫中的死党李朝钦、裴有声等人只好告假乞休。在这个问题上，崇祯帝没有再过分客气，一律批准了几个人的辞呈，但用语温和，表面上做得一团和气。这样在不知不觉之间，一大批宫中的重要岗位都调整到崇祯帝的亲信手里。这是崇祯帝的一个重要胜利，但取胜的原因并不是由于他本人使用了什么了不起的计谋，而仅仅是因为作为一个皇帝，制度方面对他有利的地方太多。尽管如此，这个人事方面的胜利还是让他大大增强了信心。他仍然不敢掉以轻心，因为魏忠贤和他的党羽们几年间已经在宫中扎下了太深的根子，盘根错节，绝不是换上几个管事太监就能解决问题的；但他总算想要主动对魏忠贤发起一点小小的侧面攻击了。

大概是为了检验一下自己在宫中的权威是否已经确立，崇祯帝突然想起重提歷史的旧账，决定要严惩当年给光宗开过泻药，导致光宗一病不起的内药房太监崔文升。他选择这个目标，是因为崔文升在宫中算不上什么实力人物，是一个比较容易捏的软柿子。同时，又听说这个崔文升早就投靠了魏忠贤，多少可以算作魏忠贤集团的一个外围成员，崇祯帝这样做，有点敲山震虎的味道。但这一次，皇帝的意旨就不像当初命令赏给巡逻人员酒饭的时候那么灵验了。一群大大小小的太监为此事在宫中喧譁鼓譟不止，纷纷表示："崔官儿是好人，理不应杀。"崇祯帝面对着这种抗议，居然一时也就没有什么办法，只得暂缓对崔文升的处理。这使他更加明白，皇帝的权威有时候也并不是那么可靠。

正是因为不敢轻视魏忠贤一党的实力，在九月初送客氏出宫和批准李朝钦等人离职的时候，崇祯帝也没有忘记给魏忠贤一点甜头作为平衡。他以登基大典加恩的名义赐给魏忠贤的侄子宁国公魏良卿和侄孙安平伯魏鹏翼铁券丹书，表示对魏家子孙世世代代信用恩宠。铁券用不易损坏的生铁铸成，由歷代皇帝赐给功绩最卓着的勋臣，作为千年万代永远享受特权的象徵。但天子的金口玉言常常最算不得数，歷史上有不少得到铁券后不久就遭到满门屠戮的例子。魏忠贤也明知道，铁券并不能真正保证他和他的家族今后的安全，但眼前有皇帝的这个表态，仍然感到很欣慰，对前途不免又多了几分幻想。

最初的一两个月里，崇祯帝对于魏忠贤乃至他的左膀右臂们真是礼貌尊重，有甚于天启帝。但由于他与魏忠贤一伙人从来没有如同天启帝那样的一层密切关系，在这种礼貌和尊重后面又不可避免地会透出一股冷淡。新旧朝廷交替之后，各地赞颂魏忠贤的表章、请求为他建立生祠的报告还在源源不断地送进京城，其中绝大部分都是天启帝驾崩之前的作品，因为路上耽搁太久，才姗姗来迟。崇祯帝相当认真地阅读这些不合时宜的本章，总是一边读一边笑，既不责怪又不首肯，而且根本就不发往内阁票旨。

明代的政治体制主要是以文牍往来批覆的方式体现权力和统治，各级官僚机构要把大事小事逐条向皇帝汇报，并在得到批覆后再照皇帝的旨意执行。臣子们向皇帝提交的工作汇报或请示或建议，叫作“本”，按性质不同分为“题本”和“奏本”两种。一般说来，所有的题奏本章都应该得到批覆，以便政府各部门能遵旨而行，只有这样，帝国的政治机器才能运转正常。从理论上讲，皇帝批本应该亲自阅读、亲自批示，但明代长期以来实行的，却是由皇帝的高级秘书——内阁大学士代为处理。一切本章首先送进宫中登记之后，一般不做任何处理，皇帝通常也不看，直接

就被送往内阁，由大学士们仔细研究斟酌后以皇帝的口气草拟批旨。内阁草拟的旨用墨写在籤条上，叫作“票拟”，再由皇帝根据情况用硃笔批在本章上才发生法律效力，这后一道工序叫作“批朱”。明代许多皇帝怠于政务，是连批朱的工作也不愿意做的，全部交给宫廷内部的另一批祕书去干，那就是司礼监的秉笔太监们。内阁和司礼监因为分别掌握着“票拟”和“批朱”的大权，在明代的政治结构中地位才特别显赫。如果本章在第一次进宫的时候或是经内阁票拟之后被皇帝扣住，既不批旨又不表态，政治术语就叫“留中不发”，这通常表明皇帝对于本章中所谈到的问题抱有某种微妙暧昧的态度。

对那些吹捧魏忠贤和提出要为他建立生祠的本章，崇祯帝确实也不知道该如何处理。他肯定不能继续像天启时期那样一律批准，甚至在圣旨上也随声附和地大肆吹捧魏忠贤一番，这既不符合一代新天子的身份，也有悖于他性格中固有的那股傲气。如果对那些本章进行批驳，甚至勒令禁止，则又怕激怒魏忠贤和他的阉党同伙，会生出什么不可预测的事变。无法决定，只能全部留中不发了。但这种留中不发的方式却在无形中产生了一种神祕色彩，好像皇帝暗藏着极深的心机。这让魏忠贤和他的党羽们大费猜度，感到极度的压抑。

经过了多少次留中之后，魏忠贤终于沉不住气了，他让人拟写了报告，上疏请求不要再为自己建造生祠。崇祯帝的批示很有意思：“建祠祝禧，自是舆论之公，厂臣（指总督东厂的魏忠贤，在古代社会中，皇帝在书面上和口头上不叫臣下的名字是表示一种极大的尊敬，称魏忠贤为厂臣是天启时期留下来的传统，崇祯帝在最初阶段仍然照例尊行。）有功不居，更见劳谦之美，准辞免，以成雅志。”表面上给魏忠贤戴高帽子，骨子里却透出强烈的讽刺意味。这种讽刺意味不知魏忠贤本人体会出来没有，但那些精猾已极的朝臣和地方官员们肯定是感觉到了，从此瀰漫全

国的建祠之风一下子被煞住，魏忠贤也从近乎神圣的云端落回到平地上。

只从表面上看起来，这位新皇帝对于国家政务好像并不是特别关心。他不像天启帝那样沉醉于鉼凿斧锯，舞刀弄枪，观剧作乐，游园戏水，而喜欢静坐读书，进宫做了天子之后，又特别喜欢阅读朝臣的本章。但也仅止是读读而已，除了那些对魏忠贤吹捧得太过分的本章之外，他把诸多朝政全部交由身居内阁和六部堂官的阉党大僚们以及宫中的魏忠贤一伙处理，从不多加干预。他最感兴趣的好像只是同自己的家庭有关的几件大事。

在正式登基之后，他的一家人全都搬进紫禁城里。正妻周氏住在皇后居住的坤宁宫，田氏住东路的承干宫，袁氏住西路的翊坤宫。这3位就成了民间所谓的正宫和东宫、西宫娘娘。居住的分散和宫廷里刻板的制度打断了信王邸中那种亲近热闹的生活，但3位娘娘的关系一般说来还不错，崇祯帝对几位曾在信邸共“患难”的妻妾的感情也始终不渝，和睦稳定的后宫不会让他在险恶的政治斗争中分心费神，还能在精神上给他提供一个安乐的避难场所。

九月二十一日，以日代月计算的27天的国丧期刚满，他就为自己的生母刘氏追尊谥号，谥为“孝纯渊静慈肃毗天钟圣皇太后”，封刘氏的弟弟刘效祖为新乐伯，另外几个弟弟和侄子也都封了世职，并且命令将刘氏的棺木迁移到光宗的陵寝“庆陵”。于是在地宫中陪伴光宗的就有了他的三位妻妾：结髮嫡妻郭氏、天启帝的生母王氏和崇祯帝的生母刘氏。这样算是了结了多年来思念生母的一件心事。紧接着，在二十七日，崇祯帝又主持举行了册封信王妃周氏为皇后的大礼，再次祭告天地祖先，周皇后在后宫中也接受了朝廷命妇和宫中上下的朝拜。

十月初一日，他第一次以皇帝的身份参加了太庙里祭祀列祖列宗的典礼。初七日，在他的主持下又完成了对大行皇帝（天启帝）谥号和庙号的确定，全部称号是“熹宗达天阐道敦孝笃友章文襄武靖穆庄勤哲皇帝”。尽管天启皇帝既不“庄”又不“勤”，更谈不上“章文襄武”，但得到一大堆鲜明耀眼的好听字眼儿是每个过世皇帝哀荣的一个组成部分，给大行皇帝献上大堆好听字眼儿又是嗣皇帝应尽的义务，歷来如此，没有人过分计较。对先帝的遗属张皇后也做了妥善安排，让她住进了宽敞的慈庆宫，后来还为她上尊号为“懿安皇后”。崇祯帝对这位曾经为自己主过婚的寡嫂一直很尊重，在重大节日和她的生日都要到慈庆宫亲自拜祝，因为叔嫂之间的不方便，崇祯帝只在殿堂门外行礼，张后也隔着竹帘在殿内回拜。但后来竟有绯闻传出来，说崇祯帝同张皇后有某种暧昧的亲暱关系，不知从何说起。

皇帝忙着处理这些琐碎的家务事，使得魏忠贤和阉党党魁们多少有点安心了。只要这位新皇帝少插手政务，他们很愿意就这样长期合作下去。但崇祯帝可不愿意像大哥那样作一个煳里煳涂的天子，更不愿意同魏忠贤那种人长期合作下去。他的不动声色主要是出于无奈，只能耐心等待。好在阉党内部已经在开始分化，魏忠贤集团这座看起来坚不可摧的堡垒终于在内部出现了缺口。

一位新皇帝的即位总是意味着会有一番新政，不论是实质上的更新还是只换换形式。因此，朝臣们都在睁大眼睛盯着新天子的作为。在登基大典的时候，他们看到了一位虽然年轻却显得沉稳严肃的青年人，在气质上明显不同于原来的天启皇帝。本来对魏忠贤专权不满的人们心中升起了新的希望，而那些同魏忠贤一党搅得很深的人则深感不安。近两个月以来新皇帝虽然一直同魏忠贤和平共处，但即使最没有政治眼力的人也看出来了，崇祯帝表面上对魏忠贤客气礼貌，实际却是十分冷淡，魏忠

贤同皇帝亲如骨肉的时代已经一去不復返了。阉党集团中有的是反覆无常的小人，看风使舵是他们惯用的伎俩，何况还有相当一部分人本来已经对魏忠贤体制非常不满，难怪最先起来造反的又是阉党内部的人士。

最先起事的是御史杨维垣，他属于阉党中为魏忠贤出力不少，但得到实惠却不大的一类牢骚派。十月十四日，他上疏专攻魏忠贤的第一号心腹崔呈秀，所论的却都是些无关痛痒的事，如“与前内阁大学士冯铨争权夺利”，以及“在服丧期间仍然督理宫殿建设工程”等等，同时又为魏忠贤撇清开来。崔呈秀是最早投靠魏忠贤的，为人贪婪无耻，却颇为干练，因而最得魏忠贤的信任。他在天启五年（1625）的时候还只是一个普通的御史，仅两年工夫就经数次超擢任兵部尚书兼左都御史，并加衔少傅兼太子太傅，成为一品大员。谁都知道，魏忠贤能够操纵国家大权，主要是靠这个崔呈秀鼎力支持。杨维垣攻击崔呈秀却褒扬魏忠贤，大概又是一种策略，是在向崇祯帝发出的探测气球。但杨维垣对崔呈秀的弹劾毕竟还是标志着阉党内部一场大分化的开始。

崇祯帝大概很明白杨维垣对于崔呈秀的攻击是别有用心，是阉党内部一部分人牺牲他人保存自己的无耻手腕，而且包含着试探自己应手的意图。但出现了这样的劾疏说明政局已经起了变化，他还是很兴奋。不过他能沉得住气，在批覆中仍然为崔呈秀辩护了几句，说是“不得苛求”。但以崔呈秀的特殊身份，仅仅说“不得苛求”等于是鼓励朝臣再进一步对他进行攻击。果然，在几天里就出现了一股攻击崔呈秀的风潮，参加者包括在阉党中颇有影响的几个人物，几位主事级的小臣用词还十分激烈。到这时候，崔呈秀只能依照惯例自动请求罢免了。

明朝同歷代王朝一样，标榜以孝治天下，因而有一种“丁忧”的制度，除了极特殊的例外情况，一切文武官员遇到父母去世都要立即离职回家为父母服丧27个月，服除之后才能等待朝廷再予授职。崔呈秀不久之前刚

刚丧父，但由于他是魏忠贤的主力干将，并没有立即离职，这在许多人看来不但违背了制度，也违背了孝道，是很不道德的。这一次崇祯帝正好利用了人们的道德意识，快捷而果断地做出反应，立即批准他回籍守制，为父亲服丧。这种道德准则当然只是一个藉口，因为只过了几天，崇祯帝就再次以“罪状明悉”的理由，将崔呈秀削职为民，并且追夺诰命，这意味着崔呈秀被彻底打倒了。

对崔呈秀的处置是崇祯帝同魏忠贤集团斗争中的关键一步。在此之前，他对于那个曾经不可一世的势力集团还是颇为顾忌的，一直小心翼翼地不去触痛他们。但在以“丁忧”为藉口免去崔呈秀现职之后，对方并没有什么激烈的反应；进一步以并不明确的“罪状”将其革职削籍，仍然没有遇到什么抵抗。这时候崇祯帝才发现，对手其实并没有什么了不起的本事。他很像贵州山里的那只小老虎，本来对陌生的驴子很有些害怕，但一旦发现眼前的这个庞然大物只不过是徒有其表之后，他的勇气成倍地增加了。他开始一步步紧逼，而对手却只知道一步步后退，一待时机成熟，他就要凶勐地扑上去，咬断对手的喉咙，撕烂对手的身躯，要彻底剷除魏忠贤和他的党羽。

在攻击崔呈秀的风潮中，越来越多的人开始在不同程度上附带地攻击起魏忠贤。这反映出朝臣（其中相当一部分是阉党分子）的某种心态，他们也在小心翼翼地试探着新皇帝的心思打算。崇祯帝依然不动声色，等待着专门弹劾魏忠贤的本章出现。果然，在崔呈秀被罢职后，十月下旬，第一份专攻魏忠贤的劾疏被送进了宫中。劾疏的作者是一位下级官员，兵部主事钱元悫。钱元悫在疏中提出：“鉅奸崔呈秀虽已锄去，但崔呈秀之罪恶都是由于有魏忠贤的权势。”而那个魏忠贤是一个居心阴险的枭雄之徒，靠着为先帝操服贱役窃取了大权。钱元悫连用了七八个典故，把魏忠贤比作歷代着名的奸雄赵高、王莽、樑冀、王衍、董卓、桓

温、曹节、王甫，这些奸雄中既有宦官又有朝臣，却无一不是仗势弄权，把一个王朝闹得混乱不堪，甚至导致了王朝的覆灭。钱元悫最后请求，对这个罪大恶极的魏忠贤，皇帝即使开恩保留他的性命，也应该革去一切职务；对他的大小党羽，同样应依法治罪。

这第一份劾疏用语十分严峻，不足的地方是没有具体指出魏忠贤的罪恶，有点虚张声势的味道。但紧接着，一份更有分量的奏本也出现了。书写这一奏本的人地位更低，根本就不是朝廷官员，而是嘉兴县的一个贡生，叫钱嘉徵。他在奏章中罗列了魏忠贤的十大罪状，包括：处处与皇帝并驾齐驱；蔑视诬陷皇后；在宫内操练阉军，图谋不轨；以宦官掌握内外大权，违背祖制；剋剥藩封，侵夺皇室的利益；目无圣贤，建祠与孔子分庭抗礼；无功而封至上公；无劳而冒滥爵赏；蒐括民脂民膏；扰乱科举制度。

明代制度，凡国立学校的学生，不论是监生、贡生还是普通生员（秀才），一律不准议论国政。在太祖朱元璋钦定的“卧碑文”（即官学学生守则）中有明文规定：“天下利病，诸人皆许直言，惟生员不许……”但这一次，钱嘉徵的议论正中崇祯帝的下怀，所以他并不纠缠于祖制，立即批旨“知道了”，连同钱元悫的劾疏一起送交六科抄录，以邸报的形式公佈于天下。在皇帝态度明确的鼓励下，类似的奏章紧跟着铺天盖地而来。

此时的形势已非当年可比，尽管这一次攻击者的实力和气势都远不如当初天启四年（1624）东林党人对魏忠贤的攻势，魏忠贤却绝对不敢掉以轻心。在钱嘉徵的劾疏刚刚递交上来的时候，崇祯帝特意客客气气地将魏忠贤叫到面前，让内侍当面把劾疏的内容读给他听。这种敢于直面对手的态度让魏忠贤更加六神无主。他还是希望能够多少缓和一下同皇帝的关系，带着厚礼拜访了崇祯帝的亲从太监徐应元。当年同在太子宫中

的时候，魏忠贤同徐应元也算是老相识，这时他想靠着过去的老关系为自己疏通一下。但崇祯帝却丝毫不讲情面，在得知魏忠贤买通徐应元的事情之后，对徐应元进行了严厉的斥责。不久以后，本来可能前程远大的徐应元被髮往湖北钟祥的显陵去守陵，再后，则被罚为净军（由犯罪太监组成的清洁队），转调凤阳，悲惨地终了一生。

魏忠贤见到缓和已经无望，只得再次提出辞职养病的申请。这一回他是诚心诚意地提出的，希望能在交出权力之后还可以保住面子、财富和性命。崇祯帝这一次毫不犹豫地批准了魏忠贤的辞呈，同时根据他本人的请求，取消了魏家所拥有的公、侯、伯三个爵位，改魏良卿等人为锦衣卫指挥使或指挥同知、佥事，由原来的超品一下子降到了三品、四品的武职。为了调整魏忠贤离职后的内官班子，崇祯帝还任命王体干改掌东厂，而以自己的亲信高时明出任司礼监掌印太监。（但仅仅几天之后，王体干的东厂职务也被再次罢免了。）这道圣旨是十月二十六日发出的，距离崇祯帝上臺才两个月多一点时间。

崇祯帝一次又一次进攻，魏忠贤一步又一步退却，到这时候，已经用不着再兜圈子，崇祯帝显示出他性格中刚勐严厉的一面。又过了五天，十一月初一日，皇帝发表上谕，彻底改变了以前对魏忠贤的态度。上谕中说：魏忠贤“专务逞私殖党，盗弄国柄，擅作威福，难以枚举……”而且又“通同客氏，表里为奸”，真是罪恶滔天。“本当寸磔（凌迟处死）”，但看在先帝的份上，从轻将其发往凤阳看守祖陵。魏忠贤和客氏的家产一律查抄没收，他们的家属亲戚全部发配到西南边远地区充军。对于高级太监来讲，发往凤阳看守祖陵差不多是仅次于死刑的严重惩处，而这时的魏忠贤已经完全乱了方寸，只好老老实实地接受这一还能保住性命的处理。

对皇帝这次上谕的执行速度大大超出了明代官僚机构歷来拖拖拉拉的传

统，魏忠贤只是稍稍收拾了一下，第二天就离开了京城。或许他也认为，早一点离开京城可以减少皇帝和在京官员们的注意力，可以使自己多一点安全。但情况却并没有像他想得那么简单、那么乐观。他在这个帝国做过整整三年的独裁者，百足之虫死而不僵，影响和实力毕竟太大了。在他离京的时候，仍然有一大批人前去送行，跟随他南下的僕从数量也颇为可观。这个情况再次引起了崇祯帝的警惕，可能还极大地伤害了他的自尊心。十一月初四日，崇祯帝再发上谕，指责魏忠贤竟然对皇帝的宽大毫无感激改悔之心，南下路上居然还在身边簇拥着众多的亡命之徒，显然是有意谋反。命令“锦衣卫即差的当官旗前去，扭解押赴彼处，交割明白……所有跟随群奸，即便禽拿具奏，毋得纵容遗患。”

魏忠贤是在十一月初六日那天得知这道谕旨的。当时他那长长的车队才走到北直隶河间府的阜城县（今河北省阜城县），也可以算是他的家乡（他是河间府肃宁县人），他在京城里的亲信快马赶到，向他传达了那上谕的精神。到了这个时候，魏忠贤总算意识到，新天子是绝不会给自己留下一条活路了。魏忠贤当晚住在阜城的一个客店里，神情恍惚，六神无主。隔壁房间里正好住着一个从京城来的姓白的秀才，见到万人痛恨的大太监魏忠已经到了山穷水尽的地步，就按当时流行的“挂枝儿”曲调，临时编了一首歌词：

听初更，鼓正敲，心儿懊恼。想当初，开夜宴，何等奢豪。进羊羔，斟美酒，笙歌聒噪。如今寂寥荒店里，只好醉村醪。又怕酒淡愁浓也，怎把愁肠扫。

二更时，展转愁，梦儿难就。想当初，星牙床，锦绣衾绸。如今芦为帷，土为炕，寒风入牖。壁穿寒月冷，檐浅夜蛩愁。可怜满枕凄凉也，重起绕房走。

…………

闹攘攘，人催起，五更天气。正寒冬，风凛冽，霜拂征衣。更何人，效殷勤，寒温彼此。随行的是寒月影，吆喝的是马声嘶。似这般荒凉也，真个不如死！

歌词从一更说到五更，白秀才也在客店里真唱了大半夜。曲调似极哀婉，好像是一首輓歌，细听词句又是极恶毒的幸灾乐祸。在这样一首奇特的丧曲声中，魏忠贤的精神彻底崩溃了。当夜，他同贴身的亲随太监李朝钦用一根绳子吊死在这家客店里。时年60岁，刚好经歷了一个花甲子。

魏忠贤的垮臺和死，标明瞭魏忠贤专权的体制已经土崩瓦解。他的死讯传到京师之后，正在蓟州家里守孝的死党崔呈秀立即做出了最迅速的反应。他召集姬妾于一堂，罗列八珍，通宵痛饮，每饮一杯后就把手中价值昂贵的酒杯摔个粉碎。痛饮之后，崔呈秀也步魏忠贤的后尘，上吊死了。他的一位爱妾叫作萧灵犀的还以身相殉。更为悲惨的是客氏，在魏忠贤被贬斥凤阳之前她已经被从家中发往浣衣局监禁起来，紧接着又被抄了家。浣衣局是明宫中专门安置年老宫女的地方，条件非常恶劣，“客奶奶”锦衣玉食惯了，本来就有些熬不住，没过几天，魏忠贤已死，崇祯帝派人到浣衣局去用竹板子把她活活打死了。

魏忠贤的尸身最初被草草埋葬在阜城，后来为了昭示国法，他的尸体又被挖出来处以凌迟之刑，割成了碎片，头颅还被割下来挂在河间府城的高杆上示众。客氏和崔呈秀也分别被斩尸于京师和蓟州。魏、客、崔三家的主要成员也都迅速受到惩办，魏忠贤的侄子魏良卿、客氏的儿子侯国兴不久后都被处死，其他的昆弟子侄如魏志德、魏希圣、崔铎、崔凝秀等十余人被髮往西南烟瘴地方永远充军，只有魏忠贤的侄子魏良栋、

侄孙魏鹏翼和崔呈秀的儿子崔镗、崔钥都还只是三五岁的孩子，有旨恩准释放，以示法外之仁。

第二年正月，刑部正式提出了对已经死去的魏忠贤、客氏和崔呈秀的司法处理意见。二十六日，崇祯帝在刑部的提本上批旨：“逆恶魏忠贤，原本是宫中杂役，凭藉先帝恩宠，肆意迫害良善；无开国定策之功而封爵，威逼天子自命为上公；盗窃皇家财物，擅自弄兵大内，阴谋作乱，图为不轨。串通逆妇客氏，暗中传送声息，把持宫廷内外。崔呈秀投身魏忠贤，于君不忠，于父不孝，操持权柄，作威作福，残害官绅，屡兴大狱。罪恶累累，国法难容……”这道圣旨连同刑部拟定的魏忠贤等人的罪状谖书就成了魏、客、崔三人的最后定案材料，并且大量刊印，在全国广为散发。至此，崇祯帝上臺以后发动的一场政变才算有了一个收束。魏忠贤和他的主要亲信不但在肉体上被消灭了，而且彻底名誉扫地，在法律上也成为国家的罪人。

曾经让崇祯帝那样提心吊胆，那样小心谨慎的庞然大物，曾经那么威严赫赫不可一世的魏忠贤集团，在不过两个多月的时间里就灰飞烟灭，不復存在了。天下百姓和先前被罢去官职的东林党人们，都在为邪恶的魏忠贤专制的覆灭而群情振奋、欢欣鼓舞。没有被魏忠贤的事件牵连进去的朝臣们也在竭力表现着自己的兴高采烈，同时没有忘记齐声歌颂当朝天子的神勇英明。在崇祯初年出版的一部着作中这样写道：“当今皇帝登基，立即就削除了邪恶势力，正人君子得以復兴，干坤宇宙为之一清，日月星辰为之重朗。否极泰来，万象更新。每一道圣旨下发，人人都在额手称庆；每一道上谕颁行，处处都在讴歌颂扬。”其中虽不免有夸张之处，还是大体说明了当时社会对于崇祯帝剷除魏忠贤集团这一歷史事件所作出的反响。

在这种气氛中，崇祯帝也感到了从没有过的舒畅，从没有过的信心十

足。这也是他整个17年皇帝生涯中最兴奋也是最愉快的一段时期。他对自己的政治手腕非常欣赏，对自己经邦治国的天才毫不怀疑，因而对国家面临的种种危机也没有放在心上。他以为，靠着自己的英明天纵，在剪除掉魏忠贤集团这个政治障碍之后，没有什么解除不了的危机，没有什么克服不了的困难。

崇祯元年（1628）戊辰元旦，是一个龙年的开始，是崇祯帝即位后的第一个新年，也是崇祯这个年号被正式启用的第一天。半夜子时，新旧年相交的时候，崇祯帝在皇极殿接受了朝臣们的隆重朝拜。金吾卫和锦衣卫的将军、甲士们的仪仗队从丹墀一直排到午门外，伞盖幢幢，旌旗猎猎，仪仗队中的骏马驯训象也都精神抖擞。文武群臣们极有秩序地鱼贯而入，匐匍在冰凉的丹墀上，静候皇帝的来临。在静鞭声中，崇祯帝稳步登上宝座，微笑着俯看着群臣跪倒，起来，跪倒，起来，一遍遍地行着三跪九叩的大礼。透过古朴的礼乐声和朝臣们的致贺声，他能听到远远的宫墙外面，京城的百姓人家也正在用鞭炮迎接新岁。宫里宫外都是一片太平景象，“爆竹声中一岁除，……只把新桃换旧符。”他想到需要做的事情还很多，要清除魏忠贤的余党，要为过去的冤狱平反，要重建得力的政治领导班子，要改善国家财政状况，要加强边防，要整顿吏治……但无论如何现在已经有了一个良好的开端，在他的英明统治下，旧符总会被新桃取代，一箇中兴盛世终究要来临。

四 拨乱反正

天启七年（1627）十二月十六望日，月食。依照传统习惯，每当遇到日食、月食，皇帝都应该对自己的统治情况进行一番反省。崇祯帝即位未久，还没有什么值得反省的地方，但他仍然为此发佈了一道上谕。上谕中说：“朕披阅史籍，见到古代帝王，无不以敬天恤民为第一要义，而其中的要点又在用人、理财、靖乱、护民。……近来高官佈满朝廷，而山野遗贤却未被任用；各衙门散官冗吏贪婪无能，白白耗费民脂民膏。裁减冗员，澄清吏治，岂能不极力讲求？加派赋税是迫不得已，而有司却敲骨吸髓以充实自己的私囊。因此保护百姓，宽刑省罚，洁己爱民，责任在于循良官吏，怎样选择，才能让百姓解脱困厄？目前东西战报频仍，战守之策毫无定谋，致使师老饷乏，了无成效，如何筹划才是御敌之道？况且民穷而灾荒不绝，官劣而法度败坏；大臣畏惧谗言不愿实心任事，小臣观测风向有意制造混乱。这些情况每一条都足以引起上天的不满。你们九卿科道诸臣，一定要忠诚秉公，各陈所见，如果可以安民察吏、富国安边，朕将採纳实行。诸臣也要痛改旧习，共励公忠，以副朕侧身修行的实意，不可以虚文塞责。”

这道上谕对当时的国情、政情，应该说了解得还是很全面很得要领的。明帝国在经过魏忠贤和阉党们糟蹋了几年之后，如同害了一场大病，行政混乱，吏治腐败，民穷财匮，边防危急，要着手把这个五痨七伤的老大帝国治理得健康兴旺，实在不是一件容易的事。但刚刚走上政治舞臺的崇祯帝是一个聪明又自信的年轻人，意气风发，斗志昂扬，决心要完成一项前所未有的伟业，让天下太平，让帝国復兴，让自己成为彪炳史册的圣君。在崇祯纪元前夕的这道上谕，正是他拨乱反正的一个施政纲领。

新政是从调整内阁班子开始的。

明代内阁由内阁大学士数人组成，设立于成祖永乐年间，最初只是皇帝个人的一个秘书班子，在皇帝身边掌管文移，起草文件，内阁大学士的职位也不高，只有五品，与翰林院学士的品级相同。但自宣德时期起，朱家的龙子龙孙们日渐退化，厌倦政务，懒于同阁臣们共同办公，内阁也就不再是皇帝的贴身秘书和助手，而成为国家的一个特殊官僚机构。内阁在同皇帝分离的过程中带走了一部分原先属于皇帝的职能，主要体现在票拟圣旨这个方面，权力日益加强，地位也日益提高。后来入阁的大学士差不多都要兼尚书或是侍郎衔，被认为是朝廷中最重要的大臣，称作“辅臣”。许多人都认为，明朝虽无宰相之名，内阁大学士却有宰相之实。在明朝中后期，官场中私下里也确实把内阁成员们称作相国、相爷，被任命进入内阁称作“大拜”（就是拜相）。在一个文官官僚的政治生涯中，入阁充任辅臣，往往是终身追求的最高理想和最高境界。

内阁是朝廷的中枢，对于政策的制定与执行关系极大，而崇祯帝在即位之初继承下来的却是一个阉党充斥的内阁。主持内阁工作的首席大学士被称为首辅，地位极尊，权势极重，是庞大的官僚集团中第一位的角色，而当时的首辅黄立极却是在魏忠贤专权时期由礼部侍郎迅速升上来的，对魏忠贤和他的心腹唯命是从。内阁中的另外几位大学士施凤来、张瑞图和李国普，情况也差不多。魏忠贤被剷除后不久，浙江山阴（今绍兴）监生胡焕猷上疏对内阁4位成员进行了一番集体攻击，说他们“在魏忠贤专权之时，不能有所匡正，反而揣摩意旨，专事逢迎”，都应该被罢免。

官学生是不准议论国事的，但自从贡生钱嘉徵攻劾魏忠贤博得了好名声以来，监生、秀才们上疏议政的缕缕不绝，一时成了风气。崇祯帝以为此风不可长，对于一介书生轻议内阁全体大臣也有些厌恶，就下令把胡

焕猷逮捕治罪。刑部依卧碑中生员不许议政条例对胡焕猷判处杖刑，并革去监生功名。攻讦者虽然受到了惩治，被攻击的人却还是不能自安。黄立极等4位内阁大学士联名启奏，说自己罪恶深重，竟引起一个书生的指责，给朝廷带来了莫大耻辱。同时却又辩解说："以魏忠贤的势力，从先帝那里取旨轻而易举，臣等依上意拟旨，一言不合，就命改拟。他是虎狼之性，一触即怒，四年来多少人被其残害，臣等若以生死抗争，又能有什么实效呢？不得已徘徊其间，是想尽量做一点有益于国家的事，以尽区区报国之心。"

这种"不得已"论其实很无耻，当然也很难得到朝野舆论方面的谅解。黄立极在几天后终于託病辞职，其他几个人的地位也岌岌可危。崇祯帝为了充实内阁，也为了早日建立起一个完全属于自己的行政班底，就在新年改元之前，命各部门主要负责人，所谓九卿，依例共同推举新阁员。大臣们一共推举了10人，一般说来，依照惯例皇帝只要按照廷推的顺序画定最前面的三四个人就可以了。但崇祯帝却不是一般的皇帝。他对于君主独裁的理解，就是要独自裁定，处处显示出自己的特点来，不愿意按照老一套的程式陷入朝臣们设定的圈套。可是他也有自己的困难，就是还根本弄不清楚朝中大臣的基本情况，谁个贤，谁个劣，仅凭书面上官样文章的履歷材料是无法判定的。既不能自己判断，又不愿让朝臣们代为判断，最后他想出了一个听天由命的办法，举行了多年没有实施过的所谓"枚卜"大典，就是通过抽籤的方式来确定哪个人入选。

这次"枚卜"大典的仪式是在干清宫里举行的，场面相当郑重其事，内阁的几位辅臣，五府、六部和都察院的主官都督、尚书、侍郎、都御史，中央各寺、司和顺天府的负责官员，所谓的大小九卿，以及六科给事中和十三道御史都参加了典礼。崇祯帝先向苍天焚香祷祝，行一跪三叩首礼，而后用象牙筷子从金瓶里夹出了四支纸籤，依次得到的是南京吏部

侍郎钱龙锡、礼部侍郎李标、礼部尚书来宗道、吏部侍郎杨景辰。尽管是得之于“天命”，崇祯帝还是对这几个人有些不放心，施凤来等人也劝皇帝不如索性多抽几个。于是又抽了两个籤，得礼部侍郎周道登和少詹事刘鸿训。

在抽籤的过程中还发生了一个小小的事故。有一个纸籤已经被崇祯帝从金瓶里夹出来了，但忽然颾起了一阵风，把那个纸籤吹到了不知什么地方。宫中的侍从太监们忙忙乱乱地找了半天，也没有找到，只好当作天意，作罢。直到这次“枚卜”大典结束后才发现，那纸籤落到了施凤来背后的衣褶里。打开一看，是王祚远。这位王祚远好端端一个辅臣的前程，就这样被一阵风给吹掉了，他个人在歷史上的地位也就由声威煊赫的一代相爷变成了没人过问的无名小卒。在所谓正史的《明史》上，不但没有这个王祚远的传记，就连他的尊姓大名也一次都没有出现过。天欤，人欤？

当天皇帝就做出任命，所抽到的6个人全部授礼部尚书衔兼东阁大学士，参预内阁机务。内阁的办公地点在紫禁城午门内靠东一侧，是一排极其简陋的坐北朝南的平房，就是所谓的“东阁”。东阁横开共有5间，因为不够用，每间又南北向隔为两间，总共是10间。其中朝南中间一间是供孔圣人及开会用的厅堂，其他各间则是各位阁臣的办公室，根据各位大学士在内阁中的资格自东而西，先南后北，依次分配，其中东南角的第一间就是法定的首辅值房。由于北侧的5个房间无法采光，白天都得点灯，因而当在内阁的大学士不超过4个人的时候，一般并不利用。现在，在理论上内阁一下子就有了9名成员，很有些人满为患。幸好新被任命的阁僚当时大都没在北京，立即上任的只有来宗道和杨景辰，其他人最晚的如钱龙锡，是半年以后来到京城履任的，内阁的值房才没有因爆满而拥挤不堪。

后来的事实证明，崇祯帝的手气并不算好。他靠着天意抓到的新一届内阁中，大多是些昏昏碌碌的庸才。一两个比较好的，也因为性格气质的原因很难同皇帝合作，在阁中时间不久就被崇祯帝赶走了。从此也就奠定了崇祯朝内阁成员众多却变换频繁，大学士们走马灯似的你登场罢我登场的古怪格局。

在调整内阁班子的同时，崇祯帝对于朝廷中地位仅次内阁大学士的六部尚书和都察院左都御史（在明代被合称为“七卿”），以及侍郎、副都御史等佐贰大僚，也进行了几次调整，主要是清除阉党孑遗。如吏部尚书，被人叫作魏忠贤手下“十狗”之首的周应秋，靠无耻吹捧魏忠贤被提拔起来的刑部尚书薛贞，都是在天启七年（1627）末就被罢官。在他们的位置上换上一些比较老成持重、在魏忠贤专权时期没有什么明显劣迹的大臣。

内阁、七卿的班子乃至其他一些重要官职的调整，从来也没有真正令崇祯帝满意过，但经过了几次换班，总算是把魏忠贤时代的阉党标记基本上清除了，总算初步完成了“一朝天子一朝臣”的转换。

有鑑于魏忠贤专权的歷史教训，崇祯帝在牢牢控制住政权之后，还严厉地削减限制了宦官的权力。天启七年（1627）十一月，他颁旨撤销了各边防的镇守太监；崇祯元年（1628）正月，又发佈了一道严格限制宦官行动的上谕，严饬宦官没有受命不得出京城一步。

其实，早在明王朝建立之初，太祖朱元璋鑑于歷代不断髮生的宦官乱政的经验教训，就曾经多次提出过不能信用宦官：“开国承家，小人勿用，圣人之深戒。其在宫禁，止可使供洒扫、给使令、传命令而已，岂宜预政典兵？”

为了防止宦官干政擅权，他制定了许多禁令：严禁内臣干预朝政，严禁

内臣同外朝官员文移往来，甚至禁止内官读书识字。他还命在宫中竖立起镌刻着“内臣不得干预政事，预者斩”的铁牌，希望子子孙孙不要失去警惕。但朱元璋的子孙们对于这条祖训却执行得十分差劲。二百多年来明朝宫中的太监们依仗着自己皇帝家奴的特殊身份，不但干了政、典了兵，而且时不时地把握最高权力，俨然成为皇帝的政治代理人。

内监擅权，至魏忠贤而发展到顶峰，崇祯帝有惩于那个时期太监的骄横和政局的混乱，也基于官绅和民众对于太监乱政的切齿痛恨，在推翻魏忠贤的统治之后自然要严格限制宦官权力。特别是在边防地区设镇守太监监军这一项，虽说也有悠久歷史，但因为弊端太多早在嘉靖十八年（1529）已被下令撤销，以后近百年没有太监出京监军的，直到天启六年（1626）才又被魏忠贤重新恢復起来。对于重派太监镇守边防，连许多阉党骨干大臣都表示过极大异议，边防将帅更是极为不满。这是魏忠贤统治中最明显最不得人心的弊政，所以在刚刚粉碎魏忠贤集团之后就被革除。禁止内官擅自出京，则既是为了加强对太监们的纪律管理，也为防止太监们到各地去打抽丰、敲竹槓，惑乱视听。

不久以后，崇祯帝再次发佈谕旨，严格禁止朝官交接内侍，也是为了限制宦官利用身在内廷的有利位置与部分朝官通同作弊，干政弄权。

崇祯帝这几个限制内官的做法在当时受到普遍的好评，特别是文官官僚们，在不久前受尽了以魏忠贤为首的太监们的欺压排挤，此时很有些欢欣鼓舞，因而也从心底里赞扬新天子的这一明智之举。只是这种好心情他们没能保持多久，只过了三四年的时间，内监不准擅自离京的禁令已经成了一纸空文，朝臣与宦官之间通关节、受贿赂的事情层出不穷，监军的太监也再一次被派出去了，后来比魏忠贤时期还要多得多。那是后话。

在策御天下的最初时期，崇祯帝确实是一心一意要开创一个干坤倒转、万象更新的崭新局面。他年轻、气盛，尽管有点不知深浅，毕竟是朝气蓬勃，在调换朝臣、限制宦官等几项大政方面，都干得果断、利落，丝毫没有拖泥带水。与此同时，他也没有忘记继续深入清查清理魏忠贤在朝臣和内臣中留下来的大量残渣余孽。

崇祯帝当初还在他的“潜龙邸”的时候，就听说魏忠贤手下的爪牙有“五虎”、“五彪”、“十狗”、“十孩儿”、“四十孙”等名目。这些虎、彪、狗、儿们在魏忠贤专权时期作恶最多，名声最坏。工部尚书吴淳夫、左副都御史李夔龙等“五虎”都是身居高位的文官官僚，几年来专门为魏忠贤出谋划策，排挤异己，咬噬东林党人。“五彪”则均为武职，佔据着东厂和锦衣卫两大特务组织中5个最重要的位置。其中为首的是魏忠贤的“大儿”田尔耕，天启四年（1624）起出掌锦衣卫事，为了配合魏忠贤专权的需要，他广佈逻卒，屡兴大狱，双手沾满鲜血。“五彪”中的许显纯、崔应元等人分别主管锦衣卫北镇抚司和东厂的具体事务，杀人如麻，无恶不作。在魏忠贤的政治体制中，“五虎”、“五彪”这些人是直接出面做坏事、害好人的，因而特别遭人痛恨。

天启七年（1627）年底，崇祯帝就专门针对“五虎”、“五彪”等魏忠贤死党批旨：“五虎李夔龙等，依附权阉，希图升赏，仗势横行，罪恶累累；五彪田尔耕等，助纣为虐，草菅人命，屡兴冤狱，残害无辜。……虎、彪俱由法司依律拟罪，以伸国法。”

不久刑部根据皇帝定下的基调审判定案，吴淳夫、李夔龙等“五虎”均发往附近卫所充军终身，并且各自追缴脏银数千两；“五彪”田尔耕、许显纯被判处斩监候，就是死刑缓期执行，另外3人发往边远卫所充军。舆论对于这个判决仍然不满，以为判得太轻了。后来结合定立“逆案”对几个人进行了重新判决，“五虎”、“五彪”全部被判死刑，斩监候，而且其

中的“五彪”特务头子的死刑到秋后全部执行了。

逮捕审判“五虎”、“五彪”是清查处理魏忠贤党羽的开始。为了巩固自己的统治，崇祯帝不能不认真彻底地扫除魏忠贤在宫廷内外的各种残余势力，何况他自己对于审理案件又有一股特殊的兴趣。因此在崇祯元年（1628），清查阉党就成了朝廷中引人注目的一件大事。那些在魏忠贤时期名声太臭的如公然宣称魏忠贤功德不在孔子以下的监生陆万龄，在重大事件中表现特别突出的如首先上疏攻击张皇后的刘志选、樑梦环，等等，都被人纠弹而逮捕入狱。其他一些阉党官僚也一批批地被查出与魏忠贤有说不清楚的关系，纷纷罢官削籍。那些还没来得及被罢官、被逮捕的阉党分子这时候全都惶惶不可终日，大难临头各自飞，只能想方设法为自己开脱罪责，各逞高招，演出一幕幕滑稽戏。

阉党中觉悟最高的人，早在魏忠贤还如日中天的时候就为自己谋划后路了。靠弹劾东林党人起家的兵部尚书（管侍郎事）霍维华，在天启帝将死未死之际就故意同魏忠贤闹了一次小别扭，在一次封赏问题上顶撞了魏忠贤，遭到斥责。崇祯帝继位之后，他就把这当作政治资本，继续在朝中摇摇摆摆，把自己打扮成一个反对魏忠贤暴政的英雄。他一度还竭力申请到辽东主持军务，想依仗着边防的危急巩固自己的地位。直到崇祯元年（1628）夏天，这位政治手腕高明的阉党大僚才在一片攻击声中引咎辞职。

第一个在阉党内部造反，首攻崔呈秀的御史杨维垣，则是疯狗一般地乱咬乱攀，不停地“揭露”魏忠贤的死党，企图把水搅浑，掩护自己。他揭发朝中的大小官员，揭发宫中的大小太监，揭发魏家、客家的亲朋好友，最后连与魏忠贤接近的和尚也揭发出来。魏忠贤为人残忍却笃信佛陀，不但对京城内外的寺庙广为佈施，还特别用10万两银子买下一座庙宇供自己礼拜之用。这座私人寺庙的住持浴光和尚同魏忠贤的交往当然

密切，直到魏忠贤失势，一般人唯恐避之不急，浴光还特地请他吃过斋饭。杨维垣为了巴结魏忠贤，同浴光也有很深的交往，但为了表示自己同魏忠贤一党界限分明，只好拿浴光作牺牲品。他听说浴光早就离开了京城，估计朝廷反正也抓不到这个和尚，不用担心浴光会用过去的一些秘密交往反咬自己一口。谁知道杨维垣的揭发材料刚刚报上去，浴光和尚竟自行到京城来投案自首了，这真叫杨维垣吃惊不小。好在浴光相当磊落，只承认自己与魏忠贤交情密切，没有牵连别人，杨维垣才算过了难关。但最后，杨维垣同样没有逃过挖地三尺式的大清查，以魏忠贤死党的罪名被罢官，遣戍充军。

宫廷里的太监们同魏忠贤关系更密切，在清查中也更加心惊胆战。司礼监秉笔兼巾帽局掌印太监李永贞，在万历年间因为触怒皇帝被关押了18年，关押期间他读了不少书，知识比较广博，能写诗作文，为人又机敏善辩，因而在投入魏忠贤门下之后成为他的重要智囊。此人在政治上也算眼明手快，天启帝刚死，他就感到了前途不妙，告病回家休养去了。在京东通州的家中，他把自己住的小院用砖砌死，“闭关”不出，以示不再与世人交往。直到魏忠贤也被迫离职了，他才出墙见人，还千方百计地託门路拉关系，企图摆脱与魏忠贤的干系。不久魏、客都死于非命，他感到形势不妙，收拾行李秘密逃亡。但正巧一桩引起崇祯帝关注的大案牵连到他，想要销声匿迹已经不可能，没过多久他就被缉拿归案。

李永贞的案子涉及天启六年（1626）由魏忠贤一伙制造的一起重大冤案，所谓“七君子案”。那件冤案的起点是苏州织造太监李实对于原苏州巡抚周起元的诬陷，说他勾结党人，贪赃纳贿，讪谤朝政。一批东林党人因此被牵连，周起元和原任左都御史高攀龙、原任左谕德缪昌期等7人被捕，高攀龙在受逮前投池自尽，另外6人则全部惨死在锦衣卫的北镇抚司狱中。在“七君子案”中被迫害致死的7个人都是东林中赫赫有名

的人物，其中高攀龙更是东林书院的创始人之一，在社会上和官场上都有极大的影响。由于这个案件影响太大，所以李实及其他有关人员都被抓获归案，听候处理。根据崇祯帝的旨意，对李实等人进行了由全体大臣和监察官员共同参加的“九卿科道会审”，因为案情本来很清楚，刑部很快按会审的结果作出了判决：李实与在宫中参预构陷“七君子”的太监李永贞和刘若愚均判处死刑，决不待时。

案件已经了结了，皇帝却来节外生枝。有一天在召对的时候，崇祯帝突然问代理部务的刑部侍郎丁启浚：“李实的案子，到底有没有疑惑之处，有没有暧昧不清的地方？”丁启浚一时摸不着头脑，只得说：“此案是奉旨由九卿科道会审的，刑部据实回奏。”皇帝又问：“李实为什么要决不待时？”丁启浚说：“李实和李永贞等人构杀七条人命，没有动刑就自己招供了。”皇帝却说：“哪有不动刑就招供的道理！”又问当日主持会审的吏部尚书王永光。王永光回答：“李实一开始不承认，后来用了刑才招供的。”崇祯帝这才露出自己的意图说：“重刑之下，什么口供得不到呢？李实劾周起元的本章，其实是魏忠贤向他要的盖过印信的空白本，由李永贞填写的，现在怎么能够就这样糊里糊涂地定罪？”朝臣们不愿同皇帝顶撞，只好听凭皇帝“圣裁”。而皇帝为了证明自己确实有道理，还专门把当年李实的原疏带了来，让众臣亲自看一看，“是朱在墨上，还是墨在朱上？”大家看了，的确墨在朱上，也就是先盖过印之后才写上字的。崇祯帝于是宣佈自己的决定：“李永贞决不待时，刘若愚次一等，李实又次一等。”

其实，李实为了表示对魏忠贤的忠心而甘愿把空白本章交出去，由他随意害人，已经是罪不容诛。何况从那劾疏的内容上看，所说的大多是苏州发生的事，没有李实的配合，京城中的李永贞怎么会编得出来呢？因而李实被判死刑完全是罪有应得，当时的社会舆论和参加会审的高级官

僚也都这样看。崇祯帝却偏要为他翻案，并不是同这位李实有什么特殊的关系，而是因为他自以为从案情中看出了破绽。当他仔细查看李实的劾疏并且发现了墨在朱上的秘密之后，一定为自己的精明感动得不得了。他又无法抑制向群臣乃至天下表白自己的无比精明，于是只能在朝对中提出问题，并且亲自为李实翻案。

这样一闹，皇帝的那点小精明真是显示出来了，但并没有招来一阵欢呶喝彩声。几位主持此事的大臣对于这个年纪轻轻的小皇帝深刻于小节而在大处却不明白，很有些失望，甚至有些悻悻然的感觉。丁启浚在回答皇帝问话的时候说："严惩或是宽赦本当由朝廷做主，听凭圣上裁夺。"就是带着情绪的。这种情绪，聪明的崇祯帝当然也听出来了。他对于面前这种无人喝彩的局面很失望，对朝臣的阴阳怪气极其不满。这失望与不满后来是日益加剧了。

在崇祯帝自以为是的精明表演中，唯一的获利者是这一案件的主犯李实。他因着皇帝减等再减等的判定，被改判为戍，竟保住了性命，后再次轻判，改成"革去冠戴，为民当差"，什么事情都没有了。而那个倒霉的李永贞则在崇祯元年（1628）六月被判处斩首，决不待时，七月就被处决了。在魏忠贤宫廷内外的大小党羽中，李永贞是最早被从重从快处理掉的。

如果说把原先的政治领导人打成罪魁元凶是改朝换代的基本标志，那么为前一时期的"冤狱"平反则可以算作改朝换代的必要装饰。古往今来的专制社会中，新统治者不论真是要改弦更张还是仅仅想给公众一个耳目一新的感觉，在他开出的政治菜单中都少不了"平冤狱"一项。崇祯帝当然也不能例外。

就在魏忠贤等人死后不久，他首先指示刑部和各地方，停止对罹难东林

诸臣的追赃，释放其家属。此前魏忠贤一伙制造了“六君子案”、“七君子案”等一大批冤案，不但将案中的诸人全部残害在狱中，而且在诸君子死后仍不放过其家属，要求按限期追缴数额巨大的所谓“赃银”。六君子之首的杨涟家境贫寒，靠乡人资助交纳“赃银”，家业因而破败，母亲、妻子只能住在谯楼上，两个儿子靠乞食赡养祖母和母亲。另一位被迫害致死的着名君子左光斗家的情况更惨，为了追赃有14个人被地方官府逮繫，兄长左光霁因而死在狱中，母亲悲极而亡，整个家族为之而破产。崇祯帝决定停止对这些家庭追赃，真是救人于急难，在当时不但得到那些被难家庭的感恩戴德，也受到广大公众的一致好评。

在这以后，为东林诸人平反的啂声日渐高涨，崇祯帝于是向吏部提出：“魏忠贤、崔呈秀已经受到上天的惩罚，臣民的义愤稍稍有所缓解，但诏狱中的冤魂还没有得到解脱，冤情还没有得到昭雪。让有关部门官员将以前被迫害的诸臣，从公酌议。”要求提出名单，对已经被非法禁毙者酌情追赠名号或荫升子弟，被削籍夺职的酌情復官，仍在监禁中的酌情开释。在皇帝的亲自督促下，刑部将已被判处死刑而未处决的方震孺、惠世扬、李柱明、耿如杞等人全部释放，并准復原官；吏部则呈报了几年来被非法禁毙，应予赠恤的杨涟等人的名单。

平冤狱是一件得人心的事情，但也有人掣肘。吏部列报死事诸臣名单是拖了几个月才办好的，刑部则在最初仅改方震孺、惠世扬等人的死刑为流放戍边，留下一个巨大的尾巴，后来崇祯帝严令再拟，才算彻底平反。这里面实际上又涉及多年以来一直连绵不断的党争问题。几年来在魏忠贤政府中共事的，即使不是魏忠贤的死党，多数也是长期站在东林党人对立方面的“邪党”人物，或是靠着攻击东林而飞黄腾达起来的。魏忠贤倒臺以后，这些人的势力并没有一下子全部土崩瓦解，他们由于歷史的原因还佔据着许多要害部门，也绝不甘心让东林党人一下子捲土重

来，剥夺自己的利益。在崇祯初年，这些人的主要策略是想保持前朝对于东林“乱臣贼子”的定性，甚至把东林党人同魏忠贤集团说成是性质相同的两个罪恶团伙。

在好几个月的时间里，朝廷中流行的话语方式是万事不离对于魏忠贤的批判，而在批判魏忠贤的同时又忘不了捎带上对东林党人的批判。有人甚至于在理论上制造东林党人同魏忠贤集团的联繫，要说明东林党人与魏忠贤集团表面虽然互相对立，实质上却是一路货色。崇祯元年（1628）初，光禄寺卿阮大鋮上了一通《合算七年通内神奸疏》，就把天启帝在位7年的歷史全部说成是奸党勾通大太监共同蒙君误国的歷史。按阮大鋮的说法，天启四年（1624）之后，乱政的是魏忠贤，而在外朝羽翼魏忠贤的是崔呈秀一伙；天启四年以前，乱政的则是大太监王安，在外朝羽翼王安的就是东林党人。他在疏中还说，当初王安教唆东林党人入宫吵闹，造成移宫事件，那就是为后来魏忠贤勾结外臣，迫害嫔妃开了先河；当年贾继春由于弹劾王安而被东林党人削籍，那同后来魏忠贤打击言官封锁言路没有什么两样；而东林党人排挤异己的恶劣作风实在是直接影响到魏忠贤集团干尽坏事，包括陷害皇亲，动摇国母一类罪大恶极的坏事。

但尽管反对派的实力仍然巨大，反对东林的叫嚣依然喧天，东林党人却还是随着魏忠贤的垮臺悄悄还阳了。这是政局突变带来的必然结果，在朝诸臣，甚至皇帝本人都没有办法改变这种情况。那些在魏忠贤时期被罢官惩处的人在平反之后重新任职，有少数人还得到提升。这批人即使本来不属于东林阵营的，由于长期与东林党人同甘苦共患难，现在也以东林自居了。一些资格很老，原本就是东林中坚的人物开始佔据朝廷的重要岗位。东林名臣曹于汴在五月被任命为主管监察工作的都察院左都御史。六月，在天启五年（1625）被阉党罢职削籍的原礼部侍郎何如宠

升任为礼部尚书。更重要的是天下舆论都普遍倒向了东林一边，人们把对魏忠贤和阉党的痛恨与对东林的敬重连接在一起，当成一个问题的两个方面。南北两京、四方各省的民众都把东林党人看作精忠报国的赤诚君子，凡是有可能挤进东林队伍的都在自称是东林一员。

在这种形势下，东林党人当然不能再听凭对立势力对自己肆意攻击，他们也开始还手。最早代表东林党人发出声音的是一个官职不高地位又不重要的翰林院编修倪元璐，他对当时言论中的奇怪现象表示不能理解。他说：现在攻击崔呈秀、魏忠贤的人，一定要与东林并称为“邪党”。如果东林是邪党，那么应该怎样称呼崔、魏呢？如果承认崔、魏是邪党，那么一直在攻击崔呈秀、魏忠贤，受到他们打击迫害的怎么能够也叫作邪党呢？从这种逻辑冲突入手，倪元璐对歷史上的“三案”和“六君子案”、“七君子案”等进行了分析，认为东林党人可能确有偏执己见和对阵营以外的人士过于苛刻的缺点，但在忠君爱民、礼义廉耻这些大节方面却是无可厚非的。而那些至今还在称东林为邪党的人们，却是在魏忠贤时期跟着唱过赞歌干过坏事的，恐怕不能完全用“无可奈何”、“迫不得已”几个字就文饰掉。倪元璐的奏疏一时引起了很热闹的争论，朝中双方各执己见。

崇祯帝对于这场争论有他独特的看法。一方面，他也承认东林与阉党确实不能同日而语，对于东林党人在抗魏斗争中表现出的情操他甚为尊重。正因为这样，他才不顾阻力，坚持为东林的受害者彻底平了反，到崇祯元年（1628）夏，“六君子”、“七君子”等案中绝大多数受害者都完全恢復了名誉，得到了谥号。但在另一方面，当年在“移宫”事件中的亲身经歷也使他对于东林不无成见，对于东林的偏执和党私也颇怀戒心。他对于朝臣各分门户，结党营私而全不以君国为念一直是深恶痛绝的，因而曾反覆告诫群臣，“分门别户，绝非天下大治的标志”，要求臣子

们“化异为同”，“天下为公”。但党争有着悠久的歷史，不是皇帝几个指示就能制止住的。崇祯帝对此还是比较清醒的，因此他一直力图通过自己的政治手腕来遏制党争，保持一种均衡的政治格局。他在给东林党人翻案平反的时候，在任用东林的方面却做得很慎重，没有一风吹地大规模起用东林人士，以避免出现天启初年那种东林盈朝的局面。相比之下，他更愿意任用那些在党争中处于中间地带的人。这一点正是他在日后屡屡同东林党人发生冲突的重要原因。

不论崇祯帝对于东林党人有些什么样的看法，对于前朝的一些大是大非问题他却不能不作出最终判决。因为这既关涉到对前朝歷史的总结，关涉到对当前政治局势的定性，也关涉到他本人在公众中的形象是否英明、是否伟大。在东林党是正还是邪的争论中无可避免地再次提出了“三案”的问题，结果大体上同天启初年和天启四五年间的情况一样，还是没有争论出一个有说服力的头绪来。但不同于前两次，这次争“三案”没有出现以往的一边倒现象，既没有像天启初年那样让东林党人佔尽风头，也没有像天启中年那样把东林党人弄得狼狈不堪。

首先重新提起“三案”问题的还是那个倪元璐，但是他的谈论要点却不在于“三案”本身，而在于当年由天启帝钦定的那部《三朝要典》。倪元璐认为，对于“三案”的争议是廷臣之间不同观点的冲突，尽管是水火不能相容，终究大家都是为了天子的利益和国家的利益，因而很难说哪一派是出于公心，哪一派是出于私心。但《三朝要典》这部书则不然，那是崔呈秀、魏忠贤之流为了打击正人君子，为自己歌功颂德而盗用先帝名义炮制的“私书”。如今崔、魏已遭惩处，他们的私书不应保留世上，应当焚燬原书版和天下一切现存该书。

倪元璐的这个建议立刻遭到了一批当年参加编撰《三朝要典》工作或是积极支持过《三朝要典》编纂的朝臣们的激烈反对，但他这个分清“三

案”与《三朝要典》的不同性质的提法很得崇祯帝的赏识。崇祯帝自己对“三案”都有与东林党人截然不同的看法，他在后来谈起“三案”的时候曾经说过：这三件事东林说得不对。当年皇考（光宗）要吃红丸，方从哲是极力劝阻的，当时朕就在身边，怎么能说是方从哲主使呢？至于梃击，那张差确实是个疯子。移宫的事情，都是王安挑拨，完全不合情理。但《三朝要典》却从另一个极端颠倒了是非，成了阉党登臺、魏忠贤专政的舆论工具。而按照倪元璐的提议，则正好做到既澄清了前朝的大是大非，又不至于让东林党人过于得意忘形起来。

因此他迅速批准了倪元璐的奏请，通令全国把现存《三朝要典》的全部原书和几种书版都彻底焚燬，严禁官府和私人收藏阅读。在刚刚发佈这个诏旨的时候，翰林院有个侍讲孙之獬跑到内阁去大哭了一通，表示抗议，併力陈毁书的种种不应该，用语相当激烈，而后又告病请求回家调养，也是一种消极的抵抗。以崇祯帝的性情，对这种敢于公然顶撞他决定的人常常会下手无情，但这一次却只是一笑置之，没有多加理会。这也许正说明，他本来也没把这个专论“三案”的《三朝要典》看得太重。

前朝的大是大非基本上算是分清了，但东林党人不能满足，天下的民众也总觉得多年来胸中的恶气还没有出够。自崇祯元年（1628）中期起，一些御史们已经开始提出，要对魏忠贤和他的亲信党羽进行一次统一的定案处理，本着不放过一个阉党的原则，把他们全体集中在一个大案中，就叫作“逆案”，意思是说魏忠贤一伙欺君误国，甚至有大逆谋反的打算。魏忠贤从来也没有想过要谋反，因而“逆案”这个名称并不太合适。但崇祯帝要证明自己的顺天命、应民心，又十分有必要定立一个“逆案”，永载史册，使当初的政敌永无翻案之期。再加上他一直都有一种热爱办案的冲动，对定“逆案”的事情就更加积极。由于魏忠贤集团多年来误国害民，积怨极深，这个倡议也得到了多方面的响应。

这年十二月，前任内阁大学士韩爌应召还京出任内阁首辅。这位韩爌是受过阉党残酷迫害的，崇祯帝以为他对阉党的斗争必然坚决，因而在年底正式降旨由内阁等部门提出“逆案”名单。韩爌却是老成厚道的人，不愿给朝廷树立太广泛的怨恨，因此第一次仅仅提名四五十人，大体都是已经受到制裁的臭名昭着的阉党分子。崇祯帝对这种宽纵的处理办法大不以为然。崇祯二年（1629）正月二十四日，他在文华殿召见内阁大学士韩爌、李标、钱龙锡，吏部尚书王永光，都察院左都御史曹于汴，命他们再广为蒐罗，而且确定了立案的宗旨：“对那些首先对魏忠贤无耻谄谀，倾心拥戴，以及屡次颂美，津津不置者，还有虽然没有立祠称颂却暗地为他出谋划策的，都要依据法律惩处，以服天下人之心。”

内阁等部门按照皇帝的意图又补入数十人，但仍然没有让崇祯帝感到过瘾。两天以后，崇祯帝再次召对几位大臣，拿出了一包袱魏忠贤时期群臣上疏的原稿，都是颂扬魏忠贤或为之出谋划策的，让阁臣一一按入“逆案”中。韩爌等人推说，“臣等职责是票拟，依法定刑不是我们的专长。”王永光也表示，“吏部只擅长考察任命官员，不熟悉刑名。”都是以消极的方式抵制皇帝的决定。但崇祯帝一旦下定决心是不会回头的，既然内阁、吏部声称不懂刑名法律，他就命刑部等司法部门也参加制定“逆案”，还规定“全部要从重处罚，官员最轻的也要削职为民。”大臣们没有办法，只得从命。直到“逆案”最后确定之前，崇祯帝还亲自指定在逆案中加入了包括原大学士张瑞图、来宗道在内的69个人。

“逆案”是在崇祯二年（1629）三月十九日正式确定的，案中共开列魏忠贤等255人，分为8大类。魏忠贤、客氏为首逆，凌迟处死。“首逆同谋”6人，除崔呈秀外，魏良卿，侯国兴是客、魏亲属，李朝钦等3人均为魏忠贤的亲随太监，斩决不待时。“交结近侍”19人，主要有“五虎”、“五彪”等人，斩秋后处决。以上判处死刑的共27人。“交结近侍次

等”11人，都判处充军，均为阉党骨干。第五类“逆孽军犯”28人，全是已经充军的客、魏家属和贴身亲随。第六类“交结近侍又次等”129人，判处徒刑3年，“输赎为民”，即可以交钱赎罪，这部分全是文臣。第七类“谄附拥戴”16人，全是太监，革去冠带为民。第八类“照考察不谨例，冠带闲住”，就是虽然革职，但保留着原来的品级荣誉，共44人。这个“逆案”是由皇帝钦定的，立即颁佈天下，案中人员都被处置。

这个“逆案”涉及面广大，200多人中有文臣有武将，有京职有外任，其中位高爵显者不乏其人，仅文武大员官居一品的就有35人，（明代文官中职位最高的吏部尚书也只有正二品，要进入一品，必须靠因功或因资深加宫保衔。）文臣中任尚书或加尚书衔的有44人，入阁担任过大学士的有8人，其他如侍郎、京卿、总督、巡抚等高级大臣数量更多。对“逆案”人员的处理也比较重，仅处死刑的就接近30人，其中又多为重臣，这种情况除了明初朱元璋实行政治恐怖的时期以及“靖难”、“夺门”等非常时期外，在明代是极少见的。

“逆案”定立，算是崇祯朝对于前朝歷史所做的一个总结，也标志着对魏忠贤专权进行清算的最后终结。由于魏忠贤集团干了那么多坏事，害了那么多好人，一般官绅民众对于这个“逆案”是拍手称快的。但在专制的政治体制下，怕就怕存在着一个事关重大又牵涉极广的“案”。有“案”就会有坚持与翻案之争，不论是明显的还是潜在的，就会造成绵绵不断的政治纠纷与政治动乱，还会给下一轮政治斗争中的野心家提供无限的契机。“逆案”的情况也不例外，在整个崇祯时期，总有一个“逆案”的阴影笼罩着政坛，而到崇祯亡国之后，南明的小朝廷还真把“逆案”翻过来了，只是翻过来也没有什么意义了。明末遗民论及此事，说“这是何等大事，而草草上报批准，致使被处理者屡思翻案，持局者日费提防，纠缠不已。南京政权再建，‘逆案’翻而国家亡，宗社都成为废墟”。还是很有

道理的。可见，崇祯帝用搞运动的方式，整批地处理前朝政治遗留问题，实际给自己的政治格局中增添了新的无穷隐患，远不如对于阉党问题就事论事一件一件地慎重个案处理为好。

崇祯帝大刀阔斧地迅速办完了“逆案”，大概是想赶快摆脱魏忠贤给这个国家留下的阴影，赶快开闢一番新的天地。但魏忠贤通过几年的统治而给他留下来的那一份家底，却是他无法摆脱的一份政治遗产。在崇祯元年（1628）三月的一天，京城附近的天空一片血红，有些惯会大言的术士们传说，这标志着将有大旱，而且是战争的预兆。崇祯帝也听到了这些说法，当时并不以为然。但在做了一年多天子，对于朝廷的一应政务基本上熟悉了之后，他回想起那个所谓“预兆”，又不能不忧心忡忡起来。

此时，他对于这个帝国所面临的艰难局面已经多少有了一点了解。他也逐渐明白要想创建一番丰功伟业，让国家摆脱困境，重新兴旺起来，实在是极其困难的。在他面前，至少有四个巨大的难题。

一是边患，满族后金政权自万历年间崛起于东北，其军事力量直逼山海关，正在给明帝国的边防造成极大威胁。

二是民飢，魏忠贤集团的黑暗统治再加上连年的水旱灾害使得全国各地相继出现大饥馑，人民大量死亡，没有死的或是大批流亡，或是揭竿而起，在崇祯元年（1628），已经有陕西白水、府谷、宜川、安塞等县农民纷纷起义，陷城杀吏，事态正在不断扩大。

三是财匮，防边需要钱、平乱需要钱、赈灾需要钱、庞大的政权机构和皇家开支更需要钱，但阉党政府给崇祯帝留下来的财政基础却是挖空了的国家府库和亏空赤字。

四是朋党，自万历时期延续下来的党争不仅没有消除，反而有愈演愈烈之势，朋党交闹于朝不但常常耽误国家大政，有时就连正常的政务都要受到影响，弄得人心惶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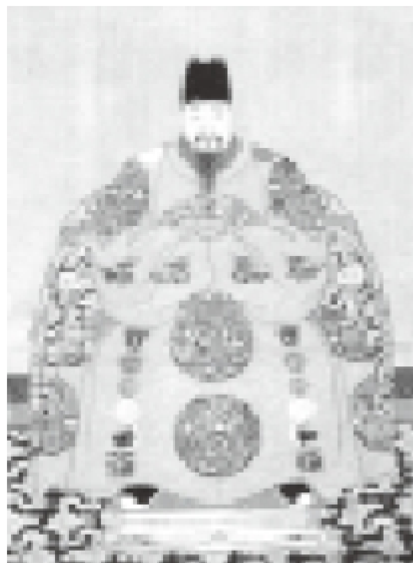
四大难题，没有一个是容易解决的。再加上官僚腐败、法纪松弛、道德沦丧、世风不古，要开创一箇中兴局面真是千难万难。

但是他决心要努力奋斗。

卷贰 守业艰难百事多

一 会推风波

崇祯帝自幼读过不少歷史着作，对于《资治通鑑》、《贞观政要》、《帝鑑图说》这一类帝王必修的歷史读物相当熟悉，登上皇位后也仍然把这些书籍作为日常读物和参考资料排列在案头和隔架上。对于歷史上那些君圣臣贤密切合作，共同创造丰功伟业的盛世，他极为羡慕，也极想在自己的统治时期再现一次那样的盛世。按照他的自我判断，君圣这个条件已经基本具备，自己在道德品质和政治素质两个方面，同歷代君主相比，即使不算是最上乘，起码也是上乘的。他平时对朝臣讲话，只说要效法尧舜，很少把后来的着名皇帝们放在眼里。有一次臣子把他比作汉文帝，本来是拍马屁的，谁知弄得这位自以为是的皇帝很不高兴。他认为汉文帝顶多算是个中上等的皇帝，把自己比成汉文帝实在是太贬低了。还有一次辅臣提到唐太宗，崇祯帝说：“唐太宗扫荡群雄，我自愧没有那样的才能；但要说到闺门无序，家法败坏，我还羞于与他相提并论呢。”前面半句话是假装客套，后面半句才是他的真心话，对于唐宗、宋祖一类人物，他确实没有太放在眼里。



崇祯帝

何况，他还在不断地努力继续提高自己。自天启七年（1627）十月起，他开始参加“日讲”，由内阁和翰林学士为他朗读和讲解“四书”、“五经”和《通鑑》、《祖训》等经史着作。这是一个皇帝在理论上应该严格遵守的天天读政治学习制度，除了节假日、大典礼和逢三、六、九的常朝仪式之外，每天都要进行。但自从100多年前的正德皇帝时起，天子们或是懒惰，或是贪玩，很少有能坚持参加日讲的，有些皇帝根本就把这种制度废除了。只有崇祯帝在位的17年，规规矩矩地参加了17年的日讲，寒暑不辍。日讲之外还有春秋两季每月3次的“经筵”，那是仪式性更强、规模更大的理论学习活动，崇祯帝同样坚持不懈。他是要通过这些常年的学习，增进自己的修养，砥砺自己的情操，提高自己的统治水平，使自己真正成为一个唐尧、虞舜那样的君主。

但盛世所需要的贤臣却总也找不到。他发现，不论是靠天命选出来的新内阁班子还是按资歷德才循例推升的部院大臣，实际能力都非常不理想。在他看来，那些翰林出身号称才学优长又有几十年从政经验的大学

士们，那些自诩老谋深算精通政务的卿贰大臣们，竟然是一批极其平庸无能的糊涂虫。

朝臣本身似乎也不争气。崇祯元年（1628）的上半年，首席内阁大学士先后换了四个人，施凤来、李国普、来宗道和周道登，始终是敷衍了事、暮气沉沉。崇祯帝精力充沛，又特别勤快，几乎每天都要召集内阁成员讨论国务，各位大学士们也就辛辛苦苦地每天进宫、叩拜、承旨。但这些老官僚大都老滑有余，干练不足，召对的时候只会唯唯诺诺，很少能提出什么建设性的意见。有几次，崇祯帝在极其失望的情况下只能冷笑着对几位阁员说："难道这就叫作召对吗？"几位老先生仍然是唯唯而已。就连阁臣们专司的票拟也不能让他满意，错字错句时有发生，内容方面更是因循守旧，等因奉此，毫无建树，毫无新意。

还有更让崇祯帝生气的。那位一度成为首辅的周道登，表面看来像个老学究，但反应之迟钝让人震惊。有一回皇帝问他，为什么说宰相要用读书人。他一时不知该怎么回答，就说，这个问题臣要回阁中查一查书才能确切回覆。崇祯帝开始听了很不高兴，后来大概觉得如此草包宰相实在少见，不由又笑了起来，又问：近来本章中总是提到"情面"，这个"情面"是什么意思呢？周道登说："'情面'者，'面情'之谓也。"弄得左右人等都憋不住要笑出声来了。

官僚昏庸已属可恨，而且还普遍贪污受贿，毫无廉洁可言，这更让崇祯帝感到无法容忍。但造成贪贿成风这种情况的原因却相当复杂，既有风气方面的因素，也有制度方面的因素。

明代官僚俸禄是相当低的，一个普通知县月俸只有老米7石5斗，按普通市价合银不到10两。即使官至最高级别的尚书（正二品），一月的俸禄也不过61石米。但一个官员的开支却很大，除了养家餬口之外，还要有

大量的上下应酬，要雇用幕僚、跟班甚至轿伕，要在各种场合摆出应有的排场，更不要说奢侈挥霍以及在家乡置办田地房产了。可以说，一个不贪污不受贿又没有大量家底资产的官僚，根本就活不下去。明朝最着名的清廉官僚海瑞据说从不贪污受贿（其实很可疑，因为官僚之间以馈赠方式的变相贿赂极其盛行，而且通常都是廉洁官员赖以生存的基本收入。）因此为他母亲做大寿的时候摆宴请客只能买2斤肉了事。而他在晚年復出任正二品的南京右都御史的时候，不得不变卖家产才置备齐了必要的冠带朝服。但这至少说明他还是有一点家产的，如果是真正的穷人是没有办法赔钱当清官的。

既然朝廷的制度实际等于默许官僚贪污受贿，甚至是要求官僚贪污受贿（以减少国家财政负担），因而200多年来官场的贪污受贿大有制度化的趋势，一个州、县每年在上交国家正税之外多收多少钱粮，一个下级地方官每年应向上司分几次进献多少馈赠，办理某一事务要送有关部门多少钱，都有惯例数字。一般来讲，一个官员不在惯例以外蒐括，不收受惯例以外的钱财就算极清廉了，所谓“一钱不取”只是一种欺人之谈而已。所谓应酬也是整个官僚集团集体分肥的一种方式。京官比较“清贫”，因而进京的地方官照例要对在京的同乡、同年（同一年科举得中者）、同门（同一主考官门下得中者）、亲友馈赠一番；京城的高级官僚还有义务在三大节等重大节日向低级官员中的同乡、门生、故旧例行馈赠。刚刚释褐的进士因为还没来得及捞钱，通常都要在回籍的路上（甚至绕道）去拜访有乡谊或是门谊的地方官，实际上是去讨要馈赠的，叫作“打抽丰”，地方官员不能拒绝。从某种意义上讲，这种以亲朋故旧、乡谊、门谊关系为基础的相互馈赠，正是明末朋党之风盛行的经济原因。当然，所有这些“年例”、“事例”、“馈赠”最终都要取之于民。

对于绝大多数官僚来说，贪污受贿还不仅仅是为了维持起码的正常开

支，而是要利用手中的权力大发横财。制度化的贪污受贿为常例以外的腐败大开方便之门，因为从来没有成文规定，“合理”的贪污受贿和“不合理”的贪污受贿根本没有明确界限。如果严格依照法律，“合理”的常例也全是违法，按照洪武时候定下的律条，“入人十贯”（大约相当于十两白银）就应判绞刑；但在举国上下贿赂公行的情况下，就是再超出常格，官场上的人们也宁愿视而不见。这就使得利慾薰心者有了大得其手的机会，特别是到了天启、崇祯时期，严重的政治混乱造成了大部分官员都是醉生梦死，能捞就捞，贪贿之风更是到了前所未有的程度。

刚刚即位不久的崇祯帝却不能理解这些深层次的原因。他只是按照皇帝自家的理论和儒家的道德规范来要求群臣，还多次向朝臣宣讲“文臣不爱钱”的古训。崇祯元年（1628）七月，他的苦口婆心终于得到了一点反响，户科给事中韩一良上疏专门讨论“文臣不爱钱”的问题。他在疏中说：当今世上，哪里不要用钱？哪个官又不爱钱？做官是花钱得来的，怎么能不收回本息？如今说到害民，都归咎于知府、知县的不廉洁，但知府、知县怎么能廉洁呢！他们的俸薪有多少，上司要想方设法勒索，过往官绅要打抽丰，进京朝觐一次至少要花三四千两，这些钱不能从天而降，他们哪里能廉洁？州、县官员进京朝觐，京城的御史、给事们号称“开市”，臣两月以来辞谢的赠金就有500两。臣淡于交际，尚且如此，其他人可以推测。他认为，只有严惩少数罪大恶极的贪污受贿者，让诸臣把钱当成祸水，才可以倡导出廉洁之风。

崇祯帝对韩一良所奏非常满意，以为深得反贪倡廉的要领。他为这份奏疏专门召集了一次御前会议，命韩一良在大臣面前高声朗读本章。读过之后，又让阁臣们传阅。他觉得这个韩一良很有点他所期望的良臣的味道，决定要破格提拔，当场就宣佈：“韩一良所奏，大破情面，忠鲠可嘉，应当破格擢用，可以加升为右佥都御史。”吏部尚书王永光一面承

旨，一面却不阴不阳地提了一个建议：“韩一良所奏一定是有所指的，请皇上命他挑出最严重的事例奏明，以便重处，惩戒贪官。”这明明是在将韩一良一军：皇帝说你能大破情面，现在倒要看看你怎么个破法。

韩一良果然汗流浃背了。在朝中做官，除了深仇大恨故意要攻击的，谁也不愿意无事生非，为自己树敌。他只好先支吾着应付说，现在国家不太平，不敢深言，至于纳贿等事，疏中已经说了是得自风闻。

崇祯帝的脸色晴转多云，很不客气地说：“难道一个人也不知道，就写了这个奏本吗？限五日奏明！”

韩一良回去以后绞尽脑汁，纠弹了周应秋、阎鸣泰等几个已经被打倒的着名阉党分子，拿着几只死老虎去交差。崇祯帝当然清楚他是在搪塞，再次召对，再一次让他朗读自己的大作。韩一良早就没有了第一次朗读时的神气。在读到拒收礼金500两的时候，崇祯帝厉声问：这500两是谁送的？韩一良推说家里有交际簿，但现在不记得了。崇祯帝反覆追问，韩一良只是一味烟涂。最后，怒气不息的崇祯帝面谕阁臣和韩一良本人说：“韩一良前后矛盾，显然是心肠大变，都御史岂是轻易就做得的？本当捉拿审问，姑念他是言官，先饶过这遭。”

韩一良带着一身冷汗离开了宫廷，都御史虽然没有做成，能逃脱困境还是值得庆幸。这以后，他再也不敢冒尖去当什么破除情面、反贪倡廉的英雄了。

韩一良事件使崇祯帝对朝臣更加轻视，面对国难当头的挑战，他只好一个人勇敢地承担起全部责任，实行最彻底的亲政。在明代诸帝中，像他这样朝干夕惕，勤于政务的，实在是凤毛麟角。

在君主专制的政治体制中，君主在法理上绝对掌握着全部国家权力，这

种至高无上的权力也决定了君主具有不同寻常的责任和义务。在中国古代，一个真正称职的皇帝应该遵守一系列呆板严刻的皇帝守则（实际上很少有皇帝去遵守那些守则），而且应该是勤政的模范。从理论上讲，国家政务的各个方面，事无鉅细，都应当由皇帝亲自过问，亲自处理。但仅以明代而言，除了开国的朱元璋以及靠“靖难”夺得政权的永乐帝之外，很少有几个对于政务真正感兴趣的皇帝。在这些对于自己的责任不那么感兴趣的皇帝中，有的干脆埋头深宫或沉溺于游乐，很少理或者根本不理朝政；有的则是勉强支应，进行一些象徵性的朝事活动。为了适应这种情况，明代的政治运作中就逐渐形成了由内阁拟旨和由司礼监批朱等一套由臣僕为皇帝代劳的制度。据说这是为了贯彻自古圣贤们制定的“君逸臣劳”的原则。有了这套切实可行的制度，懒汉皇帝们就更能够偷懒而不至于给国家机器的运行带来什么损失，因而大多数明代皇帝也就更是懒上加懒。

在一般情况下，朝臣们表面上总是希望皇帝能够亲政、勤政，经常请求天子认真批阅本章，定期召见群臣。但如果皇帝真的勤起政来，真的对于各种政务关心备至，臣子们也会非常不习惯，甚至会产生出极大的反抗情绪。因为皇帝一旦亲自理政，势必会把多年来已经分划给朝臣的那一部分君主权力又重新拿回来。崇祯年间的朝臣面临的正是这样一种局面。

崇祯帝的勤于政务可以说是出于一种天性。他满怀兴趣地埋头于枯燥繁复的政务，热衷于阅读和批改各类公文，而且对于调查处理那些头绪不清、疑点较多的案件有一种特殊的爱好。这种热爱政务的性格再加上自负、多疑等其他一些性格特点，使得他成为自洪武、永乐以来对政务操劳最多，关心最切，因而也最让朝臣受不了的一位皇帝。

崇祯帝的勤政主要表现在认真批阅本章和召对朝臣议政两个方面。他对

于中央各部门和各地方送进宫来的题本、奏本非常重视，对于一切本章和内阁的票拟都十分认真地仔细阅读，还时不时地对票拟提出修改意见，要内阁重拟。本来多年的定例，内阁的票拟虽然只是一种并没有法律效力的建议，却是极受朝廷尊重的，除了在极个别的情况下，皇帝通常很少把内阁的票拟驳回重拟。但崇祯帝却更看重自己所拥有的理论权力，只要觉得票拟不妥，立刻就发回内阁。于是，在崇祯年间又形成了一种新传统，票拟被驳回成了常情，一些内阁大学士在拟旨的时候干脆预先留下被驳回的余地，等着让皇帝驳。这种情况，是明代政治运作方式的一大变化。

由于留心本章，崇祯帝发现他的朝廷公文制度中有一个大弊端，就是本章虚浮枝蔓，常常下笔千言离题万里，结果是既耽误了自己的宝贵时间，又使得真正的要点淹没在大量的虚话套话里。其实这种情况也是古已有之。当年朱元璋阅读一个刑部主事茹太素上的万言书，读了6370字，仍不知其所云，因而大发脾气，叫人把茹太素打了一顿板子。次日再读，至16500字后，才讲到五条建议，发现颇为可用。太祖皇帝为此发佈了一个特别文告，讲述了此事的情况，并且提出：“若官民有言者，许陈实事，不许繁文。”太祖的这个指示同样没有被子孙们执行好，随着时光推移，充满无用言词的本章又大为风行起来，不但成为一种风气，而且成了一些自命才高的朝臣们卖弄才情的工具。为此，崇祯帝在崇祯元年（1628）二月正式颁佈上谕，严禁章奏冗蔓：“近来章奏冗长，已成习气，不便阅读。如论事切当可行，何必饰以空洞浮词。以后务宜简明，其字不得超过一千。如词意未尽，不妨另本再奏。”但由于风气所致，这个禁令并没有产生多大效果。就连崇祯帝自己撰写的上谕、诏令，也常常是充满了华而不实的辞藻。后来国家的大事顾不过来，崇祯帝也就不再过问这件事。

同大臣不时议政本来也是皇帝应尽的职责，但明代诸帝中能坚持这样做的却极其罕见。在崇祯帝即位前的100多年里，朝臣们很少有机会与皇帝共同议政。有些皇帝，例如崇祯帝的祖父万历帝，竟有20多年根本不同任何朝臣见面。就是比较规矩一点的皇帝，能坚持3日一次的常朝，也只是仪礼性的，人称是“跪拜起立，第如傀儡之登场”。崇祯帝却是既能常年不断地坚持与朝臣会面，而且几乎每次会见都要讨论些实质性的问题。

明代天子同朝臣的会见分仪礼性的与办公性的两种。前一种主要是所谓朝会，特别是在元旦、冬至、万寿节（皇帝生日）等重大节日的大朝会。平常例行的常朝则是半仪礼性的，既带有仪式色彩，也可能讨论一些特别重大的问题。真正的办公会议一般不会在正殿中举行，因为那种森严的局面和繁复的礼仪显然不利于讨论问题、解决问题。明代皇帝如果偶尔举行办公会议，那么多半是在建极殿（清代称保和殿）东面的后左门。那儿是前殿后寝的结合部，又非正式殿堂，对于皇帝和朝臣都比较方便。后左门由于正处在正殿区三层丹墀的边缘，宫中俗称又叫“平臺”，所以这种平时在后左门召开的办公会议又叫“平臺召对”。在崇祯帝以前，这种平臺召对举行得极少，有些皇帝一辈子也没举过一次；而崇祯帝自从一当上皇帝就屡屡施行，召对的对象有时候是全体高级大臣和言官，所谓“九卿科道”，有时候是专召同某一问题有关的官员，或是某一类官员。

但是，对于这种不定期的召对形式崇祯帝仍然不够满意。崇祯元年（1628）八月，他又主动向内阁等部门发佈了一道上谕，其中的内容很明白地反映出他在执政初期的心理状况。他在上谕中讲述了自己登极以来夙夜焦劳，为国家民众呕心沥血的情状，进而责备朝臣因循积习，“政事奉行不实，徒夸纸上虚言”。正因为这样，他才屡次召对平臺，希望能

同朝臣一同振作起来，扫除弊端，共创新政。但召见的时候，因为时间短促仍然不能把问题讨论清楚。如果每天都同大小臣工共筹庶务，则打扰朝臣的日常办公，太过繁滋。只有内阁辅臣本来就是天子的心膂股肱，应当时刻顾问于左右。所以决定：今后除酷暑严寒之外，朕将每日御于文华殿中，所有奏章均同各位辅臣面商定议，务求处理精当。最后他还要求群臣秉公勤奋，“一洗欺玩颓靡之习，共收奋庸熙绩之功。”

这个新制度以后一直被执行着，直到他的朝廷被农民军彻底摧垮。这种制度上的变化给明朝末年的政治带来了许多新的因素，使得多年来形成的已经适应于懒汉皇帝的政治运行机制突然变得非常不能适应。我们后面将会看到，一位又勤快又自以为精明的专制君主给这个老大帝国造成的伤害，远远要大过一个平庸、惰怠、无所事事的皇帝。

每天都同皇帝接触，实际上对阁臣本身是一个极大的考验。第一次通过枚卜确定的内阁班子很快就显示出了它的弱点。这个班子中的一些成员是在魏忠贤时期做过高官的，有些人还估据着重要的位置。因此，随着清查阉党工作的深入，一些新阁僚的问题也被纠出，其中如来宗道、杨景辰，问题还比较严重。来宗道和杨景辰在受到纠弹后都照例提出辞呈，很快就被批准退休回家。当然更让崇祯帝不满意的还是那些大学士们的颟顸糊涂，就是上面所说的“情面”——“面情”一类插曲。他下定决心，至少要换上一个有能力有责任感的首辅。经过仔细考察选择，他最后决定任用前内阁大学士韩爌。

韩爌是山西蒲州（今山西永济）人，万历二十一年（1593）进士，入翰林院，万历后期官至礼部右侍郎协理詹事府事，做过东宫讲官。由于同太子（即光宗）有一层师生关系，韩爌在“国本”问题上很自然要站在同东林一致的立场上，但因为是北方人，他同东林中几位特别有影响的人物并没有什么密切关系，而且在“红丸”等事件的争论中也对东林党人一

些不合理的观点提出过自己的不同看法。他于泰昌元年（1620）入阁，以老成慎重而闻名。天启四年（1624）东林党魁叶向高罢相后，韩爌继之为首辅，在阉党日盛的情况下勉强支撑着残局，不久终于被排挤出内阁。天启五年（1625）七月，他又被阉党列名为东林奸党，削籍除名，并诬坐赃银2000两。韩爌为了完纳赃银，只能变卖田宅，竟至于同家人居住在祖墓。由这样一位同魏忠贤和阉党界限清楚，宗派色彩又不浓厚，而且老成干练的资深政治家来出任首辅，确实是一个十分合适的人选。崇祯元年（1628）四月，崇祯帝在对于当时内阁中的成员绝对失望的时候发出任命，要韩爌以原官职进京入阁。依照制度，明代内阁成员不论年龄、资歷和职位，一律以入阁先后（按任命时间算）排列序位，韩爌早在泰昌元年即已入阁，资格无与伦比，回朝后自然要坐首席。

从晋南到京师路远迢迢，韩爌已是60多岁高龄，行动也不能过于迅速。因此，在接到圣旨之后他用了半年多的时间，直到这年的十二月才入阁中担起责任。在这之前，崇祯帝也只好先将就着使用现成的班子。好在他还是发现了一个比较精明强干的人才，就是刘鸿训。

在枚卜大典中被抽中的6个人当中，刘鸿训的原官职最低。其他几位都是尚书、侍郎一级的人物，是所谓的“卿贰大臣”，而刘鸿训原来只是少詹事，官仅四品，只是由于按明代制度，詹事府（主管太子教育等方面事务）的正副长官都有资格候选阁僚，才侥倖进入辅臣的行列，而且一下子被加礼部尚书衔，连升了4级。但刘鸿训并没有因为自己资歷太浅就缩手缩脚不敢任事。他是崇祯元年（1628）二月入阁任职的，由于年纪较轻反应机敏，口才也还不错，加上感激皇上的知遇之恩，所以在每一次御前办公会议上都表现得颇为积极。在一段时间里，内阁中、部院大臣中只有一个刘鸿训还能顶着皇帝的挖苦和训斥同皇帝讨论一些机务大政，能让皇帝比较和颜悦色起来。

正对内阁官僚们十分厌烦的崇祯帝对这个崭露头角的刘鸿训一时也有点相见恨晚的感觉。在每天的召对中有一个人能够跟上自己的思路，并且能够阐述他本人对各种政务的看法，对于崇祯帝来讲是一种很不错的感觉。刘鸿训也确实发表过一些有益的意见，例如那一个时期进行的清查阉党和平反冤狱，刘鸿训都积极建议、具体主持过。在崇祯元年（1628）夏秋之际这段时间，崇祯帝和刘鸿训君臣之间的配合与默契达到了最佳状态，成为一个他们相互关系温暖和煦的时期。可惜这个时期太短暂了。

这一对君臣关系的最初裂痕是为了一起争论而出现的。这年七月，山海关外宁远卫的驻军譁变，譁变部队把宁远巡抚毕自肃等官员绑在谯楼上，逼着要拖欠了几个月的粮饷。毕自肃因惭愤自刭而死。消息传到京城，崇祯帝大为光火，他责备户部为什么不及时发饷。户部回答因为府库空虚，而军费开支太大，暂时无力解决。这个军费与财政的问题是后来让崇祯帝头疼了十几年的问题，但此时问题刚刚浮出水面，一向喜欢把一切失误和罪责都推给下面的崇祯帝很想拿户部问罪，也能借此显示一下自己的“不测之威”。但此时刘鸿训却明知道户部巧妇难为无米之炊，实在没有那么多钱粮，责罚也没有用，而且也不公平。因此他反对问罪户部，而主张由皇帝出“帑币”30万发往辽东军前，以示“不测之恩”。

所谓“帑币”指“内帑”，就是皇帝自己名下的财产，在明代这笔财产的数量到底有多少谁也弄不清楚，反正是数字极其可观。但崇祯帝生性吝啬，让他出帑币示不测之恩，等于是割他的肉，挖他的心窝子，是断断不能接受的。不但不能接受，对敢于提出这样混账建议的人还要怀疑他是不是别有用心，是不是心怀不轨。皇帝的主意既然是这样定的，“不测之恩”也好，“不测之威”也好，就全没有实行。好在不久宁远的兵变就被

平定了。但崇祯帝同刘鸿训的蜜月也就此结束。没有多久，崇祯帝就听到专门派去监视刘鸿训的人员汇报：刘鸿训在家里面竟然说当今皇上“毕竟只是个冲主（年幼之君）”。这句话可是触到崇祯帝的逆鳞了。

极其自负的崇祯帝在内心深处大概还有很大不自信的成分，因此他才会对他人的评价特别敏感，有时候简直就是一种病态。这病态的表现形式之一就是对于身边所有人都怀着一种深刻的怀疑和猜忌。刘鸿训在家里说的悄悄话是怎么传到崇祯帝耳朵里面去的，如今已不可考，但最大的可能是由皇帝专门派遣的特务人员（锦衣卫干事一类）探听到并且报告给皇帝的。在崇祯时期，这种由特务对大臣进行无孔不入的全方位监视的做法，实际上一直在实行着，明末野史中对此有过许多记载，大臣们也有心理准备，因此不论在什么地方都万分小心，生怕有什么不妥的地方被皇帝探了去。

从崇祯帝十几年君临天下的实际活动中可以看出，他平生最痛恨的事情就是别人看不起他，不论是直接给予他不太高的评价（总之不如他自己的评价那么高），还是在他面前耍小聪明，妄图欺骗他（这在他看来无疑是低估他的精明，也是对他的一种看不起）。对这两种行为，他一律给予最严厉的惩处，心黑手毒，从不留情。皇帝的这种病态心理给他的统治时期留下了深深的印痕，特别是使得朝臣们常常会处于一种两难的境地。表现得太平庸甚至愚蠢会让自以为高明绝伦的皇帝十二万分的看不起，当然无法得到他的欢心；而表现得精明瞭却又很容易遭到神经过敏的皇帝的猜忌，会让他怀疑是看不起他，那样后果将更为不堪。在崇祯年间同这位皇帝有过比较密切合作的几位大臣，几乎都在小心翼翼地力图摆脱这种两难，但除了一个杨嗣昌以外，好像再没有别的成功者。皇帝的心理变态使这些大臣们註定了厄运，刘鸿训只是这些倒运大臣队列中的第一个，而且是最不引人注目的一个。

在这一年，不满18週岁的崇祯帝也可以说还是个“冲主”，但在整人方面他却已经显得相当成熟了。首先，他一旦对哪个人有了恶意，那是绝不会忘怀的，他心中有一本明确无误的“生死簿”。其次，他也知道整人不能够过于直率，如果以刘鸿训在家中说他“毕竟只是冲主”来定罪，不但会造成恶劣影响，而且可能在朝臣的阻挠下根本就定不了罪。他懂得在必要的时候需要找一些藉口，这是政治斗争技巧的精髓。

藉口很快就找到了，而且因因果果还相当复杂，很容易掩盖住处理刘鸿训的本来性质。

九月，提督郑其心向朝廷提出：新任总督京营戎政惠安伯张庆臻的敕书（委任状）中有“兼辖捕营”的话，但按旧例京营总督是无权管辖巡捕营的，郑其心认为这样就侵夺了自己的权力，因而请求核查。有关部门在检查中发现，敕书的内容是内阁办事人员中书舍人田嘉璧私自加进去的，怀疑有贿赂作弊的可能性。田嘉璧立即被逮捕，跟敕书事件有关的张庆臻和兵部、内阁的官员都受到了怀疑。因为按照规定，这一类敕书应该由兵部拟稿，经阁臣审定后交中书缮写，再经大学士和兵部主官审阅后才盖印生效。现在出了问题，内阁和兵部都有责任。

最喜欢调查疑难案件的崇祯帝立即亲自对这个并不重要的案子进行审讯。张庆臻表示，改敕书的事情他根本就不知道，而且增加管辖巡捕营的权力并没有什么油水，怎么可能去重金行贿呢？崇祯帝完全不相信张庆臻的辩解，又调来了兵部写给内阁，要求发放敕书的揭帖，发现上面刚好有刘鸿训批的“由西书房办理”的字样，这证明了此事是由刘鸿训经办的，他的责任是脱不掉了。问题在于，刘鸿训仅仅是工作失误呢，还是接受了贿赂有意如此呢？

不知是在什么背景下，朝中的一些言官开始对刘鸿训大肆攻击，说他纳

贿有迹，有人还扯上了其他一些捕风捉影的事情。而在狱中的田嘉璧竟然也在口供中说，是受了刘鸿训的指使。内阁大学士李标、钱龙锡和礼部尚书何如宠认为事情不可能这么简单，而且以刘鸿训一贯的人品，不应该有这样的行为。但崇祯帝却一口咬定，案情已经大白，没有必要再进行调查，严令拟旨惩办。于是刘鸿训和张庆臻均被革职，逮捕听候审判。刘鸿训反覆为自己辩解，却没有一点作用。

案子拖了一年多，最后刘鸿训被判处流放戍边代州（今山西代县），而且一直没有得到赦免，后来死在戍所了。兵部尚书王在晋和兵部职方郎中苗思顺因为混在案中，虽然没有受贿的证据，也被革职削籍。倒是主犯张庆臻，因为是世职勋臣，仅被停止俸禄3年。据说崇祯帝本来是一定要置刘鸿训于死地的，因为内阁和部院大臣们通力援救，处理才稍稍从宽了一些。

刘鸿训被罢相，韩爌还没有到京，内阁中又只剩下周道登、李标和钱锡龙3个人，同一年前举行枚卜大典的时候没有什么两样了。更为重要的是崇祯帝对于这3位大学士并不满意，尤其是首辅周道登，他是早就想撤换掉的。为了给内阁增加新鲜血液，也是为了进一步寻找能够成为自己心膂股肱的能臣良吏，他决定再举行一次会推阁臣的活动。

这时候，朝中的形势同一年以前已经大不一样了。东林党人在朝中的实力正在迅速地壮大起来，他们中的不少人在崇祯元年（1628）得到平反，回朝上任，正好补上了被清查出来罢官落职的阉党分子，其中有侍郎、京卿一类的高级大臣，也有掌握着很大实权的郎中、员外郎等部属，还有能极大地影响舆论和朝政的言官——御史和给事中。这些东林党人的数量在朝中并不占优势，但在同心戮力、结合密切方面，朝中那些散兵游勇式的小圈子、小宗派是无法同其抗衡的。这些一度蛰伏星散的东林君子们满腔热情，满腔悲愤，又开始把持朝政、排斥异己，俨然

成了朝中主流派。他们感到不满足的是在内阁和七卿中自己的人还太少，韩爌和钱龙锡严格说来都只是东林外围，而部院大臣中真正的东林中坚人物也只有一个曹于汴。他们想做的，就是尽快利用自己的势力在内阁中和七卿中安插自己人，建立一个真正的东林朝廷。天子下令会推阁僚，机会终于来了。



温体仁

这一次会推充分显示了东林在朝中的实力，在报上的11个候选人名单中，钱谦益、孙慎行、曹于汴都是东林中着名的骨干人物，其他如成基命、何如宠等人也多是东林党人的好朋友。其中最引人注目的是礼部侍郎钱谦益。此人机智博学、风流倜傥，人称“东林浪子”，是东林中的核

心人物，而且诗名卓着，是全国闻名的大才子。由于钱谦益的名望和才干都非常突出，东林党人对于他入阁主政，并且进一步扩大东林的势力抱有极大的期望。

另一方面，当时很有希望入阁的温体仁和周延儒却没有被列入候选人名单。

温体仁字长卿，浙江乌程人，万历二十六年（1598）进士，曾任翰林院编修，魏忠贤专权的时期官至礼部侍郎，但没有参与过阉党的政治阴谋，也没有无耻吹捧逢迎过魏忠贤等人，因而在崇祯初年晋升为礼部尚书衔，协理詹事府事。

周延儒字玉绳，南直宜兴（今江苏宜兴）人，是万历四十一年（1613）癸丑科状元，授翰林院修撰，天启后期任少詹事掌南京翰林院事，同样没有什么追随阉党的劣迹，在崇祯帝即位后调升礼部侍郎。

按照惯例，像温体仁、周延儒这样翰林出身的礼部高级官员是应该被推为内阁候选人的，但这两个人都是在魏忠贤统治时期做着高官平平安安过来的，尽管同东林并没有什么夙仇，却让那些曾经备受迫害才刚刚翻过身来的东林党人在感情上有一种非我同类的感觉。东林人士大概以为，稍稍压抑一下在魏忠贤体制下也很得志的人是合情合理的，也是很公平的，因而在会推中排挤掉温体仁和周延儒后根本就没有准备会遭到抵抗。

但温体仁和周延儒却觉得很不公平，特别是温体仁，释褐做官已30年，好不容易在将近晚年的时候熬到接近政治生涯巅峰的地步，却被东林党人毫无道理地拦路阻截住，因而极其愤怒。他是一个极有心机，极有城府，在关键时刻敢作敢为的人，此时虽然东林势力雄厚，他却要同东林斗上一斗。

他还选中了一个很好的突破点。

那还是在天启元年（1621）的时候，当时身为翰林院编修的钱谦益主持浙江乡试，结果出现了一桩舞弊案。有两个无赖棍徒，徐时敏和金保元，假称能暗通关节，在参加乡试的生员中兜售所谓的“字眼”暗号，号称已有内部保证，按照“字眼”格式交卷的定能取中，而且事先讲好，凡愿通此关节者，中试后收费。其实这两个棍徒并没有什么内部关节，只是想採取广种薄收愿者上钩的办法，骗取银钱。有个生员钱千秋就上了圈套，徐、金两人给他的“字眼”是“一朝平步上青天”七个字，要求写在七篇应试文章的结尾处。钱千秋照着“字眼”交了卷，碰巧还真被取中，得中浙江省第四名举人。徐时敏和金保元根据原先的协议去要钱，钱千秋却已经发现那两个人搞的是个骗局，不想履约付钱。两边为此大闹起来，惊动了乡邻，惊动了官府，惊动了京城。礼科给事中顾其仁上疏纠劾此事，朝廷下令严查，不久查清结案，钱千秋和徐时敏、金保元俱以科场舞弊罪判处流戍，钱谦益以及房考官郑履祥以失察罚俸3个月。

这个案件已经过去了七八年，中间的政治局势已有过两次天翻地覆的大变化，主犯徐时敏和金保元都死在了戍所，钱千秋则因遇赦回了家，本来不值得再去纠缠。但温体仁深知崇祯帝生性多疑又酷爱调查各类案件，就想利用这件歷史的旧案去搅一搅局，即使不能遂自己之愿，也要把水搞浑，出出心中的一口恶气。这样，在会推阁臣结束后不久，温体仁上疏弹劾钱谦益，“盖世神奸”、“结党欺君”，一面揭露钱谦益品德败坏，歷史上就有过受贿舞弊行为，一面控诉东林党人把持会推矇蔽皇上。

崇祯帝对于这次会推早已经有了怀疑，但不是为了温体仁，而是为了周延儒。周延儒中状元的时候才25岁，少年得志，风流自喜，非常聪明也非常圆滑。崇祯帝在召对群臣的时候，对于这位年轻的礼部侍郎的风

度、才智都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在一些具体问题的应对上，周延儒也很合崇祯帝的心意。在那次有关宁远兵变的讨论中，刘鸿训因为提议由皇帝掏腰包示“不测之恩”而遭到了皇帝的唾弃，而周延儒却利用不久后的另一次兵变，在皇帝的心目中得了一张至关重要的选票。当时锦州驻军也是为了闹饷而譁变，诸臣又提出发内帑充饷，周延儒却力排众议，说：“关门本来是为了防敌的，如今却要专门用来防兵了。宁远譁变给宁远发饷，锦州譁变又给锦州发饷，各地的驻军将来都要效法了。”崇祯帝问：“那你说有什么办法呢？”周延儒其实也没有什么办法，只是说：“目前事急，饷不得不发。但应该筹划一个长久之策。”说得虽然空泛，却很合崇祯帝的脾胃。自此皇帝对这个周延儒更是青睐有加。

在这次会推中，崇祯帝心中比较有目标要选入内阁的就是这个周延儒。可是会推结果出来后，却没有周延儒的名字。一向多疑的崇祯帝认为一定是有人在捣鬼，不但是在同周延儒过不去，而且是在同自己过不去。他满腹狐疑，满心不高兴地正准备调查这件事，温体仁却首先为他发难了。崇祯帝第二天就以他一贯的作风组织了御前调查会议，那是崇祯元年（1628）十一月初六日。

钱谦益没想到温体仁会突然在钱千秋科场旧案的问题上对自己发动攻击，一下子有点措手不及。对于皇帝的质讯，只能回答：“钱千秋通关节一案，当年已经疏参，由刑部勘问明白，现在有案卷在刑部。”

温体仁却说：“当年钱千秋在逃，居间过付的两个人徐时敏、金保元被提到刑部后，亲口供称是与钱谦益通同作弊。这些事实怎么能隐瞒得了呢？”

两个人在皇帝面前争辩了许久，没有结果。崇祯帝转而问温体仁：“你在疏中说‘神奸结党欺君’，奸党是指哪个？这次枚卜大典，是谁一手操

纵？”

温体仁奏道：“钱谦益的党羽甚多，臣还不敢尽言。至于这次会推阁臣，皇上务求真才，其实大多是钱谦益一党。”

这时吏科都给事中，也是东林干将的章允儒指责温体仁：“钱千秋一案，早已了结多年。温体仁资歷虽深，却无声望，这次会推没有列名，因为怨恨而生事端。如果钱谦益果然有通关节的事情，为什么不在枚卜之前就参奏？这次会推的结果已经奏上，到底用哪个人，全凭皇上裁定。”由于吏科都给事中官品虽低，权力却极大，在会推阁臣中起着非常重要的作用，因此章允儒要为这次会推辩解。

温体仁却侃侃而答说：“臣并非言官，纠弹不是臣之职掌。在会推中没有列名，依理应避嫌不言。但枚卜大典是关系江山社稷安危的大事。钱谦益结党受贿，满朝上下无人敢言。臣不忍见到皇上孑然孤立，因此才不得不言。方才科臣（章允儒）所说，正表明他与钱谦益是一党。”

温体仁的这番话深深打动了崇祯帝。登基以来，他一直疑心朝臣们在结党营私，也最害怕被朝臣高高在上地孤立起来，被欺骗矇蔽。而今天这次廷对已经让他切切实实地感觉到了东林之“党”，也感受到了东林党人的势力非常。

这时候章允儒反击温体仁道：“从来小人陷害君子，都是用这个‘党’字。当年魏广微（阉党巨擘）要驱逐赵南星、杨涟等人，就让魏忠贤在会推题本上加了一个‘党’字，全部加以削籍夺职。这种办法流传至今，成为小人陷害君子的榜样！”

这番言辞太激烈了，而且有将崇祯帝比作昏聩无能的天启帝之嫌。这下子可惹恼了皇帝，他大发雷霆：“胡说！御前奏事，怎么能这样胡

扯？”当场让人将章允儒拿下。

这时候戏剧性的场面发生了，崇祯帝连喲几声，竟然没有人应旨去拿下章允儒。对于自尊到有点病态程度的崇祯帝来说，这太失面子了。这个场面足以给他造成终身难忘的印象。而且，这情况似乎从另一个侧面证明了温体仁所说的“满朝皆钱谦益之党”，证明了东林党人在朝廷上下的泼天大势。在这一瞬间，崇祯帝的决心其实已经下定了。他绝不允许朝中存在一个干扰天子权力的朋党实力集团。

连喲“拿人”而无人承旨，崇祯帝只得直接命令锦衣卫。此时也在朝班之中的锦衣卫总管只好出班承旨，但所谓“拿下”，只不过是把章允儒扶着出去。这以后，温体仁一口咬定钱谦益受贿通关节是实，而部阁大臣们则坚持当年已经定案，并无疑点，不应再做纠缠。崇祯帝命人从礼部调来当初钱千秋的考卷，亲自验看。那捲上确有“一朝平步上青天”的字眼，也有钱谦益用硃笔批的得中名次，但这些其实很难说明到底有没有关节。崇祯帝因为已有先入为主的成见，觉得拿到了真凭实据，只是督促诸臣从实议奏。

一直没有出声的周延儒这时终于说话了，他说：“皇上再三追问，诸臣却不敢回奏，一是由于害怕引起皇上的愤怒，二是有碍于情面。总之钱千秋一案，通关节是真，现在有当年硃卷，皇上已经验看明白，这是通关节的确实证据，不必再问诸臣。”

崇祯帝对于周延儒的这番话很以为然，要他再重复一遍。周延儒于是又把话重说了一次。温体仁趁机又说：“臣孑身孤立，满朝都是钱谦益之党。臣的弹劾本章一出，不但钱谦益恨臣入骨，凡是钱谦益一党无不恨臣入骨。臣孤身一人，岂能当受众怒？只是忝居大臣之列，不忍心看着皇上日夜焦劳而诸臣却不知谨戒，因而不得不参劾。事已至此，恳乞皇

上罢臣之官，允臣归乡，以避钱谦益一党凶锋。”

崇祯帝当然不会让温体仁辞职归里，当场就说：“既然是为国劾奸，何必要求去职？”

这场会推风波本质上是朝中新旧两个既得利益集团为争夺政治权力而进行的一场斗争，这场斗争也反映出明末官场上朋党习气已经发展到了何等严重的地步。作为最高统治者，对于朋党交闹可以超然其外，也可以充分利用矛盾来推行统治术，却绝不能加入到朋党中去硬要充当一方朋党的角色。明末朋党自万历中年起愈演愈烈，但万历帝虽然昏庸，在党争中态度还是比较超然的。自光宗起情况则不然，光宗和前期的天启帝是全然倒向东林党，对“邪党”大施辣手；后期的天启帝（其实是魏忠贤）又完全站在东林的对立面。正是这最高统治者的介入加剧了党争的激烈程度。

自以为聪明已极，政治手腕高明已极的崇祯帝却并不明白这样一个基本道理。表面看来他是严禁一切结党营私，但由于他的自作聪明自以为是，却常常被一些具有真正政治智慧的人引进圈套里，不自觉地成为党派中的一员。因此，崇祯时期天天讲消除朋党，而朋党却越来越盛，而且朋党之间已经不再有明确的路线分歧，变成了完全的争权夺利，斗争的手段也越来越阴险下流。总而言之，在崇祯帝统治的17年中，朋党之争不但越来越激化，而且斗争的政治水平也越来越低下了。

这一每况愈下的流程大体上就是从那次会推风波开始的。崇祯帝出于对周延儒的情有独钟，首先对会推产生怀疑和不满；既而由于他深文周纳的狱吏性格而引起了对于钱千秋歷史旧案的浓厚兴趣；在廷对中温体仁的一番自我剖白使他痛感自己正在被矇骗，已经被孤立于上，因而更要一举扫平朝中朋党。他在廷对中对温体仁说：“如果不是你揭露，朕几乎

要被欺矇了。”实属肺腑之言。他还发现，像温体仁和周延儒这样的既在朝中孤立无援又对自己忠心耿耿的大臣正是破除朝中朋党的有力人员。有了这一系列认识，尽管钱千秋的案件并没有发现什么新证据、新情况，崇祯帝却在第二天传旨：“钱谦益既遭议论，着回籍听候勘查。钱千秋由法司提问。”倒霉的钱千秋还不明白髮生了什么事情，就被煳里煳涂地抓起来，不久就被重枷枷死。（这时候，崇祯帝已经完全没有当初对魏忠贤说，立枷“实在还是太惨”，那种悲天悯人的感觉了。）此案也就不再有人过问。

在廷对中被“拿下”的章允儒以及在会推事件中涉嫌党私钱谦益的河南道掌道御史房可壮（也是在会推中能起重要作用的言官）、给事中瞿式耜等人被降三级调用，作为对结党营私的惩办。也是为了给结党之党一点颜色看看，崇祯帝对于会推的11个人一个也没有用，等于宣佈这次会推全部作废。

在这次由会推而引起的风波中，皇帝与大多数朝臣第一次严重地对立起来，君臣关系的紧张程度也大为加强。这以后，崇祯帝对朝臣从整体上已经最后失去了信心，决意要完全地独断专行了。这以后，朝臣们对于当今天子的能力和个性也有了更清楚的认识，直接批评皇帝举措失当的本章就是从崇祯二年（1629）起开始出现的。

在这种君臣相互猜忌、相互对立，甚至相互敌视的情况下，他们可能同舟共济，一起对付帝国正在面临着的重重危机吗？

二 己巳之警

崇祯帝和他的大臣们都知道国家正在面临着危机，但直到崇祯二年（1629）十一月，他们才算真正领略到危机临头的滋味。那一次，后金八旗军的铁骑直逼京师，王朝危在旦夕。

在十几年间明朝与后金的军事对抗中，尽管明方一再失利，君臣将士在心理上也对东方这个强敌极为畏惧，很有些谈虎色变的意思，但在口头上却还是一直强撑着，在各种明朝的公文以及私家着述中，提到后金，一律用“虏”，用“奴”，甚至用“么么小丑”之类极尽轻蔑、极尽丑诋的用语。但在实际上，这个东北关外的“么么小丑”在崇祯帝登上宝座的时候已经发展成极其强盛的一支政治力量了。就在崇祯帝登基的前一年，后金的第二代大汗（太宗）皇太极继承了汗位，定年号为“天聪”。这位正值盛年的大汗统治的疆土没有崇祯帝的那样辽阔，治下的人口更远远比不上明王朝那样众多，但他的政权正处在欣欣向荣的发展时期，他不但以渖阳为中心，在辽东地区建立了一个颇具规模的国家政权，而且拥有一支英勇善战所向披靡的劲旅。他的目标也非常明确，主攻对象就是西面的明朝，最终目的就是取而代之，成为天下的主宰。

明王朝对于关外这个劲敌瞭解的却并不怎么多。由于连年吃过不少败仗，明朝朝廷上下都知道这个劲敌很厉害，为此在山海关一带佈置了重兵，大约有10万人，此外还在辽南皮岛（今朝鲜椴岛）、登莱（胶东半岛）、蓟镇（今天津蓟县）等处安排了大批兵力。但这个劲敌内部情况如何，兵力有哪些部署，战略目标做何打算，明朝的君臣们却是一片茫然。一来因为明朝的对内情报系统虽然极发达，对外情报系统却极薄弱，根本探听不到消息；二来由于朝廷上下已经习惯于用一种虚妄的自

大来自我安慰，本来也不想听到对方真实可靠的消息。

崇祯帝就是在一种懵懵懂懂的状态中体验那劲敌的恐怖的。在他即位之前，他只记得在天启六年（1626）和天启七年（1627）有过两次东“虏”进犯，而那两次却都是明朝一方胜利了。他也记得尽管取得了胜利，京城内外在那前后还是一片人心惶惶。更为奇怪的是，在那两次胜利中立了首功的宁远巡抚袁崇焕在第二次胜利后不久就被免了职，回家闲住去了。值得庆幸的是，在崇祯帝即位后的两年里，东方的这个劲敌并没有发动过什么正式的攻击。因此，在崇祯帝诸多亟待解决的重大问题中，辽东问题虽然是头等重要的，却始终没有进行过实质性的讨论，触及过实质性的问题。



皇太极

在崇祯帝即位的初期，他在辽东问题上做过的一件最重大的安排，就是重新起用了袁崇焕。

袁崇焕字元素，广东东莞人，广西藤县籍，万历四十七年（1619）进士，初任知县，不久即以边才破格任用为兵部职方司主事，升宁前兵备道。袁崇焕为人慷慨有胆略，勇于任事。天启五年（1625），辽东经略高第要撤宁远（今辽宁兴城）和广宁前屯（今辽宁绥中县东南）两座卫城之防。袁崇焕坚决反对这个决定，表示：我官为宁前道，即应与宁远、前屯共存亡。如撤宁、前之兵，我也绝不入关，只好独卧孤城抵挡敌军了。高第无奈，把周围各卫所的兵全部撤掉，在山海关外只留下宁远、前屯两座孤城。第二年正月，努尔哈赤率军东进，在宁远遭到顽强的抵抗。当时后金军有13万之多，而宁远城里只有不满两万守卒。但在后金军全力攻城之际，城中的明军用西洋大炮和雷石、火球奋力抗击，城下尸积如山，后金军却始终没有攻进城中。据传说努尔哈赤在这次攻城的时候被炮击伤，最后只得撤兵。清代的官书在记载这一战役时说：“帝自二十五岁起兵以来，征伐多处，战无不捷，攻无不克，唯宁远一城不下，不怿而回。”

从此以后，袁崇焕声名大振，立即被提升为辽东巡抚、兵部右侍郎兼右佥都御史，全权负责辽东防务。又过了几个月，努尔哈赤病逝，皇太极继位，第二年再次进攻锦州、宁远一线。袁崇焕率军再次凭城坚拒，两军相持了20几天，最后皇太极的兵马无功而返，并且在以后的两年多时间里不再进犯。接连两次御敌的胜利奠定了袁崇焕知兵善战的舆论基础，普天下都知道有个袁巡抚专能克“虏”，是帝国在东北方面一堵坚不可摧的长城。人们甚至以为这是天佑大明，专门降下一个守边制敌的人才来。但也正是在这个时候，袁崇焕由于同魏忠贤闹了一些矛盾，却被

不明不白地免了职，辽东的防务改由能力和名望都不高的王之臣主理。魏忠贤集团在辽东前线主帅任免这样重大的问题上，只凭一己的好恶而不考虑实际后果，当时就有许多人表示不满意、不理解，甚至一些阉党要员也公开对此事提出过批评。



袁崇焕

崇祯帝取得了政权，诸事都要拨乱反正。在辽东对敌这个至关重要的问题上，他的认识水平同当时的舆论差不多，以为辽东问题的关键在于用人，当今第一可用之人就是袁崇焕。为此，他在崇祯元年（1628）四月重新任命袁崇焕为兵部尚书兼右副都御史，督师蓟（州）、辽（东），兼督登（州）、莱（州）、天津军务。这一次袁崇焕的职务更高，以兵部尚书在外督师，官职已至极点；事权也更重，不但掌握着辽东前线的全权，而且拥有了对于蓟镇、登莱、天津等战略后方区域的军事指挥权，几处兵马加在一起差不多占全国总兵额的一半。这等于是为辽东战事设立的一个特级军区，军区的总司令就是袁崇焕。在袁崇焕的职权中

后来还加上了“便宜行事”一条，就是凡事关紧急可以自作主张，先斩后奏。

对袁崇焕委以如此重任，说明崇祯帝确实有一种只要把辽东大事全部託付给袁崇焕就可以高枕无忧的幻想。这种幻想出自于舆论中袁崇焕专能克“虏”的神话，而神话毕竟是靠不住的。崇祯帝同袁崇焕这种以幻想和神话为基础的君臣遇合，其实从一开始就已经註定了其悲剧性的结局。

袁崇焕是七月份来到京城就职的，立即受到了崇祯帝的召见。

七月十四日，崇祯帝在平臺召见新任蓟辽督师袁崇焕，同时参加召见的还有内阁大学士周道登、钱龙锡、刘鸿训以及九卿科道一干人等。

在召见中，崇祯帝关心的一是辽东的对敌方略，也就是说都有哪些具体办法；二是想知道辽东问题到底能不能根本解决，要到什么时候才能根本解决。袁崇焕在对应时说：“臣特受陛下眷宠，希望能允许臣‘便宜行事’，那样用五年的时间，可以恢復整个辽东地区。”崇祯帝听了袁崇焕的这一许诺，极为兴奋，当即表示：“只要能恢復辽东，朕是不吝惜封侯之赏的。卿务必努力解除天下的苦难，也可以为自己的子孙造福。”

崇祯帝能听信袁崇焕5年復辽的保证，主要是由于对辽事缺乏起码的瞭解，也是因为对袁崇焕的才能有些迷信。但朝臣中还是有比较明白的人，在召对中间休息的时候，给事中许誉卿特地请教袁崇焕，所谓5年復辽是怎样推算出来的，都有哪些具体安排部署。袁崇焕却说：“看到圣上为辽事焦心劳神，说五年復辽只是为了让他安心罢了。”许誉卿大惊说：“皇上英明善察，岂能够随口答对？将来期限已到而不能成功，阁下怎样对皇上讲呢？”袁崇焕这才感到刚才自己对皇帝讲的话太冒了，但为时已晚，不免心中忐忑不安。

为了挽回一点影响，留一点后路，袁崇焕在皇帝小憩之后又提出了一系列的保障条件：户部转运军饷，工部补给军械，吏部任命文官，兵部调兵遣将，都要服从辽东大局，事事配合。崇祯帝当场命四部尚书照此办理。袁崇焕又提出："以臣的能力，管理辽东尚且有余，而对付朝中口舌则不足。关门之外距京师遥远，如有人忌功妒能，制造蜚语，即使没有直接掣肘，也足以影响到臣的谋略。"崇祯帝对这一点十分理解，站起来倾听袁崇焕所言，并且保证说："卿不要疑虑，朕自有主持。"其后，崇祯帝又赐袁崇焕可以先斩后奏的尚方宝剑，并当廷赐予酒馔，这在当时是极少有的恩宠。

袁崇焕于八月初六日抵达山海关，他的指挥部就设在那里。到任之后，他先是平定了上个月发生的宁远兵变，紧接着又忙着处理锦州的譁变，一连几个月主要是在清理粮饷，核定军额，理顺建制，任免将吏，做的都是打牢基础的工作。好在这一段时间东线无战事，他自可以从容安排。朝廷中自崇祯帝以下对于袁崇焕的工作也确实给予了全力支持，可以说是言听计从，竭尽国家之力为他服务。但到底通过什么样的安排才能用5年的时间恢復辽东呢？袁崇焕显然并没有任何成算。以当时形势而论，明朝每况愈下，后金蒸蒸日上，能维持现状已经阿弥陀佛，恢復云云只能是一些好听的大话。这样一直到第二年的六月，行事常用奇着的袁崇焕还是终于做出一件令朝廷上下极为震惊的事情来。在六月初五日，他没经过任何请示，就擅自把战略地位重要的东江镇总兵官毛文龙杀掉了。

原来，在后金势力基本上佔据了原属明朝辽东都司的大凌河以东全部地区之后，在辽南沿海地区和沿海岛屿地区还残留着一支明朝的军事力量，就是以总兵官毛文龙为首的东江镇官兵。毛文龙原来是辽东军中的一员下级将官，在努尔哈赤进军辽瀋的时候被分割在辽南一带，无法归

营。他于是以鸭绿江口外的皮岛为根据地，招募辽东各地逃来的难民和在战争中散落的散兵游勇，建立起一支数万人的队伍，号称十万。明朝政府得知在敌人腹下还有一支生力军，自然非常高兴，天启二年（1622）任命毛文龙为平辽总兵官，后来加衔至左督都，官一品，设镇于皮岛，总管辽南各地抗击后金的斗争。毛文龙设镇数年，在辽东半岛上给后金政权制造过不少麻烦，从侧面牵制了后金对明朝的正面进攻，对于明朝来讲确实是立了功的。但此人胸无远略又骄横跋扈，因为孤悬海外，明朝中央政府难以节制，他所辖的辽南沿海地区实际上已经成了一个独立王国，朝廷输来军饷他自然欢迎，但朝廷下的命令就要看他愿不愿实行了。

为此，明朝朝廷对于东面大海上的这一彪人马用心十分复杂，既珍视它作为一支军事实力在对敌战略上的宝贵作用，又痛恨它的骄横目无朝廷，还很心疼几年来为这支军队支付的许多粮饷。一些胆大心粗的政治家于是设计了一种“两全其美”的方案，就是杀其帅，用其兵。当时内阁大学士钱龙锡和新任蓟辽督师袁崇焕都是賛成使用这一方案的。这种设计因为涉及诛杀专阃大帅，没有人敢写在奏章中，提到桌面上，也不知道钱龙锡同崇祯帝讨论过这件事没有。从事后袁崇焕汇报杀毛文龙一事和钱龙锡为自己辩解的奏疏来看，崇祯帝对这件事情好像一点都不知情。杀毛文龙主要是袁崇焕在北京陛见的时候同钱龙锡一道下的决心，袁崇焕自称：“臣向在都门，九卿诸臣无不以此（毛文龙事）为虑，辅臣钱龙锡特过臣寓，商及此事。臣曰：‘入其军，斩其帅，如古人作用，某能为也。’”

但这个“两全其美”的办法其实并不那么优秀。首先是实行起来非常困难，要到千里之外的海岛上杀掉当地的土皇帝，谈何容易？袁崇焕敢于膺此重任，说明他的胆略、勇气实在有过人之处。

其二是执行人要极为敢负责任，因为没有皇帝的旨意而擅自诛杀大臣（而且是一品大臣）本身是一件非常危险的事情，在明代歷史上几乎绝无仅有。尽管袁崇焕身上有尚方宝剑（毛文龙身上也有一口尚方宝剑），这件事的后果仍然十分严重，后来他终于为这件事付出了惨痛的代价。但通过此事，也可以看出袁崇焕的敢于任事以及他恣肆无羁的狂放性格。

第三是从后果方面看，杀掉毛文龙以后真能把这支军队驯服吗？大概很难。因为东江独立王国的形成是势使之然，杀掉一个能够束缚部众的毛文龙肯定会造成混乱，却不一定会引导出使这支部队乖乖臣服的结果。事实上，毛文龙死后皮岛部众大体先后投降了后金，为对方解了心腹之患，还使之增加了有生力量。当然，这些事都是在袁崇焕被杀之后发生的，但如果袁崇焕依然主持辽东军政，就有办法治理毛文龙的余部吗？恐怕也难，因为其中的许多困难是无法克服的。

但袁崇焕既不顾危险又不计后果，以检阅军伍为名，带着不多的随从泛海到了辽南旅顺口外的双岛，在那里会见了毛文龙。两个人相互宴请，深夜密谈了几天，毛文龙警惕之心已消，袁崇焕才突然命人绑缚了毛文龙，对他宣佈了12条当斩之罪，并且立即砍了头。毛文龙的部下群龙无首，又猝不及防，只得暂时听从袁督师的将令。

当袁崇焕把诛杀毛文龙的经过汇报到京师的时候，京城里的君臣们全都大吃一惊。这事情太突然，人们毫无心理准备。对于崇祯帝来讲，这还涉及一个尊严和权限的问题。在一年前，他确实许诺过袁崇焕可以“便宜行事”，但这个“便宜行事”还要不要有一个尺度呢？这一次袁崇焕可以自行其是杀掉一个领数万之众的总兵官，下一次他还可能做出些什么样的举动来呢？由于明帝国的法律带有浓重的模煳色彩，很难判断袁崇焕这一次的“便宜行事”是不是太出格了，但用从来的先例来比较，这样的做

法肯定是无例可循的。另外，对于崇祯帝这样一个眼睛里糅不得沙子的君主来说，到底有什么严重情况使得袁崇焕非得在那样一个时刻杀掉毛文龙，而不能事先同皇帝进行认真磋商呢？显然，自以为边才第一的袁崇焕并没有真把皇帝看在眼里。这个事件最让崇祯帝痛心的正是这一点。由于对辽东的情况不甚瞭解，他还不能充分估价除掉毛文龙可能带来的严重后果，但他的自尊心受到的伤害却是现实的。这一点他记得很牢，而且在不久以后把痛心转化成了报復行动。

但在当时，崇祯帝却做出了一个最温和的反应。他在袁崇焕的奏章上批旨，说毛文龙完全是罪有应得，“卿能周密筹划，果断行事，声罪正法，事关封疆安危，将帅在外原本不必事事听从朝廷安排，不必引罪，一切佈置，遵照敕谕，听便宜行事。”天大的一个事情，好像就这样过去了。

当然，事情并没有过去，只不过沉寂了一段时间罢了，到了后金兵临城下的时候，才一起爆发了出来。

自从天启七年（1627）进攻宁锦失利以来，后金政权把主要精力用在征服内蒙古诸部方面。这体现了皇太极的战略思想：进攻明朝取而代之是总目标，但在自己实力尚不具备取而代之的条件的时候也不宜硬拼蛮干，应该首先把自己内部的事情弄好，把周边比较容易征服的部族和国家征服，对明朝则要不时侵扰，尽量掠夺人口和财物；侵扰明朝的路线，不能只限于山海关一路，而应选取长城各关口择机突破，直接深入内地。皇太极的这一战略思想在他在位的17年里一直在扎扎实实地执行着，而明朝的君臣们对此却从来也没有弄清楚过。袁崇焕也不清楚皇太极的战略意图，因此仍然像过去一样，把防御的注意力集中在山海关一线，而没有去加强蓟镇等处长城的边防。

崇祯二年己巳（1629）十月，皇太极率领10万大军绕道内蒙古科尔沁草

原，在遵化以北的长城各关口发起了进攻，而且迅速在大安口（在今河北遵化县北境）、洪山口（今遵化东北境）、龙井关（今河北迁西县西北境）等处突破，进而合兵围遵化。明着名将领山海关总兵赵率教闻警后带兵急速救援遵化，在城外同后金军大战，结果中箭身亡，全军覆没。十一月初四日，遵化陷。此前3日，京城听到警报，已经通报各地，实行戒严。

这是有史以来后金的军队第一次出现在山海关以内的地区，而且这支军队简直是以摧枯拉朽之势所向披靡，正在快速地向京师方向逼进。京城里的官民们百年来头一次遇到这样灾难性的奇变，全都慌了手脚，纷纷出城逃亡。有关当局不知是出于什么考虑，只放男性成年人出城，却不许带着家眷。急于出逃的女眷们有女扮男装的，有藏在箱子、柜子里的，花样百出，不少人在城门口又被查获，弄得鸡飞狗跳，不亦乐乎。于是人心惶惶，流言四起，天子的京城成了一个混乱不堪的世界。在这种切切实实的险境面前，一向自以为无所不能的崇祯帝也完全乱了章法，手足无措了。

京师戒严后，兵部立即火速召京城四方的兵马入援，最早赶到的有战斗力的部队是宣府总兵侯世禄部和大同总兵满桂部，袁崇焕所部也在接到入援的命令后于十一月初四日从山海关出发，疾速向京城方面行军。但明军除了山海关一线各部比较顽强能战外，其他各处多是武备松弛、将士腐败，根本不堪一击。因而后金军在拿下遵化之后，很顺利地继续向西挺进。而在明朝方面，不但军事上无力阻止后金军的前进，就是信息上也因为驿站传递系统的败坏而很不灵通。遵化失陷的消息是过了两天，十一月初六日才报到京城皇帝面前的，而此时皇太极的兵马实际上已经到蓟州附近了。

遵化是京东重镇，是顺天巡抚的驻地，而且在行政上隶属顺天府，属于

京畿地区。这样一个重要城市的陷落和一位巡抚（顺天巡抚王元雅）、两位总兵官（山海关总兵赵率教和蓟镇总兵朱国彦）的死难，给人心理上的震动非常巨大。崇祯帝立即召开紧急御前会议，讨论严峻局势，但朝臣们却拿不出什么像样的办法。身为辅臣的几位大学士全都不懂军事，仓皇不知所措。倒是吏部左侍郎成基命提出，应该立即召还原任辽东最高军事统帅的内阁大学士兼兵部尚书、督师孙承宗，说是此人对敌经验丰富而且德高望重，正是主持京城防御的合适人选，另外孙承宗的家乡就在京南不远的高阳，指日可以抵京。崇祯帝也早听说孙承宗虽已年近古稀，却深通兵法，慷慨忠勇，此时事急，只能先用一下试试。于是在十一月初八日，召孙承宗重任兵部尚书兼中极殿大学士，主持通州防务，并命其即刻进京陛见。由于军书傍午而内阁人少忙不过来，崇祯帝捎带着把荐举孙承宗的成基命也任命为礼部尚书兼东阁大学士，入阁办事。

从崇祯帝以后的表现中可以看出，每当遇到猝不及防的重大危机的时候，他很少能想出什么沉着机敏的对应方案。能做的大体是两类事情：一是临时任命专责大臣，实际上是把重担往别人身上推；二是严厉惩罚引发危机或是同危机有关的失误者，以此来推卸自己的责任并且发泄自己的刻毒怨愤。这个行为模式就是从己巳京师之警的时候开始的。一般说来，被临时任命专责的大臣，不论其成效如何，下场都不会太好，那又是另一种心理因素在起作用了。

如果说起用孙承宗和以成基命入阁基本上还属于正常任命的话，另外一些灵机一动式的破格任用就有些太不着边际了，引起朝臣的许多议论。有个翰林院庶吉士刘之纶，一向喜欢研究兵法，他还有个朋友是个叫申甫的和尚，也是业余军事爱好者。两个人在一起设计了几种战车，有单轮火车、偏厢车、兽车等等，并附有阵法，在纸上谈兵的时候，侃侃有

致。京城戒严，形势紧迫，急需人才，另一位翰林院的庶吉士金声就向皇帝举荐了刘之纶和申甫。崇祯帝连忙召见，看见那些战车的模型煞是有趣，以为两人都是张良、韩信一流的人物，立即破格擢用。刘之纶作为翰林院的庶吉士，大体上相当于国家高级研究院的政治研究生，严格来讲还算不上正式官员，此时却一下子被任命为兵部侍郎，大约连升了十四五级。那和尚申甫也被授予副总兵官实职，还差一步就当到武职的最高职务了，让他招募新军抗敌。

朝臣们对于这些莫名其妙的超升嘴上不好说什么，心中却十分不满，各衙门处处事事掣肘多而配合少。申甫仓促间招集了一些市井游民，又没有好好操练，就急匆匆地出城作战去了。结果在卢沟桥边迎拒后金军，被敌人绕道包抄，不战而溃，申甫阵亡。刘之纶协理京师防卫，不断受人攻击，愤而请求率师出兵迎敌。后来也是自己招募了一支万人的队伍，东进蓟州、遵化，最后在遵化城外全军覆没。刘之纶和申甫都是为国流血牺牲，死得也算壮烈，但崇祯帝在国难临头的时候这样随便地委任大员，却难免给天下留下笑柄。

任命了新人之后紧接着是惩罚旧人，十一月初十日，兵部尚书王洽被逮捕入狱。

王洽原来任工部右侍郎，因为身材伟硕，面貌威严，很引得崇祯帝的重视。在私下里崇祯帝对随从取笑说：这个王侍郎，长得像个门神。兵部尚书王在晋因为刘鸿训“敕书事件”的牵连被罢官，找人替补的时候崇祯帝想起了这位“门神”，正好为朝廷把好关门，于是钦点由王洽任兵部尚书。但这位新任兵部尚书并不太懂军事，而且明代的兵部尚书主要管军政，在军事调配和军事指挥上权力十分有限，因此上任一年，并没有什么作为。这次后金兵临京城，王洽努力调度各地部队入援勤王，也算积极妥善，但朝中一些人和崇祯帝本人却觉得这个“门神”没有挡住敌人进

入内地，实属重大失职。在一次平臺召对中，礼部侍郎周延儒指责王洽“防御疏忽，调度乖张”，翰林院检讨项煜进而建议应严惩王洽，竟然说：“当年世宗皇帝斩了丁汝夔，将士震悚，敌人连夜撤兵。”

世宗嘉靖帝杀丁汝夔是嘉靖二十九年（1550）的事情，当时蒙古俺答部也是兵临都门，情势危急异常。身为兵部尚书的丁汝夔对于那次危机当然也有责任，但嘉靖帝长期不理朝政，又听信谗言胡乱指挥，责任最大的正是他自己，因此杀丁汝夔本来就是为了文过饰非。所谓斩丁汝夔而敌军宵遁云云，更是梦话。但糊涂朝臣的这番梦话却正合了崇祯帝的胃口。他正恨被自己以貌取人而重用的王洽不能为自己争一个面子，因为惊吓、气恨而窝在心里的一股邪火又正无处发泄，因而有人一提，立即就下令把王洽逮繫起来。与嘉靖年间不同的，只是没有当日就押赴刑场把一个兵部尚书斩决，而是等到京城解围之后才行议处，仍然是判的死刑，但此前王洽已经在狱中瘐死了。王洽因为仪表堂堂而得到皇帝的欢心，平白做了一年的兵部尚书，却也因此而丧了命。他的运气实在不佳。

崇祯帝在朝中用新人除旧人，却丝毫不能阻止后金的攻势。袁崇焕带领所部星夜向西支援京城，于十日到达蓟州城；而皇太极的部队在此前根本没有攻打蓟州城，而是绕道而过，直接向离京城更近的三河、顺义等地扑来，初十日这天，后金贝勒阿巴泰和岳託已经直抵顺义城下了。最早赶到京城勤王的满桂部和侯世禄部被派往顺义方面迎敌，两军在顺义城下大战，最后还是明军大败，逃回京城，顺义知县率众投降。扫清外围之后，皇太极的主力部队从从容容地进驻到离京城只有四五十里的通州张家湾。而这时袁崇焕的勤王部队却跟在后金军的后面紧赶慢赶，到十五日总算也抵达了香河县河西务，离后金军和京城都不太远了。

袁崇焕部一路赶来，基本上没有同后金军交过锋，而且他是主持对后金

防务的主帅，现在后金大军突然进入了京畿禁地，京城的官民对他就有了许多怨言，进而又有了许多猜疑。此时迫近敌军主力，袁军中有人主张应该主动出击大战一场，既可以缓解京师之危险，又能够挽回袁军的名誉。但袁崇焕生怕皇太极不同他决战而直接奔袭北京，考虑再三，还是决定先到京城领旨待命。当夜开拔，走南路旱道，十六日晚抵达京城东南，在左安门外扎营。

这几天，崇祯帝不断地得到战报、警报，知道敌军在逼近，却完全没有主张。正好十六日这天，受召进京陛见的孙承宗到了北京，崇祯帝总算有了一个可依靠的人，立刻召见。他问孙承宗："你以为应该怎样保卫京师呢？"孙承宗说："现在情势紧急，守城的人却飢寒交迫，非万全之法。应该整治器械，重加犒赏，以稳固人心。"孙承宗还对守城的具体策略提出了看法。崇祯帝见这位老臣说得条理清晰头头是道，大为欣慰，于是吩咐："卿不要去通州了，就留在京城为朕总督京城内外的守御事务，还可以参与筹划机务。"

孙承宗既然受到这样的信用，当然只能尽心竭力。当晚离开皇宫时，已经将近半夜了，孙承宗立即就对京城的防务进行了一番检查，视察过内城又去察看外城，昼夜不曾休息。

但就在孙承宗忙着视察京城防务的时候，崇祯帝得知袁崇焕领着兵马也到了京城。他对袁崇焕的到来还是非常高兴的，因为有一支实力雄厚的军队来到身边总要感觉安全多了。他也听到特务机构传来过一些流言蜚语。说袁崇焕同后金达成了默契，所以两军共同向西而来，半个多月没有交手对过阵；还有的说袁崇焕早已通敌，这次"奴"军就是他带来的。事实上，袁崇焕部刚到京城，后金的前哨部队也到了城边，从表面看来真像是袁崇焕带过来的。不过崇祯帝对这些小道消息并不太在意，因为说袁崇焕通敌，实在想不出有什么理由。

对于崇祯帝来讲，比较难以处理的是到底由谁来主持京城的防务。昨天刚刚确定了孙承宗，已经通知内阁去铸造临时关防了，但孙承宗手中无兵，到底不如袁崇焕更可靠。经过反覆斟酌，他最后还是决定用袁崇焕，传谕出去：命袁崇焕总统各路援兵。还赐给袁崇焕以下各官玉带、蟒衣，并由户部给袁军发放了粮饷。既然任用了袁崇焕，孙承宗只好让位。当天夜里，崇祯帝再传谕孙承宗，要他仍然去镇守通州。孙承宗弄不清皇上到底是怎样打算的，只能接旨，当夜带领着27名随从出东便门赴通州。那时候京城以东遍地烽火，孙承宗一路疾驰，到了通州已经丢掉了3个人。在孙承宗来讲，去通州主持防务是忠于王事，依旨而行。但他也知道，这时候再去防守通州，对于捍卫京城的意义已经不太大。因为后金的主力早已经越过通州，活跃在京城脚下了。

十一月二十日，皇太极在京城北面土城关立营，所部在德胜门外和广渠门外分别同满桂、侯世禄部和袁崇焕部对阵。袁崇焕部阵容比较整齐，在广渠门外小胜；而在德胜门外的满、侯两部面对的是后金军主力，侯世禄部一战而溃，满桂独自支撑。城上守卫的士卒欲用火炮支援满桂，但计算不准，一炮打到满桂军的核心，满桂被炸伤，其部下溃败，后来退入德胜门瓮城。这样，经过第一天的对阵，明朝佈防在京城外围的两座主力大营就少了一座，除了东南一侧外围尚有袁崇焕军守卫，其他各处基本上只有靠着坚固的城墙死守。

好在皇太极的意图似乎并不在于攻克北京。清人后来传说，皇太极当时对部将们表示：“城中都是些蠢材，要攻下北京易如反掌。但明朝疆域广阔，不是一朝一夕就能崩溃的，拿下北京容易，要守住就难了。不如训练好军队，以待天命。”其实，当时要强攻北京也并非容易。明代的北京城异常坚固，绝非一般州县乃至省城可比，而且明军虽然不成气，毕竟人数众多，不断赶来勤王的部队渐渐达到数十万人，后金军在人数上处

于劣势，当然更无力强攻坚城。总之由于主、客观多方面的原因，后金军以流动骚扰为主，并不认真攻城，这使得京城中的皇帝和朝臣、将军们能够稍稍喘一口气。

二十三日，城外敌军的攻势稍缓，崇祯帝在平臺召见了袁崇焕和满桂两位援军大帅和他们的部下祖大寿、黑云龙等人。崇祯帝对各位将帅说了许多慰劳辛苦的话，还让满桂脱掉上衣，察看了他身上的创伤。袁崇焕反覆申明自己的部队连日来行军作战，过于疲惫，要求允许进城休整。崇祯帝却出于种种顾虑，没有同意。他反过来敦促袁崇焕努力击敌，至少要把敌人赶到离京城远一点的地方去。袁崇焕对此只是含煳其辞，不做明确保证。

这次召对令崇祯帝很不愉快，对于袁崇焕的种种不满和怀疑也都重新勾了起来。朝廷给了他那样的特殊信用和特殊权力，甚至不惜牺牲自己的尊严容忍他擅杀大将，就是要他保障东北方面的安全，进而恢復全辽，彻底根绝隐患。但此时后金的兵马非但没有被抑制、被削弱，反而破天荒地开到了天子脚下舞刀弄枪，算起来责任最为重大的还不是兵部的主官，而正是袁崇焕。而且就是这个袁崇焕，勤王救驾姗姗来迟，来了之后又逗留不前，不肯同敌人激战，只是一味地强调自己兵困马乏，却不想一想皇帝连日圣心焦灼的痛苦。难怪京城中人士一直都在传说袁崇焕是同敌人勾结好了一路前来的，是个居心叵测的大汉奸。看来真是有不少疑点。他同毛文龙并没有冤仇，为什么上任不久就要冒着极大的风险把毛杀了？听说他早在天启年间就同敌人吊庆往来不断，是不是有什么密谋？这次京中抗敌，各军都伤亡惨重，为什么只有他的部下很少损失？眼前正是国家需要将士戮力杀敌的时候，他为什么一而再，再而三地要求进城休整？

这些不满和疑团在崇祯帝心中慢慢地发展着，终于在一个时刻爆发了。

这些天来皇太极过得极从容，并不急着取得什么决定性的军事胜利，在城北战胜之后，看看一时也难攻坚，就绕道京城南面，一边围歼着小股的明军，一边在郊野上骑射围猎，简直像是在组织一次大规模的旅游。二十九日晚上，一名先前被后金军抓获的明宫太监趁着后金营中只顾喝酒玩乐，看守不严，逃脱出来。他还给崇祯帝带回一个极其重要的情报：在临逃出来之前，他亲耳听到敌方的一个副将对人说，我们同袁巡抚有密约，大事立即可成，马上就可以撤兵了。

后来人们从清方史料里面得知，这全是皇太极下的一个圈套，是故意要让崇祯帝中这个反间计。这条妙计显然是从《三国演义》里"蒋干盗书"一节学习来的，那时候后金的君臣将帅们确实是把《三国演义》当作兵书来读的。这条从小说中化出来的计谋并不算很高明，但对付正在满腹狐疑的崇祯帝却已经足够了。

崇祯帝听到那个逃回的太监的情报之后，连夜做了安排。他没有同任何人商议，（怕走漏风声？）第二天（十二月初一日）再召袁崇焕、祖大寿、满桂、黑云龙等进宫，说是商议粮饷问题。袁崇焕从军中直奔平臺，发现皇上突然变了脸。崇祯帝先责问袁崇焕为什么擅杀毛文龙，（他总是忘不了杀毛文龙这件事）又责问他为什么逗留拖延不与敌力战。袁崇焕还没来得及认真回答，就被早已佈置好的锦衣卫校卫捆绑起来，抓进了专关天子钦犯的诏狱。崇祯帝几天来一直比较倚重的内阁大学士成基命此时在旁，感到突如其来，连连叩头请皇上慎重从事。崇祯帝恨恨地说："什么慎重，不过是因循守旧，能办好事情吗？"成基命说："现在兵临城下，非比他时！"崇祯帝全然不理。

值得注意的是，不论是在抓袁崇焕的当时还是后来对他审判的时候，明方的官私文书从来没有提到过脱逃太监告发一事，官方给袁崇焕拟定的多种罪名中也没有这最根本的一项：通敌叛逆。这是不是说明崇祯帝在

中过皇太极的圈套后又有点反省，有点疑惑呢？但不论如何，他既然在围城最危险的时候逮捕了援军主帅，就绝不能再自认是抓错了人。因此袁崇焕的下场很惨。

袁崇焕突然被捕，惊呆了他部下的将士。宁远总兵祖大寿是袁崇焕一手提拔起来的亲信，此次一同陛见，看到袁崇焕被逮，吓得浑身哆嗦。出城后把袁督师被逮的事向全军传达，全军譁然。于是祖大寿和何可纲（袁崇焕的中军）也不再管什么守城勤王，带着部队一路向东，逃到了山海关外的老根据地。这样，不但京城守备部队中少了最重要的一支，而且这支部队是否会叛变投敌也很难说，本来就坏透了的形势于是更坏。

这时候还是在辽东极有威信的老臣孙承宗起了作用，他主动派人招抚关外各部，并建议朝廷用温和态度加以抚慰。崇祯帝为修补残破，也只能依靠孙承宗，顺势命他移镇山海关，实际上是由他顶替袁崇焕任辽东前线总指挥。京城防务方面也得有人主持，只好用满桂，以其总统各路援兵。

虽说是勉强有了个安排，京城里因为袁崇焕被逮和祖大寿等部逃亡而造成的人心惶惶的气氛却一时难以安定，平日运行有条不紊的各衙门好像也乱作了一团，不断髮生事故。兵部对于先后赶到京畿一带的将近20万各地援军一时根本不知怎样调派，于是朝令夕改，左右支应，把一些援军弄得摸不着头脑。山西巡抚耿如杞带着5000人入援，第一天被安排守京东通州，第二天又被调到京北的昌平，第三天再调京南的良乡，每天赶路100多里，却得不到给养。又饿又累的山西援军忍无可忍，在郊区大肆抢掠。崇祯帝得知后大为震怒，把耿如杞和总兵官张鸿功投入了监狱，后来全部杀掉了。那耿如杞在魏忠贤统治时期因为对魏忠贤不恭而被判处过死刑，崇祯帝即位后才得到平反，并升任巡抚，这一次却很冤

枉地被杀了。

户部为了援军的粮饷问题也一直在头痛，东挪西凑，仍然漏洞百出。工部应该为守城部队提供守城武器、器械，但一时哪里备办得齐呢！皇帝又发了火，把工部尚书张凤翔和工部四个司的郎中（司长）全部抓了起来，其中三个死在了狱中。连刑部也跟着出事，在人心惶惶的一片混乱中刑部大牢失于防范，竟让170多人集体越狱逃了出来，在准备跳城远遁的时候才被抓获。崇祯不断听到这些乱七八糟的坏消息，精神几乎崩溃，把自刑部尚书乔允升、侍郎胡世赏以下直至提牢主事（刑部监狱长）都抓到刑部自己的监狱里。

在一片混乱中，崇祯帝唯一的希望是敌人赶快离开京城远一点，以便让自己过于紧张的神经稍稍得到一点松弛。为此，他又不断催促满桂出城迎敌。满桂明知这些杂凑起来的部队战斗力太差，守城还勉强可用，出城野战必定凶多吉少，也曾找藉口一拖再拖。但皇帝不断地催，还拿袁崇焕的先例来威胁，满桂最后只好出城一战。这时候后金军的主力在京南永定门外一带，满桂率城中各部援军于十二月十六日出永定门扎营，第二天一早就同后金精锐骑兵展开战斗，终于败了，满桂力战而死，全军覆没。

这时候，京城里只剩下京营的卫戍部队，城外面尽是些被兵部调得团团乱转的援军，形势之坏，前所未有。崇祯帝连他的20大寿（19週岁生日）也顾不上庆贺，早朝和文华殿的议事也暂时免了，传旨让人准备大批麻袋，让太监和文武百官进献马匹。官员们开始传说：皇上这是准备要弃城逃跑了。有些官员为此还专门上疏请皇上正常视朝，以安定人心。

崇祯帝是不是真的想要逃跑不得而知，但捱过了崇祯三年（1630）的新

年之后，危险却自己过去了。皇太极出兵已有数月，抢掠的人口财物也已经多得不好输运，新春一过，决定班师回家，于是过通州，克香河、永平、迁安、滦州等府、州、县，绕过山海关从长城外面回到辽东。

后金这次入塞攻明，基本上是所向披靡，兵将损失甚微，却掠夺了大批银钱、粮食、牲畜、器械，还有大批人口，其中包括一些投降的明朝中下级官吏和生员、举人。皇太极把这些人看作是一种重要的资源，注意对他们的任用。可以说，这次入塞大大加强了后金的实力。

明朝在这次军事对抗中则损失惨重，京畿及其附近两府十几个州县遭到蹂躏，被歼灭的部队达数万人。死于战场或是被迫自杀的高级官员和将领包括1名侍郎、1名巡抚、3名总兵官；被崇祯帝自己杀掉的更多些，有兵部尚书王洽、督师袁崇焕、蓟辽总督刘策、山西巡抚耿如杞、总兵官张士显和张鸿功等一批高级文武官员；因为带队勤王发生兵变被吓死的有延绥巡抚张梦鲸；判处死刑后来被赦免改戍的有大学士钱龙锡（因袁崇焕案牵连）、刑部尚书乔允升、左副都御史易应昌（为拟乔允升罪过轻）；还有许多人被下狱、被罢官。因此，后金军的入塞对于明朝来说，不仅造成了经济上的破坏、军事上的破坏，还造成了人才上的巨大破坏。

此后，后金（清）军又一次接一次地进入内地，每次入塞实力都进一步加强，而明朝在一次又一次打击下实力不断削弱。等到清军第6次入塞的时候，崇祯皇帝和他的明王朝都已经寿终正寝，不復存在了。

这次己巳之警给明朝造成的最大损失还在于丧失了一个杰出的边防人才。袁崇焕的5年復辽之说虽不免荒诞，但从当时情况来讲，在辽东边防上最有胆识、最有能力、最有威信的统帅仍然是非袁崇焕莫属。也正因为这样，皇太极才会不怕麻烦地使用反间计。崇祯帝却中了计，而且

把结局弄得很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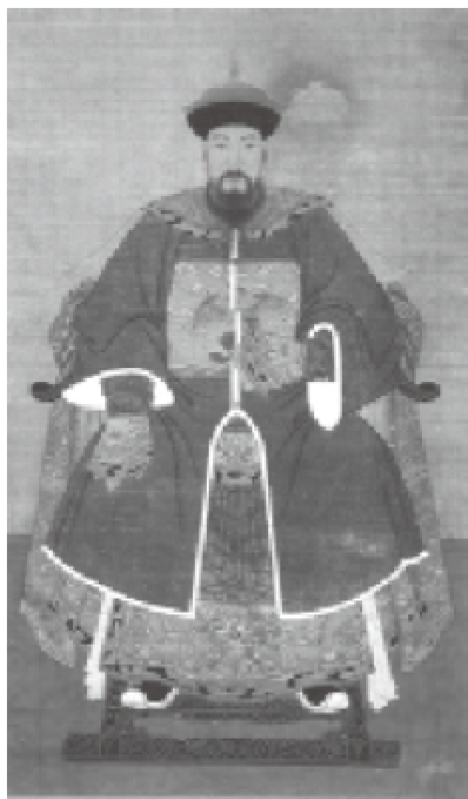
崇祯三年（1630）八月，崇祯帝在平臺召见九卿科道诸臣，宣佈袁崇焕的罪状和对他的判决：“袁崇焕不能效力重託，一味欺瞒君上，私自购买军粮而助敌，为与敌人议和而擅杀大帅，纵敌长驱畿辅，顿兵逗留不战，又遣散四方援军，及至兵临城下，反而一再要求入城，种种罪恶。命刑部公开执行磔刑，依律家属十六岁以上处斩，十五岁以下给功臣家为奴，今从宽只将其妻妾子女及同胞兄弟流放二千里外，其余释放不再追究。”

袁崇焕当天就被处决。京城百姓都以为他是招敌入寇的大汉奸，恨之入骨，不但前来围观，而且争着要吃他的肉。行刑者于是有了生意，每割下手指大一块肉，卖银一钱。百姓们蜂拥而上，一边骂一边吃，一会儿就把袁崇焕的肉吃光了。行刑用了半天时间，据说“皮肉已尽，心肺之间叫声不绝。”

三 西北烽烟

崇祯三年（1630）正月，后金的部队回师向东，京城的明朝君臣们才算松了一口气。但几乎就在同时，西北方向却又传来了坏消息。

这个月，西北各处的农民起义军在陕西省延安、庆阳两府的延川、宜川、青涧、安化（今甘肃庆阳）以及西安府的韩城等地攻击官府，抢掠官仓，甚至聚集大队人马围攻县城。陕西三边总督杨鹤一面命手下最得力的官员参政洪承畴四处进剿，一面派人对农民军劝说招抚，可是，此处方平，彼处又起，要平息这西北的动乱看来真是遥遥无期。



洪承畴

也是在这年的正月，从西北调集起来准备进京勤王救驾的两支部队又发生了譁变，更使得局势雪上加霜。其中一支是延绥镇（驻今陕西榆林）军，由延绥巡抚张梦鲸和总兵官吴自勉率领。士兵们因为对官长剋扣军粮不满，在半路上集体开小差，整个部队一下子全然溃散。张梦鲸又怒又怕，死在了路上。那些逃亡的士兵原本是陕西人，就都逃回了陕西，逐渐同当地的农民军合流起来。另一支譁变部队是甘肃镇（驻今甘肃张掖）军，由甘肃巡抚梅之焕和总兵官杨嘉谟统帅。这支部队出发晚，崇祯三年（1630）正月才走到安定县（今甘肃定西）。长官不断督催着士兵赶路，士兵们痛苦不堪，聚众杀了参将孙怀忠等军官，抢了饷银，自行返回驻地，其中不少人后来也都成了暴民。

事实上，西北地区的动乱已经闹了许多年。万历末年，陕西各镇赴辽东作战的部队在战场上大溃败之后逃回老家，但不敢归伍；各地的长官和军官把这些残兵看作破坏性力量，也不让他们归伍，而是四处剿杀。这些败卒于是在各处落草为寇，先是抢劫富户，继而攻击官府。这时又正遇上西北地区连年发生严重的自然灾害，百姓穷困已极，飢饿已极，只好铤而走险，纷纷参加到造反的队伍里。这种情况到天启末年已经非常严重了，在陕西行省8府4镇的广阔地域里，到处都有小股的暴动武装在活动。

当崇祯帝兴高采烈登上皇帝宝座的时候，他不可能想到，从人类与环境的关系这个角度来看，他所接手统治的帝国也正处在一个最危险的时期。明帝国经过200多年的生息发展，人口已经从建国时期的6000万左右增长到差不多2亿。这个数字从万历后期一直维持到天启末年，基本上没有大的变化。也就是说，在崇祯帝开始他的统治的时候，帝国的人口发展曲线正好处于巅峰状态的一个平臺的边缘。（此后由于天灾人祸，人口开始逐年下降。）这个有史以来最巨大的人口数量（几乎相当

于当时世界人口总数的1/3）需要同样数量巨大的物质资源来维持生命，最基本的需求就是粮食。但也正是在这个时期，自然条件的变化却恰恰十分不利于农业生产。我国的气候从14世纪起逐渐由暖变寒，到17世纪刚好发展到顶点。当时江南一带农作物的生长期比现在要短10天，北京附近则要短2周左右。这种严寒的气候对于农业，特别是粮食的生产显然造成了相当严重的危害。祸不单行，这个严寒的时期又正好赶上近500年来3次持续干旱中年头最长的一次，特别是黄河流域，出现了罕见的接连十几年的大旱。

严寒苦旱造成农业急剧减产，众多的人口却需要大量的粮食来维持，尖锐的供需矛盾就造成了全国性的大饥馑。这种情况是从万历末年就开始了的，但最初社会尚能承受。而当歷年的积存逐渐告罄，人民的肚子越来越空，正好到崇祯初年的时候，全国性的饥荒已经成为一条凶勐的怪兽，一面狂虐地吞噬着大批人民的生命，一面也把崇祯时代的社会危机推向最险恶的境地。

由于当时社会生产力的限制，这种人口膨胀与农业萎缩相结合的危机也许根本就无法克服。但如果有一个廉洁而有效率的政府，能拿出一套比较可行的救灾保民稳定社会的办法，或许至少可以缓和或是延迟这种危机。而崇祯时期的政府却又正好是一个极其腐败又毫无效率的政府，自最高统治者崇祯帝以下，直到各级官吏，既弄不清帝国正面临着一种什么样的危机，更从来没有通盘考虑过对付危机的对策。他们只知道头疼医头、脚疼医脚，最后是眼睁睁地看着帝国同他们一起灭亡。

全国性的大饥馑又以黄河流域最为严重，特别是陕西、河南两省尤为惨烈。明代的一级行政区分为两京（北京，直隶地区大体相当于今河北省和北京、天津两市；南京，直隶地区大体相当于今江苏、安徽两省和上海市）、13省，13省中又以陕西地域最为广大，大致相当于今天的陕

西、甘肃、宁夏全部和青海、新疆的一部分，包括着明政权统治的整个西北地区。这里土地贫瘠，民风强悍，在明代是个强兵勇将的摇篮，也是暴动作乱的渊薮。

西北地区自天启中叶起就连年大旱，有些地方颗粒无收，到了崇祯初年，灾情已经严重到了令人髪指的地步。行人司行人马懋才曾经向皇帝陈奏过自己家乡延安府安塞一带的灾情：“（崇祯元年）八九月间，乡民争相採集山间蓬草而食，其子粒类似糠皮，味道苦而涩，吃了仅可以勉强不死。至十月以后而蓬草食尽，则剥树皮而食，各种树中只有榆树皮质地稍好，掺杂其他树皮，也能稍稍延缓生命。迨年终而树皮也吃尽了，只能挖掘山中的石块而食，石头性冷而味腥，吃一点就觉得饱，但数日以后则腹胀下坠而死。”“最可怜的，如安塞城西有一个粪坑，每天必有几个弃婴被扔在里面，有的哭号喊其父母，有的吃那里的粪土。到第二天，弃婴全都死了，又有新的被抛弃。更可怪异的，年幼童稚及独行者一出城外，就会全无踪影。后来见到城门外有人用人骨作柴，煮人肉为食，才知道以前失踪的人都被吃掉了。而吃人的人几天以后也会面目赤肿，内发燥热而死。于是，死尸横陈，臭气熏天。县城外掘了几个大坑，每坑可容纳数百人，用来掩埋死者遗骸。臣来的时候已经装满三坑有余，而离县城稍远没有掩埋的又不知有多少。小县如此，大县可知；一处如此，他处可知。”在如此悽惨的情况下，人民只有造反一条路可走了。

何况，除了天灾以外还有人祸。各级官府并没有因为连年饥荒就停止徵收赋税，由于辽东军事局势一直十分紧张，各地供应沿途兵马和国家的临时徵派名目繁多，比平时反而更加苛重。一位在崇祯初年做过知县的官员回忆各种临时徵派时说：“突然得到一件公文，要取豆米几千石、草几千束，运到某营交纳。突然得到一件公文要买健骡若干头、布袋若干

条，送到某营交纳。突然得到一件公文，要制作铜锅若干口、买战马若干匹，送到某营交纳。所有这些都不说明应在哪项钱粮中开支，后日怎样报销核算；只是说迟误了就以军法论处。州县官吏不敢拖延，只能分派到民间。所以私派多于正赋，民不堪命，怨声四起。”一些州县的酷吏只要完足钱粮，根本不顾人民死活，每当催比赋税的时候，总是差役四出，抓人打人，有些地方县衙大堂竟然血流满阶。连基本生存都没有保证的老百姓负荷不了沉重的赋税，只能要么逃亡，要么死亡。但官府仍要征敛，就要由没有逃没有死的人户包下来，于是负担又要加倍，剩下的人户也只能或逃或死。如此恶性循环，许多地方都出现了赤地千里的局面。死者长已矣，活着的人为了摆脱迫近死亡的命运，只得揭竿而起。

就在崇祯帝即位的那一年，陕西澄城县的饥民因为不堪飢饿和知县张斗耀的残酷催科，用墨涂黑了脸，在山上聚众起义。饥民的首领高声问：“谁敢杀张知县？”众人齐声回答：“我敢杀！”这样大喊3遍，算作誓师，而后蜂拥着闯进县城，一直冲进县衙。知县张斗耀正在公堂催比税收钱粮，见到暴动的农民们手执利器冲进来，吓得掉头逃进后衙住宅。农民们跟着赶了进去，把张斗耀用乱刀砍死。澄城农民这次杀死朝廷命官的暴动，通常被看作是明末农民大起义的正式开端。

在澄城暴动之后，西北的农民起义更加风起云涌。崇祯元年（1628）冬，西安府白水县王二纠合山西的逃兵举行暴动，抢掠了蒲城县的孝童镇和韩城县的淄川镇；几乎与此同时，延安府府谷的王嘉胤、宜川的王左挂、安塞的高迎祥，巩昌府成县、两当的王大梁，都聚众而起，攻城陷地，只旬月之间已经各自发展成数万人的队伍。

这样涉及地域极其广大的大规模暴动不能不引起朝廷的高度重视了。自崇祯二年（1629）起，崇祯帝和他的臣子们开始把西北的“流贼”当成一

件很重大的事情，认真看待，也想认真解决。这年三月，专门负责西北方面军政事务的陕西三边总督武之望死在任上，朝中推举继任者。因为解决民暴的事情过分棘手，朝中的官员互相推诿了好一阵子，最后才选中了左副都御史杨鹤。杨鹤曾做过南赣巡抚，做官清谨，但并没有什么军事谋略。崇祯帝在他赴任前特别召见了他，问他对于平定西北有什么打算和安排。他只是说："清慎自持，抚恤将卒而已。"到任之后，他发现手下一名道员洪承畴果决干练，就把指挥军事行动的事情主要交给了洪承畴。

洪承畴字彦演，号亨九，福建南安人，生于万历二十一年（1593），万历四十四年（1616）进士，做过浙江提学道，后来转升为陕西参政道。他本来也是一介书生，但生逢乱世，一向热心于钻研军事。他校订过古代军事文献精华《武经七书》和明朝名将戚继光着的《南北平定略》等一大批军事着作，而且讲求理论与实践的结合，用兵作战常有过人之处。他在杨鹤麾下主持剿杀农民军，取得过不少次胜利，因而在崇祯三年（1630）正月被提升为主管陕北地区军政的延绥巡抚，年纪轻轻就当上了专阃开府的封疆大吏。洪承畴其貌不扬，并不显得很有才力，但勤于职守，与士卒同甘共苦，在陕西军民中颇得人心。据说有一次行军缺粮，附近乡民争相把口粮借给他的部队，一个老妇人揹着粮食跌倒在路上，还向人说："我为洪军门送干粮来了。"

洪承畴和西北地区的其他几位巡抚、总兵带着部队东挡西杀，哪里有农民暴动的警报就到哪里去扑灭，几乎每天都在向朝廷发出取得军事胜利的捷报。但农民起义有大批饥民和溃兵作为源源不绝的生力军，却越剿越多。在陕西官军的逼迫下，从这一年的春天起，农民军又纷纷渡过黄河，把活动的范围扩大到了山西。而山西各地同样有饥民飢军，于是风从响应，原来一省的动乱变成了两省的动乱。

杨鹤见到痛剿总是无效，渐渐明白这无止无休的动乱“总因饥荒之极，民不聊生”，只是调集大军四处围剿，“流贼”是“诛不胜诛”的。何况他的手中也并没有足够的军事力量，特别是崇祯二年（1629）末京师戒严后，调各地兵马勤王，西北各镇部队调的调，溃的溃，兵力更少。为此他提出以抚为主的平定策略，并且率先实行。在崇祯三年（1630）春，他先后在陕北招降了王虎、小红狼、一丈青、掠地虎、混江龙等农民军首领，给他们发了免死牒。一度农民军受降相当踊跃，连大名鼎鼎的王左挂也在绥德受了招抚。但受抚的农民军却常常不能稳定，因为他们拿了免死牒解散回乡之后，等待他们的仍然是大饥荒。为了求食，这些受过抚的农民军只得再度起事，于是“旋抚旋叛”，没有宁日。

这种情况表明，抚要抚到实处，才能有效。朝廷中一些官员也认识到，只有充分地赈灾救济饥民，才能从根本上平定这场内乱。兵部职方司郎中李继贞在崇祯三年（1630）十月上疏，请求赈济延绥。疏中说：“皇上用数万金钱救活数十万生灵，是无量的功德福泽；活数十万生灵而使之恢復农桑故业，以后收回的赋税，又不止数十万金钱，是莫大的利益。”这个动议很有道理，但因为要调用数十万金钱，却也让崇祯帝十分头疼。

自从崇祯帝接掌大权以来，一遇到哪里需要用钱，他的眉头就止不住要皱成一个疙瘩。他的帝国的财政情况实在是前所未有的坏。自从万历末年对后金作战以来，王朝的国防开支大大增加，到崇祯初年，全国的额设兵力已有50多万，额定常项军费开支粮饷每年多达白银1530余万两，这还不包括临时战事耗费的大量资金。但明王朝的基础财政收入，即户部徵收的土地税、户口税以及盐税、关税等项基本税，每年定额才只有1461万两多一点，就是说以全部正税用作军费还略有不足。但在实际上，除了军费的开支以外，庞大的官僚行政支出，庞大的宗室消费支

出，还有庞大的皇家宫廷支出，都要国库出钱。入不敷出，这是任何人从账面上一眼就能看出来的基本财政情况，在算账方面相当内行的崇祯帝对这种情况更是一清二楚。

要解决巨大的常年财政赤字问题，只能老老实实地开源节流，可惜在这方面余地却非常有限。在开源方面，前朝的皇帝们已经把能开的门路开得差不多了。首先能想到的自然是从百姓身上多收一些税，就是所谓“加派”，这在万历末年，为了辽东用兵已经用过。当时接连三次增加过税收，合计每亩加银9釐，全国总共增加收入520万两，称为“辽饷”。因为辽东一直没有平定，“辽饷”也就没有废止，一直在徵收。但“加派”等于剜肉补疮，崇祯初年继续徵收前朝定下的“辽饷”，但对于增加新的“加派”，统治集团一时还有些犹豫不决。“加派”以外，还有打各级官僚主意的“捐助”，其实就是对各级官员强行摊派，这个办法当然会遭到官员们的强烈反对，实行起来困难重重。

开源无计，节流更难。各项开支要么是出于现实的急需，要么是祖宗传下来的定例，很难凭空减少甚至取消掉。但崇祯帝还是想尽办法，能省就省。崇祯二年（1629）二月，给事中刘懋建言对全国驿站进行整顿，裁撤冗繁役卒，认为每年可以节省下数十万两银子。正为开支问题一筹莫展的崇祯帝见到这个奏章大为开心，立即升刘懋为兵科左给事中，命他专门负责整顿驿站的工作。

明末的驿站系统也同其他各个系统一样，确实已经腐败混乱之极，并非没有可以整顿之处。但这个烂摊子是烂在根子里，仅仅靠发几个文件，报一下账目，哪里就能整顿清楚呢？刘懋既然夸下海口，说是能节省几十万两白银，只能兑现，因此所谓的兴利除弊最后就变成了消减经费，裁减冗卒也就成了单纯的减少驿卒收入。这项措施实行下来，据说各省共节省银685720余两，对于整个的财政亏空来说实在是杯水车薪，解不

了大渴。但各地的驿站却由于这次裁扣而大伤元气，许多驿卒因为难于维持生计而逃亡，其中不少人又加入了农民军的队伍。在逃亡的驿卒中有一位陕西米脂的汉子，名字就叫李自成。十几年以后，就是这个当年驿站的马伕率军攻陷了北京，推翻了明王朝。这样的后果，崇祯帝在整顿驿站系统的时候是绝没有预料到的。

其实在刘懋之前，已经有人提出过裁撤驿站之议，起因却透着几分荒诞。有个御史叫作毛羽健的，因为在京城私纳了一房爱妾，被他的妻子听说了。妻子就“乘传而至”，就是坐着驿站的车马来到京城，打破了毛御史的一场春梦。毛羽健痛愤之余，迁怒于驿站，才上疏力言驿站之害，刘懋只是跟着附和而已。当时谁也不会想到，一场妻妾争风吃醋的闹剧竟然会最终导致帝国陷于灭顶之灾。

崇祯帝自己也在带头节流，在宫中朝中提倡勤俭节约、艰苦朴素，尽量减少一切开支。朝中惯例，每年端午节入夏皇帝要送给朝臣每人一把扇子，以示关怀。但崇祯帝即位后立即把这项开支省了，朝臣们要用扇子，只好自己去买。类似这样细微已极的小型支出，崇祯帝减免项目颇多。他自己也以身作则，至少按照当时作皇帝的标准来说，他的生活还是相当俭朴的。皇帝的衣食用度本来都是典例上有规定的，每年消耗资金不可数计，崇祯帝即位后因为府库空虚，也由于他生性较为节省，把可以裁减的项目都尽量裁减了。在饮食方面他并不太喜欢那些珍奇的山珍海味，爱吃的大多是家常食品，像夏初用新麦穗制成的“捻转儿”，用莴苣叶裹米饭肉丁的“包儿饭”，六月的新藕叫作“银苗菜”，五月的马齿苋叫作“长命菜”。明宫中是一个美食家的天堂，各个时令都有应节的食品，而且大多源于市井，到了宫里，以大俗而见大雅。崇祯帝自小受宫中习俗的薰陶，喜欢清新可口的宫中家常饮食，品味上反而高出只知道追求奢华排场的官僚贵戚们许多。他唯一的一个“高级”嗜好是爱吃燕窝

羹，每日不辍，宫中极品都是进自南洋，所费自然不赀。

不过，一位皇帝的家常饮食费用常常也会大得惊人。有一次崇祯帝突然想起要吃市面上卖的元宵，派人去买，经管太监后来报账，一碗元宵竟要一贯钱（约合一两银子）。崇祯帝同意报销，但告诉经管太监，当年在信王府的时候一碗元宵只要三十文（其实已经大大超出市价）。管事太监吓出一身冷汗，但过后还是照样里克外扣——以皇帝的高贵身份，当然就得吃一两银子一碗的元宵。据记载，崇祯帝每月的伙食费用，除去厨料等杂项之外，仍有1046两白银之多，周皇后每月360两8钱，田、袁两妃各164两，皇太子154 两9钱，他的另外两个儿子定、永二王各120两，这样仅崇祯帝一家7口每月的伙食费就高达2000多两，大概相当于平常百姓人家几辈子的消费。

在穿衣上他也不很讲究，而且讨厌繁缛的文饰。除了礼仪上需要的时候不能不穿规定的龙袍，平时他愿意穿着素色袍服。虽然依照旧制皇帝的内外衣裳都是穿过一次就不能再用，崇祯帝却觉得太可惜，经常穿下过水的浣衣，特别是内衣，甚至要穿多次。但内府的织造衙门从来只提供一次性消费的衣服，只注意外观，不讲求结实，袍服穿过几次之后很容易破损。有一次崇祯帝参加经筵，发现袍袖有一点破了，颇为尴尬地用手把破处掖了起来。讲经的讲官正巧看到，就说：“衣服破敝，虽然过于俭省，却是美德，何必讳之？”崇祯帝才大为高兴起来。此后变本加厉，下令袍服大袖一律只留一尺五寸，以节约绸布，不但自己如此，而且定为天下共式。明朝的士大夫习惯于宽袍大袖，至此也不得不跟着皇帝一起实行紧缩政策。

他还把日常使用的金玉器皿改为瓷器，后来又用漆器，因为是木胎，就算是木器了。这当然只是一种形式上的俭省，因为瓷器少不了景德镇的极品细瓷，甚至是宋代的官、均、哥、定，漆器大多是重染精雕，即使

在当时价值也不在金玉以下。

在皇帝作风的影响下，宫廷里也一改浮华旧貌。周皇后在夏天带头穿不加绣饰的素白衫，嫔妃宫女们也纷纷效法，为了跳色，又在白纱衫里面衬上绯红的里衣，红装素裹，清新喜人。周皇后甚至还在宫里组织过一次大生产运动，让江南织造处给宫里送来一批纺车，亲自督促宫女集体纺线，宫女们却屡学不会，她一怒之下把纺车都当噼柴烧了，不了了之。宫中女眷本来时行浓妆，但崇祯帝却不喜欢，说是“浑似庙中的鬼脸”。周皇后、田贵妃都是天生丽质，皮肤极好，就干脆不施脂粉。袁妃以下不敢效颦，却也一律是薄薄的粉黛，尽量追求贴近自然。应该说，崇祯帝自小成长于侈靡俗艳的深宫，却能够不但性情上有节俭的一面，在审美情趣上也颇为清雅，实在是很难得的。

但仅仅用裁驿卒、省宫费这些小打小闹的方式，无论如何也解决不了巨大的财政危机。何况宫中省减下来的费用仍然是落到皇帝自己的腰包里，一分一釐也没有提取用于国家财政支出。崇祯初年颇有一些官员打过皇帝内帑私财的主意，崇祯帝却总是哭穷说：“朕在宫中极力节省，仍然入不敷出。如果真有余钱，朕怎么会吝惜呢？”既然捨不得自己出血，他在左思右想之后，还是把眼光放在了“加派”上。他深知，绝大多数朝臣都是反对“加派”的，理由很简单：民力已竭，再加就将不堪于命了。可是在财源枯竭、国用急需的情况下，他却只有“加派”这唯一的办法了。按照他一贯的工作作风，所有明知是要受到舆论谴责，不那么理直气壮的决策，他都不愿意亲自提出来，总希望先由能同他默契的贴心大臣提出，作为抵挡攻击的盾牌。这一次给他充当盾牌的是不久前被他特别提升起来任兵部尚书的梁廷栋。

梁廷栋在崇祯二年（1629）后金军入塞的时候还只是个小小的参政道，因为在己巳之警中表现突出，在两个多月里接连升任顺天巡抚和蓟辽总

督，崇祯三年（1630）正月又被任命为兵部尚书。在明代歷史上，像这样破格提升的实在是绝无仅有。这体现了崇祯帝在用人方面有一种打破传统不拘一格的锐气，也让梁廷栋感激涕零，决心要誓死报效皇上的知遇之恩。为了报效皇恩，当然就不惜为皇帝做一次挡箭牌。崇祯三年（1630）十二月，他不顾群臣的非议，上疏请求再增加“加派”数额，以解决财政危机。

樑廷栋是一个头脑比较“清醒”的官僚，他不但说出了皇帝想说又不好意思说的话，而且为“加派”制造了一套理论根据。这个理论的出发点相当惊人，就是：即使再增加“加派”数额，人民的税赋负担也并不算重！

仅仅从账面上看，明朝人民的负担确实不能算重。上面讲过，明末正税额定每年是1460万两左右，其中还包括相当一部分盐税、关税等商业税收。即使对商业税忽略不计，如果按纳税地亩数算（当时纳税地亩数约为5.8亿亩，全国的实际地亩数比这个数字要多），每亩田地额定税平均只有2分5釐白银（约合铜钱25枚）或是相应数量的粮食。如果按人口负担算，当时全国人口大约2亿，人均负税也不过7分白银。加上前朝“辽饷”和拟议中再加的“辽饷”共685万两，人均负税也才白银1钱多一点。这样的税率不论是在中国歷史上还是同世界各国的情况比较，都是相当低的。

可惜人民的实际负担情况却远非如此。造成实际负担加重的主要原因是杂项钱粮太多，所谓的杂项钱粮包括合法的徵派，也包括不合法的或是半合法的勒索。明朝正税以外的赋税门类繁多，张居正实行一条鞭法的时候清理过一次，但以后重新蔓延，各类杂税名目新奇，负担沉重，远远超过正税。此外，明代税制又极为僵化，一个行政单位的负税额几乎是百年不变的，如果出现什么重要的影响税负的情况，仍然照旧不变。例如歷代亲王们都被朝廷赐予大量土地，像崇祯帝的叔叔福王和瑞王，

各自得到的赡养田是2万顷。所谓赐赡田2万顷，就是每年把2万顷的田租交送王府，这份租税并没有具体人负责出，而是分摊给各省各县，成为当地人民的一项特别负担。但不论哪个地方负担了多少这类额外钱粮，国家的正额赋税一律照旧。这样，有些地方的实际税额已经10倍于正税了。

更多的额外负担是非法的或半合法的勒索，例如各种临时的私派及已经成为定例的“耗羡”。所谓“耗羡”是地方政府在正项税差钱粮之外增加的部分，名义上是为了补充徵收转运时造成的损失，实际则主要用于中饱各级官吏的私囊。私派更是毫无定制，各级官吏“有的假借军兴而私加，有的假借增饷以擅派，有的因工程修筑而巧立名目，有的借解运税粮而加倍徵收，或是设立杂项开支，或是藉口费用不足，凡设置一个项目，都要增收数十倍”。

由于整个官僚集团消费量极大而国家发给的俸禄却极低，通过各项非法或是半合法的私派加徵来获取金钱实际上是养活这个官僚集团的基本方式。这项不走国家财政账目的鉅额钱粮当然全部是由老百姓交纳的，是没有加派之名却有加派之实的沉重负担。樑廷栋的“加派”理论就是针对这一点提出的：如今百姓虽然穷困，却不是由于有加徵的辽饷才穷；一年里面暗中加派的实在不知其数。例如州县官员进京朝觐接受吏部考核，重新任命，最少也要花费五六千两银子打点有关部门，这些钱财全部出自百姓身上，等于全国选任一次知府知县，就在暗中加派了几百万两。巡抚到地方缉访，收到的馈赠谢仪多的有两三万两白银，这些钱同样出在百姓身上，等于国家派遣一次巡方大臣，又在暗中加派百余万两。

樑廷栋的理论是：既然百姓们被各级官吏在暗中蒐括去的钱财远远高出了国家的正宗赋税，为什么国家不能把这部分钱财中的一部分转移成国

家的正式收入呢？他提出的具体办法包括两个方面，一是肃贪，让官员减少对百姓的暗中蒐括；二是加派，由国家正式提高税额。这个思路表面上看来是很清楚的，也很对崇祯帝的胃口。因而崇祯帝经过同户部及兵部的磋商之后，就在这年年底正式推出了增税方案：提高“辽饷”定额，由原来的每亩平均9釐，增加到1分2釐，每亩增加3釐，全国每年共增收165万多两。

在“加派”方面，崇祯帝做得相当雷厉风行，后来军费仍然不足，“加派”也就一加再加，那是后来的事情。但在如何通过肃贪来减轻人民负担方面，崇祯帝却并没有立即拿出什么切实可行的举动。因此，不论数额多少，加派都给本来已经负荷沉重已极的天下百姓又加重了新负担。何况，在新增辽饷165万这个数字后面，又不知有多少官吏在增加徵收、转运、损耗等等项目的费用，以中饱私囊。人民的负担又要数倍于165万。

新的“加派”果然立即遭到许多朝臣的反对，人们不但背地里对这个决策深为不满，有些人还公开对此进行了批评。给事中吴执御上疏所言比较有代表性，他直接就把“加派”称作“剜肉医疮，去皮附毛”，认为绝对是个下策；即使非出此下策不可，也只能暂行一年两年，而且应该向百姓说明年限，免生是非。他的这些认识都不错，但崇祯帝需要解决的是如何弄到钱的问题，而对这一点，吴给事就颇为含煳了。他只是强调，“理财应先理民，民富则财自充足，赋税也自然增多。”然后就是孔子怎么说，先朝怎么做，侃侃而谈一番，没有一点具体的办法。崇祯帝恨就恨朝臣只尚原则空谈毫无切实主意，见到吴执御一番肉疮皮毛之论，很不高兴。他抓住疏中的几句话反覆苛责追问，让吴执御一遍又一遍地回奏，闹了将近一个月才不了了之。朝臣见皇帝执意要“加派”，批评议论也没有用，以后虽然时时还有人提起，反对的热情也就不那么高涨。

关于要不要“加派”的事情总算确定下来，但真正拿到钱还要等到第二年的秋天。可是用钱的事情却不等人，在崇祯四年（1631）初就又出来了。

陕西三边总督杨鹤主持剿务将近两年，农民军却越剿越多，虽然也用了招抚的办法，但因财力有限，同样没有什么成效。他觉得，只有朝廷确定招抚政策，而且拿出钱来实行，真正解决了西北人民的生计问题，“流贼”才能最终被扑灭。在这年正月，杨鹤把他的认识和主张向崇祯帝作了系统汇报，提出：“必实实赈济，使之餬口有资，而后谓之真解散。解散之后尚须安插，必实实给予牛种，使之归农復业，而后谓之真安插。”因为怕皇帝捨不得花钱，他还特别算了经济和政治两笔账：调军围剿需要大批粮饷，同样要花很多钱，但“费之于剿，金银一去不还，且斩首太多，上干和气。费之于抚，金钱去而民在，活一人即得一人性命，盗息民安，利莫大焉。”

应该说，杨鹤的这一套看法还是比较有道理的。但问题在于，在到处都是亏空，财政状况极其窘迫的情况下，到哪里去找那样一大笔钱财去赈济，去安插受抚的义军和大批流民呢？退一步说，即使真的凑齐了这样一笔钱，吝啬成性的崇祯帝又怎么会捨得拿出来，无声无响地散佈到民间去呢？杨鹤看问题比较深，安排得也比较周全，但是他把一个长期积累下来的社会问题看得太容易解决了，没有想到人民的飢饿一方面是人口过剩和自然环境的变化造成的，另一方面又正是统治者横徵暴斂的结果。朝廷自己不事生产，要用大笔银钱赈济安插，只能仍然通过横徵暴斂来解决。这是一个走不出去的怪圈，招抚（或是围剿）人民的暴动要用大批钱财，要钱只能通过对人民横徵暴斂，横徵暴斂又造成新的饥荒和新的暴动……整个崇祯时期，朝廷里的君臣们就一直在这个怪圈里面打滚。也正因为有这么个怪圈，杨鹤的主抚政策从一开始就註定了要失

败。

崇祯帝这一次却被说动了心，觉得如果能一劳永逸地解决西北的暴乱，做出一些牺牲还是值得的，于是决定採用以抚为主的策略。他在廷对中几次提到了招抚的问题，说“流贼原是中原赤子，不可纯以剿为事。”“寇亦我赤子，宜抚之。”他为此还痛下决心，要拨款赈救陕西，兼作招抚之用。皇帝掏腰包救济灾民当然是一件恩德无量的大事，他特此隆重颁佈诏书，让全国官民个个知晓。诏书中说：“陕西屡报饥荒，小民失业，甚至被迫而从贼，自罹锋刃。……今特发十万金，命御史前去，酌被灾之处，次第赈给。仍晓谕愚民，即已被胁从，误入贼党，若肯归正，即为良民，嘉与维新，一体收恤。”

原来郑重其事了半天，忍痛拿出来的才不过区区10万两银子，相当于他一家7口人4年的伙食费。这点钱对于西北的大饥荒和大动乱能起到多少缓解作用呢？当时有人为崇祯帝算过一笔账：以每两银救活一人计算，也只能救活10万人；其时陕西粮价腾贵，1斗米要银7钱，1两银子甚至买不到1斗半米，最多能维持50天。这对于已经飢饿了几年的数百万饥民来讲，实在是太少了。但就是这10万两也已经让崇祯帝肉痛，而且让户部大为作难了。此后，杨鹤所筹划的那些赈济和安插怎样进行，赈济和安插的费用如何筹调，崇祯帝和他的朝臣们就再也没有做出过安排，甚至也没有认真地讨论过。这又是崇祯朝办理朝政的一个特点，办事处处需要花钱，常常还需要花大笔的钱，但朝臣们对花钱的问题通常都是讳莫如深的。一是因为国家没钱，一提就是没法解决的困难；二也是因为皇帝最不爱听花钱这两个字，（相反，他很喜欢听省钱这两个字）谁提得多了谁可能就要倒霉。大家就干脆不提，等待着事态的自然发展。

杨鹤在西北招抚农民军得不到什么像样的财政支持，但基本政策既然已经定下来，他也只好硬着头皮去干。崇祯三、四年之交，西北的农民军

大致可以分成东路、西路两大支。东路中的着名首领有王嘉胤、罗汝才、张献忠、蝎子块等人，他们当时的主要活动范围在黄河以东的山西省西部各县。西路中最大的一股是神一元、神一魁兄弟领导的农民军，主要在陕西的延安、庆阳两府一带活动。山西的剿抚大计自有山西的官吏和军队主理，而对于陕西的农民军各部，杨鹤则真是费尽心机。

崇祯四年（1631）初，神一元已经死去，他的弟弟神一魁带着数万人从二月下旬开始围攻庆阳府城。杨鹤手中没有多少兵马，连忙派人去庆阳城外招抚。经过谈判，神一魁同意受抚，并派了几十个大小头目去杨鹤驻镇的宁州（今甘肃宁县）。为了扩大影响，杨鹤特地在宁州城楼安设“龙亭”，让受抚的大小头目们到“龙亭”前跪拜，山喲万岁，而后再到公署拜谒杨鹤，并一同到关帝庙宣誓。这样一番大张旗鼓的表演，表现了朝廷招安的诚意，神一魁在几天后也亲自来到宁州。杨鹤先当众宣佈了神一魁的十大罪状，神一魁一一承认；然后宣读朝廷的赦免令，授神一魁守备官职。神一魁部的大部分都被遣散回乡，部分主力4000余人则安排在宁塞堡。

招抚神一魁是杨鹤主抚政策最重要的一个成就，但招抚之后的后续手段却不是以他个人的能力就可以解决的了。最要紧的当然还是赈济钱粮的问题。崇祯四年（1631）四五月间，朝廷咬牙掏出的10万两银子，再加上由藩王以下捐助的5万两以及2万石粮食，由御史吴甡押运到陕西，在发放的过程中又有大批小股农民军接受招安，领了钱粮。有了钱粮的时候，局势大好，陕西的农民军几乎全部受抚。但两三个月之后粮食吃光了，刚刚受了招安的农民军只能再到处打粮，又大乱起来。

对付这种局面，杨鹤实在没有什么办法了。他在七月给朝廷的报告里提到：“诸贼穷饿之极，无处生活，兵至则稽首归降，兵去则抢掠如故。此必然之势。”这种“必然之势”终于给他自己带来了厄运。七月末，一批降

而復起的农民军竟然大举攻佔了中部县（今陕西黄陵县）；不久之后，神一魁也率所部在宁塞营再次起事。此前杨鹤早已奏报朝廷，说庆阳的招抚全部安排停当，这时候突然又有县城失陷，引起了朝中一批惯会挑刺的言官们啧啧烦言。有人说："杨鹤先前说流贼已经遣散干净，而今中部县之贼难道是从天上掉下来的吗？"正巧也是在七月，在山西的农民军也发动了大规模的攻势，活跃于山西省的农民军号称有20万人，分为36营，在晋南、晋中各处抢劫富户，攻击官军。

接连出现的这些情况让崇祯帝大为恼火，他本来以为自己能够出钱出粮对"反贼"进行招抚，实在是体现了极大的宽仁，也体现了极大的耐心。既然如此，"反贼"们理应听到招抚就感恩涕零，从此老老实实地做顺民，即便饿死也不再捣乱。但事实上这些"反贼"竟然是一而再再而三地投降——叛乱、投降——叛乱，崇祯帝觉得这简直是一种恶意的冒犯。这时候，一些本来对招抚政策就不满意、不信任的官僚也纷纷抨击杨鹤和他的所作所为。放赈后就转任陕西巡按御史的吴甡是专责纠察地方官吏的，朝廷把有关弹劾杨鹤的奏疏下发他核查，核查的结果是杨鹤主抚误国，"人恨招抚之失矣！"杨鹤的政治生涯和他的主抚政策从此都到了尽头。

崇祯四年（1631）九月，恼羞成怒的崇祯帝不顾自己原本也批准过招抚政策，发出谕令："杨鹤总制全陕，何等事权。乃听流寇披猖，不行扑灭，涂炭生灵，大负委任。着革了职，锦衣卫差的当官旗，扭解来京究问。"这样就把西北大乱和招抚失败的责任全都推到了杨鹤的身上。杨鹤被逮捕后，一度情势非常危急，几乎被问成死罪。他的儿子杨嗣昌当时任山海关兵备道，接连3次上疏请求代替父亲接受处罚。崇祯帝对于杨嗣昌的印象似乎很不错，这一次竟然破例对杨鹤从轻处分，最后定为遣戍袁州（今江西宜春）。4年以后，杨鹤死在了戍所。

杨鹤的被撤职、被逮捕、被遣戍，标志着明王朝在对待农民暴动方面主抚政策的失败与结束。这以后，主剿派的势力佔了上风。陕西巡抚洪承畴接替杨鹤升任陕西三边总督，负责黄河以西，宣大总督张宗衡负责黄河以东，分别对农民军进行围攻剿杀。明官军还是在战场上不断传来捷报，但捷报之后又总有新的“流贼”在意想不到的地方出现。在剿了一两年之后，“流贼”仍然没有被彻底消灭，力量反而在不断壮大，活动的范围也越来越广阔。崇祯五年（1632）秋，大股的农民军已经进入到河南北部和北直隶南部地区，攻克的州城、县城也越来越多。围剿的政策同样以失败告终。

抚也不成，剿也不成，崇祯帝面对着遍地的烽火，只好乞怜于茫茫上苍。自即位以来，他对于依例应行的各种祭祀活动一直殷勤郑重，不敢亵渎神灵。连年的苦旱又使他特别上心于祈雨的活动。崇祯五年（1632）春，京畿地区又是一场大旱，他在三月中旬在会极门召集礼部官员，表示要再次虔诚祈祷，求苍天降下甘霖。他对官员们说：“目前已将近入夏，正是农事繁忙的季节，但春雨不至，朕心深为焦虑。”要礼部选择日期，制定仪式，组织施行。十九日，崇祯帝从干清宫移居到文华殿，脱离开自己的后宫妻妾，同时斋戒素食，要用苦行感动昊天上帝。他还表示，如果不下雨就不离开文华殿。也许他的精神真的感动了昊天上帝，到二十二日，京师竟然下了一场近年来罕见的春雨，滋润了土地万物，也滋润了崇祯帝和他的朝臣们焦灼的心灵。年轻的皇帝又神气起来，以为上天的宠眷毕竟还没有转移。只要天心还在，西北和中原那点不成气候的“蟊贼”终归还是可以制服的。至于如何制服，他却还是同过去一样，胸无成算。

四 朝中朋党

明代的科举制度每3年为一个週期，逢鼠年、兔年、马年、鸡年秋天各省举行乡试，从秀才中选拔举人，叫作秋闱；第二年牛年、龙年、羊年、狗年春天，举人们到北京来参加会试和殿试，叫作春闱，通过考试的就取得了进士的资格，全部进入官僚阶层。会试是国家大政，也是士子们的终身大事，这一年就被称为大比之年。

崇祯四年（1631）辛未，是崇祯帝即位后的第二个大比之年，整个春天朝廷中都在忙忙碌碌地安排出题、考试、阅卷、发榜、皇帝点名召见、新进士举行庆贺宴会……崇祯帝也亲自参加了带有仪式性的殿试和传胪等活动，并且欣然批准了本届取中的349名新进士的名单。新科进士按例分成3个等级，称作三甲。第一甲只有3名，就是民间所谓的状元、榜眼、探花三鼎甲，“赐进士及第”，直接进入翰林院；二甲“赐进士出身”，三甲“赐同进士出身”，分别考授官职。这一科取中的进士中很有几个天下知名的文士，崇祯帝很高兴，朝野上下的反映也还不坏。

但在春闱结束之后，新进士的考选授职工作也已经完成了，在八月里，有几个言官突然提出，本年科举中有诸多弊端：一是一甲第一名状元陈于泰竟然就是主考官首席大学士周延儒的连襟姻亲；二是一甲3名竟然全都是南直隶人，陈于泰是常州府宜兴人，与周延儒同里，第二名榜眼吴伟业是苏州府太仓人，第三名探花夏曰瑚是淮安府山阳（今江苏淮安）人，全部是主考官周延儒的同乡；三是榜眼吴伟业（同时又是会试第一的会元）的试卷中有明显的谄媚主考官的意味，不成体统。于是一石激起千层浪，一时间攻击这次考试及有关考官的章疏不绝于朝。考官们和新得中的进士们为此都紧张起来。

崇祯帝对于各种舞弊事件从来都十分敏感，立即就着手进行了调查。但调查的结果并没有反映出什么舞弊的证据，所谓姻娅、同乡确是实情，但制度上从来没有规定会试中要回避亲属，更没有规定不能录取同乡。他还特地调阅了吴伟业在会试中的考卷，读过之后觉得很好，没有所谓"衬贴"的感觉，于是批了"正大博雅、足式诡靡"八个字。有了皇帝这样的批示，弊端的说法就算不攻自破。

这次小小的科场风波总算平安过去了，但崇祯帝却从中感到了一些蹊跷。攻击科场舞弊的矛头直指首辅周延儒，而他听到自己的情报系统传说，在幕后指挥这次战役的就是内阁中地位仅次于周延儒的次辅温体仁。如果情况属实，这显然又是一种新形势下的朋党之争。

在崇祯初年，崇祯帝尽了极大的努力，在朝中剿杀朋党。崇祯元年（1628）冬季那次会推风波之后，他对于东林党人结党营私有了深刻的印象，并且极为厌恶，在后来的用人行政中就一直有意识地抑制东林的势力，希望通过压制东林党人彻底消除朝臣们的朋党之风和朋党之见。

在那次为会推而进行的御前辩论之后，东林党人集中火力发起了一次大反击。几位御史纷纷指摘温体仁在家乡的时候的种种不法行为，包括娶娼妓为妾、接受贿赂、夺取他人家产等项；御史毛九华还弹劾他为杭州魏忠贤的生祠做过颂诗，而且刊刻成册。温体仁为此辩解说：我在朝中三十年了，从来没有被人弹劾过，如今只因为参奏了钱谦益，立即就受到四面攻击，恨不得把我罢官杀头而后快。难道一个人的好坏前后能有这样大的不同吗？毛九华等人显然是钱谦益一党。对于谄媚赞颂魏忠贤的诗，他矢口否认，并且说：谄媚之诗应当手写逞送才恭敬，绝对没有刻印刊行的道理；即使真有刻本，应该流传很广，但为什么当初籍没魏忠贤的时候没有人蓼纠，反而在一年多以后提出来呢？请陛下下令严查，审问刻诗的人，究竟诗稿是从哪里得来的。

温体仁的回答总体来讲是比较有道理的，本来就对这件事有成见的崇祯帝则更容易听信。他再次召集朝臣进行当面辩论，结果东林的御史们有些理屈词穷。连与东林党人关系密切的首辅韩爌也说：“温体仁平日清谨自守，名声很好；此次因参劾钱谦益一事，激愤过当，犯了众怒，所以诸臣攻他。”在崇祯帝看来，一向名声很好的温体仁受这番攻击，完全是因为揭露了东林人的党私，是为了朝廷的利益而造成的一种光荣孤立，因此这个人就更值得信任，值得重用；而东林党人则在这些无理的攻击中显示出他们的营私和褊狭。他为此特地在内殿召见韩爌等几位阁臣，很气愤地说：“进言的人不知忧国忧民，只知结党营私，自我标榜为‘东林’，对国家有什么贡献呢？对这样的人一定要严惩。”

韩爌这时候深深感觉到，朝中的朋党之争已经对皇帝产生了巨大的影响，而且这只能使正在日益艰难的国事更加艰难。他在那次内殿召见后给皇帝写了一份表示个人意见的奏本，专论党争问题，其中说：“人臣不可结党侍奉君主，人君也不可用结党怀疑臣子，只能根据一个人的才能品行和从政业绩来决定他的升迁或是革黜，而不能看他是不是在哪一党。如果朝廷上打得你死我活，官员们全部分成甲党乙党，绝非国家之福。”这实际上是说，朝臣结党固然不对，但作为君主，不论是不是真有朋党，都不应该以朋党视之。君主心中无党，朋党之祸尚不至于太酷烈；君主自己先有了朋党的成见，那造成的党争将带来无法预期的严重后果。

可惜韩爌这个极有见地的说法却没有被崇祯帝接受。他确实有朋党的成见，而且成见还极深，还极其自负地认为只有把哪一朋党哪一圈子的人都认清了，才能以党治党，有效地消除朋党。他坚持要这样做，别人谁也没有办法，但朋党并没有被消除，反而愈演愈烈。

朝中那些非东林党人，特别是那些在魏忠贤时期曾身居高位的非东林党

人，很快就从崇祯帝的表现中感觉到了某种可以利用的东西。既然皇上对于朋党深恶痛绝，那些“党”得最厉害的东林人士就有了致命的弱点。这些非东林党人对于东林大规模佔领政治要津，并且不断地攻击、排挤东林以外的人士相当不满，有了皇帝的成见，他们就可以利用时机再把东林分子赶回老家去。这个时机随着后金军队对京城的包围而成熟起来。

在己巳之警中又急又窘的崇祯帝对于全体任职的大臣都不满已极，因为在大敌当前的时候，从内阁到六部几乎拿不出什么像个样子的对应措施。崇祯帝深感到这样一批朝臣实在无法应付当前的各种危机，更不要说开闢新的丰功伟业了。为此，他在紧急中先是临时处理了兵部尚书王洽、督师袁崇焕，而后撤换了几个部的尚书，到警报稍缓的时候，又对内阁班子进行了大调整。

首先被调整下去的是大学士钱龙锡，直接原因是为了他同袁崇焕的关系，特别是在擅杀毛文龙事件中的责任问题。钱龙锡同袁崇焕本来并没有任何瓜葛，但崇祯帝召用袁崇焕，提出5年復辽，钱龙锡作为内阁大臣却不能不关心不过问。袁崇焕在京陛见期间，钱龙锡曾两次到他的寓所，共同商议辽东前线的安排佈置。袁崇焕谈到毛文龙的问题时曾说，毛文龙可用则用之，不可用则杀之。钱龙锡从朝廷的立场出发，对除掉毛文龙也是比较支持的。这就是后来袁崇焕在杀掉毛文龙之后的奏疏中所说的“辅臣钱龙锡特过臣寓，商及此事。”后来为了边防事宜，袁崇焕同钱龙锡还有过多次的书信往来。这些本来都属于正常交往，但等到袁崇焕突然成了祸国殃民的大汉奸之后，问题一下子变得严重了。

钱龙锡是南直华亭（今上海市松江县）人，与东林中许多老一辈骨干是同乡又是老朋友；他在天启五年（1625）因为得罪于魏忠贤而被削籍，因而属于崇祯初年得到平反覆职的那个新既得利益集团。这种身份决定

了他同在魏忠贤时期也还混得不错的旧既得利益集团处于对立状态，在定立“逆案”之后，他对于虽然没有列入“逆案”却可能多少与阉党有些牵连的那些人压制得很厉害，因而也特别被那些人仇恨。袁崇焕得罪被逮，而袁崇焕的奏章中明明写着擅杀毛文龙是同钱龙锡商量过的，这对于仇恨钱龙锡的人来说是个天赐良机。因此，在后金大兵仍在京师城下，情况还万分危急的时候，御史高捷、史䇅等人就开始对钱龙锡劾攻劾打，揪住不放。

崇祯二年（1629）十二月初五日，也就是袁崇焕被逮仅仅4天之后，御史高捷专章弹劾钱龙锡。他在奏章中先把崇祯帝大加吹捧了一番，说“皇上赫然震怒，下督师袁崇焕于狱，京城中万口一辞，都在称颂圣上英明果断，一举而振作国法，消除内患。”然后指出，袁崇焕的所作所为都有内阁的钱龙锡为他谋划，为他撑腰，为他侧应。高捷在疏中列举了钱龙锡的三大罪状：一是指使袁崇焕擅杀毛文龙，他认为已有确证；二是勾结袁崇焕私自同后金谈判媾和，这是他据袁崇焕所言推测出来的；三是挑动祖大寿率军溃逃，这就完全是他捏造的了。在奏章的最后他又危言耸听地说：“臣深知龙锡羽翼如林，死党牢布，此疏一出，大祸将立至。但求一点忠心能达上听，皇上能够因此做出决断，除绝祸根，臣即再受刀俎也无所遗憾。”

崇祯帝对高捷所说的颇有同感，但暂时还没有精力来处置，只是听凭钱龙锡自行辩解和高捷一流继续攻讦。钱龙锡在这种情况下已经无法安于职任了，只得申请退职回乡养病，并且立即得到批准。到第二年八月，袁崇焕被处死，钱龙锡的问题再一次被提出来。史䇅甚至说：“袁崇焕出京时，重贿钱龙锡数万金。”崇祯帝为此震怒，命人到江南将钱龙锡逮至京师。十二月，钱龙锡被押送到北京，关进了刑部监狱。他再次上疏为自己辩解，并把袁崇焕给自己的信的原件和自己回信的底稿一起上交。

崇祯帝已经拿定主意，因而不为所动，只是催着刑部定案。刑部根据皇帝恼怒的程度拟定：钱龙锡处斩，决不待时。崇祯帝却似乎又以为有点太重了，就以钱龙锡没有逆谋为由，命先关在狱中。到第二年，再次对钱龙锡减轻处分，改为免死遣戍定海卫。钱龙锡直到明王朝瓦解后才被南明弘光政权赦免復官。

相比之下，钱龙锡的运气还算是好的。在他之后，有两位内阁大学士，薛国观和周延儒，被崇祯帝杀掉了，而且罪名都相当含混。明末的一位遗民在论及此时事说："使其当日近韩城、宜兴之间，復有余生哉？乃知人主用法以渐而手滑也。"韩城、宜兴分别指薛国观和周延儒，到崇祯帝统治的后期，他杀大臣已经杀得手顺了，即使是首辅也难逃厄运，而钱龙锡的事件发生在早期，因而保全了性命。

在处理钱龙锡的同时，崇祯帝对内阁的其他人员也进行了大换班。崇祯三年（1630）正月，首辅韩爌离职还乡，原因是许多人对他同袁崇焕的关系以及在己巳之警中举措失当进行纠劾。三月，接替韩爌任首辅的李标在多次请求去职养病后终于得到批准，也离开了内阁。这样，崇祯帝第一期枚卜建立的内阁已经再没有一个人留任了，同时亲东林的势力也在内阁中大大削弱。补充进来的人员都是崇祯帝自己选择，自己任命的，叫作"特简"。这从理论上讲是皇帝的特权，却不符合百年来的传统法则，朝臣们对皇帝不经过会推就自行任命大学士意见很大，认为这样做既侵夺了朝臣应有的权利，又伤害了朝臣的体面。

但崇祯帝坚持我行我素，最初是在崇祯二年（1629）末简任了成基命，不久又以周延儒、礼部尚书何如宠、礼部尚书协理詹事府事钱象坤3人为礼部尚书兼东阁大学士，参预机务。3人中以周延儒的资歷最浅、职务最低，但在入阁的顺序中却处在第一位，这表明崇祯帝对于周延儒还是情有独钟的。到崇祯三年（1630）的九月，在内阁中位居周延儒之前

的成基命退休，才40岁出头的周延儒终于成为明代歷史上最年轻的首辅之一。在此前的六月，温体仁和另一位有礼部尚书衔的吴宗达也一起进入了内阁。当初受到东林排挤却被崇祯帝赏识的周延儒和温体仁都进入了中枢机构，说明皇帝的权力毕竟是高于一切的。

东林党人为自己实力的受挫进行过几次反击，但效果不大。崇祯三年（1630）五月，东林骨干文震孟上疏攻击吏部尚书王永光，说他网罗一批阉党余孽，想要藉着举荐边防人才来翻“逆案”，并且打击正人君子。给事中许誉卿等人也集中火力勐攻王永光。不久后，更有人放风说，王永光等人想要以袁崇焕事件为口实，定立另一个“逆案”，把一批东林人士都牵连进去，以抵消原先阉党的“逆案”。东林党人把矛头对准王永光，是因为王永光在魏忠贤时期曾任过兵部尚书，现在又是百僚之长，是唯一一个在天启后期和崇祯初年都身居要害位置的人物，因而也可以说是旧既得利益集团理所当然的领袖人物。此外，这个王永光早在万历年间就同东林党人意见不合，也是东林的老对头了。但此时王永光并没有被东林抓到什么真正的把柄，而崇祯帝对东林的一切说法本来疑心重重，因此这次攻势毫无成效。

六月，东林中的着名理论家，大理学家刘宗周上疏，提出：“刑罚宜当宜平”，“赋敛宜缓宜轻”。并针对朋党问题，批评崇祯帝任命辅臣，不经会推，都是出自特简。结果朋党更盛，当政者一意驱除异己，不惜构成大狱，造成天下土崩瓦解之势。刘宗周的奏章是连皇帝带辅臣一起攻击的，因而崇祯帝不高兴，周延儒、温体仁之流也很愤怒。于是君臣联手，拟旨苛责。刘宗周当时正任顺天府尹，就是首都特别行政区的首席长官，是个很重要的职位，他见到东林大势已去，自己又不受天子信任，只好告病隐退。这以后，东林在朝中的势力更加微弱，东林派与非东林派之间的恶斗也暂时趋于平静。后来的很长一段时间里，东林党人

尽管在朝中还保持着一定的实力，也掀起过几次小小波澜，但总起来讲很不得意。这种情况直到崇祯十四年（1641）才再次发生变化。

崇祯帝很为自己能在朝中压抑住东林的势力，平息由东林挑起的党争而得意。但在东林被抑制之后，朝中的党争却并没有像他所希望的那样就此消失得干干净净。在东林以外的各式各样的朋党、帮派、小集团，为了各自的利益争夺得同样剑拔弩张，如火如荼。早在天启中年，一位老资格的政治家，首辅叶向高就曾经说过："去河北贼易，去朝中朋党难。要其病根所在，只是争官竞进，一意牢不可破。"一语道破了朋党的根子在于"争官竞进"，也就是不论如何朋，如何党，其实最终目的还是在于做大官、掌大权，维护自己一个小集团的利益。按照明代官场面子上的说法，争官争权是不大道德的一种行为，所以才会有受命后再三推辞的成例。主管官员升迁的吏部大堂上也有一副对联："功名身外事，大就何妨，小就何妨；富贵眼前花，早开也得，晚开也得。"就是劝大家要想开点。但士大夫一辈子就是为了做官、做高官而活着的，哪能不争不竞？因此在抑制了东林的势力之后，朝中的各派势力"争官竞进"的斗争并没有完结，因而朋党之争也就不会有宁日。而且，这些小家子气十足的朋党之争更纷杂、更琐屑，也更加混乱不堪。

崇祯四年（1631）初，东林与非东林的争执才平静了不到半年时间，分别主管着文职官员的考察、选拔、任用和武职官员的考察、选拔、任用的吏部与兵部两部的尚书，就为了各自的权势展开了一场恶斗。

如前所述，此时任兵部尚书的梁廷栋是在己巳围城时期被紧急提拔起来的新晋官僚，仅两个月工夫就由一个地方官吏晋升为朝中显赫的大臣。梁廷栋的飞速提升一方面是由于他的运气好，另一方面也确实是因为他在具体安排各路援兵的驻防、调配和应付突变局面的时候比较有章法，能力显然要比朝中那些老资格的正统官僚要强。崇祯帝明显感到这个人

才难得，才在危急时刻破格任用。在军情紧急的时候，其他的朝官们也只好眼看着梁廷栋一步登天，但形势一旦和缓了，就有许多人对他生出无限的嫉妒。有人上疏说他“监司（道员）之才有余，枢府（兵部）之才不足”，指斥他的这个差错那个失误；有人甚至就公然说，“廷栋数月前一监司耳，倏而为巡抚、总督、本兵（兵部尚书），国士之遇，宜何如报？”似乎他既然受到这样的国士之待遇，对他怎样要求都不能算高。幸好崇祯在这件事上很有主见，认为在一片大乱中能把局势维持成这样已经不错了，对梁廷栋仍然很信任。

在朝中代表着正统官僚，对梁廷栋很看不上眼的，就有吏部尚书王永光。王永光是万历二十年（1592）的进士，在朝官中资格第一；早在天启初年就做过尚书，当高级重臣的歷史在朝中也数第一。他作为旧既得利益集团的代表人物，对突飞勐进步入高层的新贵自然有些不以为然，那些交章攻劾梁廷栋的言官和下级官员们也很有一些是他的死党。梁廷栋对此看得很清楚，一时性起，决心要同这位朝中大老斗一斗。这也同他自己的野心有关，因为做了兵部尚书之后，他的眼光又瞄向了吏部尚书——那才是真正的百僚之首，而只有把王永光排挤掉之后，正在受到万岁青睐的梁廷栋才有可能攀登上那个最高的位置。

崇祯四年（1631）二月，梁廷栋利用同兵部有关的一件行贿案参劾了御史袁弘勋和锦衣卫指挥张道浚，得旨“俱革职提问”。袁弘勋和张道浚两个人都是王永光的心腹死党，这个贿赂案件因而也牵连上了王永光。立即有人弹劾王永光贪赃受贿，举用非人。由于王永光为官清廉是很有些名气的，崇祯帝一时也不相信对他的这些指控，但梁廷栋同样是自己信任的人，因而又有些半信半疑。这时候，内阁中两位起主导作用的大学士周延儒和温体仁的意见就举足轻重了。

从崇祯三年（1630）的下半年起，当初因为会推中没有列名而显得可怜

巴巴的周延儒和温体仁，分别担任首辅和次辅，成为内阁中的主导人物，成了朝廷政务的核心。两个人曾经为了共同“争官竞进”一度联过手，但由于背景不同，性格各异，得势后又不能不为各自的利益发展朋党，渐渐地变得势如水火了。周延儒少年得志，中年即成为首揆，是一路顺风的人物，因而外表虽然风流潇洒，机敏善辩，其实内在气质中却有很软弱的成分。他又已经身为首辅，同温体仁斗主要是为保住已有的位子，因而一直比较被动。温体仁则是个深谙世故的老牌政客，表面上待人一团和气，温柔可人，内心却阴险而决断。他一心就是想对周延儒取而代之，处处设计却尽量不留痕迹，常常令周延儒防不胜防。

周延儒是最先被崇祯帝赏识并被重用的，要取而代之就需要在君臣两方面下功夫，先在舆论上、感情上领先一步。温体仁很重视攻心战，也很善于攻心战，相比之下週延儒则差得远了。这从一些小例子中就可以看出来。钱龙锡被判处死刑后改为遣戍，出狱临行前特地去拜会当朝的辅臣。周延儒对他说：当时皇上火气很大，几乎无法挽回了，我们几个费了很大力气才使皇上回心转意（保住了阁下的性命）。钱龙锡当然非常感激，在见到温体仁时再次致意。温体仁却说：皇上当时并不是很恼怒。这件小事使得钱龙锡以及他的亲朋故旧都非常欣赏温体仁的为人忠厚，而对周延儒却颇有微词。

在对待崇祯帝的时候，温体仁更是深深懂得为臣之道。他一直在积极培植自己的势力，打击异己的势力，但做得不显山不露水。他明知皇帝生性多疑又刚愎自用，于是採取虚实结合、扬抑并用的战术。凡是他想要荐用的人，总是先找别人举荐在先，而后自己才出面，免得被崇祯帝疑心；而对于想要排挤的人则故意做出宽容的样子，想办法触动崇祯帝的疑心，让崇祯帝自己动怒。周延儒虽然为人也十分乖巧，但常常乖巧在表面上，有的时候会让生性多疑的崇祯帝察觉出来，时间长了就有些不

太好的印象。

吏部和兵部两位尚书的决斗是关系朝中力量消长的大事，正在暗中较劲的两位辅臣不可能不参预进去，也不可能不把这次斗争当成一个发展自己实力、排挤对方的重要时机。因而在王永光与樑廷栋的斗争背后，一场潜在的辅臣之争也在激烈地进行。

周延儒是支持王永光的，他一直把王永光的势力作为支撑自己主持国务的重要力量。同时，他对于一直在崇祯帝面前很吃得开的樑廷栋也很有些敌意。但阴柔狡诈的温体仁却另有一番打算。他入阁才半年多，实力尚弱，但已经做好了驱除周延儒全面把持朝政的通盘安排。在表面上，他对周延儒很尊重很友善，实际上却在不露声色地拆周延儒的臺。这一次他看到王永光因为多年掌吏部得罪人太多，而且在皇帝面前的宠信程度已经大大下降，就果断地站在了樑廷栋的一边。这时候正好赶上週延儒主持会试，不在内阁，于是温体仁做主拟了一道严厉申斥王永光的圣旨。一向以为是自己在操纵群臣和朝政的崇祯帝哪里知道朝臣之间还有那么许多曲折繁复的门道，一不小心就把温体仁所拟严旨批发了。根据传统，受到严厉申饬的大臣是不能安于其位的，王永光只能再三地请求辞职，并且终于得到了批准。

王永光在东林党人正面的大举进攻面前没有垮下来，却在樑廷栋与温体仁的阴谋活动中成了牺牲品，从此脱离政坛。

但樑廷栋的如意算盘同样没有得逞。赶走了王永光，他本人并没有顶替上去补为吏部尚书，那个位置煳里煳涂地被左都御史闵洪学佔据了。闵洪学是温体仁的同乡好友，这次任吏部尚书也是温体仁荐举的，显然在驱逐王永光的事件中得渔人之利的正是温体仁。这以后，温体仁与闵洪学结为一体，阁权、部权合一，温体仁的势力逐渐膨胀起来，逐步压过

了周延儒。

樑廷栋却因为是在驱王事件中冲锋陷阵的，既得罪了王永光的党羽又得罪了首辅周延儒，再加上他本来政治资本就薄弱，经过一番伤筋动骨之后更无法在朝中久留了。果然不久就有人弹劾他营私舞弊诸多实事，这一次在幕后主持的正是周延儒。樑廷栋无法与朝中大势力抗衡，最后被罢免，回原籍闲住。

靠着种种阴柔的办法，温体仁越来越得到崇祯帝的信任，在朝廷中的实力也渐渐超过周延儒。但直到王永光去职，温体仁的亲信闵洪学当上吏部尚书之后，周延儒才意识到温体仁已经对自己构成了威胁。周延儒仗着自己的首辅地位，也对温体仁的势力做了一些反击。王永光去职后不久，他先是扳倒了同自己作对的兵部尚书樑廷栋，捎带着以为樑廷栋泄露消息为理由，把内阁大学士钱象坤也赶出了朝廷。钱象坤是温体仁的门生，尽管比温体仁先入阁，却一直以师生之礼屈居于温体仁之后。除掉这个钱象坤总算减少了温体仁在内阁中的一个重要内援。至此，内阁中两位辅臣间的斗争进入了白热化状态。

崇祯四年（1631）的所谓科场事件正是在这个背景下产生的，暗中主持这次行动的也确实就是温体仁，当初他能用将近十年前的一次科场事件整垮钱谦益，这一次就准备用眼前的一次科场事件除掉挡在自己前面的首辅周延儒。这一次他虽然没有成功，却为后来倒掉周延儒埋下了一个伏笔。

这年的年底，山东方面发生了一起严重的叛乱事件。原先属于毛文龙部下的一部分官兵在毛文龙被杀后各谋生路，其中很大一部分浮海逃到胶东，带头的是孔有德、耿仲明和李九成等人。负责胶东半岛防务的登莱巡抚孙元化过去多年任职辽东，对辽东部队比较有感情，就收编了他

们，仍由孔有德等人统领。这支部队却为了主帅被袁崇焕无缘无故地杀死，对朝廷深怀不满，脑后的反骨并没有蜕化。十一月，因为辽东大凌河遭受后金围攻，形势吃紧，孙元化奉命调孔有德部从旱路增援。队伍走到吴桥（今属河北），因为天降大雪军食不足而譁变。孔有德带着部队一路向回杀过来，攻陷了山东的陵县、临邑、商河、青城、新城等县，长趋进入胶东，在岁末的时候围困了孙元化驻镇的登州城（今蓬莱）。

对于这次叛乱，孙元化一直主张和平招抚，朝廷一时没办法调集军队去剿杀，也只得先让孙元化招抚着看。直到叛军兵临城下了，孙元化仍然以为自己凭着老关系可以传檄而平乱，还是多次写信劝喻孔有德，没有把注意力全放在坚守拒敌上。崇祯五年（1632）正月，仍在孙元化军中的耿仲明在城里做内应，登州城破。孙元化自杀没有死，做了俘虏。孔有德看在过去的交情上，又把孙元化放了。孙元化逃到北京，不久就因致叛、陷城被逮捕，后判处死刑，处决。孔有德的叛军则在山东闹腾了足足1年多，到处攻城陷地，杀人放火，至崇祯六年（1633）二月乘船逃往辽东半岛，投降了后金，成为后金的一支重要有生力量。

失事被杀的孙元化和周延儒是同科举子，过从甚密，关系极好。孙元化主张招抚，在内阁中主要是靠周延儒的支持。再加之周延儒身为首辅却对于孔有德叛乱一直没有拿出什么好的对策，朝中不少人就追究起周延儒在这次事件中的责任。温体仁当然不会错过这个好机会，也发动自己的党羽一起趁火打劫。一时间弹劾周延儒在山东问题上主抚误国的奏章有数十封，有人甚至风闻奏事，把一些同山东事件无关的事情也一起搬出来，说周延儒收受大盗神一魁的贿赂，力主在西北抚贼，给国家造成巨大损失。周延儒为自己作了辩护，崇祯帝也知道有些事情不能全由周延儒负责，温旨劝慰，让他继续在阁中办事。但以崇祯帝一贯的作风，

朝政中有大的失误，总是要由部阁大员承担责任的，众人指责首辅应该为山东的失败负主要责任，仔细想起来也不无道理，正好合了他的思路。前思后想，周延儒在他心目中的地位已经开始动摇。

为了自救，周延儒进行了最后一番努力。他决定先对吏部尚书闵洪学下手，以此来动摇温体仁的基础。由于自己的力量不足，他只好去求助于那些喜欢在朝中兴风作浪的东林派言官。周延儒由于乡籍的缘故本来同东林党人的关系并不坏，在东林中也还有一些朋友，只是由于在崇祯元年（1628）那次会推风波中得罪了东林，才反目成仇。但相比之下，东林中人对于温体仁更为仇恨。周延儒让自己一派的吏部侍郎张捷等人向东林言官们表示，只要挤走了闵洪学，在内阁中驱逐温体仁可以由周延儒一手承担。

东林的言官和一些小臣们立即对闵洪学发动了一场攻势，给事中王绩灿、御史刘令誉、周堪赓等人纷纷上疏参劾闵洪学，其中最为直截了当的属兵部员外郎华允诚的参奏，他直接提出：我朝罢设丞相，用人之权由吏部执掌，内阁不得侵夺。而今次辅温体仁与吏部尚书闵洪学同乡同党，阁臣把持吏部之权，吏部曲承内阁之命。任用私人，排除异己。皇上恼恨诸臣专权，其实没有比这专权得更厉害了；皇上疑心诸臣结党，其实没有比这结党得更严重了。崇祯帝对这些攻击闵洪学和温体仁的官员们都给了一些不太严重的惩戒，而在心中对于闵洪学与温体仁的同乡身份也不能不有些怀疑。闵洪学不能安于其位，终于在崇祯五年（1632）的八月引疾辞职。崇祯帝任命曾在天启初年做过户部尚书的李长庚接任吏部尚书。

周延儒挤走了闵洪学，算是在与温体仁的斗争中获得了一次不小的胜利，但他自己受到的损伤也不小。一方面是他这次与东林联手，使得崇祯帝也对他产生了勾结东林谋求私利的疑心。另一方面，温体仁和他的

党羽们通过这件事情对他恨之入骨，更坚定了整垮他的决心。还有，就是东林方面的人士见到他并没有能把温体仁驱逐出内阁，对他的能力和人格再次感到失望，也不想再同他合作。在这种情况下，周延儒的处境就相当艰难。温体仁却在这个时候使出一个非常阴险的招术，终于将周延儒打倒了。

崇祯六年（1633）初，温体仁不再用亲信的言官，而是请一位在宣府监军的太监王坤上疏对周延儒进行了一番系统攻击。崇祯帝在刚刚即位后就撤除了全部监军太监，一直被朝臣和士民们当成英明天子善政的一个重要部分。但随着他对朝臣的日益失望，到了崇祯四年（1631）秋天，这种引起官僚层极大不满的太监监军制度又被恢復，而且派遣人员之多超过了魏忠贤专权的时期。朝臣们当然要集体抗议，崇祯帝却咬牙坚持，表示自己出此下策实在是由于文武百官太无能太腐败。君臣之间在这个问题上的冲突始终没有真正和缓下来。温体仁明知道，在这种背景下，由一位太监攻击首辅，必然会遭到大多数官员的不满和抗议，但这种抗议却一定会激怒皇帝，使得在朝官舆论中得到支持的周延儒在皇帝那里彻底失分。对于这样一条巧妙曲折的毒计，不论是周延儒和朝臣们还是崇祯帝本人，都没有看透其中的奥祕。

温体仁的另一个有利条件是他同宦官的关系一向很好。因为太监们是常随皇帝左右的，一句悄悄话对于皇帝产生的影响可能比全体朝臣的集体启奏还大。崇祯帝自认为是从来不受宦官影响的，对掌管国事的太监们也非常严厉，但他实际上还是在不知不觉之中受着极大的影响，温体仁对这一点从来不敢掉以轻心。平时在内阁，哪怕是一个最没有权势的小内侍来传话办事，他也总是恭恭敬敬、客客气气。在其他场合他并不招摇过市地同太监们交往，但时刻不忘恭谨二字，不少太监对他都颇有好感。太监王坤同他的关系显然已经不只是好感了，其中的内幕不得而

知，但温体仁在攻劾周延儒的过程中做了手脚，却是满朝皆知的。

果然，朝臣们对一个宦官指摘首席大学士表现了几乎是同仇敌忾的愤怒，以为这使得整个文官官僚集团都大丢面子。新任的吏部尚书李长庚率全体卿贰大臣上疏说："陛下博览古今，曾见过有内臣参论辅臣的吗？从今以后，廷臣都将拱手屏息，这难道是盛朝气象！臣等失职，请立赐罢谴。但不忍心开内臣轻议朝政之端，流祸无穷，让后世万代指责。"左副都御史王志道还独自上奏："近年来内臣参劾朝臣越来越多，朝内则参给事、御史、各部司官，朝外则参总督、巡抚方面大员，进一步又参部院卿贰大臣，现在参起辅臣来了。臣以为，这太出格了！"崇祯帝却认为这是朝臣们藉机发泄对自己任用内臣的不满，也果真气恼起来，决定同朝臣们斗上一斗。

第二天是二月初八日，崇祯帝在文华殿召见内阁和各部院尚书、侍郎、都御史等高级大臣。首先让王志道出班，对他说："王坤的劾疏，已经有旨责他轻率妄言，为什么还要牵扯许多？说是内臣参的就处分，参内臣的也处分，这样说来，所有被惩处的官员都是因为内臣，这个朝廷上也没有别的政事，都是内臣了。全是诬捏！"而后又插七插八举了一大堆近日处分朝臣的例子，说明都是罪有应得，并非为了宦官的缘故。又说："你们不自己检查反省过失，只是揪住内臣不放，无非是借一个题目，但凡参过内臣，就是护身符了。这是怎么说？"

王志道只得回答："王坤疏劾辅臣，举朝惶惶不安，都是为了纪纲法度担忧，并非为了朝臣自己开脱。至于臣疏中不能详慎，语多谬误，罪当万死。"

崇祯帝却没听清楚后面那句话中说的是语多什么，就问周延儒："是说什么？"周延儒代为答道："谬误。"他就接口说："又有这许多谬误了。你

在朕前说谬误，写在史册上就不谬误了？多少关系国家大计的事，从来不发一言。如今使用内臣，不利于你们在外作弊，恰有王坤一疏，就张大起来，有许多话说。故意借个题目，挟制朝廷不便处分，你真是奸巧之极。”他越说越觉气愤，越说越觉痛心，转而对诸臣说：“文武百官，朕未尝不信用，可是谁肯打起精神，实心做事？只是一味朦徇诿饰。不得已才差内臣查核，原是一时权宜之计。你们外臣如果肯做事，朕何必要用内臣？”一时声色俱厉。

朝臣对于皇帝的发火无可奈何，周延儒跪上前去劝解说：“王志道并非专论内臣，实际是谴责我们内阁溺职。诸臣不能尽心修职，以致封疆多事，寇盗繁兴。皇上万不得已，遣出内臣查核边防，原是一番忧勤图治的苦心，屡次上谕很明确，外廷都知道。人们对皇上无不钦佩敬服，只是臣等罪状多端，所以外廷都来责备。”崇祯帝的脸色这才好看一些，沉思了许久才说：“王志道疏中诬捏款项还没有说尽，本该捉拿问罪，念在辅臣申救，起去候旨吧。”当天有旨下来，王志道革职回籍。

这次风波虽说暂时过去了，但崇祯帝对于周延儒还是起了疑心，觉得他是为了保护自己，才纠集群臣在任用内臣的问题上大做文章。他为什么要这样急于保护自己呢？显然是真有隐藏很深的亏心事，生怕暴露出来。根据这个逻辑，崇祯帝认真对周延儒的所作所为进行了调查。那个王坤本来在劾疏上只是侧面攻击周延儒利用职权，选拔了一个并没有真才实学的连襟做状元，仍然是一套过时的老话。但此时见到皇帝认真要查，就又蒐集了一大批有关周延儒的罪行材料，共有20多条，有纵容僕从，招权纳贿，为害乡里，乱政误国种种罪恶，从大政方针到生活琐细无所不包，其中也却有其事的，也有道听途说的，也有凭空捏造的，洋洋洒洒，真够周延儒抵挡一气了。

崇祯帝早已对周延儒有了成见，对于这些指控也是将信将疑。他又作了

进一步调查，还把周延儒的一个门客叫李元功的抓进了锦衣卫监狱进行拷问。周延儒毕竟是一位当朝首辅，又是崇祯帝一手提拔上来的，崇祯帝即使现在对他也并不是全无好感，这些调查多半是在祕密进行的。皇帝显然并没有真下狠心，负责调查的锦衣卫衙门也就没有真下实力。因此调查拷问了许多日子，并没有得出什么结果，周延儒的那些罪状大多是事出有因，查无实据。查来查去，倒查出一条无关紧要的事情来：有人反映，周延儒自称“颇有回天之力（对皇帝的影响力）”，而且在背地里叫皇上是“羲皇上人”，实属大不敬。

所谓“羲皇上人”就是指太古之人，但一般很少有人用这个词。陶渊明在文章里说：“常言五六月中，北窗下卧，遇凉风暂至，自谓是羲皇上人。”是一种很潇洒的说法，或许有几分自嘲，却绝无贬义。状元出身的周延儒书读得多了，喜欢玩些文字游戏，把皇上两个字夹在“羲皇上人”里面，作为一种代号，多半是为了好玩，并没有什么恶意。但崇祯帝却是一个毫无幽默感的人，觉得大臣，特别是像周延儒这样的亲近大臣，给自己起外号，简直不可思议，的确是有大不敬的味道。于是他抓住了这一条，反覆追问周延儒到底是怎么回事。

周延儒真是有苦说不出，总不能说是为了好玩才给皇帝起个代号吧。所以在这个问题上他就一直支支吾吾，不肯明白回答。在这种情况下，他也只能依照惯例上疏乞休了，而且暂时停止入阁办公。他本来还以为这并不算什么大事，希望能得到皇帝温和的慰留，但没想到他的第三封乞休疏（照惯例就是最后一封了）却被在阁中当值的温体仁拟了“准予休告”的旨，而且被皇帝批朱通过了。于是这位年轻的首辅只能回家乡去“调养”身体。这时是崇祯六年（1633）的六月。

周延儒就这样在一场利害之争中败下阵来，而且直到最后也没有弄清楚，到底是温体仁还是崇祯帝让他下了臺。周延儒离开内阁之后，他的

首辅之位自然被竞争对手温体仁接替。这以后，崇祯帝同他的首辅温体仁似乎有一段相当不错的合作，温体仁也因而成为崇祯朝歷史上任首辅时间最长的一位，整整有4年的时间。

卷叁 励精图治总无期

一 刚明求治

崇祯七年（1634）甲戌又是一个大比之年，三月十五日，通过了会试的贡士们照例入宫参加由皇帝亲自主持的殿试。这是一次大典礼，文武百官都身着斑斓的礼服跪在丹墀上，黑压压的一片。崇祯帝庄严地坐在皇极殿（太和殿）的御座上，等着群臣们一拜三叩的仪式完毕，才见到礼部官员引导着300多名贡士们鱼贯而入，按名次排列在大殿外面。

当年唐太宗策试士人，见到天下学子中的佼佼者们鱼贯而入的时候，曾经极为得意地说过："天下英雄尽入我彀中矣！"此时的崇祯帝却并没有那样的好心情。朝廷以科举取士，重用科甲人才，是明代的祖制。中央和地方的各种要职差不多被清一色的进士佔据着，就连手握重兵，相当于大军区司令（而且兼管地方行政）的各处总督也是清一色的进士出身。但崇祯帝在自己执政的这几年间却深深感到，那些堪称八股文能手的进士们、翰林们，在处理实际军政要务的时候大多是些昏昏聩聩之辈。他很想在自己亲手考选的进士中挑出一批干练的人才，但面对着这一大群神色拘束紧张的书生，他又很怀疑其中是不是真有干城栋樑之材。

前一天才紧急刊印出来的"策问"考卷下发到每一个贡士手上，考生们连忙浏览一番，全都表现出一副大惊失色的样子，有的朝同伴们递送着不解的眼神，有的脑门上渗出了汗珠。这篇"策问"试题中一连提了9个问题，出语严峭无华，却大多切中时弊，噼头第一问就说："同朕共同治理天下的，是士大夫。如今士风不正，欲求无边而见识短浅。想要正士风以復古道，用什么办法可以做到？"

从理论上讲，殿试是由皇帝亲自主持的一次考试，皇帝亲自出题，亲自

监考，亲自阅卷评定名次，因此进士们都得意地自称是天子门生。但长期以来，明代的皇帝们大多对朝政毫无兴趣，因而所谓主考只是名义上的，有的皇帝仪式性地在考场上露一下面，有的则根本不出席，全部事宜都交给内阁大臣去处理。只有事必躬亲的崇祯帝才每次殿试必到，而且每次都认真地直接过问考试的各个环节。殿试时间较短，通常只考策论一道，就是根据皇帝提出的“策问”回答自己对于一些治国大政的意见。这相当于试题的“策问”通常也是由内阁拟出两三种再由皇帝挑选，大多空泛无实，贡士们也是以空对空，写上些歌功颂德的话交卷，反正除了极个别的例外，全体参加殿试的贡士都能得到一个“进士及第”、“进士出身”或是“同进士出身”。

因为有这样的传统，这一次参加殿试的贡士们早就通过各种关系从内阁里套出了原拟的两道“策问”，事先写好了两篇洋洋洒洒的空洞文章，准备在殿试的时候誊写一遍就交差过关。谁知道，崇祯帝这一次对内阁所拟的两道“策问”都不满意，于是自己重新作了一篇。

虽然只是一篇试题，他却实实在在是有感而发，因而这篇“策问”很清楚地反映出他在当时最关心的问题和对时事的看法。这篇300多言的“策问”共有9问，可以归结为5个方面。最初的一问表现了他对于整个官僚集团的极度不满，在他看来，官僚们在整体上已经腐败之极，士风败坏，庸碌无能，对此非彻底整治不可。但用什么办法才能重振士风，使得官僚们勤廉兼备，德才并茂，他自己心中却毫无成算。除了端正士风之外，“策问”中提出的问题还包括抵御外患、消弭内乱、治理财政和破格用人。对于每个方面的问题他都正面表述了自己的看法，然后指出问题的核心所在，要贡士们提供解决问题的办法。对于外患，他认为满洲本来只是属夷，地域狭窄，人口稀少，但一旦对本朝发起进攻，竟然势不可当，实在不可思议。对内乱，他以为流贼与天灾互为因果，很难从

根本上解决问题。关于财政他讲得比较具体，说是流寇蔓延，兵事孔急，国库空虚，粮饷不继，进言的人却不考虑国家大局，总是要求减免税收。人民是国家之本，朝廷怎么会不怜恤呢？但又要恤民，又要养兵，两全之策却不知是什么。最后他特别提到：唐、宋时代文职武职本没有什么高低贵贱的区别，国初的时候用人也不一定都是科甲出身，而现在却成了牢不可破的规制，这种压抑人才的陋规非改不可。

贡士们常年潜心于八股文，对这些重大国政当然提不出什么真知灼见。他们在皇帝眼睁睁的监视下才发现，题目同原来打听到的完全不一样，一时心烦意乱，文思全无，定了好一阵神，才硬着头皮各自应付了一篇，交卷。

崇祯帝自己对这篇“策问”却是极其郑重其事的。国事日趋艰难，心中毫无成算，他很想通过候补进士们的集思广益找出这几个亟待解决的问题的答案，同时也能发现几个人才俊杰，以便让自己的帝国由乱而治，重新昌盛起来。因为有过很高的期望，见到那些言之无物的“策对”答卷就更叫他失望。内阁在初评后按规定把12份最好的考卷标定名次进呈御览，崇祯帝把这些“策对”仔细研读了一遍，觉得竟没有一篇能让他满意。难道天下人才真的枯竭到这种程度了吗？他仍然不甘心，让内阁再选一些比较好的送进宫来。辅臣们只得又选送了12篇。仍然不好，但其中的一份总算针对“策问”中的问题说了一些自己的看法。打开弥封一看，是河南杞县举人刘理顺。崇祯帝只好矮子里拔将军，把这个刘理顺钦定为一甲第一名状元。

其实这位刘理顺也并非有什么真才实学，只是关系少没门路，在殿试之前没有探听到内阁原来拟定的试题。因为本来没有特别的准备，见了崇祯帝亲自出的“策问”反而不紧张，从容抒写，竟中头魁。有些时候，老实人并不吃亏。

这次小小的殿试制度改革，只是崇祯帝在执政期间所进行过的无数次革新尝试中的一次，而且也像他所进行的一切革新项目一样，丝毫没有取得实实在在的成效。他御极已有7年，一直痛切地感到朝中无人才，天下无人才。他手下的文武官员们也确实是无用的居多。明朝特重科举，科举考试又只重八股文，引导大批士子终身读经制艺，头脑中除了程朱理学的一套性情义理的教条之外空空如也。这就造成明代各级官僚和士人只会空谈天理，极少政治、经济和军事才能。《明史》上说："明季士大夫，问钱谷不知，问甲兵不知。"是很公允的评价。空谈之余，在士大夫中逐渐形成了一种重"德"轻才，重义理轻实际的意识形态至上的风气。东林党人总体上比较清廉正派，为了他们自认为的正义也曾轰轰烈烈地流血牺牲，但其中却很少有干练的政治家。而且这个政治派别的最早起源恰恰是同反对干练的政治家张居正有关。在一次讨论京城防御清兵的时候，有人提到使用西洋人汤若望教习的火炮部队，天下最负盛名的理学家，左都御史刘宗周竟然说："汤若望向年倡说天主邪教，蛊惑人心，堂堂中国，止用小技御敌，岂不贻笑天下！"而朝野中的士人竟也对刘宗周的凛然正气大为折服。

崇祯帝在即位之初就对朝士们的迂阔无用早有领教，随着国家危机的日趋严重，他对于大臣们的失望也越来越强烈。为了改变这种状况，他在文官制度方面也进行过多种革新的尝试，崇祯七年（1634）前后推出的就有：从知县、推官中选拔人才入翰林院；不拘资格任用科道；内阁大学士兼用朝臣和外臣；破格起用特殊人才等等。这些改革大体是为破除多年来用人只重进士、进士中又特重翰林词臣的陈规。因为进士也罢，翰林也罢，只不过是《四书》烂熟，文章优秀而已，并不见得就有经邦治国之才。而明代歷年"非进士不入翰林，非翰林不入内阁，南、北礼部尚书、侍郎及吏部右侍郎，非翰林不任"，既压抑了各方面的人才，也使得政府高级官僚长期脱离实际，缺乏解决问题的能力。为了改变这种局

面，崇祯帝一面命令直接从有实际工作经验的地方官员中选拔人才任翰林院的编修、检讨，以改变翰林院的结构；一面从没有翰林经歷的官员，特别是由知县、推官起家的官员中遴选内阁辅臣。崇祯八年（1635）他首次任命知县出身的张至发为内阁大学士，以后任用的地方官出身的阁臣还有薛国观、程国祥、范復粹等数人，其中张至发、薛国观、范復粹都做过首辅。

崇祯七年（1634）同样是武选的大比之年。明朝的科举制度文武并行，武科同样有生员、举人的名目，武举还3年一次参加会试。但由于明代一向重文轻武，武生、武举的社会地位根本不能与文科的秀才、举人们相比，而且武举通过会试后也只是酌情授予武职，不给进士的名分。在天下刀兵纷纷，急需军事人才的情况下，崇祯帝觉得，这个武选的制度也该改一改了。

还是在崇祯四年（1631），武举会试，武场考试中能挥动百斤大刀的只有徐彦琦和王来聘两个人，但发榜时徐彦琦却因为文场考试成绩不佳而没有中选。崇祯帝瞭解到这个情况后大为恼火，天下军情孔急，正是需要将才的时候，而主试者却还是固执于重文轻武的旧规，选拔武士居然也以文章为主。他把主考的两位詹事府词臣杨世芳、刘必达逮捕严办，同时下令重新举行会试。这一次的做法以后成为定例，武会试以刀马骑射的武艺为主，文辞为辅。为了提高武科的地位，崇祯帝还决定从这年起，武会试之后增加殿试，同文科一样授予中试者进士及第、进士出身、同进士出身的功名。另一个能耍大刀的王来聘于是成为明朝的第一位武状元，当即被授予副将职衔（在武职中仅次于总兵官）。

即便能耍得大刀，射得好箭，也未必就真是将才，何况武场的考试积弊多年，管理松弛，从来等同儿戏，耍刀射箭的武艺也不见得是真的。崇祯七年（1634）秋天的武选会试就搞得乌烟瘴气，第二场考步射，正赶

上飏起了大风，射中的极少，监试官就提请只要中一箭的都算合格。有人说，考骑射的场面更加令人吃惊，许多人都是让僕人牵着马跑到靶子前面，用手把箭插在靶子上。如此武艺怎么能对敌作战呢？因而崇祯年间偶有一两个能打仗的将领，大多是行伍部卒出身，很少有武举、武进士起家的。这一番武试革新同样毫无成效可言。

在用人的风格上，崇祯帝确实有些不拘一格的特点，而且一直在探索着通过科举、词林、科道以外的非常规途径网罗人才，一直尝试着文才武才并重、科第保举并重、朝官外官并重等一套新的用人办法。从明朝选官用人制度的弊端来看，他的这个思路还是很正确的。但他本人实际上根本就缺乏统筹安排进行制度改革的能力，而且又自以为是，从来没有组织得力班子作过周密的筹划，只是凭着一时的激动随意降旨。对各种破格使用的人才，他又很少认真进行过周密考查，更谈不上长期培养。而一旦印象改变，罢免的时候也极轻易。因而崇祯时期用人极多，用人途径极广，真正有用的人才却没有几个。另一方面，用人制度的改革势必会侵犯朝官集团的既得利益，因而遭到他们的强烈反对，使得君臣之间更加离心离德。因此他的用人改革想过无数办法，坚持了许多年，但陡然增加了朝政的混乱，却始终没有收到预期的效果。

崇祯七年（1634）是相对平静的一年，政治上没有出现什么大的纠纷，除了在秋季后金军第二次入塞，在宣府、大同一带进行了一番骚扰之外，军事上也没有什么重大的失败。在这相对平稳的一年里，崇祯帝一直在努力地抓理财、抓军事、抓吏治，要把自己的政权建设得更加巩固起来。他一直遵奉着乱世须用重典的信条，喜欢用不测君威震慑群臣，以激励臣子们用心办事。因而在并没有出现什么大乱子的这一年里，仍然有大批官员由于在各种政务和军事活动中的失误而遭到制裁。吏、户、礼、兵、刑、工六部的尚书和都察院的左都御史几乎都受到了严厉

处分，分别被停职、罢官、削籍或是逮繫问罪。

这年的四月，第一个被削籍为民的高级大臣是户部尚书毕自严。事情的起因在上一年春天。当时有个华亭（今上海淞江县）知县郑友玄通过考选升任为御史，已经被任命。但关心细务的崇祯帝在仔细研究过有关材料后发现，这个郑友玄在原先任青浦知县的时候曾经拖欠过金花银2900两。金花银是明朝后期在正税之外附加的一项钱粮，直接提解到内库作为皇帝的私人收入。崇祯帝对于这项私人财产一向看管得很严，多次谕令户部按期按量收缴，对于歷年的拖欠绝不宽缓。郑友玄身为地方官，拖欠钱粮本来不能参加考选，何况拖欠的又是皇帝自己的收入，尤为可恶。因此崇祯帝严旨要户部回奏，郑友玄钱粮未完，户部为什么虚报知会吏部，让他得预考选？户部尚书毕自严连忙上疏解释，说郑友玄在此前已经用个人的钱财交库，完纳了十分之七。崇祯帝再命管库的太监核实，回说根本没有郑友玄交纳逋赋的记载。这里面到底是户部书吏做了手脚还是内库太监做了手脚，毕自严无法弄清，只能找些藉口为自己辩解，并且发誓诅咒，表明自己在这件事上绝对清白。崇祯帝大为恼火，立即罢了毕自严的官，并且把他抓进监狱。

毕自严从崇祯元年（1628）开始任户部尚书，在六部尚书中资格最老，而且年逾70，多年主持帝国混乱脆弱的财政，没有功劳也有苦劳，却为了一件说不清楚的小事罢官入狱，许多官员都有些为他不平。御史李若说、给事中吴甘来等人上疏为他求情，希望至少先让他在家中待罪，听候处理，免得因年老多病，一旦死在狱里，“致皇上不能全其恩”。但崇祯帝要严办毕自严，却是有意要给户部和地方官员一点颜色看看。

几年来，国家的财政一直处于破产的边缘。造成这种严重局面的原因，一是因为军费开支太大，二是由于各地灾民流离失所，许多地区正额和加派的赋税严重拖欠，根本收不上来。在崇祯帝看来，有额无税，全是

各级官吏特别是地方官的贪污与无能造成的，因而多次严申要彻底核查“逋赋”（拖欠税收）。他自己也天天抱着账本、拿着算盘，像个账房先生一样地给各部门各地区的官员算细账。只是他这个账房先生掌握着生杀予夺的大权，一旦算出毛病就会凶相毕露。有关部门根据皇帝的意旨议定：各省巡抚、巡按要负责对所属府、州、县的税收情况严格审核，知府完不成应缴钱粮的不能提升司官、道员，推官、知县完不成应缴钱粮的不能参加考选升迁，而且都要根据情况降级罚俸。几番清核之后，有些逋赋严重的地区，地方官被罚俸累计几十年，降级达80多级，就是做上几辈子官，每年都连升3级，也抵不上所罚之俸，所降之级。

严格催科的结果却是使户部的办事人员得意起来，地方官员到京奏销钱粮，都先备厚礼贿赂户部书吏，只要贿金够了，书吏们自有办法在账面上把该地的税收结清。如果不送礼，就是已经结清的地方也可能变成没有完成税收计划。因此京中有一句传言，叫作“未去朝天子，先来谒书手”。这种情况会给财政收入造成什么结果，可想而知。崇祯帝对户部作弊的情况也多少有所瞭解，因而对理财无方，贪污有道的户部官吏更加痛恨。毕自严主管户部多年，既没有想出解决财政危机的办法，又不能严格管辖手下的司官书吏，令人切齿，实在应该得到严惩。但仔细想起来，毕自严多年苦撑残局，竟然找不到什么大的罪行。因此在耍了一通威风之后，崇祯帝竟然难得地开恩释放了毕自严，让他出狱在家听候发落。这个案件用了一年工夫也没有查清到底是怎么一回事，直到这个时候才匆匆了结，毕自严还比较走运，只是被削籍为民，回家当老百姓去了。

在毕自严之前和以后，被崇祯帝处分的大臣，自内阁大学士至尚书、侍郎、都御史，总共有数百人之多。崇祯帝轻于用人，也轻于治人，在他17年的统治中，先后任用过整整50位内阁大学士，人称“崇祯五十相”，

这不论在明代还是歷朝歷代，都创下了最高纪录。六部、都察院的首长更换也同样频繁，在整个崇祯时期，共任用过吏部尚书13人，户部尚书8人，礼部尚书11人，兵部尚书17人，刑部尚书16人，工部尚书13人，都察院左都御史13人，七卿的平均在任时间只有一年零两个半月。在崇祯的17个年头中，朝廷中最重要的大臣像走马灯似的你来我往，交替更换。崇祯帝好像是想在这频繁的更换中最终物色到自己中意的贤臣，但最后还是都不满意。

更换朝臣常常伴随着严厉的处罚，罢官、削籍、坐牢、流放、杀头，几乎成了崇祯时期各级官员们的必然归宿，多年做官而不受处分的反倒成了不正常的现象，被人当作捣鬼有术的怪物。但惩办主义并没有真的让官僚们振作起来，却使得相互推诿，逃避责任，做一天和尚撞一天钟的风气大为盛行。兵部协理戎政尚书陆完学主管京城卫戍部队的训练，凡事只知唯唯诺诺，居然做满了一任平安司马。在离京的时候他的继任张四知为他饯行，他特地把做官的四字真经传给了继任者，就是“行无所事”。张四知果然照着办了，来了公文就批“照行”，绝不多置一言，后来竟然还入阁当了辅臣。这位张四知又把“行无所事”的四字真经到处宣传，说依照而行，甚为得力。

在惩治失误官员的同时，崇祯帝更下了狠心惩治贪污。正如前面讲到的，明代官僚的贪污腐败是结构性、制度化的，为官必贪。而且不但官员贪污受贿，凡属宦官、师爷乃至门房、皁吏，只要职位同国家权力连上点边的，没有一个不贪污不受贿。兵部尚书傅宗龙因得罪皇帝被下狱，刑部国家监狱要收入门费，而且每一道门都要收费，傅宗龙走到“天下太平”门前，身上的钱已经告罄，狱卒却死活不让他进去。这位大司马只好先席地坐在监狱的院子里，派家人再回去取银钱，最后才算奉旨入监。甚至御史们到会极门投送奏本，守门太监也要按例收取三钱银子的

手续费，没有钱就拒绝接收。天子门前尚且如此，风气可知。

崇祯帝一向对于官员的贪污贿赂深恶痛绝，但好像一直也没有弄明白造成这种无官不贪局面的内在原因，总是想利用手中至高无上的权力和强硬的手腕来扭转这种贪污成风的局势。从技术的角度讲，要压下贪腐之风至少要具备两个条件：一是在俸禄制度上保证官吏的基本收入符合当时社会公认的官吏生活标准；二是建立严格有效的监督和处罚机制。前面一条由于饷匮粮乏也由于崇祯帝生性吝啬，他连想也没有想过，因而只能从后一方面努力。

明朝本有一套监察系统，就是都察院及其所辖的100多位御史。但同整个政治系统一样，监察系统也是头重脚轻，效率低下。全部御史名义上都是京官，以中央特派员身份监视地方的巡按御史在一般情况下每个行省只有一人。贪污的渊薮和第一起点却正是在地方上，以一个人的精力监督全省几十个府县的数百名官员，实际上只能以空对空。而且全部监察系统的作业方式都是陈旧的个人负责制，由每个御史根据自己的好恶“风闻奏事”，都察院和御史们本身没有制裁处理的权力，甚至也没有组织调查的权力。在缺乏机制性制约的情况下，即使都察院的全体人员都奋发努力，疾恶如仇，也只能检举少数几起撞到枪口上的恶性案件，对于官场上瀰漫的贪贿之风还是莫之奈何。何况普通御史只是七品职衔，俸薪之低几乎为全体官员之最，御史也要生活，也要排场，因而也得受贿。事实上明末御史贪贿大案发生过多起，天启时崔呈秀巡按淮扬，贪赃受贿达数十万两，被都察院自己检举出来，劾疏中说淮扬士民“无不谓自来巡方御史，未尝有如呈秀之贪污者”。这是说过去的巡按贪污程度都没有崔呈秀那样严重，并不是过去的巡按不贪污。崇祯时期也发生过淮扬巡按御史史贪污案，他在淮扬任上一度代理巡盐御史职务，主管盐税，仅几个月工夫就贪污盐税21万两。由贪官监督贪官，其

效果可想而知。

崇祯帝也知道都察院的监督系统不灵，而且对于朝臣因情面关系通同作弊也一直是疑心重重，所以在他的反贪斗争中更为依重由自己掌握的东厂和锦衣卫特务系统。东厂和锦衣卫是一套集侦查、拘捕、刑讯、判决大权于一身的皇家祕密警察组织，密探遍佈天下，常常深入到官僚家中假充奴僕卧底，探听各种政治、军事、经济情报和关于官员士绅们私生活方面的一些消息。崇祯帝对了解官民的隐私有一种特别的兴趣，因而从来都对这套特务系统非常重视，也很信任。在他的统治时期，厂卫特务组织虽然没有魏忠贤时代那样张狂无忌，侦察办案的效率却是有过之而无不及，常让朝臣有谈虎变色之感。

崇祯帝决心严办的惩贪大案大部分是由厂卫侦查出来密报，全部交由厂卫系统调查审理。崇祯六年（1633）七月，锦衣卫密探侦查到江西彭泽县知县张子廉买通吏科给事中曹履泰谋求升为运同，而且抓获了作为这次交易中间人的监生项珍，还搜到张子廉写给吏部郎中王三重和吏部员外郎弓省矩的请託信件。这本来是明末官场中最常见的事情，但既然被皇帝抓到了，就当成大案处理起来。崇祯帝亲自指示要认真追查，严肃处理，有关人员全部被逮捕。因为案情很简单，又没有涉及有势力的大官僚，案子很快就了结了，几个官员都被革职，张子廉和曹履泰遣戍充军，弓省矩在狱中自杀。崇祯七年（1634）六月，东厂番役又在南京搜查到原任兰州知州李景时託河西道朱纯给南京左都御史张延登写的信件，希望张想办法给李景时安排在南京任职。事发后，朱纯、李景时等人全被逮捕。

对于厂卫系统侦查到的地方官员横徵暴敛肆行贪污的案件，崇祯帝也一律严处。在崇祯七年（1634）先后抓获的地方官员有四川安县知县钟士章、巴州（今巴中）知州杨文明、南直隶和州（今安徽和县）同知邝毓

秀、六安州同知路之泰、湖广京山县（今湖北京山县）知县李春华等一批人，后来都以贪虐的罪名充军边卫。虽然同太祖时期对贪污者剥皮实草，摆在大堂里当作标本展览相比，崇祯帝的惩处还不算太重，但在整个明代的歷史上，这样集中而严厉地处理地方官员的情况却是极为少见的。

问题在于，崇祯帝用来作为反腐败主要工具的厂卫系统自身就极为腐败。东厂和锦衣卫从主官到吏卒爪牙没有一个不贪狠异常，不但受贿索贿，还常常有意制造冤案，趁机勒索。时人记载，崇祯中期的锦衣卫指挥使吴孟明缓于害人而急于得贿，每缉获到州县官员送到京城的礼单就故意把收受双方的名字洩露给当事人，然后挨家索贿，直到满意了才罢手。东厂也是同样，有一个知县送了24两银子求翰林胡守恆撰写一篇文章，被东厂侦查到，去找胡守恆索贿。胡守恆还根本不知道这件事，但为了避免麻烦，还是送给东厂上下1000两银子才消了灾。鑑于有这种情况，可以想象，那些被揪出来的贪官污吏虽然大部分都是罪有应得，却只是贪官群体中极个别的倒霉鬼，真正神通广大的贪官们是很难受到惩治的。在崇祯帝严厉惩贪政策中得到好处的反而是贪鄙成性的厂卫特务组织。

尽管一次又一次地严惩，由于不得要领，崇祯帝的反贪倡廉运动没有见到丝毫成效，贪污贿赂的行为反而在不断髮展。到灭亡的前夕，京城里授官索价已经高得惊人，而且明码标识，绝不还价。知县要进京做主事，任职兵部的要1000两，任职礼部的要2000两；部郎外转道员，好地方需要5000两，有一位讨价还价，只给了3000两，结果只被授了一个知府。但到那个时候，崇祯帝已无暇也无心过问这些“小事”了，只能让这腐败之风同腐朽的王朝一起覆灭。

选拔人才不得要领，肃贪倡廉没有成效，士风不振，百病丛生。正是面

对着这种无可奈何的局面，崇祯帝才又重用起身边的太监来的。但在这个问题上，他在内心里一直处于深刻的矛盾状态中。

歷朝歷代的皇帝们总是倾向于把宫中的宦官看成绝对亲信和真正的自己人，尽管歷史上出现过无数次宫奴太监仗势弄权最后把皇帝本人也玩弄于股掌之上，甚至直接生死废立皇帝的，大多数专制君主还是喜欢把宦官当作最容易操作也最值得依赖的一个群体。崇祯帝读过许多歷史，也亲身经歷过魏忠贤专权时代的惨痛，但在他自己的独裁生涯中，在对待和任用太监的问题上，却还是不能突破歷来的模式。在宫中，他对宦官其实是相当严厉的，为了一些不大的过失受到杖责、监禁、罚充净军甚至处死的大小太监不计其数。被派到各地执行公务的太监如果出现失误，受到的处分也往往要比廷臣严重得多。在崇祯中后期，有一大批监军太监因负责的地方军事失利而被杀掉。

但这种严厉表现出的是一种主子对奴才的威风，当他同“外人”打交道而把宦官们当作自己家里的一个分子（尽管是地位极其低下的分子）的时候，他的心理感觉就大不相同了。他同朝官的关系通常很不好，互相轻蔑，甚至互相敌视。而在这种同朝官的对立中，他就很本能地把自家的奴僕当成了自己的一种资源、一个筹码，忍不住要充分利用。在17年的统治中，他曾经3次大规模招募宦官，共增加宦官1万多人，每月仅增禄米即达7万2千石，年增靴料银5万两，宦官的人数超过了前几代。拥有这样一大批宫奴，崇祯帝似乎觉得在同朝臣的明争暗斗中更有了底气，于是，凡是在他同朝官关系特别恶劣的时候，总会出现太监权力膨胀的情况。

早在崇祯四年（1631）的秋天，他已经开始对于朝臣们的能力和品德失去信心。他最发愁的事情是辽东的敌情，陕西、河南的民暴和财政的匮乏，而在这几个方面，朝臣们不但不能为他分忧解难，而且常常对他有

意欺瞒，让他连基本情况都摸不清楚。他或许是出于无奈，或许是故意想让朝臣们难堪，在这个时候决定重新起用中官监督各要害部门。

九月初九日，崇祯帝特命宫中太监王应朝、邓希诏等人出京监视山海关、宁远、蓟镇等处军粮以及各边防抚赏情况，实际上就是用这些太监充当各战略要塞的特派员，直接向皇帝传递情报信息。二十六日，他又任命司礼太监张彝宪监督户部、工部两部的钱粮往来，并特意为这位大太监建立衙门，称作“户工总理”。不久，他又派遣太监王坤、刘文忠、刘允中等人监视宣府、大同、山西等处兵饷。再后，则几乎每支部队都有太监监军，每处重镇都有太监镇守了。

由太监监军的办法，尽管在明朝也算是自古有之，但由于太监们依靠在宫中的势力，难免要营私舞弊、贿赂公行，而且事权不一，将帅被太监掣肘，也给军事行动带来许多不便，这种制度早在嘉靖年间就已经被革除，直到魏忠贤专权时才再次恢復。崇祯帝拨乱反正，全部撤销监军太监，当时是得到了一致喝彩的。但仅仅过了不到4年的时间，这种弊政却再度被恢復，而且变本加厉，超过了以往任何时候的规模，这不能不让朝臣们大为震惊。

在朝臣们看来，恢復太监监军、监部的制度，不仅意味着将要破坏军务、政务，而且体现出皇帝对于朝臣极大的不信任，甚至是极大的轻蔑。更为重要的是，由太监监军、监部还将大大侵夺朝臣的权力和利益。为此，朝臣们对崇祯帝的这项决定表现出空前一致的坚决反对。给事中宋可久、冯元飙等十几人交章论谏，不被理睬。南京侍郎吕维祺纠劾辅臣不能匡正天子，转弯抹角地还是批评皇帝。吏部尚书闵洪学以百僚之长的身份率领全体朝官共同上疏，反对内臣参预军政。崇祯帝为此召见群臣说：“如果你们都能殚精竭虑为国效命，朕又何必用那些内臣呢？”于是一项一项逐一指责朝臣的偾事与无用。朝臣竟然也无言以对。

崇祯帝再次重用太监，很重要的一个原因是他把那些每天在宫中同他生活在一起的太监们看成是自己耳目的延伸，派太监出宫办事，就是四面散佈下了自己的诸多耳目。既然朝臣、边帅都已经无可信任，多派太监四处收集情报并在关键时刻代表自己处理要务，他认为是非常必要的。此外，对于朝臣中长年积累下来的陋习弊端，似乎也只有任用太监才能克服革除。

果然，受命监视宣府的太监王坤到任不久就检举新任宣府巡抚马士英挪用库存饷银6000两，于是马士英立即被逮捕审问，不久被判处流放遣戍。这个表面上看来很简单也处理得很公平的贪污案却在朝官中引起许多不平。原来，根据多年来的陈规，每一个新被任命的巡抚在上任后，应该立即给京中各要害部门送上一大笔礼金，数目都是有规定的。但新任的巡抚通常并没有那么一大笔钱，于是歷来都是先从库银中预支，等以后有了钱（当然也是靠受贿而来）再行补垫。也就是说，马士英的所作所为尽管不符合法规条例，却是多年来所有的人都这样做的，是符合惯例的。对于朝官们来讲，这些陈规惯例是自己应有的一种权益，不应受到破坏，不然的话，皇家所给的那点微薄已极的俸禄连餬口尚且不够，更不要说置家业，立恆产了。但崇祯皇帝却不想考虑朝臣们置业立产的事情，他只是痛恨朝臣们的舞弊和贪黩。王坤之类的无情检举可谓正中崇祯帝的下怀，更使他以为只有内臣才能决绝情面，剔除积弊，也只有利用内臣才能对腐败的官场进行彻底整顿。

在这样的背景下，太监们的势力迅速膨胀起来。身为户、工两部总理的司礼太监张彝宪俨然是钦差大臣，在户、工两部颐指气使，把尚书、侍郎全不看在眼里，还命各司郎中以下官员都要来拜谒。工部侍郎高鸿图不愿身居于太监之下，上疏抗议说：“臣部有公署，中间是尚书之座，两旁是侍郎之座，这是国之大体；而今内臣张彝宪奉命总理二部，位在尚

书、侍郎之上，这是有辱朝廷，亵渎国体。臣为侍郎，是尚书的副手而非内臣的副手，为了国之大体，臣不能不慎重其事。”崇祯帝对高鸿图的抗议置之不理，高鸿图于是接连7次请求辞职，崇祯帝被惹火了，一怒将他削籍为民。此外，工部主事金铉与同仁相约不要私行拜谒，惹恼了张彝宪，也被纠劾免职。工部尚书周士朴由于不愿配合张彝宪工作，有旨诘问，在崇祯七年（1634）也罢官削籍而去。其他如南京御史李曰辅、礼部主事周镳等都以攻劾张彝宪被罢职，工部管盔甲主事孙肇兴为了攻击张彝宪误国还被治罪遣戍，给事中庄鳌献请求撤回内臣监军，被下狱治罪。

朝臣们同太监斗争动辄得咎。太监们更为嚣张起来，甚至有点忘乎所以了。监视宣府太监王坤上任后先是弹劾倒了巡抚马士英，接着弹劾倒了巡按御史胡良机，进而参预朝中大事，上疏弹劾起朝中大员，甚至直接导致了内阁首辅周延儒的下臺。普通的文武官员深受宦官欺压，更为不堪。崇祯六年（1633）七月，总兵官张应昌率军到晋南围剿农民军，军中的监军太监阎思印趁机大肆向地方索贿，汾阳知县费甲鐄因为满足不了这位大太监的要求，百般无奈，竟然投井自杀。各地被出京的太监挟制凌辱的官员怨声载道，朝中官员们反对太监监军干政的呶声也从没有断绝。

虽然在表面上，崇祯帝任用太监坚决果断，不容朝臣提出异议。但他心里却也有几分明白，宦官们虽然是自己人，但那些生理和心理上都有致命缺陷的宫奴们同样多是贪鄙昏聩之辈。他用这些人做心腹和骨干，一是因为“内”“外”有别，有一种心理情感方面的因素，另外也是不得已的无奈之计。何况他又是一个极好面子、极重声誉的人，也分明知道，过分重用内臣，不论是在现实的口碑中还是在将来的歷史记载上，大概都不会得到什么好评。这一点凡是读过些史书的人都会懂得，崇祯帝的史

书读得很多，也颇精，又极想在青史上佔据一个超过唐宗、宋祖那样的位置，因而任用宦官不但是朝臣的一大心病，也是他自己的一大心病。

因为总是一块心病，他会时不时地表露出来，一说到任用太监就忍不住要控诉朝臣的不力，倾吐自己的苦衷，极力为自己的这个做法辩解。在同朝臣的关系比较缓和的时候，他还会主动提出裁撤监军、管部的太监。

崇祯七年（1634）八月，崇祯帝就做出了一次这样的决定。他为任用太监的事情发表了一份特别上谕，但先把朝廷官员大肆指责了一番："国家开科取士，对官员寄予厚望，待遇优隆。朕御极之初，撤还镇守内官，天下大事全部听凭朝士裁处。不想诸臣营私舞弊，推卸责任，不恤百姓艰辛，置民生于度外，甚至刻剥侵吞以图升官自肥。间有一二清廉谨慎者，又拘泥迂疏，不能恪尽职守，或是性情钝陋，被属下欺矇；即使有少数能不徇私情，却又因循推诿。总之居官只求有正直之名，于时政毫无建树。……这都是士大夫负国家之恩！"批评够了，才转而说自己是不得已才"恢復"祖制，任命内臣出边监军，并添设两部总理，都是一时权宜之设，同时也是为了让朝臣们自我反省。现在制度初步理清，官员们或许也认识到了自己的耻辱，所以决定将总理、监视等内官酌量撤回，以证明当初派遣都是为了国家的安危起见。这次裁撤内官留了一个尾巴，着名的太监军事家高起潜没有被撤回来，仍然负责监视山海关、宁远两镇军事。据崇祯帝说，这是因为关、宁的战略地位太过重要，暂时无法撤回。

从起用太监统兵理政，到自圆其说撤除太监，崇祯帝被自己的矛盾心理推动着转了一个圈子。从此以后，他开始沿着这个圆圈旋转不止，而且频率越来越高，旋转的速度越来越快。太监监军甚至直接任命太监为军事统帅的情况不断髮生，又一次次地被他自己否定，重新撤回。最先被

这种无止无休的反覆弄烦了的反而是对内臣监军最不满意的朝官们，到崇祯朝后期，他们已经懒于再提宦官领军的事情了。只有崇祯帝自己，还是被英主之名和执政实利两种诱惑交相驱使着，仓皇反覆，转圈不已，直到灭亡的时候也没有决定下来，到底是重用内臣好还是不用内臣好。

一次又一次自以为是的改革图强都不见效，崇祯帝渐渐感到了形势的难以抗拒，自信心不断受到打击。崇祯七年（1634）以后，他的朝气蓬勃日渐消退，却仍然自以为是，而且更加任性，更加狐疑，做事更没有章法。他仍然在渴望着天降奇才，仍然在破格用人，但破格常会破出笑话来。明末士大夫中广为流传的有好几起崇祯帝滥用“匪人”的事件。

最早的一起发生在崇祯九年（1636）初，有一个山阳县（今江苏淮安）武举叫陈启新的跑到京城向皇帝进言，因为没人理睬，就在正阳门前面跪了3天。崇祯帝在宫里听到这个消息，觉得新奇，派人把他的奏疏取了进来。陈启新的进言里面说：“天下有三大病。士子作文高谈孝悌仁义，而做官后就恣行奸慝，这是‘科目之病’。国初典史授都御史，贡士授布政使，秀才授尚书，嘉靖时还是进士、举贡、杂流三途并用，现在却只用进士一途，举人、贡生不能升至高官，以至于一中进士就行为放诞，这是‘资格之病’。旧制教官也可以作给事、御史，后来稍严，举人为推官、知县者仍可选任，如今只从进士中选用，剥下虐民，恣其所为，这是‘行取考选之病’。……”

陈启新所说的正是崇祯帝平日最关心的用人问题，而重点攻击的又正是崇祯帝深为痛恨的由进士包揽一切要职，因而极受崇祯帝的赏识。崇祯帝觉得，一个被士大夫们所不齿的武举竟然与自己“英雄”所见略同，本身就证明卑贱者最聪明，反过来也说明士大夫的无能无用。他立即传旨破格任用陈启新为吏科给事中，准备将来再委以重任。给事中虽然只有

从七品，却是显要之职，通常士人得中进士之后再考取翰林院庶吉士，经过3年学习，成绩比较优秀的才能担任。另一条渠道就是所谓“行取考选”，是进士出任知县、推官或是小京官多年之后，政绩优异，经过考核选拔后任用。陈启新以一个武举的身份，由于进言合于圣意就直升为给事，这引起了朝士们极大的愤慨。

更为严重的是，一个小人物因进言而受到天子的青睐，升官晋爵，又给民间无数小野心家带来了挡不住的诱惑。在陈启新之后，各种闲杂人等上京进言的如同赶集逛庙会，纷纷扰扰，无止无休。其中一些人还提出足以让朝臣们震惊的建议。

这年四月，一个比陈启新还低一个档次的武生员李琎进言说，缙绅豪富之家，大者家产千百万（两），中者百十万，以万计者不可胜数，应令他们以私产输官助饷，可以满足国家急需。这种剥夺豪富资产的提议在当时简直就是大逆不道的异端邪说。大学士钱士升为此拟旨，要把李琎交法司严加治罪，并且上言说：“这是衰败时代的乱政，李琎竟敢以此向皇上进言，真是小人之肆无忌惮者！”“郡邑有富户，也是贫民的衣食之源。因为兵战不息而归罪于富户，籍没其家，这是秦始皇、汉武帝横徵暴敛的时候也没有用过的手段。”到底谁是谁的衣食之源，我们没有必要去同古人辩论了。崇祯帝毕竟是统治阶级的皇帝，虽说听到能够满足国用不由食指大动，但在朝臣们的一番“大义”面前还是裹足不前了。他没有敢实行蒐括富户的政策，但也没有按照钱士升的意见治罪李琎，以广开言路的名义放过了李琎。

朝臣们却不能对这种况状保持沉默了。言官们比以往任何时候都团结一致，积极行动起来，发动了一个反对任用陈启新的高潮。高级大臣们也跟着披挂上阵，钱士升藉着李琎进言的事件对任用陈启新提出了激烈的批评：“自陈启新言事直升给事，近来借进言为名希图侥倖的大有人在，

……大乱自此始矣！”崇祯帝对自己的创新遭到朝臣反对大为光火，见到阁臣居然也参预进来更是愤怒，在钱士升的奏本上批旨道：“即使想沽名钓誉，此前《四箴》一本已经足矣，何必这样喋喋不休？”钱士升见皇帝动怒，只得乞求退休，立即就得到了批准。

言官们却还是不屈不挠，御史詹尔选上疏说：“辅臣钱士升不过偶然因一事代天下抒发郁愤，竟致罢去，恐今后大臣没有敢于言事者。大臣不敢言，则小臣更难言事。每日与皇上言事的，都是苛细刻薄，不识大体之徒。貌似忠直，如狂如痴，得计则招摇于朝，败露则逃之夭夭，骇人心志，乱人耳目，隳弃成法，酿造隐患。如此以往，天下大事还能忍心再说吗？”崇祯帝见他疏中所言，句句都在尖刻地讽刺自己，顿时大怒。他在武英殿召见了詹尔选，声色俱厉地质问：“朕如此终日焦劳，天下人还怀疑朕吗？”詹尔选却极为强硬，绝不屈服认错。崇祯帝气急败坏，命锦衣卫把詹尔选抓起来拷问治罪。大臣们却集体跪在皇帝面前请求宽免。崇祯帝顶不住朝臣的压力，最后才改为由本部门议罪。第二天，都察院议处只是停俸一年。崇祯帝不满，命会同吏部再议。两个部门合议的结果仍然只是降级调用，又被驳回。经过几番反覆，詹尔选终于被革职削籍，但毕竟是全身而退了。

一个面临着亡国危机的破败朝廷，不用心思去对付那些迫在眉睫的大难，却为了一件莫名其妙的事情君臣之间乱哄哄地大动肝火，这场闹剧本身就是一个亡国之象。而天子和朝臣们却斗得津津有味。此后仍有一批言官弹劾陈启新，都被崇祯帝撤职或是降级。

朝士们没能用直接的抗议赶走陈启新，就改为用阴柔的方法，抓住一切机会对他进行诋譭。陈启新先任吏科，后升任刑科左给事中，先后任职6年，朝士们绝不与之交往，却不断地蒐集整理他的黑材料。陈启新本来是个小人，志得意满后不免招摇过市，家里人在乡下也横行霸道起

来。崇祯帝对这个亲手提拔起来的“人才”也渐渐烦了，因为他丝毫也没有显示出什么经天纬地的治世之才，在言官位置上提出的几次建议也不再能够正好切合皇帝的心意。见到时机成熟，御史们对陈启新发动了新的一轮攻讦高潮，说他请託受贿、还乡骄横，不忠不孝、大奸大诈。崇祯帝明知这是朝士在藉机报復，此时却已经不想再为一个不感兴趣的小人物同朝臣们作对，因而顺水推舟，同意对陈启新进行审查，后来据说是罪有实据，又将其削籍，交由地方官员追赃拟罪。

陈启新虽然不是什么清廉正直的人，却实在没有过贪污受贿的劣迹。因为不论朝官外官，对他本来心存恶意，又怕他收了钱反咬一口，所以没有人去贿赂他，他作为言官也没有贪污的机会。但皇帝已决定对他治罪，要辩白也难，这时候他正回乡在家，听见消息就熘之大吉，从此隐匿不出，直到明朝亡了也没有把他逮捕归案。朝廷官员被皇帝治罪却畏罪逃跑，而且潜逃成功，这在明代歷史上也算一件奇闻。当时兼管苏北地方事务的漕运总督史可法事后对人说：“陈启新其实很穷。如果为他翻案，弹劾他的御史就要获罪；如果坐实其罪，追赃的几千两银子到哪里去找呢？”因此有人说其实是史可法故意放他走的。

正在廷臣们为了一个陈启新同崇祯帝斗成一团的时候，一个头脑比较清醒的大臣，刚刚被任命为工部左侍郎的理学名家刘宗周上了一份《痛愤时艰疏》，正好可以看作是对崇祯帝几年来锐意求治的总结。他在疏中说：

“陛下锐意求治，而圣王治天下之道却未及讲求，行政举措多未得要领。……己巳之役，群臣一无良策，朝廷于是有轻慢士大夫之意。自此以内臣为耳目心腹，为国家干城。治理国家只重刑罚，朝中大政归于琐细，天下大事日趋败坏而无法挽救。厂卫司掌缉察，而告讦之风日盛；诏狱遍及士绅，而官体尊严扫地。人人自危但求无过，欺矇推诿已成风气；

事事仰承天子独断，阿谀逢迎充满朝堂。司法不由刑部主持，罪犯反而更多，皇上勤于办理大小案件，每年亲自审理达数千起，慈悲之心越来越少。……以钱粮收缴考核官吏，官员更贪，胥吏更狠，所欠粮饷更多。严刑催比税收，百姓全无生路，致使盗贼蜂起。用内臣为总理，户、工两部无所作为；以宦官为监军，封疆大吏不负责任。内臣掣肘，督、抚无权，造成将懦兵骄，朝廷无力约束。接连限期平贼，逼迫将士杀良冒功，天下生灵涂炭。”

刘宗周对于崇祯帝几年统治的弱点揭露得太准确太彻底了，竟然使得崇祯帝一改往日的作风，对于这个胆敢如此直言无忌的人没有惩处泄愤。最初见到刘宗周的奏疏，崇祯帝确实暴怒了，疾言厉色地要内阁拟定严旨。内阁连着拟定了4次，都不能让他满意，每一次票拟送上来，他都要把奏疏再重读一遍，然后手执奏章在宫中不停地走动，显然内心十分激动。在接连激动了4次之后，他好像平静下来了，还是亲自批了旨，只是说：大臣论事应当体察国家时势，不应学小臣那样归过于朝廷，为自己争敢言的高名。同时还表彰刘宗周清正耿直。

看起来，对于刘宗周为他作的总结，他也没有办法一概否认。励精图治最后得到的竟是这样一个结果，竟是这样一种评价。他还能说什么呢？

二 下诏罪己

就在崇祯帝不得要领地努力励精图治的时候，各地的农民暴动如火如荼，又有了新的发展。

在崇祯四五年间，主要活动在山西的农民军已经实力相当可观。当时的农民军大股武装据说有36营，总兵力达20万。各股农民军大体上各自为战，没有统一的组织和部署，但反抗朝廷的共同目标又使得他们自觉地相互配合，相互支援，成为一个松散的联盟整体。因而在大的战略方向上，各股农民军常常能够共同行动，步调比较一致。36营中有几支部队后来在战斗中不断髮展壮大，成为对抗明朝官军的主力，其中包括闯王高迎祥部、“曹操”罗汝才部、老回回马守应部和革里眼贺一龙部等，而在歷史上影响最大，终于给明王朝以致命打击的则是八大王张献忠部和闯将李自成部。

张献忠是陕西延安人，万历三十四年（1606）生，家境贫寒。有记载说，他小时候同父亲一起到四川贩枣，在内江因为把驴拴在乡绅的石坊上，驴粪弄脏了石柱。乡绅仗势对张献忠父子又骂又打，还让他们把驴粪用手捧走。张献忠当时怒而不争，暗自发誓道：“我再来这里要把你们都杀光！”他小时候读过一些书，粗通文墨，后来做过延安府的捕快。崇祯初年，陕西大乱，张献忠参加了起义军，由于作战勇敢，又机警有谋略，很快成为一路农民军的首领，自号西营八大王。到崇祯中期，张献忠所部纵横于晋、陕、豫、皖、川、楚各地，八大王张献忠已经是明朝君臣们非常熟悉的名字了。

李自成乳名叫黄来儿，陕西米脂人，也是生于万历三十四年（1606）。他出身于农民家庭，父亲早故，家境非常贫苦，幼年曾经被舍入僧寺，

后来又给地主家放过羊。成年以后他在米脂县圁川驿当驿卒。崇祯二年（1629）裁减驿站经费，李自成也被裁撤，失去了生计。当时陕北大飢，李自成失业后吃不上饭，飢饿难当。一天他见到本乡士绅姓艾的公子拿着一块饼在吃，就上前讨要。那艾公子却说：“我宁可喂狗，也不能给你吃。”还把饼扔在地上用脚踩得稀烂。李自成极其愤恨，于是带领本乡一批青年投奔了“不沾泥”领导的农民军。大约从崇祯四年（1631）起，李自成所部作为一支独立的农民武装已经开始崭露头角，他的队伍被称作“八队”，他本人则号称闯将。李自成部在农民军各部中的突出特点是纪律严明，所部令行禁止，因而虽几经挫折却能日益发展，终于成为农民起义军中实力最雄厚的一支力量。

崇祯六年（1633），黄河以东的农民军各部大多从山西翻越太行山进入到北直隶（大体相当于今河北省）南部和河南北部的平原和山区。明廷调集了河南、河北、山西、陕西4省和京营的官兵3万多人对农民军进行围剿，农民军各部接连失败，几乎面临全军覆没的绝境。为了保存实力，各营农民军首领共同向官军投降。这年十一月，义军首领李自成、张妙手、闯塌天等人来到京营总兵王朴的司令部，表示愿意接受招安，说“我等都是良民，因陕西大旱，才犯了大罪。如今立誓归降朝廷，愿回故乡恢復旧业。”王朴军的监军太监杨进朝以为农民军主力全部就抚，从此就可以消弭大患，天下太平，立即向朝廷奏报，并命各军将帅在得到朝旨之前不得对农民军作战。谁知农民军是诈降，为的是争取时机。在官军停止围剿得以喘息之后，各股农民军于十一月末乘着天气寒冷黄河冰封，突然全部跨越黄河，进入到中原腹地。等官军反应过来再要追击的时候，已经来不及了。

河南自崇祯三年（1630）起连年大旱，作物歉收，米价腾贵，许多地区把草根树叶都吃光了，饿死路旁的人不计其数。但由于这里过去一直没

有农民军活动，朝廷把河南当作税收的重要地区，正税之外有加派，加派之外又有积年逋赋，逋赋之外还有预徵和临时科派。有人形容当时河南情形：“黄埃赤地，乡乡几断人烟；白骨青磷，夜夜常闻鬼哭。触耳有风鹤之声，满目皆荒惨之色。欲使穷民之不化而为盗，不可得也；欲使奸民之不望贼而附，不可得也；欲使富之不率而贫，良之不率而奸，不可得也。”在这种情况下，进入河南的农民军得到当地人民的广泛响应，队伍迅速扩大。加之河南省地处中原，明朝的军事力量相当薄弱，尽管崇祯帝严旨催促“河南、山西巡抚、监军亟督左良玉等部合力追击，并严饬道、府、州、县各官鼓励乡兵各自堵截防御”，农民军却如鱼入大海，在旬月之间足迹就几乎遍及河南西部各州县，搅得明廷君臣寝食不安。

河南是军事要冲，毗邻两京5省，河南大乱则天下难保。为了统一事权，集中各省兵力剿灭农民军，崇祯帝接受朝臣的建议，决定设立一个统管陕西、山西、河南、湖广（包括今湖北、湖南）、四川军务，专责围剿农民武装的五省总督。朝臣比较一致的意见是由陕西三边总督洪承畴担任这一重要职务，但崇祯帝以为三边地区同蒙古诸部相邻，责任重大，最后还是决定任用延绥巡抚陈奇瑜。崇祯七年（1634）正月，陈奇瑜加兵部右侍郎衔，出任五省总督。这是明廷设置专门司令部统一主持剿杀农民军之始。

这时候的农民军尚在发展初期，各部倏分倏合，力量比较分散，行军作战也是从当时的军事形势出发，基本上採取打了就跑的战术，并没有什么战略意图，因而才被统治者称作“流寇”。在崇祯七年（1634）数省大兵同时压境的情况下，河南的农民军又分成了几大股，向不同的方向流动，以避敌之精锐，大体上有向南、向西南和向西3个大方向。向南各股经信阳和南阳一线进入湖广，进逼襄阳、应山等府县，甚至打到了长江以南的枝江。但湖广官军防守比较严密，农民军没有攻克什么城市，

不久就在官兵的压力下沿长江北岸的山区入川，一度攻下夔州府（今奉节），后来流动于川、楚、陕三省交界的崇山之中。向西南的一路经内乡、淅川进入湖广的郧阳地区，先后攻陷了6座县城。这一带情势最为危急，因而陈奇瑜率本部兵马重点在郧阳一带作战，颇有斩获。农民军被迫向西避入三省交界的群山中，在汉中、川北等地流动作战。向西的一路经卢氏进入陕西的商州、洛南地区，一度也进入过汉中，攻克过洵阳等县。这一路遇到的敌人是洪承畴所部的陕军，农民军暂时无力同陕军正面对抗，就在豫、陕两省交界的商洛山区分散潜伏，等待时机。

总而言之，当时的农民军力量还不足以同官军正面抗衡，因而大部分转移到各省交界的山区分散隐蔽起来。官军虽然连连取胜，却没有办法彻底剿除分佈在崇山峻岭之中的各路农民军。中原地区像是暂时平静了，但遍地的饥民是农民起义的天然基础，一待进剿的官军回营归伍，各路农民军立即就重新冒出来，搅起漫天的烽火。

但在这年五六月间，陈奇瑜还是得到了一次歼灭农民军部分主力的机会。当时以张献忠为首的几股农民军的联军大约4万多人在汉中府城以东的山谷地区被陈奇瑜所部包围，由于地形窄仄，很有可能被歼灭。于是张献忠等人再一次使用了受抚的计谋，向陈奇瑜提出愿受招安，解散回家务农。陈奇瑜大概对于聚歼这4万之众也没有把握，生怕张献忠作困兽之斗，一旦失败反而没法向皇帝交代，也很想先招抚这一大股农民军，再图后计。他把情况向崇祯帝汇报，说明宜于招抚，开列的各营名单计有：八大王部13000余人，蝎子块部10500余人，张妙手部9100余人，八大王又一部8300余人，共计45000余人。

稍微注意一下就可以知道，这里请求招安的张献忠等人都是半年前在河北向官军请降过的，其中张妙手还带头面见过杨进朝、王朴等官军首脑，因此这一次受抚很可能又是故伎重演，不过是为了躲过眼前之灾的

一种权宜之计。但不知为什么，一向对于各种细节颇为精明的崇祯帝对于这一点却好像没有看出来。兵部也同样马虎，议论后认为招抚可行。崇祯帝也就立即批准了兵部的拟议。

陈奇瑜有了皇帝亲自批准，就放心招安，让各部农民军分成百人一队，由一个军校带领，从容经连云栈道出汉中盆地，传檄各部不许截击。张献忠等部果然又是在假投降，刚一脱离险境就把带队的所谓安抚官或杀或缚，接连攻克凤县和宝鸡，向甘肃地区转移。

这次招抚的失败引起了明朝士大夫们的极大震动。他们大多过高估计了在汉中可能取得的胜利成果，因而把由误抚而导致的丧失成果看成是极大的误国之举，甚至以为后来天下大乱国家危亡也全是由于这一次错误引起的。在传说中，他们把被困在汉中的农民军说成不仅有张献忠部，而且还有李自成部，于是得出一旦全歼就不会再有南张北李这两大巨盗的结论。他们也忽视了除了被困的4万余众之外，在4省边境地区还活跃着至少十几万其他各股农民军的事实，以为只要这次得手就能从此天下太平。他们还忘了，如果不用招抚而坚决作战，腐败怯懦的官军也未必就能取胜，类似的例子在明末农民战争史上屡见不鲜。但他们还是坚持说，陈奇瑜误抚纵寇，有大罪于国家，揭露他的罪行的劾疏不绝如缕。

招抚的方案本来是崇祯帝自己批准的，他当然不愿承认失误有如此严重。在好几个月的时间里，他顶住朝臣的压力没有处理陈奇瑜，反而逮捕了几个被认为是“破坏抚局”的人，其中包括陕西巡抚练国事。这样的做法其实是要表明，招抚的大政方针并没有错，只是在具体执行中出了问题。直到这年秋冬之际，潜伏在边境山区的各股农民军纷纷出动，集中在陕西各府行动，声势越来越大，崇祯帝才在十一月把陈奇瑜撤职并逮捕进京。十二月，命陕西三边总督洪承畴兼督河南、山西、湖广、保定、真定（今河北正定）等处军务，主持围剿。

在明末10位专责镇压农民起义的统帅中，洪承畴的军事和政治才能都是比较突出的。同陈奇瑜相比，洪承畴更有战略眼光，更有作战经验，在士大夫和将领中也更有威信。他也很年轻，出任五省总督的时候才42岁。应该说崇祯帝任用洪承畴为对付农民军的最高统帅，是一个正确的选择。

但在洪承畴刚刚接到任命，还没来得及做出任何部署的时候，陕西、湖广等地农民军又再次大举进入河南。给事中常自裕在奏报中说："大小七十二营之贼，有二三十万之多，蜂屯伊、嵩、宛、洛之间。"这是农民战争再次由低潮转入高潮的标志，也确实触动了崇祯帝。他与廷臣商议，第一次决定从山海关等方面调集精兵，以便彻底消灭农民军。这是一次重大的军事行动，因而在崇祯八年（1635）正月用了差不多一个月的时间，至二十三日才最后确定，调集关宁及京营等各处精兵并各省兵力共72000人，饷银93万两。崇祯帝发出严令，"限六个月扫荡廓清。"

正当朝廷忙着制定军事计划的时候，河南的农民军却又席捲而来，向安徽（在明代属南京直隶）方面挺进了。正月十一日，一支农民军攻下了皖北重镇颍州（今阜阳），当地的贫苦农民群起响应。凤阳一带的贫民甚至跑到几百里以外邀请农民军，还向农民军提供情报，哪里有富户巨室，哪里无官军防守，讲得清清楚楚。凤阳被称作"中都"，是明王朝的"龙兴之地"，朱元璋的祖坟就在那里，政治地位十分突出。但为了风水上的原因，200多年来却从来没有修建城垣，承平日久，守备也很松懈。当地官员听说农民军入皖，慌手慌脚不知如何应付。农民军扫地王、太平王等部却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在正月十五上元节这天突袭了凤阳。凤阳守军几千人勉强抵抗了一阵，大部被歼，剩下的全部投降，凤阳被农民军佔领。这支农民军打起了"古元真龙皇帝"的旗号，放火烧了皇陵享殿和朱元璋出家当和尚时所居的龙兴寺，把朱家皇帝的祖坟也

掘了一个大洞。3天以后，四处官军将至，农民军才从容撤离。

崇祯帝和他的大臣们二月十二日才得到凤阳失陷，祖陵被毁的消息，大为震惊。兵部尚书张凤翼又惊又怕，几乎晕倒过去；崇祯帝则是暴怒与悲愤交加。在那个时代，即使是一介草民让人挖了祖坟，也是既坏了风水又丢尽脸面的事情，要大动一番干戈，何况皇皇天子呢！因而朝臣们认为这件事是“君受辱，臣当死”，为“古今未有之奇变”。

闻到凶信这一天本来正是新春重开经筵的日子，一切准备都已就绪，但突然而至的噩耗打乱了原来的安排。崇祯帝命暂停经筵，自己换上了黑色的袍服，从干清宫搬到偏殿，以示哀痛和对自己的惩罚。根据传统观念，国家有大灾变、大动乱，身为天子是要负主要责任的，崇祯帝对这“古今未有之奇变”必须有一个交代、有一个表示。通常的做法就是皇帝降低自己的生活质量，包括素服（不穿锦绣黄袍）、避殿（暂离正式寝宫）、减膳（降低伙食标准）、撤乐（停止宫廷音乐）等项。如果认为情况更为严重，皇帝还应该向上天和臣民公开检讨自己的失德和无道，就是所谓“下诏罪己”。这些举动有三个方面的功能：一是要通过自我批评来求得冥冥中昊天上帝的谅解，以重新邀得上天的宠眷；二是用严格的自律使君主本人深刻反省，以痛改前衍；三是通过皇帝的严于律己的精神使朝臣和天下百姓振作起来，共图復兴。

天下大乱多年不靖，祖陵又被捣毁，当然是一个极严重的事件，素服避殿等项措施是一定要有的，但对于是不是应该下诏罪己，崇祯帝却一时拿不定主意。他是一个自尊心极强又极为自以为是的人，对于在位8年以来国事日非的形势，他一直认为主要是朝臣负国造成的，而他自己则是兢兢业业，朝干夕惕，精明干练，洞察一切，是本朝和歷史上少有的英明之君。因此，不论是表面上还是在内心深处，他从来没有承认过自己做错了什么事情，从来没有进行过自我批评。而下诏罪己却是要通过

最公开最隆重的方式向全体臣民表示自责，这对于妄自尊大惯了的崇祯帝，心理上是很难承受的。

为了帝国的利益，他确实想到过要发佈罪己诏书，那至少能鼓舞一下天下士气。在刚刚听到凤阳失陷的消息时他向朝臣透露了这个意思，但颇为吞吞吐吐，只是笼统地说，“皇陵罹变，都是朕的不德所致，”没有正式提出罪己的事。朝臣们对于皇帝的性情已经很瞭解了，因而以内阁为首，五府六部及各衙门大臣共同上疏，为国家的不幸对皇帝表示慰问，同时也把一切责任揽到自己身上，痛加自责。由于有朝臣集体承担责任，崇祯帝心头的压力稍稍减轻了一点，下诏罪己的事也就暂且不提。

其他善后事宜还是要办的。二月十三日，就是接到坏消息后的第二天，他下令逮捕了负有守卫凤阳责任的漕运总督杨一鹏，因为漕督的驻地虽然远在淮安，却兼有巡抚凤阳等处的职务。同时被逮治的还有守陵太监杨泽和凤阳巡按御史吴振缨。不久以后，杨一鹏被斩首于西市，吴振缨远戍边卫，杨泽则自杀身亡。同时崇祯帝还命全体朝臣都改换布衣角带上朝，共同进行深刻反省。十四日，任命原山东巡抚朱大典为漕运总督兼凤阳巡抚，第一要务就是修復皇陵。二十四日，崇祯帝身着素服亲自到太庙向祖先祭告，流着眼泪向二祖列宗汇报了祖陵罹难的不幸。两天以后，又派驸马都尉王昺和太康伯张国纪代表自己到凤阳皇陵行祭慰之礼。

在这些应急的举措完成之后，他该静下心来思索一下造成如此惨痛事件的原因和今后重新振作的办法了。復兴的要点在于扭转军事局面，二三月间，崇祯帝採取了两个军事方面的步骤。一个是正着，即按照正月里制定的调兵集饷的作战计划，在以河南为中心的各省进行全面围剿。三月，洪承畴加升兵部尚书衔，以五省总督的身份率陕军出潼关进入河南，指挥各路官军以期决战。但善于流动作战的农民军见到官兵聚集中

原，趁着洪承畴安排未定，又分股向西进入兵力空虚的陕西。洪承畴见到自己的根据地吃紧，只得又率部返回陕西。中原决战的计划落空。

崇祯帝的另一个步骤则属于奇着，就是加紧在京城组织太监操练内军。明末宦官总数达数万人，仅就人数上讲确是一支颇为可观的力量。魏忠贤专权时期为了炫耀自己的势力，开始选拔年轻力壮的宦官万余名，在皇城里分队操练。大小太监们舞刀弄棍，喧声震天，一时成为京城中的奇景。魏忠贤倒臺后，宫中这支太监武装并没有被裁撤，但几年来已经名存实亡，不再演练了。此时中原边外军事形势逼人，崇祯帝异想天开，以为用这些宦官操练成军，不仅可以保卫京师，必要时还能出兵作战，既增加了兵援，又不用额外耗费军饷，实在是一个好主意。三月初，他命司礼太监主持，重新开始操练这支内军，很有些热火朝天。有个江南文士写诗挖苦此事：

天子宫中肄六韬，红妆小队舞蛮刀。

一闻炮火心惊战，昨日言官谏内操。

所谓“红妆小队”云云其实是诗人的臆测，内操的成员全是太监，并没有宫女，更没有宫眷。

朝臣们对此事颇不以为然。他们对于宦官参预正常的朝廷大政从来就极度敏感，而让太监们在京中组织成一支军队，更让他们有一种不祥之感。有些人直接指责了皇帝的这种做法，列举祖宗之制，说明从来没有这方面的制度，万历、天启年间虽然开过内操，但内廷弄兵，有伤天和，不久就出现了王恭厂火灾、朝天宫火灾这样的报应。他们希望皇帝解散内军，停止操练，“不要使兵戈舞弄于萧墙之内，火炮伏匿于肘腋之间”。崇祯帝对于朝臣的这些反对意见当然是全然不顾，内操也一直在进行，但这支由太监组成的内军却从来也没有真正起过作用。在王朝面临

末日的时候，负责守卫京城的确实主要是这支太监军队，但他们根本没有抵抗，就打开城门向李自成投降了，跟着崇祯帝一起上吊，为他殉葬的只有一个贴身的太监王承恩。

在加强军事部署的同时，他还是得考虑用人问题。这是一个总也得不到解决的老问题，但情势危急，却又非解决不可。六月里，他主持了一次前所未有的特殊考试。他在中左门平臺召集全体卿贰大臣及翰林、詹事等词臣，每人分发一份提本或奏本，以及两张纸笺，要他们各自拟写一旨，一张草稿，一张誊定，全部上交。第二天，他在试卷中选出礼部尚书姜逢元、礼部侍郎陈子壮等9人，命吏部把他们的履歷材料一同上报。这时内阁中有4位大学士在任，不算多，但也不算太少，崇祯帝的这个举动显然是要通过亲自考核再选几名阁臣。几年来他基本上按照自己的意图特简阁员，不採取会推的方式，但每次特简都是根据平常印象或是一时兴起，这一次却用了考试的形式，确实又是一种制度上的革新。

七月，他不同朝官作任何商讨，就直接任命了少詹事文震孟和刑部右侍郎张至发为礼部左侍郎兼东阁大学士。文震孟是着名的东林党人，这一次入阁被认为是东林一派几年来少有的胜利。其实他因病没有参加上一次的票拟考试，但因为他是皇帝的日讲官，几年来一直为崇祯帝讲解《春秋》，深受赏识，所以才被特简充任辅臣。而张至发是县令起家，入阁成为辅臣在当时被认为是极不平凡的特例。

但对内阁的调整毕竟同军事大局关系较远，崇祯帝最关心的还是所谓“边才”，也就是军事人才的培养、选拔和任用。为这个问题他动了许多脑筋，召集廷臣用策问“时政边才论”的形式徵求过用人方案，还参阅了本朝歷史中的有关记载。七月，他让宫中档案部门调出六七十年前大学士兼吏部尚书高拱的一份着名奏疏，是专讲边才问题的。高拱在奏疏中主

要提出了四个层次的办法：一是增加兵部侍郎的编制，由侍郎担任各处总督，再由总督中选任兵部尚书，这样朝廷边防更番调配，有利于军事人才的培养和使用；二是要精慎选用兵部郎中、员外郎、主事等司官，务要有智谋有才力又畅晓军旅情况的人，而且宜于久任不可轻易转到其他部门，将来任命总督、巡抚主要从这些人中选拔；三是挑选边防军事要冲的地方官员充任兵部司官，并且分省各负其责；四是重视边防要冲地方官员的铨选，不能以杂流和贬谪人员充数。他发现高拱所言现在看来仍然很有道理，但如果按部就班，先从选任地方官做起，数年才能选拔出一批得力司属，再数年才能涌现一批干练督抚，至少要十几年以后才可能会有几个可任本兵（兵部尚书）的人才。这对于火烧眉毛的局面来说，未免太迟缓了。崇祯帝的办法，只能是四途并举，既要有长远打算，又要有应急手段。

对于基层官员的任用，他强调保举之法，先后数次命在京朝臣和地方大吏推举精明练达可资任用的知府和州、县主官。对于兵部司官也精心挑选。在选择兵部尚书的问题上，他则留心于各处督、抚中特别突出的人才。这个工作在第二年才见成效，他任用做过户部郎中，又在地方上做过道员，既有中央工作经验又有地方工作经验，并且在巡抚、总督任上显示出不凡才干的杨嗣昌为本兵。而杨嗣昌确实是整个崇祯时期最有能力也最得崇祯帝信任的一位兵部尚书。

总督、巡抚这个中间层次，因为要直接临阵对敌，人才更为要紧，也更为难得。洪承畴是不可多得的人才，但农民军遍佈于陕西、山西、河南、湖广各省，靠他一个人组织全面的围剿实在是难于支应。事实上，洪承畴在再度返回陕西以后，对付陕西一省的“流贼”已经捉襟见肘。他所率的曹文诏、张全昌等部虽然也在商州（今商县）、眉县等处打过几次胜仗，但由于农民军随处都有饥民作为补充兵员，在陕西的人数已达

20万，而洪承畴直接指挥的官军却不到1万人，寡众难敌，不久就连遭败绩。六月，副总兵艾万年、柳国镇部在宁州（今甘肃宁县）被李自成军打了埋伏，损失千余人，艾、柳两人战死。紧接着，总兵张全昌部又在清水（今甘肃清水）受创。不久，总兵曹文诏在真宁（今甘肃正宁）与李自成军遭遇，身陷重围，自杀身亡。

曹文诏在明末各路总兵官中以凶狠能战闻名，官军自称是“军中有一曹，西贼闻之心胆摇”，因而他的死在统治者中引起了很大的震动。洪承畴听到消息，仰天大哭，后悔不该让他孤军轻入。崇祯帝在听到奏报后也非常痛心，命设坛祭奠，并且修祠祭祀。

然而这年秋天，不但是陕西有大股农民军不断重创官兵，河南、湖广一带也战报频传，以闯王高迎祥部为主力的一大批农民军几十万人再度出潼关进入河南，中原四处告急。在这种情况下，崇祯帝决定再设一个统帅部，与洪承畴分别负责东西两方面的剿务。经过仔细斟酌，他选定湖广巡抚卢象升为这一路的统帅。

卢象升字建斗，比洪承畴更年轻，这时候才36岁。他是南京宜兴（今江苏宜兴）人，少年时期即有大志，读史至张巡、岳飞的英雄事蹟，就兴奋得手舞足蹈，嘆道：“这才是大丈夫啊！”天启二年（1622）中进士，由户部员外郎出任大名知府。崇祯二年（1629）己巳之警，他自募万人成军入卫勤王，从此这支部队保留下来，称作“天雄军”，一直由他统领。他由一个地方文官白手起家创立部队，而且有很强的战斗力，所以很受朝廷重视，不断被提升。崇祯七年（1634），任郧阳抚治，已经是巡抚一级的方面大员，第二年五月又升任右副都御史、湖广巡抚。在各处督抚中，他不仅最年轻，而且治军有方，颇通兵法，又有多年同农民军作战的经验，因此崇祯帝才不考虑资歷，任用他担任东路的最高统帅。这年八月，卢象升被任命为总理江北、河南、山东、湖广、四川军

务，督办东南，而洪承畴则专门经营西北。他希望在做出这样的部署后，各地将士个个奋力杀敌，让战场上早日传来捷报。

但战场上传来的却仍然是坏消息。九月，农民军蝎子块部攻打河南沈邱，活捉了总兵官张全昌，接着再次攻克颍州，凤阳再度告急。陕西方面西安附近的扶风县被攻破，农民军在离西安不远的地方纵火，城里都看得见火光。卢象升统辖的左良玉、祖宽两大主力在河南中部郏县一带同农民军对垒，农民军连营数十里，兵势浩大，轮番出战，左良玉等部不敢用强，只好撤兵。年初六个月平定天下的限期已经过了许多，但平定却丝毫无望。

经过几个月的卧薪尝胆（素服避殿、减膳撤乐，即使对于一个生活简朴的皇帝来说也不啻是卧薪尝胆了），几个月的苦心经营，得到的竟然是毫无结果，崇祯帝感觉到，那个迟迟未行的罪己之举也许终究还是要进行的，不然不足以挽回上天的宠眷，也不足以激励臣民的精神。仍然是要面子到极点的自尊心在作怪，他在不得不公开检讨自己的时候采取了一种比较折中的方式，没有正式向全国颁佈诏书，而是在十月二十八日向兵部发出了一条上谕。

上谕是他亲自撰写的，很长，其要点说：朕自继承大统以来，希望与天下更新，不想倚任非人，遂致内外交闹。国库空虚而徵调不已，城乡凋残而加派难停。及至今年正月，皇陵被难，责任实在朕躬。于是集兵措饷，限期平贼，谁知诸臣失策，叛乱更为猖獗，甚至丧失上将，失陷州府。痛心切齿，其何以堪？自明日起，朕居武英便殿，减膳撤乐，除典礼外一律着青袍视事，以示我与军中文武士卒同甘共苦之意。还期望文武官员各自反省过失，激励将来，上下同心，以挽回天意，共救百姓于水火。

从格式到内容，其实都是一份罪己诏书，但不以诏书而以上谕发出，不显得那样隆重，多少可以为自己遮一遮脸面；而通过邸报，这个上谕同样能传遍天下，又可以收到感动臣民的效果。崇祯帝为了这次迟迟出臺的罪己，真是用心良苦。但透过这份良苦的用心，他的臣民们也感到皇帝的罪己似乎缺乏某种真诚。即使从内容上看，他的上谕中虽然承认“责实在朕”，但只是一句空话。说到具体的错误，就是“倚任非人”，到头来还是朝臣不好。这样一个明为罪己实为罪人，而且遮遮掩掩的上谕，到底能感动多少位臣子，激励起多少颗人心，效果就很难说了。

但就是这么一个不像样子的罪己“诏”，也已经让崇祯帝相当脆弱的心理失去平衡了。自尊本来是人性中的一种高贵气质，但在九五之尊的崇高地位和一言九鼎的绝对权力的双重腐蚀下，崇祯帝的这种气质却化作了极度的狭隘和刻毒。在天下纷纷，政局大乱，几乎无法挽回颓局的形势下，他不得不下诏罪己，勉强作一番自我批评。但天性中的自尊和褊狭又使得他在向天下认“罪”的时候感到了无法排遣的耻辱、怨怼与沉痛，让他抑郁、愤懑、寝食难安。正因为如此，他在下诏罪己承认自己也有不足之后，难免要紧跟着一次肆虐的发洩，对一些倒霉的替罪羔羊大施淫威，以便证明真正有罪的不是皇帝而是万恶的朝臣，让他捞回一点面子，使脆弱的心灵恢復一点平衡。到他统治的末年，随着政局的更加败坏，下诏罪己的频率也跟着增加了，而每一次罪己之后又都连接着一次毫无道理的恶毒发洩，成为一种规律。在这样的发洩之后，朝臣们为了皇帝的勇于罪己和景然振作而产生的那一点激动，那一点感奋，也就荡然无存。

对于一个皇帝来说，寻找发洩的机会是太容易了。罪己的上谕发出以后不久，崇祯帝就见到吏部尚书谢升弹劾工科都给事中许誉卿和福建右布政使申绍芳的奏疏。事情的起因是为了许誉卿的提升问题。许誉卿任给

事中资格最老，已有14年的歷史，照例应转升京卿，但谢升见于这个许誉卿一直是言官中带头攻击大臣的首领，很不驯顺，就藉故提请升任他为南京太常寺少卿，让他到南京做一任冷官，免得在京城中喧嚣作怪。许誉卿是江南东林一脉，在朝中也颇有实力，内阁中的大学士何吾驺和文震孟都是他的好朋友。吏部提请升任许誉卿为南京太常的本章正好落在何吾驺和文震孟的手上，两位辅臣就拟旨驳回，坚持要让他升任北京的京卿。首辅温体仁却因为多次遭到过许誉卿的直接攻击，暗中为谢升鼓气。谢升有首辅在暗中支持，就坚决要同许誉卿和何吾驺、文震孟们斗争到底。正好他手里还抓着一个许誉卿的把柄。那是前不久，福建布政使申绍芳想要谋取登莱巡抚的职位，曾託许雀卿向谢升说项。谢升当时不置可否，这时候却拿出来当作许誉卿的一条罪状，就弹劾许誉卿“营求北缺，不欲南迁，以便把持朝政；并关节託请，为申绍芳谋官。”

谢升的劾疏发到内阁，引起几位相爷为如何票旨进行了一番争议。文震孟是不久前才被皇帝特简入阁的，自以为深受皇上知遇，颇为不可一世，因而与何吾驺坚持从轻拟议，让许誉卿回奏。但温体仁存心要害许誉卿，又对文震孟的趾高气扬十分不满，一定要拟旨严处。双方争得面红耳赤，几乎要抱以老拳，把各自的票拟争来抢去，撕得粉碎。温体仁毕竟是首辅，最后仗着权力执笔拟旨：“大干法纪，着降级调用。”文震孟等人只能在一旁冷笑。

但温体仁的票拟第二天还是被崇祯帝批迴内阁，要求重新再拟。温体仁自然洋洋得意，提笔再次拟旨：“许誉卿着革职为民，申绍芳提京逮问。”文震孟尴尬之余不免在旁边说了一句冷话：“科道言官被革职削籍，可是天下最荣耀的事情。”没想到这句话又被温体仁向皇帝汇报了。

崇祯帝这些天正为着罪己的事满腹邪火无从发洩，见到包括内阁辅臣在内的朝臣们还在徇私朋比，不由烈焰升腾。他不但批准了许誉卿革职、

申绍芳提问的拟议，而且严旨申斥文震孟和何吾驺，并把两个人都罢斥出内阁。至于不久前他对文震孟的赏识和好感，全都抛到了九霄云外。

为了一件小事而罢免两位辅臣，崇祯帝的心火还是没有出尽。最能体察皇帝心思的温体仁就不失时机地又为他提供了一副解药。文、何两人刚刚离开内阁，温体仁以首辅的身份又参劾了一个更不重要的小人物庶吉士郑鄤一本。

这郑鄤是明末理学高调风行时期一个典型的伪君子。他是南京武进（今江苏常州）人，出身于世家名门，天启二年（1622）进士，又通过考试成为翰林院庶吉士。他与文震孟是同科（文是天启二年状元）、同乡（文为苏州人），又同在翰林院中，交情非常深厚。文震孟在中状元的当年就因为直言进谏被贬官，但从此声名满天下。郑鄤附骥于后，为了援救文震孟也被降级外调，同样博得了一个正直不阿的好名声。降调后他一直乡居在家，没有赴任，崇祯帝即位后起復原官，但他先后丧父丧母，接连丁忧不能上京任职，所以同年的文震孟已经当上了大学士，他却还只是一个翰林院的学员——庶吉士。尽管官运不佳，他的社会地位和名望却不容忽视。前朝着名大臣，东林巨魁，礼部尚书孙慎行是他的岳父，当朝大学士吴宗达是他的母舅，他的朋友中更多是名声显赫、位高权重之士。他的学问精良，文章大多讲求义理，是个出名的理学家。在同更加出名的理学家交往中，他也做出一副道貌岸然之态。大理学家黄道周曾到他家拜访，见到他家里俭朴异常，每天吃饭的时候都要数次询问母亲想吃什么，亲自侍奉，因而对他极为推崇，以为道德文章当推他为天下第一，自己所不及。可是迂直的黄道周没有想到，郑鄤家中的一切都是摆出样子专门让他看的，有人说连那个被孝敬侍奉的母亲都是让人假扮的。实际上，郑鄤贪婪好色，仗势横行乡里，包揽讼事，品行极为恶劣。据说有一次乡间某富户正在打官司，他听说后前去勒索，那

家人把他骗进院里，准备好了杀猪刀、盐水盆，因为他长得肥胖，要把他当猪宰了，吓得他跪地告饶不止。

在服丧期满后，他开始谋求出山。但如果重新出任庶吉士，同他的资格和声望都太不相符，他本人和朋友们都不能满意；可是直接任命更高的官职，又从来没有先例。为了这件事，他亲自跑到京城，文震孟等人在朝士中积极活动。进入内阁以后，文震孟还请求温体仁帮忙想办法通融。温体仁对于文震孟和他的东林同伙却一直存有戒心，口头上哼哼哈哈地答应，并不实心去帮忙。何况，在郑鄤的亲友中也有不少人对他颇有微词。他的亲舅舅大学士吴宗达就对这个外甥很不以为然，在内阁里曾对温体仁说过：这厮不是好货，当年曾怂恿其父杖责亲母，不贤不孝，莫过于此。但不久后吴宗达卸任离京，温体仁也没有提起过这件事。

文震孟罢职，崇祯帝仍然怒火不息，温体仁觉得有必要提一提这件事了。一来可以为皇帝提供一个发火的机会，二来也可以藉此事揭露东林君子们的丑恶，杀一杀他们的气焰。但以首辅重臣的身份去纠参一个十几年没有任职的庶吉士，多少有点不妥，于是温体仁在劾疏中全以吴宗达的口气讲话，说“郑鄤曾以箕仙幻术蛊惑其父削髮为僧，又迫使父亲杖责其母。其母舅旧辅吴宗达每言及此事，则流泪不止”。崇祯帝果然立刻抓住这件事不放，命将郑鄤革职，交刑部严审定罪。

郑鄤杖母这件事，各种记载纷纷不一，归结起来大体是这样的。郑鄤的母亲吴氏醋劲极大，经常残酷虐待家中那些被怀疑与其夫有染的婢女，甚至有虐待致死的。郑鄤的父亲心中不忍，就与郑鄤共同定计，请了一个巫婆到家里来，装神弄鬼，假作天仙附体，对吴氏不守妇道，酷虐婢妾大大谴责一番。吴氏被吓得要死，甘愿受杖责以赎罪。郑鄤也就毫不留情地棒打了亲孃一顿。谁知这件事后来露了马脚，不但吴氏翻脸，吴

家的孃家人也出面大闹了一通。那已经是近30年前的事了，主使是郑鄤的父亲，郑鄤不过是个胁从，而且事出有因。但不论是出于什么原因，亲手杖母在当时却被认为是令人髮指的忤逆不孝。身为理学名家的郑鄤当然明白其中的利害，所以铁嘴钢牙，绝不承认有过这件事。他在辩疏中说："臣读温体仁之疏，惊怖欲绝，不信人伦天壤之间，有此怪诞不经之事。且臣父亡八年，母亡五年，而突然发难于吴越隔省（温体仁为浙江乌程人），从未见一面之首辅，难道是听人误传而没有仔细考察吗？"

京中舆论对这件怪事也大多持怀疑态度，刑部提出异议说："蔑视人伦之大罪，不可由风闻定论，还请饬郑鄤同乡官员共同核实。"而在京的常州籍官员或许由于年久失闻，或许为了同乡情面，回奏都说一向闭门读书，没有听说过此事。但民间的传说却各式各样，有人说郑鄤不但杖责亲母是实，而且还有其他劣迹。他的未成年的儿媳妇因为父母双亡，被他接进家去，后来却自杀死了，据说就是因为被他姦污。还有人说，他同胞妹关系也很暧昧，妹妹出嫁后闹出了丑闻。当然，这些风传又全都是事出有因，查无实证。

崇祯帝是为了洩火才死抓此案不放的，在他看来，抓到了如此罪恶滔天悖谬人伦的所谓"名士"，不但证实了他一贯关于士风日下的判断，而且足以说明天下败乱至此都是由于朝士们的无比恶劣所致，并非他这个皇帝没有做好。既然兹事体大，当然不管有没有实证。他痛斥刑部官员徇私蔑法，又把郑鄤转给锦衣卫去审理。锦衣卫指挥使吴孟明同江南士大夫的关系一直不坏，深知郑鄤的势力不同寻常，又很佩服他的学问，在锦衣卫狱里对他也极为照顾，甚至让两个儿子到狱中听他讲授经典，办起了监狱学堂。这件案子由此也就一拖再拖，拖了3年。最后吴孟明为此事被撤职，郑鄤才在一直没有实证的情况下被定了案，在西四牌楼下被凌迟处死。临刑前传下的圣旨结句是："照律应剐三千六百刀。"当天

京城里买卖生人肉片就成了一宗大生意，据说此物作为药引子，可以治疗疖疮，大有奇效。

郑鄤案由于起因奇特，处理怪异，成为崇祯时期最脍炙人口的一件轶事，直到明亡之后，议论的人还喋喋不休。人们或是认为郑鄤实在无行，或是认为皇帝过于狠刻，或是以为发生这件事全是由于温体仁在其中捣鬼，但很少有人想到，郑鄤的倒霉遭遇其实是同崇祯帝那次郑重其事的罪己联繫在一起的。

这次罪己的直接牺牲品还有好几个人。十一月，礼部右侍郎陈子壮上言反对选拔宗室人才特授官职。这本来是崇祯帝破格用人各种办法中的一种，是希望自己的本家亲人们能在国难当头的时刻与自己同心同德，但多次命有关部门着意推选，一直没有成果。陈子壮这一次从理论上反对这种做法，认为从来宗藩自有官爵，疏支远宗也可以参加文武科举同普通士人一样以功名授官，如果特开保举宗室的先例，则只能徒然增加朝政的混乱。崇祯帝见到这份语言还算平合的奏议，又是一次大怒，命人把陈子壮抓起来，准备实行廷杖。侍郎是卿贰大臣，就是在明代歷史上也很少有廷杖的先例，内臣外臣一起叩头救护，崇祯帝才算宽免，把陈子壮革了职，交刑部议罪。

但他既然已经起了打人的念头，就难以收心，十二月，终于还是实行了廷杖。廷杖是明代皇帝用来迫害、凌辱朝臣的一种特别臭名昭着的残酷制度，就是不经任何司法程序，全凭着皇帝的个人意志在紫禁城的午门外对朝臣进行杖责。遭受廷杖的朝臣像囚犯一样被捆住双手，押解到午门以外，上百个锦衣卫士持杖等候。受杖者都是被放在一块大布上，由4个人拽着，行杖的人则把大棍搁在他的大腿上。掌刑的锦衣卫使大喝“打！”开始行杖，每5下换一个打手。掌刑的口令也有讲究，如果喊：“着实打！”则受刑者还可能生还；如果喊的是“用心打！”则必死无

疑。廷杖既能挫辱朝臣的人格，又可以不经法司而直接置朝臣于死地，因而成为明代皇帝们打击朝臣发洩恶毒心理的一宗法宝。对这宗法宝，常常对朝臣恨之入骨的崇祯帝当然不能不继承下来。自崇祯初年起，廷杖的事情时有发生，但对象往往是些无足轻重的小人物，这一次要打侍郎没打成，他只好再用小臣撒气。

这一次的受难者是一个滋阳县知县成德。此人性格亢直，在任上得罪了不少上司，被纠弹入狱。经过调查，所有罪状都不属实，已经准备释放。但他在狱中又写了一个攻击首辅温体仁的奏本，崇祯帝见了，以为是小人之无忌惮者，不严惩不足以端正士风。于是以无主赃银70两的罪名，下令廷杖60，五凤楼前终于流满了鲜血。成德没有被打死，棒伤未愈就被髮配到边地充军去了。

同月，另一个地方小官河南府推官汤开远上疏批评“朝廷赏罚无章”，“行间失事，无日不议处议罪，而于荡寇安民毫无少补”。这些话很说到崇祯帝的痛处，更引起他极大的恼怒，于是命将汤开远削籍，由地方抚、按押解来京刑讯治罪。汤开远几乎要遭不测，幸好他同围剿前线的总兵官左良玉等人关系不错，左良玉率所部将士70多人合奏乞求宽免。崇祯帝对于拥有重兵的左良玉从来忍让三分，这一次算给了面子，把汤开远放回去，让他戴罪立功。

从十月到年底，他不断地惩处朝臣，势头却渐渐平缓下来。内忧外患、饷匮兵乏这些大事总还是要他自己来想办法解决，作为一国之君，他不能总是沉浸在自我心态失衡的阴影中。第二年的形势更加不妙，他也再没有心思同臣子们进行搅不清的意气之争了。

三 君臣之间

进入崇祯九年（1636）之后，围剿农民军的形势仍然不见好转。去年八月任命卢象升为总理五省军务，与洪承畴分别负责东南和西北的剿务的时候，崇祯帝再一次刻期6个月完成剿平任务。但到了这年春天，限期将至，农民军仍然风行天下。洪承畴在陕西一直主要同李自成、蝎子块、过天星等部的农民军周旋，胜负参半，总是不能给农民军以重创。在中原地区活动的最有实力的一股农民军是闯王高迎祥部，卢象升在崇祯九年（1636）初的一封信里讲到围剿形势说："两个月来奔驰于汝州、南阳、黄河、洛水之间，万分忙苦。贼多而且肆横，前后擒斩虽有数千，却不是彻底荡平的好办法。必须在正、二、三月内先剿尽闯王一股，其他各贼才能依次歼灭。闯王之贼大约有七万余人，其中妇女约二三万，壮丁一二万，精骑一二万。此贼之危险，不亚于东虏（清军）和察哈尔部。"

但要剿尽高迎祥谈何容易！就在这年正月，高迎祥和张献忠等部突然东下安徽，围攻滁州，直接威胁到留都南京，卢象升只得提兵救援。农民军却转而攻凤阳，不克，又经怀远、蒙城进入河南，二月间在嵩县大败官军，击毙了总兵官汤九州，转过头再一次回到陕西。这一时期的农民军还没有彻底消灭明王朝的明确战略意图，也没有集合组织成统一的大兵团，分散流动作战主要是为了迴避官军的集中围剿和寻求足够的军粮给养。这种分散流动的作战方式虽然还不足以颠覆明王朝的统治，却使得明朝官军的围剿十分困难。卢象升和洪承畴大抵只能不断地驰援救急，疲于奔命，根本无法组织起重创农民军的大战役。

接连不断的灾荒制造了千百万挣扎在死亡线上的饥民，又为农民军的不

断壮大提供了基础。这年春天，陕西、山西、河南等省的灾情还在蔓延。三月，山西巡抚吴甡奏报：晋南闻喜、沁源等处大飢，人相食；河南巡抚陈必谦等人相继奏报：南阳、南召、裕州（今方城）一带村落荒凉，树皮都已经被剥尽，有母亲把女儿煮食的；陕西仍是没有止境的旱灾、蝗灾，有个别地方还发生了洪涝。面对遍地饥馑，崇祯帝一筹莫展，只能对几个灾情特别严重的地区实行减免钱粮，但不过是官样文章，对于嗷嗷将死的饥民来说，减少一点赋税并没有多大实际意义。

崇祯帝只能设想，先用全力剿除农民起义这一心腹大患，以后再想办法慢慢收拾残局。因此在这年三月，他又一次勒令兵部，要卢象升等人立下军令状，限期灭贼，否则将以军法从事。他很想把全部精力集中到围剿农民军这件大事上来，可是朝臣们却仍然在吵吵嚷嚷，内乱不休，不断地搅扰他的思路，让他烦躁不已。

正当他为了四处的灾情和战报焦虑不安的时候，却见到御史张寿祺一份参劾首辅温体仁的本章。张寿祺的劾疏没有什么实际内容，不过是说温体仁心怀险僻，治国无谋，任首辅数年，未建一良策，致使流寇嚣张、边警频传，要温体仁引咎辞职。按照传统，大臣受到攻劾，应立即上疏请求辞职，同时还要暂时停止公务，以示严于自律和心胸广阔。这一次温体仁也照样做了，以健康原因为由，提出退休回籍。崇祯帝对这些故套却很不耐烦，朝中诸多政务都需要辅臣来协助处理，哪能总是受到无聊的言官们的干扰？他在温体仁的奏本上批了几句慰问的话，要他立即回阁办事，不必理会御史的叫嚣。张寿祺见到自己的劾疏毫无影响，就接着又上了一本。负责传达本章的通政使司汇报了有关情况，崇祯帝干脆下令，不要把张寿祺的奏本送进宫来，连看也不要看了。

自从温体仁出任内阁大学士以来，攻击他的事件已经发生过几十次了，攻击他的人上自大臣，下至庶民，攻击的内容也是五花八门。温体仁是

靠同东林党人撕破脸皮激烈斗争才得以晋身内阁的，因而一直被东林一气视若仇敌，但他不断受到恶毒攻击甚至在朝野间遭到普遍恶评，却与他受到崇祯帝特殊的宠眷有关。在崇祯帝17年的统治中，没有一个内阁辅臣能像温体仁那样任职长久。在其他49位阁臣中，除周延儒先后两次入阁总共5年多时间，前期的吴宗达在阁近5年，后期的陈演在阁近4年之外，其他人多则两三年，少则几个月，很少能多年安居于相位。而温体仁自崇祯三年（1630）六月入阁，六年（1633）为首辅，至十年（1637）致仕（退休）回乡，作了整整7年辅臣，4年首辅，创下了崇祯时期的纪录。而他能在阁臣特别是首辅的位置上坐得如此长久而稳固，又体现出崇祯帝对他有一种特殊的信任和依赖。

崇祯帝对于温体仁最为欣赏的地方是他的“孤立无党”，曾经多次公开这样表扬他。这其实同他的性格有关。温体仁为人阴沉孤僻，不喜欢与人交往，在朝为官数十年，却没有一个挚友，也没有什么可靠的心腹。因此，在歷次政治内讧中同他结成同盟，为他充当党羽的，都是为了一时的利害，过后就可能变脸，很少有人能同他长期合作，更谈不上关系密切。对于一个高级政治家来说，这很难讲是一种优秀品质，但在明末朋党交闹纷纷扬扬的官场上却也真是十分难得。崇祯帝极其痛恨朋党勾结争执不已，因而对温体仁的孤立也就特别看重。按照他的逻辑，只有孤立者才会全心全意地只依赖皇帝一人，满腔热情地为朝廷办事，才是最可靠的忠臣。

除了孤立无援之外，温体仁还有一大优点，就是清介不贪。由于少有交往和内心的孤傲，他很少接受贿赂和常例以外的馈赠，居首相多年仍然相当清贫。这一点，连他的政敌也不得不承认，攻击他的人在各种问题上捕风捉影，吹毛求疵，却闭口不谈当时普遍存在的贪贿问题。文不爱钱，武不怕死，就是忠臣良将。这种传统的价值判断尽管在复杂的政治

运行中已经被动摇，在崇祯帝心中却还是有相当的影响，因而清介也成为温体仁得到崇祯帝信任的重要因素之一。

但在孤立和清介之外，温体仁就乏善可陈了。他不贪财，却极重名位。排挤掉周延儒后，按位次他已是内阁中的第一把交椅了，但旧例只有皇帝降明旨之后才能有首辅的身份。内阁的九间直房中前排的第一间是专供首辅用的，温体仁在担当首辅责任多日之后却还不能搬进去，不免耿耿于怀。原来崇祯帝本想让前内阁大学士何如宠復出任首席，只是何如宠因病一直拖延，最后只得作罢。为了这个原因，温体仁当了将近一年有实无名的首辅，真是心急如焚。直到第二年端阳节，皇帝照例要赏赐阁臣酒食，颁赐御馔的太监传达的口谕里提到了“首辅温体仁”几个字，他才一块石头落地，立刻就命人把自己的用具挪进首辅的值房。

由于汲汲于名位，他在事关自己的政治争夺中显得冷酷而强硬。这在当面揭发钱谦益和阴谋排挤周延儒的事件中已经有过鲜明的体现。就是在对待与自己无关的问题上，他也表现得刻薄残忍。但在同样冷酷而强硬的崇祯帝看来，温体仁的这种风格正是一种少有的优长。崇祯帝的治国术以惩办为基础，喜欢用严刑峻法驱动臣民去服从，却效力，以“乱世用重典”为信条。而这“重典”却需要有刚忍的辅臣去协助推行，温体仁正好堪当此任。在以往的无数起严处大小诸臣的事件中，大多数都是由温体仁拟旨，往往正中崇祯帝下怀。每年十月斩决死囚，照例要进行復审再由皇帝亲自核准。崇祯帝有时候会讯问一下阁臣的意见，但温体仁从来不为拟议处决的人讲话。崇祯六年（1633）秋决的案犯中有一个陕西华亭（今甘肃华亭）知县徐兆麟，上任才7天就因县城被攻陷判处死刑，连崇祯帝都以为有些无辜，温体仁却绝口不提缓刑二字，徐兆麟终被处决。崇祯八年（1635）为皇陵被毁君臣共同修省，其中一项措施是宽免部分在狱中的犯事官员。吏部为此提出了一个100多人的名单，温体仁

拟旨却只同意释放十几个人，崇祯帝感到相当满意。

温体仁在严刻对待朝臣方面处处与崇祯帝合拍，也有他故意用心逢迎的一面。此人虽然阴骘刚勐，在讨好皇帝的问题上，却也不乏乖巧机智。崇祯帝很喜欢搞一套君威不测的小伎俩，处理人虽然总体从严，偶尔也会意想不到的从宽；有时候明明有话要说，却偏要朝臣们猜谜。对于这样一位聪明皇帝，作阁臣为他拟旨实在不容易。温体仁却摸到了一套规律，能够应付裕如。凡遇有言官等人建言可能有令皇帝不高兴之处的，内阁总是先拟一条“该部知道”的票拟，这代表皇帝的一种冷淡的中立态度。如果这个票拟被退回来要求重写，下一次就有分寸地加重语气，再退再加，直至皇帝满意为止。这样就既满足了崇祯帝独裁一切的权威感，又不至出现内阁重拟而皇帝宽容所引起的尴尬。这个成规直到温体仁下臺以后仍然被后任的阁臣们尊行不移。

在猜谜方面温体仁也是一把好手。崇祯八年（1635）曹文诏死难，奉旨抚卹祭奠，曹文诏之子副总兵曹变蛟上疏谢恩。这种谢恩疏通常是最容易批旨的，但这一次内阁连拟四次都被崇祯帝发了回来。温体仁当时正好因事没有值班，其他人抓耳挠腮不得要领。还是等温体仁回来之后，仔细揣摸，发现崇祯帝在奉旨卹典的日期和谢恩疏的落款日期上各点了一个点，才弄明白。原来曹变蛟为了父亲的卹典差人上京活动，得知事情已经办妥就连忙谢恩，却忘了谢恩的日子竟在颁旨日子之前，露了马脚。温体仁于是拟旨诘问其故，立即就被通过了。崇祯帝专好在这些无关宏旨的小事情上玩弄他那无与伦比的小聪明，而他的小聪明又只有温体仁的小聪明才能领悟、才能欣赏，无怪崇祯帝要把他当作一个难得的知音。

认真对比之后就可以发现，崇祯帝与温体仁这君臣两人，虽然地位悬殊，经歷各异，年龄上又差着30多岁，但在性情气质上却颇有些相似之

处。两个人都是洁身自好、刚愎自用、刻薄残忍又好用聪明。或许正是这种性格上的契合，才是他们君臣遇合的真正基础。

但人格契合所造成的情感因素也容易使人矇住眼睛，看不到对方致命的弱点。崇祯帝就很长时期都没有认识到，温体仁虽然精明干练，却缺乏经邦治国方面的大才干。身为一个多事之秋的第一重臣，他没有为崇祯帝提出过比较有意义的总体治国方针，在具体事务上也很少拿出什么切实可行的方案。崇祯帝为军事、财政困难向他谘询，他总是说："臣一直靠着写几篇文章滥充词林，陛下不知臣的庸劣，提拔至此位。贼寇日益增多，真是万死不足塞其责。但臣愚昧无知，只是票拟时不敢欺矇罢了。至于兵事、饷事，请陛下圣明裁决。"崇祯帝每临大事无静气，冒实敢断；而朝臣优柔不言，一切听凭皇帝胡闹。这种政治格局加速了明王朝的灭亡过程，而这样的政治格局正是温体仁主持内阁的时期确定下来的。

对于崇祯帝来说，任用温体仁还有一个意外的好处，就是温体仁无形之中成了代他受过的替罪羊和挡箭牌。崇祯帝的刚愎自用和刻薄寡恩一直是士大夫们极其不满的，但在一个君主专制的时代，根本不允许对于皇帝进行人格方面的批判，即使在心中想一想也有大逆不道的腹诽之嫌。因而歷代的朝臣们都倾向于把皇帝的自以为是和残虐臣下归罪于他身边的重臣，对于皇帝的极度不满也就有意无意地全部发洩到那些被指控为"奸臣"的重臣身上。这种意识甚至渗透到农民起义军的队伍中，李自成在《永昌元年诏书》中对明末政治进行了彻底的批判，同时却说"君非甚暗"、"臣尽行私"。明代公认的最着名的奸臣严嵩和温体仁，分别在两个最刚愎最严狠的皇帝嘉靖帝和崇祯帝时期充任首辅，显然不是偶然的。严嵩和温体仁从总体上说都属庸才，为了邀宠固位而阿顺皇帝意旨，也可以说是佞臣，但说是奸臣却过分了。因为在嘉靖帝和崇祯帝这

样的“英明之主”面前，他们唯唯诺诺尚觉心怀悸怖，哪里敢耍聪明搞什么奸谋诡计呢？

朝士甚至普通百姓对于温体仁的恶意，正是随着他们在潜意识中对于崇祯帝越来越强烈的不满而日益加深的，在崇祯九年（1636）前后形成高潮。这时候，朝野上下无不切齿痛恨温体仁这个奸相，并且把朝廷的每一项恶政都当作是温体仁的杰作。言官庶臣只需上疏把温体仁不负责任地痛斥一番，就可以扬名天下；卿贰大臣凡敢于公然同温体仁作对的，都能博得一个公忠义烈的称号。崇祯七年（1634）会试，温体仁任主考官，有个参试的举子名叫漆园的，竟敢在考卷中借题发挥，暗讽温体仁不恭不敬。批卷的房考官文震孟见到这样的文章大喜，批语：“伸眉抗手，想见其人。”温体仁明知是在骂自己，还是沉住气选取了漆园。只是在考试之后才在内阁中抱怨说：“外人说我们要进考场收几个门生。我们今天的地位，也靠不着门生了，何况考场里就有人骂我。”同僚们问是怎么回事，他说：“他那篇八股末尾专讲不恭之臣如何，不敬之臣如何，岂不是骂人？只是本房批了‘伸眉抗手，想见其人’，哪里敢不取他？哪里敢不取他？”

这大概说明，温体仁自己也明白是在代君受过，因而颇有些无可奈何。但他能对种种恶语相伤泰然处之，心胸也还是够宽阔了。只是他所表现出来的宽宏大度却从来没有被舆论认可过，反而纵容了对他的攻击谩骂。京城中恶少根据时政编了一副对联，因为礼部尚书黄士俊是丁未科状元，左右侍郎孔贞运、陈子壮分别中过榜眼和探花，一部三位主官恰巧是三鼎甲，传为美谈，所以上联是“礼部重开天榜，状元、榜眼、探花，有些惶恐（黄、孔）”，虽略带嚯虐，不失好意。下联却很不堪入目，用的是几位阁臣乡籍的谐音，温体仁乌程籍、归安人，王应熊巴县人，吴宗达为人圆滑无争，被称为篾片，因此说“内阁翻成妓馆，乌龟

（归）、王八（巴）、篾片，总是遭瘟（温）”。因为解气，这副把内阁称作妓院的对子在京城内外广为流传，阁臣们听到了也只能苦笑置之。

崇祯九年（1636）和十年（1637），京城里还出了两件轰动一时的新闻。一件新闻是被重处的滋阳知县成德的母亲，在崇祯九年（1636）年末连日在长安街上等着温体仁的轿子过来，见到了就用砖头石块乱投，并且破口大骂，骂得很难听。在长安街上看老太太对当朝首辅乱投乱骂，一时成了京中特别有意思的一景。崇祯帝也知道了这件事，特意为温体仁加派了50个卫兵，却也不愿意同一个撒泼的老太太大动干戈。另一件新闻发生在第二年春天，是南京新安卫千户杨光先进京上言攻击温体仁。这并不稀奇，稀奇的是他还随身用车拖来了棺材，以示必死之志。于是京城譁然，赠诗赠文的争先恐后，把他带来的棺材上都贴满了。崇祯帝痛恨他的譁众取宠，命令对他廷杖80，发配到辽西极边。据说行杖的时候，观者如堵，全都为他大念阿弥陀佛。

身为国家第一大臣，温体仁可谓丢尽了体面。崇祯帝对于这一点却好像并不太在乎。他似乎也隐隐约约地意识到，温体仁的被攻击、被侮辱，有几分代自己受过的意味。但这种事情不好言明，所以他虽然一直对温体仁百般护持，对于朝臣过分的攻击也常常小有惩戒，但总体上还是採取比较宽容的态度，不愿再为温体仁树立更多的势不两立之敌，也不愿引火烧身，把朝臣的恶意全部揽到自己身上。只有当大小臣工们在攻击温体仁时夹枪带棒，把矛头暗中对准皇帝的时候，崇祯帝才会认真恼怒起来。

像绝大多数皇帝一样，崇祯帝很讨厌臣子们对自己提出批评，也就是所谓“进谏”。但在儒家的传统意识形态中，乐于纳谏、勇于纳谏又是一个贤明君主应该具有的基本素质。为此，歷来的专制王朝都专门设立了一套言官系统，以进言为其专责。明代的言官系统实际上有两部分，一是

由都察院统辖的御史们，分属十三道，总计100余人；另外则是各自独立的六科给事中，约50人，两者合称科道。原则上说，御史主要负责监视群臣，是监察官；给事中主要负责监督皇帝，是谏官。但明末科道大体合流，在朝都以言事为主，因而统称言官。言官的职责就是言事，而且可以风闻奏事，用不着负责任，因而在每天数不清的本章中总有一部分言官的奏本，其内容不可避免地会涉及对朝政的或温和或激烈的批评。

为了证明自己是一个真正的圣君，崇祯帝不能不经常要听任言官们说三道四，但在骨子里他却对言官们厌恶之极。明末官场上把言官称作乌鸦，说他们只会哇哇乱叫，实为不祥之兆。崇祯帝也深有同感。太子开始读书后，他就常让太子陪他一起阅读本章，以便使太子早早了解朝政中的精微奥祕。在看本的时候他告诉太子："凡阅读科道的本章，必须明确其中的用意，或是为了讨好他人而荐举，或是为了树立高名而救援，这才是他们的本意。至于表面上的那些铺陈，娓娓千言，只是虚张假借，可不要被欺骗了。"这些话正是他对于言官的真实想法。

出于对言官的厌恶，他除了採取像对张寿祺的本章那样干脆封锁住其言路的办法之外，每隔一段时间还要对于真正冒犯了他的言官发一次威风，以抑制他们的嚣张。在崇祯九年（1636）的八月，他就又发了一次这样的威风。

这年七月，围剿农民军的形势本来很不坏，洪承畴和刚刚上任的陕西巡抚孙传庭分率所部在陕西周至同高迎祥农民军作战，因为叛徒出卖，高迎祥被俘获。由于高迎祥是当时最为着名的"巨贼"，这个消息使得崇祯帝和整个朝廷大为振奋。按照崇祯帝多年的梦想，活捉了高迎祥这样重要的人物，本来应该举行隆重的献俘大典，以振军心士气，同时也让自己大为开心一次。他也发出了旨意，要将"贼渠解京，着择的当员役，沿

途拨兵严防，毋致疏虞”。但京师出现的紧急军情却使得这件事情延误了。

在俘获高迎祥的好消息传来之前，已经先有了清军再次入塞的坏消息。这是清军第三次进入内地了。六月末，由皇太极之弟多罗武英郡王阿济格率领的10万清军由北京西北的独石口（今河北赤城县北境）毁边城入关，然后沿延庆、昌平一线直逼北京，大有己巳年横扫畿辅的势头。七月上旬，京师开始戒严，崇祯帝一面命文武大臣分守城门，一面传檄山东、山西、大同、保定及关外等处兵马火速入援京师。幸好这一次清军入塞，志不在攻打北京而在抢掠京城周围的人口财物，在京城附近一扫而过，就连克房山、固安、文安、永清、定兴等畿南州县，然后又转过头来攻陷了京东的顺义。京城没有受攻，使得崇祯帝精神稍定，他看到对敌的将帅个个畏缩不前，不能用命，决定再派太监外出监军。他觉得这样做实在是势不得已，曾经对阁臣说：“派遣内臣出京监军，全是当天就出发的；而新任的添设兵部侍郎张元佐出镇昌平，受命三天却还没有动身。怎么能怪朕任用内臣呢？”但他毕竟对朝臣的抗议有所顾忌，因而这一次尽量不事声张，悄悄派遣，希望在大敌当前的时候朝臣们也不要再毫无道理地争论不休。

但皇帝的这份苦心却还是没有被朝臣谅解。八月初，河南道御史金光宸上疏攻劾在外督师的兵部尚书张凤翼和镇守通州兵部侍郎仇维桢，说他们报捷叙功首推监视内臣，是别有用心，并且义正词严地请求罢去所有督军内臣。这一次崇祯帝真的被激怒了，对文臣昏庸武将怯懦的痛恨，对言官的厌恶和自己一片苦心不被理解的怨艾，一起爆发出来。

十七日，他在平臺召对大臣，特地也召来了御史金光宸。召对开始的时候，突然风雨大作，侍立在屋檐以外的太监们只好用袖子遮挡飞溅下来的雨水，以免弄溼了中左门内的殿堂。崇祯帝厉声喝问金光宸为什么借

题发挥，沽名钓誉。金光宸却强硬地说：“皇上因为文武诸臣不能实心任事才委任内臣，臣却以为任用内臣只会使诸臣更加推诿不负责任。”崇祯帝本来是想重重处罚金光宸的，但突然一个炸雷轰下来，好像要打在他的御座上。他似乎有些心虚，沉吟半晌才说：“你不要再说这些事情了。”就没有再行追究。第二天传下旨来，金光宸只被降3级调用。朝中都在传说，金光宸是靠着上天的保佑才得到倖免的。

或许崇祯帝并不是真的惧怕霹雷骤雨，但他在对待言官和其他朝臣进谏的问题上同样存在着深刻的心理矛盾却是明显的。一方面，他很想做出一副虚怀纳谏的圣君姿态，根深蒂固的道德意识也要求他实心纳谏；但另一方面，对言官和其他进谏者的怀疑与厌恶，以及强烈排斥一切批评的虚荣心，又使他很难听进去任何批评，忍不住要发作，要暴怒。发作过后平静下来的时候，他或许也会有所悔悟。那声炸雷大概就正好起到了让他突然平静下来的作用。

九月初，清军携带着劫掠来的18万牲畜人口和大批物资浩浩荡荡地由冷口（今河北迁安县西北境）出了长城，还特地在长城边立了木牌，上书“各官免送”，以示对明朝官兵的蔑视和羞辱。明官军果然听话，远远地看着清军从冷口撤军，撤了整整4天，直到全部撤完了才涌到关城前。负责督师的兵部尚书张凤翼向崇祯帝报捷说，敌军已经被赶出边塞，我军斩敌首三级！

这样的鬼话当然掩盖不住明军怯懦避敌的真相。在北京解除戒严之后，崇祯帝照例对主要军事负责人进行了惩治。兵部尚书张凤翼和宣府大同总督原任兵部尚书樑廷栋同时被撤职议罪，但在九月初的前后几天里，张凤翼和樑廷栋相继死于军中，据说他们是知道难免会受到重处，连日服用大黄，中毒而死的，总算避免了做刀下之鬼。

清军接二连三地进入内地，如入无人之境，给了崇祯帝很大的刺激，也更激发了他对于干练的军事人才的渴求。在这以前，他曾经亲自破格提拔过王洽和樑廷栋任兵部尚书，但都不能满意，又为了清军兵临城下，一个被处死，一个自杀。这时候，兵部尚书和宣大总督这两个重要的职位出现空缺，他希望能任用真正有才略、有胆识，能够帮助他挽救颓局的人。经过仔细的斟酌，他最后决定调正在围剿农民军前线上的总理五省军务卢象升任宣大总督，起用正在家中守丧的原任宣大总督杨嗣昌为兵部尚书。

在崇祯帝十几年的统治中，这一次人事安排大概是最为精心也最为妥当的。卢象升年轻刚毅，治军有方，在多年同农民军的周旋中显示出超出寻常的才干，被公认为是最有军事才能的朝臣之一。由于高迎祥被俘后农民起义的形势稍稍缓和，崇祯帝把卢象升调到北方重镇，一方面是为了加强京畿地区的防务力量，另一方面也是想要就近对他进行进一步考查，以备将来主持兵部的人选。

至于起用杨嗣昌，则很超出普通朝臣的意外。杨嗣昌字文弱，湖广武陵（今湖南常德）人，万历三十八年（1610）进士。他是原陕西三边总督杨鹤的儿子，杨鹤为招抚农民起义失败被逮治，他正任山海关兵备道，接连上疏请求代父受罚，崇祯帝因此免除杨鹤的死罪，遣戍边卫充军。从这一点上说，崇祯帝对于杨嗣昌是有私恩的，杨嗣昌也为此颇为感激涕零，对崇祯帝忠心耿耿。杨嗣昌博学强记，又多年身歷戎马，在军事战略方面很有一套自己的见解，而且文才口才俱佳，善于表达，因此在多次疏论平定之策和召对陈词的时候很为崇祯帝赏识。崇祯五年（1632）夏，他被提升为右佥都御史、永平山海巡抚，担当防御清军的重任；七年（1634）秋，又升任兵部右侍郎兼右佥都御史、宣大总督。但第二年他的父亲死于戍所，不久继母也在家去世，他按惯例离职回乡

守制，照理应该3年期满之后才能再由朝廷酌情授职。但在国家急需人才的情况下，崇祯帝最后还是决定由杨嗣昌来接替兵部尚书。由服丧期间的官员任职，政治术语叫作“夺情”，就是说在国家危急中忠孝不能两全，为了尽忠只好有亏于孝道。但明朝歷来标榜以孝治天下，在一般情况下总要尽量避免出现夺情的事，偶一有之，大多会引起朝士的非议。当初张居正身为首辅，权倾天下，还是为了夺情的事被攻击得灰头土脸。崇祯帝明知道在朝臣们齐唱理学高调的形势下，这个决定可能会遭到许多人的反对，却还是毅然下了决心。

对卢象升和杨嗣昌的任命似乎表明，在崇祯帝统治的中期，他更痛切地感觉到使用有真才实学的实干之才的重要性。温体仁一流使用起来虽然得心应手，感情上也容易交流，但要靠他们来摆脱危机却是有些靠不住的。大概正是这样的想法使得他对温体仁的宠眷突然降温，尽管在感情上他还是很喜欢这位同自己灵犀相通的老臣，但已经没有过去那样的热情去为他维护首辅的位置了。正在这个时候，一个新的事件促成了温体仁的下臺。

崇祯九年（1637）末，江南常熟一个叫张汉儒的讼棍上疏讦告在籍的乡绅原任礼部侍郎钱谦益和原任给事中瞿式耜，说他们“凭自己的喜怒把持人才进退之权，收受贿赂掌握江南生死之柄；宗族亲戚无不是奸诈之人，违禁出海贩运，没有不敢做之事；甚至侵吞国库之财，诽谤朝政，危及社稷。”温体仁在内阁见到这份文书，如获至宝。钱谦益是他的老对头，又是东林党中硕果仅存的元老，而东林一派在朝中的残余势力这些年里几乎无时无刻不在对他进行攻击，想方设法要迫使他下臺。藉着这个案件，正好打击一下东林党人的气焰。因而温体仁立即拟旨，要刑部将钱、瞿二人逮捕入狱，审核定罪。

明代的士绅在乡里极其横行霸道，其中尤以江南一带的乡绅为最甚，张

汉儒讦状里所说的也未必全都不是事实。但这一次告御状却另有缘故。原来常熟有一个富户叫陈履谦，为了一件争夺产业的官司曾经求助于钱谦益和瞿式耜，两个人却因为看不起陈履谦的人品，反而帮助了官司的另一方。陈履谦怀恨在心，想要报復，才找到了专门包揽讼事的棍徒张汉儒。张汉儒虽是一介草民，却很懂得朝中政治的内幕。他知道皇帝最信任的是首辅温体仁，而温体仁的仇敌正是东林党人，因此只要把对于钱谦益和瞿式耜这两个东林骨干的讦状告到朝廷上，就一定能收到奇效。

奇效好像真的立刻就收到了，钱谦益和瞿式耜不久都被抓进了京城的监狱。但东林党人毕竟在朝野上下还有相当的势力，在江南地区更是横行无阻，因而命地方调查追究的朝旨虽然下来了，地方官员却故意拖延，以便寻找转机。张汉儒、陈履谦本来是些小人物，所求的不过是洩愤图财，见到形势对自己有利，就又生出了一些妄想。他们一不做二不休，趁机又造了些谣言，说江南东林早有政治预谋，方针是“款曹和温”。温就是温体仁，是说东林党人想要弥合同他的间隙，以便为钱谦益解脱；而曹则是指宫中最有脸面的大太监之一，总督东厂太监曹化淳。此人是崇祯帝在信邸时期的旧人，极得崇祯帝的信任，两个弟弟都因为他在皇帝面前得宠而封至一品武职的都督。他本来出自王安门下，因此同东林党人一向关系很好，又与钱谦益特别有交情。谣言说钱、瞿差人携巨资买通曹化淳以谋求自救。有了这些谣言，他们就直接出面对钱谦益、瞿式耜的家里人进行勒索，大有不装满腰包誓不罢休的劲头。

他们没有想到，这一次做得太过分了。钱谦益是个老谋深算的政客，哪里肯随便低头服输，受小人之气？他在狱中指挥人上下活动，特别找到了曹化淳。曹化淳本来是钱谦益的老朋友，何况谣言中说的又正是崇祯帝最忌讳的内官和外官相勾结，一旦被皇帝听信了，自己前途莫测，因

此就大为振作起来，认真查办这件事。曹化淳主持着一个现成的东厂特务组织，要让案子转风并不困难。他直接向崇祯帝奏明瞭这件事，当然要为自己辩解，同时请求皇上让他亲率东厂番役调查此事，以杜绝小人诬陷大臣，搅乱朝政的歪风。

崇祯帝最喜欢处理复杂的案件，听说这里面还有这么多弯弯绕绕，不禁技痒，马上同意曹化淳的申请。曹化淳雷厉风行地抓了陈履谦和张汉儒，亲自在外东厂严刑拷讯，把他们俩打个半死，当然就拿到了需要的口供，无非是两个人怎样为报復进行诬告，怎样造谣惑众以便勒索，等等。曹氏淳拿着口供向崇祯帝作了汇报，崇祯帝见到并没有什么疑点，也就决定免除对钱谦益和瞿式耜的查处，并命将陈履谦和张汉儒交刑部议处。正巧刑部尚书郑三俊也是东林一党，于是再审别无异词，议定对陈、张二犯各杖责100，枷号3个月。两个人先是被打得一佛出世二佛昇天，接着又要扛上几十斤重的木枷连日在街头示众，加上刑部牢里毫不留情，3个月的期限未到就先后死了。

这个案子前前后后闹腾了将近半年的时间，一旦真相大白，东林一派乘势不依不饶地追究起当初温体仁拟旨的过失来，而且把过去的一些是非也重新搬了出来。温体仁照例引咎乞休，这是多年来做惯了的事情，本来以为还会像以往那样，由皇帝来温旨慰留。在内阁值班的张至发本来也按照以往的规律票拟了慰留之旨，谁知崇祯帝却在上面批了“放他去”三个字。温体仁毫无思想准备，正在家里吃饭的时候听到了消息，一时惊慌，把手里的筷子也掉在地上了。

崇祯帝对这位在自己身边操劳多年的老臣总算是有感情，虽然让温体仁退休回家，还是很给了他些体面，临行前赐给他金银绸缎，并命行人司官员一路护送他到浙江故里。但对于温体仁来说，这却是一个极大的打击。回到家乡之后，这位精力充沛、干劲十足的前首相竟然一病不起，

第二年就死去了。

就在钱谦益的案子闹得满城风雨的时候，新任兵部尚书杨嗣昌于这年三月进京任职。崇祯帝很急切地召见了他，向他讯问用什么办法能够摆脱当前军事上的被动局面。杨嗣昌则从一个兵部尚书的角度全面分析了形势，提出了一整套战略构想。

杨嗣昌认为，“攘外必先安内”。他比喻说：“天下的大势好像是一个人的身体，京师是头脑，宣府、蓟镇等边防是肩臂，黄河以南、大江以北的中原地区是腹心。一个人身上最重要的是头脑。边疆烽火燃于肩臂，对身体危害甚急；流寇作乱于腹心之内，对身体影响甚深。紧急的固然不能谋划迟缓，而影响至深的更不可以稍有忽视。如果腹心安然，脏腑无恙，就可以输送精血，运行骨骸，以拥戴头脑，护卫风寒于肩臂之外，还有什么可忧虑的呢？……所以臣以为必先安内然后可以攘外，必先足食然后可以足兵，必须保护民众才能够荡平流寇。这是今日辨证施治的根本，不是敢缓言攘外，因为急切于攘外，才不得不先安内。”

杨嗣昌分析出，清军的攻势再勐烈，暂时还不会危及明王朝的根本统治，因而只是肩臂之患；而中原的农民起义不但消耗了大量的兵力和军饷，还造成了人心浮动、城乡凋敝，使帝国大伤元气，所以是心腹之患。出于这样的分析，他认为应该首先集中全力对付农民军，而对清军采取守势，甚至想办法与其妥协媾和，将来内乱彻底平定后再作长远打算。这样的战略眼光，比起过去崇祯帝和他的朝臣们忙于头疼医头脚疼医脚地穷于应付，确实要高明多了。崇祯帝从来没有听人从战略的高度为他系统分析过形势，一听这番话，大有茅塞顿开之感，感慨地说：“只恨用卿太晚啊！”从此对杨嗣昌信任不移，把剿平农民起义的大事放手交给他去办。

在确定了全力消除农民军这个心腹之患的战略构思之后，需要的就是具体实施的方略。杨嗣昌针对农民军分散流动作战的特点，提出了一个以主力兵团流动进剿和地方兵团固守协助相结合，稳扎稳打，步步为营的“十面张网”方案。根据这个方案，五省总理和陕西总督分别统率各路援剿部队和三边劲旅，作为主力在中原和西北两地突击剿灭大股农民军；陕西、河南、湖广、凤阳四个巡抚辖区的地方兵团一面固守自己的区域，一面配合主力兵团围剿，所谓“分任剿而专任防”，称为“四正”，就是围剿大网的四个正面；此外，延绥、山西、山东、应天、江西、四川六个巡抚辖区的地方兵团作为“六隅”，是大网的六个边角，主要负责严守自己的区域，相应协助围剿。杨嗣昌以为，一旦张网部署完成，只消3个月时间就可以彻底消灭全部农民军。

仅就军事方案而言，“十面张网”的计划还是相当严密的，但要认真执行起来却需要许多基本条件。首先是要有充足而精干的兵力，否则网大眼稀，只靠空架子无法收到实效。杨嗣昌在自己的方案得到崇祯帝的批准之后，立即就着手增兵。根据他的调配，五省总理和陕西总督的两个主力军团各增兵3万人，湖广、河南两巡抚增兵各1.5万人，凤阳、陕西两巡抚各增兵1万人，此外还在凤阳祖陵和承天（今湖北钟祥）祖陵各增设专防兵5千，总共增兵数达到12万。连同中原、西北两个战区和“六隅”地区原有的兵额，十面网中所用的部队超过了20万。调集这么多的部队完成一个总战役，在明代的歷史上是极为罕见的，从数字上说也至少足以同各路农民军相抗衡。问题在于，在军制极其腐败的明朝末年，这些部队到底有多大的战斗力？杨嗣昌对此也只好听天由命了。

增兵就要增饷，户、兵两部经过仔细筹算，共需增加军饷280万8千两。这笔庞大的开支很让人伤脑筋，崇祯帝在四月的一次召对中说到增饷问题时指责朝臣们：“去年谕令勋戚之家捐助，至今抗拒，全没有急公体国

之心。就是直隶各省的乡绅也不捐助。及至贼来时，都成了他们所有。怎么这样愚蠢？”但愚蠢的又何止是勋戚和乡绅，崇祯帝本人也同样是守财奴本性，宁可国破家亡也不愿意拿出钱来助饷。大家都不愿出钱，巨大的金额只能再从民间榨取。杨嗣昌因此提出了他的着名的加派“剿饷”的计划，在辽饷之外又在每亩加粮6合，每石折银8钱，合计天下增税192万多两，再加上所谓“溢地”——就是重新核查纳税土地——等项，全国年加派共280万两。这项“剿饷”是为完成“十面张网”的大战役而临时设立的，所以崇祯帝在发佈加派诏书的时候说：“暂苦我民一年，除此心腹大患。”但“十面张网”终于没有完成，临时设立的“剿饷”也就长期延续下去，人民更加痛苦，明王朝的灭亡也就来得越发迅速。

除了增兵加饷之外，还有一个命将用人的问题。特别是总理、总督和四正六隅的10位巡抚，能否有力地节制军队，机动地运用战术，积极主动地以围剿为己任奋勇歼敌，实在是整个战役能否成功的关键。对于10位巡抚，由于涉及全面的人事安排，杨嗣昌不便插手过问，只能继续使用原来的在职官员。其中以陕西巡抚孙传庭最为深沉老辣，所部战斗力也最强；其次如湖广巡抚余应桂、凤阳巡抚朱大典、山西巡抚吴甡等人，也还老成干练。但孙传庭从一开始就对杨嗣昌的“十面网”不以为然，认为“向来贼势，张则四出，困则归秦，则贼之地利在秦明矣”，如果分散围剿，“贼将踞全秦为窟穴，而四面六隅几为空张之网矣”。他的看法并非没有道理，但出发点却是从自己陕西一省的地方利益考虑。类似的地方主义情绪在各督、抚中相当普遍，后来给杨嗣昌的作战计划带来许多麻烦。

用人中关键的关键当然是总理、总督两名主帅的选择。洪承畴久任陕西总督多年，经验和能力都是有目共睹的，自然毋庸再议。而总理一职在卢象升调任宣大总督以后，就由平庸无能的王家祯接任，大战当前，显

然必须调换。从当时的实际情况考虑，重新调回卢象升肯定是最佳方案，因为他毕竟有多年剿除农民军的经验，人才胆略又堪称朝中第一。但杨嗣昌对于卢象升却并不感兴趣，一半是出于人格气质方面的不合，可能还掺杂着几分嫉妒，另一半则是由于党派的纷争。

杨嗣昌同他的父亲杨鹤都是在天启时期因为不满于魏忠贤的专权而被罢免官职的，本来同东林党人关系并不坏。但在任永平、山海巡抚期间，因为辖区内有人为迁安的原任侍郎郭巩被收入“逆案”鸣冤叫屈，他也觉得郭巩确实冤枉，曾为之向朝廷请命。郭巩并没有因此被宽赦，他本人却因此背上了为阉党翻案的恶名。东林党人最痛恨企图翻“逆案”的人，一律目为奸邪，从此把杨嗣昌打入另册。而杨嗣昌是一个外圆内方的人，宁愿为一件小事同东林作对到底，决不屈服。在他主持兵部枢权以后，东林方面的人不断对他放出明枪暗箭，他也就毫不客气地同东林对抗到底。而卢象升出自江南士绅之家，又深受理学薰陶，却是东林一派人。他对于杨嗣昌在服丧期任职和建议加派等做法很不以为然，不时有所表露。这样，两个在当时最为杰出的军事人才却不能和衷共济。

不喜欢卢象升这个最佳人选，杨嗣昌于是选中了两广总督熊文灿。熊文灿的出名是因为在福建巡抚任上曾经招抚了多年横行海上的着名海盗郑芝龙（郑成功之父），后来又在两广平定了大股海盗刘香。崇祯帝对这个屡建奇功的军事人才一直很注意，特地派亲信太监以到广西採办药材为名，到广东对他进行实地考察。熊文灿并不知道太监是来考察自己的，但招待仍然十分殷勤，送了大批礼物，又大摆宴席，痛饮10日。一天在酒宴上，那太监说起了中原流寇总不能平，无人肯为朝廷尽力。熊文灿多喝了几杯，忘乎所以，拍着桌子大言道：“都是诸臣误国！若是我熊文灿去了，怎么会让那些鼠辈猖獗至此呢？”太监立即起身说：“我并非去广西採办，而是奉皇上之命特意考察熊公的。熊公真是当世之才，

非公不足以办贼。请做好准备，不久以后大概就会有诏旨下来了。”熊文灿这才吓得酒醒，但后悔已经来不及了。

崇祯帝已有意任用熊文灿为五省总理，杨嗣昌虽不认识此人，但见他过去的政绩斐然，也宁愿相信他真是一个可用之才，于是上疏力荐：“臣思总理一官，与总督专任剿杀，须得饶有胆智，临机应变之才，非现任两广总督熊文灿不可。”熊文灿只得离开相对安适的两广，走上危险的五省总理的宦途。在路过庐山的时候，他拜访了熟识的僧人空隐和尚。和尚说：“你可是大失误了。你以为所将的兵士足以制贼于死命吗？”熊说不能。和尚又问：“手下大将有能委以大任、独当一面，不烦指挥就取得胜利的吗？”熊说无有。和尚说：“两者都不能对付贼寇，而皇上特以盛名重任阁下，一旦没有成效，不是要杀头吗？”熊文灿站立了许久才说：“用招抚的办法怎么样？”和尚说：“我料到阁下必用抚，但流寇与海寇不同，请慎重其事。”

熊文灿就是带着以抚为主的宗旨来出任战区总司令的，这至少同“十面张网”计划的原本意图是不相符的。统帅们各有主张，对于杨嗣昌方案的实施必然会有不利影响。

但在经过半年多时间的紧张筹措之后，兵、饷都已完成准备，主帅也已到任，“十面张网”的总围剿还是被正式推行了。杨嗣昌在奏章中对这次行动作了颇为乐观主义的描述：“臣计边兵到齐，整整在十二月、正月、二月为杀贼之期。除凤泗、承天祖陵所在理应防守外，确确以河南、陕西为杀贼之地。……臣之愚计，要使陕西巡抚断商州、洛南，郧阳抚治断郧阳、襄阳，湖广巡抚断德安（今安陆）、黄州（今黄冈），安徽巡抚断英山、六安，凤阳巡抚断颍州（今阜阳）、亳州，而应天巡抚抚之兵仍堵潜山、太平（今当涂），江西巡抚之兵急堵黄梅、广济（今湖北黄梅县西），山东巡抚之兵直堵徐州、宿州，山西巡抚之兵横截陕县、

灵宝，保定巡抚之兵飞渡延津一带。然后总理提边兵，监臣提禁旅，河南巡抚提左良玉、陈永福等兵，同心并力，合剿中原，为不尽不休之势。倘闯将（李自成）、过天星（张天琳）大贼透出关东，则陕西总督提左光先、曹变蛟、祖大弼诸帅之兵与之俱出，下三个月苦功夫，了十年不结之局。……断断乎可三个月而平贼也。”

在杨嗣昌的内心深处是不是真有这样乐观，不得而知。但崇祯帝的确是在他所描述的美丽图景前激动了。只要能在近期讨平流寇，就可以腾出手来对付关外的清军，而一旦军事上的危机彻底消除，中兴盛世就将不会太远了。对于杨嗣昌这位真能实心任事，把如此重大的一次军事行动安排得妥妥当当的栋梁之臣，他心中充满了感激之情。直到“十面张网”的计划最终流产，他的这种感情也依然没有完全消失。杨嗣昌毕竟是他在整个统治期内最得力，也最受他信任的大臣。

在一种乐观主义情绪的鼓舞下，崇祯帝在崇祯十年的八月举行了他平生唯一的一次巡城阅兵仪式。这天京城全城戒严，禁止百姓出行，崇祯帝在威武仪仗的引导下骑着骏马缓缓出宫，文武百官也都骑马跟在皇帝身后。这支庞大的队伍在“武成之乐”的伴奏下先到正阳门，然后沿着内城绕各门巡视了一圈。京营的全体将士们早已排列在城墙上下，鲜艳的军旗随着金风飘舞，兵刃铠甲在朝阳的照射下闪着毫光，皇帝在哪里出现，哪里就响彻了山呼海啸般的“万岁”之声。崇祯帝见到军容威严整齐，非常高兴，特地赏赐了那位怀揣“行无所事”四字真经的戎政尚书陆完学。在这个秋高气爽的愉快日子里，他似乎又看到了自己的帝国和自己的军队的伟大力量。他当然不会知道，接受检阅的这数十万大军中，多一半都是各营将领们出钱临时雇来充数的，京城里的杂役、伙计乃至流氓、闲汉一时都在城墙上下当了临时工。依靠这样一支徒有其表的部队来维护破败的帝国，其结果可想而知。

四 战和两难

崇祯十年（1637）末到十一年（1638）初，当十面张网的方案开始正式实施的时候，确实收到了一些成效。

李自成、过天星的农民军在崇祯十年（1637）十月曾南下攻入四川，先后攻克了川北和成都平原上的三四十座州县，一度兵临成都郊外，吓得明朝四川地方当局惊惶不知所措。负责西线围剿的陕西总督洪承畴连忙带领固原总兵左光先部和临洮总兵曹变蛟部两大主力进入四川，从东线对农民军进行阻截攻击。新上任的四川巡抚傅宗龙则调集各路川军数万人在成都至阆中一线阻止农民军南下。李、过等部无法偏促于川西北一隅，于崇祯十一年（1638）初分别折返陕西。过天星、混天星等出东路，经凤翔重新回到西安以北的广大地区。陕西巡抚孙传庭率军围剿这部分农民武装，在四、五两月先后于澄城、三水（今旬邑）取得胜利，混天星被杀，过天星等人投降。李自成部出西路，在甘肃河州（今临夏附近）、临洮一带活动。洪承畴率西北主力重点围剿李自成军，在三月份也两度获胜。李自成在接连受重创后沿着秦岭山区撤退到川、陕、鄂交界的大山中潜伏起来，部队只剩下千余人。至此，西北地区的“流寇”基本上被剿平了。

在河南、湖广方面，张献忠部于崇祯十年（1637）八月在南阳地区被左良玉击败，退入湖北。在襄阳总理剿务的熊文灿本着以抚为主的方针，派人去招降张献忠。张献忠也表示愿意接受招抚，并且派人送给熊文灿一批珍宝，其中包括两块一尺多长的碧玉和两颗径寸的珍珠。贪财好货的熊文灿以为招抚了张献忠既可以唾手而得荡平之功，又能够蒐括到不尽的财宝，极力向朝廷建议招抚。崇祯帝正苦于兵乏饷匮，也极想不费

刀兵之力就实现天下太平，立即批准了熊文灿的建议。

杨嗣昌明知道农民军在不利的时候往往以受降为名以屈为伸，很少有真心实意，但又不能抗拒圣意，只好提出要张献忠先去剿杀其他各股农民军，然后才可以招安，否则还应乘机砺兵严剿。崇祯帝却深受着不用增兵增饷就能大获全胜的诱惑，当面批驳杨嗣昌说："岂有他来投降，便说一味剿杀之理？"于是抚局已定，张献忠受封为副总兵，屯师于襄阳西面的谷城，解散所部18000余人归农，仍留精兵11000名，听候熊文灿调遣。但张献忠却并没有听候调遣，只是在谷城造房种地，训练部队，让他出徵就以粮饷不足进行拖延，熊文灿也毫无办法。

但张献忠的受抚还是给中原地区的农民战争造成了极大影响。在他受抚前后，闯塌天刘国能、"曹操"罗汝才等大股的农民军都接受了招抚，有些人后来还成为明军镇压农民起义的悍将。到崇祯十一年（1638）下半年，农民军中比较有实力的大股武装只剩以老回回（马守应）、革里眼（贺一龙）、左金王（贺锦）等人为首的所谓"革左五营"仍在大别山一带活动，但强敌四布，也不能有大的举动。明末的农民战争陷入一个前所未有的低潮之中。

尽管同"三个月平贼"的限期相比是延长了一些，十面张网的大战役好像还是取得了很了不起的成功。崇祯帝被接连传来的捷报弄得有些飘飘然起来，开始准备在平寇之后进行中兴的第二步战略——剪除清虏。身为兵部尚书的杨嗣昌却不敢这样乐观。他深知，中原和西北的"流贼"还远远没有剿除干净，在灾害频仍，遍地哀鸿的形势下，李自成、马守应这些星星之火随时都有可能再成燎原之势。而张献忠、罗汝才等人的投降也很靠不住，不一定什么时候就会东山再起。因此他一直坚持，绝不能削弱围剿的军事力量，而且要趁着大好形势力促归降的农民军出征讨伐没有归降的农民军，让其两败俱伤。如果降军不听命令，就以武力强行

解决。为了彻底解决农民军这个“心腹之患”，他认为对于清军的“肩臂之患”还是应该从容对待，最好是先能暂时媾和。可惜在战局稍有好转的情况下，崇祯帝已经听不进这些有见地的想法了。

杨嗣昌希望能与清方进行谈判，并不只是一厢情愿的空想。早在崇祯八年（1635）十月和崇祯九年（1636）二月，皇太极曾经两次派人送信给明朝边防守将，并请他们转给明廷，两次信上的内容都谈到讲和的问题。后一封信是专门写给崇祯帝的，信上说：“我见黎民百姓涂炭，常以和睦为念，只希望能共享太平，致书遣使不下数次，不知下边臣属欺骗矇蔽没有报告朝廷，还是朝廷明知黎民涂炭、人民死亡而无动于衷，不愿和平。我一再讲和而你明朝大臣竟无一言回答，这是有意招惹祸乱。”信中口气虽然蛮横，但想要和谈的意思还是表达清楚了。既然对方愿意和谈，就有机会通过某种妥协换取一段和平时间，来保证肃清中原，恢復国力。当然杨嗣昌还不能够公然说是对清谈判，为了保住天朝和皇帝的伟大面子，只能说是用“款”，就是说朝廷以抚慰的方法，通过给那些边外的蛮夷一些好处，让他们驯服。

崇祯十一年（1638）四月十二日，是例行的经筵活动。几位主讲的大臣照本宣科地讲解了几篇儒家经典，希望皇帝潜心于理学修养，成为德行高尚的尧、舜之君。经筵完毕后，崇祯帝似乎还觉得意犹未尽，又把六部大臣召了来，想问一问怎样把孔孟的治平之道运用到实际政务中来，以理论结合实际。杨嗣昌藉着这个机会，向皇帝进讲了《孟子·离娄》中的一章：“争地以战，杀人盈野；争城以战，杀人盈城。此所谓率土地而食人肉，罪不容于死，故善战者服上刑。”想借着孟子这种反对诸侯战争的和平主义思想来引导崇祯帝同意对清方进行接触谈判。崇祯帝已经知道杨嗣昌的想法，但丝毫不感兴趣，很不耐烦地说：“这是孟子针对列国兵争而说的。今天对一个属国（指清朝），虽然还不能大加讨伐以示天

朝之威，又何至于像汉代那样使用‘和番’的下策呢？今后不要再提这件事了。”

皇帝基本否决了对清议和的动议，但这件事却还是引起了满城风雨。绝大多数朝臣对于杨嗣昌竟然提出“款和”清方，都感到极大的愤慨。根据夷夏大防的传统原则，堂堂天朝的中央帝国同外间的一切夷狄是根本没有平等可言的，一切夷狄只不过是天朝的藩属，只能规规矩矩地向天朝纳贡称臣，如有犯上作乱，则只有剪除讨平一个办法。而关外的满洲部落世世受天朝封赏，史册俱在，却突然不驯造反，而且强佔辽东、数次入塞，烧杀掳掠无恶不作，在明朝的臣民中更是引起了极大的敌忾情绪。一般人都以为，同清方谈判、媾和，不论有什么理由，都是丧权辱国，甚至就是通敌叛变，是石敬瑭、秦桧一流的行径。在明代敢于同清方进行接触、进行谈判的，只有一个头脑比较清楚的袁崇焕。而袁崇焕的这一做法却在天启七年（1627）和崇祯二年（1629）两次被朝廷视为大逆不道，最后一次还被当作“通敌”的重要罪状之一，直接导致了他的身败名裂。有这样的前车之鑑，又是在平庸的爱国主义热情充斥朝野的情况下，杨嗣昌还敢冒天下之大不韪，提出议“款”，正说明他有着不凡的战略眼光和对皇帝真诚的忠爱。

朝臣中却很少有人能理解他的这种眼光和忠爱。在以东林为首的反杨派看来，这正好又给他增加了一条罪状。东林党人认为，杨嗣昌共有3大罪状。一是为“逆案”翻案，同东林君子作对；二是父丧、母丧双重的服孝身份腆颜于朝，伤害了国家以孝治天下的根本；三就是通敌误国。这第三点，几乎是要引起全国官绅民众公愤的。为此，东林战士们对杨嗣昌发动了勐烈攻击，以反对倡言和谈为主，兼及其他。兵科给事中钱增、工科给事中何楷等人反覆上疏，弹劾杨嗣昌。大臣也有出面的，礼部右侍郎王铎上言说：“听说有对建虏抚和之意，不胜愕然。天朝雄兵数

十万，疆域万里，彼不过是一部耳。怎能损抑雷霆之积威，去实行纳币款和之轻举？”但最引人注目的，则是东林旗手，闻名天下的理学大师黄道周。

黄道周字幼平，福建漳浦人（其家乡今属东山县），因为多年在铜山（东山）孤岛的石室内读书，天下学人都称他为石斋先生。他的学识渊博，在理学和《易学》方面的修养犹深，而且节操高尚，为人严肃不苟，被人认为道德文章均堪为楷模，声名隆赫，遍及九州。天启二年（1622）他在38岁上才得中进士，接着入翰林院，歷任编修，充经筵展书官。惯例，展书官要跪着膝行向前为皇帝翻开书卷。黄道周却认为这不符合古礼，因而在展卷的时候起身而进。周围的人对这种举动都十分错愕，在旁的魏忠贤几次使眼色让他跪下，他却仍然坚持不动。因为强项耿直，他多次受到贬黜，直到崇祯九年（1636）才以詹事府右中允再次入朝，后屡迁至少詹事，虽然地位仍然不高，却已在京卿之列。

黄道周对于杨嗣昌的攻击，完全是站在理学意识形态的立场出发的。他认为即使天下再缺乏人才，也万万不可用像杨嗣昌这样应该在籍守制的“不祥之人”，因为这是违天理、逆天道的。杨嗣昌不能坚决迴避辞免，就是贪图禄位，居心阴险。对于议款，那更是关乎国家大节，即使有百利也绝不能行。何况他还认为，就是从眼前利益来讲，议款也是行不通的。他在奏章中说：“不用说建虏必不可款，款必不可成，成必不可久，即使款矣、成矣、久矣，目前宁远、锦州、遵化、蓟州、宣府、大同之兵，何处可撤？”似乎认为由于不好安置因和平而裁撤的军卒，就根本不应该力求和平。这样高明的逻辑大概只有高明的理学家才能推导出来。

黄道周的地位和声望远非几个普通言官所能相比，他的攻劾所造成的影响力也就超乎寻常。在这样一股风潮中，杨嗣昌款虏误国几乎已成了舆

论中的定评，他在精心筹划十面张网中取得的功绩也被轻松地放置在一旁，没有人愿意为他评功摆好。好在崇祯帝在这个问题上思路并不糊涂。他出于天朝皇帝的傲慢和形势好转带来的盲目乐观，完全不愿考虑议款的建议，但对于杨嗣昌的信任和珍视却并没有因此而减弱。他也清楚，朝臣们攻击杨嗣昌带有浓厚的朋党意味，在款和问题上立论虽然同他一致，用心却全然不同。他还是一心一意地信用杨嗣昌，同时也禁止再议论对清方媾和的问题。

杨嗣昌却不是温体仁那一类的佞臣，他还是要想方设法地劝说皇帝按照自己的战略方针行事。正值这年四五月间，钦天监的星相专家向朝廷汇报，火星运转失常，由尾宿逆行至心宿，而且一度被月亮掩盖。这其实是行星视运动的一种有规律的自然现象，本来没什么可奇怪，但明代的皇家天文学者一向抱残守缺，而且对古代的天文学遗产也不甚明瞭，才当成非正常的灾异报上。更加不懂得天文的皇帝和朝臣们于是有些惶惶然了。自西汉以来，星相学就成为正统儒家学说的一个组成部分，而且同天人感应的理论紧密结合在一起。按照这一理论，冥冥中的天是宇宙万物的主宰，天通过各式各样的符号系统来表达自己的意志和愿望，而在地上只有圣人才能领悟这些符号，并且按照天的意愿行动。这就是所谓“天垂象，圣人则之”。而所谓圣人，也就是君临天下的专制皇帝们。对于皇帝来说，理解并且执行上天的意愿，就会得到天的宠眷，国运昌盛，反之就会祸坠于天，遭受劫难。

对于这一点，从小浸润于正统儒家说教之中的崇祯帝是深信不疑的。在他的性格中尽管有个性坚强的一面，对于祖宗的家法、国家的制度，甚至通行的意识形态理论，他不时地会小有突破，但对于那个至高无上的天，他却总是怀着深深的敬畏，不敢稍有疏忽。按照古代圣贤们的理论，月食火星和荧惑（火星）反常逆行，表示上天对于刑罚失度的不

满。而正是在刑罚失度这一点上，崇祯帝自己也会常常感到不是那么理直气壮。

为了响应上天的指示，崇祯帝采取了一系列应急措施，在国家监狱实行清狱，将死罪以下的罪犯全部具保释放；制定了一个每5年对犯罪宗室进行復审的条例；自己也再次素服减膳，以示修省。他还特别给总督东厂太监王之心发了一个祕密上谕："今年火星逆度两次，为灾勐烈，深可惊悼。……近来人情奸险者固多，挟仇诬诈者亦復不少，今后凡有出首报案事件，旗番止许拘人，或者亲自审讯。要叮咛刑官严密核查，案情真实者据实参奏，诬陷者即时开释。并将首报之人，按律反坐以示惩戒。不许擅自抓人，私行拷打，……甚至张冠李戴，增少为多，或长期监禁暗用酷刑，或苦打成招制造冤狱。种种可恶情状，令人一见辄怒。"看来他对厂卫的恶行并非全然不知道，但一定要到天灾示警的时候才会来出面限制一下。

杨嗣昌对于这次火星的"反常"运行，却採取了一种不同的态度。他为此专门上疏说："臣闻月食五星，古来变异史不绝书，但是灾是祥，却要看当时的时势与君主的德行而定，并不一致。"而后引经据典，说明歷代多次出现过同样的现象，却也多有平安无事的，甚至还会是吉祥的兆头。特别有趣的是，他在援引歷史的时候分别举出了几个招抚夷狄或是叛臣的事例。东汉光武帝建武二十三年（47），月食火星，明年匈奴嗯韩大单于受款于五原；唐宪宗元和七年（812）月掩荧惑，其年魏博节度使田兴归降；宋太宗太平兴国三年（978）月掩荧惑，明年兴师灭北汉，随徵契丹，连年兵败，后来听从宰相张齐贤的建议，改用安内养外的和平政策，国家才得安定。这就不但向皇帝阐述了"天变不足畏"的思想，而且利用这次变异再一次为自己的议和政策张目。

崇祯帝读了杨嗣昌的本章，多少有些如释重负的感觉。尽管他不敢完全

相信杨嗣昌所说的，也不大相信火星的变异是标志着款和清方的徵兆，但有了这样多的歷史凭证，总是让他可以放一点心了。他还需要用更多的精力去对付烦杂的朝政，特别是去解决那些迫在眉睫的紧要问题。

这年六月，他又一次对内阁进行了大改组。他先是在此之前把首辅张志发和黄士俊、贺逢圣、孔贞运先后免除了阁职，这样内阁中已经没有一个同温体仁共过事的人了，而且人数骤减。为了充实内阁他又组织了一次对高级大臣的策试，亲自出题，摆出天灾频仍、流寇难平、边饷匮乏、吏治紊乱等当前面临的主要问题，要大臣们出主意、想办法。臣僚们对皇帝的这一套做法早有些腻烦了，明知道皇帝又有了任用新人的打算，却要用这种虚假的考试来向群臣表示自己的公允。那次考试是在中极殿举行的，当时正下着大雨，又是在晚上，烛光昏暗，雨声嘈杂。大臣们无心答卷，多一半人没写几个字就交卷走了，有人干脆就交了白卷。崇祯帝对此却好像早有精神准备，也没有责备。

考试过后，他又让吏部等衙门走了一下会推的形式。这也是多年没有实行过的，这一次算是对朝臣的一种安慰。但会推选中的名单却基本上没有被採用，最后他还是按照自己事先想好的人选直接任命了5位内阁大学士：程国祥、杨嗣昌、方逢年、蔡国用、范復粹。崇祯帝组织这一届内阁有他的特殊动机。由于长期以来，内阁成员多是词臣出身，虽然文学优长，对于国家各部门的实务却缺乏瞭解，很难真正起到顾问辅佐的作用，他想要把在中央各主要部门有实际工作经验又通达干练的大臣集中在内阁里，形成一个通晓六部公务，有实效的班子。经过这次改组之后，首辅刘宇亮原任吏部右侍郎，有吏部工作经验；程国祥原任户部尚书，有户部工作经验；杨嗣昌原任兵部尚书，有兵部工作经验；方逢年原任礼部右侍郎，有礼部工作经验；蔡国用原任工部右侍郎，有工部工作经验；范復粹原任大理寺少卿，有司法方面的工作经验；薛国观原任

都察院左佥都御史，有监察方面的工作经验。其中除刘宇亮和方逢年做过翰林，是词臣出身，其余都是出自外僚。朝臣们，特别是翰林出身的朝臣们，对于任用大批外僚进入内阁当然非常不满。但他们已经习惯了崇祯帝独断独行，只能在下面发发牢骚而已。真正让他们忍无可忍的，还是那个事关天理人伦大道的“夺情”问题。

这次简选阁臣最引起人们注意的当然还是杨嗣昌。因为他仍然在服丧期里，以不祥之身主持兵部已经大乖于体制了，如今又入值内阁，很有些骇人听闻。崇祯帝的打算却是准备有朝一日让杨嗣昌充任首辅之职，因为内阁位次一向是按入值的资格而定，只能及早先让杨嗣昌进来。至于舆论会有什么反映，他不准备理会。

杨嗣昌入阁带来的另外一个问题是兵部尚书这个位子需要一个合适的人来接替，崇祯帝早就看准的是年轻有为的卢象升。但卢象升刚好在不久前也死了父亲，接连上5疏请求回乡奔丧守制。崇祯帝反正已经夺情任用了一个杨嗣昌，不妨再开一例，就不但不许他回乡，反而打算命他在热孝中接任兵部尚书。因为宣大总督主管着京门要塞，不能一日无人，他又任命同样在服丧期，正在四川老家守制的原任宣府巡抚陈新甲夺情出任宣大总督。在陈新甲未到任前，卢象升仍留守宣大总督之职；卢象升未赴尚书任前，杨嗣昌仍署理兵部印信。这样一来，主持军机大事的三位高级官员同在服丧期，都是以不祥之身夺情任事，这在明代歷史上是前所未有的，简直有点不把人伦大道放在眼里了。因为舆论方面的反对意见太多，而且卢象升本人是新近丧父，要求奔丧很坚决，崇祯帝最后只好把原来的安排改变一下，杨嗣昌以辅臣兼任兵部尚书（这又是没有过先例的），仍任陈新甲为宣大总督，加卢象升兵部尚书衔，同意他在陈新甲到任后回籍。

但就是这样的安排也还是遭到了强烈的反对。以坚持和捍卫纯洁的理学

意识形态为己任的大宗师黄道周，再一次对杨嗣昌的入阁和陈新甲的任职进行了道德批驳，顺便地又抨击了款清的政策。他先后写了三份劾疏，一是攻击陈新甲不应为了贪图权势而不完成服丧之期，“守制不终，走邪径，託捷足”；二是攻击辽东巡抚方一藻阴谋主持对清和议，丧权辱国；三是攻击杨嗣昌自己不能持内外两服，又荐引服期的陈新甲，阻挠丧父的卢象升奔丧，真是猪狗不如，“即使人才极缺，又怎能让这种不忠不孝之人勾枝结蔓，让他们的不祥之气秽及天下呢？”

这3份劾疏是六月末同时送入宫里的，崇祯帝读过以后感到很气愤。黄道周在世上的名声他是很清楚的，但对于这样的理学大师，他有着一种微妙复杂的心理。他对于黄道周以及另一位理学大师刘宗周等人的学问人品确实有几分敬重，这同他自幼接受的正统教育是一致的；但同时在心底里他又深深怀疑这些人的学识对于经邦治国到底有什么实际价值，甚至怀疑他们的人品是否真如自我标榜的那样高尚。另一方面，这些人在天下的盛名又使他颇存忌惮，即使以皇帝的九五之尊也不能不考虑舆论方面的影响；而这又使他在心中潜藏着某种不平，常常能为藉故揭露他们、打击他们而产生一种恶毒的快感。正是因为皇帝有这样一种复杂的心态，刘宗周、黄道周们在崇祯时期的宦途才总是大起大落，擢黜不定。

这一次，崇祯帝以为又抓到了黄道周的把柄。在当初九卿会推阁臣的时候，黄道周以少詹事的身份也被选入推选名单里，而且入阁的呼声相当高。他偏偏在没有被任用为阁臣的时候连上3疏，难道不是心存怨气，藉机发洩吗？何况他在攻劾杨嗣昌的奏章中还提到：“陛下以孝治天下，为了缙绅家庭中口角小事，都要治之于法。”这明明是借题讥讽郑鄤一案。而黄道周是郑鄤的好朋友，这分明是徇私情而蔑名教，诽谤朝廷。七月初五日正午时分，崇祯帝在中左门平臺召见了内阁和五府、六部大

臣，并指名要黄道周入见，要当面揭露一下这个德高望重的大宗师。

他不无讽刺意味地对黄道周说：“朕幼年失学，成长后又缺少见闻，只是不时在经筵中略微懂了一点道理。凡圣贤千言万语，不过天理、人慾两瑞而已。无所为（不为自己的私利）而为之，谓之天理；有所为而为之，谓之人慾。你三疏不先不后，却在不点用之时而进，难道是无所为吗？”

黄道周劾方一藻和陈新甲的两疏其实是在五月份就誊好进呈了，但家僕因为听说老爷有可能入阁为相，生怕这次上疏得罪了皇帝，失去机会，就藉口说会极门的守门太监一定要索取八两银子才肯接受奏本，拖着没有送进宫里，直到大局已定，才把两份本章连同新写的劾杨嗣昌疏一起送入。黄道周虽然有些委屈，却无法在皇帝面前陈奏这些说不清的琐屑情由，只得硬着头皮说：“为利者，专事功名爵禄，事事为一己之私，这就是人慾；为义者，以天下国家为心，事事为天下国家，就是天理。臣三疏皆为天下国家、纲常名教，不曾为一己之功名爵禄，所以臣自信本心是无所为而为。”

崇祯帝仍然不停地追究为什么陈新甲五月授职，劾疏直到简用阁臣以后才上。

黄道周毫不示弱地说：“先时因有涉嫌疑而不可言，至简用之后则不得不言。今日不言，无再言之日。况且高官厚爵，谁不乐得之，臣缄默数时，也可叨光冒得些许，臣何苦用自己之功名去作他人的话柄呢？所惜者，千古之纲常名教。臣哪里有为一己私利之嫌？”转而又说：“纲常名教，礼义廉耻，皆是根本上事。若无此根本，岂能做得事业？”

杨嗣昌忍不住出班争辩：“纲常二字，不可不剖明。君为臣纲，父为子纲，君臣列在父子之首。臣入京，闻黄道周品行学术为人所宗，以为其

必有持正之言，可以使臣回乡完成守制之期。不料其疏中自称不如郑鄤，臣才为之嘆息绝望。人说禽兽知母而不知父，郑鄤杖母，禽兽不如。道周又不如郑鄤，还讲什么纲常？”

黄道周说不如郑鄤云云，是去年秋天在一份辞谢升任右谕德的奏疏中提到的，他自称有“三罪、四耻、七不如”，其中的一不如就是“文章意气，坎坷磊落，不如钱谦益、郑鄤”。这句话正是让崇祯帝感到深受刺激的，杨嗣昌才特意点出来同黄道周为难。

黄道周辩解说：“匡章弃于通国，孟子对其不失礼貌。孔子自云：‘辞命，吾不如宰予。’臣是说文章不如郑鄤。”

崇祯帝说：“匡章是不受父亲的喜爱，岂能同郑鄤杖母相提并论？你说不如郑鄤，就是朋比！”又问：“陈新甲谙练军情，今日内外交讧，不得不用他。你说是走邪径，难道杨嗣昌一荐他就是邪径？”

黄道周说：“臣并不认识陈新甲，但人正则行皆正，心邪则径皆邪。且夺情一事，嗣昌在边疆则可，在中枢（兵部）则不可；在中枢犹可，在内阁则不可；使嗣昌一人为之犹可，又吆朋引类使成一个夺情世界则更不可。臣不得不言。”

崇祯帝愤愤地说：“如今的人为达私慾，就在纲常名教上做文章。本来念你尚有操守，还要用你，谁知这样偏矫恣肆。本当拿问，念你是讲官，先起去候旨吧。”

黄道周依然执扭地说：“今日臣不尽言，是臣负陛下；陛下今日杀臣，是陛下负臣。”

崇祯帝说：“你这都是虚话，一生的学问，只学得了这佞口。”

黄道周却还是言犹未尽："臣还要将忠佞二字奏明。人臣在君父面前，如果独立敢言的是佞，难道谗谄面谀的是忠吗？敢争是非、敢辨邪正的是佞，难道不敢争是非、辨邪正，只是一味附和取悦者是忠吗？忠佞不分，则邪正也不明。这是自古为政之大戒，望皇上体察。"这才一身正气地退下。

这君臣之间的一场辩论中，黄道周一直以正统理学卫道士自居，正气凛然，毫无畏惧。而崇祯帝却好像站在了纲常名教的对立面，成了接受批判的角色。他本来想让理学名家当众出丑，结果却是自己被大大抢白了一番，相当恼火。而朝臣中的大多数人却为黄道周犯颜直谏，让皇帝理屈词穷而大为欢欣鼓舞。这次召对之后，朝士们奔走相告，大有扬眉吐气之感。崇祯帝明知这些情况，却无法追究，只把黄道周降六级调外用，让他到江西按察司做一个小小的九品照磨，而且把这笔仇恨暗暗记在了心里。

关于是否款和清方这一无根的风波还没有完全平息，帝国的安然盛世也还没有真正安然过几日，不提防渔洋鼙鼓又动地而起，清军再次入塞了。

自从崇祯二年（1629）第一次突袭北京以来，清王朝在皇太极的统治下，实力又有了突飞勐进的发展。皇太极姓爱新觉罗，是努尔哈赤的第八子，生于万历二十年（1592）。清代史书说他3岁时就聪颖异常，"耳目所经，一听不忘，一见即识"，显然是夸大之词。但他确实是一个英勇的战士和深谋远略的政治家，从十几岁上开始军旅生涯，20岁出头就成为独当一面的一军统帅，后来成为权势巨大的后金四大贝勒之一。天启六年（1626）努尔哈赤去世，皇太极经过一场兄弟间的激烈角逐继承了父亲的统治，成为后金第二位大汗，自称"淑勒汗"（意为聪明汗）。为了最终入主中原，取明而代之，他在自己的统治时期十分注重政治和军

事建设，巩固后方，增强国力，扫清周边地区，逐渐养成了不可战胜之势。崇祯七年（1634），皇太极亲率大军第三次征伐内蒙古察哈尔部，大获全胜，接着颁侑“钦定法令”，实现了对整个漠南蒙古的统治。同年，遣兵徵黑龙江啯尔哈部，把黑龙江流域迤南的广阔地区扩进了自己的版图。崇祯九年（1636），他率军第二次入侵朝鲜，逼迫李朝国王定立城下之盟，从此这个世代忠于明王朝的藩属成为清朝的属国。在军事上，八旗劲旅不断扩充，而且利用大批投诚的明军和蒙古部民建立了汉军旗和蒙古旗，在军备上则使用了很有威力的“红衣大炮”。在政治上他渐次削弱了几大贝勒分庭抗礼的权势，实现了南面独尊的独裁统治。

崇祯九年（1636）四月，皇太极在朝臣们的拥戴下，放弃传统的大汗称号，正式即皇帝位，成为清朝歷史上第一位皇帝，就是清太宗。即位后，宣侑改元为崇德元年，改国号为大清，设六部、都察院等各衙门略如明制。到这个时候，山海关外的清王朝人口虽然不能同明朝相比，但领土的广阔已经与明朝不相上下，部队的战斗力则远远超过了明朝一方，而且体制粗具，国势强盛，完全是一个可以与明朝相匹敌的大国。而明朝君臣却还在为与其接触谈判有失国体国威而夸夸其谈，真是如在梦中。

崇祯十一年（1638）九月下旬，清朝以睿亲王多尔衮为奉命大将军，率左翼，贝勒岳託为扬武大将军，率右翼，分别由墙子岭（在今北京密云县西境）和青山口（在今河北抚宁县北境）拆毁长城，第四次大举进入内地。岳託的右翼清军入墙子岭后直逼密云，明蓟辽总督吴阿衡这天正带着下属为监视太监邓希诏祝寿，大家喝得烂醉，听到警报后才仓促应战，大败，吴阿衡和总兵吴国俊都醉醺醺地死于战斗中。清右翼军在京东一带等候左翼从迁安方向来会合，明廷这时听到报警，京师再度进入戒严状态。

崇祯帝和他的大臣们近年来经历过好几次清军兵临城下的惊险，总算有了一点儿经验，不似最初那样张皇失措。杨嗣昌虽然暗中抱怨朝廷不能早早采纳自己议和的建议，以至于又一次遭到这样的攻击，但作为本兵，却不能不赶忙调兵遣将，竭力支应。崇祯帝寄希望于这位干练的兵部尚书，梦想着能取得比前几次好得多的战果，甚至是聚歼入犯之敌，因而对杨嗣昌的佈置全部照章批准。于是速调辽东前锋总兵祖大寿率部入卫，以山海关监军太监高起潜带关、宁兵一部为应援；命宣大总督卢象升为督师，统管各路兵马，并率宣府、大同、山西各军为左路，天津、青州、登州、莱州各军为右路，夹击清军；以山东总兵刘泽清部由正面遏制清军；京营各军则加强京师的守城。

这样的战防安排大体上还算有章法，却没有考虑到清军铁骑剽悍的战斗力根本就不是腐败的明军所能抵挡的。况且清军极其骄横，进入平原地区后常常是分成数股疾驰电掣，到处攻城略地，大肆掳掠，明军以稳健迟缓的防御为主的战略对应，其实是防不胜防。清军果然在京东地区集结后就分成8路，在西起太行山麓，东至大运河畔的一个宽大的正面上齐头并进，向南攻掠过去。他们这次入塞，并没有把威胁北京当作战略要点，而是把目标放在了太行和运河之间的广大平原地区。

卢象升在接到军令后立即星夜赶来京师，屯兵于昌平，然后进京陛见皇帝。崇祯帝一向对卢象升印象极佳，此时正堪大用，十月初四日召对大臣的时候特别召见了他。崇祯帝问他对清作战有什么方略，他回答说：“陛下命臣为督师，臣只知有战而已。”言外之意是反对同清军和谈。崇祯帝对此言却感到莫名其妙。清兵再次来犯，他确实有些懊悔当初没有听从杨嗣昌的建议，但清朝大军入塞之后，丝毫也没有表现出想要以武力威胁进行谈判的意思，此时即使想同清军接触也找不到门路，哪里谈得上和谈讲款呢？崇祯帝沉吟了一下才很不高兴地对卢象升

说：“朝廷本来没有说要款和，那只不过是外朝在无端议论罢了。”

卢象升似乎不信，但也不便同皇帝深论此事，接着说：“敌人所重的，事事宜防。逼迫陵寝以震动人心，可虑也。趋近神京以撼动根本，可虑也。分兵出京畿之南，剽掠周围州县，断我粮道，可虑也。集中兵力以设防，则失城陷地必多；分兵四处对应，又力量单薄难以取胜。兵少则防守不严，军粮不足则会生乱。这都是御敌的困难。”卢象升不愧是一个杰出的将领，所说的分合两难问题，确是当时对清军作战的要害。崇祯帝也觉得有理，就命他与杨嗣昌共同讨论，制定出可行的作战方案。

杨嗣昌和卢象升可以算是当时明廷中两个最杰出的军事人才，一个长于战略运筹，一个长于战役指挥，如果两个人能够精诚合作，悉心安排，尽管困难重重，还是有可能在这次对清作战中取得比前几次好一点的结果。可惜两个人都囿于朋党之见，从一开始就相互猜忌甚深，只是互相拆臺，根本无合作可言。

卢象升一见到杨嗣昌就说：“公等坚意抚款，难道没有听说过，城下之盟，孔子在《春秋》里也认为是可耻的吗？象升受命督师，如果唯唯从命，袁崇焕的下场就是前车之鑑。阁下不想一想，孝服在身，又不能移孝作忠，奋身报国，将忠孝两失，怎么能还有面目活在人世呢？”

面对这样激烈的言词，杨嗣昌还是比较冷静的，耐心地向卢象升解释：“嗣昌并未言抚。”卢象升却不信，质问道：“周元忠到彼处讲款，数次来往，其事先由蓟辽总督等人发起，最后受命于阁下，天下皆闻，谁可讳言？”

周元忠是个算卦的瞎子，过去行走江湖，曾多次到过辽东，关门前线的将帅们苦于缺乏敌人的情报，就把他发展成一个眼线，以瞭解关外的情况。这件事，兵部知道，也很想通过这个难得的线索同清方取得某种接

触。但皇帝没有批准和谈，谁敢擅自谈判？何况以一个无官无职的算命先生的身份，怎么可能同清朝作正式接触呢？这些政治和军事的基本常识问题，到了明末的士大夫那里，却全是一团懵懂。两方交战，明王朝要靠一个瞎子供情报、通联络，已经十分可悲，而这种军事机密还要被满朝风传，指摘非议，每战必败的原因由此可见一斑。

卢象升对杨嗣昌早有极深的成见，解释是听不进去的。杨嗣昌也十分恼火，说道："阁下是要以尚方剑置我于死地了！"卢象升挖苦说："既不去奔丧，又不能作战，被杀的是我自己，哪里还能杀人？"两人不欢而散。

卢象升并不是心地狭隘，不以大局为重的人，但多年积累的朋党之见和传统的意识形态枷锁束缚了他，使他不能看清形势，无法与杨嗣昌沟通。在回到昌平军营后，他给杨嗣昌写了一封略表歉意的信，说："承蒙老年臺（对杨的尊称）眷顾，冒昧陈说，激烈忠怀，毫无隐讳。也是依仗老年臺有圣贤之人品，不会怪我愚狂，因此情不自禁地剖心沥胆相告。"一位督师，一位本兵，是这次战役中分主内外的两大干城，毕竟还要合作。但杨嗣昌对卢象升的忌恨却没有因此减轻，卢象升对杨嗣昌的成见也依然存在，此后兵部和督师各行其是，战局越来越坏。

清军正在源源南下，目标显然在京南的平原地区，杨嗣昌因而命卢象升调兵通州与高起潜统率的关宁军团会合，以便向南机动对敌。但卢象升却以为高起潜是杨嗣昌一派人，又是监军大太监，合兵后必然被其掣肘，因而以京北敌军甚多，京城、陵寝均需防护为由，拒不从命。将在外，君命有所不受，杨嗣昌对卢象升也没有办法，只得拟定，由卢象升统宣大之军，高起潜统关宁之军，各自分头进剿。这时候，大股的清军已经在攻打京南的良乡、涿州等军事要冲了。

高起潜在明末的太监中是一个特殊人物。他从崇祯五年（1632）起作为

监军太监吕直的副手随军出征胶东，征讨孔有德，不知为什么博得了一个知兵善战的名声，以后就成了内监中最着名的军事家。崇祯帝对他的军事才能相当赏识，一直派他在辽东边防要冲山海关担任监军太监，中间屡次裁撤内官监军，唯有高起潜的关宁监军保留不动。他在山海关任职时间长，又号称很懂军事，所负责任其实已经不仅仅是监视军事调配和行动，而是俨然一方统帅，调兵遣将、指挥作战，无所不为。这一次清军入犯，他以太监的身份直接被任命为一路官军的最高统帅，在明代的歴史上还是前所未有，也最遭朝士的非议。

但不论是被舆论看好的卢象升还是遭到鄙视的高起潜，在分头进剿的时候，全都吃了败仗。卢象升组织了一次对敌营的突袭，没有成功；高起潜部则在卢沟桥一带企图阻击清军南下，同样是大败而归。卢象升的宣大军团和高起潜的关宁军团在明军中算是比较有战斗力的，也都有过同清军作战的经验，所遇敌军又是独立分队，人数并不太多，以全力对敌而不能取胜，实在是两军战斗素质相差太远的结果。相比之下，这两支部队毕竟还敢于一战，而内地来的各部队被调到前线，则只会远远地观望，或是望风而逃，连同清军接触一下都不敢。孙传庭的西北悍军在围剿农民军的时候打过不少次胜仗，十二月被调入京畿地区后，刚见到清军马队的烟尘就吓得屁滚尿流，全军溃乱。主帅孙传庭对这种情况都感到无法理解。这样的局面，无论是勇敢的将领、干练的本兵，还是自以为在运筹帷幄的崇祯帝本人，都没有办法挽回。

十一月里，平原上好像到处都有清兵在活动。顺天府的良乡、涿州、霸州、文安等州县相继失陷；保定府北部的涞水、定兴、新城等县也被攻破。上旬，保定东南的高阳县被围，城中原任督师大学士孙承宗组织奋起守城，坚持了3天，终于城陷被杀。孙承宗一辈子主持对清用兵，颇有建树，最后却在自己的家乡死于清兵之手，引起时人极大的感慨。在

运河西侧，河间府的阜城、故城，真定府的衡水、武邑、枣强等县都被清军一度攻佔，运河上的重镇德州报急。甚至京畿南端广平府的鸡泽、威县也在这时失守了。清军在方圆六七百里的广阔地区分头作战，各路明军东遮西挡不得要领。朝廷每天都在接到各处失利的战报，杨嗣昌对应无术，崇祯帝气急败坏，唯有再次调重兵来援。由于西北形势安定，崇祯帝在十一月先是调陕西巡抚孙传庭率所部入援，第二个月又命陕西总督洪承畴也来京畿援剿，全国精锐差不多都集中到了畿南地区。

崇祯帝对于卢象升在前线的无所作为大为失望，几次想要对他进行撤换，却没有什么合适的人选。十一月末，首席大学士刘宇亮在召对的时候主动提出要去出京督师。崇祯帝为此很高兴，因为以首辅的崇高身份出任前敌总司令，至少能为朝廷立威，振奋士气。崇祯帝要刘宇亮回去把这一请求写成书面奏章，不知为什么，刘宇亮的奏疏中却变成了出城督察各军。督察和督师的意义显然完全不同，崇祯帝不由对文臣的狡猾更加厌恶，但在军情紧急的时候也没有办法，只能命他出城去督察。这时候，孙传庭部已经来到战区，崇祯帝很想用他替换卢象升，还是杨嗣昌劝告说，“临阵易帅，恐怕会影响用兵”，才没有实行。但为了表示他的极度不满，在刘宇亮去督察的同时，崇祯帝还是宣佈撤削了卢象升的兵部尚书衔，改为侍郎衔总督，仍然同高起潜戴罪夹剿。

其实这时候卢象升名为督师，实际上能统辖的只有自己的宣大军团，而且这个军团的兵力也越来越少。十一月，因陈新甲北上任职，兵部命卢象升分一部由陈新甲统率；十二月，大同方面有警报，兵部又命大同总兵王朴率部回防。这样，卢象升部下本来的二万多人只剩下了五千多，虽然多是百战之兵，却更难有所作为了。

负责夹剿的卢象升、高起潜两部从来没有形成夹剿之势，只是从十一月以来一直不断南进，在敌丛中周旋。卢象升在庆都（今河北完县）等处

同清军交锋过几次，双方互有杀伤。十二月上旬，卢、高两部都到了河北南部的顺德府（今邢臺）一带，这里正集结了大批清军。连日作战不利已经让卢象升认识到，面前的清军同他过去对付的农民军大不相同，是很难战胜的。再加上兵部不断减少自己的人马，皇帝又多次严旨切责，他深感悲愤而无奈，决心以死战来报答皇上。

十一日，卢象升营于鉅鹿县贾庄，清晨誓师，他对将士们说："我与你等俱受国恩，患不得死，不患不得生！"众将士皆失声而泣。卢象升率军进至蒿水桥，遇到清军，展开激战。战斗一直持续到半夜，附近的清军来援，把卢象升部包围起来。卢象升却只能孤军作战，亲自挥刀冲入阵中，杀敌十余人，身中两箭两刀，大喲道："关羽断头，马援裹尸，在此时矣！"最后坠马遇害，其时年仅39岁。卢象升死得慷慨壮烈，为世人称道，但他的牺牲却没有对整个战局造成任何影响。在清方的史乘上，根本没有把贾庄之战当作一次重要的战役，没有做出任何记载。

自十二月起，清军开始渡过运河，在山东西部活动，到这年年底，清军的主力大部分已经进入山东，并且向济南方向集结。杨嗣昌本来把山东的防御重点放在德州，山东巡抚颜继祖率军移驻德州，济南的防守相当空虚。清军已经从德州以南的临清和东昌（今聊城）一线渡河进入山东，情报不明的明廷却来不及相机调动，驻防各地的明军将帅们也只照兵部的命令固守自己的防区，绝不主动增援。崇祯十二年（1639）正月初一日，清军对济南发起攻击，只用半天工夫就攻克了这座鲁中第一大都会。山东巡按御史宋学朱、山东布政使张秉文等几十名官员和住在城里的几个宗室郡王都在城陷后被杀，德王朱由枢被活捉后俘虏到盛京去了。城中居民被杀的达到13万，全城被焚劫一空。

在崇祯帝即位以来，虽然军事失利接连不断，大小城池被清军和农民军攻陷了不知多少座，却还从来没有失陷过一座省城。亲藩大批被杀，亲

王被俘，更是明代前所未有的噩耗。崇祯帝在听到这些消息后，大惊失色，简直不敢相信。但除了降旨痛骂诸臣偾事，甚至逮捕惩办之外，他也只有到太庙去向祖宗汇报大难，并祈求列祖列宗保佑这个残破不堪的帝国。

杨嗣昌在不断的失败中也已经完全丧失了信心。年前，他为了军事接连失利而降三级，但仍任职内阁和兵部。济南失陷后，他建议由洪承畴任蓟辽总督，主持北线的对清作战；由孙传庭任总督漕运、山东、河北军务，主持南线的对清作战。但大将们都不敢再同清兵正面作战，督察辅臣刘宇亮也移师到孙传庭军中，跟在清军后面“收復失地”。好在大家都知道，清军抢掠饱足后自会班师回朝。

正好在年初的时候，清军右翼统帅岳託染上天花死了，其他将士们也因水土不服有不少感染天花死亡的。多尔衮不愿再久住中原，决定撤军。二月，清军集结北上，经天津卫向东，三月，从青山口出塞，安全回到辽东。清军这次远征纵横2000多里，先后败明军57阵，攻陷了50几座州县和山东省城，杀明朝两名总督和百余名各级文武官员，俘获人口牲畜共计46万多，其中包括亲王1名，郡王1名，掠夺白银近百万两，其他各种财货无数。

像以往歷次清军入塞之后一样，崇祯帝在军警解除之后对失事诸臣进行了严厉的惩办，由于这一次清军为害最烈，这次的惩办也比以往任何一次都更为严酷。到这种时候，崇祯帝才充分表现出他的精明能干。他把文武诸臣的军事过失分为五大类，分别是“守边失机”、“残破城邑”、“失陷藩封”、“失亡主帅”、“拥兵观望”，统称叫作“五大法案”。兵部和刑部通过认真审核，确定将蓟镇总监太监邓希诏、分监太监孙茂霖、顺天巡抚陈祖苞、保定巡抚张其平、山东巡抚颜继祖、山东巡抚倪宠、蓟镇总兵官吴国俊和陈国威、援剿总兵官祖宽、李重镇，以及副将以下直至州

县官员共36人一同判处死刑，立即执行；首席大学士刘宇亮以下等上百名大小官员被遣戍、削籍、罢官、降级。只有辅臣兵部尚书杨嗣昌仍然受到信任，没有受到处分。

这次规模宏大的集体死刑是在夏天执行的，几十个人同时被处斩，又多是高官，吸引了大批观众。官员被皇帝斩首，照例在临刑前都应该向着皇宫方面望阙谢恩。但这一次，有几个被杀的人在刑前竟然破口大骂起来，而且骂的是当今的天子。由于语涉忌讳，文献里面没有记录他们都骂了些什么，但这一事实本身在那个时代已经足以骇人听闻了。这好像在表明，进入崇祯十二年（1639）以后，不但崇祯皇帝的帝国已经开始在向着灭亡迅速滑行下去，他本人的威信也进入了一个空前的低谷时期。

卷肆 烽火惊传事日非

一 三十而立

按照传统的计算方法，从崇祯十二年的新年开始，崇祯帝就算是30岁了，照孔夫子的说法，就是进入了而立之年。但这样一个对于崇祯帝的人生有着重要意义的新年，却根本没有过好。当时清军正在畿辅、山东一带横行无阻，京师不能解除戒严，每天处于紧张的戒备状态中，不论是宫廷里还是百姓家，都没有心思去热热闹闹地过年。因为处于军事非常时期，崇祯帝下令免除了惯例中的新年朝贺典礼，只是在宫中按照家庭礼仪接受了嫔妃和太监们的拜年。但宫中人等都知道万岁爷忧国忧民心情沉重，个个显出一副心事重重的样子，一点都没有欢天喜地迎接新春的气氛。

在崇祯帝登上皇位以来，像这样悽悽惨惨慼慼的沉闷新岁朝贺已经有过好几次了。国家好像总是处在危急险恶的情状中，除了御极之初的那一段短暂时光，崇祯帝不记得自己有过真正的畅快和欢乐的时候。为了保持皇帝至高无上的尊严，他在朝臣面前总要做出精神抖擞、处乱不惊的样子，但在内心深处却感到万分疲惫。十几年来，他的生活单调枯燥，总是有开不完的御前会议，读不完的奏章案卷，难得有休息的机会。大年初一这天，崇祯帝还得强打着精神按家礼给宫中的长辈拜年，居于首位的是住在慈宁宫中的神宗刘太妃。

刘太妃是万历帝的昭妃，是天启、崇祯两朝皇帝的庶祖母，在宫中辈分最高，而且因为天启、崇祯两朝宫中都没有太后，她一直代掌着太后玺印，算是几代嫔妃中的名义首脑。崇祯帝到刘太妃宫中行礼已毕，照例

像家人那样坐下来拉拉家常。他难得有这样放松的机会，说了几句话竟然就伏着案子睡着了。刘太妃不敢惊醒他，让宫女给他盖上点衣裳免得着凉，一宫上下和皇帝的侍从就屏声静气在旁等候。崇祯帝一觉醒来，才觉得有些失礼，道歉说："神宗时候天下平安无事，宫中安乐，那是太妃亲眼见过的。如今却苦于多难，连着两夜批阅文书，没有阖眼。自以为才到壮年，还可以经受得住，谁知道体力也不争气，在太妃面前就这样昏然不能自持。"老太太听了，忆昔抚今，不由得流下泪来，觉得当今这位天子当得实在不容易。

同他的祖父、父亲和哥哥相比，崇祯帝的确是太操劳了。当年万历帝几十年不上朝，不召见朝臣，也很少阅读公文；泰昌帝虽然只做了一个月的太平天子，却也是朝朝乐舞、夜夜笙歌；天启帝更是个作乐的能手，游苑围猎、练武看戏，闲下来又做得一手好木匠活，制造了无数桌椅箱柜和机巧玩具，从来不过问政务。崇祯帝却没有继承这种家风，而是没日没夜把全部心思和精力都放在朝政上。让他百思不得其解的是，这样超常的勤勉从来都没有得到应得的回报，国家的局面反而一天天呈现出江河日下的势头。

他在极度的劳累中苦苦熬过了进入而立之年的第一个春天，清军总算席捲出塞，京畿地区又恢復了平静。但他不敢稍有松懈，连忙同大臣们商讨有关善后事宜。其中最要紧的，是如何整顿加强从山海关到甘肃的所谓九边长城防线。清军已经随随便便地从各长城要塞进出过4次了，而且给京畿附近地区造成的破坏越来越严重。如果不能亡羊补牢，建立一道坚实的防线，说不定哪一天清军再进来的时候就会残破神京，那种后果将不堪设想。他同心腹之臣杨嗣昌反覆讨论过这个问题，杨嗣昌认为唯一的办法是在九边各处要塞增练新兵，用强大的兵力来抵御清军不论从哪个方向的突然进犯。杨嗣昌大体上开列了一个单子：宣大总督所辖

3镇共需练兵17万多，陕西三边总督所辖边防5镇共需练兵15万多，蓟辽总督所辖5镇共需练兵24万余，保定总督所辖4镇共需练兵15万多，总计要训练边兵73万有奇。

如果真有了这样一支人数众多又训练有素的边防部队，也许确实能够抵挡住清军的再次进犯。但要凑足这样一支庞大的军队，需要大批招募新兵，增兵就要增饷，训练和改善装备也需要大量金钱，于是欲增兵而无饷这个老问题又摆在面前了。杨嗣昌初步测算，要完成这个增兵练兵计划，至少每年要拿出400多万两白银的经费。这对于国库极度空虚，财政濒于崩溃的崇祯朝廷来说，真是一个天大的难题。

多少年来，崇祯帝总是在为兵力不足和粮饷缺乏这两个相互矛盾的难题伤透脑筋，在想尽千般招法之后，最后又总是回到向百姓加派这个饮鸩止渴的老路上来。这一次，他还是想别开蹊径，闢出一条新的财路。其实办法也很简单，就是把从百姓身上直接榨取改为从百官身上榨取，名曰捐助。

他深知文武百官、宗室贵戚乃至宫中的太监，大多腰缠万贯，生活奢侈糜烂。当时的风俗，一个读书人一旦中了进士，因为意味着当官发财，送喜报的人就都带着棍棒家伙进门，一面报喜一面把门窗打个稀烂，叫作“改换门庭”。跟着就有一批瓦匠、木匠前来，精雕细琢，整修一新。仅这“改换门庭”一项，就不知要花掉多少钱。官僚们平日里的排场浪费更是难以计数述。宫中的大太监们靠着敲诈勒索和贪污皇家资产，个个都富埒王侯，在宫外有连屋接宇的大公馆，城外有事先建造好的工程浩大的坟墓，家中姬妾成群、珍玩佈列，窖里藏的金银数目也很可观。明亡后，李自成在京中拷饷，从大太监王之心一人家里，就搜出现银15万两，据说其家实有现银30万两，其他珍宝还不算在里面。

其实天下最大的富豪和最大的奢侈之源正是崇祯帝自己。他虽然生性俭省，但皇宫中包括他的家人以及宫女、太监在内的几万人的开支仍然大得惊人。由于内监们层层盘剥，无论什么东西进入宫廷之后价格都会暴涨，而一向自以为很瞭解民间物价，很精于计算的崇祯帝最终还是要被矇蔽。有一次袁贵妃添置了一个紫檀木纱橱，管事太监报价700两，大约涨价几十倍。但那太监却说，本来需要1000两的，我想方设法，为娘娘省了300两，请不要对皇上实说，怕是皇上再让我用700两银子制作就做不出来了。崇祯帝后来见了纱橱，果然问到价格。袁贵妃回答用了1000两。崇祯帝仔细观察了一番才说："很值！前些天皇后也用1000两做了一个纱橱，质量还不如这个。"

几万人的超价高消费每年用掉大量国库收入，但崇祯帝却以为自己是自天地开闢以来最为节省俭朴的君主之一。自己身为九五之尊还处处节俭，官僚贵戚们却那样奢侈，他因此认为，从官僚贵戚身上榨取钱财以充实国库实在是天经地义的事情。只是从他即位初年起就曾屡屡降旨要求臣僚自愿捐献，臣僚们却一次次搪塞敷衍，从来没有收到过什么实效。这一次，他准备採取严厉手段，一定要把钱弄到手。为此，他同接替刘宇亮出任首辅的薛国观进行了密商。

薛国观也是没做过翰林，由外僚进入内阁的，在朝士中口碑不佳。他为人阴险强悍，成为首辅后就一心同以东林党人为代表的正统朝士们作对。崇祯帝要蒐括臣僚，他觉得也不失为煞一煞朝臣锐气的好机会，因而极表贊同，并积极为皇帝出谋划策。他认为，朝臣贫富不一，总体来说油水不太大，重点应该是那些家资鉅万的皇亲国戚们。而且一旦贵戚带头捐助，朝臣们也就不敢再顽强抵制。但对于那些贵戚，内阁是不好动手的，所以他对崇祯帝说："在外群僚，臣等负责催捐；在内戚畹，则非皇上亲自独断不可。"

崇祯帝接受了这个建议，要先从贵戚下手。但贵戚们的吝啬同他本人是一脉相承的，哪个人都不好说话。崇祯帝决定先抓一个典型，由点上突破，再扩展到全面。几经斟酌，他选定了武清侯李国瑞家。

李国瑞是万历帝的生母孝定太后的侄孙，算是崇祯帝半远不近的一个堂表叔，祖上靠着太后的势力，聚敛了不少钱财，在京中戚畹中也算得上一个大户。在崇祯十二年（1639）之前，李国瑞同他的庶出哥哥李国臣为了财产上的事曾经闹得不可开交，李国臣以为没有分到应得的遗产，为了洩愤上告到朝廷说，父亲留下了40万财产，按道理应分给他一半，他愿意把这20万捐献给国家以为军资。因为这本来是一件家务官司，又涉及嫡长子继承权这样一个传统原则，崇祯帝最初驳回了李国臣的请求。但到这年春上，为了全面铺开助捐活动，崇祯帝就旧事重提，不但要收受李国臣号称属于自己名下的20万，而且要把李国瑞的另外20万也一起拿过来，说是暂时借用，待国用充足后补还。

40万两银子是一个天大的数目，李国瑞当然心疼，就一面哭穷哀告，一面大张旗鼓地拆房卖地，又把傢俱器皿放在通衢大道上公开拍卖，表示自己的穷困，也故意让皇帝面子上不好看。这个举动还引起了全体贵戚们的恐慌。大家都知道，李国瑞之后，刀子就要割到自己头上，因而也密谋串联，共同想办法对付皇上。周皇后的父亲周奎是当今皇帝的老丈人，自然成为贵戚们的领袖，带头向崇祯帝进言，说李家确实穷，不要催逼太急，失去戚畹之心。崇祯帝一向坚决反对内戚干政，又明知道周奎是为了他们一伙的利益，不但不听劝，反而更加严厉，降旨削夺了李国瑞的侯爵，并命令内官衙门按期追缴。李国瑞又气又吓，得了一场大病，竟然死了。

事情弄到这一步，朝中宫中都有了些不平的议论。不论是朝官还是宦官，都知道皇帝在突破了贵戚这一道关口之后，就要对自己下手，因而

在舆论上一致同情李国瑞的不幸遭遇。皇亲国戚们更是大为震惊，为了保护本集团的利益，以周奎为首的一些人暗中勾结宫女、宦官，可能还有嫔妃、皇后，进行了一次抵制皇帝的阴谋活动，而下手的对象，竟然是崇祯帝才只5岁的幼子朱慈焕。

崇祯帝虽然在国务活动中严刻狠毒，对于家庭和亲人却不乏人情味。他自幼失持，父亲和生母都在早年去世，差不多是一个孤儿，就连西李选侍和东李选侍前后两位养母也由于政治原因早早地就同他分手。这样的身世使他对于母爱有一种深刻的渴求。这表现在他对硕果仅存的宫中长辈庶祖母昭妃刘老嬷娘特别的尊重上，在刘老太妃年满80岁的时候（崇祯十三年正月）专门为她加封了“宣懿康惠皇太妃”的徽号，还亲率子女和后妃到慈宁宫去为太妃祝寿，行了四拜大礼。也表现在对生母刘氏的不尽思念上，不但追封生母为太后，恩封了母家世袭官爵，找人画出了生母的遗容，而且在繁忙的政务之余屡次想到生身的母亲，痛不可支。崇祯十三年（1640）七月，不知为了什么样的契机，崇祯帝突然因不能奉养生母而大为哀恸，决定要吃长斋，穿布衣，以示对母亲在天之灵的纪念。内臣和朝臣为此多次劝谏，崇祯帝还是将近一年没有动荤腥。后来还是刘太后的母亲瀛国夫人进宫对他说，梦见了刘后，让她劝皇上不可不进肉食，常言道“药补不如肉补”，不要亏了身体。他才遵照母命开斋。

他本来有6个兄弟、9个姐妹，但夭折的夭折，早逝的早逝，到他统治的中年只剩下了一个小妹妹乐安公主，下嫁给巩永固。对这个胞妹和妹夫，他也很体贴很照顾，把他们当作重要的贴心人。

既无父母，终鲜兄弟，崇祯帝把渴望亲人体贴的一腔情怀就注入到自己的家庭中。到30岁的时候，他在立家方面倒是成果斐然，已经有了一个规模可观的大家庭。同歷代帝王一样，他拥有一大批妻妾。正式的髮妻

周皇后之外，是从打信邸时期就跟在他身边的田妃和袁妃，另外见诸记载的还有卢妃、陈妃等人，嫔、贵人以下还有多少，已无从考察，按一般规律总数应在百人之上。

小家碧玉出身的周皇后是那个时代典型的淑女形象，懂礼仪、守妇道，也善于处理家务纷争。成为母仪天下的皇后之后，她住进象徵着天下女性最高地位的坤宁宫，总管起宫廷内政，宽严相济，治理得居然井井有条。但她毕竟还是个年轻女子，时不时地会显出一点任性，会为了一些鸡毛蒜皮的小事同丈夫闹上一点小脾气。在这个偌大的帝国里，敢同崇祯帝闹脾气的大概也就只有这位周皇后一个人。有好几次，皇帝皇后像寻常百姓家的小夫妻那样为了小事争吵几句，脾气特大的崇祯帝自然不会示弱，周皇后也不屈服，恨恨地对着他连叫“信王！信王！”似乎是在提醒他当年的结髪情意，或许还有什么闺中隐祕。那位当年的信王也就拿她没有办法。闹了又好，闺房之乐有甚于画眉者，调调笑笑也是常事，调恼了，就又闹。有一次崇祯帝见她身穿珍珠衫对镜梳理，就从后面动手逗她。也许正赶上她的心情不好，不吃逗，很不耐烦地用手挡回去，却差一点打在皇帝的脸上。崇祯帝火了，气得推了她一把，把她推了一个跟斗。她的脾气也不小，从此不再吃饭，进行绝食斗争。崇祯帝听说了又连忙派人给她送礼物，问起居，两个人才和好如初。总之一对结髪夫妻，吵吵闹闹免不了，内在的感情却是深厚的。

崇祯帝对于皇后唯一严格禁止的，就是干涉政务。明朝对宫眷干政禁令森严，崇祯时期对此执行得更加严格，田贵妃以下是绝对不敢在言辞中稍涉政事的，崇祯帝坚持内外有别，也从不在内宫里谈论政事。周皇后由于地位特殊，偶尔会不小心说到一点稍关外朝的事情，但每一次都会碰上一鼻子灰。有一次崇祯帝批看新进士名录，周后正身则，见到有自家的旧房客陈仁锡名在一甲，就指着说：“这是我家的探花郎啊！”崇祯

帝为此极为不快，冷冷回道：“你家的探花离着入阁拜相还远呢。”周皇后只好顾左右而言他。

崇祯帝同周皇后的感情不薄，但最为宠爱的却还是田贵妃。田妃祖籍是西安人，父亲田弘遇是个武职的把总（级别在武职中是最低的，相当于连长），却一直在扬州经商，家境相当富饶。她的生母早逝，田弘遇娶扬州一个歌舞伎为继室。继母就有意无意地按高级妓女的教育方法培养这位女儿。扬州在当时是能同南北二京鼎足而立的大都会，是全国的商业中心，盐商巨贾荟萃，最为繁华，消费畸形发达，又尤以高级妓女闻名天下。扬州的妓家从各地选择资质优秀的小女孩买回家里，从小进行全面培养，谓之为“养瘦马”，长成之后再向全国输送。这样就逐渐形成了一整套培养高级妓女的教育方法。扬州的高级妓女讲究色艺双绝，姿色还在其次，重要的是风度气质以及相当高的艺术修养和文化素质。田家未必想把女儿培养成一个妓女，但无意中选择的那套教育方式却把她培养成比大家闺秀和小家碧玉的淑女们更有魅力的一个美人。

明代王室选择后妃甚至宫女一向摒弃姿色超群的女孩子，为的是怕冶容诲淫，腐蚀了一帮龙子龙孙。因此田贵妃在容貌上大概也不过是中人之质，闺名叫作秀英，也相当俗气。但她的举止娴雅又多才多艺，平时静默寡言，似有一股抹不去的淡淡哀愁，一入技艺场中却又生龙活虎，琴棋书画无所不通，蹴鞠骑乘无所不能。她的字宗法钟、王，据说已臻能品之境，丹青泼墨也颇得名家笔意。最为出众的还是她在音乐方面的造诣，她吹得一管好笛，崇祯帝称赞她的笛曲有“裂石穿云”的效果；抚琴更是她的一项绝技，声遏行云，绕樑三日。崇祯帝偏巧最喜欢琴曲的古雅，还自己作过五首琴曲，空闲时听田妃演奏。有一次他对周后赞赏田妃的高超琴艺，言语间似乎还为皇后的不懂音律相当遗憾。周后很不高兴地说：“妾出身儒家，只会桑蚕纺织而已。可不知田妃是从什么地方学

来的。”多疑的崇祯帝才起了疑心，问田妃少年进宫，是从哪里学来的如此技艺？田妃告诉是跟着母亲学的，他又召其母进宫，让母女二人合奏，果然极佳，才算释然。此后田妃的母亲就常被召入宫中献艺，在后妃的亲属中，也只有她能够经常入宫见到女儿。

田贵妃因为高雅的艺术气质而特别得到崇祯帝的宠爱。她住在坤宁宫以东的承干宫，就是民间所称的东宫娘娘，在宫中地位仅次于周皇后。崇祯十四年（1641）春，她被晋封为皇贵妃，在名分上也正式成为皇后的副手。与她同时入侍信邸的袁妃则受封贵妃，比她低了一个级别。但她却不敢因此而恃宠恣肆，在宫中多年，从来小心谨慎。同皇帝下棋，她总能让皇帝小胜一子两子，凭这种驾驭局面的功夫，她的棋术至少要高出崇祯帝两三个段位，崇祯帝却以为自己略高一筹。对于多少有点盛气凌人的周皇后，她也尽量低声下气，以求和睦。唯有对家中那个商人出身的父亲，她却是鞭长莫及。田弘遇仗着女儿在宫中得宠，官封到左都督，在京城里极为骄横霸道。崇祯帝为此责备过田妃，田妃非常气愤，找来父亲说：“你们在外面犯事，已经风闻宫中了。如果皇上再来责问，我只有一死了之。”田家才稍许收敛了些。

周皇后虽然是恪守妇德的典范，对于这个颇有些狐媚惑主味道的田贵妃却还是有点愤愤然，两个人之间也少不了使脸色、生闲气的时候。那一年新春正旦，天气严寒，田妃依礼到坤宁宫朝拜皇后。周皇后却故意怠慢，让她在殿外庑檐下冻了许久才升座召她入宫，朝拜之后不发一言，就叫她退下了。而袁妃来拜贺的时候，周皇后却很热情地接待，笑语移时。田妃多次受到冷落，在崇祯帝面前难免流露出委屈。崇祯帝夹在爱妻宠妾之间，也只能劝了这个又安抚那个，尽量弥合。后来田妃採取以屈求伸的办法，自己写了书面检讨，自责对皇后不够尊重，请求移居启祥宫反省。崇祯帝见田妃有高姿态，正好让一家人和气，也就批准。但

崇祯帝3个月没有见到田妃，寝不安枕、食不甘味，脾气也比平常更坏。周皇后是聪明人，知道这样下去大家都不得安生，又主动出面做好人。一天同皇帝在永和门看花，她请求让田妃一同来，崇祯帝赌气没有答应，她已经让人把田妃迎来了。一家人这才又重归于好。

这些小小的冲突构成寂寞宫廷生活中的一些花絮，稍微打破一点沉闷。但总起来讲，崇祯帝的后宫中还是算是祥和静谧，不像许多朝代那样充满了阴谋和血腥气息。待到崇祯统治的中后期，国事维艰，皇帝终日操劳，愁云满面，很少有时间再同后妃们盘桓。后妃们也就知趣地不敢再生风波，惹闲气。她们并不清楚外面到底发生了什么情况，但从崇祯帝那日夜紧锁的眉头中能感受到形势的严峻。她们只能小心翼翼地服侍好皇帝，养育好子女，祈望着国家能够转危为安。

许多记述都说崇祯帝不近女色，其实并不尽然。但他特别念旧，在众多的妻妾中始终只注重同他共同患难的一后两妃，却是实情。宫中旧制，每天将晚时分，各宫都在门前挂起两盏红纱龙灯，皇帝临幸某宫，那里的宫灯就先行卸去，而后巡街的太监才通知各宫把龙灯摘了安寝。许多年里，最先摘下宫灯的大多是坤宁、承干、翊坤三宫的皇后、田妃和袁妃。有位住在承华宫的陈妃，进宫后数年只被“临幸”了一次，门前的两盏红灯总是迟迟不能取下来。身边一个太监见她终日愁眉不解，很奇怪地问她为什么不乐。回答说：“人生天也不见，哪能快乐？”太监说：“抬头不就能见到吗？”那位陈娘娘只好骂他是呆子。由于专注于一后两妃，崇祯帝的子女也主要是当初信邸的3位故人所生。

后妃们总共为崇祯帝生下了7男6女，但宫中的婴儿死亡率极高，到崇祯帝三十而立的时候，活在他身边的只有4个儿子和2个女儿，几乎都是周皇后和田贵妃生养的。周皇后最引为自豪的是她在崇祯二年（1629）就为皇帝生下了元子，在明代歷史上，正宫皇后产子还是第一次。崇祯帝

对这个长子的出生也极为兴奋，特别诏告天下：“以今年二月初四日第一子生，系皇后周氏出。中闱开冢胤之先，万国惬元良之祝。”为长子取名慈烺，并在第二年就册立为皇太子。崇祯十一年（1638），太子10岁，正式出阁读书，崇祯帝为他组织了一个阵容强大的教授班子，其中多是醇儒名士。这以后，他就常常带着太子参加各种国务活动，并且教太子阅读和批改奏章，一心一意要培养出一个德才兼备的英明之主。对于这位长子，他确实寄予了无限的希望。

周皇后的第二个儿子夭折，第三个儿子朱慈灿生于崇祯五年（1632），封为定王。田贵妃在崇祯六年（1633）为崇祯帝生了皇四子朱慈焕，封为永王；八年又生皇五子朱慈熉。此外，还有周皇后生的大女儿长平公主和袁妃所生的小女儿昭仁公主。这些儿女个个家教良好，聪明可爱，崇祯帝对他们也都十分关心爱惜。

相比之下，才只5岁的皇五子因为是幼子，又是爱妃田氏所生，崇祯帝对他又格外疼爱一些。但在这年春上，正当崇祯帝为了催追捐助而同贵戚们大动干戈的时候，皇五子却得了一场大病，好像是痢疾，十分危险。宫外的戚畹们听说了这个情况，决定通过这个孩子来震慑皇帝一下，就买通好宫中的太监宫女，在皇五子的身边装神弄鬼起来。他们让一个老太太打扮得妖模怪样，神秘兮兮地对这病中的小孩子说：“我是九莲菩萨，皇上待外戚薄情，再不悛改，就让他的儿子全都死掉！”反覆地说了好几遍。

皇五子是个聪明孩子，在极度的惊恐中还是记下了老太太所说的全部内容，在崇祯帝来探视的时候原原本本对他讲了一遍。崇祯帝听了大惊。原来所谓九莲菩萨，是宫中对坐在莲花宝座上的观世因菩萨的一种称喲，当年万历帝的生母李太后曾在殿中供奉着一幅大士像，据说很有些灵验。李太后死后宫中就传说这位太后是九莲菩萨转世，上上下下都知

道这种说法。李国瑞正是李太后的嬢家侄孙，老太后的亡灵为了嬢家的利益来向皇子讨公道，于情于理都让人不得不信。外戚们原来打算的也许就到此为止，但皇五子本来病得不轻，又受了惊吓，没几天就死了。参加那次阴谋活动的人就乘机大造谣言，把九莲菩萨的降临描述得绘声绘色。

丧失爱子让崇祯帝心痛，也让他心惊。田贵妃不久前刚生了一个皇七子，但在月子里就夭折了，正在为之伤心，现在一个本来活蹦乱跳的皇五子又突然死去，不由得大为伤痛，为此还大病一场。崇祯帝以为五子的死同自己在朝中的行事有关，追悔莫及。为了安慰活人也抚慰亡灵，他特地追封这个5岁的孩子为“孺孝悼灵王”，仍不能尽意，又追赠了一个“通玄显应真君”的奇怪称号，显然是为了纪念他在病中见到九莲菩萨那件事。礼部认为本朝从来没有追封皇子为“真君”这一类道号的，而且“玄感灵通，实为不可思议之事”，据理反对，最后“真君”的封号才算取消了。

另一方面，崇祯帝又不得不去忙着亡羊补牢，以免厄运再降临到其他几个爱子身上。他对李国瑞进行了抚恤，把武清侯的爵位也还给了李家，那40万两银子当然不敢再要。一个武清侯的缺口没攻下来，让贵戚乃至朝臣认捐的事从此搁置不提。崇祯帝甚至还认为首辅薛国观倡议剥削贵戚是导致爱子死亡的主要原因，从此在心中对薛国观暗暗记下一笔仇恨。这个仇后来终于被他报了。

捐助军饷的事情成为泡影，在绕了一个圈子之后，负担还是要落在百姓头上。辅臣兼兵部尚书杨嗣昌是只管兵饷不问其他的，为了加强训练边防军再次提出加派。这时候一个副总兵杨德政又提出，为了对付流动作战的农民军，地方武装也需要加强，各府、州、县应加练民兵数百到1000名，这又需要一大批饷银。崇祯帝觉得总之是非加派不可了，少加

是加，多加也是加，不如一下子加足。就大笔一挥，同意把全部训练边兵、民兵的费用一齐加到挣扎在死亡边缘的百姓身上，总数达730多万两，称作“练饷”。这样一来，崇祯时期的加派总额已经达到每年1690多万，已经超过了原来1530万的正额税收。民间流传的政治谚语中于是又多了一条：“崇祯崇祯，年年重徵。（徵收双倍赋税）”就是用年号的谐音点明瞭时代的特点。百姓们的裤带越勒越紧，崇祯帝脖子上一条无形的绞索也就越勒越紧。至于公文纸面上那应该练出来的上百万精锐边兵和民兵，却从来也没有见到过。明军在内外战场上，仍然是接连不断地惨败。

皇五子因为活见鬼而死，还在宗教观念上给崇祯帝一个巨大的震动。明朝宫廷是一个迷信的大本营，宫里除了祭天地、社稷，祭祖宗，祭圣人等等这些正统的宗教活动之外，还有大批佛寺、道观、喇嘛庙，以及源于民间的各式各样的邪神淫祀，信仰之混沌，礼拜之杂乱，令人叹为观止。这种混乱的信仰状态正是中国古代民间宗教状况的一个缩影，年长日久，已经成为宫廷生活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崇祯帝自幼生长在这样的环境中，耳濡目染，心灵深处也积累了一大堆奇奇怪怪的迷信和忌讳。但自从认真学习过儒家经典之后，他至少在理智上开始奉行孔夫子“敬鬼神而远之”的古训。对威严的昊天上帝他充满了敬畏之心，但除了祭天地、祭祖宗等正统宗教仪式之外，对于那些不入经典的迷信活动他是很少参加的。对于佛教、道教，以及民间流行的形形色色的各式妖魔鬼怪，他好像也颇不以为然。在崇祯初年，他还下令对宫中的偶像进行过一次清理，除了几座正式庙宇中的佛祖、道君和据说是在宫中两次大火灾中显过灵的钦安殿玄武大帝等神灵之外，一律恭送宫外，后宫为此清静了许多。

有一种说法认为，崇祯帝在宫中清理偶像，同他对西方天主教的崇奉有

关。自万历年间意大利教士利玛窦（MatthieuRicci）来华之后，天主教士们在中国的活动的确相当活跃。一批信仰坚定又博学多才的教士们先后来到中国，排除万难，在京师和各地建立了一些教堂，发展了一批信徒，也把西方天主教文化带进了中国。传教士们一方面在民间活动，到崇祯十二年左右已经发展了近4万信徒；另一方面也注意在上层活动，不但广泛地同士大夫交朋友，还把影响渗透到宫廷之中。

士大夫中最重要的一个人物是中国近代科学的先驱徐光启，他从万历二十八年（1600）结识利玛窦，三十一年（1603）受洗入教，以后一直为发展天主教的事业奔走呶吁，并且认真学习研究了西方教士们带进来的西方科学知识，在数学、天文学、农学、水利学等方面成为我国歷史上第一个中西学贯通的大科学家。他的宦途生涯也还比较顺利，万历三十二年（1604）中进士，入翰林院，崇祯元年（1628）起任礼部侍郎，充经筵讲官，崇祯五年（1632），71岁的他以礼部尚书入阁成为辅臣。

虽然徐光启任大学士只一年多就因病逝世，但对于崇祯帝和崇祯宫廷接触天主教却有很大影响。在他的竭力推荐下，传教士邓玉函（JoannesTerrenz瑞士人）、龙华民（NicolausLongobardi意大利人）等人先后进京在朝廷供职，主要是参与制造火器和修订历法。后来龙华民、汤若望（JohannAdamSchallVonBell德意志人）、罗雅谷（JacobusRho 意大利人）3个人都可以出入宫禁，就趁机在宫中发展教徒。崇祯三年（1630），御马监掌印太监庞天寿首先受洗入教，而后扎根串联，太监、宫女，甚至嫔妃、皇室，都有人接受洗礼，到崇祯后期宫中的天主教徒已经有540多人，还安排了一座圣堂，由汤若望多次主持弥撒。

崇祯帝对天主教采取优容的态度，却不见得有过对天主教的信仰和入教

的冲动。他或许对闻所未闻的基督教义有过好奇，对庄严肃穆的弥撒仪式有过几分欣赏，但那些充满异国情调的远方舶来文化对于一个天朝皇帝来说，毕竟是太奇特了一点。他真正关注的，主要还是这些黄髮拳拳的教士们带来的西方科学技术知识。最吸引他的首先是西式火器，特别是所谓“红夷大炮”（就是红毛夷人——欧洲人的大炮，后来被讹称为“红衣大炮”），因为威力极大，可以在战场上急用，所以一直由汤若望等人加紧督造。这种在当时很现代化的重武器真造出来了不少，但并没有扭转战场上的败局，反而被清军和农民军缴获过去，成了他们攻城的利器。另外一个科技重点攻关项目则是对历法的修订。

天朝以农为本，又敬畏天命，要不违农时，洞察天象，都必须有一部精确的歷法。但明朝的官方天文历法机构钦天监却不是一个高水平的科学机关。明代制歷，以元朝郭守敬的“授时歷”（明朝称“大统歷”）为本，参照阿拉伯“回回历”。但两种历法都已年代久远，积累误差使得测算同实际相差甚远，钦天监的天文官员们却没有人去钻研修订，一直将错就错。崇祯二年（1629）五月朔日，日食，钦天监用“大统”、“回回”两歷测算的时间方位各不相同，徐光启用所谓西法也进行了预测，最后实地考察结果，徐光启的测算准确无误，钦天监的预测错误百出。崇祯帝感到了问题的严重性，决定彻底修订历法，命徐光启主持。徐光启提出以西法修歷，“令与中歷会通归一”。崇祯帝同意了徐光启的提议，此后，西式历法的编译修订工作一直在进行，崇祯六年（1633）徐光启病逝，其未竟之业由山东参议李天经继承，至崇祯八年（1635），共完成《崇祯历书》137卷，全部告竣，其中包括托勒密《大至论》、哥白尼《天体运行论》等重要西方天文学着作的内容提要。

但这部新历法并没有来得及应用到编制历书的实践中去。由于国势危急，政务纷乱如麻，直到崇祯十六年（1643）七月，崇祯帝才下诏自明

年起改用新法制歷，但第二年明朝即告灭亡。反而是清初的统治者继承了这一项遗产，自康熙八年（1669）起正式依西法制歷，直至末年。这部以西方几何体系为基础的歷法大典《崇祯历书》（中国传统历法为代数体系），大概是崇祯帝在17年统治中为歷史留下来的最重要的一份积极遗产了。

崇祯帝能宽容西方异教，接受西方新的科学技术体系，表明他在意识深处并不是一个抱残守缺、顽固不化的人，也体现了他在统治前期有一种天命在我的自信。但随着国家大势的日益恶劣，他的这种自信却一天天被消蚀掉了。皇五子的死对他精神上的冲击远远超过了一般的失子之痛。他从这个事件中感觉到，一向以为是坚定站在自己一边的天命，似乎正在远远离去。这以后，他变得越来越疑神疑鬼，而且病笃乱投医，对于上至昊天上帝，下至狐仙鬼魅的一切超自然威力都表现出浓厚的兴趣，恨不得一下子在冥冥中抓到几位法力无边的神怪，作为救命的稻草。

此后，他对于祭天地日月、祖宗圣人等等正统的典礼更加虔诚、更加殷勤，把一些多年停止实行的祭祀大典，例如上辛祈谷仪式等也悉数恢復。与此同时，对于扶乩请神、打醮祈禳一类活动也迷恋不疲。自崇祯十二年（1639）起，宫里宫外越来越乌烟瘴气，崇祯帝亲自参加了各种各样的请神闹剧，甚至想把天兵天将搬下凡间，替帝国剿平内外的战乱。但这类闹剧不但不可能产生什么实际效果，就连心理上的安慰也做不到。这年年末，崇祯帝再一次恳请天神降临，举行了一次隆重的降神仪式，又是磕头，又是祈祷，尽表哀衷。闹了许久，扶乩的沙盘上才出现了“上帝”的批示：“天将皆已降生人间，无可应召者。”崇祯帝叩首再拜，问道：“天将降生，意欲何为？尚有未降生者否？”沙盘说：“只剩汉寿亭侯受明朝深恩，不肯下降，此外没有留在天上者。”此后再怎么问也

不再回答，一片寂然。所谓汉寿亭侯就是法力无边的武圣关羽，他因为对明朝感情颇深而不肯下凡，那些感情不深的来到人间要做什么，也就不言而喻。

在这次降神中到底是什么人，为了什么心理捣的鬼，不得而知。但它给崇祯帝心头蒙上的阴影却是无法抹去的。他不肯全信，又不敢不信，请神请来的是更大的迷乱和失望。到崇祯十四年（1641），他甚至把全国最着名的大法师，江西龙虎山的张天师也搬请到京城，让他设醮为国家消灾祈福。这位天师道教首领在京师受到极隆重的礼遇，皇帝特命在灵济宫设宴招待，派太监作为自己的代表主持。但这位张天师建坛打醮热闹了好一阵子，祈雨无效，祈雪无效，禳病无效，对中原和辽东的战事更无效，崇祯帝才大失所望，把他打发回江西去了。

请神召鬼屡次不能见效，崇祯帝还怀疑到龙脉风水方面的原因。崇祯十四年（1641）四月，他特召阁臣、勋戚和礼部主官在建极殿讨论孝陵（太祖朱元璋的陵墓）风水问题，说孝陵关系重大，但听说近年来在陵区开窑伐树的事情很多，破坏了风水，影响到国运。礼部侍郎蒋德暻启奏：“中国有三大干龙，中干旺气在中都凤阳，结为凤阳祖陵；南干旺气在南京，结为钟山孝陵；北干旺气在北京，结为天寿山长陵。这三大干，本朝独会其全，是万世灵长之福。”崇祯帝听说本朝的风水这样好，才放下心来，但仍然派遣成国公朱纯臣、新乐侯刘文炳和礼部尚书林欲楫到南京和凤阳勘察，严禁开石灰窑破坏龙脉。既然风水无碍，那么国运日衰的原因仍然在于天命。但他离知天命的年龄还差得很远，只能继续沉浸在无边的迷惘中。

崇祯帝的而立之年倏忽之间就在昏昏乱乱中度过了，到年终岁末的时候，才正是他30整寿的纪念日（实际上是29週岁）。因为腊月二十四日这天正巧是他的嫡母光宗郭皇后的祭日，礼部根据惯例确定每年腊月二

十五日为万岁节，天下共庆，崇祯帝虽然批准，却从来没有真正举行过庆贺典礼。一方面因为国事繁重，他没有这个心思；另一方面也因为年纪尚轻，过生日做寿算不上大吉大庆的喜事。但而立之年这个有纪念意义的整寿却不能不重视一下了，于是他同意礼部的提请，在年关将近的二十五日接受了宫廷内外的朝贺。

朝贺这天正好是三九严寒时候，丹墀上结了厚厚的冰霜，贺寿的百官鬚眉上也都凝上一层冰碴儿。因为冷，群臣舞蹈叩拜得倒是更加起劲，山呼万岁的祝福也喊得很响亮，但个个面皮僵滞，让宝座上的崇祯帝看着并不舒服。首辅薛国观和成国公朱纯臣分别代表文武群臣进前致贺词：“钦遇皇帝陛下圣诞之辰，谨率文武官僚敬祝万岁寿！”声音宏亮的赞礼官发出口令：“山呼！”于是群臣又一次拉着长声高唱：“万——岁——，万——岁——，万——万——岁——”这种场面经得多了，这种声音听得多了，崇祯帝心中早已没有了最初年代那种自我崇高的愉悦感。从这一天起，他就算进入了壮年，但前途却显得更加莫测。他甚至能预感到，今后的日子会更加艰难，身下的这个宝座也并不那么稳固。

而立之年恰好是崇祯帝统治的一个转折点，此后的日子每况愈下，没用几年工夫，他的生命和他的统治就一起完结了。

二 枢辅督师

崇祯十二年（1639）四月，清兵入塞的军警刚刚解除，崇祯帝和他的军事大员们又不得不把注意力放到农民起义这个心腹之患上面了。这时候，大别山区的“革左五营”仍然不受招抚，中原各地的小股农民军还在四处活动，而且已经受抚的张献忠和罗汝才两大农民军主力也有蠢蠢欲动之势。主管谷城和房县等处的地方官员不断地上报两军心怀叵测的情状，说“张献忠入据谷城，屡次不听调遣，将要待民间田熟，分其夏秋之粮，稍不遂意，就会再起刀兵”；“罗汝才诡称以所部屯田，并未让部队种地，这样带刀而耕，稍有不满，就将重新起事，铤而走险”。

为此，杨嗣昌祕密建议趁张、罗两部尚未动手，迅速调集兵力，以先发制人的手段扼杀这两支农民军。崇祯帝本来是一意招抚的，对进行这样大的军事行动并没有什么主见，但他也感到大患不除总不能心安，因此最后也同意了杨嗣昌的计划。从四月下旬起，明廷开始调兵遣将，命入卫京师的甘肃总兵柴时华部和宁远总兵祖大弼部南下湖广，陕西总督郑崇俭率陕军出潼关趋襄阳、郧阳，四川巡抚傅宗龙领川军入郧阳，再加上熊文灿直属的大军，对谷城、房县一带四面围剿。

可惜杨嗣昌的如意算盘还只停留在纸面上，没来得及实施，张献忠和罗汝才就再次举旗造反了。五月初九日，张献忠在谷城起义，引军向西。二十三日，罗汝才等部在房县响应张献忠，与张献忠合兵攻打房县。消息传来，朝廷大惊，崇祯帝照例不顾当初正是他自己一意招抚的事实，严旨痛责熊文灿抚剿无策，命他戴罪立功。熊文灿好像也预感到将要大祸临头，连忙派总兵官左良玉率军进剿，希望能侥倖一胜已塞罪责。

左良玉部是总理麾下最有战斗力的一支部队，但深入房县深山密林之

中，地形生疏，辎重粮草又无法跟进，士气相当低落。七月末，张献忠、罗汝才在房县西部的罗猴山设下埋伏，先故意佯败两阵，把左良玉诱至埋伏圈里，然后突然发起攻击。左良玉军大乱，副总兵罗岱被杀，被歼灭的明军达一万多人。左良玉拼命突围，身边还剩下残卒不到一千人，总兵官的关防印信也在慌乱中丢失。

官军在罗猴山的惨败使得崇祯帝彻底对熊文灿失望了。他先是罢去熊文灿的总理职务，不久又将其逮至京师问罪，最终判处死刑，斩首于西市。但除掉熊文灿之后，由谁来接任围剿前线的总指挥，却是一个棘手的问题。在闻名于世的几名最优秀的统帅中，卢象升已死，洪承畴刚刚被任命为蓟辽总督，担负着防御清兵的重任，无法抽调。另一个不久前才崭露头角的原任陕西巡抚孙传庭，在西北的战绩虽然不错，但为人颇为狷狂高傲，入卫京师被任命为负责南线的总督，就立即指摘杨嗣昌调配指挥失当，同兵部弄得关系十分紧张。后来，据说是因为上火耳朵聋了，大概主要还是为了对杨嗣昌不服气，他数次上疏请求去职养病。杨嗣昌趁机攻击他假託疾病，不愿担任保定总督这一危险的职务。崇祯帝最恨朝臣不肯效力，一怒之下把孙传庭抓进了监狱。国无良将，又用人孔急，崇祯帝左右掂量，最后决定还是任用人才难得的杨嗣昌最为可靠。

杨嗣昌在张、罗復叛，左良玉失败之后，接连上疏请罪，并主动停止了在内阁和兵部的公务。兵部尚书一职，已由他荐举的前四川巡抚傅宗龙接替。八月二十二日，崇祯帝还在他的请罪疏上批旨，要他回内阁任职。但3天以后，二十五日，崇祯帝突然下了决心，在他的另一份请罪疏上批道：“辅臣屡疏请罪，更见诚恳。如今叛寇猖獗，总理革任，以辅臣才识过人，办此事应付裕如，可星驰往代，速荡妖氛，救民于水火。凯旋之日，优叙隆酬。”不容他有任何商量和推託的余地。

崇祯帝既不经过阁、部会议，又不同本人商量，就由中旨任命内阁辅臣去前线督师，朝臣们和杨嗣昌本人都感到有些意外。但杨嗣昌几年来受皇帝的知遇之恩，一直充满了感激涕零之情，目前皇帝需要他出朝督军，以挽救国家的危难，他也只能竭尽全力，为皇帝效犬马之劳。辅臣到前线督师是前所未有的大事，有关衙门连忙办理敕书、印信、仪礼、军需等各方面事宜，并议定，杨嗣昌以礼部兼兵部尚书、东阁大学士出任督师，一般人就称作“督师部阁”或是“督师枢辅”（枢指枢臣，即兵部尚书）。

在即将启行前，崇祯帝于九月初四日再次召见杨嗣昌，对他特别指示：“张献忠曾惊祖陵，决不可赦，其余剿抚互用。”其实挖了凤阳祖陵的不见得是张献忠部，而且崇祯帝自己也同意过对其招抚，这样说不过是确定一个原则，重点打击张献忠，对农民军其他各部可以区别对待。他还亲笔写了一首诗赐给杨嗣昌，作为临别的勉励：

盐梅今暂作干城，上将威严细柳营。

一扫寇氛从此靖，还期教养遂民生。

诗中用了好几个典故。盐和梅是古代两种主要的调味品，商代高宗任命傅说为相，说他好像烹饪中的盐和梅一般重要，后人就以盐梅指代宰相。干是盾，盾牌和城池是古代的主要防御设施，用来比作捍卫国家的将领。细柳营则是汉代名将周亚夫的营盘，他在平定吴楚七国之乱中起过重要作用。在崇祯帝的一生中，很少给其他朝臣赐过诗，这一次不但御笔亲题，而且把杨嗣昌比作贤相、良将，寄予的重望溢于言表。杨嗣昌不但感恩戴德，而且深为能得到皇帝如此的宠信自豪。他出京之后就以御笔赐诗为标榜，竖起了“盐梅上将”的大旗，所部亲标也直称“上将营”，真是八面威风。

杨嗣昌于九月初六日离京，在京的大小官员出城隆重送行。杨嗣昌也丝毫不敢怠慢，一路疾行，仅用20多天就赶到了围剿的大本营襄阳。下车伊始，他就立即召集所部文武官员会议军事，一面着手整顿军纪，一面加强襄阳的城防。根据崇祯帝的指示，他把围剿重点放在对付张献忠上，但认为以往分兵各进，很难给敌人以重创，因此决定在军中设置大将，集中军权。他在初到襄阳的时候就上疏建议任命左良玉为“平贼将军”，“总统诸部，听其指挥，共臣谋画，转行调度”。甚至把左良玉比作唐代平定藩镇的名将李愬，说自己虽不敢以那时的良相裴度自居，左良玉却与李愬相差不远。

杨嗣昌重用左良玉也是用心良苦。左良玉字崑山，山东临清人，行伍出身，做过都司。崇祯初年关外大凌河被清军围困，在昌平督军的兵部侍郎侯恂提拔他为副将带兵驰援，大战有功，成为着名的勇将。后来他率领昌平兵一部转战于河南、湖广等地，专门对农民军作战，胜败参半，但始终保持着一支颇具实力的队伍。崇祯六年（1633）他被提升为援剿总兵官，时年仅32岁。部众也由原先的2000人增加到万余人。当时在中原和西北同农民军作战的各镇总兵官先后有几十个，但大多碌碌无为，或是战场失利被杀，或是被朝廷撤职惩办，唯有左良玉一枝独秀，始终保持着实力和体面。他骁勇体健，虽然不识字，却很有心机，也很能团结手下的将士。朝廷的兵饷总是不足，他就随处纵兵大掠，各地的百姓甚至乡绅对于左军都又恨又怕。当时民间口号说，“贼过如梳，兵过如篦。”左良玉军所过之处，真是像用篦子梳头一样，把地方抢劫得干干净净。他也很懂得保存实力，遇到太强硬的敌人就远远避开，拒不执行上司的命令，督、抚和朝廷却拿他没有办法。经过十来年的剿寇，他集中了一批强兵悍将，经常自行其是，实际上已经开始逐渐地军阀化了。但在国难当头的形势下，朝廷急需用兵，根本不敢得罪这个有名望、有实力，又有些蛮不讲理的大将军。罗猴山惨败，责任并不大的河南总兵张

任学被撤职，而左良玉丢了关防，却只被降三级，仍然留任总兵之职——崇祯帝对此人也不能不有几分忌惮。

左良玉桀骜不驯，为人却很讲义气。侯恂是第一个把他由偏裨提拔为大将的人，他对侯恂就始终极为尊重。前两年，侯恂在户部尚书任上因为一宗钱粮失察案被罢官逮捕入狱，左良玉却仍然同侯家保持密切的关系，行军至侯恂的家乡河南商丘的时候，也破例不抢掠骚扰。杨嗣昌就是根据左良玉的这些特点，决定委任他为平贼将军。前次罗猴山之战，左良玉丢了关防，正无法对朝廷交代，杨嗣昌不行追究，却为他讨得一颗在内府中封存多年的将军印来。杨嗣昌以为，左良玉一定会为此感戴不尽，终生为自己卖命。只要左良玉俯首听命，其他各营的将领更容易驯服。

杨嗣昌提拔一个武将做总统诸部的统帅，也是针对当时军制的弊端而做的安排。明代重文轻武，指挥作战的大帅全部任用文臣。一个不带侍郎衔的巡抚通常本官是佥都御史，只有四品，但麾下往往是武职一品衔的总兵官们被吆来喝去，如同厮役走卒。文官大帅位尊权重，手下却没有自己的部队。带兵的将领们受制于督抚，虽是制度决定的，心中不见得都服气。因而临阵作战时督抚大帅们经常指挥不灵。朝廷也并不真的重视这些没有真正实力的光桿司令，轻易进退任免，被罢官杀头的多是这一类总督、巡抚。将帅分离，权实不符，实在是造成明末各个战场调度失机，指挥不力的一个重要原因。杨嗣昌要以武将统兵，就是想打破这种局面。

另一方面，明朝的军事建制基于一种消极分散防御的战略，全国的军队分散在上百个司令部里，统称为“标”。每一位将帅，上至总督（包括总理、督师）、巡抚，下至总兵、独立带队的副将甚至参将，都有一个自己的标，多则一两万人，少则千数人，将帅们真正指挥得动的就是标下

这支队伍。这种分散建制使得那些号称统军十几万的大帅在组织大型战役的时候，因为缺乏一个严密的分层指挥体系而八方掣肘，调度困难，更谈不上在战场上灵活机动地调动部队。杨嗣昌似乎很想对这种建制方面的弊病进行一些改善，但因为涉及整个军制问题，也只能暂时用在各标以上再设一位大将的方式来增强全军的凝聚力。

杨嗣昌在军中设置统兵大将，实际上已经包含着对于明末陈腐军事制度进行改革的某种尝试。但百年积弊，要改谈何容易，何况杨嗣昌自己囿于时代的局限，对于应该有一种什么样的合理制度也并不清楚，因而他的这一努力后来并没有产生什么实际效用。将帅分离仍然严重，指挥照样失灵，最后导致全面失败。

崇祯帝对于杨嗣昌的各种请求差不多是言听计从，立即批准任命左良玉为平贼将军，把内府的大印派专员驰送前线。左良玉也确实颇为感奋，秣马厉兵，准备对张献忠大战一场，以雪前仇。杨嗣昌则并不急于发兵，而是积极整顿部队，调配力量，囤粮输饷，巩固后方，准备蓄力而发，一举取胜。这年年末，他在楚、豫、川、陕各省四处张榜，上面刻印着张献忠的头像，榜文是一首《西江月》：

此是谷城叛贼，而今狗命垂亡。兴安、平利走四方，四下天兵赶上。

逃去改名换姓，单身黑夜逃藏。军民人等绑来降，玉带锦衣升赏。

下书赏格："能擒张献忠者赏万金，爵通侯。"

这当然是一种政治攻势，但据说榜文张出后不久，就有人在杨嗣昌行辕的大门上贴了"有斩阁部来降者赏银三钱"的传单，弄得杨嗣昌疑神疑鬼，以为身边尽是农民军的奸细。

杨嗣昌在做好了充分的准备工作之后，于崇祯十三年（1640）闰正月正

式对张献忠部发起围剿。这时张献忠所部为了避免同明军正面冲突，已经转移到川、陕交界一带的山区。杨嗣昌命陕西总督郑崇俭率陕军由汉中的西乡入川，从农民军背后追剿；命左良玉率湖广方面的主力驻扎在兴安（今安康）、平利一线，等着张献忠回窜入陕后迎头痛击。左良玉却不同意杨嗣昌的部署，认为张献忠如果不北上陕西而是西进成都平原，局面将无法控制。他向杨嗣昌申报了自己的意见之后，不待命令，就自行入川，同陕军协同进剿去了。

二月初七日，明军在四川太平（今万源）县玛瑙山同张献忠部遭遇。农民军据守山头，明军分三路进攻。这一次明军养精蓄锐多时，以逸攻劳，大获全胜，击杀农民军3000多人，张献忠的军师潘独鳌和妻妾数人被俘，张献忠亲自用的“天赐飞刀”大刀也被缴获。一些跟随张献忠的小股农民军投降。紧接着这次胜利，明军又在寒溪寺、木瓜溪等地连打了几个胜仗。张献忠屡受重创，处境十分危急，只得进入深山，迂迴避敌。

玛瑙山之捷是几年来明军对付农民军的战争中少有的胜利，能取得这样的胜利未尝不是因为杨嗣昌集中兵力蓄锐而发的战略部署正确。但这次胜利却成了明军内部失和、自我摩擦碰撞的新起点。玛瑙山战役之后，左良玉极为得意，以为此次大功是因为不听杨嗣昌的调度自行其是才取得的，从此不把督师放在眼里。杨嗣昌想趁着张献忠处境困难，乘胜穷追，彻底歼灭张献忠部，多次命左良玉进山搜剿。左良玉这时却带兵回到湖广的竹溪休整起来。杨嗣昌多次传檄严令，左良玉一概不听。有一种说法认为，张献忠曾派人到左良玉营中劝说：“献忠在，故公见重于朝廷。公听任所部烧杀劫掠，阁部（杨嗣昌）猜忌专横，无献忠则公之灭亡亦不久矣！”左良玉为了自重而给张献忠留一条生路的可能性也是存在的。

杨嗣昌并不是很有气量的人，对左良玉的傲慢不驯非常愤怒，一度奏报朝廷要解除他的平贼将军职务，改由陕西总兵贺人龙担任。崇祯帝仍然完全听从杨嗣昌的安排，很快下了命令。但左良玉的实力和威望毕竟不是贺人龙所能比的，杨嗣昌犹豫了一番，又请朝廷收回了成命，仍用左良玉。这样一来，左良玉的怨气更大，而贺人龙因为平贼将军得而復失，也对督师十分不满。此后，杨嗣昌不但调不动左良玉，连陕军也不服从命令了。张献忠就趁着明军统帅部里一团混乱，无人围追堵截，悄悄率军返回到湖广的兴山、房县一带，不久又同罗汝才部会合了。

尽管明军营垒已经在四分五裂，远在京城的崇祯帝对于杨嗣昌最初的成功还是很满意的。在他的一生中，真正能做到用人不疑，大概只有这一次。杨嗣昌的所有作战方案，他都原样批准；杨嗣昌请兵请饷，他责成兵部、户部尽力快速筹办；杨嗣昌要任用或罢免文武大员，他也一概照办，甚至杨嗣昌在任用大将时出尔反尔，形同游戏，也没有惹得他像往常那样大发脾气。

朝臣们在杨嗣昌督师亲赴前线之后，出于一种对大臣身临战阵的尊重，也停止了对他的各种攻击。只有兵部因为要同这位在外的枢辅不断地打交道，不免发生一些龃龉。杨嗣昌不断有兵饷方面的要求，兵部很难全部满足，而且有些事情是有制度成例的，兵部也不愿随意改动，破坏了规矩。崇祯十二年（1639）底，杨嗣昌疏劾兵部不任职守，妨害围剿大计。兵部尚书傅宗龙虽然是杨嗣昌推荐上来的，却对他的以势压人很不服气，就回了一本，说杨嗣昌“徒耗国家军资，不能立功报效，并以势欺凌朝廷大臣”。崇祯帝对傅宗龙在关键时刻不能同督师同舟共济非常恼火，正巧兵部又在辽东用人的问题上有一个失误，就以玩忽职守、戏视封疆的罪名把他逮进监狱。刑部拟罪遣戍，崇祯帝不肯，大有置之死地之势。傅宗龙在狱里待了近两年，后来才再次被起用为陕西总督。

罢免傅宗龙后，崇祯帝任用杨嗣昌一直极力推荐的陈新甲为兵部尚书。陈新甲是举人出身，在明代歷史上以举人而任尚书的只有寥寥数人，因而正牌进士们很不服气。但陈新甲确实是个干才，思路又同杨嗣昌相近，因而在本兵任上对杨嗣昌给予了很大的支持。

有皇帝全心全意的信任，有兵部尽心竭力的配合，又有阁部督师的巨大权威，杨嗣昌本该乘胜而进，不断扩大战果了。但由于指挥运转不灵，战场上的形势却是每况愈下。

崇祯十三年（1640）秋天，张献忠和罗汝才从川楚边界再次流入四川，杨嗣昌命四川巡抚邵捷春率川军在夔州（今奉节）至大宁（今巫溪）一线进行阻截。邵捷春是一个不错的行政长官，在四川主政颇有官声；同时却是一个很糟糕的军事统帅，把四川的军务搞得乱七八糟。川军各级将领吃空额侵吞军饷，各部缺员严重，而且军械敝破，士卒飢疲，又乏于训练，战斗力极差。邵捷春手下较能作战的只有女将秦良玉手下的石砫土司兵和副总兵张令所部，其中尤以秦良玉的部队最为着名。

秦良玉是石砫宣抚司（在今石柱）的女土司，从万历中年开始带兵为明王朝效力，参加过平播、援辽、平奢崇明等歷次大战事，所部号称“白桿兵”，军纪严明，悍勇敢战。因为秦良玉是歷史上少有的女将，特别引人注目，所以提起她和她的白桿兵，天下几乎无人不知无人不晓。就连崇祯帝本人也抑制不住对这位被民间传颂成穆桂英、花木兰式人物的好奇心，在执政初期特地召见了秦良玉一次，还事先写了诗赐给她。诗中一联是“试看他年麟阁上，丹青先画美人图”。他以为既然是花木兰、穆桂英，自是英姿飒爽，才用了汉代在麒麟阁绘像纪念功臣的典故。谁知见面一看，竟是个年过六旬的小老太太，大失所望。此时，秦良玉的锐气更大不如从前，而以勇武闻名的老将张令已经70岁出头。邵捷春靠着一个老头子和一个老太太扼守要冲，实在有些勉为其难。

九月，张献忠和罗汝才的农民军突击大宁境内的要冲竹菌坪，秦良玉和张令率部阻截。张令中箭阵亡，所部溃败；秦良玉的白桿兵负隅死战，几乎全军覆没。老太太带着少数残卒逃回老家，从此固守乡土，不再出兵作战。秦、张两部失利后，其余川军更加不堪一击。张献忠和罗汝才经达州、巴州（今巴中）一路向西，于十一月中旬渡过嘉陵江，攻克了川北重镇剑州（今剑阁）和梓潼，转而向南直逼成都。

张献忠、罗汝才流动入川，造成明朝上下一片混乱。杨嗣昌不得不离开襄阳大本营，于八月起亲自入川追剿。但他的行营和本标辎重沉冗、人员庞杂，在四川泥泞的山道上进展迟缓，根本追不上迅疾如雷电的农民军，在各处负责堵截的川军又无力抵挡。农民军在四川长驱直入，如过无人之境，编了个歌谣说："前有邵巡抚（邵捷春），常来团转舞；后有廖参军（四川监军道廖大亨），不战随我行；好个杨阁部，离我三天路。"杨嗣昌一面抱怨川军无能，"蜀兵之脆，将领之愚，至不堪言"，一面急调湖广、陕西各路部队入川。但左良玉抱定了不损失自己实力的主意，对接连8次命令拒不执行，后来干脆带上部队进入陕西兴安（今安康），远远地避开农民军。陕西的贺人龙等部也拖拖拉拉，不想入川作战。最后被逼无奈终于入川，打了几次败仗，就再也不敢同农民军正面接触。而朝廷中四川籍的官员和四川的地方官却为了张献忠的这次入川大肆诋譭杨嗣昌，说他为了保护自己的家乡（杨为武陵人，明代属湖广省）故意驱敌入蜀，以邻为壑。

杨嗣昌连日在山间奔波，得到的却只有前线不断失利的坏消息和四川官绅的恶言恶语，真是气急败坏。他把失败归罪于川、陕等处的官军，攻劾他们堵剿不力。崇祯帝为此把邵捷春逮捕治罪，最后斩首于西市。陕西总督郑崇俭被革职，后来也被问成死罪。但就在明朝方面一团混乱的时候，张献忠和罗汝才却连克什邡、隆昌等川中、川南州县，于十二月

初攻陷了川南的重要城市泸州。接着又返师向北，破仁寿，逼成都，陷德阳，绕道川北东渡嘉陵江，在崇祯十四年（1641）初拿下巴州、通江，最后沿着长江北岸胜利出川，重新回到湖北。

张献忠、罗汝才部在四川千里大游行，攻克十几座州县，队伍日益壮大。杨嗣昌惮精竭虑调兵遣将，围追堵截，最后损兵折将，一无结果。造成这种局面，除了诸多客观因素，所谓大势所趋之外，也有杨嗣昌个人主观方面的原因。郧阳抚治王鳌永曾经上疏论杨嗣昌说："嗣昌用兵经年，不能荡平贼寇，并非谋虑之不长，正因其操心之太苦。天下事，总挈其大纲则易，事事用心则难。何况贼情瞬息万变，今数千里征伐机宜，一切尽出嗣昌一人之手，文牒往返，动辄旬月，号令与事机违背，无怪乎战败之报屡闻。……臣以为嗣昌之统驭诸将，不必人人授以机宜，只需核其机宜是否确当，执其要领，去其繁琐，决策奇谋以制胜。何至于迁延岁月，劳师糜饷？"

王鳌永对杨嗣昌的评论还是公允而有见地的。在自以为是、事必躬亲这方面，杨嗣昌确实同崇祯帝有许多相似之处。他在明末诸臣中的确特别聪明干练，但这种聪明干练也正是造成千里转战，调度失灵，将帅不和，军心涣散的重要原因。崇祯帝总是喜欢那些在某些方面同自己有内在一致性的臣子，对于这个杨嗣昌又难得信任到了实处，当然听不进王鳌永一类的话，因而降旨对他进行申饬，仍然鼓励杨嗣昌继续我行我素。杨嗣昌也听不进别人的意见，仍然事无鉅细一管到底。到崇祯十四年（1641）春天，战局终于到了无可收拾的地步。

当杨嗣昌正跟在张献忠、罗汝才的后面在四川进行千里游行的时候，另一支农民军在沉寂了两年多之后，又突然出现在河南地区。那就是李自成的部队。



李自成

李自成部自崇祯十一年（1638）初潜伏于川、陕、鄂边界山区，一直没有动静，明朝官方一般都认为这股农民已经彻底被歼灭，朝野中也流传着李自成已死的消息。但到了崇祯十三年（1640）冬季，李自成所部却奇蹟般地再现，在河南西南部的淅川、内乡骠驰而过。最初到河南，李自成的队伍不过千余人，但河南各处的饥民和一些小股的起义者风闻景从，使得李自成部在几个月里就发展到数万人。这年十二月，李自成攻破了鲁山、郏县、伊阳（今汝阳）、宜阳、永宁（今洛宁）等县，把整个豫西地区搅得天翻地覆。

张献忠和李自成的农民军由一度濒临被剿杀的边缘突然之间迅勐壮大起来，是同当时的社会局势密切相关的。从崇祯初年就没有停止过的自然灾害持续了十几年，在崇祯十二三年间势头更加勐烈，旱灾、水灾、蝗灾，铺天盖地。崇祯帝在崇祯十三年（1640）五月的一道上谕中也不能不承认："近来直省各处告飢，而畿辅（今河北）、山东、河南、山西、陕西等地，近闻茹土食菜，人民并无菜色，甚至剜肉炊骨。"就连一向号称富庶，比较风调雨顺的江南地区也发生了少见的大旱灾，许多地方因

为无水而不能插秧，米价腾涨。当地的官员却藉着救济灾荒巧立名目，肆意勒索，有些人反而发了大财。一位知县很得意地对人说："幸好有这次大灾呀！"而饥馑的情况又以河南最为严重，原任南京兵部尚书吕维祺记载当时情况说："今流亡满道，尸骨盈野。阴风起处鬼火荧荧，深山林莽饥民啸聚。有全家投环自尽者，有全村封门逃亡者，有一日投河溺死数百者，有食雁屎、蚕屎者，有食荆子、蒺藜者，有食土石者，有如鬼形而呻吟者，有僵仆于道而不能言语者，有集数千数百人于城隅大道揭竿而起者。"

大饥荒本来已经令人触目惊心，明廷一加再加的"三饷"加派更加重了灾情的惨痛。崇祯十二年（1639）新增加的"练饷"一次就达730万两，崇祯年间三次大加派，这一次所加最多。而连年在死亡线上挣扎的饥民们在这样敲骨吸髓的苛剥面前，实在更没有一丝活路了，除饿死甚至被吃掉的之外，只好逃亡。河南的一个知县统计本县崇祯十四年（1641）的户口情况：原编户10035户，死绝者8028户；原编人丁20325丁，逃亡死亡者18450丁。户数仅存原额的20%，丁数仅存9%。但到处都是饿殍遍地，逃亡出去还是没有活路，强悍者于是啸聚山林，做了"强盗"。这些遍佈于中原的饥民、流民和"盗贼"就成了大股农民义军可靠的兵源。

崇祯帝和杨嗣昌们为平定流寇而增兵加饷，而增兵加饷的结果反而为农民军提供了源源不绝的有生力量，农民军愈盛而加饷愈多，加饷更多而农民军更盛。崇祯君臣们在这个无法摆脱的怪圈里旋转了十几年，终于国破身亡，临了还要说什么"君非亡国之君"。在政治大局方面的愚蠢和短视，明王朝的统治者们大同小异，并没有什么根本性的区别。

崇祯十四年（1641）春，杨嗣昌还在从四川急忙赶回湖广的路上，以张献忠和李自成为首的农民军却已经由守势转为攻势，分别在湖广和河南给了杨嗣昌致命的打击。

这年正月十九日，李自成部数万人开始围攻豫东重镇洛阳。洛阳不但是歷代古都，聚集着中原精华，而且是控制关中和襄、郧两个方向战守的军事要冲，在政治上、军事上和经济上都有着极其重要的地位。此外，洛阳又是明宗室福王朱常洵的驻地。这个朱常洵就是万历帝和郑贵妃生的儿子，万历帝曾经为了想要改立他为太子同朝臣们闹得不可开交，后来改嗣的计划虽然失败，万历帝却给了这个分封在洛阳的宝贝儿子一笔巨大的财产，其中仅土地一项就达2万顷，此外还有大量的盐税、商税的常年收入。这个福王号称富甲天下，而且同当今天子支脉最近。他是崇祯帝的嫡亲叔父，又是嫡亲叔父中最年长的一个，因而在几十位宗室亲王中地位最为尊贵。由于有这样一位亲王住在城里，洛阳的政治意义更是超出寻常。

但洛阳的守备却并不特别出众。这里有一个总兵官王绍禹率部镇守，但因为多年没有受到过军事冲击，缺粮缺饷，军心涣散。住在洛阳的吕维祺建议福王拿出王府的钱财用作军饷，一面维持守城，一面速调省里的部队救援。但朱常洵同他的父亲万历帝和侄子崇祯帝一样，是个一毛不拔的守财奴，宁死也不肯出钱饷军。守城的官兵对福王的吝啬极为愤怒不平，见到农民军兵临城下，一部分人放弃守备，开城投降。二十日晚，守城官兵起义；二十一日晨，李自成部佔领洛阳全城。福王朱常洵和世子朱由崧慌忙出逃，朱常洵被农民军搜获，朱由崧寻机逃脱，后来成为南明的弘光皇帝。

李自成在福王宫中审讯福王。福王拼命磕头求饶，李自成却对他说：“你身为亲王，富甲天下，正当如此饥荒，却不肯分发一分一毫财产赈济百姓，你是个奴才。”命令先打他40大板，然后枭首示众。还把这个肥胖不堪的福王身上的肥肉割下来和着鹿肉用大锅煮了，一同下酒，号称“福禄酒”。原南京兵部尚书吕维祺也在城陷后被杀。

李自成攻克洛阳，佔据福王府后，把王府中大批的粮食、物资和银钱发放给附近的饥民，用以赈灾。各地的百姓听到消息纷纷赶来洛阳，官道上络绎如流水，日夜不绝。这一举动不但暂时缓解了洛阳地区人民的饥荒，而且使得李自成部在河南人民中拥有了极高的威望。此后的两三年间，李自成的农民军长期在河南活动，所到之处一啲百应，明朝的官军只能望风而逃。

李自成陷洛阳、戕福藩的消息还没有传到杨嗣昌的耳朵里，张献忠攻下襄阳的报告却先来了。张献忠率部进入湖广后，在正月里先攻佔了兴山县，听说襄阳城防空虚，就带领轻骑奔驰300里赶到襄阳附近。他派人假冒官兵先混入城中，在二月初四日夜里举火为号，里应外合，趁着襄阳守军大乱，突袭成功，佔领了这座围剿农民军的大本营。

襄阳也住着一位宗室亲王，襄王朱翊铭，按辈分是崇祯帝的族祖，同样被农民军活捉。张献忠对待这位亲王与李自成对待福王略有不同。他把襄王带到襄王宫里，给他斟了一杯酒，对他说："我要斩杨嗣昌的头，但杨嗣昌远在四川，今天只好借亲王的头来让杨嗣昌以失陷藩封之罪伏法。亲王还是努力喝了这杯酒。"襄王的下场当然还是被斩首，襄藩宗支中的贵阳王朱常法等也一起被杀。

张献忠在襄阳同样开仓放粮，赈济饥民，发放的赈灾银达50万两，数额远远超过崇祯王朝任何一次大规模的赈灾活动。张献忠的这一举动同样取得了湖广广大百姓的诚心拥护，为他后来转战大江南北，建立"大西"政权打下了基础。

李自成攻克洛阳和张献忠攻克襄阳，标志着明末农民战争发展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在此之前，农民军尽管攻城略地，给明王朝以极大的打击，但在总体上是处于守势，流动作战本身就有避敌锋芒的意图。明廷

也还能组织起几次略见成效的围剿活动，迫使农民武装一度处于极其不利的局面中。但自从崇祯十四年（1641）春季起，明官军同农民义军的攻防态势发生了根本性变化。这以后，明军只能在各处勉强支应，李自成、张献忠等部则不断髮动勐烈攻势。明王朝这样勉强支应了3年，被掏空了根基的大厦终于倒塌下来，而一些有识之士早在崇祯十四年就已经看到这种必然的结局了。

洛阳、襄阳两城的失陷和福王、襄王两藩的被杀，也标志着杨嗣昌督师围剿的彻底失败。他是在匆匆赶回湖广之后才接连听到这两个如同炸雷一般的消息的，到这时候，他完全绝望了。几个月在四川奔驰于军旅之中，早已使他疲惫不堪，出川时已是重病在身。他回到湖广后乘船先顺江来到荆州（今江陵），住在郊外的沙头市（今沙市），本来想休养一下再图进剿，但立刻就听到襄阳传来的噩耗。他做过兵部尚书，深知失陷藩封对自己来说意味着什么。何况督师一年多来，劳师耗饷，流寇反而大炽，这本身也足以置任何一位军事统帅于死地了。他又为没能平定内乱，不能报效给了自己极其特殊恩宠的皇帝而痛心。他在写给湖广巡抚宋一鹤的信中沉痛而又无奈地说："天降奇祸，突中襄藩。僕呕血伤心，束身俟死，无他说矣。"一切都已无望，只有以一死来报皇恩了。

紧接着传来洛阳的消息，对他又是一次巨大的打击。三月初一日，他死在沙头市的行辕里，时年54岁。对于他的死，人们传说不一。有人说他是在听到连陷两藩的消息后服毒或是上吊而死的，但他的儿子杨松山和督师时的主要助手监军万元吉却坚持说是死于疾病。但不论是不是自杀，正是张献忠和李自成的军事胜利要了他的命，这一点当是无疑的。

杨嗣昌虽然死了，但从来对他心怀成见的朝臣们还是一直揪住不放。早在他的死讯传到京城之前，兵科都给事中张缙彦就以陷城失藩的罪名攻劾他。崇祯帝对自己最信任的杨嗣昌这样坏了大事也很愤怒，降旨"自督

师以下，调度失宜，巧言善欺”，让有关部门依法议罪。这一下，朝臣得到了机会，以吏部尚书李日宣、左都御史王道直等大僚为首的一批文臣纷纷上疏要求撤销杨嗣昌督师的职务，追究他的责任，其中犹以言官们最为活跃。但直到这时候，崇祯帝对杨嗣昌的信任还是没有完全衰退。也许还因为杨嗣昌出京督师是由他特命的，也要顾及自己的面子，因而他一反常态，没有惩办失事的杨嗣昌，反而对其大为袒护。他为这件事特意召六部、九卿、科道等官员进入干清宫，很不高兴地对群臣说：“杨嗣昌是朕特简任用的，用兵没有成效，朕自会鑑裁。何况他尚有可取之才，你们见到朕有议罪之旨，就一起排击，纷纭不已。如果真是出于忠君正直，为何不在张缙彦纠劾之前就提出来呢？这次暂不深究，各疏留中，告诉你们知道。”朝臣才不好意思再多说。

不久，杨嗣昌的死讯也传来了。不论是自杀还是病故，杨嗣昌的死都让崇祯帝感到十分震惊和痛心。朝臣们却不肯善罢甘休，又一次发起了对杨嗣昌的攻击高潮，交章论列，连篇累牍。崇祯帝似乎也觉得，杀过那么多失事大臣，对于个这已经死了的杨嗣昌仍然一意袒护，好像有失公平，就再一次决定让九卿大臣会议定罪。朝臣们认为，杨嗣昌倡议加派，致使天下民穷财尽，奔走为盗；而且失事封疆，匿罪饰功，应当按照嘉靖间仇鸾故事，以“失陷城塞律”论斩，戮尸。

崇祯帝却又犹豫起来。他对杨嗣昌的感情毕竟不同于一般，丧失这个唯一能够依赖和信任的股肱大臣给他带来了极大的伤感，甚至在梦境中都不能抹去这个身影。就在朝臣们吵嚷着要对杨嗣昌进行恶毒的身后惩罚的时候，他梦见了杨嗣昌跪在廷前叩首为自己申冤。杨嗣昌说：“臣鞠躬尽瘁，死而后已。但诸臣不公不平，连章诋譭，故尔归来向皇上诉说。”崇祯帝在梦中还问讯了朝臣攻击杨嗣昌的一些具体问题，杨嗣昌也都一一否认了。这个梦当然是崇祯帝心理情感的一种折射，但在当时的

认识水平下，却更加坚定了崇祯帝不再制裁杨嗣昌的决心。他对大臣们讲述了这个梦，神情十分惨淡，同时宣佈："故辅杨嗣昌奉命督剿，无守城专责，而且对伪装入城、乘夜偷袭均再三严申军令，地方官员却置若罔闻。待违令致使城陷，又全部归罪于督辅，不是持平之论。况且嗣昌身临前线两年，屡着捷功，尽瘁身亡，勤劳难泯。"昭雪了对他的议罪，赐祭一罈，让其家人归葬于故里武陵。

后来张献忠攻破武陵，命人掘开了杨嗣昌的坟墓，把他的尸体又千刀万刃砍杀了一遍。这从另一个侧面表明，杨嗣昌当初给予农民军的打击确实是很沉重的。

杨嗣昌之后，负责对农民军作战的统帅仍称作督师，首先接任他的是陕西总督丁启睿。但丁启睿是个平庸无谋的人，中原形势又在急转直下，督师所能起的作用只不过是领着亲标四处救急而已，而且哪里的急都救不了。

朝中已无杨嗣昌，再也没有一个能组织起对农民军进行大战役的战略人才了。

三 江南復社

在崇祯帝的皇帝生涯中，已经遇到过3次使他深受刺激的大事件。第一次是崇祯二年（1629）后金军兵临京城，那让他头一次感受到了危亡在即的恐惧；第二次是崇祯八年（1635）凤阳祖陵被农民军焚燬，他从中体验到上天的宠眷正在悄悄转移；第三次就是崇祯十四年（1641）初福、襄两藩的被难，自己的亲叔父和族祖的性命都保不住了，这让他隐约中感觉到了一种大势去矣的不祥之兆。

在听到福王被杀的惊人消息之后，他大病了一场。按他自己的说法，是“积劳成疾，诸证（症）交侵”，最为严重的是下肢一度出现麻痹，竟然很多天无法直立行走。福王是在万历四十二年（1614）之国去了洛阳的，当时崇祯帝年龄还太小，因此对这个叔父完全没有具体印象。出于一种伤感和怀念的心理，他叫人找来一个在宫中服役多年的老宫女，向她询问旧时福王的一些情况。老宫女说：“当时万历爷对福王特别疼爱，福王之国时已经出了宫门，又召回来三次，还对他说：过三年就要回来朝见。万历爷还扳着手指头计算：三年是一千天，恐怕父皇等不到那时候了，可怎么办？”宫女长年闭锁深宫，并不知外面的情况，又说：“万历爷临终的时候还对郑老孃娘不断询问河南福王的近况。不知道现在福王殿下怎么样了？”福王却已经被人吃掉了，崇祯帝只能流着泪嘆息而已。

同过去几次在受到严重惊吓后的反应有所不同，这一次他没有失去理智一般地对责任者大肆惩办。责任最重大的杨嗣昌已经得到了宽容，其余如兵部尚书陈新甲、陕西总督丁启睿、湖广巡抚宋一鹤等间接相关人员也都没有被追究，主管洛阳、襄阳等地军务的河南巡抚李仙风和郧阳抚

治袁继咸都以失陷藩封罪被逮治，李仙风事先畏罪自杀，而袁继咸却只被定罪为遣戍。崇祯帝能对这件事实行冷处理，除了有包庇杨嗣昌的意思之外，也表明在大惊大恐之后，他反而比较冷静了。

像每一次受到刺激之后一样，他又想到了要奋然振作一番。但还是同每一次要振作的时候一样，他首先痛感到佐辅的庸碌无力。二月二十四日，他带着病召见了一次朝臣。因为病体沉重不能上朝，也不能在平臺召对，这次召对破例改在干清宫寝殿的东暖阁里举行。他有气无力地对朝臣们说："朕御极天下已经十四年了，国家多事，又饥荒不断，人皆相食，实在是太可怜了。最近流寇又攻陷洛阳，福王遇害。连亲叔父都保不住，都是朕的失德所致，真是惭愧得要死啊！"说着说着不禁流下泪来，而且越哭越觉悲痛，最后竟然失声大恸，涕泗纵横。这是他头一次在召对朝臣的时候公然泣不成声，而且从此哭开了头，以后就常有对着群臣哭天抹泪的事情发生。但廷臣们眼看着皇帝因为忧国而大病缠身，因为伤心而涕泪交流，竟然无言可对，想不出半个救国图强的良策。为了安慰皇帝，首辅范復粹只是一再说：这是气数，气数！崇祯帝只好很不高兴地回了他一句："这也说不得是气数。就是气数，也要靠人力来挽回呀。"大臣们于是又对以无限延长的沉默。

自从温体仁回乡之后，辅臣已经换过好几拨，首辅也先后用过张至发、刘宇亮、薛国观、范復粹四个人，却没有一个是得心应手的，更不用说什么经邦治国的王佐之才。崇祯帝的本意是很想让杨嗣昌来做首辅的，但为了剿平匪患却不得不让他出京督师，最后终致身败名裂。他为杨嗣昌惋惜，也为自己惋惜，因为仔细掂量了一番之后，在朝臣中竟然再找不出一个可以让他信赖的辅佐人才。国难思忠臣，他于是回忆起原来曾在身边任事的几位大臣。比较能干一点的韩爌、孙承宗以及温体仁都已经死了，似乎只有一度特别得到他赏识的原任首辅周延儒还算差强人

意。看来，为了这个残破不堪的国家，也只有重新起用周延儒了。

就在崇祯帝为了选用新的首辅而大伤脑筋的时候，一个有力的“院外活动集团”也正为了周延儒的起復而奔波忙碌，这个集团就是朝野闻名的江南復社。

明朝末年，各地的士人有一种结社的风气。最初结社无非是为了论文与交友两个目的。论文就是讨论八股文章的做法，以便应付科举考试；交友的目的则是要扩大社会关系网，仍然是为了科场顺利，鹏程万里。所以总起来说，结社是士子们为了走向宦途所做的一种准备工作，由于当时的士阶层实际上是一个把做官当成生命归宿和出发点的特殊职业集团，学而优则仕是他们的全部生活内容和赖以实现自我的基本手段，这个结社就有了无比重大的意义。在天启到崇祯年间，各直省几乎是无处无社，文明繁华之地的社团更是接州连邑，至今知名可考的也还有数十个之多。

结社多了，就渐渐出现了专吃结社饭的人，也就是所谓社团活动家。在天启崇祯之间，最着名也最有活动成效的社团活动家就是太仓的张溥。张溥字天如，出身于世家，伯父张辅之做过工部尚书。但他是婢女所生，子以母贱，在家里没有地位。小时候，伯父的家奴欺负他，他恨恨地咬破手指在墙上写了“不报仇奴，非人子也”八个大字。那家奴见到却嘲笑他说：“塌蒲屦儿（方言，指婢女之子）何能为？”他只能饮泣含恨，发愤读书，昼夜不辍。但书读了许多，科举功名上却一直没有什么进步，年近30岁了仍然只是一个秀才。自天启年间起他开始把主要精力放在结社活动方面，先是与同乡好友张採和常熟杨彝等人在苏州拂水山房社的基础上办起了一个应社，而后又把江南有影响的匡社、復社等合併起来，到崇祯初年正式成为一个规模庞大的社团，仍叫復社，取《易经》中“剥（卦）”尽“復（卦）”来，復兴天下的意思。

復社的宗旨之一是要復兴古文。张溥在文章上主张復古，而且要一直復到《六经》、《论语》、《孟子》那里去，比起前后七子的“文必汉魏”又倒退了一大步。但復古文实际上是要復古文中的精神，也就是《六经》、《论》、《孟》中的礼制规范和道德情操。因而，在復社的《盟词》（也就是会规）中就明确写了：“毋蹈匪彝，毋读非圣书，毋违老成人，毋矜己长，毋形彼短，毋巧言乱政，毋干进辱身。”一系列的道德信条。这在当时虽然世风日下，而学者们却极喜欢理学高调的形势下，是很有吸引力的。

张溥本人就是一个活动家，在他麾下又有几个特别善于奔走的人物。如吴江孙淳，本是小復社的发起人，进入大復社之后奔走于大江南北，结识学者名流、高官显宦，为復社的扩大发展做出了很大的贡献。当时人说他是“案头一部《汉书》，袖中一封荐书（推荐信），逢人便说‘我哩天如天如（张溥）’”。在这些活动家们的大力活动下，復社的影响日增，队伍日大，松江的几社、浙西的闻社、浙东的超社、江北的南社、江西的则社、湖广的质社、河南的端社、山东的邑社，还有一些名目繁多的小社，都汇集到復社中来，才子名士多成了復社中的社友。后人记录復社同仁名单，数得出来的就有2000多个，这在当时实在是个了不起的数字。

张溥不愧是个领袖之才，人员多了，地域又分散广大，他就以州县为单位分别设立支部，指定社长，负责发展组织、指挥行动、通讯联络。又以评选文章的方式把社员的文章习作结集出版，名曰《国表社集》，点评出自张溥和他的几个密友及得意门生之手。这《国表社集》先后出版了4期，可以看作是復社的机关刊物。

崇祯二年（1629），张溥在吴江的尹山召开了復社第一次大会。各地名流和普通学子争先恐后而至，南直各郡及浙、赣、楚、豫等各省都来了

人。大会之后復社的影响更遍及福建、广东、山西、陕西等边远省份，当地的士人们也纷纷寄来自己的文章，表示要参加復社活动。此后，崇祯三年（1630）在南京，崇祯六年（1633）在苏州虎丘，又举行了第二次和第三次復社大会，出席的人员更多，影响更大。虎丘大会来人有几千，以至于虎丘大雄宝殿的主会场根本站不开，外面生公臺、千人石等处都坐满了人，在外面看热闹的人更是拥挤不堪。

这时候的復社，有宗旨、有章程、有组织、有刊物、有社团大会，俨然是一个近代政党的雏形。在当时的社会条件下，出现这样一个组织未尝不是一种进步的徵兆，但如果站在明王朝专制统治的立场上来看，这却无疑是一股很危险的政治力量。因为它在体制外形成一种巨大的势力，固有的政治格局势必会受到某种冲击。

復社是未出仕学人的社团，本来集结的目的就在于以团体优势顺利通过各级科举考试。在社势大涨之后，张溥等领袖人物也确实把主要精力放在科考方面，一面切磋八股制艺，一面与从中央到地方主持学政和考政的官员声气勾通。官员们或是爱惜復社中人才济济，或是憷于復社的声势浩大，希望通过笼络来培植自己的势力，再加上缠三缠四的亲朋故旧关系，大多会对復中人另眼相看，给予特别的照顾。崇祯三年（1630）在南京举行第二次復社大会的时候正值江南乡试，许多南京籍生员和南京国子监的监生、贡生都趁势参加了考试。当时的主考官姜曰广正是对復社极爱惜极护持的，一大批覆社成员就都在这次乡试中高中，其中也包括张溥本人和他的好朋友或得意门生杨廷枢、陈子龙、吴伟业、吴昌时等人。其他各省復社成员在秋闱中得中举人的也有数十人。其后不久，这批新中的举人里面又有不少人成了进士，正式进入宦途。这种立竿见影的效果更使得莘莘学子对復社趋之若鹜。

随着復社势力和影响的增大，张溥和他的主要助手们的声望也如日中

天，很有些不可一世的样子。他们不但终于都自己金榜高魁，而且对于东南地区一般士子的前途命运都能施加非同寻常的影响。被他们器中并且予以推荐的，往往连试连捷，而復社以外的人却不免命途多舛。出于景仰和畏惧，江南学子们已经不敢直啜张溥等人的名字，只称他为天如先生，或是称之为西张先生，称復社的另一位领袖人物张採为南张先生（因为他们的故里一在太仓邑西，一在邑南），甚至学着孔庙里的格局，把几位社里的骨干前辈称作“四配”，把张溥的一些得意弟子称作“十哲”。太仓张天如，俨然就是一位当代的圣人夫子。

科场得意之后，张溥们不免要挟復社之势，把注意力逐渐转移到政治方面。他们大都出身于江南世家，同东林党人本来就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繫，再加上在道德文章方面的讲求也多与东林一致，因而在政治立场上，復社一直是东林的坚决支持者。復社成员中也有不少人根本就是着名东林党人的子弟，如黄尊素之子黄宗羲、魏大中之子魏学濂、周顺昌之子周茂兰等等。这些人的加入更使得復社的政治立场十分鲜明，当时有人就称復社为“小东林”。

復社在江南把持选政，几乎掌握了士子们穷达进退的命运，自然使社内人受益匪浅，却也招来社外士人的忌恨；他们激烈拥护东林党人的政治立场也使得官僚中与东林作对的人对他们侧目而视。因此，自崇祯初年起，攻讦復社的事件就屡有发生，到崇祯九、十年间，这种攻讦形成了一次高潮。

崇祯九年（1636）底，太仓有个叫陆文声的监生，上疏讦告张溥、张採，说“风俗败坏都源于士子，而张溥、张採实为坏风俗之盟主，倡立復社，以乱天下”。这陆文声本来与二张同里，很想加入復社以便求取功名。但张溥不喜欢他的人品，拒不接纳，因而才和他结下了仇怨。陆文声的讦状送到朝廷，立即引起了崇祯帝的重视。他凭直觉感到，这样一

个民间社团可能会不利于自己的独裁统治，于是命南京的提学御史倪元珙严加察核。倪元珙却是东林一脉的人，有意保护復社，调查后回奏说：“诸生诵法孔子，引其徒众谈经讲学，互相切磋，文章必学先正，品行必效贤良，实非树党营私。”崇祯帝面对这个报告，一时很有些拿不定主意。

陆文声讦告的事件还没有处理完，又有一个丁忧在籍的苏州推官叫周之夔的，穿着一身孝服千里迢迢从家乡福建跑到京城里来，首告张溥、张采结社树党，讥刺时政，简直大有造反之势。这周之夔原本是张溥的老相识，而且也是復社中人，但因为在《国表社集》第二集中选他的文章的时候，张溥没给他好的批语，于是同张溥闹翻了，才一不做二不休，专同復社作对。他是从復社里面反叛出来的，熟悉内幕，身份又是朝廷命官，告发復社的反响自然比陆文声更大。周之夔很有些泼皮脾气，不但向朝廷上疏告讦，还在京师大肆活动，用黄纸写成大字报，说张溥、张采凑了几万两银子送到京里，由復社的后臺黄道周和復社成员陈子龙、吴伟业等人做内应，给东厂、锦衣卫送礼消灾。他还把大字报贴在背上每天在长安街上游行，一见到达官贵人路过就凑过去让他们看。一时间復社的事情成了京中的大新闻，一些对復社有成见、有仇恨的士人乘机腾造蜚语，有人还匿名书写了《復社十大罪》的传单，到处散发。

但復社在朝中有东林一党做靠山，本身的成员中也有不少已经在朝中为官的，譬如张溥的大弟子吴伟业就以一甲第二名的身份做着翰林院编修，虽然权力不大，地位却是相当显要。有了这些人努力救护，復社虽然几度危乎其危，却始终没有遭到制裁。崇祯帝对于这些满口都是孔学圣道的士人纠集在一起，到底会造成什么危害，一直没有弄明白，也不愿贸然下手得罪太多的官僚绅士。这个案件因此就拖了下来，几年都没有了结，而復社却也一直安然无恙。

然而崇祯十年（1637）的这场大风波，却使得復社的骨干们更加感到参预政治，发展政治实力的重要性和迫切性。这以后，尽管復社结党一案还悬在半空，他们结党干政，大造舆论的活动却更加积极起来。到崇祯十四年（1641）之前，他们干出了两件引人注目的大事。

一件是在崇祯十一年（1638）的七月，復社中的一伙年轻人在南京发表了一份讨伐阉党分子阮大鋮的《留都防乱公揭》。

阮大鋮是安徽桐城人，为人张狂无忌，曾在书室里自题一联："无子一身轻，有官万事足。"极为惊世骇俗。他本来也是东林中的一员，在魏忠贤得势之初却因为与左光斗等人闹意气，投入了阉党麾下。他最初为魏忠贤出过一些力，但终因是东林旧人，并没有真正得到魏忠贤的信任，在朝中混不下去，告病回家了。崇祯初年定"逆案"的时候，他却没有因为在魏忠贤手下服务时间不长而被漏网，被安排在"交结近侍又次等"一类中，处以徒刑3年，但可以交纳赎金免于服刑，回家做了老百姓。阮大鋮是个不甘寂寞的人，在家乡仍然暗中把持操纵，组织起以皖人为核心的"中江社"，以扩大自己的影响。后来农民军几次进入安徽，他为了避难逃到南京，在这个明朝第二政治中心又结交官绅，大为活跃，很想再度入朝为官，有一番作为。当时天下战乱频繁，他就到处大谈行兵佈阵，想以懂军事的名声得到朝廷重视。

南京是復社的重要基地之一，许多復社青年或是在此长期寓居，或是不时到这里走动。这些青年对于阮大鋮的肆无忌惮十分反感，阮大鋮却对他们很巴结。他主动为復社四公子之一的侯朝宗（侯恂之子）与江南名妓李香君撮合牵线，还请復社诸公子到家里饮酒看戏。（他有个很有水平的家庭戏班，专排他自己创作的传奇剧本，在当时的南京颇负盛名。）但復社公子们喝了酒，看了戏，却当面把阮大鋮挖苦痛骂一番。而且，为此还提高了警惕，以为阮大鋮这样的举动明明是为了翻案在做

准备。几个復社青年名士于是会集在一起，作了一篇大文章，对阮大鋮进行了一番痛快淋漓的揭露，文章就叫作《留都防乱公揭》，留都指南京。

《公揭》揭露阮大鋮“献策于魏忠贤，倾残善类”，“逆案”既定之后，仍在家乡纳贿关说，把持官府，以至于民间相传，“杀了阮大鋮，安庆始得宁”。及至逃窜南京，每日以“翻案”、“起用”惑人耳目，自称与阉党原任内阁大学士冯铨能通宫中内线，以恫吓官绅。甚至假借传奇名目，“诽谤圣君，讥刺当世”。文中说：“陪京乃祖宗根本重地，而使枭獍之人，日聚无赖，招纳亡命，昼夜赌博，目今闯、献作乱，万一伏间于内，酿祸萧墙，天下事将未可知，此不可不急为预防也。”

这篇揭露阮大鋮的檄文稍微有点小题大做的味道，但其核心是“阉党”翻案的问题，却正是当时的一大政治关节点。自“逆案”制定之后，身罹案中却不服气又不甘寂寞的几个人确实一直在谋求为自己翻案，重新走上政治舞臺。阉党中原来任过尚书的霍维华、吕纯如等人都曾託人荐举有军事才能，希图能借着兵荒马乱的时机得到任用；冯铨、阮大鋮之流也四下活动，买通关节，并且一直同朝廷内外保持着密切的联繫。但崇祯帝对自己亲手定下的钦案却始终持一种斩钉截铁的态度，每一次有人保举逆案中人员知兵可用，都被他严厉地拒绝了。吏部尚书张捷为此还丢了官。甚至他最信任的杨嗣昌为郭巩的误入逆案申冤，他也绝不考虑一点宽容的余地。吕纯如被纳入“逆案”本来就很冤枉，崇祯帝自己也瞭解一些情况，但他坚持“逆案”一律不准翻，就是冤枉也只好忍着，叫作“不可开此端”。对于崇祯帝来讲，“逆案”是他顺应天命人心，代天行道的一面旗帜，因此不容有丝毫触动。由于有崇祯帝的坚定立场，阉党的翻案活动并不十分猖獗，几次小试受挫，也就偃旗息鼓，不敢再明目张胆地四处张扬。

而在东林派的官绅士子看来，阉党的翻案活动却是同朝中反东林派的政治阴谋紧密联繫在一起的。他们对这种翻案活动特别警惕，每提及朝政的败弊和国事的隐患必以阉党翻案作为例证。自从崇祯三年（1630）左右东林党人在朝中失势以后，残余的东林势力就把对翻案风予以迎头痛击当成了自我标榜忠君持正，从而挽回政治优势的一项纲领性政治战略，尽一切可能在反对翻案的问题上大做文章。因为在反对翻案的问题上他们同皇帝保持着高度的一致，东林党人在十来年间唯一一件干的比较顺利的政治大业也正是顶住了翻案之风。这成功又使得他们对所有的翻案意图特别敏感，整个崇祯时期东林党人反击翻案风的运动从来没有停息。

復社在政治上同东林党人保持一致，对“阉党”的翻案活动也同样敏感。阮大鋮诗文都写得不错，又行事夸诞，在社会上很有些影响，不甘寂寞也是有名的。这次復社贵公子们抓住阮大鋮的翻案企图对他进行勐烈攻击，正合了东林党人的政治战略，也确实收到一种轰动性的效应。

政治传单式的《留都防乱公揭》被大量印制，广为散发，不但在南京，而且在全国范围内引起很大的反响。人们又回忆起魏忠贤专权时的劣政，也记起了阉党助纣为虐的种种罪行，街头巷尾到处都在议论声讨妄图翻案的阮大鬍子。甚至连戏班子也不再上演阮大鋮写的传奇，所谓“梨园弟子觇人意，队队停歌《燕子笺》”（《燕子笺》是阮大鋮传奇的代表作。）阮大鋮则狼狈不堪，一面也写了一张揭贴《酬诬琐言》作为回答，一面到处託人向復社诸公子解释求情，自然遭到的全是痛诋。他可怜兮兮地对人说：“陈贞慧、吴应箕（都是首倡《留都防乱公揭》者）这些人跟我有什么怨仇，一定要杀了我才甘心呀！”絮絮叨叨，声泪俱下。他不敢再住在南京城里招摇，只好迁居到南郊的牛首山，隐居起来。

復社进行的另一项重大活动虽然不如攻击阮大鋮那样有声有色，淋漓痛

快，对朝廷政治的影响却更直接、更深远。在崇祯十三年（1640），復社人士同朝中的东林党人密切合作，扳倒了内阁首辅薛国观。

从朝中的派别体系上看，薛国观属于公开与东林党人对着干的那一类人。也正因为他敢于公开同东林对着干，才受到温体仁的推荐，得到崇祯帝的赏识。东林党人对于有这样一个对立面的首辅当国当然很不能满意，受到连带，復社中人也感到非常压抑。这种压抑有时候是很实际的。復社中的大活动家，张溥的得意弟子吴昌时得中进士后任行人司行人，歷俸年满应考选升职。吴昌时以復社干将的身份交结各方面的重要朝臣，同曹化淳等亲东林派的大太监也往来密切，本来想要得到一个给事中的位置。他为此还特地拜访过薛国观，希望薛国观能高抬贵手，让自己得到一个好的职务。薛国观表面上很好说话，一口答应下来，实际上却对復社人士丝毫不留情面。考选结果，吴昌时只被任命了一个没有什么实权的礼部主事。吴昌时为此恨得咬牙切齿，復社中其他人也痛感不把薛国观搞掉，换上一个自己人充任首辅，政治前途将永远黑暗。

正值薛国观为了武清侯李国瑞捐助国库和皇五子夭折的事失去了崇祯帝的欢心，地位岌岌可危，吴昌时等人就在朝中策动了一个不大不小的倒薛运动。以復社成员为主进行的这次活动同以往东林党人在朝中的行事不同，东林以正直自诩，就是在攻击政敌的时候大体也是直来直去地公然上疏甚至在御前当面指斥，而吴昌时却宁愿走阴柔的路数。吴昌时竭力同宫中太监和东厂首领结交，说了许多好话，送了许多厚礼，然后嘱託宫内太监和东厂人员在皇帝面前不断透露不利于薛国观的消息。

东厂本来就对薛国观很不感兴趣，因为有一次崇祯帝在召对时问起朝臣贪污的情况，薛国观曾对崇祯帝说："如果东厂、锦衣卫的主管得力，朝臣们怎么敢如此妄为？"站在一旁的总督东厂太监王德化当时吓得出了一身冷汗，把衣服都溼透了。崇祯帝并没有为此追究东厂的主管，东厂却

从此记下了薛国观的仇，总想寻机进行报復。

有了皇家特务机构的配合，復社倒薛的活动进行得十分顺利。东厂先是密报：前两年因贪污案被抓进监狱的原任大理寺丞史䇲为了免受严惩，曾运送大批资财进京，放在薛国观家中，一部分送给薛国观本人，一部分求他分送有关人员。但史䇲的案子一直拖着没有了结，他就在狱中死了，那笔钱财就全被薛国观吞没。不久后东厂又报告说：丁忧在家的刑部侍郎蔡奕琛辇金入都行贿薛国观，结党营私。薛国观在明末官僚中其实还是比较清廉的，这两个报告所说的情况相当可疑。

崇祯帝还记得薛国观确实曾为史䇲开脱过罪责，也极力说过蔡奕琛的好话，正好同密报中的情况对上号。他从来不能原谅朝臣的贪贿与结党，对于首辅的这些所作所为更是气恼异常，再加上爱子夭逝那笔旧账，他终于不能再容忍薛国观待在自己身边充任首辅了。崇祯十三年（1640）六月，他为了内阁一次技术性的失误发出上谕说："辅臣薛国观大负委任，命五府、六部、都察院、通政使司、大理寺堂上官、六科、十三道掌印官看议具奏。"大臣和科道官员们一时摸不着头脑，不知道皇帝到底对薛国观是个什么态度，只是议了一个模稜两可的处理意见。唯有刑科给事中袁恺在吴昌时的指点下，没有在会议疏上具名，而是另上了一疏，指责吏部尚书傅永淳徇私袒护，却没有说清楚袒护些什么。崇祯帝很讨厌朝臣们的圆滑，把袁恺的奏本掼到地上说："这叫什么纠疏！"也懒得再同大臣们绕圈子，直接下令让薛国观退休离职回家了。

薛国观虽然退出了政治舞臺，但復社中人、东厂太监和崇祯帝本人都没有就此善罢甘休，还要抓住这只落水狗痛打不放。东厂的番役加紧对薛国观的侦察，发现薛的亲信内阁中书王陛彦仍然同他往来密切。他们还向崇祯帝汇报说，薛国观出都时带走的银钱装载了满满一列车队。崇祯帝为了敲诈皇亲国戚，把一个宝贝儿子也赔上了，听说薛国观居然富可

敌国，不由得怒从心头起，恶向胆边生，立即下令把王陛彦抓起来严刑拷问。东厂的审讯本领是第一流的，很快就得到了详实的口供，招出薛国观贪污纳贿事件多起，牵连到的大臣小臣包括现任吏部尚书傅永淳、吏部侍郎林栋隆、左副都御史叶有声、通政使李梦辰、原任刑部侍郎蔡奕琛，以及刑部主事朱永佑等11人，他们分别被革职或是逮捕问罪。这些人都是同东林党人对立的，因而不难看出復社人士在其中所起的作用。

薛国观的案件中其实有许多疑点，王陛彦在严刑之下也还是招不清楚。到了十月，案子未结，崇祯帝突然下了一道特旨："王陛彦着即会官斩决。"由皇帝亲自裁决判处死刑，这在几百年中都是没有过先例的，但皇帝是金口玉言，刑部只能会同有关部门执行。紧接着，又有旨将薛国观逮至京师提问。对于一个卸职的首辅来说，这在明代是极少有过的严厉处治。薛国观是山西韩城人，接到凶讯后故意拖延了很久，希望皇帝的怒气能渐渐消了，但最后还是不得不跟着押解的缇骑上路，不知道到底会有什么样的大祸降临到自己的头上。

復社在倒薛事件中所起的作用，尽管比较隐晦，还是在朝野中传说开了。东林一脉为之额手相庆，东林的反对派则恨恨不已。復社既然已经深入到政治斗争的核心，也就一不做二不休，进一步要推上一个自己的代表出任首辅。远在太仓的张溥和他的助手们经过仔细研究之后，觉得最合适的人选还是原先做过首辅的周延儒。

周延儒在东林党中本来有不少朋友，只是为了那次会推没有入选，才与温体仁联起手来同东林党人撕破了脸。后来他自己也受温体仁排挤，为了利害相关，也站在了反对温体仁而与东林党人比较一致的立场。他几年休闲，住在家乡宜兴，左邻右舍尽是东林巨魁，交往过从也很不少。表面看来，大家已经尽去前嫌，重新成了好朋友。復社中决策层以为，

全力推举周延儒，既可以使之成为自己的政治代言人，又不会引起反对派太大的警觉，而且由于周延儒的资歷不同寻常，一入阁必任首辅，比起其他人来少了许多麻烦。

决策已定，復社人士们就四处活动，不但找到了在朝在野的东林骨干如钱谦益、侯恂等人，而且还找了着名的阉党人物冯铨和阮大鋮。要运动出一位首辅出山，是一个很不小的工程，既需要人事方面的通畅，又需要使用大笔资金。在筹集资金方面，復社採取了招股的办法，一股一万两，待到事情成功后分别给予回报。钱谦益为了復出，侯恂为了脱罪，冯铨和阮大鋮不敢奢望再出山做官，但想举荐自己的好朋友在朝中做代理人，都各认了一股。加上其他方面七凑八凑，最后凑齐了6万两活动经费，全部运到京里行贿。这笔在当时接近天文数字的资金当然起了极大的作用。在人事方面，主要靠吴昌时在京城活动。张溥把全部计划和给京中要人的七封求援信交给干练僕人王成送到北京，为了机密起见，信件先让王成背诵熟了，再剪成指甲大小的碎片，掺杂在一床破棉絮里，到吴昌时在京城的寓所里再用蓑衣裱法重新裱贴起来，送给受信人。

吴昌时因为同太监们关系密切，对宫中情况十分了解，也颇能在无形之中对崇祯帝施加影响，号称是“一时手操朝柄，呶吸通于帝座”；因为刚刚剷除过一个堂堂首辅，公卿臣僚们也不敢不对其另眼相看。加上有6万两银子做后盾，在一番活动之后，竟然真的奏效。崇祯帝不知从什么时候起，开始思念起当年的首辅，朝臣们也似乎在无意中常常提到周延儒的忠诚与精干。到了崇祯十四年（1641）二月，一切都是水到渠成，崇祯帝在国事日益艰难，身边辅佐乏人的情况下，终于“宸纲独断”，决定重新任用几位过去的阁臣，召原任辅臣周延儒、贺逢圣、张至发进京入阁佐理政务。其中张至发大概知道一点其中的内幕，觉得附骥于周延

儒颇为无趣，託病没有来京。周延儒和贺逢圣则是受命即发，分别在这年九月来到京城任职。

崇祯帝对于人才的渴望还不仅仅表现在召回故辅这一个方面，这年五月，他又想出一个开设特科以蒐罗人才的办法。他对户、兵两部上谕说：“天下之大，人才之盛，难道竟没有明习心计、经理储输，可以既不专事苛剥小民，又能使国用充实的人才吗？难道也没有谋略超群、勇武过人，或是沉识而出奇制胜，或是骁恣而陷阵摧锋，如同古代所谓智将、勇将的人才吗？朕夜卧不宁，旦夕思虑，竟然没有遇到一个这样的人才，或许是求才之术还不完备吧？如今欲特开科目，一是裕国足民科，一是奇谋异勇科，使海内人士有所追求，展示才品。”他还要有关部门制定出切实可行的详细方案。

这虽是崇祯帝的一番苦心，却完全是梦想，即使真有几个如他所说的天才出现，也无法挽回财政的窘迫和军事的接连惨败。何况，哪里有什么天才，在一片混乱的政局中又能有什么招致天才的办法呢？他的空想当然不被朝臣们看好，就拖延了下去，两个特科一直没有真的开设，人才自然也难进入他的彀中。好在就是这个时候，迟迟延延的薛国观终于到京了。积极的网罗人才虽然难有作为，消极的重典惩贪、震慑群臣却是可以做到的。薛国观是七月里进京的，崇祯帝决心对这位首辅大开杀戒，以儆效尤。

在明代歷史上，内阁辅臣被杀的只有两个先例，一次是天顺年间的王文，那是因为英宗復辟，需要杀几个大臣使朝廷震悚屈服；另一次是嘉靖年间的夏言，是死在极残忍狠毒刚愎自用的嘉靖皇帝和阴险刻薄的辅臣严嵩手中。两个人后来都被平反翻案了，此后内阁大学士即使犯罪，一般也会得到比较宽大的处理。薛国观鑑于有这样的惯例，加以自觉并没有什么太了不起的罪行，没有想到会被处死。初到京城，他没有被收

入监狱，而是被软禁在自己在京的宅邸里，这也使他比较放心。

但到八月初八日这天晚上，他已经睡下了，传旨的锦衣卫官员和武士突然来临。他见到诏使都是穿的红袍，大惊失色，仓皇中找不到自己的便帽，只好把僕人的帽子戴在头上接旨。听到圣旨宣佈赐他自尽，他伏在地上已经起不来了，只是昏昏沉沉地念叨着：“是吴昌时杀我，是吴昌时杀我！”后来他神气稍定，听到诏旨中还有抄家籍没一条，又对传诏的人说：“太幸运了，不籍没我，哪会知道我的清贫呢？”然后才无可奈何地在屋樑上吊死了。死后整整两天，崇祯帝才想起下令准其家人收斂，薛国观的尸体也就在屋樑上悬挂了两天。薛国观死后被坐以赃银5万两，抄没了他的家。但只抄出积财600多两，再就是一所祖宅而已。许多人都觉得薛国观虽然不算什么好人，但罚非其罪，那情状实在是很惨的。

一个月之后，周延儒进京任首辅。一个坚定反对东林和復社的首辅的被杀与一个被复社一手推出的首辅的任职，标志着东林党人在政治上大復兴的开始。在这以后不太长的一段时间里，东林党人大为意气风发起来。

周延儒还是很讲信誉的，入阁后就一改前几任首辅的做法，努力劝说崇祯帝任用东林，推行新政。崇祯帝对于几年不见的周延儒也很有些一往情深，第一次召见的时候，就握住他的手殷殷问候，赐宴的时候还亲自做主人蔘加。（杨嗣昌出征时也没有得到过这样的优遇。）回到宫里，崇祯帝仍然非常兴奋，对身边的内侍说：“还是他！”就好像迷路的商旅突然见到了一匹识途的老马，下一步如何行动总算有了依靠。

这匹老马给崇祯帝开的药方其实并不算新鲜，无非是多少年来东林党人一直在呶吁、在努力争取的几项大政。周延儒在再次入阁后首先提出，宽免民间多年积累下来的拖欠钱粮，并且免除战乱和大灾地区今明两年

的现税；作为江南士绅的代表人物，他还请求暂缓大水成灾的江南和浙北苏州、松江、常州、嘉兴、湖州五府的秋粮，改为明年夏季补足。崇祯帝对这些建议都一一批准了。这些措施虽然不可能根本上解决民间饿殍遍野的惨痛，但毕竟是一种宽解人民灾难的“德政”，至于进一步增大的财政亏空如何填补，周延儒和他的东林后臺们却暂时想不出什么好办法。

另一项重要举措是限制厂、卫权力。周延儒提出，厂、卫四出侦缉造成人心惶惶，并且制造了大量冤假错案，请罢除厂、卫辑事制度，厂、卫只接受处理皇帝指定办理的钦办要案。这个做法得到了京城全体官绅和市民的热烈拥护，因为从此免除了总是压在心头的一重特务统治的阴影。但东厂和锦衣卫的上下人等却因此失去了大部分权力和可观的经济收入，对周延儒和他背后的政治势力恨之入骨。

最关键的一项新政还在于人事方面。周延儒很讲信义，当政之后就根据復社开的单子，一面推荐东林骨干担任要职，一面解救正在待罪狱中的东林党人。出过一万两银子的大股东侯恂不久后被释放出狱，重新安排了职务。另一个着名的东林理学大师黄道周的案子也在周延儒的劝解下得到了让东林党人比较满意的了结。

黄道周在崇祯十一年（1638）被贬到江西之后，本来已经脱离了朝廷的是是非非，但崇祯帝对于这个敢于肆无忌惮地当面顶撞自己的人却一直不能忘怀，心中的一口毒气也始终没有消释。崇祯十三年（1640）初，江西巡抚解学龙按例荐举所部官员，列黄道周为一等，并大加推奖。崇祯帝得知了这个情况，一下子记起了旧仇，突然以党邪乱政的罪名将黄道周和解学龙同时罢官削籍，命逮至京师下刑部狱。两个人被押解进京后，先是被廷杖80，而后由刑部严刑拷问，追查党羽。黄道周和解学龙只能交代出一些平时交往较多的好朋友，于是翰林院编修黄文焕、吏部

主事陈天定、中书舍人文震亨等一批在京官员也被牵连入狱。户部主事叶廷秀上疏论救，被廷杖100，削籍，繫狱。刑部尚书李觉斯因为拟罪偏轻，被罢职除名。一时间，解学龙荐举黄道周这样一个无所谓罪行的案件竟成了牵扯面极广，让朝野官绅人人自危的一件大案。

周延儒入值后，崇祯帝为了这个拖了一年多的大案谘询过他，他趁机为黄道周说了不少好话，崇祯帝渐渐有些回心转意。接替李觉斯任刑部尚书的刘泽深受到周延儒指点，在这时上疏论黄道周案，认为解学龙和黄道周定罪永戍已经是最高惩罚，再重就是死刑了，但从来没有律条标明因为建言之罪而处死刑的。疏中说："陛下所怀疑的是朋党。然朋党必见诸行事，黄道周抗疏只是空言，一两个知交好友都因之被罢斥，哪里见到所谓朋党，用得着为此动用朝廷大法吗？"仍以李觉斯主持拟定的永戍作为结案。这一次崇祯帝批准了刑部的定案，黄道周和解学龙分别被遣戍。第二年，崇帝有一次慨嘆人才的缺乏和时世的艰难，对周延儒说："怎样才能得到像岳飞那样的人才呢？"周延儒趁机回答："岳飞虽是名将，但其破金兵的事，史书上也有许多溢美之处。就像黄道周的为人，将来传之史册，也不免会写上：'其不被任用，天下惜之！'"这番话让崇祯帝默然良久，最后同意免除黄道周之罪，恢復其少詹事故官。

另一件拖得更久的案件，就是復社集众结社案，也在周延儒手中了结了。復社为了周延儒的再相出力最多，当然要收回立竿见影的效果。在周延儒主政后不久，御史金毓峒等人再论復社事，希望朝廷鼓励学子聚会讲学，切磋圣道。周延儒为皇帝拟旨："朝廷不以语言文字罪人。"復社从此取得了合法地位。可惜到这时候，復社的领袖人物张溥已经病逝，群龙无首的復社再也没有什么大的作为了。

一批东林党人被解救，另一批东林党人纷纷登上显要之职。在周延儒的推荐下，在崇祯十四年（1641）末到十五年（1642）初，东林要人郑

三俊、刘宗周、范景文、倪元璐、李邦华、徐石麒、张国维等人或起自废籍，或得到提升，先后出任六部尚书、侍郎和都察院主官，朝廷中东林佈满九列，几乎成了他们的一统天下。东林人等也兴奋得摩拳擦掌，想要趁此良机，大干出一番事业来。

但所谓良机其实只是一座可望而不可即的海市蜃楼，天下事已大坏，朝廷政局已大坏，要力挽狂澜已经绝无可能。周延儒被推举上臺的方式本身就标志着东林党人对自己政治原则的背叛和东林政治的腐败。阉党的大股东们在周延儒上臺后得到的实惠不多，只有一个阮大鋮的密友马世英被从废籍起用为凤阳总督，阉党为此对东林党人以及周延儒本人都更加怀恨在心。作了大官的东林党人和气焰沖天的復社人士沿着通关节、走内线的路子走下去，一向标榜的廉洁清正之风也几乎荡然无存。最为怪异的是，剔除了厂、卫侦缉的劣政之后，反而给官僚们肆意营私大开了方便之门。在崇祯朝的最后一段日子里，朝政的腐败，官员的贪黩贿赂、推诿责任、党同伐异，都到了无以復加的程度。

身居首辅的周延儒本人正是这种腐败政治的代表。他是个极聪明又极圆滑的人，从来以原则性不强着称，重情面而少争执。对于求他办事求他通融的人，只要能帮忙他就尽量帮忙，送他多少贿赂都不拒绝，给得少也不嫌弃，门人亲故做中间人扣下贿赂中的一部分甚至大部分，他也从不过问。这种宽松的态度造成天下官绅竞相到辅臣门下营求私利的局面，他的亲信和门客乘机大发横财，相府门前车水马龙，比集市庙会还要热闹。因为聪明圆滑，他一度很得崇祯帝的欢心。崇祯十四年（1641）十月孟冬祭祀祖庙，正赶上一个风和日丽的好天气，因为此前几年的大祭祀总是气候恶劣，不是阴霾蔽日就是狂风骤起，崇祯帝大为高兴，对侍从们说：“周阁老毕竟是有福的人啊！”但仅仅靠着聪明圆滑却无法改变帝国江河日下的命运，就在周延儒以及东林诸臣同崇祯帝度

过那一段亲密无间的蜜月的时候，中原和辽东两方面的战局都在急剧地恶化着，而这种险恶的局势又势必要打破那段卿卿我我的甜蜜时光。

在中原，李自成部自破洛阳之后军势大盛，紧接着又包围了河南省城开封。明廷调左良玉部和保定总督杨文岳部火速增援，李自成才被迫撤军。到这年七月，罗汝才因为与张献忠不和，率部与李自成会合，李、罗联军更加强大。九月，才被从监狱中释放出来担任陕西总督不久的傅宗龙，率所部陕军与杨文岳的保定军虎大威部集结在项城附近，准备同农民军进行决战，结果中计陷入埋伏，几位总兵带兵逃窜，只剩两位总督和他们的本标营兵被重重围困在项城孟家庄。杨文岳后来逃出了重围，傅宗龙则坚守待援。援兵却不敢再同农民军作战，傅宗龙内无粮草外无救兵，宰食光了马匹之后，靠吃战场上的死尸充饥，最后在突围时被俘获，在项城县城门外被农民军杀死。

项城大捷之后，李自成开始自称“闯王”，成为农民义军中势力最强、影响最大的一支队伍。十一月，李自成攻克南阳，处死明宗室唐王朱聿镆，横扫豫西南、豫中各州县。十二月，李自成和罗汝才第二次围攻开封。河南全省支离破碎，黄河以南地区的州县“父母官”或是被杀，或是弃印逃亡，新被任命的全都畏缩不敢赴任，已经没有几个州县真正在明王朝的统治之下了。

中原的心腹之患越酿越烈，与此同时，山海关外的所谓肩臂之患也丝毫没有平缓的趋势。从这一年的夏季起，清军在关外发起了新的一轮攻势，崇祯帝和他的大臣们都不得不心事重重地把目光聚集在辽东的战场上——辽东吃紧，十万火急！

四 松山败绩

自天启二年（1622）明军在广宁（今辽宁北镇）战役失败后，清军同明军对峙的前线大致在锦州一线，这种格局保持了近20年。天启六年（1626）和七年（1627），努尔哈赤和皇太极父子两次率大军突击锦州、宁远（今辽宁兴城），企图拔除明军在关外的据点，但两次都遭到顽强抵御，结果是无功而返。崇祯四年（1631）八月，皇太极集中兵力围攻刚刚修復的大凌河城（今辽宁锦县），围了整整两个多月，守城总兵祖大寿被迫投降。夺取大凌河是清太宗继位之后十几年来在辽河以西地区唯一的一大军事推进，大凌河以西40里处就是明军山海关外的前锋堡垒锦州。此后10年间这座堡垒一直屹立在辽东前哨上，在其身后是松山、杏山、塔山一连串坚实的小城堡，再后则是关门外的重镇宁远。自锦州至宁远五座连成一线的城池，依山傍海，是明军在辽东防线上的防御重点。清军几次入塞，在畿辅一带如入无人之境，但进出中原却不得不绕过山海关防线，取道北京北面的长城各关口。有宁锦诸城在，山海关就坚如磐石；山海关牢固，清军通向中原的道路就不能畅通，取明而代之的战略意图就无法顺利实现。因此，清太宗皇太极对明作战的基本战略，一方面是不断派兵深入中原撼动明朝根基，另一方面就是要拔除辽东的一串明军据点，首先是拔除宁远以东的四座堡垒。

崇祯十三年（1640）三月，清太宗为了夺取锦州等城，派遣和硕郑亲王济尔哈朗等人率军在义州（今辽宁义县）驻扎屯田，先在锦州外围建立起一个坚实的军事基础。等到屯田筑城粗具规模之后，清军开始由远及近地逐渐实行对锦州城的包围，先是扫清了锦州城外围的一些小堡垒。到崇祯十四年（1641）春，清军完成了坚实的包围，在锦州四面各设8座大营，绕营有一圈深壕，沿壕筑垛口，各营之间又有长壕连通，逻卒

探哨巡视不绝。以一种类似坚强防御体系的工事进行围攻，反映出清太宗的军事天才和誓死拿下锦州的决心。

守卫锦州的是清军的老对头祖大寿。他在崇祯四年（1631）被迫降清后，以搬取家小，充作内应为名骗取清太宗的信任，回到锦州，但立即重新报效于明王朝。明廷对他也仍然依重，让他带兵防守锦州重镇。因为有过一次假投降的歷史，祖大寿抵抗清军围攻是很坚决的，锦州城的防御设施很好，存粮也比较充实，他的战术是凭城死守，静待援军。

此时负责对清作战的最高军事统帅是堪称将才的蓟辽总督洪承畴。在得到清军围困锦州的消息后，他立即意识到一场大决战即将来临。既然清军的目标是对准锦州乃至宁远的，唯一的对策只有集中兵力在锦州一带同清军进行一番大战，才能保住关外的各个堡垒。自从万历四十七年（1619）萨尔浒决战以来，明军实际上从来没有主动同清军进行过大规模会战，到底有多少取胜的把握，洪承畴胸无成算。但敌军逼到面前，也只有迎敌一战了。洪承畴一面先派小股部队沿海岸抵近锦州，骚扰敌军以缓和锦州被围的势态，一面亲自统率山海关附近的各路官军出关进驻到宁远，随时准备对清军进攻。因为仍然感到兵力不足，他还上报朝廷，要求把京畿附近的几支部队火速调至宁远。

当洪承畴正在宁远集结兵力的时候，锦州的守城局势却越来越严峻了。三月下旬，驻守在锦州外城的蒙古军将领诺木齐、吴巴什暗中同济尔哈朗联络，准备献城投降。祖大寿发现了这个情况，正要捕杀两个蒙古将领，蒙军却先动了手。祖大寿的亲信部队和蒙古族部队在锦州的内外城之间进行了一场大战，清军趁机攀城而上，把祖大寿部逼进了内城。外城被清军佔领，锦州的城防更显得岌岌可危了。但是祖大寿还是决意固守。五月，他派人熘出围城向洪承畴报告说，城中的粮草还能坚持半年，希望援军不要轻举急战，要用战车步步为营，稳健推进。



吴三桂

山海关外的紧张局势使得崇祯帝也紧张起来，但他从来对军事一窍不通，对于到底如何组织这次重大军事行动完全没有主见。五月十八日，他在中极殿召见了兵部尚书陈新甲，问他应该如何决策，如何安排。陈新甲几个月来一直为宁远方面调兵输饷，很想打一个漂亮仗，煞一煞清军的锐气。他向崇祯帝报告说，现在洪承畴在宁远已经集中了宁远总兵吴三桂、前屯卫总兵王廷臣、山海关总兵马科、玉田总兵曹变蛟、蓟镇总兵白广恩、密云总兵唐通、宣府总兵杨国柱、大同总兵王朴共8镇兵马13万人，军粮军饷也即将运齐。陈新甲以为，明军集如此雄厚的兵力在锦州一带的山海之间狭窄地带同清军进行决战，可以避敌铁骑奔驰之长，是多年来没有过的极好时机，又有洪承畴沉勇机智进行指挥，正可望取得一次大捷。为此他建议以松山为中枢，分兵四路，一路出塔山经大胜堡攻敌西北；一路出杏山绕过锦州由北面进攻；一路出松山渡小凌

河阻敌东侧；一路作为主力直接由松山攻敌南翼。四路合围，聚歼敌寇。

陈新甲号称干练知兵，但这个作战计划却很有些纸上谈兵的味道。他对兵力对比和地理形势的判断都是正确的，却没有考虑到明军战斗力极差这个关键因素。将领懦弱腐败，兵卒士气低落，器械破败，军政紊乱，这好不容易凑在一起的13万大军能够集合起来吓一吓敌人已经很不错了，想要分进合击大获全胜则简直是在做梦。洪承畴身在前线，很瞭解自己部队的这些痼疾，因而一直反对兵部异想天开的作战计划。但崇祯帝听了陈新甲的一番侃侃而谈却十分开心。多年来只是不断接到失利的战报，很少能听到奏捷的声音，如果能在辽东前线一锉敌锋，不但可以出出多次被清兵横扫京畿的恶气，也可以乘胜抽调兵马到中原围剿流贼。这样的前景不正是他多年来梦寐以求的吗？

为了这样美好的前景，他在原则上全力支持陈新甲的方案。但多年的统治经验使得他不像崇祯初年那样急躁和自以为是了，他希望兵部还是能多考虑前方统帅的意见，尽量做到中枢和前线协调一致。陈新甲于是在这次召见后又同内阁几位辅臣以及兵部侍郎吴甡、前兵部尚书傅宗龙一起商议，最后决定派遣兵部职方郎中张若麒到宁远军前作为特派员瞭解情况，参预决策。后来又增派了一个前绥德知县马绍愉，以兵部职方司主事的身份到军前贊画机务。

从这年夏初起，明军几镇官兵先后开出山海关，在松山一带集结，并且在松山附近同清军进行了几次小规模的接触，在石门地区还取得了小小的胜利。洪承畴对这点有限的胜利并不抱乐观态度，仍然坚持持久战的方针，在给朝廷的报告中说："久持松山、杏山以资转运粮饷，而且锦州城守颇坚，不易被攻破。若敌军再过今秋，不但其国内无以为继，就是朝鲜供应的粮饷也不能保障。这就是可以坚守而后再战的策略。今兵部

尚书议战，臣岂敢迁延不前，只是怕粮饷运输困难，鞭长莫及。事关国体，不如稍待，使敌人自困，较为有利。”但已经到达关外前线的张若麒却被几次小胜仗冲昏了头脑，以为可以迅速进军，一举大败清兵。他在向兵部和皇帝递送的祕密报告中痛陈机不可失，希望朝廷立即下令进行决战。

本来就倾向于速战速决的崇祯帝这时候再也沉不住气了，他渴望多年的大捷既然唾手可得，当然不能再作拖延。七月，他密敕洪承畴火速进军援救锦州，伺机重创敌军。陈新甲也在给洪承畴的书信中通报近来有清军再欲由京城以北的长城诸口入塞的消息，威胁说：“阁下督关门一年，费饷数十万，如果锦州之围未解，内地又遭困扰，不入山海则内地空虚，若撤兵辽西则无功而返，怎能对得起皇上，又如何向文武百官解释呢？”在这样急于星火的催逼之下，洪承畴只能全军出动，志在决战了。

七月二十六日，洪承畴在宁远誓师。率本营标兵和马科等部鱼贯东行。但他没有按陈新甲的方案分兵四路，而是把全部力量集中起来，保持着整体优势。全军的粮草辎重则屯集于杏山和塔山之间的笔架山，正好处在宁远与锦州中间的位置。洪承畴这样的安排显然还是从持重方面考虑的，虽然摆出了进攻的姿态，却还是先求自身的稳固，确立一个粮饷充实、队伍整齐的不败之势。二十九日，洪承畴和他的全部军队抵达了离锦州只有十几里路程的松山，当天夜里就抢佔了离锦州五六里的乳峰山西侧，在那里扎下大营。清军的主力正在乳峰山东侧。

八月最初的几天，明清两军以乳峰山为争夺重点，进行了几次激战。由于明军在兵力上佔有优势，洪承畴指挥得当，虽然双方各有损失，明军宣府总兵杨国柱阵亡，但在总的形势上清军较为不利。初二日，明军夺取了清军正红、镶红和镶蓝三旗的阵地。祖大寿见援军大至，也分兵三路出城突围，闯过了两道防线之后在第三道防线上受阻，只得退回锦

州。清军在受挫后採取守势，死守营垒不再出战，同时向沛阳的清太宗急报求援。张若麒立即向朝廷上报了大捷的佳音，崇祯帝见报大喜，更加紧催促洪承畴乘胜急进，务求痛歼。

洪承畴在初战有所收穫之后却更加谨慎小心。在军前贊画的马绍愉建议趁着敌人援军还没有到来之前全力组织进攻，他没有采纳，仍然以坚固对坚固，用营垒同清军对峙。他在乳峰山和松山之间结起七座大营，掘壕设垒，并且命骑兵分驻于大营的东、北、西三面，成为一个巩固的防御体系。但不知为什么，他对于自己的防卫措施却也有一个致命的疏忽。在锦、松、杏、塔这道生命线北侧有一条长岭山脉，不十分险峻，骑兵完全有可能绕山路而过，包抄到松山以西，切断明军的补给线。大同监军张斗曾提出分兵一支驻扎在长岭，防止敌人绕道包抄。洪承畴却傲慢地说："我做了十二年总督，你们这些书生懂得什么！"拒不接受张斗的意见，长岭方面一直没有设防。这一致命的疏忽最后终于产生了致命的后果。

清太宗在接到锦州方面的战报后，立即决定亲率大军驰援，并且打算藉此机会一举消灭明朝在山海关一带的主力部队。他调集各部兵马会集于沛阳，本来准备十一日出发，但因为鼻子出血严重，拖了几天。到十四日，他的鼻衄还没有完全恢復，就带病出徵了。在临行前他召集贵族和大臣，很兴奋地说："朕只是怕敌人听说朕将亲征，会仓促逃窜。倘若上天眷佑，敌兵不逃，朕一定让尔等大破此敌，如同纵犬逐兽，易如拾取，不会过于劳苦。朕所定攻战机宜，尔等慎无违误，勉力识之。"然后先带3000精骑，昼夜兼程赶向锦州。

熟知宁锦一带地理形势的清太宗果然沿着长岭山脉绕到了洪承畴的背后，在十九日，于松山西侧的戚家堡扎营。第二天就命令士兵在明军身后挖掘了3道深8尺、宽丈余的大壕，对洪承畴的13万大军实行了反包

围，并且切断了明军的粮草补给线。同时，他还派其弟多罗武英郡王阿济格率军攻击笔架山，夺取了明军屯集在那里的12堆粮食。

清太宗这几个有力的军事行动使得本来还算有一点士气的明军一下子蒙了头，将士们人心惶惶，战斗意志立时下降到冰点。洪承畴好像也没想到清军的援师来得这样快，而且一来就绕到自己的背后，只得集中全力先对付身后之敌，希望能重新打通运输线，夺回军粮。二十一日，明军对清太宗的营地发起攻击，虽然兵力佔优势，却没有取胜，有些将领见到清军中大张黄盖（一种标志皇帝身份的伞状仪仗），知道是清太宗来到军中，竟然还没有交锋就溃退下来。

当天夜里，明军召开紧急军事会议，讨论下一步的作战方向。因为军中存粮顶多够维持3天，多数将领都主张先撤回宁远，再图长策。张若麒和马绍愉也同意这个意见。其实即使决意撤兵，也必须先突破清军在西侧的战线，因而总难免要有一番大战。洪承畴此时并不以为自己已经全然陷入困境，所以鼓励诸将说：“诸位立誓报效朝廷，目前正是机会。虽然粮尽被围，应告明吏卒，守亦死，不战亦死，若战或可求生。我决心孤注一掷，明日望诸君尽全力破敌。”决定第二天倾全军进行一场决战。

由于明军在西线的局部上兵力具有绝对优势，进行有组织的决战，至少能够比较顺利地突破清军的包围。但多年来习惯于各行其是又怯懦已极的明军大将们已无心作战，只想着赶快逃回宁远的大本营。在军事会议刚刚结束之后，大同总兵王朴就不打招呼，带着自己的队伍逃跑了。王朴带头一逃，其他几位总兵也不敢怠慢，争先恐后地沿着海岸向西奔逃。清军却早有准备，在明军的归路上设置下几道封锁线，以逸待劳截杀明军。明军在黑夜中毫无秩序地溃奔，人马自相践踏，兵器丢了满地，已经毫无战斗力可言，被清兵杀死的，被自己人踩死的，被逼入海中淹死的不计其数。总算是明军人数太多，清兵屠杀不尽，还是逃脱了

一些人。几个总兵官王朴、吴三桂、白广恩、唐通、马科和接替杨国柱主持本镇军务的李辅明都带着残兵冲出了重围，但王朴、吴三桂等人在从杏山向宁远撤退的时候又遭到清军的阻击，兵士死伤散亡，几乎都成了光桿司令。据清方统计，在短短几天时间里，清军共歼灭明军53783名，缴获了大批的马匹和甲胄等军事物资。

在明军自我造成的一片慌乱中，洪承畴的军令不再起作用，只能望着逃兵捶胸顿足。好在玉田总兵曹变蛟和前屯卫总兵王廷臣以及辽东巡抚邱民仰还没有逃走，洪承畴指挥着这几部人马撤入松山城中，以一万人固守，两万人乘夜冲击敌阵。两军在尖石山地区作战，明军获胜。但天时不利，清军撤退后涨了大潮，把扎营在海边的明军全部淹没，逃出来的官兵又遭清军截杀，最后只有几百人回到了松山城里。洪承畴一下由兵力的优势变为绝对劣势，只得固守松山，等着下一批援军的到来。

两个盛气如虹的兵部代表张若麒和马绍愉在全军大溃退的时候也慌了手脚，逃到小凌河口搭乘海船回到了宁远。喘息初定就向朝廷汇报洪承畴指挥失度，导致大败，以此来逃脱罪责。

朝廷接到松山惨败的战报后，除了大惊失色，已经不知道该做出如何反应。经过了这样长期酝酿，调集如此众多的军队和粮饷，又有着那样巨大胜利希望的一次决战，竟然就这样莫名其妙地变成了全面的失败，崇祯帝为此感到震惊，也更加怀疑天命是否已经真的转移。极度的灰心使他几乎提不起精神来处理棘手的辽东军事问题，因而我们看到，在最需要采取紧急措施对惨败后的辽东局势进行调整的时候，崇祯君臣们却表现出令人不解的动作迟缓、麻木不仁。

被围困的孤城由原来的一个变成了两个，被围困的大员由原来的一个总兵扩大成三个总兵和一位总督、一位巡抚。紧接着，杏山和塔山也都被

清军分割包围起来，山海关外的最后一道屏障宁远城完全暴露在清军面前。山海关防线兵力不足，士气低落，又没有主帅，已经到了崩溃的边缘。这时候，当务之急是设法重新组织援军，先救出锦州、松山等处的被围将士，同时要重新安排山海关——宁远的防卫，这两项任务都应该是十万火急的。但在八月松山战役之后的几个月里，不论是崇祯帝、内阁辅臣还是兵部的陈新甲，都没有在这两个方面提出什么积极的动议。

九、十月间，为了临时解决山海关防线没有军事统帅的实际问题，崇祯帝先后任命杨绳武为蓟辽总督、叶廷桂为辽东巡抚，替代被围困在松山的洪承畴和邱民仰。但这两位新督、抚才力威望都很平常，要收拾残局实属不易。所以崇祯帝还根据兵部的建议，给吴三桂加升提督职衔，让他“收拾残败”，总统各镇残兵，成为武职的军事统帅，并要求他“上紧整顿，徐图再举”。但这个临时的紧急处置又在朝中引起了许多议论，许多人认为6镇总兵一起逃跑，理应治以重罪，现在吴三桂反而得到提升，于法于理都说不过去。但崇祯帝从来对于手握实际兵权的总兵官们不敢过于严苛，何况吴三桂出自辽东军事世家，手下的家丁故部训练有素，是明军中少有的精锐部队之一，在前方军情孔急的情况下更不能得罪。就是其他几位逃跑的总兵，朝廷也一概没有处理，唯一例外的是带头先逃的王朴，因为影响太坏，而且他已经成了没有实力的光杆总兵，被逮捕进行审问，到第二年被斩首。

朝廷不顾廷臣议论纷纷，任命吴三桂为临时军事统帅，要他“徐图再举”。至于如何再举，崇祯君臣们却一直没有想出一个可行的办法。崇祯帝为辽东的军事问题召开过几次御前会议进行讨论，兵部只是强调“宁远现在有兵三万，巡抚、总兵都很得力”，宁远的防务可保无虞。而对于如何解救松、锦四城的围困却根本不提具体意见，好像那是一个应该由总督、巡抚们自己见机而行的小问题。兵部对这个棘手的大事避而不谈，

刚刚復职不久的首辅周延儒和他的内阁同僚们就更不愿搅进来。周延儒初回内阁的时候，有一位关心国事的老将军曾拜见他，对他说：“相公入朝，愿首先以松山为急务，那是关系到国家安危的，松锦一失将无所措手足。”但圆滑的周延儒见到事已大坏，此前的佈置又同自己无关，就宁愿缩起头来不置一言。至于国家大势如何，那自有皇帝去安排。

崇祯帝却根本不知道应该怎样做出安排。大臣们提不出办法，关外的军事部署也就无限期地被搁置下来，没有人总理其责，也没有任何调集部队支援松、锦的计划，只是听任洪承畴和祖大寿等人的一两万人马被分割在四座孤城中自生自灭。

松、锦四城被围困的明军眼巴巴地企盼着援军的到来，却总也盼不到，守城越来越困难。松山城坐落在一块四周突起的凹地上，全城面积只有0.1平方公里左右，城墙也不坚固。洪承畴带领着一万多明军驻扎在这个狭窄的小城中，粮草殆尽，火药缺乏，要长期坚守几乎是不可能的。清太宗似乎料定了明朝不会再派出大批援军，在九月里就回渖阳去了，留下杜度、多铎、阿济格等诸王主理军务，并且制定了围而不攻，静等城中粮尽自溃的方针。洪承畴也逐渐明白朝廷大概不会派出援军了，曾经先后5次组织强行突围，但都没有成功。天气一天比一天寒冷，城中将士们的心也慢慢凉透了，大家都知道城破只是早晚的事情，眼下不过挨一天算一天罢了。从崇祯十四年（1641）冬到十五年（1642）春，不论是明廷还是被围的明军，实际上只是在静静等待着松、锦四城被最后攻破的那一天。有了这样的心理准备，大家反而不急不躁，变得极有耐心起来。

就这样一直拖到年末，在军事事务方面负有主要责任的兵部尚书陈新甲走投无路，终于又想起了尝试过几次却从来没有成功过的“款和”政策。据前方来的战报说，辽东大雪深丈余，清军寒冷缺粮，想要和谈。从清

朝方面的史料来看，这完全是明朝上下一厢情愿的误传，但这种误传却提醒了陈新甲。尽管此前袁崇焕和杨嗣昌曾先后提出对清用“款”的策略，都遭到了皇帝和朝臣的一致否决，但在目前这样严重的军事危机面前，又根本没有办法调兵遣将，唯一可以试一试的也只有和谈一途了。

其实在更早些时候，前兵部尚书傅宗龙从狱中释放出来出任陕西总督，行前就曾同陈新甲议论过对清媾和的问题，傅宗龙离京前又对大学士谢升谈及此事。到崇祯十五年（1642）正月，谢升感到扫平辽东已经绝无希望，在召对时祕密向崇祯帝汇报了陈新甲的提议。自袁崇焕以通款的罪名被杀，杨嗣昌因提倡媾和遭到朝野上下同声痛骂之后，与清方和谈已经成了崇祯朝议论国事的一个禁区，主战派高举夷夏之别的旗帜，慷慨激昂却拿不出什么可行的对策；而一些对国家形势有比较清醒认识的人明知尽可能同清方媾和是暂时摆脱危机的一个办法，却不敢公然提出来，怕被人指为通敌的汉奸。崇祯帝自己也深受着舆论和传统观念的制约，生怕担当一个向夷狄屈服的千古罪名。但到了崇祯十五年（1642）初，险恶的形势却逼迫着他不得不考虑这一“下策”了。

崇祯帝立即为此事召见了陈新甲，而且表面上摆出一副绝不向“鞑虏”屈服的姿态，对陈新甲切责一番。但陈新甲和谢升却都明白，皇帝进行这次祕密召见本身就意味着他已经对议和的事情感兴趣。因而陈新甲一面谢罪一面申述自己的理由，谢升也在旁边极力劝说：“如果对方真肯议和，和局还是有利。”崇祯帝沉思半晌，才终于表示同意陈新甲的建议，但要求陈新甲一定要机密行事，一切都要暗中进行，千万不能让朝臣们听到风声。

但无所不知的言官们还是听到了风声。有几位御史、给事中去向谢升询问有关情况，谢升对他们说：“皇上力主议和，诸位请一定不要多说。”言官们却为这些话立刻上章弹劾谢升，说他“昌言于众，以暴扬皇

上之过，大不敬，无人臣礼。”崇祯帝为此也十分恼怒。他对于同清方和谈本来就羞羞答答，很不愿意让人知道，很怕被人议论成昏君误国，谢升却一下子把事情搅得满城风雨。按照他一贯的脾气，谢升弄不好就有不测之灾。好在当时他正在一意更始维新，多日来对朝臣的态度出奇地和缓，这一次也只是对谢升大大责备了一番，最后仅仅削籍为民了事。但对于事件中涉及的议和问题，他却一直支支吾吾，顾左右而言他，始终没有表明态度。

身为一国之君，对这样一个事关国家安危的重大问题如此遮遮掩掩，反映了崇祯帝性格方面的致命弱点。而对这一重大决策的这种态度，又从根本上决定了议和不可能取得成功。但从这年年初开始，同清方的和谈还是极其机密地进行了，一切重大事宜都是由崇祯帝亲自筹划决定的，具体安排执行的则是陈新甲。

正月，崇祯帝暗中委派原来在辽东军前贊画军务的主事马绍愉为对清和谈的特使，晋升为兵部职方郎中，特赐二品服饰（郎中官只四品），到关外进行谈判。马绍愉轻车简从，主要助手只有那个无官无职但过去曾与清方多次打过交道的算命瞎子周元忠，一个被除名的举人叫朱良才，再加上由参将李御兰和周维墉带领的一支小小保卫部队，悄悄地出了山海关。当时松、锦诸城被围，只有塔山紧靠宁远，同后方的通路还没有完全断绝，马绍愉一行就进驻到塔山，通知清方有特使前来谈判。清朝方面一直很重视利用谈判取得政治成果，但在围城将要奏效的时候却不愿意因为谈判而贻误军机，所以对马绍愉的使团只是虚与委蛇，派出的代表一个是锦衣少年，一个是鬚髮皆白的老者，比起明朝代表团的阵容也强不了多少。

两个代表团在塔山附近的高臺堡会面，双方表面上都很礼貌，马绍愉还以主人的身份大排酒宴招待清使。但在吃喝之后，清方使节却不愿谈实

际问题，而是首先希望见到明朝皇帝的敕书，以证明明方诚意。明朝因为从来不同夷狄藩属谈判，没有经验，马绍愉出京时并没有带敕书，只得赶忙向京中请示。崇祯帝已经决心和谈，就破例给清朝写了一份敕书，但仍然不能放下天朝的架子。敕书中说：“朕听说渖阳有罢兵息民之美意，但向来沿边督抚没有奏闻。……使朕不能以开诚之心，怀柔远人，如我祖宗朝恩义联络之旧约。”总而言之是表示了对一个野蛮的属国宽大为怀。至于所谓“抚赏”，也就是对清方的经济赎买，崇祯帝同意每年支付47万两，也算是挖心割肉，下了狠心。

清方代表把崇祯帝的敕书送回渖阳给太宗过目，不久有话回来，说敕书同早年明朝诸帝颁发给女真各部首领的封赠敕书样式不一，用印不符，认为是边关大臣伪造的，对敕书中的用语也非常不满。谈判为此暂时中断，马绍愉只得如实向崇祯帝汇报。其实这不过是清方有意拖延的一种伎俩而已，因为时间已到二月，天气较暖，清军已经准备对松、锦诸城发起总攻，收取胜利果实了。

明廷在年初祕密进行谈判的同时，也曾屡次督促新任蓟辽总督赵志完率关门附近各镇兵马援救困在松山的洪承畴。但由于根本没有做出严密的部署，各镇将领又都畏葸不前，救援只是一句空话。洪承畴等人在松山、锦州等几座孤城里困守到二月，已经弹尽粮绝，毫无斗志。二月十八日夜间，洪承畴部下的副将夏成德暗中投降了清朝，作为内应，接引清兵登上松山城。城中大乱，几位大帅各自逃命，但一个也没有逃掉，统统被俘获。清军将巡抚邱民仰，总兵曹变蛟、王廷臣杀死，把洪承畴押解回盛京（渖阳）。而后，又把松山城夷为平地。

松山失陷，锦州的守军失去了最后一点希望，再也无心固守了。三月初八日，祖大寿开城第二次投降了清朝，锦州终于落入清军之手。其后，清军又在四月初九日用红衣大炮轰开了塔山，歼灭城中守军7000余人。

二十一日，炮轰杏山，明守军6800余人全部投降。在短短两个多月的时间里，宁远以东的4座城池全部落入清军的手中。至此，歷时将近一年的松锦战役算是最后结束了。

明军在松锦战役中的彻底失败，是万历末年萨尔浒之战后对清作战最大的一次惨败。在这次战役之后，明朝在辽东边防的精锐几乎丧失殆尽，山海关门也更加孤立空虚。明王朝已经完全失去了在山海关一线同清军相持抗衡的能力，将来如何防御清兵对关门的进犯，成了一个根本没有办法解决的难题。

洪承畴被俘虏到渖阳之后，本来是下定决心以一死来报效皇恩的，一连绝食数日，对来劝降的一律痛骂不止。后来清内祕书院大学士范文程出面劝降，他仍然破口大骂，但范文程只是好言安慰，并且同他谈古论今。谈话之后范文程向清太宗报告说：“洪承畴不会死的。我同他交谈时樑上偶有灰尘落到他的衣服上，他立刻就把灰拂掉。连衣服都还爱惜，何况生命呢？”此后太宗就派人轮番劝降，还亲自去探视，把自己的貂裘送给他穿。洪承畴热爱生命同时又深受感动，也许在松山被围的6个月里还深刻反思过，感到明王朝的灭亡已成定局，而清王朝却正是天命所归。在这种情况下，他最后终于投降了清朝。有一种说法，说太宗曾命爱妾庄妃亲自给洪承畴送去蔘汤，才打动了他。那是小说家言，不足为据。但太宗对于洪承畴确实十分珍视，在他投降后赏赐了大批珍宝，并在宫中演出歌舞百戏为他压惊庆贺。诸将以为这样对一个战俘优待得过分了，清太宗问他们：“我们栉风沐雨，是为了什么？”众人说：“当然是想得中原！”太宗说：“比如行人，你们都是瞎子，现在得到一个引路人，我怎么能不高兴呢？”

洪承畴在清朝入关以后真的成了一个得力的引路人，在为清朝镇压各路农民军和南明抗清力量中立下了汗马功劳。

清朝多了一个得力的引路人，而明朝却失去了一位得力的统帅。在明朝的重臣中，能像洪承畴那样有谋略、有胆识，又有威信的帅才实在屈指可数。松山陷落的消息刚刚传到京城的时候，都传说洪承畴已经以身殉职，崇祯帝深为痛悼。他所特别器重过的军事统帅人才，杨嗣昌、卢象升，还有这个洪承畴，竟然全部谢世而去，谁还能为他支应眼前这个残破的局面呢？痛心之极，他命令在城中大摆祭坛祭奠洪承畴以及邱民仰等人，还决定亲自到祭坛前表示哀悼。但不久却传来消息说洪承畴并没有死，已经被清军带到了渖阳；后来又有情报说，洪承畴已经投降了清朝！这对崇祯帝又是一个沉重的打击。自己一向信任器重的股肱大臣居然投降了敌国，这不但是国家和朝廷的耻辱，也使他本人脸面无光。

在崇祯帝统治的最后一段时期，他的双重人格似乎也发展到极致，经常是一时暴戾狠毒得出奇，一时又温柔和缓得反常。在洪承畴的问题上，他正好表现出温和的一面，只是停止了祭奠活动，却没有按照朝臣们提出的办法，依惯例逮捕严惩洪承畴的全部家属。对于这个反常的举措，他后来颇有些自我解嘲地说：“我是要让洪承畴去做王勐式的人物啊！”王勐是东晋时期前秦苻坚的主要谋臣，因为原是晋朝的子民，曾经劝阻苻坚不要南向攻晋。可惜洪承畴不是王勐。即便真有王勐，在明清之间的战局中又能起什么作用呢？崇祯帝的思路有些天真，也有些奇怪，但他在末年的思路大体都是如此。

兵部的官员们在一番惊慌失措之后，却不敢奢望因为有了一个投降敌人的“王勐”就可以高枕无忧。连下松、锦四城之后，清军主力班师回到渖阳，山海关外的战局暂时和缓下来。陈新甲竭力主张利用这个战争的间歇期继续同清方进行谈判，争取通过一定程度的妥协来换取一段时间的和平，以便对辽东防务进行新的调整。崇祯帝虽然有依靠“王勐”的幻想，却也不能不去面对无情的现实，只得同意再次进行谈判的尝试。

一直逗留在宁远的马绍愉使团接到新的指令，立即同清方联络。清朝当局在战场上取得巨大胜利之后，仍然不愿意放过在谈判桌上再捞取好处的机会，因此表现出很高的姿态，同意马绍愉到盛京来。这年五月，马绍愉一行来到清朝的盛京渖阳。清方按照对待大国使节的礼节接待了马绍愉，诸王、贝勒和主要大臣多次设宴招待，清太宗还亲自接见了他，并且同他商谈了议定和约的一些原则性问题。表面看来，清方并不反对通过和谈达成和平，但在议和的具体条件方面双方却不太容易取得一致意见。清朝以战胜国的姿态，要求明方每年交纳高额岁币，停止对清朝的敌视态度，这些条件明朝还可以勉强接受；但清朝同时要求明方承认双方的国家关系是一种两大帝国间的平等关系，这个要求尽管合情合理，对于崇祯帝来说却万难接受了。

长期以来，明帝国一直自认为是高居于万邦之上的天朝，明朝皇帝自认为是君临天下的万邦之主，从来也不认为自己同边外的“夷狄之邦”是平等的。何况夷夏之辨还是一项基本的儒家理性原则，同“鞑虏”讲平等就意味着丧失原则。崇祯帝对于与清方谈判本身就理不直、气不壮，在这样有关君主尊严和国家尊严的原则性问题上，当然不敢随意做出让步。何况，朝臣们还是多少听到了一点信息，都在纷纷攻击陈新甲，说是“堂堂天朝，何至讲款”？崇祯帝就这个问题讯问首辅周延儒，周延儒由于害怕皇帝将来改变主意会卸罪于自己，竟然一言不发。明朝君臣的态度如此，和谈的成败自然可以推断出来。

在另一方面，清朝对于这次谈判也并没有多少诚意。清朝统治者早已经制定了入关伐明最终夺取中原的既定目标，这一次愿意同明朝谈判，无非是在战争的间歇时期不想错过一次在外交上取得利益的机会，本来不抱有太大希望，也没有特别认真对待。对于取明而代之的大方略，清太宗曾经有过一个很生动的表述：“取燕京如伐大树，须先从两旁斫削，则

大树自扑。……今明国精兵已尽，我兵四围纵略，彼国势日衰，我兵力日强，从此燕京可得矣。”既然有这样的方针，和谈无论如何也只是一种权宜之计，不过是从两旁砍斫明朝这棵大树的手段之一罢了。

一方碍于天朝的体制而扭扭捏捏，另一方因为有既定目标而漫不经心，两方面的和谈当然很难取得实质性的成果。马绍愉在沛阳滞留多日，接连不断地向陈新甲汇报谈判的情况，陈新甲密报崇祯帝，崇祯帝再向马绍愉发出指示，两边的信息往返多达数十次，却一直毫无结果。马拉松式的谈判一直拖到六月，因为不可能谈出什么结果，马绍愉使团只得撤回到宁远，但继续同清方保持着接触，并不时把清方的意图报告给兵部和皇帝本人。这段时间，明清双方之间处于一种不战不和的胶着状态中。直到七月间，一个偶然事件才把这种状态打破了。

这年七月里，兵部尚书陈新甲接到马绍愉的一份关于对清谈判问题的祕密报告，一时不当心随手放在书几上。他家的僕人以为是边关来的塘报，就送到了通政使司抄发各衙门。朝臣们一直在关心着对清和谈的事而不知其内幕情况，忽然见到了这份明发“密报”，大为震惊也大为兴奋。言官们开始慷慨陈辞，据理力争款和的不可行，同时勐烈攻击陈新甲主款误国。

这次阴错阳差的大揭祕使得崇祯帝处于十分尴尬的境地。言官们明知和谈有皇帝在后面做主，却把火力全部集中在陈新甲身上，用语严厉尖锐，其中表现的对皇帝的态度也是不言而喻的。崇祯帝在和谈问题上一直不敢理直气壮，就是怕朝臣因此看轻了自己，而这一次陈新甲的不小心却使他成了众矢之的，被放在要遭千夫所指的位置上。他的气急败坏是可想而知的，却又几乎无从发洩，只能一腔的怨毒都倾注到陈新甲的头上。

他在言官攻击陈新甲的奏疏上批旨，要陈新甲自陈回奏。陈新甲却以为和谈大事本来都由皇帝主持，自己并没有什么责任，因而在回奏中非常委屈地为自己大摆功劳，说某事某事，“人以为大功，而实臣之大罪”，一连列举了十来项之多。这种不愿为皇帝承担责任的态度让崇祯帝更为光火，月末，陈新甲终于以弄不清的含煳罪名被抓进了监狱。这实际上是一个无法审理的案子，但刑部主管侍郎东林党人徐石麒恰好是一个坚定的反对和谈派，一向痛恨陈新甲，因而入之以重罪。崇祯帝恼羞成怒，又需要一个替罪羊为自己顶骂名，因而也动了杀心。首辅周延儒等人多次营救，引用律条说：“依据国法，敌兵不临京城，不当杀大司马（兵部尚书）。”崇祯帝却回答：“别的不说，陈新甲任兵部期间，宗室亲王、郡王被流贼屠戮的有七人之多，难道不有甚于敌兵临城吗？”

洛阳、襄阳等处失陷，福王、襄王等亲藩遇难，都是一年以前的事情，如果以为兵部尚书有责任，早就应该处理，何必要等到和谈的情况败露之后呢？崇祯帝的这个藉口连最煳涂的人也不能相信。但在朝臣群起反对和谈，皇帝又决心杀人洩愤的形势下，陈新甲还是被判处了死刑，并且在九月就被处决。担任谈判代表的职方司郎中马绍愉不久也被削籍。陈新甲事件发生以后，对清方的和谈也就彻底中断，没有人再敢提起同清方谈判。直到两年后明朝覆灭，南明弘光政权才又派出使团乞求和平。但那个时候，已经佔领北京，正要席捲中原的清王朝已不屑于同残破的南明小朝廷和谈了。

明清间本来没有什么成功希望的和平谈判因为一次技术性的小事故而最终流产，说明了谈判本身基础的脆弱可怜。但停止和谈接触，对于明王朝来说，不但意味着失去了通过政治方式争取暂时和平的最后一线机会，而且也失去了通过接触瞭解敌情的唯一渠道。这以后，崇祯帝和他的朝臣们只能在一片黑暗中提心吊胆地等待着不知何时就会降临到头上

的沉重打击。紧张，惶惑，又无可奈何。

矗立了近300年的帝国大厦风雨飘摇，距离一朝倾覆的日子不远了。

卷伍 生于末世运偏消

一 绝处图强

在风雨飘摇中，崇祯帝迎来了他即位后第15个新年。

天下形势大坏，而且比以往任何时候都坏。李自成和罗汝才的农民军正在围攻河南省城开封，从南阳调来救援的明军还没有接近开封城就全部投降，城里的官兵只能凭藉城池的坚固死守。洪承畴正率所部残兵株守在松山、锦州等几座孤城中，只等着清军最后总攻破城。全国性的大饥荒还在不断蔓延，河南、山东方面传来的消息说，各地都在以人肉为粮，至亲好友都不敢轻易相互看望，怕被对方吃掉。饥民们为了填饱肚子铤而走险，人心思乱，一首让统治者听了毛骨悚然的民谣在到处传唱：“吃他娘，喝他娘，大家开门纳闯王，闯王来时不纳粮。”国家的财政情况继续恶化，接二连三的加派抵消不了连年用兵的巨大军费开支，国库已经彻底空虚，到崇祯十四年（1641）底，户部能够直接支配的银两所剩无几。但不论朝中还是地方上的文武官员们却丝毫也没有表现出要振作起来复兴图强的意向，文官们一如既往地贪污纳贿、榨取钱财，而且为了各自的利益相互勾结、相互排挤、相互咬噬，把朝廷搅得天翻地覆；各地握有重兵的大将们则把军队当成了自己的私人财产，常常为了保存实力而临阵脱逃或是根本不听调遣。

崇祯帝已经做了15年皇帝，而且15年来他真可谓殚精竭虑，朝干夕惕。得到的却是这样一个结果，他感到悲愤、沮丧，甚至非常委屈。他哀叹时运的不济，痛恨朝臣的腐败无能，但身为帝国的最高统治者，他却不能不独自挑起挽救危亡的重担。在新年伊始的时候，他再一次下定了奋

发图强的决心，要通过不懈的努力来改变命运，改变帝国的面貌。

为了表现出更始维新的气象，崇祯帝在接受了崇祯十五年（1642）的新年朝拜之后特地在皇极殿召见了内阁的全体成员。周延儒、贺逢圣、张四知、魏炤乘、谢升、陈演六人在殿檐下行过叩拜礼之后，崇祯帝吩咐他们在殿内西侧排班。因为根据朝仪文臣通常都是在东侧朝见，周延儒等人一时有些摸不清皇帝的意思。后来才知道，皇帝让他们在西侧召对，是按照民间把家庭教师称作“西席”的惯例，以示对阁臣的尊重。这次召见的形式的确是史无前例的，崇祯帝走下宝座，面向西站着对阁臣们很客气地说：

“古来的圣明帝王都崇尚师道，至今天子称讲官为先生，仍然是自古尊师的遗意。卿等就是朕的老师，今天正旦的日子，应当行礼为敬，就教于各位先生。”说罢躬身向阁臣们拱手一揖。

阁臣们哪里见过皇帝向臣子作揖的，全都受宠若惊，感动得泪流满面，只能跪伏叩头不已。

崇祯帝接着说：“经书上说‘修身也，尊贤也，敬大臣也，体群臣也。’今天朕行此礼，本来也不过分。自古君臣志同道合，天下没有不能平治的。今后执掌政务，在各部院；主持决断，在朕自身；调和于其间的就靠各位了。”

当天，崇祯帝又正式发出了成文的上谕，检讨自己“深惭德行浅薄，才识庸常，恐忝居君师之位”，并且对阁臣们寄予重託，说是“今而后，道德惟诸先生训诲之；政务惟诸先生匡贊之；调和燮理，奠安宗社，万民惟诸先生是赖”。

皇帝在大年初一的这一番举动，在朝中引起了强烈反响。阁臣们由于受

到皇帝的礼遇而感激涕零，而沾沾自喜。其他的大臣小臣中也颇有一些人以为皇帝这一番表态标志着今后的一番振作，很有些兴高采烈。许多人上疏表达了自己的欣喜之情和对未来的乐观态度，有人甚至说，今年元旦之日适逢瑞雪，京城的米价因而下浮，这正是皇上锐意图强的精神感动了上苍，是太平盛世将要出现的兆头。

这年的正月，由于皇帝异乎寻常的举动，也由于新春佳节欢乐气氛的感染，京城里一直瀰漫着一股相当盲目的乐观主义情绪。正月十一日深夜，崇祯帝到城南的天坛主持了例行的祈谷礼。（原礼久废，上年始恢復。）正值这天又下起了鹅毛大雪，“瑞雪兆丰年”这句谚语正好给皇帝亲临祈祷丰收的祈谷礼做了註脚，让朝臣们感到上天好像真是又在重新垂青于这个摇摇欲坠的王朝了。当天晚上，天坛里万灯齐明，映照着一天的雪片，银光灼灼，崇祯帝身着素服，踏雪步入祈谷坛，对着昊天上帝的神主行了二十四拜的庄严大礼。在肃穆的鼓乐声中，每一个参加礼拜的人都感受到一种与苍天神圣无比近切的神祕体验，感到一股油然而生的自信。

皇帝、臣子，以至于京城的百姓们，似乎都把重建太平盛世的信心建立在神的佑护上。一个已经有200多年历史的盛朝是不应该这样没来由地削弱下去以至消亡的，一个仰承天眷的圣明天子也不应该毫无道理地失去上天的宠信。

接下来的上元灯节也过得红火非常。一年一度的东华门外灯市显得特别热闹，八方商贩毕集，摆摊的，挑担的，出售各种古董玉器、书贴字画、彩灯香烛、烟花鞭炮、时鲜蔬果、日用杂物；卖小吃的摆出来热切糕、艾窝窝、爆肚、炒肝、羊头肉。京城里上至达官贵人，下至贩夫走卒，甚至十里八乡的农民，都赶来灯市凑热闹，人头攒动，拥挤不堪。正月十五这天晚上，宫中还放了烟火。内官监火药房制作的花卉烟火堪

称一绝，点燃以后有兰、蕙、梅、菊、木樨、水仙各种样式，哧哧地升上夜空，嘭嘭地炸开，闪烁如生。崇祯帝特别喜欢水仙，就让多放，一时金盏银盘漫天飘曳，只是没有那股袭人的幽香。

二月里，崇祯帝又按照古礼，亲自参加了为振兴农业而举行的耕籍仪式。这耕籍大典也是多年搁置不行，几代皇帝都忘了自己还有带头春耕为天下作则的义务，崇祯帝即位以后因为政务繁忙，也只在崇祯七年（1634）举行过一次籍田典礼。现在要振兴国家，首先要以农为本，耕籍的典礼不能不用心恢復。

耕籍仪式是在先农坛举行的，祭坛上用黄色绸缎架起幄帐，帐中供奉着先农神的牌位。崇祯帝按照周代的仪礼换上了皮弁和绛纱祭服，在先农牌位前恭恭敬敬地揖拜，而后再更换翼善冠和黄袍，来到名义上专门由天子耕作的御田，亲自操作。天子的耕田仪式热闹得如同一臺大戏。在御田四周，国家歌舞团教坊司的优伶们扮作农人模样，衣饰灿然，载歌载舞，忸怩作态，装作在春耕中酒足饭饱心满意足的样子。合唱队在琴瑟声中高唱着不知从什么时候传下来的《禾歌》，还有人打扮成各路天神，翩翩起舞。两个所谓的老农为皇帝牵牛，另外两个人为皇帝扶犁，崇祯帝则右手执鞭，左手秉耒，装模作样地耕完了一垄田地，再由顺天府尹代皇帝在垄中撒下谷种。皇帝的仪式完成之后，周延儒等内阁大学士、吏部尚书李日宣等各部尚书、定国公徐允祯等勋臣又照样耕作了一垄，典礼才告结束。而后是摆酒设宴，全体参加仪式的成员大嚼痛饮一番。

崇祯帝对于这次耕籍礼并不满意。因为整个典礼像是民间的一场社戏，相当粗俗，而且鼓乐歌舞都是乱糟糟的，显然没有经过严格的训练。在这场典礼中他丝毫也没有找到在祭天、祈谷中那种超凡入圣的感觉，只是觉得乱哄哄的，非常无聊。他为此对礼部提出了批评，说教坊司扮演

的黄童白叟鼓腹讴歌，过于俚俗粗鄙，祭乐舞容也不像样子，礼部连忙提出了今后的改进办法。这一场多少有些无趣的闹剧也使得崇祯帝稍稍清醒了一些，天道远，人道弥，依赖神灵的佑护毕竟是不大靠得住的事情，真要復兴国运还需要靠自己的努力。

春天很快过去了，上天确实并没有显露出特别垂佑的迹象。黄河流域和畿辅地区都发生了严重的春旱，收成无望；江淮地区的旱情也在蔓延，有些地方因为缺水根本不能插秧，只好把水田改作旱田。中原和西北地区已经飢饿了十几年的百姓们纷纷参加暴动，就连一向治安比较稳定的南直隶（今江苏、安徽）和浙江也出现了饥民揭竿而起的事件。在饥民的嗯应下，李自成等部的农民军的攻势更勐。一月间，陕西三边总督汪乔年率3万大军出潼关进入河南剿杀李自成农民军。汪乔年这次出师颇为踌躇满志，因为在不久前他刚刚指示米脂知县边大绶把李自成的祖坟掘毁，破坏了李家的风水。他在听到边大绶报来的喜讯时高兴地说："知闯墓已伐，可以制贼死命。"以为此战必胜。可惜最后被治死命的却是他自己。二月，两军在襄城激战，汪乔年部几乎被全歼，他本人被生擒后杀掉。三月，李自成部又攻克了豫东的大批城镇。张献忠部则在皖北一带活动，于四月攻佔舒城，并改舒城为得胜州，设立六部尚书等官职。豫、皖两地的民众对农民军热情欢迎，许多地方的百姓刑羊载酒犒劳农民军。

四月里，松锦之战终于有了大结局，松、锦、塔、杏四城全被清军佔领。这虽是意料之中的结果，但败讯初闻，还是让崇祯帝感到一种不寒而慄的震惊。震惊之余他唯一的办法是向内阁和全体朝臣发佈了一道上谕，再一次宣佈要"治理维新，廓然更始"。在这道上谕中他作了少有的自我批评，说自己"求治之心虽然殷切，实施政令却不得要领"。所以"虽有深切忧民之心，却不能将恩德普施于天下。致使村社凋敝，灾害频

仍，兵火纵横，中原涂炭。……这些全是朕德化不敷，声灵不振所致”。为了弥补这些过错，他决定再一次下诏罪己。但接受了以往的教训，他也提出了“空言无补”，觉得应该在罪己诏书中提出一些切实可行的能够解决问题的措施。至于如何解决问题，他已经想不出什么特别有效的办法了，因此他要求各部门的大臣、小臣，“凡有可以利民之事，救时之方，裨助政治之规条，弥补朝廷之缺失者，须实实开列项款，送内阁匯奏”。他表示要把其中确有意义的内容採入到自己的罪己诏书中，并且见诸实施。

皇帝在这道上谕中所表达的急于求治的诚意和深切的自责精神是前所未有的，由于上谕是公开向群臣发表的，而且通过邸报很快就传遍了天下，因而确实在一部分臣民中引起了一些震动。但这种震动同崇祯帝本来希望的某种戏剧性效果比起来就远远不够了。一些朝臣上疏说了些感动激奋的话，一些朝臣对朝廷面临的严峻问题提出了些应急的办法。但那些办法仍然是迂阔无用的居多，切实可行的极少，因而朝廷的大事还是在一天天坏下去。

陕西总督汪乔年在襄城被俘身亡后，一直作为围剿农民军的主力之一的西北军没有了统帅。崇祯帝在认真斟酌了可能的人选之后，决定重新任用原陕西巡抚孙传庭。

孙传庭自崇祯九年（1636）出任陕西巡抚起开始主持一方的围剿，而且表现出不同寻常的干才。但这位能干的统帅又是一个极其傲慢自负的人，也是少数敢于抵制崇祯帝的自作聪明的大臣之一，因而很不讨崇祯帝的喜欢。为此他付出了代价，崇祯十二年（1639）先是被撤职，而后又被逮捕，关在刑部的天牢中，一关就是两年多。直到崇祯十四年（1641）末，首辅周延儒几次提出孙传庭人才难得，希望皇帝能赦免孙传庭委以重任。崇祯帝也感到几个堪为任用的军事人才如杨嗣昌、洪承

畴、傅宗龙等人死的死，被困孤城的被困孤城，也确实亟须像孙传庭这样的人，因而将他开释，起用为兵部侍郎。他还在文华殿召见了孙传庭，向他讯问平定内乱的方略。孙传庭对于天下大计从来有一套自己的见解，对皇帝侃侃而谈。大概是因为在狱中关得久了，不瞭解天下大事已经败坏到何等地步，也不知道农民军的实力已经远远超过当初，他还在皇帝面前夸下海口说，只要有5000精兵，就足以破贼。崇祯帝是第一次单独召见孙传庭，很有些相见恨晚的感觉，立即命他率领京营部队前去解救正在被围困的开封。李自成却已经自解开封之围，转而攻打堰城、襄城，消灭了汪乔年部。在这种情况下，也只有一个孙传庭最合适担当陕西总督的重任了。

这时候在中原对付农民军的名义统帅是7省督师丁启睿，但此公庸碌无能，任职以来毫无作为。崇祯帝任用孙传庭，实在是把他当成围剿农民军的中坚人物。孙传庭对于皇帝的信任也颇为感动，入潼关后就召集西北诸将，杀了颇有实力但一直不服从调遣的总兵官贺人龙，把贺部万余人全部收作自己的标兵。各路将领震慑于孙传庭的威严和名望，一时都还驯顺，陕西军团成为当时帝国唯一一支有强大战斗力而又听从朝廷调遣的主力部队。崇祯帝对孙传庭的表现也十分满意，多次降谕嘉奖，并且把一举歼灭农民军主力的梦想全都寄託在孙传庭身上。

在佈置围剿的人事安排的同时，对清朝的和谈也有气无力地继续着，这至少给了崇祯帝一点虚幻的安全感。惊魂稍安，他又集中精神全力抢修帝国朝廷这只千疮百孔的破船。在发佈“治理维新”上谕之后的四、五月间，他接连召见群臣，对各方面的政务进行商讨，提出新的要求。

对付内乱与外患需要大批精兵，就要整顿部队，操练士卒。在这个问题上，他首先想到了京营的禁军，在召集有关官员会议时提出从京营中选拔出5万精兵，重新编营操练。主管京营的兵部侍郎吴甡说：京营本来

就应该是精兵强将，由于承平日久才出现老弱病残充斥、不堪一击的现状，与其重新立营，不如就在京营中裁汰老弱，选练精壮。他还提出了任用得力将领、对士卒进行考核选拔等具体办法。崇祯帝听了很高兴，同意让吴甡照此办理。但这次训练京营的计划后来还是成了一纸空文，到第二年吴甡本人被任命为督师，想要集中3万人马，京营却还是无有可用之兵。

对于让崇祯帝头疼了十几年的财政问题，由于天下民力已竭，开源大体无望，他只能再从截流方面想办法。他针对各地簿籍上有兵额而调用时却没有兵的情况，要求户、兵两部对各处兵丁人数进行彻底清核，以后一律按实有人数支取粮饷，以节约开支。他还要求各地将向来拖欠中央的应缴钱粮迅速结算交清，要户部拿出具体办法。但在朝政一片混乱的情况下，崇祯帝的这两个措施同样没有被执行，财政状况依然在急剧恶化。

除了练兵、理财这样的重大机宜之外，崇祯帝的“新政”还包括一些不太重要却也能显示少许新气象的方面。他要求刑部及各地方官对于全国的在押囚犯进行一次大清理，对那些案情可疑或是情有可悯的案犯或取保假释，或减刑免刑；对于追赃的犯罪官员，大部分可以查明宽免，或全豁，或减半。为了表示朝廷的恩典和对人才的渴求，他还决定增加了各地乡试中举的名额，两京13省共计增额122名。此外，还做了一些礼制方面的改革，均属无关痛痒。

崇祯帝的一番维新尽管迂阔缺乏实效，却也表现出他对于时局的一种紧迫感。他的心比天高，也隐约感到了一种亡国在即的恐惧，可惜他的治国能力实在平庸，虽然着急，虽然努力，却不得其法，终究挽救不了土崩瓦解的局面。中原战场的局势在加剧恶化。五月间，李自成部第三次围攻开封，明督师丁启睿统率各路官军计18万前来援救，但在朱仙镇遇

到农民军就不战而溃。其后，李自成部死死围住开封这座孤城达数月之久，明廷却再也调集不起一支像样的部队来救援解围了。开封城中以河南巡抚高明衡为首的守军依靠着城墙坚固殊死抵抗。不久城中粮绝，居民们靠吃牛皮、皮胶、药材、水草、纸张、马粪挨延时日，最后竟发展到吃死人甚至杀活人吃，饿死的人不下数十万。这座中州古都危在旦夕。

可面对着中原残破的危局，朝中大臣们却手足失措、毫无对策。復任首辅之职的周延儒把大批的东林志士引入朝中，崇祯帝本来对这些号称忠贞，把过去的执政者批得体无完肤的忠臣义士们抱着很大的希望。但重新得势的东林党人在应付国家大难的时候，却同他们的对立面没有什么两样。同样是不思进取，同样是消极推诿，同样是不知所措。开封形势吃紧，许多河南籍的官员敦促内阁快想办法调兵解围。周延儒却说：有什么办法呢，只好放弃开封了。人们对这种回答觉得简直不可思议，开封又不是边疆城镇，放弃了也只是缩小一点疆土，放弃开封就意味着放弃河南、放弃中原，允许一个反叛的国中之国存在。再发展下去，又会意味着什么呢？

当然就意味着亡国。这种亡国在即的不祥之感在朝臣中不动声色地蔓延着，人们还不敢公然点破，也不愿意承认国破家亡的大难就在眼前，但许多人都能感受到帝国的头顶上笼罩着的那片浓重险恶的阴云。与周延儒一同被召还入阁的大学士贺逢圣，因为痛感迴天无术，在这年六月乞请退休养病，得到批准。在临行前崇祯帝最后一次召见了他，并且破格赐宴。在召见的时候，贺逢圣似乎是预感到这就是最后的诀别，突然间放声大哭不止，也不说话，只是跪在地上连连叩头达数十次，哭声震撼殿宇。崇祯帝和其他大臣们都被他哭得莫名其妙，同时不知为什么也被感染得悲从中来，不由得也跟着抹起眼泪，最后终于发展成一曲君臣集

体恸哭的大合唱，场面蔚为壮观。哭够了才想起，竟然不知道为的是什么。

在贺逢圣离开内阁之前，大学士中谢升因为泄露对清和谈机密被削籍，魏照乘、张四知也先后引疾罢去，阁臣中办事的实际上只剩下首辅周延儒和陈演两个人。五月，周延儒和陈演就请求再补充几位阁员，正忙于更始维新的崇祯帝于是依照旧例要求由朝臣会推。像以往多次发生过的那样，这次会推又推出了一场大风波。

会推由吏部尚书李日宣主持，第一次推举了吏部侍郎蒋德暻等13人。崇祯帝以为推举的人太少了选择余地不大，要朝臣再多推举几个人。于是会推又加了10个人，其中包括副都御史房可壮、工部侍郎宋玫和大理寺卿张三谟。尽管在崇祯时期入阁为相是件很艰难的事，大多数人都没得到什么好下场，但朝中的许多大臣对于跻身于相位的极大荣耀还是颇为垂涎，在会推前后有不少人在为自己或为别人积极活动。经过一番活动终于在两次推举中列了名的自然皆大欢喜，而那些花了钱费了力却还是没有被提名的则愤愤不已，就有人制造流言，耸动视听。还有些人对被推举的人素有仇隙，因而也想不平则鸣。所以像每一次会推阁臣之后一样，朝廷中人言鼎沸，关于会推过程中营私舞弊的传说不胫而走，其中有真的，有假的，也有半真半假的，而这些流言通过皇家的各种职业或者业余的密探很快又传进宫中，传到崇祯帝的耳朵里。

传说最多的是后来推举的房可壮、宋玫和张三谟3个人。这3个人都属于东林一派，平时有不少政敌，有人就说此次会推全是由这3人暗中主使，行贿受贿，连通关节，种种不法。而这种说法又不是全然没有根据，宋玫就确实请人打着首辅周延儒的牌子大肆活动过。偏巧次辅陈演因为一个亲戚的升迁问题求助过房可壮，而房可壮却没有买他的账，为此对房可壮衔恨入骨。有一次崇祯帝游西苑（今中南海和北海）的时候

召见辅臣，而周延儒恰巧因病没有去，陈演就趁机把会推的弊端攻击了一番。内有东厂情报，外有辅臣陈言，崇祯帝确信这次会推又是一次结党营私的阴谋。

自这年新春以来，崇祯帝表现出歷来少有的好脾气，对朝臣的态度相当温和，在处理谢升洩密事件和洪承畴投敌事件时也颇为宽容仁厚。在他统治的后期，凡是心态较为积极，想要奋发振作一番的时候，一般都会显得比通常宽厚，也比较能听进不同意见。但这种心态很难保持长久，进取毫无成效，形势仍然越来越坏，他就会由积极的进取变为消沉、破罐子破摔，积郁在心底的刻毒就又会发散出来。将近半年的毫无成效的奋发图强，将近半年的宽和容忍，已经超出了他的心理极限，在这个盛夏时节，他藉着这次会推舞弊事件，把对国事的失望和对朝臣的怨恨一起化作一股怒火，伴着高温酷暑倾泻出来。

六月十九日，他因为毒火攻心得了热病，但还是带病躺在床上在德政殿召见了全体被推举的人员，分别进行谈话。因为对房可壮、宋玫和张三谟有成见在先，召对时的气氛很紧张。宋玫本来是有备而来的，对皇帝大谈了一番九边形势和御敌方略，却被崇祯帝斥责为虚夸浮躁。当天夜里，宫中传出旨来，任命蒋德暻、黄景昉、吴甡为礼部尚书兼东阁大学士，3人全是第一次会推中提名的。中旨同时还指责吏部在会推中滥举多人，要吏部明白回奏。

吏部在回奏中坚持自己是按章秉公行事，至于举荐过多则是遵从皇上的旨意。这就有点揭短的意思，更激起了崇祯帝的愤怒。二十三日，他自己的病情好转，再次在中左门平臺召见内阁和部院大臣。也许是为了让儿子们见识一下朝臣的阴险和狡诈，这次召见他特地带上了太子和另外两个儿子定王、永王。他把吏部尚书李日宣召唤到跟前，声色俱厉地说：

“用人是治国的要害，用人不当，吏部不能逃脱责任。如今天下动盪，而各地督、抚却不断更易，国家怎么能够有治平的希望呢？记得两年前曾经面谕诸臣，有人宁背君父不背私交，宁损公务不破情面。而今还是这样只讲情面，哪能济事？前者会推阁臣，何等重大，怎么也徇情滥举，任意夸扬呢？”

李日宣却十分执拗，不肯承认有徇私的事。崇祯帝又把在会推中负有重责的吏科都给事中章正宸和河南道掌道御史张瑄召来痛责，两个人同样不屈。李日宣还说：“臣事皇上十三年，精白一心，若有一丝徇私背公，今日文武诸臣俱在，皇上可一一询问，廷臣可一一参奏。”弄得崇祯帝竟一时无话可讲。冷场了好一阵，崇祯帝才命锦衣卫把李日宣、章正宸、张瑄和房可壮、宋玫、张三谟全部拿下，送刑部问罪。6个人不久都受到制裁，李日宣等3人戍边，房可壮等3人革职为民。

俗话说吃一堑，长一智。崇祯帝自登基以来，发生过那么多次会推阁臣的风波，而且每一次的基本模式又全都一样，但他显然没有从中总结出什么有教益的经验和教训。每一次都是群臣竞进相互倾轧，每一次都是他自作聪明大破情面朋党，最终却不免落入另一些情面朋党的套中。在每一次风波之后，朝臣的结党营私并没有稍许收敛，而君臣之间的隔阂和隐含的敌意却在加深。在半年来的一意维新中，他的脾气刚刚有点好转，这一次却又故态復萌了，几番振作刚刚在人们心中煽起的一点热情也从此冷却下来。

会推风波给朝中君臣带来的不愉快还没有来得及被时间冲淡，一个个丧气的事件又接踵而来。七月中旬，崇祯帝一直钟爱的田贵妃病故，引起了崇祯帝极大的悲痛。田贵妃身体本来瘦弱，自前年幼子悼灵王死后就一直郁郁不乐，病不离身，这年入夏以后竟然一病不起。崇祯帝心中最喜欢的女人还是田贵妃，因而对她的病非常惦记，不但吩咐宫中御医悉

心调治，还亲自在宫中各处庙宇的神祇面前恭敬祷祝，为她祈福。但田贵妃的病还是一天比一天严重，那一天崇祯帝正在一处殿堂行香为她祈祷，承干宫里突然传来消息，说娘娘情况不妙。崇祯帝连忙赶到承干宫的时候，田贵妃已经玉殒香消，两个人竟然没有来得及作最后的永诀。崇祯帝望着这位陪伴了自己十几年的爱妾的遗体，忍不住放声大哭，把对田妃的伤悼和多年来压抑在心底的委屈、怨恨都化作滂沱涕泪。

极度的悲痛几乎又使他大病一场。但在依照仪礼辍朝3日之后，他还是强打着精神恢復了正常的政务活动。首先，处理田贵妃的后事就是一项重大政务。礼部和司礼监根据皇帝的意愿安排了隆重的丧礼，还为田贵妃拟定了一套高贵美丽的谥号，叫作“恭淑端慧静怀贵妃”。工部和内官监星夜组织人力为贵妃修造坟墓，地点选在昌平皇陵区域内的银泉山，施工虽然仓促，但按照皇贵妃的规格，墓圹、墓园都还算宽敞精緻，崇祯帝基本满意。他当然做梦也不会想到，田贵妃的这座坟墓将来就是他自己的长眠之地。

京中的士大夫们对于宫中这位几乎专宠的田娘娘早有耳闻，因而对她的盛年早逝也大都唏嘘不已。直到两年以后，国破家亡，明朝的遗臣们回想起田贵妃的早亡，才又慨嘆她的死与其说是不幸，不如说是万幸。诗人吴伟业在他那首着名的《永和宫词》中追咏此事，也情不自禁地吟出“倖免玉环逢丧乱，不须铜雀怨兴亡”这样的诗句，庆幸她没有像唐代的杨贵妃那样在丧乱中惨遭杀害，也没有像曹魏末代后妃那样成为亡国臣妾。比起在两年后仓促自尽的周皇后来，她毕竟是寿终正寝的。

不知是出于怎样一种心理，在田贵妃死后不久，一向在生活上比较严于律己、疏于声色的崇祯帝忽然提出要增选一批宫嫔，还提出要求，“良家子女年十四以上、十六以下，必德性纯良，家族清白，容貌端洁者，方许与选。”朝臣们对此颇不以为然，觉得国难当前，万机待理，皇帝却忽

然把心思放在女色上，实在是有失为君之德。阁部大臣和言官们一面委婉地劝诫，一面故意拖延，从秋天拖到第二年春天，崇祯帝不好意思为这件事同朝臣翻脸，最后只得不了了之。

有一种说法认为，崇祯帝这次选嫔，其实是专为田贵妃的妹妹而发。田妃这个小妹据说叫田淑英，相貌气质都同姐姐接近，当年曾经进宫，很得崇祯帝的欢喜。他还把一枝花插在小姑娘的头上，并半开玩笑地说："这是我家的人了。"如果真是为了这个缘故，那么这次选嫔主要还是体现了一种对田贵妃的思念。当然也不能排除他在多年的振作、失败，终致心力交瘁之后，一时产生了自暴自弃的心理。歷史上陈后主、隋炀帝、李后主一类亡国之君，不就是置国家大难于不顾，纵情于声色的吗？但他又终归不愿意做一个亡国之君，因而自暴自弃发洩了一番之后，他只好再重新振作起来，投入到无止无休的烦乱政务之中。

紧接着就出了陈新甲洩露和谈机密的事，于是陈新甲倒了大霉，崇祯帝自己也更加郁郁不乐。到了九月，中原的战局又有新的发展。开封守军被李自成围困了4个月，内无粮草，外无救兵，竟然想出一条"奇计"，要掘开黄河大堤水淹农民军。高明衡和巡按御史严京云组织人力挖掘朱家寨口大堤，农民军得知消息，移营高阜，反过来也派人挖掘马家口大堤以灌开封守军。当时秋高水急，九月十五日夜，汹涌的黄水决堤而出，整个开封城全被淹没，城内外居民淹死无数，农民军也有一万余人在洪水中遇难，开封城中只有高明衡等一批高级官僚和周王的家眷乘船逃生。

大水后，开封这座有过数百年繁荣的中州古城变作了一片汪洋，明廷也失去了在中原地区对抗农民军的最后一个堡垒。这时候，对于崇祯帝来讲，唯一可恃之军只有陕西的孙传庭部了。但孙传庭莅任才只半年，实力薄弱，一贯的战略思路是拥兵拒守陕西，不愿出潼关作战。早在六月

间，开封被围，崇祯帝多次催促孙传庭赴援，孙传庭强调兵饷不足，无法出关作战。崇祯帝回想起当初廷对的时候孙传庭夸下的海口，指责他说："原议练兵五千可以破贼，何以又说需练兵二万，兵饷百万？"催促他"但有一月兵饷，便当卷甲出关，共图扫荡歼敌。"孙传庭无奈，只得于九月出兵，但进入潼关的时候，开封已经被水淹没。李自成部撤离开封后，挥军向西，也决心一举歼灭明军中最后一股强敌。

十月初，两军大战于河南中部的郏县。最初农民军进入了明军的埋伏圈里，失利战败。但明军为了抢夺农民军的辎重自己乱作一团，外围的农民军罗汝才部趁机冲击明军，明军大溃，农民军反败为胜，斩杀明军数千名。孙传庭在郏县一战中大伤元气，只得退回潼关。李自成乘胜再一次攻佔洛阳以及周围州县，在河南省黄河以南的广大地区站稳了脚跟。至此，明廷对于中原一带声势浩大的农民义军，不但毫无办法去剿除歼灭，就连正面与之对抗的实力也没有了，只能眼看着它的力量不断壮大。

一心想在旁侧砍斫明王朝这棵大树的清朝统治者也十分关心中原的形势，就在明王朝被农民军的攻势打得透不过气来的时候，又发动了新的一轮"从两旁斫削"的行动。十月，清太宗派多罗饶余贝勒阿巴泰为奉命大将军，再一次统率八旗劲旅出兵徵明。清太宗充分注意到农民军这股势力，在阿巴泰等人出发前特别叮嘱："如遇流寇，要对他们说：你等为明朝政治紊乱，激而成变。我前来征讨，也正为此。"他要求军士要善待农民军，不可与农民军结下仇怨，如果对方愿意派使者或有书信交送，一定要妥为接洽。

阿巴泰的十万大军在十一月上旬分左右两翼分别由抚宁北面的界岭口和蓟州北面的黄崖口攻入长城，接着轻易地拿下了迁安、三河、蓟州等重镇。这是清军第五次进入内地，第四次兵临京师城下。明朝为了防范清

兵，此前在山海关至北京一线设置了辽东、山海、昌平、保定四个总督，宁远、永平、顺天、密云、天津、保定六个巡抚，宁远、山海、中协、西协、昌平、通州、天津、保定八个总兵官，大帅如云，防兵如蚁。但由于事权不一，将帅怯懦，士气低落，这些分属于督标、抚标、镇标的明军根本无法有效地调集起来对付清军。各路兵马或是没遇见敌军就先行逃窜；或是故意避开敌军的正面攻势，远远地逗留观望；或是保持距离跟在敌军屁股后面，充当清军的收容队。因而清军这次入关最为轻松，几乎从来没有遇到过任何抵抗。

清兵临城的时候，崇祯帝和他的朝臣们又一次大为恐慌，一面下诏要各路部队勤王入卫，一面临时抱佛脚，紧急推举堪任大将的人才。只是这时候，京城周围根本就没有能够起作用的援兵，朝中也再没有可以任用的军事人才了。好在清军只是从京城边上擦身而过，就向京南一带进军，崇祯帝这才松了一口气。

但这接连不断的打击和失败还是让崇祯帝感到了极大的沮丧。早在四月他就提出过要第二次下诏罪己，以邀民心，以邀天眷，但一直没有实行。到了中原残破，清兵横行，朝政紊乱，财匮民飢的闰十一月，他在极其无奈的情况下终于第二次颁发了罪己诏书。由于第一次罪己其实只是以上谕的形式下发的，这也可以说是他第一次正式以诏告天下的方式公开罪己自责。

诏书中说：“近来灾害频仍，干戈扰攘。醒来就想到祸乱，日夜不能安宁。这实在都是朕的无德所致啊！罪在朕自身，不敢自我宽容。自今日为始，朕敬于宫中默告上帝，修省戴罪视事。务期歼胡平寇，以赎罪责。”在这一套听起来沉痛深刻其实毫无实质性内容的自我批评之后，诏书中又对朝臣的“挟私偏执、更端争胜”种种情弊大加挞伐了一番，最后要求群臣“各知勉励，无负朕罪己求言、克艰图治至意”。

他已经没有能力控制这个局面，只好希望百姓们能振作起来，群臣能振作起来，也希望苍天能振作起来，重新福佑他的王朝。但还没等群臣们真的振作，他的自尊心却已经因为公开罪己而遭受了破坏性的打击，难以自拔了。像6年前第一次罪己之后的情况一样，他再一次陷入自责—惭愤—发泄的泥潭中，顾不上国势的衰微，顾不上军情的急迫，只有一种惩治朝臣以挽回心理平衡的冲动。

这一次最先撞到他枪口上的是两个下级官员，礼科给事中姜埰和行人司司副熊开元。

姜埰见到皇帝在罪己诏中号召群臣直言国是，又见到诏书中指责言官“挟私偏执、更端争胜”，“或代人规卸，或为人出豁，种种情弊，难以枚举”，因而上疏表示了自己的不同意见。他认为皇帝对言官的指责实在是言过其实了，所以在疏中说：“若说‘为他人关说解脱罪责’，怎敢说绝对没有这种事？臣独辗转而不得其解的，是皇上了解了哪些情况才这样说？”接着又告诫皇帝，不应该听信流言蜚语，钳制言官之口。

姜埰的奏章口气比较强硬，有几处诘驳问难，简直是在同皇帝辩论。正有一肚子邪火没处发泄的崇祯帝见到如此不恭敬的本章，立时火冒三丈，当即命令：“姜埰革了职，锦衣卫拿去北镇抚司着实打问。”姜埰于是被锦衣卫抓入诏狱，严刑拷打逼供，追查背后的同谋和主使。

熊开元的问题比较复杂一些。这位老兄是天启五年（1625）的进士，释褐近二十年，资格很老，但仕途不顺，几经升降，直到此时还只是一个从七品的小京官。他为了宦途前程曾经拜会过首辅周延儒，请求周延儒施加影响给他一些特别照顾。但那天恰巧周延儒有急事，只是礼貌性地见了他一面，没听他说明情况就把他客客气气地请了出去。这件事使他大为光火，决定不惜代价参劾周延儒一下。

正巧崇祯帝下罪己诏并徵求朝臣和平民直言，熊开元就在会极门报名，要对皇帝陈述有关事宜。崇祯帝第二天就在文昭阁接见了熊开元，但因为内阁的大学士们一直都在皇帝的身边，熊开元临阵胆怯，没有敢攻击周延儒，只是对当时的军事形势发表了一点不着边际的议论就告退了。但他既然已经下了决心，不狠狠咬上週延儒一口心中总不痛快，所以过了十来天，又再一次请求召见。

崇祯帝这一次是在德政殿召见他，辅臣仍然陪伴在身旁。他只得说："《周易》中言，'君不密则失臣，臣不密则失身'，请辅臣们暂时退避一下。"周延儒等人赶快请求迴避，崇祯帝却不允许。熊开元只好硬着头皮说："陛下登基以来，辅臣用过数十人。陛下以为是贤人，陛下左右以为是贤人，但群臣和天下人未必以为是贤人。辅臣是天子的心膂股肱，而轻易任用，致使庸人在高位，相继为奸，因此才天灾人祸没有止境。等到言官揭发其罪状，再诛杀斥退，却已经无补于事了。"

崇祯帝觉得这番空论中必然暗有所指，就一再要他言明。他却一面否认，一面用眼睛瞟着周延儒。周延儒这才知道熊开元原来是为着自己而来的，立即表示自己昏聩无能，请求罢免。崇祯帝却对面前这个小人物的畏畏缩缩、吞吞吐吐很有些反感，仍然坚持让他当面启奏。熊开元却正话反说："陛下要大小臣工不时面奏，而让辅臣不离左右，谁敢提出不同意见为自己招祸呢？何况当年的辅臣，繁刑厚敛，屏弃忠良，因而贤人君子攻击他；而今辅臣奉行德意，释放积囚，豁免欠赋，起用废籍，贤人君子都是他引用的，即使心中偶有不平，也只好私下里慨嘆一下而已。"

崇祯帝见他明明要攻击的是周延儒，说出话来却阴阳怪气小人气十足，非常恼怒，厉声让他明言所指。熊开元却一直遮遮掩掩、指桑骂槐。崇祯帝不愿听他混扯，命他退下把要说的话写在本章里奏上。

但周延儒毕竟势力庞大。熊开元在这次被召见后听到了许多好友同乡的劝告，都以为周延儒在历届首相中还算是宽和老成的，攻劾周延儒绝非明智之举。本来就首鼠两端犹豫不决的熊开元因此锐气全无，在补奏的本章中只是把召对时说过的话又复述了一遍，“只就臣次第所奏，恭列上闻，臣奏云：……”

正在为清军的兵临城下而焦虑烦躁，又为罪己自责而悒悒不乐的崇祯帝见到熊开元这样一份毫无内容的补牍，觉得简直是在被这个小人耍弄，大怒，立刻派锦衣卫把熊开元抓起来，送北镇抚司严刑拷问。

姜埰和熊开元在朝中不过是两个小人物，所谓“罪状”也不过是在皇帝徵求直言的情况下说了几句不相干的话，并非在重大国策上同皇帝及首脑集团有什么根本性牴牾，却被皇帝当作国家大敌，鉅奸大恶，送进最黑暗的锦衣卫镇抚司狱中严刑逼供。朝臣对皇帝这种没来由的暴怒议论纷纷，也颇为姜、熊二人不平。周延儒由于熊开元的入狱是为攻劾自己而起，更是深感不安。在闰十一月二十九日的一次御前会议上，言官和部、阁大臣们相继为姜埰和熊开元开脱申辩。以道学而名满天下的左都御史刘宗周说的最为恳切：

“朝廷待言官自有体制，言官进言，可用则用之，不可用则置之，即使有应得之罪，也应敕下法司，据情节定罪。如今熊开元、姜埰狂躁无知，不能无罪。但目前皇上急切求言，而二臣因进言下诏狱，于圣政国体大有伤害，恐非皇上求言的本意。臣愿皇上俯念时事艰危，放开如天一般宽宏的度量，以开闢诸臣诤谏之路。”

但崇祯帝听了这番话却觉得极为刺耳，以为明明是在讥讽自己度量狭窄，滥用私刑。他大发雷霆，强词夺理地说：“三法司、锦衣卫都是朝廷的衙门，有什么公私之分？你说言官自有体制，难道贪赃坏法、欺君罔

上、混乱纪纲的，通通都不该问罪吗？”“熊开元这疏，定有人主使，想来这背后主使的人就是刘宗周！”

阁臣周延儒、蒋德璟、吴甡，兵部尚书张国维、侍郎冯元飙，刑部尚书徐石麒，工部尚书范景文，都察院佥都御史金光辰以及五府的勋戚武臣一起为刘宗周申辩，甚至痛哭溼了衣袖。崇祯帝却愈发恼火，坚持要大行处治。在这次不欢而散的召对之后，崇祯帝发旨将刘宗周革职下刑部议罪。内阁对此进行了坚决的抵制，扣住中旨不发，联名恳请皇帝收回成命。崇祯帝临御以来还很少遇到过这样的抵制，又不想同朝臣闹到势如水火的地步，只好改令将刘宗周罢斥为民。徐石麒和金光辰也为了这个案件分别被罢免和降级调用。

大臣们能在抗争中倖免于难，崇祯帝在与朝臣的冲突中不断升腾的一股恶气只有发洩在倒霉的姜埰和熊开元身上。在二十九日召对过后的当日，他向锦衣卫指挥使骆养性发出了一道密旨：“取熊开元、姜埰毕命，以病故报闻。”骆养性见到密旨，大惊失色。锦衣卫歷来是皇帝施行暴政的得力工具，在明朝歷史上为皇帝祕密处决过不知多少人。但那些助纣为虐的锦衣卫主管们却大都没有什么好下场，远的不讲，天启时期主持锦衣卫的“五虎”就为了私刑杀人全部被处决了。何况骆养性与熊开元是同乡，本来有些交情，而且这件事已经闹得满朝风雨，匆匆把两个人杀害了，朝臣追究起来，算是谁的责任呢？骆养性为此与同事们商量，决定拒不执行皇帝的密旨，还有意把密旨的内容向朝臣透露出去。但为了应付皇帝，镇抚司还是对姜埰和熊开元用了毒刑。据熊开元自己记述，第二天十二月初一日，“先拶一百敲，又一夹打五十棍，掠至垂毙，始还狱。初二日，又一夹打五十棍，復去衣打四十棍，自分死矣！”

因为言官们开始为皇帝下旨密裁的事议论纷纷，周延儒等阁臣又一再力争，到初四这天，崇祯帝才决定将姜、熊二人转交刑部议处，但杀两人

以泄愤的心情却还是没有消除。刑部奏上的狱词显然在避重就轻，他严责刑部“不审不招”，“欺藐玩徇”，并在十一日下令对姜、熊二人在午门外施行廷杖，各杖100，杖后仍送镇抚司拷问。

对于刑伤在身，已经气息奄奄的姜埰和熊开元来说，廷杖100几乎是必死无疑的事情。幸亏监刑和行刑的司礼太监和锦衣卫官员怕打死了人引起朝臣的集体抗议，在廷杖的时候手下留情，两个人才算保住了性命。即使如此，姜埰被打了100大杖之后已经气如游丝，不省人事。他的弟弟姜垓也在京为官，赶来用嘴含了人尿灌他，才终于甦醒过来。

姜埰和熊开元的事件折腾了整整一个月，崇祯帝通过对两个小人物大动干戈，总算找回了一点心理平衡。姜埰和熊开元都侥倖保住了性命，又在监狱里住了一年多，到崇祯十七年（1644）初才被分别遣戍到宣州和杭州，但两个人都没来得及抵达戍所，就听到了北京陷落的消息，不久后又都得到了福王弘光政权的赦免。

通过这个事件，朝中的大小臣工们却对皇帝和政局更加失望了。如果说以前他们对于皇帝的批评还只限于“严极切峻”、“太过聪明”，到这时候则分明感到了他的褊狭残酷和不负责任。崇祯帝威信急剧下降的一个重要标志就是他一心想杀掉两个小臣却最终不能如愿以偿，这在数年以前是不可思议的。只是朝臣表现出的对皇帝的抵制，绝非积极意义上的对于专制皇权的某种制衡，而一种消极的人心瓦解。

二 土崩瓦解

进入崇祯十六年（1643）以后，这个王朝大势已去的徵兆越来越明显了。

在内地横行无阻的清军于上年末连下山东州县，并且攻陷了鲁王居住的兖州，鲁王朱以派及东陵王、阳信王、东原王、安邱王等一批郡王被杀的被杀，自尽的自尽。年初，清军分兵两路，一路略东南，围攻属于南京直辖的海州（今连云港）、丰县、沛县等地；一路渡黄河向北，再次蹂躏鲁西、鲁北地区。奉命征讨清军的各路兵马或是藉口粮饷不足，或是藉口修城筑垒，全部在远离清军的地方观望。负有守土之责的地方官更抵抗不住强悍的清军，只好要么带上细软逃跑，要么献地迎降。清军虽然没有遇到什么像样的抵抗，几个月来毕竟鞍马劳顿，于是趁着春至草肥，竟然在山东各地牧马歇兵，安安稳稳地休整起来。直到四月才载着大批战利品悠然北返。最可惊怪的是明朝朝廷对于将帅们的逗留怯战，竟也眼睁睁地听之任之，毫无办法。

农民军在中原一带的攻势更让人心惊肉跳。李自成部在河南大败明军之后开始向自古兵家必争之地的荆襄地区进军，十二月初不费吹灰之力就佔领了襄阳，十几天以后又佔领荆州。崇祯十六年（1643）新年，李自成农民军攻克了湖广的承天府（今湖北钟祥），不久又攻佔汉阳，离湖广省城武昌只有一江之隔。此时，以李自成为首的农民军大体已经佔有河南、湖广两省十来个府的全部州县，根据地连成一片。这年春天，李自成改襄阳为襄京昌义府，正式建立了自己的政权，李自成称“奉天倡义文武大元帅”，以牛金星为丞相，下设吏、户、礼、兵、刑、工六政府，在地方上设防卸使，所辖府、州、县分别设府尹、州牧、县令。这时候

的李自成农民军，早已不是明廷所谓的“流寇”、“盗贼”，而成为一个地域广阔，军力强盛的俨然敌国。

农民军的另一支主力张献忠部在崇祯十四年（1641）八月信阳失利后一度蛰伏休整，没有什么大的军事行动。但从崇祯十五年（1642）夏季起，又在安徽一带活跃起来，五月攻克庐州（今合肥），七月在六安大败明军黄得功、刘良佐部。崇祯十六年（1643）初，张献忠又率部西进湖广，连下黄梅、广济、蕲州、蕲水各州县和黄州府（今湖北黄冈），眼看就要沿江而上，袭击武昌。

在两支农民大军的夹击之下，长江中游一带的明朝地方政权犹如摧枯拉朽一样地被一一拔除，像几年前那样凭城抵抗的地方官员已成凤毛麟角，倒是带头开城投降的官员士绅大大增多。这也反映了一种社会思潮的变化，本来在明朝士大夫中极为流行的忠君气节，随着国势的日趋衰落和对朝廷的日益失望，逐渐被消磨得所剩无几；而顺应天命准备改朝换代的意识却在许多士大夫中慢慢滋生。到了明王朝临近灭亡的时候，在李自成和张献忠的麾下已经聚集起包括明朝原任中央和地方官僚以及举人、生员等相当一批旧王朝知识分子。

北京的崇祯帝对于农民军的节节胜利却是一筹莫展。各军失利、各地失陷的急报频频传来，但调集军队进剿的谕旨却形同虚文，根本不起作用。当时明朝在长江中游一带最有实力的军事集团是平贼将军、援剿总兵官左良玉所部。按照兵部的册籍，左良玉部只有25000人，在一镇所统辖的兵马中已算是数额极多了。但由于左良玉在多年同农民军的周旋中善于保存实力，又努力招降纳叛扩充队伍，这时候的实际兵力已经达到20万人。这不但远远超出了一般总兵辖军的数量，而且比任何一个相当于战区司令的督师或总督所能实际调遣的兵力也要多得多。江河日下的明王朝还有这样一支由一个将领统一率领又颇具战斗力的大部队，本

来应该是一件幸事。可惜的是，这支部队在长期的争战中早已充分军阀化了，成了左良玉的私人资本，根本不听朝廷调遣。

由于朝廷供应的粮饷不足十分之一，左良玉军长期以来靠蒐括掠抢来维持，因而走到哪里都被当地人民恨之入骨。左军残害乡民甚于贼匪，对此朝廷并不是不知道，但从来是一眼开一眼闭，很少过问。皇帝和大臣们所希望的无非是这支不费朝廷太多粮饷的大部队能够在关键时刻抵御住农民军的冲击，为朝廷效力。但真到大敌当前的时候，左良玉却惯于坐视不顾或不战而逃。当初开封被围，朝廷为了能利用左良玉的兵力，特地从监狱里释放了早年曾赏识提拔左良玉，对左良玉有大恩的原任户部尚书侯恂，任命他为兵部右侍郎兼右佥都御史总督保定、山东、河北军务，统辖各镇援剿官兵，以为左良玉总会比较听话一点。但侯恂檄调左良玉部北上援救开封，左良玉却只派了5000人前往，同时以粮饷不继的理由要挟朝廷，主力部队始终没有离开自己的据点襄阳。李自成军南下襄阳，左良玉稍稍抵挡了一下，又把襄阳附近焚抢一空，然后率军向东逃窜。这支恶劣甚于土匪的20万大军先逃到武昌，又顺江向东而下。武昌居民在蛇山上见到左军东去，欢唿“左军过矣！”庆贺更生。

逃离了襄阳据点的左良玉军真成了一批无所顾忌的匪徒，不但所过之处烧杀掠抢，甚至公然攻打闭门不纳的州县，完全变作了一伙反叛。三月，左军已经到达芜湖附近，声言要到南京筹措军饷，吓得南京陪都政府乱作一团，急忙派兵陈师江上，准备防御左军。后来还是正在湖口的新任左都御史李邦华对左良玉反覆劝诱，又让安庆巡抚拿出15万两库银作为军饷，左良玉才让部卒们稍微安定了一点，驻军于安庆、池州一线。

对于左良玉军的这次变乱，崇祯君臣们竟然连声讨的勇气都没有了。李邦华到京后向崇祯帝建议把变乱之罪推到左良玉的一个下级部将王允成

的身上，因为此人所部劫掠州县最为猖獗。崇祯帝深知这个左良玉还要依为干城，不能惹；而且实力雄厚，也惹不起。只得忍气对左良玉“戢服变乱”嘉奖了一番，要他把“首恶”王允成斩首以维护朝廷的面子。左良玉却连这点面子也不给，仍然把王允成留在军中，继续我行我素。

不但无力对付境外的敌人和境内的叛乱者，而且无力对付自己营垒内部的军阀势力，这是一个政权行将崩溃的重要标志之一。左良玉只是明末军阀中最有代表性的一个罢了，其他各处握有实力的总兵们，如宁远的吴三桂、山东的刘泽清等人实际上都已经成为一方的军阀。朝廷对他们只能小心笼络，而他们对朝廷则要根据自己的利益情况决定态度。

崇祯帝自己也弄不清楚，从什么时候起堂堂的天子朝廷竟堕落到要看几个粗鄙武夫的眼色行事了。但为了大局，眼色仍然要看。这是一种十分痛苦的无奈，崇祯帝所能想出来的唯一办法，就是从朝廷派遣有威信、有胆略的得力大臣到前线督师，切实辖制诸军，与“流寇”进行一番决战。可是自从杨嗣昌故去，洪承畴陷于清朝，这样的得力大臣实在太难寻觅了。崇祯帝把朝中大员们扳着指头算了一遍，觉得只有内阁大学士吴甡还算差强人意。吴甡是万历四十一年（1613）的进士，做过河南、陕西的巡按御史和山西巡抚，在任期间正值“流贼”蜂起的时候，他办事较为得力，朝野口碑多认为他是剿“贼”的干练之才。正是由于有这方面的才能，他自崇祯十一年（1638）起被任用为兵部侍郎，对于全国的军事形势和各部队情况十分熟悉。上一年崇祯帝特地提升他为辅臣，主要也是为了在内阁中有一个通晓军事的顾问。比起杨嗣昌、洪承畴来，吴甡虽然要逊色一筹，但论资歷、地位、威望和能力，他也要算一个不可多得的人选了。

这年三月，襄阳、荆州等地接连失陷和左良玉部作乱的消息相继传来，崇祯帝决定由吴甡以辅臣的身份前往湖广督师。他在召对廷臣的时候流

着泪对吴甡说："卿多年在匪患猖獗之地任职，有战守韬略，可去湖广为朕督师。"此前，除了崇祯初年的孙承宗和后来的杨嗣昌以外，督师大臣一般顶多挂兵部尚书衔，很少由内阁大学士直接担任，这次任命阁臣督师，崇祯帝是相当郑重的。

但吴甡对于这个任命却十分不情愿。他知道如今天下大势已去，官军很难节制，而"流寇"则根本没有可能剿灭。既然註定了不可能成功，出去督师就等于出去送死，不是死在农民军的手里就是失败后被皇帝处死，或是像杨嗣昌那样死得不明不白，死后还要留下一世的骂名。但身为大臣，他又不能不为君王效命，强不可为而为之。他在接受任命后提出：一要有精兵3万由自己亲自统辖；二应先沿运河南下到南京，再相机溯江而上，进可讨贼，退可保卫南都及江南富饶之区。

吴甡提出这两点，从当时的实际情况来看，不能说没有一定道理。但在崇祯帝看来，这却是吴甡有意避重就轻，推诿迁延的藉口。他在同阁臣们面议此事的时候很不高兴地说："京畿正在对鞑虏用兵，三万精兵哪能仓促间集中起来？何况南京远在下游，何至于现在就去退守？"吴甡回答说："左良玉骄横跋扈，当年杨嗣昌督师，连下十道号令，他一兵不发。臣才能不如杨嗣昌，而左良玉目前势力又大于当年。臣手中无兵，不能节制，只会损害朝廷威严。由襄阳顺流而下，极易攻至南京，因而应该兼顾，并非退守。"崇祯帝对吴甡所说也无法驳斥，只得先让兵部速议发兵，但心中却对这个吴甡极为不满。国事危急，竟然连大臣也不用命了，这让他心里一阵阵地怒火中烧。

好在另一位辅臣在此时表现出了良好的素质，崇祯帝的心情才好了一点。

这另一位辅臣就是首席大学士周延儒。四月初，清军在山东等地饱掠一

番之后准备回师关外，再一次路经京师附近。尽管皇帝和朝臣都知道清兵这次抵近京城大概只是过路，却还是不免紧张起来。一向精明的周延儒深知清兵带着大批俘获的人口辎重，肯定无心再战，主持这次京师防卫的军务决不会吃什么大亏，而且只要把清兵安安稳稳地送出长城以外，就可收到驱除敌寇、捍卫朝廷的大功。他同样深知，皇帝正为吴甡受命后拖拖拉拉不肯离京而恼怒，很需要在辅臣中有一个勇于任事的榜样。为此，他在四月初四日自请出京督师御敌。在明代歷史上还从来没有过首辅亲自统兵作战的先例，崇祯帝对于周延儒这一别出心裁的申请果然非常满意，非常高兴，觉得毕竟是自己最信任的股肱大臣，在危急时刻能为自己分忧解难，所以立即就批准了周延儒的请求。

周延儒这一次出兵真是雷厉风行，在皇帝批准的第二天，不再进行任何准备就带着少量京营官兵出了城。这时候京畿地区仍然有三四个总督、五六个巡抚、七八个总兵，大帅如云，兵力也有十多万人。但各路统帅都抱定了不与敌人接触的方针，只是从旁观望或徐徐尾随，因而根本无仗可打。周延儒明知这些情况，却也打定了多一事不如少一事的主意，以为清军反正早晚要出边回国，因而每天只是同幕僚们饮酒欢会，并不把军事形势放在心上。他的如意算盘果然打得不错。清军急着回家，不想再打硬仗，既然没有人阻截，就直奔京师以东的长城而来，把那一带的长城拆出了许多口子，悠然扬长而去。周延儒对于官场上和战场上的诀窍倒都非常熟悉，把各路官军抓获的散兵游勇和一些无辜的流民斩首充数，向皇帝报捷说与敌人交战斩获百余人，现已将敌军驱逐出边外。于是大获全胜。

崇祯帝对于首辅督师旗开得胜真的很高兴，因为这些年来胜利的捷报毕竟是太少了。他一次又一次地对周延儒予以嘉奖，特赐金币，等他班师回朝之后又晋升为中极殿大学士、太师。这后一项晋封在明代太过隆重

了，文臣中得到过太师衔的只有万历时期的张居正一人，周延儒坚持辞免，获准。对比之下，崇祯帝于对吴甡更加深了痛恨，在周延儒回朝后不久就降旨切责吴甡迁延逗留，令他停止入直内阁。吴甡只得上疏谢罪，并且请求辞去职务。这个请求立即得到批准。

这一幕辅臣督师的闹剧至此并没有结束。周延儒刚回到京城，就有言官弹劾他故意纵敌出关，“狡诈欺君，丧师辱国”。崇祯帝开始还不大相信，但后来锦衣卫的密探又把在周延儒军中打探到的情况密报上来，无非说他怎样悠游京郊，不理军务；怎样杀良冒功，怯懦不战。崇祯帝这才大怒，甚至悲从中来，感到自首辅以下的文武大臣全都这样矇混欺骗，全都对天下大坏的形势如此不负责任，要挽狂澜于既倒真是毫无希望可言。

五月里，新任保定巡抚徐标进京入对，向皇帝报告了一路的见闻：“臣自江淮来，途经数千里，见到城陷处固荡然一空，就是没有被攻陷的城市，也仅存四壁城隍。物力已尽，蹂躏无余，蓬蒿满路，鸡犬无音，路上竟没有遇到过一个耕田的人。皇上几乎没有人民，没有土地了，如何还能达到天下大治呢？”这一番悲观的实况和悲观的论调让崇祯帝更为悲观，只能流着眼泪说：“都是诸臣不实心任事，才到这步田地呀！”

这确实是他的心里话。多年以来他一直认为是朝臣们的结党营私和敷衍塞责坏了国家的大事，此前两位辅臣督师的种种表现更证明了朝臣们的狡黠无能与可耻可恨。出于这种怨恨，他在这个月罢免了周延儒，但还为周延儒留了一点面子，准许他“乘传而归”，就是回家路上由国家驿站提供交通食宿。在此前后，他还罢免了近来办事不力的吏部尚书郑三俊、户部尚书傅淑训和兵部尚书张国维。但在这种危亡的时刻大批更换重臣对于国事到底能有什么补益呢？连他自己也弄不清楚。

清军出塞之后，京畿附近至少暂时平静了。而且由于清太宗皇太极于这年八月突然病逝，清朝方面忙着处理自己内部的权力再分配，一时无暇顾及关内，整个的对清战事竟有将近一年的安定局面。但已经分崩离析的明王朝却没有能力利用这个时机来振兴自强了。

湖广方面的战局还在恶化。五月初，张献忠攻克了武昌，把楚王朱华奎扔到长江里淹死，退职大学士贺逢圣投水自尽。这是农民军自起义以来佔领的第一座省城，张献忠改武昌府为天授府，当作自己的首都，自称“西王”，设五府、六部及总督、巡抚，正式建立了大西政权。李自成则在自己统辖的广大地区加强政权建设，剷除残余的官军和团丁武装。

朝政也在继续恶化。周延儒罢相后，陈演继任为首辅，而这位崇祯朝最后一任首辅却无疑是歷任首辅中最庸碌无能的一个。他主政以后的主要兴趣好像是集中在煽动言官们追究周延儒的过失、罪责上，而且真的煽动起一个不小的运动。一些趋炎附势、唯恐天下不乱的言官们也为有机会投井下石而摩拳擦掌、兴奋不已。

似乎是祸不单行，京城中从这年二月起又流行起瘟疫。这是一次恶性的传染病，来势勐烈，有些家庭刚刚发现有人染病，没有几天工夫一家人就死得精光。这样厉害的瘟疫在京城的歷史上闻所未闻，引起市民的极大恐慌。由于城外清军还在活动，想逃到郊外躲避瘟神都不行，城里的居民只能烧香祈祷，求菩萨保佑。江西的张天师这时候正在京城，崇祯帝急忙命他建坛设醮，祈禳瘟疫。但这位有一千多年传统的道教领袖的法力看来并不怎么样，连日烧符唸咒，疫情却没有丝毫减退。老百姓只能用一些土办法来自我保护，每到夜间邻里们就组织起来敲锣打鼓整夜地折腾，说是为了驱除厉鬼。连夜的锣鼓喧天吵得深宫里的皇帝后妃们都不能安眠，但在这种疫疠横行、人心大乱的情况下，根本无法下令禁止。

清兵退出塞外后，一些有能力的人家开始逃离，其他大部分人仍然战战兢兢地生活在恐怖之中。整个夏季京城中病死的人无数，一些全家死绝的没有人帮助埋葬，尸体就在屋里腐败发臭。极度的恐怖感和悲观绝望的情绪酿造出大量的流言蜚语。有人传说：皇上梦见一个神人递给他一张白纸，上面只写着一个“有”字。市井间解释说，“有”字是半个“大”和半个“明”的结合，“大不成大，明不成明”，岂不是大明将亡的徵兆！还有人传说：皇宫里有一间长年封闭的小屋，祖上传下来的禁令不许开封。一天皇上兴起，非要打开看看里面到底有什么东西。太监们苦劝不成，只得打开。结果里面只有一个小匣，小匣里面有两幅画，一幅画着七个身穿朝服的官员，上面写着四个字“官多法乱”；另一幅画着几个人隔河对泣，上面也是四个字“军民号泣”。人们说这是当年刘伯温留下来的镇宫之物，一旦现露出来，画中的内容就要变成现实，仍然是亡国之兆。

在民间流传更多的是关于鬼魅横行的说法，不少人一口咬定在大白天亲眼见到过死鬼。狡猾的宦官们还要趁机渔利，负责收缴城门关税和市场经营税的太监们把税收装进自己的腰包，然后向上司汇报说白天收到的钱到晚间点数的时候发现都变成了阴间用的纸钱。这种说法一传开，市井更为恐慌，做小买卖的生意人只好在小摊小铺前面放上一个水盆，让顾客把铜钱放进水里，以识别真假。——堂堂的天子之都，完全成了人鬼混淆的世界。

在没完没了的天灾和人祸的打击下，崇祯帝的自信心已经丧失殆尽。长期以来，他一直为着到底谁是造成天下大乱的罪魁祸首这个问题而困惑。在一般情况下，他当然更愿意把罪责全推给无能而邪恶的朝臣，因而不论是降旨切责还是召对痛斥，他总是反覆强调“诸臣负朕”，“朝臣皆不实心用事”一类的话。但在内心深处，他又不能不为自己是否真的失德

于天下而焦灼不安。他毕竟是帝国的君主，而且深信那一套受命于天、代天行道的传统儒家理论。如果说种种人祸还可以勉强推到群臣身上，那么连年的水旱虫灾，山崩地震，以及当前京师这场瘟疫的流行，却可能是上天垂象示警，用灾变来表示对于君主失德的不满。而所谓失德，也许真像有些臣子在私下里甚至公开表示过的，就是他多年来用人不淑、行政乖张、自作聪明、果于杀戮。他不敢在心中正视这一点，当然更不会公开承认这些，但隐隐约约地还是总会有一些自责自怨的情绪。正是在这种情绪的支配下，他才会在痛责、罢黜、惩办、杀戮朝臣的同时，又不时地想起要下诏罪己。自从崇祯十五年（1642）闰十一月第二次发佈罪己诏书以后，他降谕自责和下诏向上天和天下百姓认错的频率大大加快了。

这年六月十三日，崇祯帝第三次发佈了罪己诏书。诏书对国事的惨痛描述相当具体，说是“逆胡（指清军）蜂拥阑入内地，京畿、山东成为一片废墟”；“流贼接连攻陷藩王封地，数次惊扰皇陵，河南、湖广江北地区大半受到摧残”；“加以天灾不断出现，蝗旱频仍，而贪官污吏一意蒐括，横徵暴敛，不顾民间凋疲。致使兵灾祸乱联翩，边境腹地交困；老弱死于沟壑，丁壮亡于干戈。万姓何辜，遭此异惨！”但说到自己的“罪行”却还是空洞的一句话，“皆朕不德所致也”。至于罪己后的改进措施，这一次总算有了一点具体内容，除了在此前已经免除的河南省失陷地区5年来拖欠的赋税钱粮外，（其实这一地区都由李自成控制着，朝廷即使想收钱粮也收不到）“直隶各省在兵乱中残破的府、卫、州、县，自崇祯十六年为始，一切三饷加派各项钱粮，免徵二年；其未经残破而村落荒芜可怜者，各抚、按分别速奏，酌量减缓。”

在帝国全面崩溃的形势下，减免部分地区的三饷加派，已是杯水车薪，无济于事。而这一举措却使得早已支应计拙的国家财政雪上加霜，国库

无银，各路兵马却急需粮饷，户部用尽心机，还是无法筹措。于是，有人提出用发行纸币，也就是钱钞的办法。罪己诏刚刚发佈，桐城一个叫蒋臣的秀才进京建言，说是国初实行钞法，因而国用充足，只要恢復旧制，每年印制钱钞3000万贯，朝廷就可以凭空收入白银3000万两，既不必加派扰民，又可以充实军饷。这一套惊人的经济学理论居然打动了户、工两部的大员和崇祯帝本人，崇祯帝立即命太监主持设立了内宝钞局专司印钞，昼夜赶制，印出一部分就在京城募商发卖，每贯面值一两，只收9钱7分。可是京城的商人们听说朝廷要用纸币换取银子，纷纷停业逃跑，没有一个主动购买的。阁臣在讨论此事的时候说："商民再愚蠢，谁会用一两银子买一张纸呢？"崇祯帝却不解地问："为什么高皇帝（朱元璋）的时候就能实行？"阁臣也弄不清楚，只好回答："高皇帝似乎也只是承元朝旧制，当时只用作赏赐和一部分官俸，连兵饷也不曾用过。"崇祯帝还是垂涎于那每年3000万两的收入，执意要实行，要求用严刑峻法来推广。

由于阁臣的抵制，严刑峻法一直没有制定出来，发行的钱钞也就没有收回一两银子，但印制的成本却用了不少。宝钞局提出，制钞需要桑条200万斤，照例应由北直、山东、河南、浙江等地交纳，于是一大批太监出京催办，搅得各处鸡犬不宁；又需要3000名工匠，得在京城附近徵募，京畿地区也为此一片大乱。国库有限的资金填到印钞的无底洞中，却毫无收益，朝臣中不少人为此提出反对意见。由于崇祯帝坚持要靠印制纸币发财，制钞的工程一直没有停止；由于朝臣阻搁和商民无人响应，钱钞一张也没有实际发行。直到第二年北京陷落，王朝覆灭，那一大堆没用的废纸才毁于兵燹之中，完成了它的歷史使命。

在崇祯帝执政的最后一两年里，他一直处在对朝臣的刻毒怨恨和对自己怀疑、自责两种情绪中。两种情绪交替在他身上起作用，就表现为一时

对朝臣痛下毒手，一时态度又相当温和谦虚。这种双重人格交替呈现的情况不但使得群臣总是摸不着头脑，因而更无实心侍奉这位喜怒无常的君主，也加深了他本人的心理苦痛。刻毒的报復引起进一步的自责，自责刺伤了自尊心，又导致更刻毒的报復。恶性循环，他的心中永无宁日。

像以往几次一样，第三次下诏罪己之后，他心中的愤怨又化作了一股痛击朝臣的激情。正巧有人为他发难，六月里，有个叫雷縯祚的山东武德兵备佥事疏劾蓟辽督师范志完畏缩纵敌、纵兵淫掠，附带着攻击兵部主官“木偶昏贪，听司官吏书作弊”。崇祯帝在下罪己诏后的第五天，也就是六月十七日见到这份奏疏，当天就召雷縯祚进京回话，第二天就下令逮捕范志完，并命法司拟议对已经被罢免的原兵部尚书张国维和原户部尚书李待问、傅淑训的处罚。

七月初，崇祯帝亲自审讯了被押解至京的范志完，雷縯祚也赶到京城参加对质。范志完对所有的指控全部矢口否认，并且说：“雷縯祚是原辅臣吴甡的死党，是吴甡让他参臣。朝臣一半是周延儒之党，一半是吴甡之党，两家不和，因此连累及于臣。”他知道皇帝平生最恨朝臣结党，这样说是想以此转移视线，挽救自己。但崇祯帝现在要做的却是杀人出气，根本不听他辩解，只是把他痛斥了一番就算结案。最后他又想起与范志完一起主持对清作战的还有个蓟州总督赵光抃，说是“赵光抃也逗留纵敌，只惩治范志完一人，他怎么能服气？”于是降旨把赵光抃也逮捕，同范志完一同处理。

其实赵光抃在当时的督抚大臣中还算比较好的，虽然胸无大略，对清军作战也毫无成绩，但总算能约束自己的部队，不至于到处烧杀抢掠。雷縯祚攻劾范志完的时候，还顺便称赞了赵光抃，用他的兵不扰民与范志完对比。没想到皇帝一心办人，把本来没事的赵光抃也牵连了进去。到

这年十一月，范志完、赵光汴一起被押赴西市斩首。

范志完所说的朋党云云虽然没有救了他自己的命，却还是勾起了崇祯帝对于两位前辅臣的痛恨。当初两人罢官而去的时候正好赶上他的心中自责多于刻毒，因而都能全身而退，现在换了一种心境，才觉得不严惩不足以平心中之愤。正在这时候，兵科给事中郝縯上疏攻劾吏部文选郎中吴昌时，而且矛头直指原任首辅周延儒，说吴昌时“窃权附势，纳贿行私，为周延儒干子。内阁票拟事关机密，而昌时事事先知”，说周延儒“多欲则不刚直，有用而无体，智足以掩过而忠不足以谋国”，是“天下之罪人”。紧接着，一批御史、给事中纷纷论劾吴昌时和周延儒，御史蒋拱宸还揭发吴昌时勾结内监，直接在皇帝身边做手脚。

吴昌时是復社的第一号政治活动家，极善于钻营，当初周延儒再次出山全是靠他一手操办，在京中宫里宫外关系又极多，自然是周延儒的头号心腹。但他在周延儒再次出任首辅一年多之后，仍然只是一个没有实权的礼部仪制司主事，心中颇为不平。崇祯十六年（1643）三月，在周延儒和东林党一派的吏部尚书郑三俊的联合支持下，吴昌时才调任吏部文选主事，代理郎中事，掌握了文官铨选的大权。一朝权在手，他不由得得意忘形起来，在京都的官场上频繁活动，徇私受贿，一面为朋友同党安排好职位，一面对结过夙仇的人痛下狠手。

在吴昌时代理文选郎中的当月，正值例行的科道外转，就是在给事中和御史中挑出几个人出京作地方官。科道出京照例是要升官的，但通常还是被认为是很吃亏的事，因为给事、御史不但在京中颇有势力，而且随时可能升为京卿，前程无量，而一入外官之流，远离朝廷，前途就十分暗淡了。何况此时正是天下多事之秋，外转为地方官，天知道会落个什么下场。因此科道们全都不想被外转出去。按惯例，每次科道外转都是给事中一人，御史两人，但这一次吴昌时偏要杀一杀言官们的威风，一

下子外转了4个给事中和6个御史。大多数言官为此相当愤慨，但当时吴昌时的后臺太硬，只得隐忍。

随着周延儒罢相和郑三俊去职，陈演等人又正在煽动一起摧毁周延儒在朝势力的风潮，言官们的积怨终于爆发出来。再加上吴昌时平日招摇太甚，得罪的人很多，才有了这次对他的集中攻讦。明朝的官僚向来彼此撕咬不休，但许多人共同攻击一个郎中级的小臣的事件却极为少见。崇祯帝正在邪火上撞的时候，见到劾书上有同首辅勾结操纵朝政、与宦官暗通声气及洩露机密等重大内容，立即对这宗案件表现出异常的关注。

崇祯帝执政从来有一个保守机密慎之又慎的原则，最忌讳宫中与外间，内阁与部僚互通消息。平日里有关重大事宜的本章发往内阁，他都是亲自密封在黄绢小匣中，亲笔在封条上写好“某日某时送阁”；内阁票拟之后，原本章连同票籤再放在原来的小匣里，由阁臣密封“某日某时某臣等谨封”，再由他亲自启封。这一套烦琐的办法，就是怕内臣或是中书一类办事人员有意无意瞭解了机密，洩露出去。而这个胆大妄为的吴昌时竟然既勾通内阁又勾通太监，觊觎大密，暗操朝政，这还了得？为了不让手眼通天的吴昌时得到消息，他没有把攻击吴昌时的劾疏发往内阁，因为怕内官见了也会走漏风声，劾疏就一直装在自己的袖子里，趁着身边没人才亲自批旨：立即将吴昌时除名，听候审判。

崇祯帝在处理吴昌时案时表现出的极度小心谨慎，实在有点疑神疑鬼，小题大做。但他自己却真是很郑重其事的。他平时亲自批的御旨，字都是真草相间，唯独这一次批旨全用楷书，无形中也反映出他当时的心态。皇帝如此郑重，这样如临大敌，吴昌时要想躲过这场灾难已经不可能了。七月二十四日，崇祯帝再次在中左门平臺上升堂断案，亲自审讯吴昌时。

这次审讯一派杀气腾腾，内阁、五府、六部大臣以及京卿、科道官员全部被召入，崇祯帝身着素服角带，更是一副要杀人的气势，太子和定王也随侍在身旁。在此之前，锦衣卫密探已经向皇帝报告了周延儒与吴昌时狼狈为奸、纳贿营私的种种劣迹，围在崇祯帝身边的大太监们也摸准了他的脉，用真真假假的“事实”向周延儒大泼脏水，因此他在心里早已拿定了主意，审讯不过是为了耍耍威风、出出恶气。

没想到，吴昌时却是个硬骨头，对于所有指控一一辩解。崇祯帝特别痛恨吴昌时罪款中的“通内”，因为宦官内臣是他自己的家奴，却被朝臣中的小人利用，实在是情理难容。但吴昌时却说：“祖宗之法，交结内侍者斩。此法最为森严，臣虽不才，哪里敢触犯？”崇祯帝喊来揭发吴昌时通内的御史蒋拱宸，要他当面对质。谁知蒋拱宸已经被周围的气氛和吴昌时的强硬态度吓破了胆，伏在地上浑身哆嗦，一句话也说不出来。崇祯帝被气得几乎也要发抖，只能大骂吴昌时欺瞒狡辩。吴昌时仍是不屈不挠，说：“如果皇上一定要以通内之罪坐臣，臣怎敢违抗圣意？处罚自当由臣承受，但要违心屈招，臣实不能。”

气昏了头的崇祯帝命宦官对吴昌时用刑。阁臣蒋德璟、魏藻德抗议道：“朝廷殿陛之间，向来没有用刑的先例。请将吴昌时发送法司审问。”崇祯帝说：“这样的奸党，神通广大，若离开此地，谁还敢按法律对他勘问？”两个阁臣仍然说：“在殿陛用刑，实为三百年来未有之事！”崇祯帝恨恨地说：“吴昌时这厮也是三百年来未有之人！”阁臣无话可说，只能看着太监们在堂皇的丹陛上动刑。吴昌时被上了夹棍勐敲，不多时两条腿就都被夹断，人也昏死过去。朝廷中的文武大臣们从来没见过这样的场面，一个个面如死灰。崇祯帝发洩了一通，也觉得颇为无趣，这才收场。当天，他又命锦衣卫迅速派人到周延儒和吴甡的家乡，将两人提解到京，听候发落。周延儒是在吴昌时案中受到牵连的，提解

进京还勉强说得通，吴甡同此案毫无关系，也被提解，理由就只有崇祯帝自己知道了。总之是出于圣命，锦衣卫立即执行。

吴昌时被人抬到锦衣卫狱中，后来又多次受刑，始终没有招供。但在十一月里，他还是同范志完、赵光忭等人一起被处决了。

恶气出罢，还是要回到险恶的时局中来。处治过两起大案之后，崇祯帝的心中渐渐平静，又想起了自己君临天下的责任。在九月和十月，他几次发表上谕，再次宣佈今后要浣衣减膳，以示节俭，与臣民共度艰难。当然也不能只是他自己节俭，他同时敕令天下不论官绅士民都要节省，并严禁官绅用黄蓝绢盖，士子用红紫衣履，庶民百姓用锦绣丝苎、金玉珠翠衣饰。

在国家面临危亡的时候倡导勤俭，即便是身体力行，大概也已经没有什么实际意义。但这毕竟体现了他的一种努力，希望能从这些细微处感动自己的臣民，也感动冥冥中的昊天上帝。上帝却不那么容易被感动，这年秋冬之际，中原的战局又进一步恶化了。

吴甡被罢免后，崇祯帝只能把督师的重任交给唯一一个还敢于同农民军作战的军事统帅，陕西总督孙传庭。五六月间，孙传庭加兵部尚书衔，改称督师，管辖的范围包括陕西、河南、四川、山西、湖广、贵州及江南、江北各路兵马，负责统一指挥剿平农民军。但事实上孙传庭所能统辖的部队只有集结在关中一带他自己的陕西军团，其他各地或是早已无兵可言，或是根本不会听从远在西北的督师的调遣。而自从上一年郏县惨败后，孙传庭尽管在关中努力扩军屯田，所部兵力还是不足10万人，在关中自保还可以维持，进入中原同农民军正面抗争却显得力量不足。

崇祯帝任命孙传庭为督师却是幻想着以他的部队为主力，在中原战局中出现一个转折，因而一面给他加衔加职，一面催促他出潼关作战。朝臣

中一部分人对于让孙传庭部出关作战颇有异议，在一次廷对中兵部侍郎张凤翔就很恳切地指出：“孙传庭所有皆天下精兵良将，皇上只有此一副家当，不可轻动。”孙传庭本人也很清楚，出关同农民军正面作战，前途暗淡，凶多吉少。但被内外交困的形势弄得心忧如焚的崇祯帝头脑中已经没有了清楚的思路，又从来都不瞭解官军和农民军两方面的实际状况，只是一味地要求速胜，所以三番五次严旨督促孙传庭出关。孙传庭被逼得没有办法，慨嘆说：“我明知出战未必能胜，但也许可以侥倖成功。大丈夫岂能再被逮去面对狱吏呢？”决定八月初出兵。

孙传庭军最初进展顺利，八月上旬恢復了豫西重镇洛阳，又攻下汝州（今临汝）、宝丰等州县。崇祯帝闻讯大喜，高兴地对朝臣说：“贼灭亡在旦夕！”同时开始安排善后事宜了。但李自成其实是把主力放在郏县、襄城一线，诱敌深入，准备以逸待劳。九月中旬，连日疲于奔波的孙传庭军又来到一年前刚吃过大败仗的郏县，已经人困马乏，加上秋雨滂沱，道路泥泞，粮草运输跟不上，全军处于飢饿状态。李自成趁这个时机发起攻击，官兵溃败，损失4万余人。孙传庭只好收拾残部逃回关中。李自成军却乘胜而进，趁孙传庭喘息未定，直逼潼关。十月初六日，农民军勐攻潼关，孙传庭部下大将高杰和白广恩率部逃窜，潼关被攻破，孙传庭死于混战中。

孙传庭部被歼灭和潼关的陷落，标志着明王朝镇压农民起义军事行动的彻底失败。这以后，李自成军在陕西势如破竹，十一日佔领西安。十一月，克延安、榆林、宁夏，十二月，克甘州，陕西这个包括当时整个西北地区的明朝最大行省几乎全部落入李自成农民军的掌握之中。与此同时，张献忠的大西军则活跃在湖广南部和江西一带，连克岳州（今岳阳）、长沙、衡州（今衡阳）、袁州（今宜春）、吉安、常德等名城，湘江、赣水之滨，全成为农民军的天下。

一个又一个的重大失败让崇祯帝蒙了头，除去严令惩治那些失利的军事首领和地方官之外，他想不出任何积极的对策。正是在这个晦气的时刻，晦气的原任首辅周延儒被锦衣卫缇骑押解到京。他是十一月二十五日来到京城的，暂时被羁押在崇文门外下头条衚衕的关帝庙里。他已经预感到这次被逮来京凶多吉少，但也幻想着皇帝能够看在他两任首辅，多年顾问于身边的情分上，对他宽大处理。崇祯帝本来对如何处理周延儒以及吴甡并无确定想法，但随着坏消息的不断传来，他的心情越来越恶劣，对于两位有罪的前辅臣也就越想要严惩不贷。吴甡是先进京的，正好在周延儒入京的前一天受到正式处分，与妻子一同发往金齿卫充军。金齿在今云南的保山，遥距京师万里，算是极边，又是烟瘴之地，流戍到那里也算极重的刑罚了。但比起周延儒来，吴甡还是幸运的。



张献忠

三法司依旨议罪，提出的处理意见与吴甡相同，以“受财枉法”的罪名，判处“发烟瘴地面充军终身，妻子一同解往。”崇祯帝却批旨道：“周延儒机械欺蔽，比匿容私，滥用匪人，封疆已误，前屡旨已明，这所拟岂足蔽辜？姑念首辅一品大臣，着锦衣卫会同法司官，于寓所勅令自裁，准其棺殓回籍。”所谓机械，古代是说巧诈的意思，而这一点正是崇祯帝一向深恶痛绝的。他在同阁臣们谈起周延儒的事情时就说过：“朕恨他太使乖巧。”蒋德璟把这话告诉了周延儒，周延儒无可奈何地说：“侍奉这样

的英主，不乖巧能行吗？”这就是崇祯朝臣子的悲剧，不乖巧的早都因为强项忤旨而获罪了，乖巧得太过了头却也难逃杀身之祸。

十二月初五日深夜，锦衣卫首脑骆养性带人同传旨的太监一起来到关帝庙。周延儒从床上爬起来仓皇接旨。传旨的太监十分阴毒，唸到“姑念首辅一品大臣”处，故意停下来不往下读。周延儒以为是从宽发落了，喜极谢恩，却又听到“敕令自裁”四个字，一时把持不住，竟然拔腿要逃。逃当然是逃不掉的，死却又不愿死，骆养性一再催促，周延儒一再拖延，直到四更时候，骆养性才让卫卒强行把周延儒吊在房樑上。名为自裁，实际同于绞刑。但在气绝之后过了一两个时辰，周延儒的尸身却还是温热柔软。骆养性生怕出现死而復生的情况，自己的麻烦就大了，于是命人用长钉钉进周延儒的头颅里，才放了心。周延儒死的时候，只有51岁。

周延儒到底是一代状元，在临死前的最后时刻还写了一首绝命诗：

恩深惭报浅，主圣作臣忠。

国法冰霜劲，皇仁覆载洪。

可怜惟赤子，宜慎是黄封。

替献今何及，留章达圣聪。

大概是方寸已乱，诗写得一点也不好，但对于崇祯帝的忠贞却表达得极清楚。在他看来，皇帝是英明圣主，而自己也是赤胆忠臣，对于忠臣来说，冰霜雨露莫非天恩，要他自杀也是皇恩浩荡。他所挂念的，除了未成年的幼子之外，就只有当年皇帝亲笔写给他的那些密谕是否能妥善保管不致流散出去。而满腔忠言却已经没有机会向皇帝当面诉说了，只好留下诗章献给皇帝。

周延儒哀婉的绝命诗并没有感动皇帝，却令朝中的大臣们不禁有兔死狐悲之感。杀戮辅臣，在整个明朝的歷史上只有王文、夏言和薛国观、周延儒四例，其中两起都是发生在崇祯时期，而且两人都是首辅，仅仅这一个事实就充分说明了崇祯帝对于朝臣的残酷无情。除辅臣之外，崇祯帝直接杀害的大臣总共有六部尚书4人，督师、总督7人，巡抚11人，其他侍郎以下文官和总兵、副将等武职以及畏罪自杀的人数多得难以统计。更多的人被频繁罢免、削籍、流放充军或是投入监狱，许多人死于戍所或狱中。崇祯帝对于臣子的这种残忍严厉的态度并没有激发起群臣励精图治的精神，却造成了人人惶恐，众叛亲离的局面。到了末年，大臣们都把兵部堂官、督师、总督、巡抚这些显要的职位看作畏途，想方设法地避免。孙传庭死后，朝廷补选陕西总督，由于人人规避，竟然选不出来。崇祯帝气愤地质问："获罪诸臣，廷臣多以知兵保举，被赦免破格起用。为何要推选督、抚，就一个可用之人都没有了呢？"在任兵部尚书冯元飙也算是后期东林党人中名高位重的中坚人物，但为了逃离这个危险的职位，竟在朝房里当众装作有病晕倒，为自己退职养病造舆论，连家里人都嘲笑他身为九卿却玩弄这种小人的诡计。

文臣逃避责任，武将不听调遣，财匮饷乏，山河破碎，等在崇祯帝面前的只有亡国一条道路了。只是这亡国的速度比所有人预想的都要快得多。

三 煤山惨雾

崇祯十七年（1644）的新年，是崇祯帝一生中所过的最后一个新年，也是他一生中所过的最晦暗、最死气沉沉的一个新年。

在大年三十晚上，崇祯帝还强作欢颜在后宫里同着周皇后、袁贵妃以及儿女们一起吃了辞岁的年夜饭。宫里也一直在燃放着爆竹烟火，气氛还算热烈。但他同后妃和太子守岁到了子时，领着太子一同到太极殿准备接受臣子们的朝贺时，却发现官员们都还没有到，只有刚刚入阁一个多月的内阁大学士李建泰踉踉跄跄地赶了来。由于元旦子时的早朝歷来是大朝会中最隆重最意义重大的，从来没有、也不可能发生过集体迟到的现象。这一次出现这种情况，如果不是宫中的报时系统出了问题，把时辰报早了；就一定是京师四城的报时系统出了问题，把时辰报晚了。但崇祯帝当时没有想到这些，只是觉得近来朝臣们越来越涣散不负责任，全没有臣子的样子，甚至到了全不把大朝会放在心上的地步，因而非常气恼，干脆下令取消了这次朝贺。

大概因为正是大年初一的喜庆日子，崇祯帝觉得不便深究群臣的这次集体犯规，所以在发了一顿火宣佈撤销早朝之后，也就回他的后宫去了，只是一直郁郁不乐的心情更加沉重。而那些稍后赶来参加朝会的群臣们在宫门听说这次早朝免了，同样感到摸不着头脑。大家只觉得，一年之计在于春，在春正月的第一天就无缘无故地停止朝见，怎么看也不像个国家吉祥之兆。

接下来的白天是个大风扬尘的阴霾天气，整天狂风怒号，竟如同夜晚一般，宫里宫外的人们只好点着灯烛过年，让人心中更觉得不痛快。直到下午的申时（四五点钟），阴霾才算过去，但仍是阴沉沉的见不到太

阳。这个年过得完全是不见天日。

但在同一天，西北的古都西安却是热火朝天。这天凌晨，李自成在西安接受了他的文武百官的朝贺，并且宣佈：建立自己的王朝，国号大顺，改元为永昌元年。李自成在这天还宣佈，改西安府为长安府，称西京；追尊其曾祖以下为皇帝，册封妻高氏为皇后；定官制，封功臣。至此，李自成的农民军已经建立了一个体制完备的政权，下一步，就是要推翻明王朝，完成统一天下的大事业了。

这时候，大顺政权的战略目标已经很明确，就是要以主力分进合击，扫荡华北，攻克北京。因而在正月初八日，年还没有过完，李自成就亲率主力由西安出发，不久后渡过黄河，向着明王朝的老巢北京一路攻杀过来。在过黄河到达晋南之后，大顺军分作两大部分。一为偏师，由制将军刘芳亮统率，沿黄河北岸一带跨过太行山转而向北，攻略潞安（今山西长治）、彰德（今河南安阳）、广平（今河北邯郸）、顺德（今河北邢臺）、真定（今河北正定）、保定一线，自南面进逼北京。另一路为主力，李自成亲自统辖，沿晋中谷地向北，出大同、宣府，由西北直扑明朝的京城。两路大军号称百万之众，军容整齐，所向披靡。

崇祯帝和他的朝廷也是在正月里听到大顺建国和李自成发兵的消息的。尽管几年来风雨飘摇，崇祯君臣们已经对各式各样的军事警报听得太多，但这一次，仍然感到了形势的严峻和紧迫。崇祯帝深知，李自成部经过多年的歷练发展，实力已非当年可比，这一次的进军看起来是冲着北京来的，如果没有一番大振作，灭顶之灾恐怕是在所难免了。为此，他在正月十一日召见内阁成员的时候悲愤交加，对大学士们说：“朕非亡国之君，事事皆亡国之象。祖宗栉风沐雨得来的天下，一朝丧失，有什么面目见列祖列宗于地下！朕要亲自率师出兵，决一死战，就是死在沙场也没什么，只是死不瞑目呀。”说罢竟放声痛哭起来。

几位阁臣还从来没有见过这样悲壮的情景，也是第一次听到皇上提到“亡国”两个字，一时慌了手脚，一面劝慰，一面表示愿意代皇帝督师出征。陈演作为首辅自然要带头，先请带兵御敌。崇祯帝却说他是四川人，不熟悉北方情况，不同意他去。蒋德璟、魏藻德等人请行也没有得到批准。最后大学士李建泰要求说：“臣家在曲沃，愿出家财作为军饷，不用国家出资，请让臣率军出征。”崇祯帝此时正为拿不出军饷而头疼，听到这话大为欢欣，于是转悲为喜，连连夸奖李建泰是忠臣，并且说：“卿若出行，朕定要仿照古代推毂之礼为卿送行。”

但李建泰其实只是一个极平庸的官僚，而且又从来没有军事方面的经验，不仅无法同歷来带着阁衔出征的孙承宗、杨嗣昌相比拟，就是比起前年统兵出京的周延儒也还远远不如。靠这样一位督师就能挽救大明王朝的危亡？崇祯帝心里其实并没有底，不过是病笃乱投医罢了。所以李建泰出师的问题又耽搁了十来天才最后确定下来，这期间，崇祯帝一直在考虑其他的御敌之策。

他心里最愿意执行的一个方案是迁都江南。

明代建国的时候本来建都在南京，后来成祖靖难成功，却不愿离开自己的老根据地北平（就是北京），所以在政权稳定之后仍然回到北方，以北平为北京，但在很长时间里北京在名义上只是陪都，称为“行在”，正式的首都还是南京。直到宣德年间，南北两京的地位才颠倒过来，北京成为了正式的京师，而南京反而成了陪都。但由于歷史的原因，陪都南京一直保留着皇宫和一整套政府班子，有五府、六部和各院、寺、科、司，甚至宦官的24衙门都一应俱全。各部门的长官和属员在名义上同北京各官是平级的，只是没有实权，管辖范围仅限于南直隶地区。

明代在南京保持一套虚拟的政府班子，本来也有预防突然事变的意思。

此时北方大部分地区频遭兵燹，已经残破得几乎无法收拾，而长江以南却还基本上保持着比较稳定的局面，因而迁都南京确实是暂时躲避危险，再从长计议的最佳策略。这里面的道理，就连从来不过问政事的周皇后都很明白。据说一次见到崇祯帝为国事危急闷闷不乐，她就提起过："我们在南京还有一个家。"其实崇祯帝自己对于这个道理更清楚，而且早在崇祯十四五年间就已经与首辅周延儒祕密商议过南迁的问题。但举朝撤离北京，不论表面上说得怎样冠冕堂皇，具体做出怎样的安排，实际上都意味着要最后放弃北京和北方广大地区，下一步大概只能在江南偏安一隅。那样的话虽然算不上亡国，但导致一个一统天下成为半壁山河，却也有点像歷史上晋代的惠帝、宋代的徽宗，难免要耽误国昏君的名声。自以为是圣贤之君而且极重视自己脸面的崇祯帝因而在这个问题上又一直极为慎重。他希望最好是能有一个有威望的大臣出面力主南迁，而自己则最后在群臣的极力劝说之下"不得已"而为之。至少可以保住一点面子。

在这个问题上，崇祯帝的心态多少有点像在对清媾和问题上的心态，内心极想，却不愿露出形迹，因而在酝酿的时候极其机密，到后来却多半不会有什么结果。最倒霉的常常是参与了机密的人，一旦稍有洩露，就会被当作遮羞和洩愤的牺牲品。当年陈新甲为洩露和款的天机而被杀，周延儒之死很可能也同密商南迁的事情露了风有些关系。

出于这样的心理，在崇祯十七年（1644）初，关于南迁的讨论也进行得极其诡祕。正月初三日，宫里城里都还在忙着过年，崇祯帝悄悄地把詹事府左中允李明睿召进宫来，在德政殿里祕密召见。李明睿只是个不起眼的文学侍从之臣，这次能够受到特别召见，是因为他一直主张"南迁图存"。他在年前曾上疏提出过这个问题，由于人微言轻，并没有引起强烈反响。崇祯帝在召见李明睿的时候把左右人等完全屏退，又再三四顾无

人之后，才仔细讯问了关于南迁的设想。并且对他说：“朕早已有南迁之意，但无人贊襄，才拖到今日。你的意见同朕一致，朕决心已定。但诸臣都不同意，怎么办？你现在要保守祕密。”崇祯帝同李明睿谈了很长时间，中间还在文昭阁赐宴赐茶，茶饭后召入再谈，详细地商量了南迁的具体路线、沿途护卫、饷银以及留守等诸方面的事宜，直到天黑才让李明睿出宫。

从这次极不平常的召见中可以看出，崇祯帝当时在内心里确实已经决定了举朝南迁，但出于名声和面子的考虑，他却迟迟没有把这个问题提到桌面上来交群臣进行讨论，他所希望的由阁部重臣首先提请南迁的情况也一直没有发生，因而一拖再拖，所谓南迁图存终于成为泡影。而在这时候，崇祯帝再想要找一个如杨嗣昌、周延儒那样可以说说心里话的股肱大臣也已经没有了。

既然暂时不能弃城逃跑，就只有尽最大努力加强京城的守备。京城的常备卫戍部队是所谓的“京营”，是一支腐败已极的部队，平时闹饷生事，战时不堪一击。数年来清兵几次威胁京师，真正的保卫力量主要都是靠着各路勤王部队。这一次大顺军可能不久就要兵临城下，调军入卫的事当然应该早做安排。可是京城以外的北方各路兵马要在沿途抵御大顺军，不可能事先龟缩到天子脚下，南方的部队又远水不解近渴，崇祯帝能想到的只有山海关外面的宁远总兵吴三桂部。

吴三桂出身将门，其父吴襄、舅父祖大寿都是关外着名的将领，他以大将子弟从戎，人称精明深沉，勇武敢战，不到30岁就身任专阃大帅。他所率的4万精兵在关外的歷次对清作战中表现也是比较突出的，虽然在松锦战役中有过不光彩的逃跑歷史，仍然被一致认为是关门最有战斗力的劲旅。在京师危急的时候，调吴三桂部入卫虽然未必真能挡住大顺军的几十万雄师，却能给弱不禁风的朝廷增加一点信心。问题在于，抽调

吴三桂军入京，就必须放弃关外硕果仅存的宁远城，而且山海关的防御也会因此大为空虚，清军一旦乘虚而入，后果同样不堪设想。这样拆东墙补西墙的办法，同样使崇祯帝和他的朝臣们两面为难。

为了解救眼前之急，崇祯帝还是在正月十九日的一次召对中首先提出了调吴三桂军入关的问题。但这一次同歷来一样，他仍然不想自己担负弃关外之地和造成关门空虚的责任，因而只是提出由吴三桂带精兵5000前往山西助剿，说是关外余兵尚多，不致造成山海关边防的破坏。同时，他又对阁臣们说："此等重大军机，应行与否，原应先生们主持担任，未可推诿，延缓误事。"还是要大臣们承担责任。

大臣们却早已从歷史的经验中得知，一旦主动承担了调边兵入关的谋划，将来追究起弃关外之地和山海关残破的责任来，皇上大概又要寻找替罪羊，那就是杀身之祸。因而大家一口咬定，就是不同意，任凭皇帝自己做主。首辅陈演代表大臣们说：皇上要调吴三桂精兵入关，确为灭寇良策。但山海关和宁远迫近京城，关系重大，为有吴军，清兵才不能长驱直入，若一旦调去，其他各处未必能够支撑得住。万一有了差错，臣等万死也不足以承其责任。此事关系安危大计，臣等密议多时，不敢轻易以封疆为尝试，伏乞皇上圣裁。兵部尚书张彦缙更明确指出，调不调吴三桂，实际上是弃不弃宁远的问题。

崇祯帝无法向朝臣推卸责任，只得反覆向朝臣解释说："放弃宁远，退守山海关，虽属下策，实在是不得已而为之。"但陈演等大臣们为了慎重其事，其实是要彻底推脱责任，仍然提出兹事体大，要由九卿科道会议讨论，再后来还提出要谘询各地督抚的意见，即使放弃宁远，也要妥善安排宁远撤兵后山海关的防御和关外军民的安置。因而调动吴三桂部的事情同样一拖再拖，直到三月初还没有正式定下来。

南迁不行，调兵也定不下来，剩下来唯一的招法只有派遣大臣出征迎敌了。李建泰经过几天的筹划，勉强拼凑了一支500人的军队，因为事先说好了不要户部粮饷，也就不携军粮辎重，整装待发。正月二十日，崇祯帝正式任命李建泰以辅臣督师，加兵部尚书衔，“代朕亲征”，并任命了李建泰荐举的原御史卫桢固等人为该部监军、中军副将等职。但对于这支形同玩笑的部队如何行止，怎样迎敌，以及如何调度其他各军在何处组织战役等等，朝廷都是一片茫然，只是大概确定了一下李建泰部出京后向南运动，因为当时估计李自成军主力可能是要从京南真定、保定一路向北进攻。

李建泰正式出师的日子选定在正月二十六日。此前，大顺军已经在二十三日佔领了平阳府（今山西临汾），李建泰的家乡曲沃也陷入大顺军之手，他的所谓“家财”已经全部化为乌有，但消息还没有传到京城。

崇祯帝为李建泰的出征举行了最隆重的“遣将礼”。在这天清晨先派驸马万炜到太庙祭告了祖先，而后亲自在正阳门（俗称前门）行礼。从紫禁城的午门直至正阳门外东西两侧都佈满了卫士和旌旗仪仗，场面壮丽庄严。内阁、六部、五府、都察院等衙门的文武大臣侍立在两旁，崇祯帝端坐中央，对李建泰说了许多慰劳嘉奖的话。而后设宴，崇祯帝亲手为李建泰酌酒三杯，并把盛酒的金盃赐给他。酒后，崇祯帝当席亲笔撰写《钦赐督辅手敕》，用印后郑重地交给李建泰。敕书中授予李建泰在外对于各级文武官员自行诛杀赏罚和一切机宜自行调度的莫大权力，并说：“愿卿早荡妖氛，旋师奏凯，晋爵鼎彝铭功。朕仍亲迎宴赏，共享太平。”都是一派梦话。宴罢，内官在鼓乐声中为李建泰披红簪花，迎出尚方宝剑。李建泰叩首再拜，下了城楼带上一行人马启行。崇祯帝一直在城楼上目送着李建泰的队伍走远了，才摆驾回宫。

李建泰这次出征，仪式之隆重在崇祯一朝是史无前例的。但以李建泰之

庸才，带领着500零散人马，想要挽狂澜于既倒，实在不啻于痴人说梦。一番煞有介事的隆重不过是自欺欺人，给自己壮壮胆子罢了。李建泰带的一队残兵也确实丝毫无所作为，刚刚出城就先受到缺粮的威胁，后来不得不在各处“就地筹粮”，实际上就是纵兵劫掠，没有平“贼”，自己先成了贼。到了三月初，听说刘芳亮部已经佔领了广平，离自己只有咫尺之遥，李建泰连忙率部向北逃窜，缩守保定不敢出头，最后终于向大顺军投降了。

情势已经危急到无以復加，而惯于无事生非的朝臣们却还在朝中酝酿新的是非。正月里，给事中光时亨、王言上疏，认为国事坏到这种地步，绝非皇上的责任，都是由于任事诸臣“奸深启衅，苛刻相因”的结果。要挽回天怒人怨，只能对这些“奸人”大加挞伐。因而他们建议：将十六年来误国诸奸，详开姓名，钦定一案，诏告中外，使天下晓知祸乱来由，“诸奸之罪案明，而陛下之圣德益彰。”崇祯初年定过一个“逆案”，已经搅得朝廷纷纷扰扰，现在如果真的实行这个维护皇帝面子，打击歷任朝臣的建议，再定一个大案，不知又要生出多少风波。好在当时形势太紧迫，连热衷兴大案的崇祯帝也没有精力再考虑这方面的事情了。

这时候，大顺农民武装正在胜利进军。二月初六日，李自成率军来到太原城下，城中明军勉强抵抗了两天，不支，城陷。李自成在太原稍事休整，准备继续挥师向北。

崇祯帝相继听到平阳、太原失陷的消息，更加惶惶不可终日。二月十二日，他特地召见了吴三桂的父亲吴襄和户部、兵部堂官，再次讨论放弃宁远，调兵入卫的问题。吴襄是多年统兵关外的老将，家资田产都在关外，因而坚决表示“祖宗之地尺寸不可弃。”崇祯帝关心的却是吴三桂的部队到底管不管用的问题。他问吴襄：“贼势甚为紧迫，你儿子的方略足以制平吗？”

吴襄出身行武，不免有些大话炎炎，说道："臣揣测贼估据陕西、山西，未必来攻京城，即使来也要先遣一部试一试。如果逆闯（李自成）自来送死，臣子必能生擒献于陛下。"

崇祯帝当然不会那么天真，说李闯已有百万之众，哪有那么容易对付的。又问吴三桂到底有多少兵力。

吴襄说，按兵册应有8万，但实际上只有3万余人。崇祯帝问：这3万人都骁勇善战吗？吴襄说："若三万人都是战士，平贼早就大功告成了，真能作战的只有三千人而已。"

崇祯帝大为失望："三千人怎么挡贼百万之众。"

吴襄说："此三千人不是普通战士，而是臣襄之子，臣子之兄弟。臣自受国恩以来，自己食粗粝，而三千战士都吃细酒肥羊；自己衣粗布，而三千战士都穿绫罗绸缎，因而能为臣效死。"

这个老头子的一番信口开河的谎言和大话，竟然很让崇祯帝动心。他倒真希望吴三桂是能让帝国起死回生的活神仙。但问到让吴三桂入关需要多少粮饷的时候，吴襄的回答却让他大吃一惊。吴襄告诉他，部队在关外的庄田要赔偿，十几个月的欠饷要补足，关外的600万百姓（其实只有十来万人）要安插，算起来至少需要100万两银子。

竟然要这么多银子，此事只能暂缓了。

在万般无奈之中，崇祯帝于二月十三日这天第四次下了罪己诏。但直到这时候，他的罪己诏仍是空话连篇，文过饰非，名曰罪己，不知罪谁。他在罪己诏中抽象地承认国难当头，民不聊生，"罪在朕躬，谁受其咎！"同时又拐弯抹角地指责"大臣不法"，"小臣不廉"，"言官首鼠而议不清，武将骄懦而功不举"，总之一切过错都应该归咎于文武百官。唯

有“要惜人才以培元气，守旧制以息纷嚣”两句话，似乎还对多年来滥杀滥黜大臣和进行的那些徒劳无益的改革有些反省。但事已至此，不要说他已习用多年的统治方式很难更改，即便是改了，其实也已经无济于事。

这样一个又空洞又虚伪的罪己诏自然对于国事毫无补益。在崇祯帝的罪己诏颁佈之后没几天，二月十六日，李自成又率部由太原出发了，而且在出发后也发佈了一道诏书。诏书列举明朝的种种暴政，“狱中囚犯累累，士人不思忠义报国；赋役征敛重重，百姓企盼推翻暴政。苍天不仁，致万民辗转于灾难。”诏书还要求明朝君臣“体念天地祖宗，审时度势”，及早投降，这样还可以“如杞如宋，享祀永延”，就是能够保留一个爵位封号。这个诏书，实际上就是一份以胜利者姿态发出的劝降最后通牒。

李自成的这份诏书，明朝的臣子们大概是没有勇气拿给崇祯帝看的。以崇祯帝的性格，他也决不会向“反贼”投降。但最后通牒的出现却反映了崇祯王朝实在已经大事不妙。而这时候，崇祯帝还在抓耳挠腮地想法子应付残局。

残局处处需要应付，却处处应付不过来。南迁没人应答，守城又没有勇武的将士，即使有了兵，还没有足够的粮饷。吴襄提出的100万让他心惊，却也提醒他眼前筹饷实在是一个大问题。没有饷，坚守京师只是一句空话。自二月中旬起，他屡次提出军饷问题，要诸臣想办法解决。诸臣有什么办法，这时由于连年用兵，江南提解钱粮又因为军情紧急运不过来，户部库存只剩下40余万两，臣子们眼睛盯着的只有属于皇帝私人财产的内帑。崇祯帝却是至死也不肯自己出钱的，他向大臣们哭穷说“内帑业已用尽”。大臣们不信，反覆恳请，左都御史李邦华甚至明确地指出：“社稷已经危倾，皇上还吝惜那些身外之物吗？皮之不存，毛将焉

附！”崇祯帝却假作没有听到，直到最后也没有拿出自己的内帑。大顺军佔领北京后，从皇宫中各内库共搜出白银3700多万两，还没有算上黄金和其他各种珍宝。

外帑没有钱，内帑又不愿出，崇祯帝只好再次拿出了强迫勋戚、宦官和朝臣捐金助饷的老办法。勋臣和内外官员们见皇帝自己一文钱不想往外拿，自然也没有捐钱的积极性，相互推诿，死磨硬抗。直到三月初，农民军已经快要兵临城下了，崇祯帝密谕他的老丈人嘉定伯周奎，要他捐银10万两，在勋戚中带个头。周奎却说：老臣哪里有那么多钱？咬紧牙关只认捐一万两。崇祯帝以为一万太少，把数额提到两万。周奎不能再还价，就派人进宫向女儿求援。周皇后暗中给家里送去了5000两，周奎从中扣下了2000两，以3000两交差，以后就拖着不再拿钱。后来大顺军进京，从周奎家抄出的现银就有53万两。大宦官们个个富可敌国，此时也纷纷装穷，有的在院门外贴上“此房急卖”的招贴，有的把珍宝古玩送到市场出售，一时鸡飞狗跳，乱七八糟。相对于勋戚和宦官来讲比较“穷困”的在京官僚们更捨不得出钱，所捐不过几十两，百儿八十两而已，崇祯帝嫌少，开始按衙门，后来按官员籍贯，分省硬行摊派，最终还是所得无几。一番混乱之后，捐出的饷银才不过20多万两，杯水车薪，无济于事。

筹不到饷，无法增兵，只得加强对现有部队的监督统辖。这时明朝在山西、京南的兵力并不算太少，但因为一直採取分散株守孤城的战略，很容易被各个击破，再加上士气低落，将领们都感到大势已去，因而多数明朝守军要么望风归降，要么不堪一击，与大顺军稍一接触即作鸟兽散。对于这种状况，朝臣们根本想不出什么好办法，崇祯帝在军事上相当低能，也从来没有想到过在战略上做出什么改进。唯一有意义的一个建议来自被夺职的前陕西总督余应桂，他上言说：贼号称百万，非天下

全力剿之不可。请调左良玉、吴三桂及高杰、唐通、周遇吉、黄得功等众将，齐赴军前，会师真定、保定之间，以为决战之计。但这个建议却没有被理睬。

崇祯帝想不出什么战略上的安排，唯一的办法就是加强对各部的监视。二月二十日，他再次任命了一批太监到各处监军，高起潜总监（山海）关、蓟（州）、宁远，卢惟宁总监通（州）、德（州）、临（清）、（天）津，方正化总监真定、保定，杜勋总监宣府，杨茂林监视大同……受命之前，他对这些大太监们谆谆嘱咐，一副把身家性命都託付出去的样子。太监们也颇为激昂慷慨，似乎抱定了捐躯报国的决心。但文臣武臣们对于情势危急中又大用太监，分散事权，却是极为不满。兵部抗议说：如此政出多门，必定会使各处长官和将领无所措手足，请求收回成命。崇祯帝照例坚持自己的决定。但靠几个太监监军当然不可能真正增加部队的战斗力，后来这些太监绝大多数都带头投降了大顺军。

崇祯帝在他最后的日子里还最后一次调整了内阁班子。正月二十七日，因为李建泰出征，内阁里只有4相，他任命工部尚书范景文、礼部侍郎邱瑜入阁参预机务。但以陈演为首的这个内阁庸庸碌碌，实在是崇祯朝歷届内阁班子中最不中用的，正赶上这种最危险最紧急的局势，既拿不出任何可行的办法，又不敢担当责任。直到眼看京城就要不保，首辅陈演为了怕日后要担罪责，主动提出退休养病。崇祯帝曾经很信任陈演，但今年以来陈演遇事退缩，处处都不能体量圣心，让他大为失望，所以立即就批准了陈演的辞呈。向皇帝辞行的时候，陈演自己承认没有佐理皇帝办好事情，致使国难当头。崇祯帝也很气恼，说：“你就是死了也抵不了误国之罪！”陈演唯唯而退，后没来得及离京，终于落到了大顺军手中。另一位辅臣蒋德暻在三月初也被罢免。在明朝的最后十来天，首辅是崇祯十三年（1640）的进士魏藻德。那是崇祯帝亲自面试所取的门

生，又是他一手迅速提拔起来的。由这样一位崇祯帝亲手培养的首辅伴随着他终结自己的王朝，倒是颇有象徵意味。

二月里，京城的官僚们个个都成了惊弓之鸟，但大祸临头的时候却又不敢各自投林，因为皇帝明令不许在职官员和他们的家眷逃离京师。头脑灵活的就想办法争取出外公干，以便因“公”逃亡。但想要因公出逃也不容易。最后一位首辅魏藻德就自请出京去督催粮饷，崇祯帝却批旨说：“警报正急，已有旨留卿佐理机务，兵饷且不必催。”还是不放他走。不能跑又想不出迴天的办法，大家就在一片恐怖中煎熬。京城里还在不断出现凶恶的徵兆，朝臣们议论起来就会胆战心惊。二月初八学宫祭孔，大学士魏藻德主祭。典礼前本来天气晴和，但正要行礼的时候却突然颳起了狂风，学宫中松桧怒号，殿堂里的灯烛全被吹灭，连行礼的仪仗队伍都被大风吹散了。等了半天，狂风不歇，典礼只好暂停。官员们就传说：这是孔夫子在天之灵不愿接受明朝的祭享了！圣人的垂眷都已经转移，帝国的命运还有什么希望呢？有人已经在暗自盘算，怎样顺应天命，去做大顺朝的开国元勋了。

明朝君臣乱作一团，李自成的大军却在日益逼近。二月二十一、二十二两日，大顺军在宁武遇到明山西总兵官周遇吉十分顽强的抵抗。周遇吉虽然勇武善战，却终因寡不敌众，最后城破巷战而死。宁武之后，大顺军基本上没有再遇到像样的抵抗，大部分明军将领都是在李自成的人马还没有到达的时候就提前派人接款请降了。

宁武失陷和周遇吉全军覆没的消息给了崇祯帝更加沉重的打击。这时候，他总算弄清楚了李自成的军事意图，知道大顺军的主力必定是要经大同、宣府，由西北方向进攻京城。按照这条路线和大顺军的推进速度算来，兵临城下只是个把月的事情了。二月末，完全没有了主意的崇祯帝屡次召集同样完全没有主意的群臣，商量对策。群臣或讲几句毫无意

义的空话，或干脆缄口不言，竟然没有一个人拿出一条具体意见。

这样空泛地议来议去，最后才又重新提起南迁的话题来。一直主张南迁的李明睿在私下里同一些重臣交换过意见，大约也暗中透露了一点皇帝瞩意南逃的信息。比较有责任感的左都御史李邦华以为皇帝是社稷的象徵，自然不能怕死逃跑，但为了保险起见，应该先让太子到南京躲避一下，万一北京不存，南京还有个主宰。在廷议中，李邦华把这个建议说出来；李明睿也再次申明瞭请崇祯帝“南征”的意见。反对崇祯帝南迁的人很多，无非是怕南迁后北京守不住，皇帝必然要治罪主张南迁的人，许多人还害怕皇帝逃了，自己被留下来守城，那也是九死一生。至于让太子去南京监国，多数人倒是觉得有道理，因而一时阁臣、部臣都附和李邦华的意见。

但这个意见却是崇祯帝最不愿意听到的。因为让太子南迁，等于承认京师已危如累卵，而自己却只有以身殉国一个无可选择的下场，李邦华就明说是“在皇上惟有坚持效死勿去之义”。在崇祯帝看来，李邦华和其他大臣们的这种说法实在可恶之极，自古以来只有忠臣一心殉国殉主的，哪有逼着皇帝去殉国的道理呢？翻遍史籍竟然找不出一个类似的例子。另外还有一个担心，就算最后北京能够守住，如果有权臣在南京拥戴太子登基，像当年唐肃宗在武灵遥尊玄宗为太上皇那样，岂不同样等于是丢了天下？其实在殿上就有个给事中光时亨大声说过：“奉太子往江南，诸臣想要干什么，难道要效唐肃宗武灵故事吗？”但崇祯帝对于大臣们那些冠冕堂皇的论调，却没法正面驳斥。他的虚荣使他无法向朝臣表示自己的真实意图，更不好意思不顾群臣反对当机立断地决定南逃，只能讪讪地说：“朕经营天下十几年尚不能济事，哥儿们孩子家做得甚事？先生们早讲战守之策，此外不必再言。”所谓死要面子，崇祯帝真是实行得彻底。

仍然不能逃，到二十八日，崇祯帝只得诏天下兵马都来勤王。但这时候，李自成的部队已经快要到大同，而京师周围一带的许多军队已经变作大顺旗号了。

大顺军主力于三月初一日抵大同，大同总兵官姜瓖和总督太监杜勋以城降。这时候整个雁北地区和宣府一带民心所向全在大顺军，各路官兵也早打好了投降的主意。驻军阳和（今山西阳高）的宣大总督王继谟见部下都在祕密筹划迎降，打算带上百余亲丁逃回京城，但走到天城卫（今山西天镇）又被亲丁把饷银好马都抢走迎降去了。他在给朝廷的报告中哀嘆说："看此时候，无一兵一将一民不反面向贼。"没过多久，走投无路的王继谟自己也只好"反面向贼"，向大顺军投降了。大顺军到达阳和时，明朝阳和兵备道于重华到十里以外郊迎，民众箪食壶浆于道。宣府总兵官王承胤也早早派人到大同联络投降，并且接应农民军的先头部队潜入宣府。

明王朝京师西北方面的通信系统这时候全部瘫痪，朝廷上根本弄不清作为京城重要门户的大同、宣府一带的情况如何。得到的都是各种传闻，有的说大同还正被围城，也有的说连宣府都已经被攻破了，甚至还有特别乐观的消息说李自成扫平全晋后已率军南返！崇祯帝被各种各样的消息搅得头昏脑涨，总的感觉是死亡之剑已经悬在了头顶上，就是不知道什么时候才会掉下来。

三月初四日，崇祯帝在平臺召对群臣，又一次提出南迁的事。因为刚刚收到还在京南地区徘徊的李建泰的奏章，也是请朝廷南迁。大臣们既已抱定主意，说来说去还是那一套。崇祯帝大概也感觉到，此时就是决定南逃，可能都来不及了，于是愤怒地说了一句硬气的话："国君死社稷，朕还能往哪里去呢！"从此君臣们都不再提皇帝和太子南迁的事。对于如何作战，如何守城等项具体问题，大臣小臣全都默不作声。崇祯帝恨恨

地说了声："朕非亡国之君，诸臣尽亡国之臣尔！"拂袖而去。这已经是朝臣们第二次听皇上说到亡国了，不禁都有些神色黯然。

这天总还是有点积极的行动，崇祯帝在当日诏封吴三桂、唐通、左良玉、黄得功等4位比较有实力的总兵分别为伯爵，其他在各处掌握兵权的总兵官们也都升了级。这虽然有明显的谄媚军阀之嫌，毕竟是大难临头，不得不然。封爵升官的目的当然是想让武将们为自己拼命，所以在封爵的同时，崇祯帝命蓟镇总兵唐通和山东总兵刘泽清立即率所部进京勤王。初六日，崇祯帝终于顾不上关外的得失和自己的面子问题，下令放弃宁远，命蓟辽总督王永吉和吴三桂统兵入卫京师。但为时已晚，大顺军正好在这一天佔领宣府，离京城只有四五百里的路程了。

距离京师最近的唐通最先率部来到北京，实际上他也是唯一一位赶上了勤王的将领。初七日，他带的8000名士兵屯军在齐化门（即朝阳门）外，并且立即陛见了皇帝。崇祯帝总算见到了一支救兵，欢喜异常，又是赐宴，又是赏银，说了许多嘉奖的话，赏给唐通白银40两，其所部兵丁每人银5钱。崇祯帝本来的意思是要让唐通部驻扎在北京城外抵御敌军，还派了太监杜之秩作为唐通部的监军。但唐通为此大为恼火，对人说："皇上晋我太师，封我伯爵，却又让内官在我头上节制我，我还比不上一个奴才呢！"于是上疏说兵少不便于平地野战，应去居庸关设险待敌。而后也不等朝廷批覆，竟自带上队伍走了。

当年京师第一次戒严的时候，袁崇焕率部千里驰援，兵力雄厚，却不能不时时处处震慑于朝廷的威严，生死予夺听凭天子之命。而现在，一个只有8000人马的小小总兵官就如此骄横跋扈，崇祯帝追今抚昔，真是不胜感慨。但事急从权，因为还要用这些武将，也就无可奈何。他只希望唐通能在居庸关挡住李自成军，至少能抵挡一些时日，以便更多的勤王之师赶到。

但其他的勤王部队却一直不见来到。山东的刘泽清接到诏令后谎称自己骑马摔伤了腿，拒不赴京，后来在临清大肆抢掠一番反而率部南逃了。吴三桂在关外有许多军民需要安置，拉家带口又行动迟缓，直到三月十六日才入山海关，京城已经无救。

三月中旬，京中已是一片大乱。许多住在京城但不在现任上的官员和大批官员的家眷不顾禁令纷纷出城向南方避难，普通的士民工商也不乏出逃的，城门口大小车辆拥挤不堪。崇祯帝怕大批逃亡扰乱军心民心，更怕大顺军的奸细大量混进城里，所以决定关闭城门，不许随便出入，有些城门甚至用砖土堵了起来。他还上谕兵部："敢有讹言惑众及私发家眷出城者，擒治。"但除了这些措施之外，也就再别无长策。他仍然在不停的召对朝臣，但每次都照例毫无结果，想到命运的不济和朝臣的可恨，他也每每不禁悲从中来，接连几日都是痛哭着回宫的。

十五日，前几天还表示过忠心耿耿的唐通和他的监军太监杜之秩在居庸关向大顺军投降，京师西北的最后一道屏障不復存在。这一天，大顺军权将军刘宗敏已经把檄文送到了京城，说是"定于十八日入城。"朝廷连忙把京师主力部队"三大营"安扎在齐化门外，准备在城东迎敌，城西则拒守。但京营总督襄城伯李国桢对如何守城毫无定见，只是坐在城楼上，凡事都听提督太监王承恩的指挥。守城的士兵大多都是京师豪门子弟雇佣贫民替代的，既无斗志又乏训练，加上缺粮缺饷，士气低落已极。

十六日，崇祯帝仍然按照原来的日程安排召见了在京考选的地方官员。城外军情急如星火，照道理是应该停止这些不急之务，但早朝的时候群臣相顾不发一语，他自己也不知该做什么事情，与其枯坐焦心，不如有点事干。但在召见的时候考选官员们已经察觉出皇上的表现颇为异常。他对被召见的人又提出如何筹军饷，如何安人心这些老问题，却无法集

中精力听官员们的絮叨，一会儿左顾右盼，一会儿无缘无故地笑笑，一会儿又亲手磨墨、斟茶，完全没有了往常那副庄重严峻的样子。这次召见差不多用了一整天的时间，直到一个太监送进一份密件，崇祯帝看过之后，面色大变，丢下召见的官员们急匆匆地走了。有人说那份密件报告昌平失守，但昌平那天实际上还没有失守，只是过居庸关之后都是平川，通往京城不一定非经昌平不可，大顺军的先头部队在十六日已经到达京郊。估计密报所说的就是京城附近发现大顺军的消息。

当天夜里，崇祯帝彻夜不眠。他绕着宫殿狂奔长号，又是顿足捶胸，又是悲泣嘆息，又是大叫："内外诸臣误我，误我！"已经陷入了半疯狂状态。而这时候内外诸臣却大多已经做好了开城投降的准备。司礼太监曹化淳、兵部尚书张缙彦等人拟了一个开城投降的公约，宫中朝中的许多大太监、大官僚都在上面签了一个"知"字。当然唯有崇祯帝不知。

十七日早朝，崇祯帝再一次同群臣讨论如何应付危难，再一次当众落泪，诸臣也再一次跟着哭天抹泪了一番。有人提出起用阉党中的人才冯铨、霍维华、杨维垣等人。且不说可用不可用，几个人都远在外地，起用了对于守城也毫无用处。崇祯帝听着这些废话实在心烦，懒得说话，用手指在桌案上写下了"文臣个个可杀"几个字，让身边的司礼太监王之心看了看，又抹了去。他实在想把这些昏庸怯懦的朝臣们杀个痛快，可是在这旦夕间就要覆亡的时刻，他其实连杀人的能力也没有了，只能等着大顺军来完成这一遗愿。

上午，寥寥无几的几个大臣心急火燎地守在宫门外等待消息，一面议论着形势。有人说只能听天由命，也有人强打精神说城池坚固，守几个月没有问题。突然间负责守城的襄城伯李国桢独自骑马赶来，衣冠不整，面色仓皇。崇祯帝忙宣他入殿，问他守城情况如何。李国桢趴在地上哭着说："守城的军队都不服从命令了！都躺在城上，用鞭子打起来一个，

另一个又躺下。怎么办呢？”崇祯帝也哭，说：“诸臣误朕到了如此地步！”于是殿里的文武大臣和太监们都跟着一起恸哭起来，声彻殿宇，外面都听得清清楚楚。

崇祯帝打发走了文武大臣，又召集太监，要太监们去武装守城。太监们譁乱一片，直到傍晚才组织起来几千人的一支队伍，分了皇上临时拿出来的二十万两银子，乱哄哄地到各城去了。这时候，大顺军已经把北京城团团围住，齐化门外的“三大营”不战而溃，平则门（今阜成门）和彰义门（今广安门）等处都遭到勐烈攻击。四处火光冲天，炮声动地。

在又一个不眠之夜里，崇祯帝明明白白地想到了死。人生自古谁无死？但是作为一代“英主”，却这样狼狈不堪地“以身殉国”，实在心有不甘。只是逃已无路，守又无策，奈何？十八日清晨，他最后一次召对阁臣，垂头丧气地说：“不如大家一起在奉先殿完事（自杀）。”阁臣中竟没有一个响应。奉先殿是宫内供奉祖宗牌位的地方，面对着列祖列宗毅然投缳，还是很有些悲壮的。但这个最后的打算也没有实现——他还是渴望着能有最后一线生机。

他在这天又下了最后一道“罪己诏”，宣佈停止辽饷等一切新旧加派，可惜这一“德政”来得太晚了。诏书还宣佈“赦免”一切从贼人员，只有李自成不赦，官民有擒之者封世侯。这种痴人说梦般的最后“振作”当然不会带来生机。

这天上午出了一件意想不到的事情。在大同投降大顺军的总监太监杜勋受李自成的派遣，坐着大筐被吊进城里，要同崇祯帝进行谈判。这正是最后一线生机，崇祯帝连忙召见。但杜勋传达的意思很简单：李自成军声势浩大，已无可抵御，唯一的生路只有崇祯帝自动“逊位”，其实就是投降，让位，让李自成堂皇而又名正言顺地登基即位。这样的生机对于

崇祯帝来讲未免有些太难堪了，但毕竟是一种选择。他还在犹豫，希望能有一个比较体面一点的投降方式，因而谈判一直拖到晚上。李自成已经不愿再拖，当晚对各门大举进攻，负责守卫彰义门的太监曹化淳开城门迎降，外城陷落，内城的失陷也近在眼前。



歪脖子树

在最后关头，崇祯帝还是决定既不投降又不“殉国”，而是冒险冲一下，争取逃出重围。他颁佈了亲征诏书，号称要御驾亲征，荡平逆贼，实际上就是率军逃跑的意思。但这时候他已经没办法组织起一支部队了，他要内监召京营护驾，内监对他说：“京营都已溃散，哪里还有兵！皇上自己想办法逃吧。”深夜时分，他找到皇亲驸马都尉巩永固和新乐侯刘文炳，要他们召集家丁护驾出逃。巩永固哭着说：“祖制亲臣家不能藏片甲，臣等哪里有什么家丁！所有的家人不会作战，哪能御敌！”实在没办法，崇祯帝只好手持三眼洋枪，带上一伙太监像没头苍蝇似的冲出了紫禁城，先后到了齐化门和安定门，看没有突围的可能，才又沮丧回宫。

大势已去，大势已去！他让宫中临时备下酒宴，召来妻妾子女，阖家举行了最后的晚餐。当初第一天进宫当皇帝，他正是由吩咐鸿胪寺预备酒食这件事，第一次体验到君临天下的威严和快意。而今备下的这顿酒饭，却只能用来同家人与人世诀别了。一家人哭哭啼啼地痛饮一番，直到杯盘狼藉，他才拔出宝剑，凶狠狠地对家人说："事已至此，可以死了！"周皇后哭着对他说："妾侍奉陛下十八年，却不听我的一句劝告，及早南迁，才会有今天呀！"同几个儿女洒泪相别，才回到自己的坤宁宫悬樑自尽。崇祯帝看着妻子摇摇晃晃地挂在房樑上，连声说好，又对两个号啕不止的女儿说："谁让你们不幸生在我家！"随即他挥剑杀死了幼女昭仁公主，长女乐安公主用手挡剑，右手被斩断，流血昏倒在地。袁贵妃自经的时候绳索断了，跌了下来，崇祯帝也上去补了三剑，却没有击中要害。他乘着酒力，又杀了几个嫔妃。昔日一派肃穆的内宫血流遍地，成了一个刑场。各宫的宫女们此时纷纷逃出宫门，却不知回家的道路，到处讯问。城中官民见到这种情形，都知道宫中已经大事不好。

皇宫里三个皇子吓得不知所措，崇祯帝让太监带他们先逃到宫外在成国公朱纯臣等人的家中躲起来，还谆谆嘱咐说："你们今天是太子，明天就是平民了，在乱离之中要隐姓埋名，不露行迹。见到老年人叫他老翁，见到年轻的叫他叔叔伯伯。万一保住性命，报了父母之仇，不要忘了今天的教训。"他还发了最后一道谕旨，要文武百官都到太子行在（即朱纯臣家）集合，一切听朱纯臣指挥。但这道谕旨送到内阁的时候，内阁中已没有阁臣值班，太监把谕旨放在内阁，回来报告皇帝，皇帝却已经不在宫中了。

一场大屠杀之后，三更已过，已是十九日的凌晨。崇祯帝踉踉跄跄地奔出了玄武门（今神武门），爬上了紫禁城北面的煤山（今景山）。这里是京城里的制高点，这两天来他也曾几次登到山顶观察四周城守的形

势。在临死之前再一次到这里来，说明他在朦胧中还是存在着一丝幻想，希望能在这里看到上天突降奇蹟。但这两天一直是悽风苦雨的天气，夜深雾浓，四周漆黑一片，只听得到有隆隆炮声传来，也辨不出方向。他在风雨中清醒了一点，才明白，奇蹟是不可能发生了。再看看身边，随从而来的竟然只有一个亲信太监王承恩，众叛亲离，还有什么希望呢？

在出宫之前他已经事先写好了遗诏，由于心意已乱，只写了一句话："朕已丧天下，不敢下见先人，亦不敢终于正寝。"到了最后时刻，他的头脑似乎又清醒了一些，觉得有些言犹未尽。于是他弄破手指，又在衣襟上写上："朕误听文官言，致失天下，任贼碎裂朕尸，但弗伤我百姓。"这是他最后一次把罪责推给别人，把面子留给自己。

一切结束，他同王承恩一起在寿皇亭旁吊死了，时为崇祯十七年三月十九日（1644年4月25日），他的实足年龄只有33岁。

城外，大顺军攻城的大炮声响得正急。

四 遗胤余波

大顺军是在三月十九日清晨进入北京内城的，各门守城的太监和官兵全部停止了抵抗，缴械投降了。明朝的大小官员们有十几人在城破的当天自杀身亡，绝大多数则战战兢兢地躲在家里，等待着新王朝的处置。京城里的百姓则家家户户都在自己门前设立香案，供上了写着“大顺永昌皇帝万岁，万万岁”字样的牌位，许多人还在帽子上贴上“顺民”两个字。反正不论是哪朝哪代，天下都少不了顺民。

京城的陷落和崇祯皇帝的自杀标志着已有270多年历史的明王朝寿终正寝，但在大顺军刚刚进入北京的两三天里，人们都还不知道崇祯帝的下落。当时城里有许多传闻，或者说崇祯帝已经在破城之前夺门出逃，现在正在南行路上；或者说他出宫藏匿在百姓人家。大顺军在宫中找不到崇祯帝的踪迹，也一面派将领率军南下追击，一面发出告示：“主上救民水火，克破京城。其崇祯逃出紫禁城外，有能出首者，赏黄金千两；隐匿者诛全家。”

直到二十二日，才在煤山发现了崇祯帝的尸体。大顺政权把崇祯帝的尸体拖下山去，同周皇后的尸体一起陈放在东华门外。故明官员和京城百姓听说后有去观望的，见到尸身以发覆面，一只脚赤足，一只脚穿着袜子，衣衫零乱，情状颇惨。一帝一后陈尸当道，很不雅观，明朝的兵部主事刘养贞自己出钱买了两副柳木薄棺，草草地把尸体装殓起来。李自成出于安定民心的考虑，觉得总是要把前朝皇帝安葬了为好，因而在二十五日拿出质量较好的红漆棺和黑漆棺各一具，重新装殓了崇祯帝、后，并且命令顺天府择日将崇祯帝、后下葬在昌平银泉山原来埋葬田贵妃的墓圹里。

按一般习惯，一个皇帝即位后就开始为自己营造陵墓。但崇祯初年御用堪舆学家在天寿山明陵地区踏遍群山，竟没有找到一个风水好的地方，因此为崇祯帝修建陵墓的事情一直拖下来。4年前龙虎山的张天师终于在蓟州附近找到一块风水宝地，但经推算必须到甲申年（即崇祯十七年）以后动工才吉利。因而崇祯帝始终没来得及为自己建陵，最后只能同田贵妃挤在一起。下葬是在四月初三日，因为有棺无椁，负责监葬的大顺礼政府主事许作梅临时决定把田贵妃的棺材从原来的木椁中取出，用它装了崇祯帝的棺材，葬事草草结束。

虽然是亡国之君，他毕竟曾经做过17年大明皇帝，因而在身后免不了还要享受一些哀荣。大顺政权尽管在《永昌元年诏书》中说过“君非甚暗”，其实对这个已成政治殭尸的明朝皇帝并不感兴趣，再加上当时要建设政权巩固政权，还要对付各处明朝残兵，根本顾不上给前朝皇帝加谥号一类无聊的事情。但一个月之后，政局又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四月初，拥有重兵的明平西伯吴三桂同关外的清军联盟，在中旬同大顺军进行了一场大战。李自成军大败，先是撤回京城，又于四月三十日撤离北京。五月初二日，清摄政王多尔衮率领着清军不费吹灰之力就佔领了无人管理的北京城，俨然以中华帝国的新主宰自居了。

作为一个杰出的政治家，多尔衮深知自己以关外少数民族的身份入主中原，更需要广泛地收买人心，因而在刚刚入关的时候就打出了“除暴救民，灭流贼以安天下”的旗号。在佔据北京的当天，多尔衮又传令，自初六日起，为崇祯帝设位哭临3天。设位就需要有一个称号，就需要定立谥号，清礼部侍郎杨汝成以典礼浩繁为由，要求有明朝故官一起参预。明朝故官推举当初一直主张南迁而始终没有南迁成的原左中允李明睿，清朝立即任命李明睿为礼部侍郎。李明睿还託病不想参加，多尔衮说：“明天就要令京城官民人等哭临，无神主，何以哭临？无谥号，何以

题神主？”李明睿只得痛哭从命。当即在朝房中同众人议定：以“怀”为崇祯帝庙号，以“端”为谥号，合称“怀宗端皇帝”。

根据谥法，“怀”表示“执义扬善”和“慈仁短折”，“端”表示立身严正，“内外宾服”。李明睿等人为崇祯帝制定的这第一套庙号谥号，多少反映了明朝遗臣对于他的某种评价以及对于他以身殉国的哀悼和怀念。但根据歷史上的惯例，一个亡国之君只能期望由后来的朝代赠予一个谥号，却不应该再得到庙号，因为国祚已绝，宗庙不存，亡国之君根本没有了在宗庙中接受祭祀的资格，当然也就没有资格取得一个庙号。例如元末顺帝，明朝谥其为“顺”，却不为其设立庙号。大约在最初，满洲贵族对于中原的一套繁文缛节还不十分清楚，因而让明朝的遗臣钻了空子。多年之后，清顺治帝已谙熟中原文化，特降旨取消了崇祯帝的庙号，并改谥号为“庄烈愍”，此后清代官书，概以“庄烈帝”或是“愍帝”称呦崇祯帝。

北京被李自成攻陷和崇祯帝自杀身亡的准确消息是四月初才传到南京的，明朝南京大臣们在大悲大恸之中连忙筹备拥立新君。各派政治势力紧张地争斗厮杀了一个来月，最后定立福王朱由崧为帝，改元弘光，就是通常所谓“南明”的第一个政权。弘光帝于五月十五日登基，登基后立即就降旨为崇祯帝议上庙谥。六月十五日，谥号议定，全称为“绍天绎道，刚明恪俭，揆文奋武，敦仁懋孝烈皇帝”，庙号“思宗”。庙号、谥号用“思”、用“烈”，特别突出对崇祯帝“杀身成仁”的痛悼。后来有人提出，“思”字曾经是蜀汉后主刘禅死后的谥号，用“思”来称崇祯帝极为不妥，建议改定，朝臣们又反覆磋商了很久，最后改定庙号为“毅”，因而南明人士和以明朝遗民自居者多称崇祯帝为“毅宗”或是“烈皇帝”。只是对于清朝统治者来说，这一套庙谥是伪朝所定的伪号，属于非法，因而敢用的人越来越少，后来几乎失传。在下一年，清顺治二年（1645），弘光政权被清军摧毁，黄道周、郑芝龙等又以唐王朱聿键为帝，建立第

二个南明政权“隆武”。隆武君臣在清兵压境，大难临头的环境下，不知为什么又想起来为崇祯帝再设置一套光荣称号，遂改庙号“威宗”，称作“威宗烈皇帝”，但这种称嗯应用的时间更短，范围更窄，知道的人也极少了。

由于亡国和时势的混乱，崇祯帝倒成了明朝诸帝中得到过庙号、谥号最多的一个。即使如此，有些明朝的遗老遗少仍然觉得所有这些庙号、谥号都未能确切表达对于崇祯帝的褒彰和缅怀。曾经在崇祯朝做过一个月大学士的文震孟的儿子文秉就争辩道：“先帝（指崇祯帝）俟两宫毕命后，始自为计，义也；初拟从权，徐图后举，既慨然知天命之不可争，不难身殉以谢天下，智也；业已身殉矣，犹曰‘因失江山，不敢终于正寝’，礼也；从容殉难，合乎大道，仁也。夫当变起萧墙，祸介俄顷，而仁、义、礼、智俱全而无失焉，可不谓正乎？按谥法：杀身成仁曰‘烈’，临难不屈曰‘正’。愚意修史者当具疏特请，更上先帝谥号曰‘烈宗正皇帝’。”

文秉的看法在当时很有代表性，遗民们出于亡国的惨痛和对故国深刻的怀念，对于作为故国标志的最后一个皇帝难免要表现出特别的热情。何况“自古艰难唯一死”，崇祯帝毕竟是杀身殉国了，那死就被看作壮烈非凡，是合乎大道的“仁”，甚至连在死前逼杀后妃也成了“义”，不争天命也成了“智”，临死前的一句激愤之言也成了“礼”，仁义礼智俱全，简直是独立于天地之间，垂则于千秋万代。清初着名的岭南诗人屈大钧写诗追思歌颂崇祯帝：

先帝宵衣久，忧勤为万方。捐躯酬赤子，披髮见高皇。

风雨迷神路，山河尽国殇。御袍留血诏，哀痛何能忘？

…………

诗中就把崇祯帝塑造成了个为国为民不惜献出生命的圣君。但相比之下，不论清朝还是南明，为崇祯帝定的庙号和谥号却太普通，太一般了。至于崇祯帝在自己的统治时期悭吝成性苛刻加派，自作聪明虐杀大臣，遇事不决贻误时机，驭人乏术涣散朝政，最后终于导致灭亡，遗民们就全部委之于“天命”，不愿去做痛苦而且难堪的回想了。

崇祯帝死后那么长时间，仍然引得明清双方的君臣为了他的称呼问题而议论争辩，大伤脑筋。这从另一个角度说明在古代的君主专制制度中，一个皇帝，不论生前还是死后，能给社会造成的巨大影响。但同崇祯帝的几个儿子在后来的歷史中有意无意掀起的政治波澜相比，几个不同谥号挑起的争论就显得微不足道了。

崇祯帝先后共有7子6女，其中第二子、第五子、第六子、第七子和四个女儿都幼年夭折，到甲申之变的时候还活着的有16岁的太子朱慈烺，13岁的三子定王朱慈灿，12岁的四子永王朱慈焕，以及长平公主和昭仁公主两个女儿。尽管同为皇帝亲生的金枝玉叶，在危急时刻不同的性别却有着绝不相同的命运。女性是要清白的，因而崇祯帝残忍地用剑砍死了幼女昭仁公主，斫伤长女长平公主。长平公主被砍断手臂，却侥倖没有死。李自成进宫后，见到奄奄一息的长平公主和同样是被崇祯帝砍伤的袁贵妃，觉得很可怜，就让人把她们各自送到本宫调养。袁氏后来辗转流落民间，到清初北方局势平定后才被京南雄县的地方官发现，送交给清廷。清王朝对这位前朝贵妃并不重视，交发有关部门“恩养”。袁妃又过了几年才死在北京。长平公主后来则被送到外祖父周奎的家中，数月之后伤势才逐渐好了。

3个皇子的经歷却要比公主复杂得多。三月十九日那天凌晨，太子和两个弟弟随着太监仓皇出逃，但都没有逃脱掉。3兄弟本来是分别出逃的，但引导的太监们见到大势去矣，无处可逃，也不敢隐匿皇子，于是

或把他们弃置在街巷上不顾，或是直接向大顺军出首把他们献给大顺军，因而在十九日当天3兄弟就全部落入大顺政权的手中，又聚在了一起。当时3个人都换上了民间的破旧衣服，帽子上也贴着“顺民”两个字，吓得要命。李自成要他们不必害怕，把他们交刘宗敏营内看管。3位殿下对新的身份却很难一下适应，谈起李自成和大顺军的时候，仍然按照当初在宫里惯用的称呦，叫作“贼”。原任大学士邱瑜听到了很担心，悄悄用笔在手上写了：“今后勿言‘贼’字。”让几位皇子千万不可口无遮拦。

李自成对崇祯帝的几个儿子还是很宽厚的，进入北京几天以后，封太子为宋王，定王、永王二兄弟也改封为公爵。从政治的角度来看，这三个男孩子是一宗很重要的战利品，对于安抚民心，招降故明官员，乃至于平定天下，都能起到积极作用。当然也有消极的作用。大顺军佔领北京后多次发现传单，声称大明气数未尽，“将立东宫为皇帝，改元‘义兴’元年”，就把太子当作反对大顺政权的旗帜。

到四月份，山海关的吴三桂公然打出了对抗大顺政权的旗号，击败了大顺军的唐通部。李自成、刘宗敏在十三日率领大军出京征讨吴三桂，在出行的队伍中也带上了太子三兄弟，还有吴三桂的父亲吴襄等人。李自成带上这几个人出征作战，显然是把他们当作人质。吴襄是吴三桂的父亲自不必说，太子朱慈烺三兄弟作为故明遗胤，有着重大的政治象徵意义，由于吴三桂在讨伐李自成的檄文中发誓要“克復神京，奠安宗社，干坤再整，日月重光”，表现出对于明朝无比忠心，因而李自成希望用太子们证明他对于故明的宽仁态度，也想利用太子最后一次要挟吴三桂投降就范。

但这次出征却成为大顺军失败的起点。在山海关外的大战中，李自成没有想到吴三桂已经同清军联盟，因而在突然遭到清军冲击的时候大惊逃

窜，导致全军的大溃败。李自成带着败军一路向北京撤退，为了缓解吴军和清军的追击，特派人到吴三桂军中议和。吴三桂当即表示：只要能归还太子和二王，迅速离开京师，就可以暂时罢兵，却没有提出交还其父吴襄作为交换条件。这表明当时太子的价值之大。以吴三桂的如意算盘，掌握住太子，在驱除李自成之后拥戴太子即位恢復明王朝，他本人将建立不世之功，同时也将拥有超乎寻常的地位和权力。李自成已经同意了吴三桂的议和条件，但清军统帅多尔衮却对这些丝毫不感兴趣，逼迫吴三桂继续穷追不捨。李自成大怒，在永平附近杀了吴襄，并把吴襄的首级挑在竹竿上示众，却没有伤害太子三兄弟，一直带着他们撤回北京。

李自成在四月二十六日回到北京，二十九日在武英殿正式举行了即皇帝位的典礼，当天夜里下令放火焚烧了宫殿，三十日清晨又挟着太子和二王撤离北京。自闯王进京至离京，前后四十余天，太子和两个弟弟一直在大顺军的掌握之中。这段日子他们过得相当狼狈，却没有受到什么伤害，只是乱离中随着军旅东西奔波，身体的劳累和心中的惶恐都是他们从来没有体验过的。

撤离北京之后的大顺军完全乱了阵脚，接连在庆都（今河北望都）、真定等地战败，队伍散乱，军心摇动，军中辎重都顾不上收拾，经常散落在荒路田野里，对那些随军看押着的故明太子等人更是无暇多顾。民间传说都认为太子和他的两个弟弟已经死于乱军之中，南京弘光政权还正式为三兄弟定了谥号，进行了祭奠。但实际上，朱慈烺三兄弟竟然在这种混乱之中，分别逃脱出来，各奔东西，自谋生路。

在三兄弟中，16岁的太子朱慈烺运气最差，他在逃离大顺军营之后又被一支不知名的什么队伍抓到。但这一次他把自己的太子身份隐瞒得很严，抓他的人只是把他当成一个临时伕役，让他打草餵马。又过了两个

月，他才再次逃亡。不知是出于什么样的想法，他在得到自由之后回到了清朝统治下的北京。有人传说，这位太子先是在一个穷苦人家或是一个尼庵寄居下来，观察时局并且打听家中倖存亲人的下落。他听说外祖父周奎一家都还平安无事，而妹妹长平公主也没有死，现在就养在周奎家。他还听说清朝为他的父亲补行了哭临礼，还给予了庙号谥号。这些情况大概使他误以为清朝也会给他相当的礼遇，至少也应该像大顺政权那样封一个王吧。于是在十一月间，他投奔到外祖父周奎家，不再隐藏着自己的身份。

周奎和他的儿子周绎都是胆小怕事的势利小人，初见太子出现，一时不知所措，就把他接进府里，还按照明代的规矩对他行了君臣大礼。在周府养伤的长平公主见到失散了半年多的大哥，不由百感交集，两个人相拥抱头痛哭。太子在周府住了两天，风声传了出去，邻近的许多居民送来酒食礼品表示慰问。这下子周奎和周绎坐不住了，但也不知应该如何处理，只好请来现在在清宫中服务的前明太监商议。商议的结果是留太子在府，凶多吉少，必须赶快驱逐。于是就由周绎出面，劝太子离去自谋生路，而且千万不要说明自己是崇祯太子。太子终究有些太子脾气，对外公、舅舅这种不客气也不讲君臣大义的行为十分气愤，竟拧着不走。周绎于是乎詈骂、推搡，甚至动手打了太子。太子更加愤怒，在周家大门外争吵不休，惊街动巷，连负责地方治安的巡捕也知道了。事已至此，周奎只得正式向官府举报。

崇祯太子已有多日下落不明，如今突然再现，引起了相当的轰动。特别是一些入仕清朝的汉族官员，大多怀着一种很微妙的心理，希望这出现的真是崇祯太子，而且希望清朝能够善意地对待崇祯太子。吏部侍郎沈惟炳在奏章中就明确表示："如其真也，是先帝之所默拥也。清朝宽仁厚德，加意先朝，上谥发丧，备极隆盛。今日命将出徵，代先帝除凶伐

暴，又何嫌何疑于其子，不以备三恪之后祀，为先帝存此一线哉？”用的虽是虚拟语气，意思其实是肯定的，认为崇祯太子遭逢丧乱而仍能存活，实属大幸，一定是崇祯帝的在天之灵保佑的结果。他还以为，清朝已经表现了对故明的宽仁厚德，入关建国都是代崇祯帝除凶伐暴，没有必要担心太子的出现会造成不利于清朝的影响。这是给清朝统治者一点宽慰，希望他们不要为此紧张。

但摄政王多尔衮为此事还真有些紧张了。他明知清朝作为一个关外少数民族入主中原本来就有许多难以克服的困难，而这时候南京的弘光政权又以正统的姿态成为各地抗清运动的核心，在这种情况下，一个前朝名正言顺的太子昭然存于世上，就是留下了一个巨大的隐患。在任何一个时刻，任何一个人物想要起事作乱，都可以打上拥戴崇祯太子的旗号，而这个旗号必定会有巨大的号召力。由于有这种担心，清朝的统治者绝不能让一个明朝的太子留在世上。但他们不愿正面做这件事，害怕留下一个不“宽仁”的千古骂名，于是导演了一幕认证真伪的闹剧。

其实太子出宫还不到一年，京城里有许多熟悉他的人，其中还包括他的亲妹妹和长期在他身边侍奉的太监，要认证真假并不困难。但清廷早已抱定了以真为伪的决心，而且把这个决心表达得十分明确，一件简单的事情就变得非常复杂。太子被关押起来，先由亲属认证。周奎和周绎都一口咬定太子是假的，长平公主先说是真的，被周奎打了一记耳光后，才哭哭啼啼不敢再讲话。原来太子亲随太监中有坚持太子是真的，随后都被处死，剩下的自然不敢放肆，也都异口同声说太子是伪冒。甚至教过太子读书的原明内阁大学士谢升也坚持说这个太子不是真的。太子对他说：谢先生，某年某月，先生讲书时说过某事，现在还记得吗？谢升实在无法回答，只得作了一揖，赧然退下。



南明永历政权颁发契尾

一些汉族官员对这种指鹿为马的行径非常愤慨，接连上章争辩。民间百姓也果真以这位太子为旗号造起反来，山东东阿县民祁八、秀才杨凤鸣等人聚众起义，给清朝官员发出通牒说：“你们速放还我太子，否则要把你们杀光。”这种情况反而使清廷更加紧张，就对反叛和坚持太子是真的朝臣士民一律无情打击。祁八的暴动很快就被镇压了；在这年年末朝中又处决了15个坚持太子是真太子的官员和普通百姓。所谓的伪太子也在结案后被处死。高压之下，一场风波才算平息。而可怜的太子朱慈烺虽然逃过了几次兵难，却最终没有躲过清朝统治者的屠刀。

长平公主为此事受了很大的刺激，本来重伤未愈的身体更加不堪。她也再不愿意住在无情无义的外公家里了。在清顺治二年（1645）初，她上书给清朝皇帝，请求允许她削髮出家。清廷却不同意，而是要早在崇祯年间已经同公主定亲的周世显把公主娶回家去。周世显家尊旨把这位前明公主娶到家里，公主的身体却每况愈下，才一年工夫，就在哀怨中死

去。

在一个男性中心的社会里，胜朝女性遗嗣的生死已经无关大局。但崇祯帝的儿子们不论生死，却还在产生着巨大影响，时时制造出大大小小的政治震盪。清顺治二年（1645，南明弘光元年）初，北京的太子事件刚刚平静下来，南京却又冒出来一个“崇祯太子”，事情更曲折，对政局的影响也更大。

还是前一年冬天，南京鸿胪寺少卿高梦箕的僕人穆虎从北方南下，在路上遇到一个少年，自称是东宫太子。穆虎不敢怠慢，把他一路带到南京。高梦箕开始还不大相信，与他交谈，听他大谈宫中轶事，还是分辨不出真伪。问到崇祯帝、后的情况，那位“太子”就号啕大哭，问到北京陷落后的情况，他说李自成把他当成儿子一样，待他很好。高梦箕本来想要报告朝廷，但想到现在太子的堂叔福王已经作了皇帝，可能会做出不利于太子的事情来，就把他祕密送到杭州自己侄子高成的家中。但这位“太子”很不老实，常常酣饮狂啯，说些无法无天的大话。如此一来，祕密保不住了，高梦箕又把他转移到金华府的江浦，但仍然是流言腾起。高梦箕无奈，只得在这年正月报告朝廷。

弘光帝听到这个消息也着实吃惊不小，因为崇祯帝的亲儿子来到南方，对于他刚刚登上的皇帝宝座实在是太大的威胁。所以他一听到消息就召亲近大臣到内殿说：“太子若是真的，将把朕放在什么位置呢？卿等一定要仔细地查问。”明确暗示大臣们要查出一个假太子来。但南京政府毕竟是明朝的政府，对于太子的事比北京方面慎重小心得多。弘光帝派太监把那个少年从浙江带到南京，委派了大学士马士英、王铎、蔡奕琛以及勋戚朱国弼等人召集府部大小九卿科道讲读官，对其辨别真伪。这次参加辨认的官员中有不少人见过太子，其中刘宗正、李景濂还做过太子的讲官，这些人见到那个少年后都说不是太子。辨认时还问了少年一些宫

中情况，回答中也有许多错误。但那少年态度相当倨傲，朝臣们因为事关重大，全都缄口不言，一时无法定案。最后还是大学士王铎大声说了一个字：“假！”就昂然而去，才算打破僵局，诸臣共同认定这个南来“太子”是个假的。

在随后的审问中，那少年承认自己是驸马王昺的侄孙，叫王之明，家住保定府高阳县，因时局变幻，太子不知下落，才起意冒太子之名，希冀富贵。事已至此，应该可以结案，为了防止民间误传，弘光帝还特地传各省的提塘官（负责通信联络的驻京官员）和南京的市民代表旁听审讯，并且把审讯记录刊刻出来颁行天下。但民间和各地的官员对于这个结果还是大为怀疑，各式各样的流言传遍大江南北。特别是一些手握重兵的驻镇大将，认定朝廷是故意以真为伪，要保住弘光的帝位，加害于东宫太子。弘光帝和了解真相的朝臣们竟然是有理说不清，只得把那王之明关在狱中，等着慢慢解释。

但时间却已经不容弘光君臣慢慢解释了。就在南京太子案闹得沸沸扬扬的时候，清豫亲王多铎率领大军开始进军征讨南明，仅一个多月的时间就攻到了长江北岸。与此同时，驻扎在武昌的大军阀左良玉也以救护在南京的太子为藉口，自称奉了太子的密诏，率军顺江东下。他在公佈的讨逆檄文中宣称：“率师远来，原为讨彼贼臣，救我嗣主，以申一念痴忠，用彰千古大义。”一副大义凛然的样子，要攻入南京诛杀奸臣以清君侧。北面、东面两路大军的同时进攻使得防御力量本来就十分薄弱的弘光政权根本无法支应，到了五月初八日夜，清军在镇江附近渡江，南明守军溃败。初十日，弘光帝逃离南京，跑到芜湖黄得功的营中，不久终于被清军俘获，后被处死。皇帝逃跑，南京城里一片大乱，百姓们从狱中抢出王之明，拥着他到宫内武英殿即位，乱闹了一番，到十五日清军入南京，王之明也成了俘虏，不久被杀。

弘光政权从建立之日起，廷臣纷争门户，君主昏庸矇昧，内乱不息，毫无建树，覆灭本属在劫难逃。但如果不是有个假太子事件，没有左良玉的东征，或许弘光政权还能再多支应几天。一个浮浪子弟，只是冒了一下已死皇帝嗣子的名字，就足以在朝野间引起巨大的政治风波，甚至加速了一个王朝的灭亡。专制君主的亡魂在一个专制社会中的巨大能量，真是危险已极。

南北两个太子都死于非命，不论是把北太子当成真太子的，还是把南太子当成真太子的，都不再对太子的復出抱什么期望。但崇祯帝还有两个儿子定王和永王没有下落，崇祯帝的亡灵也就依然还时时要显现一下。在清初的顺治和康熙两代，民间一直在盛传着关于“朱三太子”的传说，大体是说，崇祯帝尚有一个“三太子”活在人间，并且似乎还一直在进行着“反清復明”的活动。这个朱三太子到底是指定王朱慈灿还是永王朱慈焕一时也弄不清楚，因为按正式排行，定王行三，而以崇祯末年活着的诸子排序，则永王又是排在第三的位置。民间同样弄不清这朱三太子的名字，只知道总而言之是个朱慈什么，因而传说中有叫朱慈英的，有叫朱慈璊的，不一而足。尽管朱三太子的面貌如此不清晰，一时蓄意要反清復明的志士和趁乱揭竿而起的草莽英雄却都把他当作怀思故国的寄託和号召天下的旗帜，甚至一些奸邪棍徒也喜欢用这个名义去招摇撞骗。

顺治八年（1651），有人在江南出首，一名自称是定王朱慈焕的青年被都督马国柱抓获。据其口供说：曾随大顺军至荆襄，大顺军兵败后流落四方。这个“朱三太子”下落不明，大约是被清朝当局杀掉了。

顺治十二年（1655），有个叫朱周錤的人自称“朱三公子”，在苏北组织反清活动，在扬州被捕，处死。

顺治十三年（1656），直隶真定（今河北正定）有自称是崇祯帝之子朱

慈焞的，谋举大事，事发在平山被抓获，处死。

顺治十六年（1659），有一个江湖无赖以崇祯帝之子朱慈英的名义在河南诈骗，事发被逮入北京，经审讯得知，此人已经用这个名义在全国各地行骗多年。这个骗子后来被清朝处死。

康熙十二年（1673）末，吴三桂叛清，京师人情汹汹，有人自称朱三太子朱慈璊，密谋在北京起事，甚至祕密改元为广德元年。这一次由于事机不密，还没有真正动起手来就被破获，所谓的朱三太子却逃脱掉了。审讯得知，那假冒的朱三太子原名杨起隆，后来杨起隆不知所终。

此后在平定“三藩”之乱的几年间，以朱三太子名义起事造反的竟在天南地北各处屡屡发生。康熙十九年（1680），大将军图海在汉中抓到了一个据说是杨起隆的人，正在陕西借朱三太子之名造反，审讯后发现不但不是什么故明太子，而且也不是真的杨起隆，而是一个旗下逃奴，后来被凌迟处死。

在各式各样的朱三太子中，有一个看起来比较像是真的。那是清朝的定远大将军安亲王岳乐在康熙十八年（1679）在湖南抓获的。当时清军在对吴三桂的战争中已经取得了巨大优势，吴三桂在前一年仓促登基后死了，部将逃散的逃散，降清的降清。岳乐统兵在湘中一带，抓到了几个趁着乱世招兵买马的草头王，为首的是歷来倡教作乱的白莲教支派无为教的首领，姚文明和戴必显。两人招供出参加活动的还有一个还俗的和尚，自称是崇祯帝的太子。岳乐乃派兵到新化县的一个寺庙里把那还俗和尚捉拿归案。据后来他书转述的口供来看，那人自称叫朱慈灿，说是12岁遭难逃出京城，在南京被福王监禁过，后出狱为民，先在河南随朽木和尚为僧，后流落江西、湖广20余年，因病还俗。“三藩”之乱起，他不能再安分，才伙同姚、戴等人招兵散札，声称要讨伐吴三桂云云。

这位朱三太子用的名字慈灿是正确的，而在当时，许多明朝遗臣对这个名字都并不太清楚，一个游方江湖的和尚是不大可能知道的。其他那些假朱三太子，所用的就多是慈璊、慈英一类不着边际的名字。他的供词也有不少疑点。如说是12岁遭难，同当时惯用的虚岁差了一岁；说被福王监禁过，于史无证。但清廷对于故明皇子的事情向来多有忌讳，在官书上转录的口供，并不完全可信。因而这个朱三太子很可能就是真的定王朱慈灿。

这朱慈灿在第二年岳乐班师回朝的时候被带回北京，清廷经过法司审问，还同原北京杨起隆“朱三太子案”中的案犯对质，互相都不认识，最后决定，以谋乱罪同姚、戴等俱处斩。朱慈灿不认识杨起隆的党羽，是情理之中的事，说明不了任何问题。对于他皇子身份的真伪，康熙帝也只是很轻率地说了一句：“彼时朱慈灿年甚小，必不能逸出，今安得尚存？大约是假。”就算是否定了。比起当年处理北太子案时像是更加漫不经心，实际上却是更为处心积虑。因为越是真正的崇祯帝的子孙，清朝统治者越是要斩草除根，同时又要尽量不留痕迹，表面漫不经心地含混过去，实为上策。

经过多少年的沧桑鉅变和数不清的兵荒马乱，崇祯帝的三个儿子中只有最小的永王朱慈焕竟奇蹟般地倖存下来，而且娶妻生子，形成了一个很大的家庭。只是到了康熙四十七年（1708），距离甲申之变已经60多年了，一场飞来横祸终于还是把这个家庭彻底毁灭了。

年龄最小的永王朱慈焕在大顺军溃败的时候由一个开小差的毛将军携带着逃到河南，在河南种了一年地。后来清政府清查“流贼”，姓毛的害怕出事，抛下朱慈焕一个人跑了。年仅13岁的朱慈焕只好一个人流浪，在凤阳遇到了一位姓王的明朝给事中，说明了自己的真实身份。王给事老于世故，对外人绝不透露此事，让朱慈焕改姓了自己的王姓，当成自己

的儿子养着，让他同自己的儿子一块读书。这段时间，他的生活相当安定，也受到了良好的教育，成了一个标准的青年学士。到十八九岁上，王给事病逝，他无法在王家继续住下去，就出走江南。因为没有谋生的手段，他一度削髮为僧，到处云游化缘。后来他在浙江遇到一位姓胡的故明官员，大概又一次透露了自己的真实身份。胡某同样是出于对故国的感情，在家里收留了他，让他蓄髮还俗，并且把自己的女儿嫁给他做妻子。从此他冒籍浙江余姚，以余姚王先生的身份娶妻生子，大体以教书为生，成了一个清朝的顺民。

岁月悠悠，一晃就是几十年过去。这期间“王先生”生了6个儿子、3个女儿，还娶了妾，子又生孙，有了一个很庞大的家庭。为了养家餬口，“王先生”常常或是单独一人或是携家带口到各地为人做西席教书先生，也认识了不少清朝的官员士绅。在大多数情况下，他对自己的身世守口如瓶，身在外地的时候甚至还再次改名换姓，或说姓王，或说姓张，名和字、号也时有改变。这一方面说明这位故明皇子相当谨慎，深知暴露真实身份的极大危险性；但另一方面也表明他把自己的真实身份这一点始终看得极重，并没有从心底里放下出身高贵的架子，彻头彻尾地变为一介普通平民。因为有着这种意识，他的皇子身份在家庭内部是并不保密的，妻妾子女大概都知道自己的家庭有着非同寻常的血统。“王先生”还严格按照明代宗室家谱的排辈顺序给儿子们起了标准的龙子龙孙的佳名，诸子排“和”字辈，名中后一个字均为土部的怪字。对于一些最亲密的朋友，他也忍不住要透露出自己的真实身世。这大约是一种难以割捨的“高贵意识”，在一个帝王具有绝对权威的君主专制社会里也许是无法避免的。但正是这种意识最终害了他和他的全家。

忍不住要透露出的帝王血统慢慢被一个极小的圈子中的人瞭解了，而且在更大的范围内被当作模煳不清的传闻流传开。直到康熙后期，各地的

豪杰会党仍旧在打着“反清復明”的旗号造反起事。在浙东地区有个张念一又称念一和尚的，聚集部众在大岚山起事，在嵊县、慈溪、上虞等地抗拒官兵，一时颇有声势。张念一的部下中就有知道一些有关“王老先生”（即朱慈焕）的信息的，但显然并不十分清楚。因而张念一在造反的文告中就仍按民间惯例，号称自己拥戴着“朱三太子”，也就是崇祯帝之子定王，用来争取民心。可见张念一等人也没有弄清楚，现在活在浙江的“朱三太子”其实是永王朱慈焕，而非定王朱慈灿。

造反活动引起清朝统治者的重视，通过明察暗访和对俘获人员的审讯，他们得知，所谓“朱三”就是余姚的王老先生王士元。“王老先生”本人也听到了一些风声，当时他一家人正寄居在宁波的一个监生家里，为了避免牵连，就举家迁到了湖州府的长兴县。但“王老先生”怕全家搬迁，动静太大，还是不安全，就领着长子和四子北上到山东，找到一个过去的老朋友家里住下。官府果真根据线索找到了“王士元”一家，立即捕捉。朱慈焕的妻、妾、三个女儿和一个儿媳按照崇祯帝一家的老传统，全部自缢而死，男性成员除了一子早已故去，3个儿子和1个孙子都被抓住。这是康熙四十五年（1706）的事情。

至康熙四十七年（1708）初，大岚山的造反活动被清军彻底镇压下去，张念一等人被抓获，对于“朱三”的追捕也更加紧迫起来。这年四月，清官府的军役到山东汶上县逮捕了朱慈焕和他的两个儿子，先押解到省城济南，不久又押送到杭州去与大岚山的叛乱分子对质。张念一等首犯其实都并不认识朱慈焕，朱慈焕在审讯时也一口否认参与了谋反。他对主审的官员说：“今上（康熙帝）有三大恩于前朝：流贼乱我国家，今上诛灭流贼，与我家报仇，一也；凡我先朝子孙，从不杀害，二也；吾家祖宗坟墓，今上躬行祭奠命人洒扫，三也。况吾今七十五岁，血气已衰，鬓髮皆白，乃不作反于‘三藩’叛乱之时，而反于清宁无事之日乎？且所

谓谋反者，必估据城池，积草屯粮，招买军马，打造盔甲，吾曾有一于此乎？”说得既哀婉可怜，又合情合理。

但对于康熙帝和他的王朝来说，既不想造反又没有造反能力的朱慈焕和他的儿孙们仍然是一种潜在的巨大危险，因而只有彻底剪除才能彻底放心。困难在于，从顺治帝到康熙帝，一直都在假仁假义地高唱举逸兴绝，善待前朝帝裔，以示自己的宽仁大度和守礼好古。直到朱慈焕案发的前10年，康熙帝在南巡的时候祭奠了明孝陵，见到毁圮得很严重，还向身边的大臣表示：“朕意欲访察明代后裔，授以职衔，俾其世守祀事。”这一次明代的后裔真被“访察”到了，而且是最正宗的崇祯帝的亲生儿子，一向胸怀广阔的康熙帝却没有公开其身份，授予其职衔的胆量。为了不食前言，唯一的办法就是拒不承认朱慈焕的真实身份。

康熙四十七年（1708）九月，朱慈焕父子6人又被从杭州押解到北京。（他的孙子钰宝本来也到了杭州，在当年六月的上谕中还提到要将他一起带来京城，但后来好像并没有到北京，可能已死于杭州狱中。）清廷九卿在审讯之后奏报：“朱三供伊系崇祯第四子。查崇祯第四子，已于崇祯十四年身故。又遵旨传唤明代年老太监，俱不认识。朱三明系假冒，朱三父子应凌迟处死。”崇祯帝的第四子根本没有在崇祯十四年身故，这是明末和清初各式各样的史籍中有明确记载的；而明朝亡国已60多年，就算真有当年的小太监还留在清宫，又怎么可能认识当年的皇子呢？而这些毫无道理的判断竟然也就成了定案的根据。康熙帝开恩，只将“王世元”即朱慈焕一人凌迟处死，他的5个儿子都被判为斩立决。

至此，崇祯帝的全体儿孙们都被杀了个精光，再也不能让人奉为造反的旗帜了。

苍茫大地，真是干净。

崇祯帝大事年表

万历三十八年（1610），一岁

十二月二十四日，生于紫禁城慈庆宫。父朱常洛（明光宗），生母刘氏。

万历四十二年（1614），五岁

生母刘氏卒，由李选侍（康妃）监护。

万历四十三年（1615），六岁

五月，“梃击案”发，陪同祖父朱翊钧（明神宗）及父、兄召见朝臣。

万历四十四年（1616），七岁

努尔哈赤在赫图阿拉建立“后金”，称大汗。

万历四十六年（1618），九岁

后金以“七大恨”伐明，佔领抚顺。

万历四十七年（1619），十岁

明金萨尔浒之战，明军大败。

万历四十八年（1620），十一岁

七月，神宗病逝，父常洛继位为皇帝。

九月，光宗病逝，兄朱由校（明熹宗）继位，以当年八月以后为泰昌元

年。

接连发生“红丸案”和“移宫案”，改由东李选侍（庄妃）监护。

天启元年（1621），十二岁

后金军分8路进攻辽东，佔领辽阳、渖阳等主要城市，辽东大部沦陷。

天启帝信用乳母客氏及太监魏忠贤，委以大权。

天启二年（1622），十三岁

九月，受封为信王。

天启四年（1624），十五岁

秋，东林党人发起对魏忠贤的攻击，失败，魏忠贤开始专权。

天启六年（1626），十七岁

正月，努尔哈赤率军攻宁远，袁崇焕固守，后金军不克而归。

八月，努尔哈赤病故，八子皇太极继位。

十一月，离开紫禁城，搬入信王邸。

天启七年（1627），十八岁

二月，娶王妃周氏，即周皇后，及庶妃田氏、袁氏。

八月，明熹宗病逝，遗诏以皇五弟继位。二十四日，即皇帝位，改元崇祯。

九月，册周氏为皇后。

十一月，籍没宦官魏忠贤及熹宗乳母客氏，魏忠贤自杀。

裁撤各处监军太监，并禁太监擅自出京，干预政务。

十二月，会推阁臣，以枚卜方式选任钱龙锡等6人为内阁大学士。

崇祯元年（1628），十九岁

五月，焚燬《三朝要典》。

七月，召对袁崇焕于平臺，袁崇焕提出5年復辽。

八月，定制，每日在文华殿与辅臣共同处理朝政。

十一月，会推阁臣，温体仁、周延儒同东林党人发生激烈冲突。

是年陕西等地大灾，此后灾害频仍，出现全国性大饥馑。陕西爆发大规模农民起义。

崇祯二年（1629），二十岁

二月，长子朱慈烺生，明年册封太子。

批准裁整驿站。

三月，定立“逆案”，入案者255人，分别惩处。

五月，以徐光启主持用“西法”修订历书，至崇祯八年修成《崇祯历书》137卷。

六月，袁崇焕擅杀东江总兵毛文龙。

十月，后金军第一次入塞，威胁北京。袁崇焕入卫京师，被逮，明年被杀。

十二月，周延儒入阁。

是年江南学人团体“復社”在吴江尹山召集第一次大会。

崇祯三年（1630），二十一岁

春，陕西三边总督杨鹤对农民军剿抚并用，部分农民军流动至山西。

五月，后金军返辽东。

六月，温体仁入阁。

十二月，加派“辽饷”153万余两，合原加派“辽饷”共计680万余两。

是年，东林党人同反对派为争夺权力纷争不已，东林派辅臣韩爌等相继罢去，钱龙锡被逮治，后遣戍。

御马监太监庞天寿等受洗加入天主教，天主教开始进入宫廷活动。

崇祯四年（1631），二十二岁

正月，赈济陕西灾民，定议对农民军实行以抚为主的政策。

八月，后金军围攻辽东前线重镇大凌河，十月城降。

九月，杨鹤以招抚不效被逮治，招抚政策失败，陕西、山西农民起义更炽。

復遣太监出京监军，并以太监张彝宪总理户、工两部钱粮。

闰十一月，登州游击孔有德等叛乱，骚扰山东各地。

崇祯五年（1632），二十三岁

八月，皇三子朱慈灿生，后封定王。

崇祯六年（1633），二十四岁

六月，皇四子朱慈焕生，后封永王。

周延儒罢，温体仁遂为首辅。

十一月，农民军大批渡过黄河，进入河南地区。

崇祯七年（1634），二十五岁

正月，以陈奇瑜为五省总督，主持围剿河南、陕西等处农民军。

七月，后金军第二次入塞，蹂躏宣府、大同一带。

八月，撤内监监军、监部，此后旋撤旋復。

十一月，陈奇瑜以剿抚无效罢职逮治，改任洪承畴为五省总督。

崇祯八年（1635），二十六岁

正月，农民军克凤阳，掘皇陵。明廷调集各省精兵7万余在中原进行会剿。

八月，以卢象升为总理，与洪承畴分责东南、西北的剿除农民军战事。

十月，下诏罪己。

十一月，郑鄤案起。

崇祯九年（1636），二十七岁

年初，农民军主力高迎祥等部纵横于豫、皖、川、陕各省。

三月，工部侍郎刘宗周上《痛愤时艰疏》，对崇祯帝治国政策进行系统批判。

四月，皇太极即皇帝位，建国号大清，改元崇德。

七月，清军第三次入塞，攻掠京畿地区。九月返回。

高迎祥在陕西作战失利，被俘。

崇祯十年（1637），二十八岁

年初，相继发生讦告復社“败坏风俗”、“以乱天下”的事件。

三月，杨嗣昌出任兵部尚书，提出“十面张网”的对农民军作战计划。

闰四月，加派“剿饷”280万两。

以熊文灿为总理，主持“十面张网”会战。

六月，温体仁罢。

八月，阅城。

崇祯十一年（1638），二十九岁

六月，以程国祥、杨嗣昌等5人入阁，杨嗣昌仍兼兵部尚书。

七月，召对，理学大师黄宗周同崇祯帝亢直辩论。

復社诸公子发表《留都防乱公揭》，讨伐阉党分子阮大鋮。

九月，清军第四次入塞，扫荡畿南、山东。卢象升于十二月战死。

是年，农民军张献忠等部相继受抚；李自成部在陕西接连失利，此后潜

伏于川、陕、楚交界山区。农民起义一度陷入低潮。

崇祯十二年（1639），三十岁

正月，清军克济南，掳德王。

三月，清军班师。明廷以“五大法案”杀各级失事官员36人。

五月，张献忠、罗汝才在谷城、房县再度起义。

六月，加派“练饷”730多万两。

七月，农民军在罗猴山大败明军左良玉等部。

八月，以杨嗣昌为督师，主持围剿农民军。

是年催逼勋戚李国瑞等捐助，因皇五子朱慈焕死亡而停止。

崇祯十三年（1640），三十一岁

二月，张献忠部在玛瑙山受到重创。

六月，首辅薛国观罢，明年八月被杀。

秋，张献忠、罗汝才部进入四川，攻克大批州、县。

崇祯十四年（1641），三十二岁

正月，李自成部復振，攻克洛阳，杀福王。

张献忠部出川，二月克襄阳，杀襄王。

二月，李自成部围攻开封。

再召周延儒入阁，九月至。

三月，杨嗣昌悸怖死，丁启睿继任督师。

春，清军对锦州实行包围，明廷调集13万大军出山海关救援。

八月，明清松锦决战，明军大败，主力部队大部被歼，蓟辽总督洪承畴等被迫困守于松山、锦州等4城中。

九月，李自成部于项城聚歼明军数万人，杀陕西总督傅宗龙。

十二月，李自成部再围开封。

是年周延儒主持阁务，东林势力復兴。

崇祯十五年（1642），三十三岁

新年，揖拜阁臣，再图振兴。

正月，以马绍愉为特使，同清朝进行谈判。

二月，李自成部在襄城大败明军，杀陕西总督汪乔年。

三月、四月，松山等城相继破，洪承畴被俘，降清。

五月，李自成部三围开封。

七月，皇贵妃田氏病故。

对清和谈机密泄露，兵部尚书陈新甲为此被杀。和谈彻底中断。

九月，黄河堤溃，开封被水冲毁。

十月，李自成在郏县大败明陕西总督孙传庭部。

十一月，清军第五次入塞，深入山东，俘获人口36万多。

闰十一月，第二次下诏罪己。

崇祯十六年（1643），三十四岁

年初，李自成在襄阳建立政权。

二月起，京师瘟疫流行。

三月，左良玉部变乱。

四月，清军出塞去。

五月，张献忠部克武昌，杀楚王，正式建立“大西”政权。

周延儒罢。

六月，第三次下诏罪己。

七月，吴昌时等案起，牵连原任大学士周延儒、吴甡。

八月，清太宗皇太极病故，幼子福临继位，改明年为顺治元年。

九月，李自成再败明督师孙传庭于郏县。

十月，李自成攻克潼关，孙传庭战死。农民军相继攻战西安及陕西全省。

十二月，赐周延儒自尽。

崇祯十七年（1644），三十五岁

正月初一日，李自成在西安称帝，建国号“大顺”。随即分兵两路向北京进军。

正月，以大学士李建泰为督师，出京抵御大顺军。行“遣将礼”。

二月，大顺军克太原，发佈《永昌元年诏书》。

第四次下诏罪己。

三月，李自成部兵临北京城下。

十八日，下诏罪己，下诏“亲征”。当夜在宫中屠杀妻妾、女儿。

十九日凌晨，自缢于禁苑煤山。

主要参考书目

1.刘若愚《酌中志》，商务印书馆“丛书集成初编”本。

2.文秉《先拨志始》，上海书店1982年12月版。

3.黄宗羲《明儒学案》，中华书局1985年10月版。

4.顾秉谦等撰《三朝要典》，臺湾伟文图书出版社1972年版。

5.夏燮《明通鑑》，中华书局1959年4月版。

6.李逊之《三朝野记》，上海书店1982年5月版。

7.王誉昌《崇祯宫词》，北京古籍出版社1987年5月《明宫词》本。

8.张廷玉等撰《明史》，中华书局1974年4月版。

9.李清《三垣笔记》，中华书局1982年5月版。

10.沈国元《两朝从信录》。

11.朱长祚《玉镜新谭》，中华书局1989年9月版。

12.陈子龙等选辑《明经世文编》，中华书局1962年6月版。

13.《明熹宗实录》，臺北“中央研究院歷史语言研究所”1962年5月《明实录》本。

14.孙承泽《思陵典礼纪》，商务印书馆《丛书集成初编》本。

15.汪楫《崇祯长编》，臺北“中央研究院歷史语言研究所”《明实录》

本。

16.《礼记》，中华书局1980年9月《十三经注疏》本。

17.黄宗羲《明夷待访录》，臺湾金枫出版社1987年5月版。

18.文秉《烈皇小识》，上海书店1982年10月版。

19.傅维麟《明书》，商务印书馆《丛书集成初编》本。

20.《明□宗□皇帝实录》，臺北“中央研究院歷史语言研究所”《明实录》本。

21.商衍鎏《清代科举考试述录》，三联书店1958年5月版。

22.吴应箕《两朝剥復录》。

23.计六奇《明季北略》，中华书局1984年6月版。

24.佚名《崇祯新政纪略》。

25.孙承泽《崇祯勤政纪》，商务印书馆《丛书集成初编》本。

26.谈迁《国榷》，中华书局1958年12月版。

27.余继登《典故纪闻》，中华书局1987年7月版。

28.谷应泰《明史纪事本末》，中华书局1977年2月版。

29.徐鼒《小腆纪年》。

30.黄宗羲编《明文海》，中华书局1987年2月版。

31.孙承泽《春明梦余录》，江苏广陵古籍刻印社1990年9月版。

32.《钦定逆案》，上海书店《先拨志始》本。

33.夏允彝《倖存录》，上海书店1988年11月《明季稗史初编》本。

34.查继佐《罪惟录》，浙江古籍出版社1986年5月版。

35.吴晗《朱元璋传》，三联书店1965年2月版。

36.孙承泽《山书》，浙江古籍出版社1989年9月版。

37.周文郁《边事小纪》。

38.《清太祖高皇帝实录》，中华书局1986年11月《清实录》本。

39.张岱《石匮书后集》，中华书局1959年4月版。

40.《明清史料》（甲编），中央研究院歷史语言研究所1931年铅印本。

41.昭梿《啸亭杂录》，中华书局1980年12月版。

42.蒋良骥《东华录》，中华书局1980年4月版。

43.葛剑雄《中国人口发展史》，福建人民出版社1991年6月版。

44.中国科学院《中国自然地理》编委会《中国自然地理·歷史自然地理》，科学出版社1982年版。

45.吴伟业《绥寇纪略》，上海古籍出版社1992年7月版。

46.戴笠《怀陵流寇始终录》，臺湾广文书局1969年7月版。

47.朱朝瑛《垒庵杂述》。

48.孙承泽《天府广记》，北京古籍出版社1982年1月版。

49.金光宸《金双巖中丞集》。

50.郑天挺等编《明末农民起义史料》，中华书局1954年版。

51.彭孙贻《流寇志》，浙江古籍出版社1983年8月版。

52.杨嗣昌《杨文弱先生集》。

53.陆世仪《復社纪略》，上海书店1982年3月《东林始末》本。

54.王鸿绪《明史稿》。

55.杨士聪《玉堂荟记》。

56.谈迁《北游录》，中华书局1960年4月版。

57.蒋平阶《东林始末》，上海书店1982年3月版。

58.谈迁《枣林杂俎》，江苏广陵古籍刻印社1983年12月《笔记小说大观》本。

59.杨士聪《甲申核真略》，浙江古籍出版社1985年2月版。

60.《崇祯实录》，臺北“中央研究院歷史语言研究所”《明实录》本。

61.顾公燮《消夏闲记摘抄》。

62.费密《荒书》，浙江人民出版社1983年10月版。

63.郑廉《豫变纪略》，浙江古籍出版社1984年6月版。

64.彭孙贻《平寇志》，上海古籍出版社1984年1月版。

65.张凤翼《枢政录》。

66.周同谷《霜猿集》。

67.锁绿山人《明亡述略》，上海书店1982年3月《崇祯长编》本。

68.于敏中等编纂《日下旧闻考》，北京古籍出版社1983年5月版。

69.《卢象升疏牍》，浙江古籍出版社1985年2月版。

70.温璜《温宝忠先生遗稿》。

71.杨光先《野获》。

72.《孙传庭疏牍》，浙江古籍出版社1983年10月版。

73.杨松山《孤儿吁天录》。

74.《清太宗文皇帝实录》，中华书局《清实录》本。

75.《孟子》，中华书局《十三经注疏》本。

76.邵廷寀《东南纪事》，上海书店1982年9月版。

77.饶智元《明宫杂咏》，北京古籍出版社《明宫词》本。

78.史梦兰《全史宫词》，北京古籍出版社《明宫词》本。

79.孟森《明清史论着集刊》，中华书局1959年11月版。

80.何其敏《中国明代宗教史》，人民出版社1994年4月版。

81.樑家勉编着《徐光启年谱》，上海古籍出版社1981年4月版。

82.李馥荣《滟滪囊》。

83.顾诚《明末农民战争史》，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4年10月版。

84.抱阳生编《甲申朝事小纪》，书目文献出版社1987年3月版。

85.吕维祺《明德先生文集》。

86.徐树丕《小识录》。

87.程嗣章《明宫词一百首》，北京古籍出版社《明宫词》本。

88.陈去病《五石脂》。

89.王应奎《柳南随笔》，中华书局1983年10月版。

90.万斯同《明史稿》。

91.杨彝《復社事实》。

92.陈子龙《陈忠裕公年谱》。

93.夏完淳《续倖存录》，上海书店《明季稗史初编》本。

94.吴应箕、陈贞慧《南都防乱公揭》。

95.吴翌凤《镫窗丛录》。

96.陈贞慧《书事七则》。

97.杜登春《社事始末》。

98.叶梦珠《阅世编》，上海古籍出版社1981年6月版。

99.《明清史料》（乙编），中央研究院歷史语言研究所1935年铅印本。

100.计六奇《明季南略》，中华书局1984年12月版。

101.赵尔巽等撰《清史稿》，中华书局1977年12月版。

102.边大绶《虎口余生纪》，上海书店1982年4月版。

103.白愚《汴围溼襟录》，上海书店《虎口余生纪》本。

104.吴伟业《吴梅村全集》，上海古籍出版社1990年12月版。

105.熊开元《熊鱼山先生文集》。

106.孙之騄《二申野录》。

107.佚名《崇祯长编》，上海书店1982年3月版。

108.钱馨《甲申传信录》，上海书店1982年1月版。

109.顾宗泰《胜国宫闱词》，北京古籍出版社《明宫词》本。

110.蒋德暻《悫书》。

111.刘健《庭闻录》，上海书店1985年7月版。

112.李邦华《皇明李忠文先生集》。

113.李长祥《天问阁集》。

114.刘尚友《定思小记》，浙江古籍出版社《甲申核真略》本。

115.张正声《二素纪事》。

116.赵世锦《甲申纪事》，中华书局1959年12月版。

117.戴名世《弘光朝伪东宫伪后及党祸纪略》，上海书店《东林始末》

本。

118.温睿临《南疆逸史》，中华书局1959年11月版。

119.《清世祖章皇帝实录》，中华书局《清实录》本。

120.李天根《爝火录》，浙江古籍出版社1986年4月版。

121.屈大钧《翁山诗外》。

122.黄宗羲《弘光实录钞》，上海书店《甲申传信录》本。

123.娄东梅村野史《鹿樵纪闻》。

124.陆圻《谶言》上海书店1982年4月《三湘从事录》本。

125.鄂尔泰等编《八旗通志》（初集）。

126.《清圣祖仁皇帝实录》，中华书局《清实录》本。

Table of Contents

封面
关于“回顾丛书”
再版前言
首版前言
卷壹 平步青云上九重
一 深宫少年
二 信王殿下
三 初登大位
四 拨乱反正
卷贰 守业艰难百事多
一 会推风波
二 己巳之警
三 西北烽烟
四 朝中朋党
卷叁 励精图治总无期
一 刚明求治
二 下诏罪己
三 君臣之间
四 战和两难
卷肆 烽火惊传事日非
一 三十而立
二 枢辅督师
三 江南復社
四 松山败绩
卷伍 生于末世运偏消
一 绝处图强
二 土崩瓦解
三 煤山惨雾
四 遗胤余波
崇祯帝大事年表
主要参考书目